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朱德传

 **eBOOK**
网络资料 非同凡响

朱德传

一、佃农的儿子

四川省北部的仪陇县，位于嘉陵江中游的东岸，是嘉陵江和渠江之间的一片狭长的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狭，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这里缺水少矿，土地贫瘠，是四川的偏僻山区。但嘉陵江向南经过重庆流入长江，还有一条驿道穿过仪陇可以通往成都。所以，外界的消息还常能传到这里来。

仪陇县城坐落在金城山的半山腰上。金城山东南约三十七公里，有一个马鞍场，它因镇旁有一座马鞍形的山而得名。马鞍场西北约两公里处，突起一座山梁，一峰屹立，松柏参天，草茂林密，叫琳琅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辰时），朱德就诞生在琳琅寨脚下李家湾一个佃农的家里。

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省韶关县的客家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流行严重的疫病，使四川人口稀少，荒地很多，有些城镇甚至成为虎狼出没之区。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它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一系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的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群大群的外省人经过长途跋涉，迁移到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历史上称它为“湖广填川”。朱德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场。后代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了。

朱邦俊是朱德的祖父，在他上一代还有老业田三十挑（一亩约为五挑），到他那一代，四兄弟平分，只得到七挑多地，加上人丁兴旺，这点地已不够维持生计。于是，在一八八二年把土地和草屋典了三百吊钱，作为资金，领着全家到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琳琅寨西麓李家湾的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土耕种。从此，朱家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出生时，全家共有十一口人：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二哥朱代凤，姐姐朱秋香。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朱德在姊妹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在封建社会里，男子在家庭中特别受到重视。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大，便以动物命名，想用来骗过那些专门捉拿男孩子的“鬼怪”，给朱德取乳名叫“狗娃子”。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一生都在家里劳动，从未出过远门，“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但由于没有文化，思想比较狭隘。

朱德的母亲出身于姓钟的贫苦人家。她身材高大，“有着一般农妇的强壮的体力”，性情“贤淑和气”，“从来不发（脾）气，不打人、骂人”。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同长辈、叔伯、妯娌都能和睦相处，对朱德更是特别爱抚。“她不嫌弃人，爱穷人，给叫化子也要说几句话”。她又是个好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在生朱德前一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母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朱德。朱德从幼年时起便在母亲身边帮助干活。他在一九四四年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还深情他说到：“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还说道：是母

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人口的增多更使家里必须十分节省才能维持生活。他家的住房原来是地主用来存放粮食的仓库，光线昏暗。全家从来没有吃过白米，多半是吃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油盐很少。过年时宰一头猪，要留着吃一年，只在过年过节时才可以吃到。遇上好年成，可以做件新衣服，平时就没有了。鞋子是家里自己做的。点灯用的也是自己家打的油。少年时代这种艰苦简朴的生活，给朱德留下深刻的印象。

全家后来有二十多口人。朱德回忆道：“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有人为他祖母所写的寿文也称她“事无钜细，皆躬自纪理无遗绪”，“内治殊谨严，令子侄皆以力事事。”自幼所过的这种有规律有组织的生活，对朱德的一生也是有影响的。

他小的时候，脾气很倔强，干什么事情，一干就干到底。他从小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还翻杠架，所以身体一直很健壮。

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朱德说：“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一八九二年前后，仪陇县一带兴起种植鸦片，百姓的生活比以往富裕了些。朱德家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有所好转。那时，清朝政府的苛捐杂税非常严重，“可是这些交粮催差的，就怕读书人”，因此，朱家几房人决心省吃俭用，送一两个孩子去念书，近一点说，可以为家里抵挡税吏、差役的欺侮和“帮助家里打打算盘”；远一点说，还期望今后能改变朱家的生活和地位。

这样，一八九二年，也就是朱德六岁的时候，老人把他们兄弟三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药铺垭私塾就因此而得名。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四百个铜钱。私塾离家不远，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秦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他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又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他家田地的地主。私塾丁老师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读了不久，两个哥哥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纪小，又过继给了伯父，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开始学作对联。

佃农的家庭真是多灾多难。租种地主的田地年年要交纳租粮，“一年除去五十担纳租以外，余下的将将够吃”，终年不得温饱。如果遇到灾年，日子就更加难过了。

一八九五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方加租子”，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来到朱家，逼着他们退佃搬家。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如晴天霹雳一样，震碎了朱德一家人的心。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向人家借了两百多吊，加上家里仅存的一百多吊钱，赎回原已典当出去的大湾老屋和祖业田。全家被迫分居两处：生父朱世林带领一家迁居陈家湾；朱德随养父母、三叔、四叔搬回大湾去住。在这里，朱德整整住了十四年。

悲惨的遭遇，严酷的现实，给年幼的朱德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仇恨那些欺压穷人的地主的种子，使他从小深深感到人世间的和平。后来，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

迁居大湾后，从第二年起，朱德又到离大湾不远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他的名叫国珍，聘三是他的字）老师读书。席聘三那时四十多岁。（11）朱德在这里断断续续地读了八年书。老师给他取字“玉阶”。

席家砭私塾与大湾相隔四公里。朱德每天清晨起床后，干点家里的劳动，然后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都要来回走四次，“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他家迁回大湾后，在镇外佃来三亩地。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里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有六七个月去读书。他后来回忆起艰辛的童年时代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指挥的士兵并肩走来走去。”“习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在毛尔盖（草地）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12）

席聘三，是当地一位很有见识的学者。他多次去考秀才未中，后来回家设馆，以教书为业。乡中男女老少都很尊重他。

朱德到席聘三私塾去读书的时候，正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这时的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威胁。清政府在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击下，可耻地屈服。它的腐败完全暴露出来了。接着，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之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如同一群饿狼，争先恐后向它扑来，恣意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它的血肉。这不能不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热血沸腾，忧心如焚。

席聘三历经沧桑，饱尝过人世间的种种辛酸，对历史十分熟悉。他又是个很“有骨气”而又“很懂人情世故”的人，思想开朗，喜欢纵论古今，抨击时弊，很有见地，“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提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更是满腔义愤，常说：“人不做事，没什么作用”，“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路。”朱德称赞他“是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13）

朱德随席聘三读书，从十岁到十八岁，这正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他对席聘三十分尊敬，所以受席聘三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时的朱德“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了。席聘三痛恨恶势力和追求救国救民真谛的精神，以及他那强烈的民族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朱德，使朱德的眼界开阔了，使他的思想在几年里“慢慢开展了”。他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14）

从增长知识这方面来说，朱德在席聘三门下读书，也获益不浅。朱德说，在这个时期，只要学生想学什么东西，席聘三就给他们讲什么东西，“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二十四史’”。以后还教朱德读《左传》。因此，朱德能把四书、五经、《史记》贯通起来，“二十四史”也“大致记得”（15），由于朱德聪明又肯学习，因而得到了席聘三先生的时时夸奖。

在这几年里，朱德不但广泛地阅读古籍，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朱德在同学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吴绍伯，年纪比他大，出身书香门第，家里有书房，书很多，还有个常跑成都的人给他带些“新学”书籍回来。吴绍伯就把这些书情给朱德看，于是“新学”书籍成了朱德经常的课外读物。他抓紧时间，拼命阅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借光了”，“吃了便宜”。

他们读了大量的新书，还见到别人从外地带来的地球仪，“眼光放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于是，渐渐萌发出一个念头：“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他们成天“打主意怎么样到成都，到外面”去，再也不想呆在家里了，因为“屋里是太闷人了”。（16）

朱德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无情搜刮，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和朝廷分摊的巨额赔款，此时的四川已是民穷财尽，整个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这几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荒，使本来缺粮的老百姓更陷入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转徙他乡，“殍殍相望于野”。他们有的倒毙荒丘，有的卖儿溺女，有的找有粮的人家要一点粮食，这叫做“吃大户”。一天，正在席聘三家里读书的朱德等，忽然听到屋外纷杂的呼唤、呐喊，走出教室一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走来，有六七百人。这些人穿着非常槛楼。男女老少，带着小孩。小孩子张着嘴巴在不停地哭喊。大人眼里露出悲痛的火焰！这凄惨的场面，把学生们都吓得跑了。可是，当地的士绅却从保宁府请来一百多官兵，把饥民打散，还杀了不少。朱德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17）

他从一八九六年入席聘三私塾读书，直到一九〇四年。最后一年，还得到席聘三的同意，住在他家里，只交一百斤米作为伙食。在席聘三先生的良好教育下，不但为朱德后来喜欢读书、爱好作诗打下了良好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使朱德的幼小心灵开始萌发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意识地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了。

二、走向广阔的世界

一九〇五年，朱德年满十九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追求进步、寻求新学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科举考试，在当时几乎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如果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得去应试。按照清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得在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湾只有三十六公里，凑了一吊钱，也就勉强能去了。

这一年，头上梳着长辫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同席聘三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一道，步行来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养育他十九个年头的家乡。

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他那时用的名字是朱建德。在一千多个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二十名中。这是他自己都不曾料想到的。尽管大湾离县城那么近，他一家三代中还没有人进过县城。能够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他们家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这场考试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仪陇县属于顺庆府（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在前往顺庆府参加府试之后，朱德抽空到距仪陇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南部县盐井去参观，听说这里有些西洋机器。他从来没有见过机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朱德和许多结伴同行的考生一起，到了南部县盐井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新机器，却见到几千名贫病交加的盐工的苦难生活。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从事着奴隶式的劳动，面容憔悴，瘦骨鳞峋。身上除着一块裹腰布外，几乎赤裸。住的小屋终年不见天日，还满是臭虫。吃的也仅够维持生命。这种悲惨的情景给朱德脑海里留下难忘的印象。

来到顺庆府后，朱德犹如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陌生。正如他后来回忆中所说，连大河也是“第一次看见”，“见了大世面”。在府试中，他又顺利地通过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重大的变化发生了。面对严重危局的清朝政府正在标榜推行“新政”。他们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宣布：科举考试从丙午（一九〇六年）年开始一律停止，并严伤在各府、厅、州、县普遍设立蒙小学堂。于是，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顺庆府是四川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一九〇六年也兴办起新式小学堂、中学堂。仪陇、营山、蓬安、南充、西充、邻水、岳池、广安八个县的学生都到这里求学。由于科举制度已被废除，朱德还没有经过院试，也就失去考取秀才的机会。他决定到顺庆府去上新学堂。但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家里老人的同意。原因是他们不相信这种新式学堂能维持多久，说不定哪天就会关门。而且家里已按照封建习俗，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安排朱德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

怎么办？朱德只得求救于席聘三老师。席聘三素来重视“新学”，他的话对学生家长有很大的影响。在席聘三的帮助下，终于使老人改变态度，同意朱德到顺庆府上新学堂，并且东挪西借地给朱德筹措了一笔钱，供他读书

时使用。

一九〇六年春天，朱德先考入南充县（南充是顺庆府的首县，也就是府治所在地）官立两等小学堂。在那里，除国文外，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和英文。一学期后，在这年秋季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那里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格致、美术、体育等。其中，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既没有课本，又没有实验室，只是凭老师口讲，学生们记点笔记。但朱德对学习新学的兴趣很高。

这两所新学堂的老师中，有一部分人思想比较进步。南充县两等小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是张澜。顺庆府中学堂的监督先后由张澜、刘寿川担任。他们两人都曾在日本留过学，是当时的新人物，除担任监督外，还给学生讲课。张澜曾经对学生说：现在要亡国灭种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刘寿川和朱德有一点比较远的亲戚关系。朱德在课余常到他家去，听他讲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事情，看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理化仪器和幻灯片。这些对朱德有很大的吸引力。

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读书只有一年时间。他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也开始接受科学的教育，这一年既是他从学习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端，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这时，朱德同社会各方面的交往也多起来了。从他们当中得知成都新建立了一批学堂，包括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是他很感兴趣的，出路也比较有保障。他决意到成都去上学。一九〇七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

成都不仅是四川的省会，也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朱德还没有到过这样的大城市。那时候，成都的社会状况正处在异常剧烈的变动中：设立了机器局、银元局、铜元局、兵工厂，商业很繁荣，开始有了新军和警察，出版了铅印的《四川日报》，街上还出现胶皮轮的人力车。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那样新鲜，使他的眼界大大开阔了。同这种畸形繁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破产，城里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穷困的苦力。

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因为怕要亡国了”。朱德到成都时，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在招生。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这所学堂的举办是为着适应各地小学堂陆续兴办的需要，“以划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口令为宗旨”，招收本科生的、条件是“旧日曾读经书略解文义者”。它的课程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唱歌、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朱德入学时用的名字仍是朱建德，被编在甲班。

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朱德对这些教师十分佩服。他在学校里，“读书是读书，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当时，要求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已在成都学堂里流行起来。有一天，一本革命派在日本所办的秘密刊物《民报》，不知由谁塞到了他的枕头下，这本刊物的字迹已被翻得模糊不清，显然已经过许多人的手。朱德在仔细阅读了这本刊物后，又把它悄悄

地塞到其他同学的床上。在成都的一年里，朱德的“同学多，来往的人也多”，开始产生要“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的思想。

这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十二门功课的总平均分数是八十二点三分，其中器械获得了一百分，心理获得九十八分，教练九十二分，算术九十分，学习成绩优良。这两年，为了支持朱德上学，朱家的老人先后为他筹借了二百多元钱，这笔债务直到后来朱德当上滇军旅长时才还清。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这正是变革的年代，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在仪陇这样一个偏僻山区的县城里，尤其是这样。县里原有的金粟书院历来是一班秀才、举人们把持的，对这种新学堂千方百计要进行破坏。

一九〇八年，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来到县立高等小学堂，立志要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但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经过努力，才招来十二个学生。学堂里的教师和办事人员有刘寿川、田玉如、朱德、张四维、李绍沆五人。守旧分子写了首打油诗讥讽他们说：“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他们还向县里诬告学堂的新教师是些“假洋鬼子”，教的是野蛮思想，有损国粹。还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猥亵的课程”，有伤风化。县里就去查封学堂。朱德和其他教师联合社会上一部分进步人士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迫使县里收回成命。

学堂重新开学后，学生从原来的十二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朱德平时对人宽宏大度，但对这种无理的横逆决不能忍受，就教学生学习武术，实行自卫。

朱德是农民的儿子，本来属于很下层的人，现在居然做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教员，自然更引起那些守旧分子的忌恨，受到他们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020_0014_1.bmp}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020_0015_1.bmp}

的排挤。当时，地方官家、士绅请客，照例要请老师赴宴。但朱德往往接不到请帖，即使偶尔被请去，入座时也不能在上席。那年孔子诞辰，学堂的师生参加“祭庙”活动，按惯例要给教师每人分一两斤祭祀用的猪肉、牛肉，叫做“胙肉”。可是朱德却连一两也没有分到。这在当时，对一个教师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朱德对这些却毫不在意，认为“不吃那点肉，我倒觉畅快些”。(11)几十年后，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讲到这段历史时写道：“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12)“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13)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一年的经历，对朱德的影响是很大的。以前，他一直在学校里求学。这是他头一回投身到实际社会中独立谋生。一年来亲历的新旧社会力量的尖锐冲突，备尝社会上旧势力的压迫和排挤，使朱德懂得许多世事，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加上小学堂的同事里也有人排挤他，(14)使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15)毅然辞去了教师职务，决心到云南去。

三、奋身军界

朱德为什么要到云南去？他的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朱德后来回答道：“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在外国列强正加紧掠夺中国边疆的危急局势下，一般人“认为最危险的就是东三省和云南了。”东三省离四川那么远，朱德自然不可能去，于是就想到云南去。

云南同四川接壤，在那里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原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又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些学生。这也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原因。

就在朱德从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辞职后不久，有一天，一封从成都发出的书信寄到他的家里，这是他原来一个同学写来的，约朱德一同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候，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立刻同意那个同学的要求，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家里，只是说要到成都去读书。朱德的三叔朱世和常年在外做生意，在经济上给了他一些帮助，作为路上用的旅费。

一九〇九年春节刚刚过完，朱德告别了家里的亲人，沿南充步行到成都。这是他第二次到成都。

到成都后，朱德找到他的同学敬镕，一起徒步从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进入滇境，再经昭通、东川，在四月间到达云南省会昆明，长途跋涉共七十余天。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同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接壤，正处在法、英侵略势力的争夺中。法国在宣统初年向清朝政府要求云南七府矿藏的开采权。英国伺机侵略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滇越铁路的兴筑，更使云南的局势显得岌岌可危。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它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员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一九〇九年中秋，在云南“设立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防营现任军官研究武学之所”，“堂内附设丙班学生一百名，考选十六至二十二岁之学生，以品行端方、文理清顺、身体强健者为合格，三年毕业，备充下级军官之用。”同年，还在云南编成新军一镇（师），称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云南陆军讲武堂分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选调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入学调选；乙班选调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连长）、哨长（排长）入学；“丙班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

朱德、敬镕到达昆明时，正是云南讲武堂开始招生的时候。他们寄住在昆明景星街一个四川同乡萧氏开设的临时客栈里，准备应试。但事情在开始时对朱德并不顺利。投考的结果，敬镕用云南昭通府大关厅的籍贯（他其实是四川南部县人）被录取；朱德仍用四川原籍报名，是外省人，不容易被录取；又没有当地老住户或大户介绍，就落榜了。这时，朱德身上带的盘缠钱，已几乎花完。为了渡过难关，只得先投入川军步兵标当兵，改名朱德，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因为朱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较短时期的军营生活后，便升任队部司书（即文书）。干了一两个月，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适

值滇越铁路通车，滇政府希望多招一些迤南籍的学生，以备将来屏障迤南边陲之用。蒙自县地处滇南边陲，朱德探听到蒙自无人报考，就报蒙自籍应试”，终于考入了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同班同学有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王均、杨池生、董鸿勋、杨希闵、唐淮源等。

朱德到达昆明后几经周折，终于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事学堂生活，喜悦的心情是不难想见的。他后来谈到：“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至于为什么要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说：“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为了受不住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

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其中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在操场上，严格地进行班、排、连、营、团的队列教练，要求每个人姿势端正，动作敏捷，各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做到纯熟了才能结束。丙班学员除学科和术科外，还有普通学科，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军事学科。

朱德在讲武堂过着紧张而兴奋的生活。他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020_0020_1.bmp}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的时期”。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那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由于他刻苦好学，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取得优秀的成绩，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

他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宏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11)

当时教职员的来源：“在军事教官中，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队职员中有的保定军校毕业生，有的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在文职教官中，大部都是留日学生毕业回国的知识分子。”“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和文职教官，成了留日学生的集中地，是他们回国后谋出路的一个场所。”(12)

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罗佩金、方声涛、顾品珍、李烈钧、唐继尧等大部分都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许多人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后，第二年二月就找了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吕志伊等五人谈话，嘱咐他们筹办《云南》杂志，说：“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13)同年十月，《云南》杂志在东京创刊，《发刊词》中沉痛地描述了云南在英、法激烈争夺下所处的危殆局面，写道：“哀哀同胞，行作白人奴隶。彼苍者天，谁实为之，而使我至于此极也。”并且号召云南民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14)这本杂志以云南留学生同乡会名义

出版，大量流入省内，在云南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云南面对的民族危机也正在日趋激化。特别是法国修建滇越铁路，更被人们看作云南行将沦为殖民地的直接信号。朱德回忆说：“在我们刚入学校的时候，穿过国界的滇越铁路——那是法帝国主义来侵略的一条动脉——修通了，亡国的刺激澎湃着，一般宣传刺激都根深刻的印在脑子里。同时，这个学校她还没有带着一种官僚腐化的气习，一般办事都富于革命倾向。”(15)所以，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后不久，就建立起同盟会的秘密组织。

朱德正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一九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16)和他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有杨秦、范石生等。会员不仅传阅《云南》杂志，还秘密地看从外地偷运来的革命书刊，如《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17)

在这个革命据点里，朱德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活动，还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的书和意大利、日本、俄国有关改革政治方面的书籍，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还和同学唐淮源、杨如轩、杨池生等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五华社，“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主要是主张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8)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19)

一九一九年七月，随营学堂学生二百人并入云南讲武堂丙班。杨如轩便是随着随营学堂学生并入，而和朱德同班学习的。因为新军急需补充军官，便从丙班和随营学堂学生中挑选了学习成绩较优者一百人编为特别班。朱德和范石生、杨秦、董鸿勋等被选拔入特别班。原来讲武堂的军事课程要学一年半，特别班只学八个月。

第二年六月，原在广西新军任职的蔡锷被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云南，任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做裁缝的，但他聪颖异常，沉静刻苦，幼年就有“神童”之称，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同盟会领袖黄兴在这年的一封信中写到：“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20)第三十六协司令部同讲武堂毗邻。蔡锷的办公室内四周准满了中文、日文的书籍和报纸。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求知欲强烈的朱德有时到蔡锷办公室请教和借阅一些书刊。长时间的接触，使比蔡锷只小四岁的朱德，深深感到蔡锷思想敏锐，办事稳重，工作能力强，充满智慧，有着坚韧不拔的品格，因而很尊敬甚至崇拜他。蔡锷也很喜欢这个壮实、质朴、勤奋的朱德。

蔡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性格冷静持重，对事深思熟虑，不轻易露声色。他虽然允许朱德到他那里去，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不仅如此，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忙碌完工作之后，“在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21)可是，当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黄毓成去找蔡锷谈到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蔡的支持时，蔡锷断然告诫他：“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22)

这个时机果然来到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动全国的武昌起义爆

发。起义主力是湖北的新军。九天后，蔡锷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飏四人密议，准备起义，并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23)接着又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次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进行秘密会议。献血为盟，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在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又称重九）夜十二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云南的新军第十九镇虽有两协，但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第三十八协正分别驻在滇甫的临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驻在省城昆明的新军第三十六协、炮标、机关枪营和讲武堂都已由革命分子掌握，在省城中没有其他足以同他们相抗衡的军事力量。起义的具体部署是：驻在城北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向省城北门、东门进攻；驻在城南巫家坝的第七十四标和炮标向南门、东门进攻；陆军讲武堂师生为开城作准备；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

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早在八月已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分配到蔡锷部下。朱德是这十八人中的一个，到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和第二营管带刘存厚，都是同盟会会员。朱德当副目没过几天，“又当了司务长”，负责“作士兵运动”。他说：“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上来了。”(24)

十月三十日，预定起义的日子到了。但临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天晚上九时左右，昆明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士兵正在为准备起义而抬运子弹时，遇到北洋派值日队官查究，情绪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这几个军官，起义就提前发动了。这部分起义军攻入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正在巫家坝布置起义的蔡锷，听到北较场已经发动，立刻下令第七十四标也提前出发攻城，宣布云南起义！

这时，朱德被指定接替所在连的队官（即连长）职务。晚上十二时，起义部队全部入城。黎明时，起义军已占领所有城门，朱德率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由于他们同总督衙门的卫队营事前已有秘密联系，卫队中有不少四川人，朱德自己也曾利用这种同乡关系在卫队营中作过士兵工作，因此，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第二天晚上，起义军第七十三标将五华山和军械局攻克，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击毙，总参议靳云鹏化装逃走。据杨如轩等回忆，云贵总督李经羲藏匿在四集堆一个姓萧的巡捕那里，被朱德搜获，(25)后由蔡锷遣送出境。不久，大理、临安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各地的巡防营被陆续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

十一月十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为都督。朱德在这次起义中作战有功，但因资历还浅，担任排长职务，率部在昆明城内街道担任巡逻任务。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朱德曾在《辛亥革命杂咏》这首诗中写道：“同盟领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权。起义武昌全国应，扫除封建几千年。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场。”(26)

云南起义是武昌起义后第五个起来响应的省份，也是西南各省中第一个独立的省份。这个伟大壮举，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清朝政府计划向革命力量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端方率领的清军已进入四川。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力量，仍在血腥地镇压四川人民。于是，云南军政府决定遣师北上，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相当于旅），共八个营，由韩国饶率领入川。

十一月十五日，援川部队从昆明出发，分两路北上：李鸿祥率领第一梯团取道贵州毕节向泸州前进；谢汝翼率第二梯团经东川、昭通入川，向叙府（今宜宾）前进。朱德仍任排长，随第二梯团出征。

援川的滇军，纪律很严格。十二月中旬、下旬，部队顺利地占领了叙府和自流井，这时，朱德晋升为连长。不久，四川宣布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援川军返回云南。后来，朱德对这次援川战斗，曾有诗一首：“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弟兄，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27）

那时，蔡锷领导下的云南军政府在政权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28）这些初步的改革，不仅增强了朱德对蔡锷的信任，而且在他心中对国家的未来燃烧起一股新的希望。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云南起义后，曾一度停办。民国成立后，蔡锷在一九一二年秋天下令恢复讲武堂，称为讲武学校，任命谢汝翼为校长。朱德随援川军回到云南，因功被晋升为少校，先在滇军中训练新兵，有两个多月时间。讲武堂一恢复，他又被调任学生队区队长（学生分五个区队，每个区队约一百人）兼军事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野外的实地演习。朱德后来说：“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温了一遍。”（29）

但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却已开始逆转，坏消息不断传来。在担任教官期间，朱德听到袁世凯在代替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开始大批逮捕和虐杀共和派人士，整个社会状况依然那样黑暗，使他原来抱有的期望逐渐幻灭。他又从留学法国的几个教官那里了解到一些法国革命的情况，渴望弄清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中国的革命为什么却搞成那样。这个使他疑惑不解的问题，朱德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他的思想开始从辛亥革命时的兴奋和喜悦中渐渐地产生出新的忧虑和不安！这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堂学生肖菊芳结婚。

一九一三年夏天，朱德奉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刘云峰）步兵第二团（团长董鸿勋），升任第一营营长。一九一四年初，因为临安府发生兵变，陆军第一师调到临安（今建水）、蒙自、开远、个旧一带布防。朱德也随部队来到了滇南边疆。他的注意力暂时被完全转移到如何巩固祖国南疆边防这个问题上。

按照当时的军事部署，朱德所部负责驻守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属于亚热带地带，气候炎热多雨，万山重叠，环境艰苦，斗争复杂。又同法属印度支那相邻，需要时刻提防外国势力的侵袭和他们豢养的土匪的骚扰。部队一面要说服本地土著，一面不得使用武力对付土匪的袭扰，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大小不等的战斗。在山间、河谷、密林、村舍，到处都会响起枪声。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敌情，使朱德用心地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战术，有时化整为零，有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机动灵活地打击土匪。

蒙自有个著名的惯匪叫方位。他纠集匪徒，打家劫舍，祸害人民，无恶不作，但屡缉未获。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朱德侦得方位等土匪十余人正

躲在冷水沟的黄喜店子里，便突然率部围击。方位负隅拒捕，开枪打死军士三人。双方激战达三小时。方位从屋后逃出，避匿在沟边，被击毙。店中的其余上匪仍负隅顽抗。朱德命令士兵购来煤油，将油泼在店子的前后门上，然后放火延烧。土匪见势不妙，纷纷跳窗奔逃。这股土匪被击溃，当地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朱德报告旅长刘云峰，请求政府对遭受土匪杀害的居民亲属给予赈恤；对因土匪负隅顽抗而不得已烧毁的老百姓房屋按市价赔偿。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在给蒙自道道尹王广龄的批文中也说到：“查该匪首方位，系著名惯匪，屡缉未获。兹复纠党盘踞冷水沟黄喜店中，经营长朱德督兵围击，反敢负隅拒捕。该营长用火将该匪烧毙，极恶穷凶，一旦殄除，实为地方庆幸。”(30)

一九一五年九月，朱德又率部队两个连，在建水县渣腊寨会同地方武装，成功地清剿了大批土匪。(31)从此，这个地区的土匪明显减少，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外国势力企图利用土匪骚扰边境、乘机侵占中国边疆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这个地区地域宽广，包括十几个县，清剿的部队只有两营人（另一个营的营长是唐淮源），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于朱德在边境深山密林的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被先后提升为团副、团长。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德在延安同美国女作家宁谟·韦尔斯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旧称）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集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32)了。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对这种游击战术的来源再次作了说明。他说：“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33)

朱德在滇南边境度过了异常艰苦的两个寒暑。他在特殊的地方、以特殊的方法。进行着特殊的战斗。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迅速提高。讲武堂的学习和教学生活，使他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近代军事教育。这两年实际作战的磨炼，又使他学会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带兵，如何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这是他稍后在讨袁护国战争中能成为战功卓著的名将的重要原因，对他投身人民军队后在军事指挥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也有深刻的影响。

四、护国名将

正当朱德在滇南边疆艰苦奋战的两年多中，国内的整个局势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恶化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和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民国。这曾经使许多人欢欣鼓舞，以为在中国将要开始一个新的纪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基其实并没有被触动。旧势力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很快就向涣散的革命势力反扑过来。孙中山发动的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了。志得意满的袁世凯对外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对内公然准备恢复帝制。中国的命运再一次处在危殆之中。

这一切，不能不使正在滇南作战的朱德感到震惊。他愤怒地写了这样的诗句，斥责袁世凯：“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

朱德“倾心为国志无违”的决心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盼望新的斗争风暴迅速到来，盼望已接替蔡锷担任云南将军的唐继尧能够率领滇军反对袁世凯的恢复帝制。而唐继尧见袁世凯势力仍盛，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迟疑徘徊。一九一四年秋，还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捕杀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李根源的妻弟）。一九一五年初，黔军团长王文华派人同他商议，共起讨袁。唐继尧仍借口推托说：“滇逼强邻，黔则汤芑铭扼驻于湘。此时唯有勤操练，不可轻露，先取覆亡”，依然按兵不动。

但是，历史终究是不可倒转的。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袁世凯称帝活动的日益公开化，使全国人民的愤怒日益增长。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云南新军军官积极酝酿起兵讨袁。在昆明的罗佩金、黄毓成、邓泰中、杨秦等秘密商议：唐继尧如果反对帝制，仍推他为领袖；唐如中立，就礼送出境；唐如附和帝制，就杀掉他。“议定后，始由黄、邓、杨三人代表全体同志请于唐。谓唐若终不从时，则将杀唐以举大事。”

唐才决心起兵。十一月三日，推罗佩金拟定作战方略。十二月九日，原驻昆明的滇军精锐邓泰中、杨秦两团“借平土匪为名”开始向川边出动。

十二月十九日，蔡锷机智地摆脱袁世凯对他的严密监视，几经周折秘密地从北京回到昆明。蔡愕在云南有着巨大的威望。他的到来，不仅坚定了唐继尧的讨袁决心，而且壮大了讨袁军的声势，起了巨大的号召作用。二十二日，蔡锷、唐继尧等召集上校以上军官、省级各机关长官以及外地来滇的爱国志士会议，宣誓效忠共和。二十五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蔡锷到云南后，秘密派人给分驻各地的滇军将领们送去亲笔信，介绍全国反袁斗争的形势，要他们积极作好准备，率部在二十五日和昆明同时起义，然后开往昆明待命出师。

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朱德等遵照蔡锷的嘱咐，如期率领部队逐走反动军官，举行讨袁誓师大会。朱德在誓师会上发表了演说。

起义后，朱德立即率领部队开往昆明，这时，为了北上讨袁，护国军需要迅速扩军。十二月三十日，朱德被调离他原来率领的部从，改任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负责训练新兵。次年一月六日，被委任为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所部编入护国军第一军，为第三梯团第六支队。

护国军由三个军组成。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下辖三个梯团六个支队。各梯团团团长是：第一梯团是刘云峰（后由雷飙继任），

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长顾品珍。各支队队长是：第一支队长邓泰中（后由田钟谷继任），第二支队长杨蓁（后由金汉鼎继任），第三支队长董鸿勋（后由朱德继任），第四支队长何海清，第五支队长禄国藩，第六支队长朱德（后由王秉钧继任）。任务是出兵四川，然后进攻武汉。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下辖两个梯团，出兵两广。唐继尧作为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后方。

一九一六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举行誓师大会，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

护国军第一军挥师北伐，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刘云峰的第一梯团为左纵队，所部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在云南宣布独立之前已先期出发，经东川、盐津入川直取叙州（今四川宜宾）；赵又新的第二梯团、顾品珍的第三梯团为右纵队，由宣威经贵州毕节入川，取道叙永（今四川永宁）进攻泸州。

护国军讨袁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极为震动，立即成立“征滇临时军务处”，任命曹锜为川湘两路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督率各部从湘西和川南向护国军进攻。护国军第一军进入川南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第一梯团的邓、杨两支队在一月十五日进入四川，二十日强渡金沙江。这是护国军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驻在川南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加入过同盟会，原在云南新军中工作，是辛亥革命时云南起义的重要分子。民国成立后回到家乡四川。他同护国军各将领有密切的关系。二月二日，便以“护国川军总司令”的名义在纳溪起义。这时贵州已宣布独立。作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纵队先头部队的董鸿勋支队，经过贵州在二月四日抵达纳溪。八日，董支队与川军两营渡过长江准备会攻泸州。

泸州是从云南入川的必经孔道，又是重庆的主要门户。袁世凯立即派曹锜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李长泰的第八师一部以及周骏的川军第一师向泸州增援。

双方兵力悬殊。二月九日，北军偷渡长江。护国川军团长陈礼门麻痹大意，所部猝不及防，纷纷溃逃，蓝田坝、月亮岩等要地相继失守，护国川军大炮多所损失，陈礼门自戕，董鸿勋支队也被迫后撤，北洋军大举向纳溪推进。于是，川南战场局势顿时逆转，护国军进攻泸州的战役一变而为保卫纳溪的战役。

护国军随即在纳溪城东的棉花坡一带高地顽强阻击北军，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由于形势危急，蔡锷命令第三梯团火速增援。

朱德所在的第三梯团，由于“军队分驻地相距辽远，交通复极不便，动员集中，极为濡滞”，在一月二十二日才离开昆明。二十九日，“抵宣威。接奉（蔡）总司令命令：以我孤军深入，朱（德）团曹（之骅）营除去休息，火速兼程前进。”为了尽快赶到前线，朱德率领第六支队，以每日八九十里甚至一百多里的速度赶往前方。

“二月十五日，朱德率部“抵永宁，即闻前军愤事，因寡众之故，以至炮阵失守。即奉蔡公檄委饬其星夜前进，赶接步二团事务”。(11)“步二团”是滇军原来的编制序列，即董鸿勋任支队长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三支队，也就是朱德在蒙自时指挥的那个团。

这时，“张（敬尧）军全队均到，乃用重兵凭高下压，我军众寡悬绝，有一部不能支持，已退至纳城东。而罗佩金趋前誓众曰，设一部退走，则全

军俱覆，无论如何必当死守，纵死亦同死于是处。于是全体卧下，伏于东门外小堤之内，而敌军愈接愈近，弹如雨下。”(12)第三支队已处在最危急的时刻。二月十六日午前十一时，朱德率所部曹之骅营赶到纳溪，“渡河入城，后奉总参谋长（罗佩金）命令：以本日棉花埂阵地，敌人新增兵力，着即前往增加战斗。枵腹逐行，未逞食也。”(13)朱德不久又接任第三支队的指挥任务。他立即指挥队伍冲锋前进，将敌军击退约二三里，将部队布防在棉花坡正面高地，同据守红庙高地的北洋军对峙。

棉花坡是纳溪城东山冈中一处地理位置重要的山坡，离纳溪城约五公里，泸州通往纳溪的大道就从这里通过，是两军必争之地，双方争夺异常激烈。北洋军在这里集中的兵力有张敬尧、熊祥生等部。他们依仗械弹充足，昼夜不停地以猛烈火力向护国军阵地轰击，山地小松林大多被轰击得倾倒在山上，击落的松针在地上厚积数寸。朱德支队是抗击的主力。他鼓励部队说：“北军不经一打，他们从平原跑到山地来，连走路都成问题，而且我们反袁是义师，他们是师出无名。所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4)他组织部队以白刃战和夜战，顽强地抗击北洋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终于守住了阵地。但这次战役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营长曹之骅在十八日中弹穿肠，两天后牺牲，遗职由副营长杨如轩代理。

为了实行“攻势防御”，护国军分三路进行反击。其中朱德率两营，附一个炮兵连和机枪排，从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15)双方交火后，北洋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抵抗。朱德采用“侧攻”战术，以一个营从正面用猛烈的炮火牵制敌人，而将大部分兵力迂回到敌人侧面进行攻击。北洋军遭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损失惨重，随即组织更多兵力向朱部正面阵地猛烈反扑，突破了几个缺口。朱德在友军支援下，恢复了失去的阵地。

由于朱德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指挥才能，第二天罗佩金又把护国川军的一个营交给他指挥。

护国军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战绩，但双方兵力毕竟悬殊，而经过三天鏖战，部队伤亡严重，减员颇多，因此，蔡锷命令护国军从二十二日起暂时改取防御。

二月二十三日，蔡锷从永宁来到纳溪前线。护国第二、三梯团的第四、五、六支队也先后开抵纳溪。由于这里已成为两军交锋的主战场，蔡锷从驻守在叙州的第一梯团中抽出两个营，组成一个新的支队，由金汉鼎任支队长，增援纳溪。

二十七日，蔡锷在部队经过休整补充后，决定从第二天起再一次发起反攻。这次反攻，持续了三天三夜，在何海清、朱德等支队的猛烈攻击下，北洋军阵地“已成锐角形”(16)，敌军左右两侧部分阵地也被摧毁。

但是，护国军的困难仍然很大，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事后说：北军“仅麇集泸州一隅与我不足十营之兵对垒者，已逾五十余营，兵力多寡之悬绝若是。”“我军退婴棉花埂，相持两月余，敌以全力猛扑，我赵、顾两梯团全部兵力悉数加入，后方直不留一卒，又抽调叙府兵增援，兵士一上火线，即无法更迭，昼夜不得复轮息，进退只争跬步，此路为两方主力所在，攻击之烈，殆为入民国后第一恶战。沪战方酣，叙府以抽调空虚，为敌所乘，不复能守，我军后方已受侧面之威胁。而敌军援兵第八师李（长泰）师又至合江，声言取道赤水直抄永宁。此计则我军休矣。”(17)

这种局面自然难以长期坚持下去。三月四日，蔡锷下撤退令，决定撤出纳溪，退至大洲驿一线休整。命令的第四条规定：“朱支队经双河场、渠坝驿向上马场背进。”(18)第三梯团炮兵连长孟雄成分析说：“此次之背进也，原因有二：一、叙府友军战况不利；二、弹药缺乏，一时难以补充。故不得不背进于大洲驿。斯地位于永宁河与纳溪之中间，给养便利，且山势平坦，利于休养，是以致此。”(19)

以棉花坡为中心的这次纳溪保卫战，发生在护国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那时，除云南、贵州外，其他各省还没有宣布独立。袁世凯北洋军的声势仍盛。护国军以西南边陲两省之力，挥师北进，“以寡敌众，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总计伤亡及失踪不明者不下千人”(20)，而“逆军死伤三四千人”。(21)这不仅给了袁世凯有力的打击，并且为护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争取到了两个多月极为宝贵的时间。朱德支队在这次战役中，从二月十九日投入战斗到三月七日撤出，进行了十六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在第一线，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顽强的作战能力。

护国军从纳溪退出后，张敬尧、熊祥生当天就以特急电向北京政事堂等告捷。袁世凯对形势作了十分乐观的估计。他在三月九日的命令中说：“现叙州已经克复，纳溪大股悍寇亦经溃败，当不难指日荡平。”(22)

但是，全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博得了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同情，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两个月来在川南的顽强战斗也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三月十五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立即出兵湖南，并准备向广东进军，对袁世凯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这种形势下，三月十七日，蔡锷决定对泸州发动第二次进攻。

这次进攻分三路前进：顾品珍梯团担任中路；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担任左路；金汉鼎、朱德支队和义勇军的张煦、廖月疆支队担任右路，向纳溪推进，是反攻的主力部队，而朱德支队在右路军中又担负着主攻任务。因此，蔡锷三月十五日在大洲驿总司令部召见朱德，向他说明作战意图，指出：“逆军极无攻击精神，我军对其正面，只宜配备少数之兵力，而以主力冲其侧背，彼自溃走。宜切谕诸将领，务多留预备队在指挥官之掌握，俾便运用”。(23)

十八日拂晓前，朱德支队开始发起攻击。在它前方的敌军是北洋军第七师的吴新田旅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团，战斗力较强，兵力超过朱德支队两倍以上。这里的地形也很复杂，山岭起伏，路窄林密，山下是沟渠纵横的水田，进攻十分困难。

但是，在朱德的指挥下，经过五天激烈战斗，朱支队连续突破北洋军几道坚固设防的阵地，直插离泸州只有十几里的南寿山附近。二十三日，正当朱德准备向南寿山发起更大规模攻势时，前敌指挥赵又新送来命令：因弹药不继，各部队暂缓攻击，就地待命。

这时，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护国军的声讨，使袁世凯处在越来越孤立的地位。正当朱德支队推进到南寿山附近的时候，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并密令陈宦、张敬尧同蔡锷谈判停战。经过多次磋商，双方决定从三月三十一日起停战一个星期。期满后，又两次将停战期延长一个月。两军的作战活动，实际上已经停下来。

四月六日至五月二十九日，不到两个月内，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五省又相继独立。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愤成疾，在六月六日死去。

第二天，黎元洪宣誓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日，朱德支队奉蔡锷的命令进驻泸州。护国战争宣告结束。

护国军第一军同北洋军在泸州、纳溪之战，是护国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护国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少击多，屡奏奇功，粉碎了北洋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推动全国人民反袁斗争高潮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在叙述这次战役的经过后，感慨地写道：“以袁氏二十年手创之北洋军，取精用宏，当之辄靡，挟此熏天气焰，惟所欲为，袁氏固拊手而笑天下之易是，不图以帝制冒天下之大不韪，人心一去，形势全非，以区区之护国军一击而中，遽制其死命，而赫赫濯濯之北洋军从此亦落花流水，日渐渐灭，以至于尽。武力不可恃，人民不可欺，来日悠悠，殷鉴不远，在袁氏之世矣。”(24)朱德也曾兴奋地写道：“中华灵气在仑山，威势飞扬镇远关。史秽推翻光史册，人权再铸重人间。千秋汉业同天永，五色旌旗映日殷。多少英才一时见，诸君爱国应开颜。”(25)

朱德在护国战争中的表现是很突出的。他英勇善战，战功卓著。很多次当战线面临崩溃的危险时，他率领的部队一赶到，就支持住了，往往还能反败为胜，从而使他成为远近驰名的滇军名将。吴玉章在祝贺他六十寿辰时曾说：“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錕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26)这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也大大提高了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他自己后来说过：“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27)

五、从黑暗中走出来

护国战争结束后，朱德部改编为第七师第十三旅第二十五团，先后驻扎在四川的泸州和南溪。在近一年时间里，朱德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在部属的撮合下，他又同南溪师范学校毕业生陈玉珍结了婚。在这段时间内，使他感到十分悲痛的事是蔡锷的逝世。他一直把蔡锷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曾经长期在蔡锷的领导下工作。蔡锷的死，对他精神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护国战争的胜利，没有如他原来所期望的那样，使中国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他那平静的生活没能维持多久。一九一七年夏季，风云变幻的中国又掀起新的政治波澜。六月间，驻防徐州的军阀张勋借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的机会，率兵入京，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随后，公然推出清朝废帝溥仪实行复辟。张勋的复辟活动，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慨，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很快就失败了。段祺瑞因兴师讨伐张勋，一时被称为“再造共和”的元勋，再次出任国务总理。但他在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这就导致护法战争的发生。

七月中旬，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护法”，主张维护《临时约法》，并提出在粤恢复国会，再造共和。云南督军唐继尧这时也打起“护法”的旗帜，但他这样做仅仅是把它用来作一个幌子，目的是趁此割据北洋军阀势力还没有完全到达的西南地区，充当“西南王”。

四川素有“天府”之称，经济富庶，资源丰饶，特别是盐税的收入相当可观，除抵付给列强的赔款外，每年还有一千多万元的余额。在战略上，也处于重要地位，南可掣时云贵，北可出秦晋，沿长江东下可直伸湘鄂。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后，它成为北洋军阀觊觎的目标。这时，滇、川、黔军正因争夺四川督军职位而发生混战。七月二十四日，北洋政府委任川军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接着，又派段祺瑞的亲信、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兼任四川查办使，率军入川，企图置四川于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

野心勃勃的唐继尧立刻借机宣布组织靖国军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并于七月二十日发出“思惟北征，宜先靖蜀”的通电，对川大举用兵。“滇军在护国之役时，调川者不及三千人，战后增到三万人以上，黔军亦增到一万二千余人。”这就更加深了四川局势的混乱。

驻军四川南溪的朱德，被委任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二旅旅长，受命进驻泸州，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

旷日持久而又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战事，使朱德深深感到困惑。滇军在四川作战的主要对手是企图独揽川局的川军刘存厚部，而朱德期待的讨伐北洋军阀的命令却迟迟没有下达。朱德曾致电唐继尧请求立即北伐，唐继尧没有理睬他。作为一名军人，朱德只得服从命令，带领他的部队在无休止的内战中继续冲杀。

九月中旬以后，川军刘存厚等部用重兵向川南发起猛攻。滇军由于师出无名，这时已不再像护国战争时那样能得到当地人民的热切支持，因而节节失利，很快就从富顺、隆昌、永川退至叙府、泸州一线。到十一月，川、滇两军在叙府、泸州几经激战，滇军终于不支，被迫退到横江、叙永一线。在战斗中，滇军的伤亡人数与日俱增。眼看就要进入冬季，官兵衣衫单薄，补给无源，士兵情绪低落，无心恋战。部队陷入困境，北伐无望，朱德为此陷入深深的忧虑中。

正当滇军在川南战场告急的时刻，局势突然发生转机。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与黔军王文华部配合，于十二月四日袭占重庆，吴光新率部败走鄂、湘。与此同时，川军颜德基等部相继成立靖国军，使依靠北洋政府的刘存厚等部被迫从川南各地撤退。滇军乘机由川南发起反攻。

局势的变化，在朱德心中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焰。十二月十日，他致电唐继尧，表示：“顷奉钧电催反攻，德率所部，愿效前驱”，要求以“本旅及金旅杨团克期分道进攻沪城。”十三日，朱德率部从沪城下游泰安场渡江，向泸州城外的制高点五峰顶进攻。同时，金汉鼎、周宗濂等部也分路渡江，向泸州进攻。当时正在朱德部下的杨如轩回忆说：反攻泸州前，朱德“建议（靖国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实行精兵政策，大事整顿队伍，旅长降来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全军整编为四个团，他任第一团团团长，金汉鼎任第二团团团长，我被派为朱的团副。反攻泸州时，采用步、炮联合作战，他亲临泸州对河月亮岩炮兵阵地，指挥炮兵射击，发扬火力，打得很准，专打敌人密集队伍，掩护步兵爬城、获得了大胜，再克泸州。”朱德等部乘胜追至自流井一线。十二月十五日，驻防重庆等地的川军熊克武（原同盟会会员）部在川东树起“护法”旗帜，通电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推唐继尧担任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一九一八年一月，川、滇、黔各军分道进攻成都。三月，刘存厚等部败退陕南。川局顿时改观。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朱德以为进军北伐的时机总算盼到了。他主张四川督军一职应由在四川有着长期革命历史的熊克武担任，并且集合所部进行休整，积极准备出川，同北洋军阀作战。二月九日，他和金汉鼎等驻川滇军将领联名致电唐继尧，痛陈滇军自参战以来，“迭遭挫折，饷械损失甚巨，军威扫地，为滇军从来所未有。先后经过各战役，新编人员已减十分之五，兼之弹药告罄，补充困难。”“川督一席，军民心理均属望于熊（克武）君，人心所归，如水就下，种种论断，似无再战之必要。至在川滇军则休养生息，可以保全实力，又趁此补充缺额，若再迟缓，则事局稍定，恐贻人与侵略之口实。”然而，唐继尧却另有打算，严令他们仍然驻留四川。三月十三日，朱德再次打电报给唐继尧，大声疾呼：“现荆襄危殆，日甚一日。德收合余尽，士兵已得休息。”“恳俯允率所部出武汉，歼灭敌胁。”电报发出后，犹同石沉大海，音无回音。这时，朱德虽然再三请缨北伐，但是，他还没有看清唐继尧只是假“护法”之名而行图霸四川之实的真实用心，仍以为自己在为支持孙中山提出的“护法”革命主张而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

三月间，朱德奉命移防泸州，他仍任旅长，同时兼任泸州城防司令。

这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四川境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朱德从频繁的战事中暂时得到解脱，据朱德旅部文书欧阳励清回忆：当时朱德的主要工作是安定人心，以舒民困。除了清剿当地危害民众的土匪外，他“时常穿着平凡朴素的衣服，到城乡里群众中，访问人民疾苦。”“他平常的生活是朴素的，用餐与部属同餐。战时与士卒同甘共苦，平时最注意士兵伙食，随时下连队到厨房里检查油盐柴米蔬菜。”“治军之暇，博览群书。”

朱德还常常穿起长袍马褂，去找泸州的文人名士一起谈诗论文，过起悠闲的生活。上一年秋天，朱德曾在泸州约当地士绅温攸泉等人组织诗社。他的心情在他为诗社成立而写的“小引”中表达得很清楚：“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泄腹中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

平静的生活使朱德能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思索过去几年的经历。自从参

加辛亥昆明起义以后，他又先后参加过护国讨袁战争和护法战争，但看到的却总是同他愿望相背离的另一种局面：许多“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朱德在此间写下的几十首诗，真切地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态。他厌恶那些割据称雄的军阀们：“相争权利皆新法，竟窃功名胜昔时，余子称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迟。”(11)他倾诉自己的苦闷心境：“深海当年姓字标，茫茫大地愿难销。南滇爱友嗟离别，西蜀知心太寂寥。”(12)但他仍一刻没有忘记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13)“信有寒霜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14)

他还广泛地阅读史籍，从历代的兴衰更替中寻求历史的借鉴。从一九一八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他认真阅读了《史记》和《三国志》，并写下批语一百多处。他特别注意探讨历来战争胜败的原因，写道：“成大事者起兵以义。”“人思自利未有不解体者。”“联军不战，必将内图，内衅一开，立见消亡。”“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他还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15)联系到他当时的处境和以后的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风暴猛烈地荡涤着中国的大地。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影响到泸州。原来沉寂的社会生活开始沸腾起来。{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020_0043_1.bmp}川南师范学校、泸县中学的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坚决收回山东半岛的主权”、“抵制日货”的口号，涌上街头，举行游行，到处演讲。学生的行动得到商界的同情和支持，商人们把出售日货视为耻辱，纷纷将日货销毁。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将领，朱德十分支持学生和商人的行动。他在泸县中学向学生们发表演说时进一步提出：“抵制日货固属当举，而徒恃抵制，不提倡国货，非根本之法。”他提出两项办法：一是合股开办国货贩卖所；一是开办自己的工厂。国货普及了，外货自然可以受到抵制。(16)

五四运动的浪涛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泸州。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他对这些新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朋友孙炳文帮助下，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

孙炳文，字澹朋，四川南溪人，是陈玉珍的舅父，但比朱德只大一岁。辛亥革命前夕曾加入京津同盟会，参与过密谋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活动。民国元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预科，担任过《民国日报》的主笔。一九一七年朱德驻军南溪时同孙炳文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一九一八年一月，孙炳文受朱德之聘，赴泸州担任旅部咨谋。

孙炳文的到来，对改变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十多年后，朱德对这位已故的挚友仍然怀念不已，说“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整作。”(17)

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朱德和孙炳文经常埋头在书斋里，一起阅读《新

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潮的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革命道路问题是他们经常讨论的中心话题。朱德开始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18)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引起了朱德的注意。当他从书刊中看到那些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文章时，兴奋不已。他特别赞赏苏俄劳动法典中提到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认为只有在中国实行这种原则，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压迫和苦难。虽然朱德还没有明确地找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但是，他通过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开始朦胧地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19)

这时，朱德阅读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接触到的思潮也相当驳杂。许多互不相容的思想，在他头脑里却兼收并蓄地混同在一起，一时难以分辨清楚。对于外国的情况，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朱德过去只是在讲武堂学习时从康有力、梁启超所写的《十一国游记》和《新大陆游记》等书籍中了解到一些。这时又读了达尔文、卢梭等的著作。他和孙炳文等人反复地讨论着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对朱德“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20)因此，这时他仍然没有抛弃这样的想法：“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益于中国。”(21)中国要成为一个不受外国列强欺侮的独立国家，就必须首先使自身强大起来。他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22)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德和他的朋友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讨论，但是，限于环境的束缚，讨论只能陷于口头的空谈。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记述她采访朱德时写道：“谈到他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朱德感到很别扭。这是一个充满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时期，他开始抽鸦片了。”(23)

希望与失望，追求与彷徨，复杂的心境交织在一起，使朱德处在一种苦闷的状态中。

一九二一年五月，战火再次在四川猛烈地燃起。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无视入川滇军将领的劝阻，尽力排挤不愿听他任意摆布的四川督军熊克武，以“阻挠北伐”为借口，发动了“倒熊”战争，朱德虽然早就提出过“撤回部队（指将滇军撤回云南），还政于民，滇川和解”的正确主张(24)，但不为唐继尧所采纳，身不由己地继续被卷入混战的漩涡中。

随着战局的不断扩大，朱德愈来愈担心唐继尧出兵北伐的许诺会化为乌有，他接连向滇、黔、川军各将领发出通电：“吾侪为出兵（北伐）而战，为熊氏障碍出兵而战，今熊氏既去，障碍即随之消失……若出兵之事迁延，而目的与心肝各有在，则不仁转属义师，讨叛即为国贼，踵熊氏之迹，尤而效之，天下其谓我何？”(25)“救国救亡在此，固三省永远之睦谊在此，奠西南不拔之根基在此，对国民显群公人格一举在此。”(26)朱德的两通电文发出后，立即引起各方响应，吁请息兵停战、出兵北伐的电文纷至沓来。唐继尧却置若罔闻，仍令滇军“抱定初旨”，全力作战。

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下，川军各部在熊克武的主持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滇军，人数几倍于滇军。而滇军兵饷无援，处于孤立境地，

又恰值时疫流行，死亡极多。一部分将领对唐继尧不满，不愿力战。九月中旬，两军在成都近郊血战九昼夜，滇军大败。川军乘势全力追击。在川的滇军共有两个军：第一军军长为顾品珍，第二军军长为赵又新。第二军共辖两个旅：第三混成旅旅长朱德，第四混成旅旅长金汉鼎。由于第二军参谋长杨森的反水，泸州于十月八日失陷。赵又新在从泸州突围时被击毙。滇军不得不全部退出川境，撤回云南。唐继尧企图控制四川的计划完全失败了。朱德率余部退回云南后，驻扎在滇北的昭通县。他的生父朱世林在离开泸州返回仪陇家乡的途中，病死在重庆。

滇军这次在四川的惨败，完全是唐继尧对外扩张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将领们回师后，又目睹唐继尧荒淫无度、专横跋扈，更为愤慨。入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在给云南省长周钟岳的信中沉痛地要求停止对外用兵，他写道：“滇为品珍父母之邦，素称贫瘠，生斯长斯，岂无闻见？惟频年执政柄者，悉力对外，内政不修，盗匪充斥，农工辍业，米珠薪桂，十室九空。加之连岁用兵，有事于蜀，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若再黷武穷兵，必至民穷财尽。”(27)但是，唐继尧仍一意孤行，既不给予接济，又责令他们重整旗鼓，再向四川反攻。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返回云南的滇军将领们秘密聚会，商议要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朱德对这次讨唐行动是同情和支持的。他同孙炳文商定，让孙炳文先去北京，他准备在推倒唐继尧后，再前往北京同孙炳文会合，两人一同到国外去。

那时，准备讨唐的入川滇军有一万多人。留省滇军叶荃、杨蓁、邓泰中等部也纷起响应，倒戈反唐。一九二一年二月六日，他们联合发出逼唐离滇的通电，电文说：“我公年来行为乖戾，与众不同，护法其名，而一切设施无一不显为背驰。”“公之为人，复为各省深恶痛绝，此后邻邦或离唇齿而成仇讎，或由仇讎复为唇齿，悉惟我公去留是视。故我公暂去则西南或有再造之时机，公留则邻省不仅若秦越之歧视。然则我公之去留，其关系于吾滇前途至深且切。”(28)朱德也在电文中列名。通电发出后，顾品珍率部向昆明进发。唐继尧见大势已去，在二月七日离开昆明经安南（今越南）避居香港。第二天，顾品珍到昆明，就任滇军总司令，控制云南的军政大权。(29)

入川滇军回师昆明后，倒唐的目标已经实现，朱德立即按照原来的愿望，提出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再三挽留，要他留下来为巩固新政权效力。朱德同他们有着多年的袍泽关系，只好暂时不走。三月五日，就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30)但他并没有放弃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公余时常去昆明育贤女子中学，向英文教师许岫岚学习英语，作出国留学的准备。

十年的军人生涯，朱德大部分时间是在枪林弹雨的伴随下度过的。一九二二年一月，他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在写给昆明近郊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的诗文中，对前一段的军旅生活作了这样的回顾：“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江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谂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万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31)并且对映空和尚“无人无我，有相无相”(32)的佛家境界表示羡慕。

一九二二年三月，云南政局又发生一次人们没有预想到的重大变动。出

亡香港的唐继尧趁滇军奉孙中山之命北伐的机会，纠集在广西的滇军旧部以及滇南的吴学显、莫卜等土匪，突然向昆明发动进攻。“唐、顾正规军激战于宜良大河两岸、顾军尚称得势时，唐招纳的土匪武装吴学显所属黄诚伯部，由路南方向袭击鹅毛寨，击毙顾品珍。”(33)顾部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败退广东。唐继尧回到昆明，重新掌握云南军政大权。三月二十七日，他对朱德发出通缉。(34)朱德和代理滇军总司令的金汉鼎等被迫逃离昆明后，经滇北，渡金沙江，绕至四川会理，在五月中旬回到南溪家中。在南溪，他只住了几天，又启程前往重庆，准备出川去北京寻找孙炳文一同出国。

这一次逃亡对朱德说来并不是不幸，倒是成了他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的转折点，朱德自己后来回忆时说：“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35)本来，朱德回云南后一直在打算离滇出国。顾品珍的失败和唐继尧对他的通缉，使他能更加无牵无挂地从原来的黑暗环境中摆脱出来，踏上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六、远涉重洋 追求真理

一九二二年六月初旬的一天，朱德乘坐的江轮离开重庆朝天门码头，缓缓地向下游驶去。

当朱德从南溪来到重庆时，他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败军之将”受到了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情款待。

杨森是四川广安县（和仪陇同属顺庆府）人，早年也是从顺庆府中学堂毕业的。一九一三年加入滇军，同朱德共事。护国讨袁时又同赴四川作战，后担任入川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团长，一九二二年才脱离滇军转入川军。他同朱德素有交情，对朱德的作战指挥能力深为佩服。这时，杨森正在准备同川军熊克武部作战，所以，极力挽留朱德，并以师长一职相许，希望朱德能助他“一臂之力”。朱德表示自己已决心出国学习军事，婉言谢绝杨的请求。杨森再三相劝也无济于事，只好表示希望朱德学成后再回来，一定虚席以待。

船到上海，朱德在一位旧友的帮助下住进法国租界内的圣公医院把烟戒了。七月初，朱德乘上火车赶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所宅院里见到阔别两年的孙炳文。

朱德这次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从四川来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在上海参观了许多家小工厂，看到了工人悲惨生活，也看到了饿死街头的贫民。他说，有一件事我敢确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在北京，由孙炳文陪同，他游览了这座明清两代帝王的古都，也看到了这个古都到处充满着腐败。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年了。孙炳文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相识，他告诉朱德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消息。朱德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定只有这个党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决心要找到这个党，并成为它的一名成员。

不久，朱德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和张家口旅行后，经过北京返回上海，去找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

第二次来到上海，朱德和孙炳文、金汉鼎先见了孙中山。孙中山比他要大二十岁，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行者。这年六月间，孙中山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八月初，孙中山被迫从广东来到上海。朱德虽然同情孙中山此时的处境，但是，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希望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提出，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军饷十万元。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朱德却表示已决心出国学习，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孙中山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几天后，朱德又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

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这一次会面中，陈独秀的冷淡态度给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他在十多年后谈到这次会面的情况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陈独秀没有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使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到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开吴淞口，驶入烟波浩淼的大洋。和朱德同船前往欧洲的除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十多人。这时，朱德已经三十六岁，在同行人中他和孙炳文的年龄是最大的。

邮轮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科伦坡，沿着亚洲大陆的西海岸，横穿印度洋，经过非洲的东海岸，进入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他同船出国的李景泌回忆说：“这只船每到一个城市，停留的时间不等，有的停半天，有的停一天，有的停二天，甚至还比二天多的。我和朱德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下船去耍一次，稀奇事确实见到不少，总算大开眼界。”沿途的见闻使朱德感到惊奇，国外并不是如他在国内时想象的那么好。在南洋，许多从国内到这里谋求生计的人们过的依然是穷困不堪的日子。马路两旁，富人的花园、洋房同贫民的破屋陋棚形成鲜明的对照。殖民地民众充当“亡国奴”后的悲惨遭遇，给了他强烈的刺激。特别是看到非洲国家的黑人的生活状况后，使朱德痛感“世界上的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

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邮轮终于在法国南部的港口马赛停岸。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换乘火车来到巴黎。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欧洲，给予朱德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到处也是一幅残破不堪的景象，衣不蔽体的乞丐很多，战争的恐怖和颓丧的情绪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这都是他在国内时没有完全想到的。

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中。他们听说中国留法学生中已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主要组织者叫周恩来。当他们打听到周恩来已到德国去的消息后，便乘上驶往德国的火车。

十月二十二日，朱德和孙炳文到达柏林。他们立刻按照打听来的地址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抗日战争初期采访朱德的史沫特莱曾听朱德向她详细地描述过那天会面的情景。

对朱德说来，这确实是他一生中特别难忘的日子。史沫特莱记述道：“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指朱德和孙炳文）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目，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

十一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他作为秘密党员，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初到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的书籍，而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因此，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三十六岁的他说来，是需要有很不寻常的决心和毅力的。

尽管如此，朱德并不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他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带着它出去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

“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阅读德文书籍，比掌握一般会话更困难一些。但他借助字典，慢慢也能读了。他所买的德文书已经存有几箱子。在柏林，他所来往的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上层人士除邓演达外很少接触。他确实在过一种新的生活。

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朱德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哥廷根这个城市很小，当时人口只有四万人。那里有四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十多个。朱德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那时，战败后的德国社会正处在严重动荡中，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很容易得到。他们学习、讨论的内容是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梅林的《唯物史观》、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11)。同时，还就《向导》、《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登载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进行学习。他们讨论的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具体是怎样的？有时在一起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是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他的政治眼界更加开阔了。一个曾和朱德在一起听课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有次我去他家，还看见过他在读《共产党宣言》。他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虽没有说自己是党员，但我们都知道他是。这是听从柏林来的同学讲的，那时共产党是公开的。”(12)

一九二四年三月，朱德进入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13)大学里的课程并没有引起朱德多大兴趣，虽然他每天都去听讲，但是，他觉得更能得益的是党小组的活动。当时，党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学生会内。朱德担任过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学生会最初没有固定的会址，也没有固定的开会日期。要开会，就临时通知，常常是在一家

啤酒酒店的大房间里(14)。

朱德平时沉默寡言，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一个比他小十二岁的中国留学生说：“我感到他待人诚恳，讲交情，生活节省不奢侈，和我们当学生的差不多，帮助学生油印传单就表现了他能刻苦的精神。”他还对那个学生说过：“人就是要能够忍耐，不要急躁，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骂人，要大度。”(15)另一个在哥廷根帮助他补习过德文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朱老很勤俭、谦和，有识度，读书很用功，书上写满了注解。”(16)

这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共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建议，实行国共合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朱德在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就在这个月内，朱德离开哥廷根，回到柏林，专门从事党务活动。柏林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小组。那时的成员有夏秀峰、廖焕星、章伯钧、高语罕、朱德、刘鼎等十几个人。(17)

国民党改组前后，党内的右派分子冯自由、邹鲁、张继等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原来感情是比较融洽的，后来受国内斗争的影响也分成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打起架来。当时在柏林的留学生段可情回忆说：“所有的人都围绕着留德学生会展开各种活动，包括政治斗争在内，分成新旧两派学生。新派学生受中共旅德支部领导，但出面的是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驻德支部出面；旧派学生多数是资产阶级子弟（应为富家子弟——注）和公费留学生，思想比较保守，背后又有青年党（对外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那时曾琦、李璜都到了德国——注）的人操纵指挥，因此形成对立两大派别。随着国内的政治动态而展开斗争，有时是很激烈的。”(18)

德国作为战败国，从一九二一年起开始向战胜国支付赔款，巨额的战争赔款加剧了德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又以德国拒付赔款为理由，出兵占领德国的煤炭、钢铁生产基地——鲁尔区，从而彻底破坏了德国的经济。朱德在哥廷根时，正是德国的货币马克急剧暴跌、物价飞涨之际，中国留学生后来曾用五美元就买下一幢楼房。由于马克贬值，外国人在德国生活的费用是比较便宜的。

朱德回柏林后，德国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经济开始回升，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地位逐渐巩固。那时，德国共产党还是合法存在的。他们在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坚持斗争，并且建立起自己的半军事性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把广大工人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当时同朱德在一起的刘鼎回忆说，朱德在这年夏天参观了有二十万人参加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检阅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后说：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19)。

三月七日，朱德写信给已从德国到苏联的李季和陈启修，请求他们帮助联系赴苏联学习军事，他在信中恳切地写道：

“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研究数月（此事可能否），即来莫（指莫斯科——注）入东方大学，再入赤军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

农（即陈启修——注）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足为距[拒]。……似此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有同志中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象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20）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058_1.bmp}

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朱德仍然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尽管朱德的年龄比较大，过去有过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给其他留学生的印象是：谦虚、好学、朴实、平易近人。他们印德文传单、改组留德学生会、组织追悼孙中山逝世的游行和集会、召集各种讲演会，还办了一个油印周刊《明星》，每次印二三百份，许多具体工作都由他来承担。

当时和他同在德国留学的谢唯进回忆说：他“到柏林后被选为中国旅德学生会委员。当委员的每个礼拜日要在学生会值班，把图片、文件整理好，把会议室扫干净。有一次他值日，下午同学们去了，看见地上很脏，就说，老朱，你值日，地怎么这么脏。朱德同志说：我上午扫得干干净净的，现在又脏了，好嘛，我再扫一遍。”“朱德同志很朴素，不讲吃穿。他很会做四川菜，星期天他就穿着围裙给大家做回锅肉吃。”（21）

四月间，为了声援保加利亚革命者的活动，他们在柏林一家咖啡店集会。到会的有三四十人，里面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会开了不久，德国警察就闯进来，把他们都逮捕了。朱德被监禁了二十八个小时，经中国留德学生会多方设法营救，由中国驻德公使馆保释出狱。

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以排枪扫射游行学生、造成数十人死伤的“五卅惨案”。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传到德国，激起留德学生极大愤慨。朱德立刻在党内明确地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22）学生会组织学生们包围并冲入中国驻德公使馆，公使魏宸组被迫在抗议书上签名。

“五卅惨案”的发生，也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同情。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中国的活动前后延续了一个来月。六月十八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在柏林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数千名来自许多国家的留学主集结在广场上，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尽管当时下起了大雨，但是整个会场的气氛却十分热烈。当集会就要结束时，柏林警察当局突然出动大批警察冲入会场。据第二天的《柏林日报》报导：“在这次平静进行的集会结束以后，刑事警察逮捕了三十五名外国与会者。”（23）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在大雨中，朱德等被捕者被押上敞篷汽车，他们被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

警察的暴行引起德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柏林的《红旗报》等报纸纷纷载文谴责柏林警察当局。工人团体的代表前往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外国人。

在德国各界人士声援下，特别是在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德国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皮克的奔走下，朱德等经过短时间监禁，终于被释放。但是，中国公使已得知朱德是共产党员，不肯出面保释他。朱德的护照被德国警察当局扣留了。

几天后，朱德接到通知，他前往苏联的申请得到批准，近期内即可启程。

这时，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了他很大的忙，替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七月四日，朱德离开柏林，和李大章等一起乘船前往苏联。他后来回忆道：“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24)

他乘坐的轮船是经过波罗的海前往苏联的。一踏上苏联的国土，朱德立刻感受到一种友善、热烈的气氛。在列宁格勒，朱德和他的同伴们被邀请到工厂、机关、学校去演讲、参观。

那时，列宁去世还不久，苏联还没有完全从内战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物质生活相当艰苦。有些同伴拿西欧的生活条件作比较，感到有些失望。朱德就告诉他们：“在列宁格勒，可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日节省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经济困难，那是因为刚在激烈内战之后。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是正在一点点搞起来。这一点看不穿，那是资本主义的眼光。”(25)

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根据朱德的请求，同意他留在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在这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军事学，还有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等，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几个月后，朱德又到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这里是东方大学管理的几个农庄之一。四十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在这里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26)曾经同朱德在一起学习军事的刘鼎回忆说：“教官在讲授军事课时，我们不懂的地方，朱德就帮助解释，因为他是有亲身体会的。对于游击战术的问题，他懂得多，理解得也透彻。”(27)

一九二六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为了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五月十八日，朱德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和房师亮等一起，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到海参崴，再坐轮船，重返苦难深重而又正在奋起中的祖国。

三年半的国外生活，使朱德对于过去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现在的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的人生旅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后来回忆说：“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28)

七、在北伐革命中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朱德乘坐海轮，回到阔别近四年的祖国，和他同船返国的有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二十多人。

朱德从当时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里了解到：就在他到达上海前几天，国共合作下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已正式誓师北伐。他们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向湖南迅速挺进。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五月初已在团长叶挺的率领下从广东进入湖南。接着，先后攻占湖南的醴陵和浏阳。七月十一日，国民革命军进占湖南省会长沙。控制两湖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那时正在直隶（今河北省）长辛店督师，和奉军、直鲁军一起，向原冯玉祥部西北军扼守的南口天险发动猛攻，一时无力南顾，因此，企图联合四川军阀，牵制并阻遏国民革命军继续向北推进。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军阀政治态度的向背，对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胜利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得力干部入川，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武装，配合北伐军在两湖的作战。

在上海，朱德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朱德后来回忆说：“我由苏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接受任务。当时陈说有两件工作：一是去四川杨森处，杨当时要和我合作，向我们要人，我们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另一件是去广东，准备北伐。”朱德立刻表示：杨森曾同他在护国军中共事，他出国前杨森还许愿一定“虚席以待”，因而要求到杨森那里去。陈独秀同意朱德的请求，并要他在上海停留期间去一次南京，利用他在旧军队中的关系调查孙传芳部的兵力部署状况。

七月二十六日，朱德和秦青川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登轮前往杨森司令部所在地——川东的万县，江轮先到汉口。那时，国民革命军已越过湘北的汨罗河，吴佩孚已下令在汉口实行戒严。朱德在汉口下了船，他看到码头、街口到处是吴佩孚的北洋军在盘查过往行人，如临大敌。朱德在汉口停留了一天，又继续乘船西上。船行到宜昌，遇到水灾，耽搁了四天。八月十一日，朱德和秦青川才抵达万县。

朱德一到万县，立刻被迎进杨森的高级招待所——王家花园，受到杨森的热情款待。

当时，四川正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各霸一方。杨森直接指挥的军队有枪枝二万七千支左右，受他控制的军队共十多人，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拥兵自重，对时局的变化抱观望态度。他的心理状态颇为复杂：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顺利，便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输诚，表示要加入国民革命军，又派人到北京找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调人到万县帮助他工作；他同吴佩孚又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此前不久吴佩孚刚任命他为四川省省长。朱德到达万县后第三天，奉军和直鲁军攻占南口。原在直隶长辛店督师的吴佩孚准备率师南还，抵御国民革命军北伐。因此，杨森仍心存观望，态度并不明朗。

朱德针对杨森这种脚踏两只船、四面迎合的暧昧态度，明确提出：国民政府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提供钱和枪，但是，北伐革命是会胜利的，如果同国民革命军对抗，注定是要失败的。杨森口口声声表示赞成北伐，却又借口

兵饷来源困难，不愿脱离吴佩孚。

八月二十五日，正在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的陈毅受李大钊派遣随杨森的秘书长喻正衡（是陈毅的留法同学）从北京来到万县。杨森对陈毅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经过杨森的介绍，朱德结识了陈毅。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商议如何设法争取杨森易帜。

就在陈毅抵达万县后不久，国民革命军在农民群众支援下，相继攻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歼灭吴佩孚亲自督战指挥的主力部队，一直推进到汉口外围。

吴佩孚主力惨败的消息传到万县，使杨森如坐针毡。就在这时，另一件事使他更为气恼的事情发生了。

八月二十九日，杨森部官兵在云阳提取盐款及粮税各款后准备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商船“万流”号回万县。他们分乘两艘木船，准备押款登轮。“乃该轮于木船接近时突开快车上驶，所载士兵、款项之木船二只登时浪沉。计损失银八万五千元，连长、排长各一员，士兵五十六名，枪枝五十六支，子弹五千五百发。”英国轮船无视中国主权和有关规定，在江中任意加速行驶，浪沉中国船只、淹毙中国军民的事件本已屡见不鲜。杨森得知他的运饷船被浪沉一事后，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他很清楚英国人是吴佩孚的靠山，不敢轻易得罪。可是，人员的伤亡，特别是巨额军饷的损失，又使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就去找朱德和陈毅商量如何处理这一事件。

事件发生后，朱德已同陈毅和杜钢百（杨森的同乡，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和陈毅一同赴川。）进行过商议。杜钢百后来回忆道：“朱德和陈毅分析说：北洋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靠山，所以反帝与反封建军阀是一致的。人民痛恨帝国主义，我们就要动员群众力量，迫使杨森转向广东政府，割断他和北洋军阀的联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广泛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掀起一个像‘五卅’那样的群众反帝政治运动。”三人商定：由朱德出面做杨森的工作，陈毅负责动员民众，杜钢百携朱德的亲笔信赴重庆向中共重庆地委（即后来的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汇报情况。

这时，杨森亲自到王家花园找朱德商量，朱德知道杨森内心正处于矛盾状态中，便抓住他的弱点，表示只有将肇事轮船扣留，提出赔偿要求，才有可能挽回损失。

在朱德的说服下，第二天，杨森下令扣留了途经万县的肇事英轮。

九月二日，朱德在陈毅主持召开的万县各界代表的预备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我内河肆意横行，浪沉我船只，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事，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家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人民才有真正的自由。他号召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行动起来，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连续几天，万县中学的学生一直在举行反英示威游行。各种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

杨森扣留英轮后，立刻派人同英国领事卢思德交涉赔偿事宜。但是，英国领事态度蛮横，拒不答应杨森提出的条件，而且调遣军舰分别从重庆和宜昌驶往万县，企图对中国当局进行威吓，并用武力劫夺被扣留的轮船。于是，朱德和陈毅便鼓励杨森采取强硬手段，做好还击的准备。

九月五日下午，英国军舰三艘强行靠近被扣英轮，企图用武力劫夺，遭到中国守军的抵抗。在激战中，英舰长达理被击毙。在下午五时左右，英舰

悍然开炮轰击万县城区。

这时，正在寓所的朱德突然听到炮声，立刻赶往杨森司令部，敦促杨森封锁江面，予以还击。

但是，英舰凭借着火炮优势，对人口密集的万县城区连续炮轰达两个多小时，使军民死伤千余人（其中死亡六 四人），房屋千余间被击毁，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据万县海关的外籍人员报告：“大火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左右。”万县城内最繁华的南津街、陈家坝一带变为一片瓦砾，令人惨不忍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朱德立刻向杨森建议：“速将惨案发生的前后经过通电全国各革命组织，并吁请北洋政府向英方提出严重抗议交涉，要求赔偿、惩凶、道歉，内伸民愤，外张公理，以重国权，而雪耻辱。”促使杨森向全国发出通电陈述“九五惨案”真相。第二天，朱德又派孙壶东出面组织“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一面做好死难同胞的善后工作，一面开展抗英斗争。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界给予支援，对英国进行制裁，以雪国耻。

为了声援万县民众的抗英斗争，九月九日，“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在四川巴县成立。十八日，重庆市民六万多人愤怒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时又有十万人举行火炬游行。接着，重庆的英美烟草公司华工宣布罢工，市民组织宣传队，四出进行宣传。十月五日，成都各界人士万余人也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四川各地纷纷成立反英组织，爆发较大规模的反英斗争。全国各重要城市，如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天津、长沙、厦门、烟台、济南、芜湖等，相继成立各种组织，开展反英斗争。中共中央为此在《向导》周报发表告民众书，号召“民众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对付这个强盗的帝国主义。”万县惨案极大地激怒了中国人民，使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同时，也促使杨森被迫转向广东国民政府。他委派朱德赴武汉，表示愿意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朱德回到武汉，在一次大会上讲话时说：“此次开炮，兄弟亲与此役，英人之强横可笑，亦复可怜。他以为他的枪才可以杀人。我们川军这回也不客气，为正当防卫，还他几枪，彼此都有伤亡。不过人民无辜，为他杀得太多了。”“但是，我四万万民众为他打醒了！尽都知道帝国主义非打倒不可，总望军民一致团结起来。”郭沫若也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

九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由于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陈启修还在汉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朱德暂代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二十八日，朱德率二十余名政治工作人员离开汉口前往万县。

朱德一回到万县，却得到杨森派兵东下援吴的消息。原来，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汉阳后，武昌仍在吴军手中，北伐军久攻不下，因此杨森对吴佩孚仍抱有希望。对于杨森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朱德十分气愤。他当面质问杨森，并晓以大义，杨森仍不为所动。尽管北伐军在十月十日攻克武昌，杨森的态度表面上有所转变，但仍迟迟不肯下令撤回东进鄂西的三个师，对就职一事也敷衍搪塞，对朱德说：“只要走革命的道路，迟早宣布就职没有多大问题。”⁽¹¹⁾实际上是不置可否。

十一月上旬，进犯武汉的杨森部遭到国民革命军围歼，前敌总指挥曾子唯被俘。这才使杨森被迫派代表赴武汉“请罪”，并多次找朱德表示“悔悟”。二十一日，杨森在宜昌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时仍致电吴佩

孚，表示他对吴的“忠诚”。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加紧了在四川的工作，先后派吴玉章、刘伯承、欧阳钦等人入川，并策反军阀部队，争取在四川打开军事斗争的新局面。11月中旬，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刘伯承后来回忆道：“当时我们的策略：对四川军阀一面拉拢使之有利北伐进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实力。所以在战略上是‘前面抵，后面拉’的办法。利用川军矛盾，在顺庆起义以为根据地，在泸州起义——互相策应。”(12)会后，刘伯承赴泸州具体指挥工作，朱德返回万县继续进行争取杨森的工作。

杨森易帜后，在朱德的建议下，设立中国国民党第二十军党部，由朱德任主任委员（当时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是杨闇公等三人，执行委员还有朱德、刘伯承等六人，党部设在重庆，由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13)，并且在万县杜家花园建立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由朱德带到万县的政治工作人员卢振纲、文强、熊荫寰、江亚中、滕代顺、湛杰分别担任教育长和五个大队的大队长。朱德曾到校讲话，勉励学员说：“一个军人要有崇高品德的修养，要有坚强的革命方向，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光辉事业。”(14)与此同时，朱德还通过政工人员加强对杨森部队的改造。朱德虽然担任二十军党代表兼代政治部主任，但生活仍然十分俭朴。“每天到杨森总部办公、汇报，都是身着布军服，手拿公文包，胸前佩着总部出入证，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样，徒步来去。”“他总是和蔼可亲地与人接谈，当面圆满地解决问题，使人心悦诚服的离去。”(15)这种作风在旧军队高级官员中是很少见到的，因而博得军内广大官兵的尊敬。

十二月初，沪顺起义在中共重庆地委军委领导下爆发了。一日，袁品文、陈兰亭率部在泸州起义。三日，秦汉三、杜伯乾率部在顺庆起义。五日，黄慕颜率部在合川起义。刘伯承在顺庆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第二十军在政治工作人员的教育指导下出现新面貌，引起了杨森的疑忌。他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于是，就以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考察团赴武汉考察的名义，要朱德率团前往。

十二月下旬，朱德率领由杨森部八十余名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政治考察团乘“永丰”号江轮离开万县，脱离了杨森的部队。

八、南昌暴动

第二十军考察团在武汉逗留了将近一个月。由于朱德已受到杨森疑忌，一九二六年一月间，他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前往江西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去工作。随同他到武汉的二十军考察团中，有四十多人随领队马骥之回到四川，一部分人投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八军，而鲜泽民、莫湘、徐震球等十五人跟他一起到南昌去。

朱德到南昌工作，有着特殊的便利条件。那时，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进贤一带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第三军是云南部队。这年一月初召开的北伐军军务善后会议后，第三军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后改为第五方面军）。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关系。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谊很深。朱德还有一些旧部和老同事也在这支部队里。因此，他一到南昌，朱培德立刻委任他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不久，又委任他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为什么要建立军官教育团？那是因为朱培德部先后在牛行车站和南昌城下同孙传芳部主力激战，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本身伤亡也很大，“现任中、下级军官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在战火纷飞中凭战功递升起来的，对于军事学术、政治思想的水平都较低落，有亟待整训提高的必要。”

在朱德的主持下，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学员分两部分：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编为第一、二营，共七百余人；还有一个第三营，是学兵营，主要招收省内的中学生，也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共四百余人。教育团内的中下级军官和教官，除从第三军抽调外，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以及原来在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任职前，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试军事实地指挥的能力，然后按照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连、排级职务。这种量才任用的做法，在当时军队中是少见的。

军官教育团的教育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朱德十分重视提高学员政治思想觉悟的教育。政治方面的课程，有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还有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等。他们经常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讲课。在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要求也十分严格。

朱德平时“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朱委员长有马不骑，让给体弱或临时生病的学员乘坐，自己同大家一起走路。回到团里大操场上，还要带领全团一起跑三十分钟的步。在出操时，他亲自向学员作示范动作，耐心纠正学员作错的动作。真是诲人不倦，处处以身作则。”曾随朱德从万县到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排长的莫湘回忆说：在这些日子里，“从未见他冒过火，发过脾气，一直是和蔼可亲地与人交谈，发觉到人的思想有问题时，总是旁敲侧击，循循诱导；见人行动上有错误的，总是明白指出，以理诲人。”军官教育团学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比较复杂，朱德耐心地指出：“这些人的思想是亟应改造，但也是可以改造的。我们有信心把他们改造成为革命的可靠力量，否则，怎能谈得上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改造世界呢？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

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做不同的工作。主要是：主动地接近他们而耐心细致地以理说服。我看是能够争取他们走革命这条光明大道的。” “他平时只穿套粗布军服，裹副粗布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穿草鞋。……上班总是夹个皮包走路，很少坐黄包车。他的住房只有简朴的床铺和一张旧方桌，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像个旅店。他常因开会或工作忙，便买个烧饼充饥。”

由于朱德处处以身作则，待人以诚，诲人不倦，所以在教官和学员中受到普遍的信任和尊敬。

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然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培养革命人材的基地。在每个连队很快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组，有的连党员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参谋长陈奇涵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江西的工农运动正在高涨，不少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班。整个教育团内呈现出浓重的革命气氛。

军官教育团是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开始接收学员的。三月五日补行开学典礼，当时驻在南昌的蒋介石也前来参加。

那时候，由于北伐军在两湖、江西、浙江、安徽等省的胜利进展，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政治声望随之大大提高，实力也有很大扩充。他觉得自己羽翼已经丰满，便公开暴露出反对共产党、分裂国民党中央、准备实行个人独裁的面目来。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公然说：“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份，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在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上，蒋介石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来抬高自己，说：“总理在世，一切由总理作主，现在总理已经过世，中正肩上的担子加重了……我们要作总理的信徒，总理在世，我们一切信赖总理，现在总理不在世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作为我们信赖的中心……总理在世，一切服从总理，现在总理已去世，我们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就必须有一个服从的中心。”朱德在朱培德、王均、郭沫若讲话后发言。据原军官教育团总务处长赵镗回忆：“朱团长当时告诫同学们，‘旧军阀要打倒，新军阀同伙也应打倒……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形式的新军阀在我们革命阵营中产生……我们要反掉任何跋扈、专横的独裁与篡国窃权的阴谋，才能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才能彻底实现革命。’”

就在蒋介石参加开学典礼的第二天，驻江西的新编第一师在蒋介石指使下，伙同反共的AB团分子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三月十六日，蒋介石离开南昌时，强行解散原来由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等民众团体。十七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又遭到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组织的一伙流氓歹徒的围攻，在市党部打死三人，在总工会打死一人。

这股反动逆流的袭来，激起江西各界民众的极大愤慨，南昌工人罢工三天表示抗议。三月十八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大校场召开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江西省政府主席李烈钧主持公道，严惩杀人凶手。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参加了游行，他对教育团的学员们说：“反动派已屠杀我们的同志了，我们要准备出击。”三十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的工人纠察队，收缴了蒋介石留驻在牛行车站的宪兵团的枪枝。

三月下旬，上海和南京相继克复。蒋介石从江西到上海，沿途屠杀工农群众，积极策划反共政变。政治风云越来越险恶了。四月二日，在中共江西省委发动下，南昌工农群众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军官教育团也派出一部分学员，身着便衣，携带短枪，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游行的人群高喊着反对新军阀，打倒蒋介石等口号，涌向百花洲畔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他们在方志敏等领导下，冲进蒋介石控制的省党部，捉住程天放等反共分子。并在第二天召开有三万余群众参加的大会，将程天放等人游街示众。

四月七日，朱培德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九日，任命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在全局干警大会上告诫大家，要切实负起责任，保护民众，尽快恢复南昌的秩序。

当时朱培德的政治态度是很微妙的：他同蒋介石有矛盾，武汉政府刚委任他代替李烈钧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革命势力同反动势力在江西已形成尖锐的对立，“朱培德在这中间就采取了中立态度，他对于革命不反对，可是对反革命者也不离开。”朱德利用这种矛盾，大胆地开展活动，使江西的工农运动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不久，朱培德派朱德率军官教育团到赣东的抚州一带剿匪。朱德在出发前一再向全团人员阐明：“要做到真正的成为一个革命的人，就要有个清醒的头脑，有个明净的眼光，有个坚定的信念。要能明辨是非，要能澄清曲直。要能分清敌我，还要站稳立场。如果是一贯欺压人民和剥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哪怕口头甜如蜜，其心则是毒若剑，我们必须毫不留情予以打击。若遇有权有势而有钱的人在咒骂他人时，则当多考虑之，多给予调查研究之。如系是阶级敌人诬陷穷人，则必予以惩罚而支援工农，支援穷人。”军官教育团在赣东活动了一个多月，平息了真正的匪患，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部队调回南昌前，朱德又派军官教育团的副官卓廉诗担任抚州公安局局长，排长冉国平担任临川县农民自卫大队大队长。这些，不仅支持了农民运动，而且使军官教育团的学员得到实际战斗的锻炼，提高了军事指挥能力。

但就在这个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已迅速恶化了。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接着，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当时还保持着国共合作关系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广州等地也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到五月间，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严重，反共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步步向右转。五月十三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回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公然通电联蒋反共，并向武汉发动军事进攻。二十一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枝，捣毁湖南省总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大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朱培德一时在表面上还没有公开反对共产党，但也在五月二十九日下令“礼送共产党出境”，六月六日又下令在江西全省停止工农运动。

正在赣东剿匪的朱德得知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的消息后，在六月中旬赶回南昌，向朱培德提出辞去公安局局长一职，并且将军官教育团的第一、二营学员提前毕业，只留下第三营。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回到扩编的第三、九两军，其余分到赣江流域各县做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工作。同月下旬，朱培德也以“礼送”的名义要朱德离开南昌。朱德后来回忆说：“我因为平素与朱培德他们感情还好，而博得一个‘欢送’。”(11)不久，朱德离开南昌，经九江转往武汉。

到七月初，局势更加严峻了，宁汉合流的趋势日见明朗。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政府背弃孙中山实行的三大革命政策，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愤然辞职离国，宋庆龄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十五日，汪精卫等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宣布“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

中国革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迫使共产党人不能不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部队，主要有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这些部队由于准备东征，正集中在江西九江一带。七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初步决定。因为朱德在江西有便利的工作条件，对情况也熟悉，就派他先赶回南昌。

七月二十日中午，朱德乘江轮抵达九江。他下船后，直接到赣北警备区司令部去见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兼赣北警备区司令金汉鼎。金汉鼎同朱德是多年共患难的老朋友，这时，正奉召准备上庐山去开会。他告诉朱德，朱培德打电话通知他，说汪精卫和张发奎上了庐山，有要事相商。

两人一同乘小船前往莲花洞九江车站。在船上，朱德向金汉鼎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今后革命发展的趋势，劝金汉鼎说：“在江西的这班人都是灰色的，不愿革命了。我们一同到广东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2)金汉鼎后来回忆说，当时因为他有阶级偏见，没有答应朱德的要求。

到了莲花洞，去南昌的班车早已开走，金汉鼎约朱德上山休息几日。朱德婉言谢绝了金的邀请，留在莲花洞，等候第二天的火车。二十一日，朱德回到南昌，立刻投入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

他根据中央的要求，精心绘制了南昌市区的地图，并且对敌军兵力部署的分布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同时，频繁地同第三、九两军留驻南昌的几个团的团长进行接触。

二十七日，奉中共中央之命负责发动并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来到南昌，当晚住进花园角二号的朱德寓所。朱德详细地向周恩来汇报了南昌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以及他所作的工作。后来，周恩来曾高度评价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就在这一天，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暂编第二十军先后进入南昌。成立了领导暴动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会上，决定在三十日晚举行暴动。

一场大较量已经迫在眉睫，整个南昌城里的气氛异常紧张。汪精卫在牯岭召见金汉鼎时，特别强调江西目前的局势是外松内紧，并要金汉鼎迅速把存放在南昌的所有军用物资运到吉安，以防不测。

暴动计划的执行，由于中央代表张国焘在三十日早晨赶来南昌而发生了周折。张国焘坚持认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应该争取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周恩来等多数人认为，张发奎深受汪精卫的影响，是不会同意这个暴动计划的。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三十一日，前敌委员会再次召集会议，又辩论了几个小时。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八月一日凌晨二时举行暴动。朱德的任务是设法拖住留驻南昌的第三军两个团的团长，保证暴动的顺利进行。

当天下午，朱德在佳宾楼设宴款待那两个团长。酒席上，猜拳行令，觥筹交错，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随后，朱德又约他们到大士院三十二号打牌。朱德离开佳宾楼后，先到西大街中华圣公会的第二十军指挥部，向贺龙通报情况，接着也来到大士院。

正当暴动就要发动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贺龙部有一名云南籍副营长赵某接到命令后跑来告密，第三军那两个团长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离座告辞。朱德不好阻拦，就赶到第二十军指挥部，将叛徒告密的事告诉了贺龙。于是，起义提前到午夜后举行。

从贺龙处出来，朱德又到了第三军第二十一团团长李世龙家中。据第三军第二十团中校团副蒋文光后来回忆说：“七月三十一日晚，他（指蒋文光）在街上看到叶挺、贺龙的部队情况有些不同，赶紧跑去找二十一团团长李世龙，要李立刻注意，或者将部队带出南昌。可是到了那里，碰见朱德正与李世龙闲谈。朱德一见他即知来意，不等有所表示，就拉着他说：‘文光，我们到街上走走。’没有两个小时，街上到处响起了枪声。”（13）朱德原来领导过的“军官教育团的学员有三个连参加了起义，公安局没有多少人参加。”（14）

到清晨六时，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肃清，起义取得了成功。

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朱德后来对这次起义作了很高的评价：“它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从此民主革命的大旗就由共产党独立肩负起来。”（15）

九、保存革命火种

南昌起义的成功，使国民党反共势力大为惊恐。但南昌不宜久留，因为赵义军处在朱培德、张发奎部队的四面包围中。

面对如此不利形势，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立即按中央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来一次北伐，以统一全国。南征的具体目标是广东的东江流域和潮汕地区。因为那里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共产党在那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而且，占领了汕头就有了出海口，可以争取到国际的援助。

参加起义的兵力约二万二千人。起义成功后，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来号召革命。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下辖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九军。第九军原是在江西的滇军的番号。滇军参加起义的兵力不多，只有军官教育团的三个连。滇军中有一个师长叫韦杵，那时是国民党左派。起义前朱德曾同他交谈过国是，韦杵抱着同情的态度。朱德建议由韦杵担任第九军军长，自己任副军长。起义的第二天，革命委员会根据朱德的建议，作出任命。不料，韦杵在起义前夕因病赴武汉治疗，不在军内。八月三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时，又改任朱德为第九军军长。他根据前委指示，一面着手组建第九军的指挥机构，一面整编参加起义的军官教育团，并吸收一部分铁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第九军教育团。

起义前夕，朱德曾分别写信给他在滇军中的老同学和老同事，包括：驻在韶关的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驻九江的第九军军长金汉鼎、驻吉安的第十九师师长杨池生、驻临川的第二十六师师长杨如轩，晓以革命大义，劝他们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但他们或态度暧昧，或公开反对。起义军南下的前夕，朱德又派人给杨如轩送去一信：“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龙、叶挺走一路，弟与兄走一路。兄穿须须销，弟拿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然而，杨如轩仍顾虑重重，一怕反不成被杀头；二怕朱德吃掉他。所以，没有回信，只是说：“请转告玉阶兄，望他多保重，我自有主见。”匆匆支走了送信的客人。

八月三日上午，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朱德担负了一项重要任务：被任命为先遣司令。他带着第九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比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二十五师早两天踏上南下的征途。

临川，旧称抚州，距南昌一百九十里，是起义军南下时经过的第一个重要城市。从南昌到临川，一路上没有遇到敌军的抵抗。先遣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向沿途群众作宣传，筹措粮草和安排宿营。朱德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驻临川的杨如轩得知起义军要路过那里时，考虑到同朱德多年同窗和袍泽的关系，又“慑于革命声威，同时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便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地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大路。

八月六日，朱德率起义军先遣队到达临川，全城各界群众集结在大道两旁欢迎起义军，还为部队准备了凉篷和茶水。

八月的江西，一向酷热难忍。起义军各部队因暑天行军，途中减员较多，在临川休整了几天。部队进城后，中共临川县委召开党团员活动分子会，号召党团员、工人纠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参加起义军。临川中学有三百多师生报名参加了第九军宣传队。还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在李井泉、萧志戎带领下，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随军南征的这支地方武装，在壬田战斗后编入了第九军。

起义军在临川经过将近一周的休整，于八月十二日告别临川，挥戈南进，经过宜黄、广昌，直指瑞金、会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钱大钧部两个师加两个团共九千人，已从赣州调往瑞金、会昌一带，准备拦击起义军。他的两个前哨团驻在瑞金以北三十里的壬田市。桂军黄绍竑部十个团也正赶来增援。面对这样的局势，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将第二十军的第三师拨归负责先遣任务的朱德指挥。

八月二十五日，朱德率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一个营，作为前卫营南下，在壬田同钱大钧部两个团开始激战，坚持到贺龙率第二十军主力赶到，在第二天清晨将钱大钧部的这两个团击溃，乘胜进占瑞金。

在瑞金，缴获了敌军许多文件，得知钱大钧、黄绍竑两部集结的计划。起义军指挥部为了避免在继续南下时遭到强大敌人从背后袭击，决定乘黄绍竑部尚未赶到、敌人兵力尚未集中之时，先击破会昌的钱大钧部，再行南下。

打会昌，是起义军南下途中第一场恶战。在这场战斗中，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为右纵队，攻击会昌西北的山头阵地；归朱德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三师为左纵队，向会昌东北高地进攻；贺龙率第二十军的第一师和第二师为总预备队，驻守瑞金附近，以策应和支援各方。

朱德接受任务后，首先命令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朱德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11)小分队遵照朱德的指示，一路上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自己，不断向钱大钧部打冷枪，直把他们追到离会昌城只有四十里的地方才宿营。钱部被搞得精疲力尽。五十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迫，敌驻我扰，’”(12)

三十日凌晨，进攻会昌的战斗打响了。拨归朱德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三师，由教导团和第六团组成。(13)那时，第六团还未赶到，朱德便和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带着教导团出发了。不久，就遇到钱大钧的四个团。敌人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顽抗，起义军反复冲杀，战斗形成拉锯状态。等到第六团赶到，又展开更猛烈的进攻。但由于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在夜间走错了路，城西的主攻方向一时未能打响。守军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原来作为助攻的东北方向，便集中大部兵力向第二十军第三师猛扑。后来，第二十五师赶到，叶挺指挥第十一军发起总攻，激战到下午四时，钱大钧部全线崩溃。起义军一鼓作气，追击三十里。钱大钧部伤亡、被俘和逃散的达六千人，只余下三千人退走。这是起义军南征途中取得的一次大胜，但自身伤亡也达一千人，在全军人数中占了不小的比重。回师瑞金时，朱德指挥的第三师仍归还

第二十军建制。。

会昌战斗结束后，前委讨论继续南下的路线问题。起义军原定计划是取道寻邬直下东江。这时，寻邬至东江一线已有对方重兵把守，而福建却是对方兵力空虚之地，进军阻力较小。加上在王田、会昌战斗后，起义军增加了许多伤员，取道寻邬，都是山路，运输困难，而经长汀南下，可以用船只运输伤员。所以，变更了原来的计划，改走福建长汀、上杭，沿汀江南下东江地区。

起义军越过闽赣边境的武夷山后，在九月五日开进长汀，对夺取东江的计划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当时，前委内部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和叶挺“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14)他们认为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得，如果主力先取潮汕再回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军之可能。再一种意见。“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15)由于后一种意见得到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支持，多数同志也渴望早日攻占潮汕，能得到休息，又能在沿海口岸得到国际的援助。所以，会上通过了后一种意见。这就形成了三河坝分兵的决策，使原来兵力已日益不足的起义军力量更加分散了。

三河坝分兵计划大体是：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怕承等率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从处在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约四千人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

三河坝在广东大埔县的南面，是一个位于三江口上的大镇子。从北面飞流直下的汀江，同从西南面奔腾而来的梅江在这里汇合后，向南泄入水深流急的韩江。在三河坝对岸有一座八十多米高的笔枝尾山。它形如鱼尾，山势险要，松林茂密，群峰叠嶂，可攻可守，大有一山镇三江之势，是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十五师是以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无论部队的战斗力还是党的力量，在起义军中都是最强的劲旅之一。划归朱德指挥后，十月一日，朱德便带着第二十五师师长周上第等，仔细地观察了三河坝的地形。朱德认为三河坝位于三江会合处，发生战斗时，第二十五师如果留在三河坝必将背水作战，这是兵家历来的大忌，于是，决定把部队转移到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连夜构筑工事。师指挥部设在龙虎坑东边高地。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第二十五师党代表）等都在这个指挥所，准备随时迎击敌人。

当年参加三河坝战斗的第七十五团团团长廖运周，对当时的情景曾有一段回忆：“第二天午后，朱德在河滩竹林旁边，召集全师官兵讲话。他和士兵一样，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给人一种非常温厚和朴实的感觉。朱德同志动员我们：要坚守三河坝，牵制敌人兵力，为向海陆丰进军的我军创造有利条件。（当时我军已占领了潮汕）同时他指出：我军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革命的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号召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保持铁军的荣誉，战胜来犯敌人。”(16)

朱德还仔细他讲解了如何构筑工事，如何防守阵地；对渡江的敌人，什么时候打，怎样打最为有利。听讲的军官对朱德坚定的胜利信心和渊博的军事知识十分敬佩。

布防方毕，钱大钧就带着经过补充的三个师十个团约两万人扑来。他们用二十多条小船，在半夜顶着浓重的夜幕，开始偷渡。当木船行到江中，早在滩头阵地上严阵以待的起义军战士遵照朱德“半渡而击”（17）的指示，一齐开火。钱部的大部分船只被击沉，剩下的几条逃回了对岸。

第二天，钱大钧从松口一带抢来了十多条民船，趁着浓雾抢渡韩江，又遭到起义军迎头痛击，仍没有渡过江来。

十月三日拂晓，韩江江面上浓雾沉沉。钱大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利用浓雾的掩护，调集大批船只，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分多路强渡韩江。一部分强渡成功后，抢占了第七十五团防守的滩头阵地，双方反复争夺，战斗一直僵持到午后。

下午三时，钱大钧部又调集许多迫击炮和机枪作掩护，拼命攻击。起义军战士虽经昼夜激战，又已粮绝，仍坚持顽强拼搏。这时，另一股敌军强渡过江后，抢占了梅子一带，对起义军形成两面夹击，形势更为不利。

当夜幕落下时，起义军已陷入对方的重兵包围中。朱德认为经过三天三夜的顽强阻击，大量地杀伤敌人，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已经完成。起义军在激战中伤亡也很大，为了保存实力，必须立即撤出战斗，去追赶主力。于是下令留下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第三营作掩护，其余部队交替掩护，迅速转移。

朱德和周士第率领第二十五师约两千人，在十月六日清晨撤出三河坝后，当夜兼程去追赶主力部队。周士第后来回忆道：“三河坝战斗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潮汕已经失守，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我们当时认为守住这个地区对主力作战有利，因此坚持与兵力超过我们许多倍的敌人作战。激战三天三夜后，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已处于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于是就决定退出战斗，拟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军会合。”（18）

可是，一个意外的沉重打击却突然来到。当晚，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清晨，遇见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安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二百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才得知第十二军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已在潮汕失败。主力失败的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大家头上。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那时，“这支部队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19）他们既孤立无援，又同起义军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一切只能由朱德独立负责，当机立断地作出决断。“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20）

朱德同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后，决定部队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七日上午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士第、陈毅等二十多人。有人回忆：会上，朱德介绍了起义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后，断然决然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

把革命干到底！”(21)经过热烈讨论，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22)会议上的军事决议，简单他说，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23)这一下，就为这支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朱德、陈毅为了巩固这支起义军余部，保存革命火种，适时地进行了三次整顿。这就是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人们统称它为“赣南三整”。

朱德率领这支部队离开茂芝后，一路急行军，经麒麟岭，过闽粤交界的柏嵩关，进入福建，再沿闽粤边界北上。十月十六日到福建武平时，部队还有两千五百余人。这个行动很快就被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刻派钱大钧部一个师紧紧尾追。十六日，起义军击退了追敌，但本身又受到很大伤亡和散失，留下一千五百多人。他们立刻向西北转进。当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时，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抢占了反动民团据守的隘口，带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回忆道：“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24)十月下旬，{ewc MVIMAGE,MVIMAGE,!09100020_0089_1.bmp}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

当时，这支部队的处境依然十分困难：四面受敌，孤立无援；虽然摆脱了敌军重兵的尾追，但仍经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能不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组织还没有取得联系；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供应和治疗；部队思想一片混乱，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25)“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26)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有的还在继续散布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在这样的危难关头，朱德沉着镇定地“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27)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

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一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一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28)粟裕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同志对之作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29)陈毅所说的两条政治纲领，就是指：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朱德的讲话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受到鼓舞，增加了信心，陈毅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他说，是会垮定的。”“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30)三十年后，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副教育长邓逸凡曾问朱德：“还听说三河坝失败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动摇和混乱现象，当时您号召说，谁愿革命就跟我走。”朱德并不把这些归功于自己，回答说，“有这样一回事。你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把它看作是集体的事业，看作是党的领导。当时我所讲的，也并不是我个人独到的见解，而是革命的经验。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在部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那时党员比较多，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就依靠他们去巩固队伍。”(31)

不论行军还是打仗，朱德一直和士兵们一起，一样穿灰色土布军装，一样吃大锅饭。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对于反革命整天跟在后面怎么办的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追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不会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32)他的讲话，士兵很爱听。他是很坚定的，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也受到大家的衷心爱戴。“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33)

在天心圩整顿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了，大约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34)但留下来的却更加坚定了。人数虽然减少，但都是革命的精华，为人民军队保存下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经过天心圩的整顿和以后行军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情绪有了转变，开小差的减少了。

天心圩整顿，是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是“赣南三整”的开端。这次整顿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思想教育，统一大家的认识，振奋革命精神，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朱德在这支部队生死攸关、需要作出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担当起历

史赋予的重任，把部队带出绝境，并且博得了全军对他的巨大信任。

大余整编是在十月底进行的，重要内容是进行组织整顿，先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团组织，二是整编部队。

粟裕回忆这次整编的历史背景时说：“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我们的队伍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余地区。正如朱德同志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候，继宁汉之战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同志便利用这个间隙，领导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35)

怎样进行整顿和整编？朱德回忆说：“于十月底到了大余，对部队进行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36)粟裕说：“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同志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像我所在的这个排，因为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它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是党、团员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记得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人数的十分之一。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37)在整顿党团组织中，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还整编了部队，使它更有利于指挥和作战。当时，这支由不同来源组成的部队，已经七零八落，不成建制。原来的军、师都成了空架子，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在整编中，取消了“军、师、团”建制，从实际出发，把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共组成六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同志，对外化名王楷（因朱德同志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38)

部队经过这次整编，面貌焕然一新。大家虽然衣服褴褛，面黄肌瘦，但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粟裕说：“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部队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提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次大余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39)

上堡整训，是十一月初起义军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进行的。当时，湘、粤军阀之间重新开战，无暇顾及起义军余部。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又一次进行了整训。

上堡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40)在这以前，朱德、陈毅一直很重视部队的纪律。转战途中，在信丰发生过少数不良分子鼓动战士抢当铺的事情。陈毅抓住这件事对部队进行教育。他气愤他说：“这哪里像革命军队，简直像土匪一样了！”并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41)到上堡后，部队的任务不仅是行军、打仗，而且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

加强纪律的重要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所以，部队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并对官兵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

上堡整训，“其次是军事训练”。(42)那时，崇义，上堡一带正是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杨如轩的防区。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关系，朱德又给杨如轩写去一信，希望杨如轩“沓起眼皮，把上犹借他练兵三个月，他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打败蒋介石。”(43)杨如轩虽未作正面回答，但也“沓起眼皮”，没有去骚扰起义军。在整训中，起义军“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44)

起义军的指挥员多数是原来叶挺独立团的，不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打仗所习惯的是正规战那一套。起义军中的战士，多数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南昌起义后的一些战斗仍是正规战。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都已发生变化，部队转移到山区去找“落脚点”，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始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从实践中逐渐懂得了“还可以上山打游击”，“觉得上山有出路”。这就需要学习游击战，杨至诚说：“在这里，我们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了游击战争。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这里的群众多少年来深受地主、土匪的压迫，又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一经发动，便轰轰烈烈起来了。”(45)

这是起义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朱德曾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46)

“赣南三整”时间很短，只有二十天左右。那时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混战已经开始：张发奎部南下入粤后，很快同李济琛、黄绍竑两部公开冲突，争夺对广东的控制权；唐生智部同南京政府之间的战争也已开始。一时都自顾不暇，没有力量再来追击起义军余部，朱德正是抓紧这个难得的间隙，使部队及时得到休息和整顿。历史证明“赣南三整”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赣南三整”始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三湾改编”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底。这两个重大事件，在时间上相近，在作法上类似，都取得巨大的成功，说明它们是切合大革命失败后客观形势变化实际需要的正确措施，对以后的整党整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经过了“赣南三整”，部队的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仍面临着许多严重困难，特别是给养和弹药无法解决。当时，已近隆冬，起义军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枝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削弱。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就成了摆在朱德面前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起义军在江西崇义县上堡整训时，朱德从报上意外地看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崇义相邻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他同陈毅商

量后，便写信给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同他们合作。

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兄弟，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昆明的“重九起义”，又一起在蔡锷的领导下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后来，范石生成为滇军的高级将领。一九二三年初，杨希闵率反对唐继尧的滇军讨伐陈炯明后，进驻广州，扩编为三个军，范石生升任第二军军长，“石龙大花桥一役，击溃陈炯明的洪兆麟部，立了战功，深得孙大元帅嘉许，明令授予上将军衔。”(47)一九二六年滇军第二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时，他仍任军长，一九二七年十月，第十六军移防到韶关和汝城一带。范石生同粤系、桂系、湘系军阀都有矛盾，而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尖锐。在范石生军中担任军官团教官的严中英回忆说：“范石生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一九二三年范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时，孙中山大元帅指挥东征，申讨叛逆陈炯明。当时，蒋介石任粤军许崇智的参谋长，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即席要求发言，范石生以主席身份傲慢地问：‘你叫什么名字？’蒋答后，范又问：‘你要讲什么？’蒋谈了自己对作战的意见。范不等蒋讲完，就嘘了一声说：‘算了吧！你说得轻巧，拾根灯草！’使得蒋十分尴尬，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48)蒋介石报复心很重，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范石生心里自然更有顾虑。所以，他需要寻找盟友，以加强自己的力量。当他得知朱德正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时，便几次派人秘密寻访，进行联络。

中国共产党人同范石生的统一战线关系早已建立。还在一九二六年范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时，周恩来就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云南人王懋庭（又名王德三），将在广州的云南籍共产党人赵贯一（赵薪传）、王振甲（王西平）、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向镇弼以及广西人余少杰等派入范部，建立了党组织，组成第十六军政治部。他们分别担任秘书、科长、股长及下属部队的党代表（国民党的党代表）。(49)“四·一二”政变后，范石生对蒋介石的“清党”命令阳奉阴违，搁置不理。所以，在第十六军里一直保存着共产党的组织。朱德后来说：“南昌起义前，驻在湖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们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周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50)

朱德给范石生的信发出去后约半个月，范派人送来了复信：

“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为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在驾汝城，到日唯（注：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曾日唯）处一晤。专此恭候。”(51)

朱德向陈毅介绍了范石生的情况，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同范石生的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样做，有利于隐蔽目标，积蓄力量，待机发展。朱德又向全体共产党员讲明同范石生合作的意义和目的。大家经过热烈讨论，统一了认识，同意在原建制不变、保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同范石生合作。

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受党组织的委托，带着教导队从崇义的上堡出发，

去汝城同曾曰唯谈判。在途经汝城县壕头圩时，还有过一次惊险的遭遇：他们住在一个祠堂里，半夜间突然被土匪何其朗部包围。土匪冲进祠堂，问朱德：“你是什么人？”朱德说：“我是伙伕头。”土匪又问，“你们的司令在哪里？”朱德指着后面的房子说：“住在那边。”由于朱德穿着简朴，同士兵没有什么区别，土匪信了，就往后去。朱德从窗户里跳出，脱离了危险。

到汝城后，同曾曰唯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在谈判中，朱德提出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52)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起义军改用第十六军四十六师一四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六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团长（不久，范又委任朱为第十六军总参议）；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后来，一九二八年六月，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在受编的时候，朱德向范石生他们表示，大意：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党有命令要我们怎样时，我们还是怎样，他们意承了。”(53)

对这些协议，范石生是认真执行了的。朱德说：“他接济我们十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在红军的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54)当时在范石生身边的严中英回忆道：“范对我说：‘这支部队现在还穿着单衣短裤，没有盖的。天气这样冷，就得先把棉服军毯运去。’我从侧面了解，范对这部红军是按照一个团的军需物品和粮饷等予以补充的。后来朱总司令把部队带过十六军的驻地时，我看到战士们穿着新发的棉衣，在制服装备方面，与范军没有什么区别；但在精神上态度上，却与国民党的部队截然不同，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在队伍中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大家说说笑笑，亲如家人，我见了感到新奇。”(55)

随后，陈毅、王尔琢带着部队开到汝城西北方向的资兴。在资兴时，又从范石生那里领了五六十万发子弹。

这段时间内，朱德以第十六军总参议的名义，不时到军司令部与范石生会晤，谈笑风生。他们有时讲到过去在昆明翠湖之滨一堂相聚的岁月，有时又讲到现时中国革命的前途，处得很融洽。

朱德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讲到同范石生合作的意义时，说过：“范石生之所以与我们达成协议，实现联合，是想扩充队伍，壮大实力，同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阀对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与范部建立统一战线，以他为掩护，隐蔽目标，积蓄与发展力量，绝不是放弃原则，顺从他人，也绝不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我们应该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大家一致拥护这一决定。

十二月间，这支部队又从资兴南下，进入粤北，移驻韶关西北三十里的犁铺头，他们这次开往广东，原来是按广东省委指示去支援广州起义。但到粤北时，广州起义已失败了，就在犁铺头进行休整。朱德找来教导大队队长李奇中，对他说：“就目前情况看来，我们像现在这样安定的机会不多，敌人总要打我们，我们总是要打仗的。可是以后打什么样的仗，仗怎么打，大家并不了解，我们要抓紧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让他们经常学到新的作战知识才行。”在训练时，朱德自己讲课，他要求部队抛弃旧的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密集队伍受到敌火力的杀伤；要求指挥员重视对敌

情的搜索和侦察，不摸清敌人情况不动手；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武器外，一定要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他反复强调：“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地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住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56）

他们无论在驻防或行军时，照样打击当地的土豪势力，有时还处决一些民愤很大的地主恶霸。范石生听到有人向他报告，但从没有过问和制止过。

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立即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同时，方鼎英部从湖南进入粤北，监视起义军和范石生的动向。范石生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后，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刻写信派秘书杨昌龄前往犁铺头，告诉朱德，劝他立刻离去，还送来一万块钱。他在给朱德的信上说：“‘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朱德必须立即率部脱离险境。他最初准备按照广东省委的意见，去东江同广州起义的余部汇合。但部队刚到达仁化，突然发现国民党第十三军的部队正沿浈水开往仁化东面的南雄，切断了起义军前往东江的去路。朱德当机立断地决定，在收集广州起义的一部分失散人员后，折向湘南，去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湘南起义。

十、领导湘南起义

三九隆冬，大雪纷飞。在岭南大瑶山的茫茫林海里，正行进着一支部队，作为部队前导的军旗上直写着：国民革命军第一百四十团。谁能想到这支有着整齐装备的“国民革命军”正是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朱德率领从广东仁化西移的部队来到广东乳源县（今属乐昌县）的杨家寨子。

杨家寨子是粤北山区的一个小镇，在逶迤险峻的南岭的南侧。从这里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湖南。镇上的三百多户人家都姓杨，杨家寨子便成了这个村镇的名字。在万山丛中，这是一块不多见的平坝。所以，远近乡邻又叫它大坪杨家。

给起义军带路的是龚楚。他是广东乐昌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1935年叛变投敌），曾在北江地区搞农民运动，带领广东农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后来又带领农军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利后，他回到家乡乐昌县。朱德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宜章县农会主席杨子达，当时就住在杨家寨子，他对我们进驻这个寨子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杨家寨子还有一个不久在智取宜章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就是胡少海。胡少海，又名胡鳌。他家是湘南宜章县的富户，父亲是宜章的豪绅。兄弟六人，他排行老五，乡亲们都称他为“五少爷”。他虽然出身豪门，但上学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放弃“嗣承祖业”的士绅少爷生活，投身于民主革命，在程潜部李国柱旅当一名下级军官。后来进了程潜办的“建国援鄂军讲武堂”，毕业后在程潜部任营长。“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他遭到怀疑，只得带领部分湖南籍士兵，离开部队，躲到杨家寨子，以贩马作掩护，领导着一支农民武装，打富济贫，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同中共宜章县委的杨子达、高静山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朱德率部来到杨家寨子，目的是由此进入湘南。在湘南发展革命活动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第一，这时南京政府同原来盘踞两湖的唐生智部的战争正在进行。唐生智本人虽已通电下野，南京政府组织的“西征军”已占领武汉，但唐的余部三个军退入湖南，“西征军”正分路进逼长沙、岳阳，大战即将爆发。双方对峙的兵力集中在湖南北部，一时都无力顾及其他方面，湘南空虚。桂军黄绍眩部也正同粤军张发奎部在粤西相持。这正是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第二，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基础很好，北伐军首先从那里经过。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写道：“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大革命失败后，地主进行反攻倒算，农会受到严重摧残，但潜在力量还很大，原来在国民革命军和城市中的不少湘南籍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在政变发生后被迫返回家乡，在本地工农群众中已做了许多工作，容易一呼而起。这又是发动湘南起义的良好群众基础。

这以前不久，中共湘南特委已制定《湘南暴动计划》。朱德率领的部队到达杨家寨子后，湘南特委所属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就赶来了。他详细地向朱德、陈毅、王尔琢汇报了宜章的敌情：城内没有正规部队，只驻有邝镜

明的五百名民团，同外界没有通讯联系。这是有利条件，但宜章是座石头城，易守难攻。如何拿下宜章，打好湘南起义的第一仗？朱德动员大家献计献策。讨论时，有的人认为民团不堪一击，主张强攻；有的人建议引蛇出洞，把敌人诱出城来歼灭；有的人提出组织一支小分队，装扮成赶圩场的群众，混进城去，来个里应外合；还有的主张兵临城下，把宜章围个水泄不通，限期令对方投降。朱德耐心地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他讲了四个有利条件：一是军阀正在湘北酣战，湘南地区敌人势力比较薄弱；二是时近年关，地主豪绅逼租逼债更加厉害，贫苦农民和地主豪绅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三是起义军经过了补充和休整，战斗力大大提高；四是胡少海出身豪门，参加革命后没有公开地参加过本乡本土的阶级斗争，身份尚未暴露。因此，他提出由胡少海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团副的名义，率领一支先遣队进驻宜章，布告全城：本军奉范军长之命移防宜章，保护乡里。稳住宜章的上层统治者后，大部队随即跟进。为了不让反动头目逃脱，要胡少海以“宴请桑梓父老”为名，对准备捉拿的人都送去请柬，并在宴前设下埋伏，以便一网打尽。

一封盖有第一四团团防的公函送进宜章县衙门。县议会大厅里，县长杨孝斌和县参议长、团防局头头、警察局长、商会会长及各界士绅，聚集一堂，商讨如何迎接即将入城的“国民革命军”。

一月十一日，天气晴朗。宜章打开城门迎接胡少海“荣归故里”。县里的头面人物都到南门外迎接。先遣队入城后，立即布哨，换下了团防局的哨兵，把宜章城的交通要道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向朱德发出一封密信，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一月十二日，正午过后，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起义军开进宜章城。在一四团团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宜章县女子职业学校开会研究行动方案。胡少海汇报说，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当地官员、士绅还蒙在鼓里，只是对部队进驻宜章的目的有着种种猜测，事不宜迟，应该及早动手。朱德问宴请各界的事安排的怎样了？胡少海说，他已向县长杨孝斌提出，杨孝斌说那样使不得，不能反主为宾，王楷团座一到，就为各位接风洗尘。朱德说：“那我们就借水行船吧！”

宴会在县参议会的明伦堂里举行。酒过三巡，大厅里进来一个跑堂的，一声长叫：“鱼，来啦！”这是约定的信号，说明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朱德站起来，把杯子掷在地上，门外立刻冲进十个战士，把枪口对着那些官员和士绅。这时，朱德大声宣布：“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威作福，糟蹋乡里，反对革命，屠杀工农，十恶不赦，是劳苦大众的罪人。现在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听候公审！”

几乎在同一时间，陈毅、王尔琢指挥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驻在东山养正书院的团防局和警察局，俘虏了四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

智取宜章的胜利，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

接着，朱德下令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革命者和无辜群众；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的工农群众。顷刻之间，宜章城里一片欢腾。

一月十三日上午，中共宜章县委在城内西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朱德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郑重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在这里，第一次举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朱德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打倒当地军阀

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大会接受群众意见，经公审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宜章县长杨孝斌、原县长黄得珍、挨户团副主任刘秉钧等。

会后，朱德、陈毅和宜章县委的胡世俭、高静山、杨子达等共同部署各区乡配合工农革命军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全县起义。朱德自己来到栗源堡，当晚召集全村人开大会。他说：“你们这个村子，是大革命时期最勇敢的村子，你们也是最勇敢的农民。因为反动派的屠杀，把你们成立的农民协会推翻了。我们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农民协会是推不翻的，你们要把农民协会恢复起来，组织起来，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会后，村里就组织起了暴动队，朱德还发给他们六七支新枪。这支部队以后编入了宜章的独立第七师。

朱德智取宜章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控制着广东的李济深密令曾经发动“马日事变”、大量屠杀工农的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许克祥接到命令后得意洋洋他说：“老子用六个团同朱德的一个团去较量，吃掉他绰绰有余！”立刻带着全师人马，从广东乐昌日夜兼程北上，想去扑灭湘南起义的烈火。

这一着，早在朱德的预料之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的主力部队已发展到三千多人。为了应付突然情况，并接受南昌起义中没有同当地农民运动结合而失败的教训，他在春节前夕，率领部队秘密撤出宜章城，隐蔽在乡间，休整队伍，发动群众，以逸待劳，准备反击敌人的反扑。朱德回忆起那一段历史时说：“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

宜章县委派谭新到工农革命军驻地长村，向朱德、陈毅汇报许克祥进兵岩泉圩、屯粮坪石镇的情报。听完汇报后，朱德对情况作出分析：“的确，敌人有不少优势，我们不能低估。他兵力数倍于我，武器装备精良，后方实力雄厚。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不可采取南昌起义后那种死打硬拼的方法，同敌人拼消耗。应该有勇有谋，灵活机动，扬长避短。用游击战和正规战结合的打法，去战胜敌人”。大家同意朱德的分析，决定避实就虚，诱敌深入，主动撤退，寻找有利战机。

一听说要打发动“马日事变”的死对头许克祥，工农革命军的情绪十分高涨。四乡的农军也赶来要求参加战斗。“活捉许克祥，为‘马日事变’死难烈士报仇”，成了工农革命军战士响亮的口号。

朱德、陈毅把部队隐蔽在深山中的圣公坛。许克祥将教导队和补充团留在坪石镇，亲率两个主力团进到岩泉圩一带，而把另外两个团在坪石、长岭、武阳司、栗源堡一线摆开，搜寻工农革命军。但他得到的报告却是“共军去向不明”，“朱德无影无踪”。

一月三十日，朱德判断，歼灭许克祥部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依据：一是工农革命军经过休整，士气高涨，体质增强；二是许克祥部连连扑空，锐气已减；三是许部摆成一线，首尾难以相顾，便于各个击破。他和陈毅、王尔琢等连夜制定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熟悉地形的胡少海、谭新带领，迂回敌后，阻击增援之敌，截断岩泉圩敌军的退路；另一路由朱德、陈毅率领精锐，直捣岩泉圩，消灭许克祥的两个主力团。

一月三十一日，工农革命军向岩泉圩悄悄进发。这完全出乎许克祥意料之外。一个土豪赶到岩泉圩向他报告说：朱德的部队到了百岁亭，离这里不到五里地。反而受到许克祥的训斥：“你这是造谣惑众，扰乱军心！”

早晨七点钟，冬天的太阳刚刚升起。岩泉圩上传来声声哨音，许克祥的部队正在开饭。工农革命军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岩泉圩，它的人数虽然不多，却是南昌起义留下的精锐部队，又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很强。前来助战的农军，也在四面山上摇旗呐喊，燃放鞭炮。胡少海、谭新领着另一路兵马，又从侧后杀入，前后夹击。许克祥腹背受敌，无法招架，仓皇而逃。

岩泉一攻下，立刻传来朱德的命令：乘胜追击，不给许克祥有喘息的机会！工农革命军汇成一路，集中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向坪石挺进。

坪石，是广东省北端的一个重要市镇，属于乐昌县，地势非常险要。北伐军曾把这里作为前进的基地和中转站。许克祥这次北上，也把坪石作为大本营，屯积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他刚逃回坪石，朱德带着工农革命军就赶到了。许克祥便仓皇应战，部队乱作一团。

工农革命军在朱德指挥下，一进入坪石，就猛打猛冲，穷追不舍，又追了一二十里。许克祥只剩下七八个人，慌忙换上便装，跳上乐昌河边停靠的一只小船逃命去了。大家都想捉到许克祥，朱德亲自带了部队追他。赶到渡口时，只见岸上扔着一套许克祥的军装。

坪石大捷，战果辉煌，开创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这次战斗，工农革命军主力人数不足两千，却俘虏许部一千余人。三里长的坪石街上，到处都是许克祥部丢下的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经过清点，共缴获步枪二千余支，还有重机枪、迫击炮、山炮和各种弹药装备以及几十挑子银元。后来毛泽东在诗句“黄洋界上炮声隆”中提到的那门炮，据说就是在坪石从许克祥那里缴获来的。

朱德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次战斗时，说：“我们的同志和广大群众对许克祥是恨之入骨的，听说打许克祥，士气空前高昂，个个争先恐后。许克祥把他的六个团摆成一条长蛇阵，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所以，战斗一打响，我们很快就把他先头的一个团打垮。紧跟着追击下去，一路走，一路打，把他的六个团一个一个地都打烂了。我们追到坪石时，敌人已溃不成军，乱作一团。坪石是一条峡谷，且无交叉道路，敌人只能沿这条峡谷逃窜。我们就一直追下去，追到乐昌河边，再不能追了才停了下来。这一仗打得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还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坪石大捷，是朱德巧妙地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打法取得的胜利，也是他吸取南昌起义失利的沉痛教训，实现武装力量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本来有较好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地主阶级残酷的反攻倒算，更在农民群众中郁积着强烈的愤怒和反抗要求。朱德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坪石大捷的消息，更轰动了整个湘南。春节刚过，湘南各地农民群众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斗争的烈火迅速燃遍湘南大地。

中共郴州县委得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占领宜章后，立刻召开会议，决定请朱德率部进入郴州支援起义。县委书记夏明震用明矾写了一封密信交给良田区委，让他们派人送到宜章。一月二十二日，良田区委派共产党员肖光标、李克如、李言勤三人送信到宜章。朱德看到郴州县委的来信

后，知道郴州存在着一支红色游击队，非常高兴，立刻拨出步枪一百余支，让他们把红色游击队武装起来。

坪石大捷后，朱德在皈塘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把起义烈火立刻引向湘南广大地区。胡少海等率农军返回宜章，把宜章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由胡少海担任，副师长是陈东日，党代表是龚楚，留守宜章并监视坪石、韶关方面的敌军动态。朱德、陈毅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北上，直逼郴州。

二月四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开到宜章、郴州之间的良田镇，得知有两个营国民党军队驻守在大铺桥一带。大铺桥又名大福桥，是群山之间的一处要冲，宜（章）郴（州）大道就从村中经过。村边的河上有座石桥。据说大铺桥就由此得名。驻守在这里的两个营是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刚刚组建起来的，六个连队都是些从小学和中学征召来的学生，被编成训练队，准备作军官，他们大部分还不到二十岁，有些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从来没有打过仗，但枪械很好，都是些汉阳造的新枪。朱德组织大家讨论作战方案时，有人主张对这些毫无战斗力的敌军，采取突然袭击，一举加以歼灭，自己不会造成多少伤亡；也有人主张用政治攻势，争取他们站过来。

朱德听完大家的争论，指着一把雕有“武松打虎”图案的太师椅，打趣地问大家：“武松为什么打虎？”有人回答说：“不打虎，老虎就要伤他。”他又指着另一把雕有“苏武牧羊”的太师椅问大家：“苏武为什么不打羊呢？”笑声中，有人回答：“羊又不咬人。”朱德接着说：“大铺桥这一仗，正象这两幅图案，有‘虎’也有‘羊’。对‘虎’——那些顽固的反动军官，我们学武松，要坚决地打，不然就过不了景阳冈。对‘羊’——那些学生兵，我们要学苏武，耐心地去把他们牵来。打虎才能牵羊，只有把‘虎’打死了，打伤了；‘羊’才能得救。”大家都同意这个“打虎牵羊”的方案。朱德还对陈毅和其他参谋人员说：“这六连人都是受过教育的青年——还受过一点军事训练！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可以送他们到宜章重新训练，然后要求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他叮嘱部队对待他们要像对待误入歧途的兄弟一样，开始攻击时先喊欢迎他们参加革命的口号，涣散他们的斗志，力争避免一战。

大铺桥战斗，按照预定方案进行得很顺利。一阵枪响后，学生兵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工农革命军立刻喊话：“弟兄们，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队伍。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欢迎你们参加革命！”敌军的团长威胁学生兵开枪还击，并且举枪打死了几个不愿还击的士兵。这时，一阵排枪把这个团长打倒，滚到水沟里了。“虎”打死了，“羊群”大乱，部队完全失去控制。朱德趁势下令吹起冲锋号，把包围圈越缩越小。守军除一小部分逃散外，大部分都缴械投降。后来，把他们送到宜章去学习，多数人自愿参加工农革命军，小部分要求回家的还发给了路费。一九三七年，当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问起这件事时，朱德告诉她，当年的那些学生兵，“许多人已经成了他的部队中的军政干部。”

大铺桥战斗，战果很大。拿下了大铺桥后，郴州城里原来驻有何键的正规部队五个连便弃城而逃了。二月四日傍晚，工农革命军擎着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开进了郴州。

二月五日，朱德、陈毅参加郴州市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调整充实县委的领导班子，一起部署全县的起义活动，决定以郴州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

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邓允庭同志任师长。”

二月十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离开郴州继续北上，向耒阳挺进。陈毅留守郴州，准备向东北侧击永兴。

这时，关于工农革命军和朱德的种种传说，已很快传到耒阳。中共耒阳县的机关报《耒潮》，公开刊登工农革命军快到耒阳的消息。耒阳城里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撤到衡阳，县长也溜走了。《湖南民国日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这样报导：“迄至正月十六、八日，防军开退，县长失踪。乃组织耒阳地方临时维持委员会，推举王曾奎为主任。”(11)县挨户团总局的三百多人枪，在队长章家梅带领下，统归维持会指挥，紧闭城门，打算负隅顽抗。

二月十五日，工农革命军进入耒阳的幺平圩。十六日凌晨，占领灶头街。朱德听取县委汇报后，决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担负攻城的部队，先隐蔽在城外的树林里，观察动静，相机而动。由耒阳县委委员邓宗海、刘泰身藏短枪，带领几十名农军，打扮成卖猪肉、蔬菜、柴草的，装作去赶圩场，骗过团丁的盘查，从北门混进城去，同城内接应的地下党员一起解决把守城门的敌兵。朱德对参加会议的干部说：“这是一个完整的战斗计划，部队要与农军密切配合，发挥各自的特长，迅速拿下耒阳，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另外，他还特别叮咛耒阳是座古城，是蔡伦的家乡，要认真保护。

攻打耒阳，进行得很顺利。二月十六日凌晨，攻城部队隐蔽在北门外的树林里，化装后的农军闯过团丁的盘查，进入北门。几声枪响后，埋伏在城外的农军和工农革命军三千多人扑向耒阳北门。天亮前后，朱德带着工农革命军主力，向驻守在城南桌子坳的挨户团常备队发起猛烈攻击。开始时，他们还想顽抗。后来看到城里火光冲天，无心恋战，迅速溃散了。

攻下耒阳的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欢迎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在会上讲话说：“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正在混战。趁着这些强盗吵嘴打架，互相揪住辫子，难分难解的时候，我们发动了湘南暴动，组织和武装了工农群众，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现在，宜章、郴州、资兴、永兴的暴动取得了胜利，耒阳的暴动也胜利了！”(12)他还说：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仅仅是湘南起义一个好的开端，郴县、耒阳的胜利说明湘南起义推上了高潮。暴动就要在湘南全面开花，反动派在湘南就要完蛋了！

二月十六日，召开耒阳县委扩大会，决定立即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十九日，在杜陵书院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刘泰任主席，徐鹤、李树一任副主席，”(13)

不久，朱德根据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的精神，(14)在耒阳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由邝鄘任师长，邓宗海任党代表。同时，还建立了各区的独立团、县赤卫团、乡赤卫队、少先队等。

在宜章、郴州取得胜利后，湘南各地的起义烈火相继点燃。在水兴，黄克诚、尹子韶、黄平等举行暴动。朱德在郴州、永兴交界处的油榨圩，遇到刘木带领的永兴县部分农民武装，去永兴支援起义，并带去五十六支步枪。二月十九日攻克永兴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并组建永兴红色警卫团，由尹子韶任团长，黄克诚任党代表。(15)

接着，朱德又率部来到安仁，歼敌一个连。他在安仁华王庙的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安仁农民武装的领导人唐天际回忆道：“大会是由我主持的，朱德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都是穷人，都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大革

命失败后，敌人杀死了许多农民，你们吃了苦。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贫苦人民大众谋利益的，现在我们出头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朱德同志讲话的时候，群众越集越多，场地上挤得满满的。朱德同志讲话的时间不长，但对群众鼓舞很大，使地主豪绅的威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16）资兴、桂阳等县也相继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这以前，朱德还派谢汉文和一名家在耒阳的战士，化装成商人，到来阳以西的常宁县水口山铅锌矿去发动工人暴动。谢汉文到水口山矿后向地下党的组织传达了朱德关于组织工人暴动的指示。不久，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也派人到水口山，准备发展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工人宋乔生领导下，发动暴动，夺了矿警队的枪，开到来阳、衡阳边界的桐梓山。参加水口山暴动的八百多工人和附近的三四百农民，汇合原来在桐梓山一带活动的秘密农民武装，共一千一百多人，成立了桐梓山工农游击队，由宋乔生任队长，谢汉文任党代表。不久，根据朱德的指示，桐梓山游击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独立第三团，宋乔生任团长，谢汉文任党代表。后来，这支工人武装在朱德带领下上了井冈山，改编为特务营。

三月初，工农革命军二打耒阳之后，朱德同伍若兰结婚，伍若兰，来阳人，一九二四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在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回来阳从事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曾任共青团来阳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参加了湘南起义，任来阳县女界联合会会长。（17）

朱德回忆湘南起义时说：“我们相继攻下了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了暴动。共有十一个县的群众行动起来了，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打倒上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初的湘南暴动（当时称年关暴动）。”（18）

湘南暴动的意义很大。在当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以智取宜章揭开序幕，不到一个月功夫，有那么多县起义了，一百多万农村人口起来了，切断了粤汉之间的交通线，打败了许克祥，对湖南、广州的敌人有很大震动。萧克后来说：“为什么一起义规模很大呢？我看有两条：第一条，湘南保留了党的组织。部分地区的农民协会隐蔽下来了，五个县都有县委，有湘南特委；第二条，有一支经过锻炼的有战斗力的正规军参加，两个力量配合起来了。这两个力量缺一个，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声势。”（19）

湘南暴动后，宜章、郴州、永兴、资兴、耒阳、安仁、桂东（是毛泽东应湘南特委要求率部下井冈山后，于三月三十一日建立）七个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为了便于统一领导，推动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发展，湘南特委在三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永兴县太平寺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驻点在郴州，主席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担任。湘南苏维埃区域面积不小，穿越它共有五百里路程。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开群众大会庆祝三天，扩大苏维埃的宣传。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主席团发出《快邮代电》，介绍了会议的六项决议，朱德、陈毅等当选为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

在工农兵代表会议上，来自各县的代表热烈地讨论了土地问题，最后决定：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资兴县的《土地分配法》只提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而没有提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办法是：“由

县苏维埃政府把土地一律没收交予乡苏维埃政府以局部的分配。凡参加农业劳动的都有份的，多寡以那乡苏维埃政府所辖土地之多寡而定。”(20)各县结合本县的情况、展开轰轰烈烈的“插标分田”运动，创造了苏维埃运动中较早的分配土地的经验，并且在当地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中共湖南省委在湘南暴动失败后的一个决议中写道：湘南苏维埃政府在三月初“实行土地的分配，使农民能得到土地耕种。现在湘南工农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仰仍然存在，并且都希望苏维埃政府的再来。”(21)但因为时间太短，有些地方只分了浮财，分了谷物，分配田地的口号虽然提出来了，还没有来得及很好地分。(22)

开创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新经验，这是湘南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了南昌起义失败教训的结果，朱德在讲到南昌起义时曾说过：“当时只是看到武装斗争的必要，而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必须和农民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没有把军队开到农村去搞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反而在起义胜利后把部队从南昌拉到广东去了。”(23)朱德正是认真吸取了这一教训，从湘南起义一开始，就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注意把武装夺取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正如当年参加湘南起义的萧克所说：“从三月五日第二次收复耒阳到四月三日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转移，朱德同志领导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插标分田’；一是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24)

湘南起义的规模、声势和成果都很大，给了大革命失败后工处于低沉状态的革命群众以一个很大兴奋，工农革命军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并且获得了一批干部，黄克诚、萧克、邓华，杨得志、唐天际等就是在这时带领当地农民起义军投入这支队伍的。

对湘南起义，萧克曾作过一段总结性的评论：“从一九二八年元月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到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共一万余人，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历时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可以说，我党所发动的一系列农村武装起义，规模如此之大，参加人数如此之多，坚持时间如此之长，实属罕见。”(25)

十一、会师井冈山

湘南起义后不久，国内的政治局势有了变化。一九二八年三月，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余部通电接受南京政府的收编，使他们有可能腾出手来，以更多力量来对付湘南的农民运动。为了扑灭这场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湘粤军阀根据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纠集了七个师，从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两个方向南北夹击，进逼湘南。湘南地区的地主武装也相当强大。在双方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湘南的地形条件，也不利于起义军的活动。

对起义军造成更不利影响的是：在湘南苏维埃区域内，这时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主要来自湘南特委。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要求到处进行烧杀，严重脱离了农民群众。“特派员何舍鹅提出：‘烧烧烧，杀杀杀，干干干，’。“结果遭到群众的反对，土豪劣绅又煽动说：‘鸟都有个窝。我们房子烧了，家都没啦，那共产党有什么好处？’”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并没有这样做。参加过湘南起义的黄克诚说得很明确：“我知道他没有烧房子，坪石没有烧，宜章也没有烧嘛。”李奇中说：“当时朱德同志也到各县去看了看，并纠正了杀人，放火的错误。”“朱德同志说房子不要烧，房子留下我们还可以住。”

朱德自己谈到当时“到处乱杀乱打”的盲动主义时，也说：“还好，那时军队里就没有执行过这盲动主义”。但在地方上很多是那样做了，使党和群众的关系受到很大损害。朱德后来说：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湘南。”

为了保存工农革命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

朱德当时所以能作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决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两支起义部队早就有了多次联系。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南昌起义军失利后“到达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后来在江西转战时，“朱德同志派原在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取得联系。毛泽覃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胞弟，接受任务后，化名覃泽，由资兴到茶陵，见到了毛泽东同志，详细介绍了朱德同志所部及其行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同志的问候。”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南昌起义军在江西崇义上堡，又同来自井冈山的张子清、伍中豪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会合。杨至诚回忆说：“知道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更增加了我们的勇气和信心。部队中湖南人很多，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多同志都读过，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同志’便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希望。”当时，朱德详细询问了井冈山的情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何长工从井冈山下山，同湖南省委，湘南特委联系，寻找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韶关的犁铺头找到朱德后，“朱德同志详细了解了井冈山地区的地

形、群众、物产等情况后，十分满意，怀着羡慕和赞赏之情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毛润之了，如果不发生意外，估计已经到了’。”这对朱德以后决定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实现两军会师，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湘南特委仍强调湘南起义军“守土有责”，借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要求以湘南的全部武装力量同敌人硬拼，这些盲动主义的主张，遭到朱德的坚决反对。

这时，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已按湘南特委的要求，进入湘南地区。特委将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撤销，另成立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三月上旬，毛泽东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部上山：一路由他和何挺颖、张子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一千余人，从江西宁冈的砦市出发，楔入湘南的桂东、汝城之间；另一路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第二团从井冈山五大井出发，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毛泽东还派毛泽覃带着一个特务连赶到郴州，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

三月二十九日，朱德率领部队完成了转移的准备，在耒阳骛山庙整装待发。他在指挥部门前的大坪上作了动员，说：“这次进入湖南取得了很大胜利，广大农民已组织起来了。各县都有了自己的工农武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广大农民扬眉吐气，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卷土重来，我们要百倍警惕，要选择更有利的地点、时间消灭更多的敌人，革命道路是漫长曲折的，同志们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我今年已经四十二岁了，你们还年轻，我都不怕，你们更要不伯苦，要将革命进行到底。”(11)朱德的讲话，被阵阵掌声打断。部队出发时，附近的工农群众站在大道两旁送行。朱德每到一个地方，只要部队一休息，他总要找一些老百姓来问一问，谈一谈。不管老人、小孩，他都找来聊一聊。人多了，他就站在高处讲。从骛山庙来到附近的芭蕉坪，他对当地赤卫队员讲了话。他说：“不要看我们人少，但我们一定会胜利，这是因为革命的同情者是多数。地主、富农等剥削者总是少数。”在讲到怎样打仗时，他说：“我们不能光硬打，硬打要加巧打，要灵活，打了就走，不要贪多。”(12)

在毛泽覃带领的特务连接应下，(13)朱德、王尔琢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主力 and 来阳新成立的第四师、宋乔生领导的水口山工人武装，经安仁、茶陵到达酃县的沔渡。不久，唐天际带领的安仁农军也赶来会合。

正在郴州的陈毅接到朱德关于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后，立刻组织湘南各县的党政机关向东撤退。四月二日，宜章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师三千多人到达郴州，与郴州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四千多人会合。陈毅率领湘南特委机关、各县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主力以及宜章的第三师、郴州的第七师共四千余人，经鲤鱼江木根桥，在四月八日到达资兴县城。在这里，意外地同从井冈山下来的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会合。不久，黄克诚带着永兴的八百农军也赶到资兴的彭公庙。

毛泽东知道湘南起义军正向湘赣边界转移的消息后，四月六日离开桂东沙田，向汝城进发，以牵制敌军，掩护湘南起义军转移，随即攻占汝城。四月中旬，到达资兴县的龙溪洞，同萧克领导的宜章独立营五百多人会合。这是第一支同毛泽东亲自率领的部队会合的湘南起义军。

湘南特委机关随同陈毅带领的起义部队和农军撤出郴州后，新任特委书记

记杨福涛和湘南团委书记席克思坚决反对上井冈山。部队到资兴的彭公庙后，杨福涛就提出要同大部队分手，带着特委机关回衡阳去。为了说服他们放弃回衡阳的主张，在彭公庙召开了湘南特委和军队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会上，大家再三劝说，但没有能说服杨福涛。何长工回忆道：“他们这些工人出身的同志很不冷静，五县暴动把脑子搞得太热了。”“陈毅同志便对杨福涛说开了：‘杨福涛你头脑要冷静，你们男女老少，东南西北的口音，几十口子的人，靠几支短枪能闯过民团的关卡吗？’我不时从中插话：‘同志哟，现在赤白对立，剑拔弩张，各县都很警惕我们，怕共产党渗透，湘南敌人的指挥所在韶关，两方面的军队夹击郴州，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你们现在要到衡阳，无疑是自投罗网。我的意见还是跟我们上井冈山为好。以后，再设法化装分批送你们走。’谁知杨福涛同志却火冒三丈，说：‘我是湘南特委，逃到井冈山是可耻行为！’”“我和陈毅同志说破了嘴皮，他们就是不干。我们是军队，又对他们强制不得，只好让他们走。”“后来听说他们到来阳、安仁边界，就被民团抓住，统统杀掉了。大革命失败的初期，‘左’倾盲动主义真是害死人。”(14)

四月中旬，陈毅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一部和湘南农军第三师、第七师以及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的第二团一起到达酃县的沔渡，和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汇合。何长工去见朱德，朱德非常关切地问他：“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能到？”何长工说：“两天左右可能会到宁冈。”(15)并说他带着第二团先赶回宁冈去，准备房子、粮食，欢迎两军会师。

接着，朱德、陈毅带领直属部队从沔渡经睦村到达井冈山下的宁冈砦市，分别住在附近的几个小村子里。四月下旬，(16)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湘南的桂东、汝城返回砦市，立刻到龙江书院去见朱德。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开始了他们长时期亲密合作的生涯。当时在场的何长工回忆道：

“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砦市的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一到砦市，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顾不上一路征尘，立即带领干部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同志听说毛泽东同志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同志等主要领导干部出门迎接。我们远远看见他们，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近书院时，朱德同志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是那么深情。毛泽东同朱德同志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7)

会师后，两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在龙江书院召开了两支部队的连以上干部会议，通过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的各项决定与人事安排。接着，召开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五月二十日以后，改由陈毅任军委书记）。四军军委由二十三人组成，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

五月二日，毛泽东以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写报告给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概括地介绍了两军会师和部队合编的情况说：“前湘特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毛兼

十一师师长（本任周（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机关炮略备。以朱师二十八团、毛师三十一团为较有战斗力”。（18）

“五四”运动纪念日，在蓉市隆重召开军民联欢会，庆祝两军会师和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会场就设在龙江西岸的河滩上，用几十只禾桶和门板搭起的主席台，上面用竹竿和席子搭起一个凉篷。会场中央整齐地坐着部队，四周是来自宁冈等地的群众。当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和党政军各方面的代表登上主席台，陈毅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时，几十名司号员奏起军乐，鞭炮齐鸣。陈毅首先宣布了四军军委决定，两军会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

接着由朱德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大了，又有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19）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并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卫群众的利益。他的话音刚落，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讲话时，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会师后的光明前途。他说，现在我们部队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我们有革命的思想，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他那一部分。等到我们打胜了，就立刻分成几股躲到敌人背后去跟敌人玩“捉迷藏”的把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20）

四军参谋长王尔琢讲了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各方面的代表也相继讲话，大家都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和四军的成立。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先编成三个师九个团。不久，又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其中，第二十八团是原南昌起义的余部，第二十九团是宜章农民起义军，第三十一团是原秋收起义的部队，第三十二团是袁文才、王佐部队，第三十、三十三团是原湘南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地的农民起义军。

陈毅在第二年给中共中央所写的一个报告中讲到会师后部队组成情况：“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民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21）其中，朱部和湘南农军总数超过一万人，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兵力一下子增加五倍以上。朱部又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近千支枪，装备是最齐整的。他们的到来，无疑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22）以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但是，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23）由于两军会合后集聚的部队过多，给养十分困难。五月底，红四军军委决定撤销师的番号，军部直属四个团：第二十八团、二十

九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原来以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和三十三团，在各县领导干部带领下，返回湘南。结果，这些部队分散到敌人兵力强大的湘南各县农村去，先后遭到失败。朱德后来谈到这件事，曾说这部分部队的返回湘南，“一方面是想恢复湘南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吃饭困难，其实还是可能的。结果，送回湘南给打垮了。”“对于保护革命种子上，给了我们很大的经验。当时，主要干部的地方观念也很重，一方面吵着要回去，一方面也准备要回去，那时克服农民意识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24)

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传统和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聚集到一起，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而且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

为了纪念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朱德曾赋诗道：

红军荟萃井冈山，
主力形成在此间。
领导有方在百炼，
人民专政靠兵权。(25)

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茂密，山上有生产粮食的水田和地势平坦的村庄，但只有几条蜿蜒狭窄的小路可通。党的组织和群众都有相当的基础，是一个实行武装割据的理想的军事根据地。对朱毛红军来说，“因为鉴于过去军队没有一个根据地，流寇似的东闯西窜，得不到一个休养的机会，军队十分感觉疲劳，而甚难解决的，就是伤兵的安置问题，要找一个军事根据地，必须用力量去建立一割据区域。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于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为朱毛部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26)

从周围的情况来看，井冈山西侧的湖南方面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强，共有二十个师和两个教导团，而且都是本省的军队，但他们对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实行“进剿”，积极性不很高；东侧的江西，敌军兵力较弱，只有三个师，又是客籍的云南军队，“他们的军官和江西土豪劣绅的痛痒，不如湖南军官与湖南土豪劣绅的痛痒那样较为密切相关”。(27)所以，工农革命军一直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江西方面的国民党军队。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时，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向井冈山地区集结。他们在湖南方面的军队除株洲、衡阳、宜章一带驻有重兵外，吴尚的第八军第一师已占据湖南境内的茶陵、酃县；江西方面的军队也正向湘赣边界扑来，杨如轩的第二十六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五月三日，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红军。(28)在此之前，国民党军队已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过一次“进剿”，所以这一次通常称为第二次“进剿”。

由于朱毛会师的宁冈在江西境内，湘军已放松对工农革命军的“进剿”，而赣军仍继续加紧进攻。四月下旬，盘踞在江西永新县城的第二十六师杨如轩，已下令所属的第七十九团、八十一团立刻出动：第七十九团经龙源口直逼井冈山北麓的宁冈，第八十一团绕道拿山向井冈山南麓的遂川县黄坳方向迂回，企图分进合击，进犯井冈山。杨如轩自己带着第八十团在永新坐镇指挥。

在弄清敌情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砦市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采

用“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先粉碎赣敌从遂川方向对井冈山的“进剿”。具体部署是：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作为主力，在遂川方向迎战对方的左路军第八十一团，相机夺取永新县城；毛泽东、何挺颖、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到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阻击向宁冈进攻的对方右路军第七十九团。

朱德、陈毅率领第四军军部和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经茨坪、下庄、行州，迅速向南挺进。第二十九团赶到黄坳，同对方第八十一团的一个先头营相遇。团长胡少海立即组织部队抢先占领街北的山头，向该营发动猛烈袭击。这个团原来是宜章农军，武器装备很差，只有少数枪枝，多数战士还使用着大刀、梭标，也缺乏战斗经验，但在胡少海的指挥下，发扬勇敢作战的精神，激战两小时，一举击溃这个营，缴枪四五十支。第二十九团首战告捷，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锐气。

第二十八团到达黄坳时，二十九团已经告捷。王尔琢随即率领第二十八团继续前进，当天下午抵达遂川五斗江，准备迎战从拿山方向开来的对方第八十一团主力两个营。当时，正在第二十八团的粟裕回忆说：“当时我们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29)

第二天，国民党军第八十一团在团长周体仁带领下，从拿山扑到五斗江。第二十八团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兼该团团长王尔琢指挥下，迅速占领有利地形，趁着暴雨后的大雾，迅速逼近敌人。全团约一千二百人，同时发起攻击，“打了个把钟头，就把敌人打垮了。缴到了几百支枪。”(30)

接着，朱德、陈毅率部从五斗江出发，追歼残敌，当晚在拿山宿营。第三天，在朱德指挥下，部队向永新奔袭，中午时分，在永新城外的北田附近追上了逃敌。这时，杨如轩命令守城的第八十团出城救援，企图扭转败局，可是士气已经大挫，在工农革命军的猛烈冲杀下，全线败退，逃往吉安。工农革命军乘胜占领了永新城。这是第一次占领永新，通称“一打永新”。

永新是个比较富裕的城市。工农革命军本来缺衣少食，打开永新后军衣和粮食都得到了很大补充。正向龙源口开进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团，听到第八十一团惨败的消息后，也向吉安退去。至此，赣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进剿”被彻底粉碎。这是朱毛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取得的首次大捷。

占领永新后，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召开大会，朱德、陈毅、宛希先等在会上讲话。“朱德同志说，现在我们从湘南到江西来了，两天前在黄坳打了胜仗，前天到五斗江又打了胜仗，我们要在江西打出一个局面来。接着他讲，要加强纪律性，革命军队要爱护工人、农民，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军队要服从纪律，要守纪律，服从命令。他还批评了一些不守纪律的现象，说革命没有纪律是不会成功的，有一种人以为自己会打仗，就骄傲起来，以为了不起，我们用不着这种英雄豪杰，朱德同志还讲到打五斗江的事，他说，五斗江战斗时，敌人八十一团走了一夜，包围五斗江时是比较疲劳的。第二天他们袭击我们，二十八团就地反击，打得很好，缴了几百支枪。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没有追击，因为敌人一晚没有睡觉，他们爬山来包围我们，又没有吃饭，下着雨，路又滑，而我们的队伍睡了觉，如果打垮他们后一直追下

去，追他个六十里，追到拿山，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朱德同志的这个批评很好，鼓舞了士气，又批评了缺点。”(31)

在永新还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宣告成立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会后，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布置，第二十八团留在永新城就地休整，第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分兵发动群众，协助当地工农兵政府成立农民协会，组织赤卫队、暴动队，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把这个经验概括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

国民党军队在五斗江失败后，并不甘心。五月中旬，赣军第二十六师和第七、第九师各一个团，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进剿”。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根据敌情，决定采用“敌进我退，声东击西”的战术，待对方深入根据地内后再消灭它。

毛泽东、朱德命令第二十八团主动撤出永新县城，退回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宁冈，积极备战，待机出击；第二十九团在永新东面的高桥、天河一线，不断骚扰敌军，使他们处在疲惫不安之中。

五月中旬，赣军第二十七师师部率七十九团和二十七团的一个营进占永新城，赣军主力近四个团南渡禾水河，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

乘赣军从永新出动向龙源口搜索的机会，工农革命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在营长员一民、党代表匡祖泉率领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永新西乡出发，经莲花边境向湖南茶陵的高陇奔袭。摆出主力西出湖南的架势，迷惑赣军，并搜集报纸和有用的资料。高陇是湘、赣两省交界处的重要通道，在军事上十分重要，湖南国民党军队派有重兵防守。工农革命军第三十一团一营同守军激战，未分胜负。接着，朱德、陈毅率领第二十八团从宁冈赶到高陇增援，在界首附近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会合后，立即向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两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多连，获枪百余支。在高陇战斗中，红军也付出不小的代价，伤亡数十人，第三十一团第一营营长员一民不幸中弹牺牲。

工农革命军出击高陇的行动，果然迷惑了对方。杨如轩误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已西去湖南，根据地内兵力空虚，便放胆地向根据地腹地进犯。毛泽东那时在宁冈，当赣军主力离开永新城后立刻写信给朱德、陈毅，要他们率领部队迅速折回，东袭水新，迫使已进到龙源口的两团赣军返回，打破他们企图进占宁冈的计划。朱德、陈毅接到毛泽东来信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朱德在会上动员部队长途奔袭永新，端掉杨如轩的指挥部。他说：“打他的心脏，打他的指挥机关，打他的脑袋瓜子，一个铁掌把他的脑壳打碎，他们就完了。我们今天走几十里路，明晚奔袭永新城。如果你们同意，就准备爬城头，准备楼梯。”(32)那时红军攻城没有炮，炸药也不多，只能搭着云梯爬城墙。

朱德、陈毅率领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营离开高陇出发，突然向东袭击。这一天，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路上又满是石子，十分难走。部队冒雨急行军一百三十里，当晚赶到澧田，严密封锁消息，集结待命。澧田跟永新城相距三十里，是永新西面的一个大集镇。

第二天凌晨，朱德率部队从澧田出发。在逼近草市坳时，突然遇到赣军第七十九团也从水新方向开来。他利用草市坳的有利地形迎击敌人。草市坳是澧田、永新之间的一个山凹口，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一条山路绕着山脚转。山虽不高，但杂草丛生，林木繁茂。朱德根据敌情和地形，作了部署。上午，赣军第七十九团果然钻进朱德预设的包围圈。王尔琢指挥第二十八团

奋勇冲杀，赣军伤亡惨重，慌忙向后撤退。刚到草市坳的大桥头，又被埋伏在那里的工农革命军挡住去路。这时，工农革命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了第七十九团，团长刘安华被当场击毙，缴枪数百支。正在永新城里的杨如轩，突然接到报告说工农革命军已经打来了！他还不相信。这时，枪声大作，他便慌忙地换上便装，从城墙上吊下来，又被流弹击伤，狼狈逃回吉安。朱德率领四个营的兵力，在一天内连打两次胜仗，击溃了赣军第二十七师，乘胜开进永新城，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彻底粉碎了赣军的第三次“进剿”。这就是二占永新。

当年在第二十八团任党代表的何长工说：“朱德同志出色地领导这次奔袭草市坳、二占永新城的胜利战斗，是有远见，有预见的。”“特别是二占永新的胜利，表现了朱德同志非凡的指挥才能。”(33)四十年后，杨如轩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曾说：“我奉蒋介石命，向井冈山进攻，把指挥部设在永新。当时，毛主席指挥工农红军守在龙源口，我攻了几天都攻不下，万万没有想到，朱委员长率另一支部队以一天一夜走一百八十里的速度，从宁冈、莲花绕道而来，给我一个措手不及。刚刚得报永新西乡有警，接着，我的指挥部后方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在仓皇撤退中，我只好跳城墙逃命，弄得狼狈不堪。”(34)

五月二十日，在井冈山麓的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永新、宁冈、遂川、茶陵、酃县、莲花等县和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组织的代表六十多人。其中有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宛希先等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第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边界“一大”后，在宁冈茅坪仓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袁文才任主席。

江西国民党军队的两次“进剿”失败后，并不甘心，在六月上旬又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四次“进剿”。由于杨如轩的第二十六师已在草市坳遭到惨败，这次赣军改由杨池生部为主力。杨池生任总指挥，带着他所率领的第九师的三个团，会同杨如轩的两个团，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边界地区大举推进，湘军吴尚的第八军第二师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进，企图从西面骚扰根据地，配合赣军的进攻。

毛泽东、朱德得知后，“首先命令红军于五月底首先撤出永新城，集结于宁冈休整，伺机歼敌。”(35)随后，在宁冈茅坪召开军事会议，分析敌情，定下“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36)的方针，决定集中兵力对付赣军杨池生和杨如轩部，对湘军吴尚部取守势。但在第一阶段，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故意向西出击湖南酃县。这样做，既可牵制湘军，使它不敢轻举妄动，又能引诱赣军出动，便于红军调转头来歼灭它。为此，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军主力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二十九团，西征酃县；袁文才、王佐带领第三十二团留守根据地，密切监视赣军的动向。

会后，毛泽东带着第三十一团从茅坪出发，进入酃县的沔渡、十都；朱德、陈毅率领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由茅坪的西南方向进入酃县的十都同第三十一团会合，击溃吴尚的一个团，迅速占领酃县县城。杨池生、杨如轩得知红军主力占领酃县的消息，以为有机可乘，立刻发动向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杨如轩作为前线总指挥，带着第二十六师的两个团和第九师的一个团，向新老七溪岭进犯。杨池生带着第九师的另外两个团守在永新城里。杨如轩

在白口设立前线指挥部，亲率他那两个团向老七溪岭进犯，杨池生部一个团向新七溪岭扑去。

得到赣军已从永新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立刻率领主力迅速回师宁冈。六月二十二日，在宁冈新城由陈毅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详细研究了歼敌计划。会上，大家围绕着打不打和怎样打的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有的人提出杨池生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们部队武器低劣，条件较差，很难取胜，主张后撤。大多数人认为红军有许多有利条件，战士觉悟高，战斗勇敢，两次打败杨如轩，士气高昂，在根据地内作战，是以逸待劳，还有广大群众的支援。而敌人是劳师远征，长途行军，已疲惫不堪，又屡遭红军和游击队的打击，士气低落。这是关系到根据地存亡的一仗，应该坚决打好。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打敌人的正面；一路打敌人的背后。”(37)朱德说：“因为新七溪岭是杨池生的主力，由我率二十九团截击敌人，而由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主攻，出击老七溪岭敌人的后背。”(38)

二十三日，按照部署朱德率第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个营，占领新七溪岭的有利地形，阻击杨池生部的李文彬团；陈毅、王尔琢带着第二十八团，赶往老七溪岭迎击杨如轩的两个团；袁文才带着第三十二团一部和永新赤卫大队，从武功潭一带侧击敌人。

新七溪岭，是永新经龙源口通往宁冈的要道，山高路险，林木丛生，又修有相当的工事。第二十九团在团长胡少海带领下，遵照朱德的命令，首先抢占新七溪岭的制高点望月亭一带，赣军在李文彬指挥下，也向制高点冲来。第二十九团多次打退赣军的进攻，一直坚守在阵地上，但赣军凭着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火力猛烈，逐渐占了优势，抢占了红军的前沿阵地风车口。红军第三十一团一营赶来增援，仍未扭转局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同志手提花机关枪赶至望月亭，组织力量把敌人压下去了。”(39)夺回了前沿阵地风车口。

在老七溪岭方向，杨如轩带着他的第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一大早就向老七溪岭攻击，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百步墩。红军第二十八团因为路途较远，赶到时已处在不利地形。他们在王尔琢指挥下，多次发起攻击，都未奏效。而赣军的大部队赶到，居高临下，正向第二十八团压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王尔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第三营营长萧劲，从部队中抽调班、排长和共产党员组成“敢死队”，趁敌人中午休息时发起攻击，经过几次猛扑，占领了制高点，夺下百步墩。“萧劲同志战死，获得首先胜利。”(40)接着猛打猛冲，不给对方有喘息的机会，一直把这支赣军压到龙源口一带。

正在新七溪岭上恋战的赣军李文彬部，听到红军夺取老七溪岭上的百步墩、杨如轩的部队已溃逃的消息后，慌了手脚，准备退走。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第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发起全面进攻。李文彬再也无法招架，带着部队冲向龙源口，打算夺路而逃。埋伏在武功潭山上的第三十二团和永新赤卫大队，在袁文才带领下，趁势袭击设在白口的杨如轩的前线指挥部。杨如轩在向永新城逃跑的途中，被击伤。

朱德率领新七溪岭上的部队，乘胜追击，在龙源口会同第二十八团，把赣军团团围住。经过异常激烈的肉搏战，来犯赣军因腹背受敌，军心瓦解，全线崩溃。龙源口一仗，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获步枪四百支，重机枪一挺，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龙源口战斗，是井冈山时期最大的一次战斗，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影

响之深，前所未有。红军乘胜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杨克敏一九二九年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写道：“去年至五月战争大略情形，其间大小战争凡经过十余次，平均每五天要打一次，总是我方占优势。作战的时候，常是我们的人多，敌人较弱，乘势歼灭之。六月二十三日在龙源口（永新境内，由宁冈人永新的道路）一战，赣敌共三团，杨如轩指挥之，我军亦三团与敌战一日之久。敌为二十五、六团江西军队之最狠的部队，战斗力最强，都系老兵，技术熟练。这次战争敌我兵力相当，为江西所未经过的大战。其间进退周旋，经过许久的肉搏，因为我们占得地形的优越，敌仰我俯，居高临下，幸幸（悻悻）一鼓败之。其间战机的危险非常严重，不为敌人所败者几希。”“此役敌三团全溃，缴枪约七八百支，杨如轩带花逃跑，俘虏敌兵官长士兵甚多，敌死伤数百，我方亦有死伤，敌遂退出永新，永新即完全为红军占领。”（41）边界群众在龙源口大捷后流传着一首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42）

当年曾多次进犯井冈山的杨如轩，在五十年后回忆起这次惨败时，在一首诗中写道：“三十余年一梦空，永新附逆妄交锋。那堪旗鼓未成列，已报弹花满市中。飞将白天突兀扑，两杨无计把身容。一团劲旅平中国，豪语铭心服总戎。”（43）他在这里所说的“豪语”是指一九二七年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时，曾写信给他说：“训练一团人，打败蒋介石。”这个预言已变成了现实。

在这个时期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三次“进剿”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把红军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指导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遂川的北部，酃县的东南部。红色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口。

井冈山革命斗争所以能开创出这样一个全盛时期，可以说是朱、毛会师的直接结果，亲身经历过这个时期斗争的谭震林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44）朱德同志也谈到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的胜利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红军后来取得胜利有关。”（45）

“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当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连长的萧克这样回忆：“当时四军官兵特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失败后继续战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只要朱德军长在，就感到踏实。”（46）朱德在井冈山武装斗争中发挥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十二、八月失败前后

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抓紧敌军受到重创、一时尚未发动反攻的短暂时机，将各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第二十八团开往安福，第二十九团开往莲花，第三十一团在永新的石灰桥、吉安的天河一带活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一派大好形势。

红四军按中共中央规定，是由湖南省委领导的。而湖南省委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曾规定：“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这里所说的“特委”，是指湘南特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主要又在江西境内，因此江西省委对它自然也十分关心。湖南和江西两个省委都加强了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但随着也带来一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江西省委在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五月十三日和七月八日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边界情况，并曾在五月间“去信毛泽东、朱德同志，要他们赶快向吉安及赣西南发动，因遂川、永新、宁冈本地的工作深入固然要紧，但在军事上不如播[采]扩大的策略”。

湖南省委机关在这时曾遭受严重破坏。所以，四月间井冈山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是由湘南特委决定的。五月间，湖南省委逐步恢复工作，并在这个月的下旬派巡视员杜修经上井冈山，同红四军取得联系。杜修经在宁冈、永新、井冈山地区了解情况后，返回当时省委驻地安源。六月十五日，杜修经向省委写了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汇报红四军的来历、军队党组织情形和湘赣边界特委的情况。湖南省委在贺昌主持下经过讨论，六月十九日作出《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并于六月十九日写了一封指示信，表示对红军“以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行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处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他们批评了边界特委和四军，认为“应采取向外发展的策略”，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并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总之你们目前的主要策略，应当是积极的向外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但当前的重点仍在“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并没有提出红四军立刻去湘南的问题。湖南省委还派袁德生带着六月十九日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去井冈山。

袁德生刚走，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在盲动主义影响下，湖南省委对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又作了错误的估计：过高地估计了红四军的力量和湖南群众斗争的形势，过低地估计了湖南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制定了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随后，派杜修经带着省委给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特委的两封信，再上井冈山，和杜修经同行的还有派往湘赣边特委担任书记的杨开明。

六月三十日下午，在永新县城商会楼，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宛希先、王尔琢、何挺颖、朱云卿、谭震林、陈正人、刘珍、刘作述、刘家贤、王怀、贺敏学等。刚好，杜修经由交通员带到永新，就把湖南省委的两封信当面交给毛泽东。

湖南省委写给红四军军委的这封信中，认为驻在湖南的国民党第六军已

“恐慌极矣”，“有向赣西附近推进模样，因此与赣西部队冲突已为事实”。并根据他们制订的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要求红四军在“占永新县后，立即向湘南发展，与三十、三十三团相联后，帮助湘南党部努力于最短期间发动耒阳、永兴、资兴、郴州的群众力量，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然后用全力向茶陵、酃县、攸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暴动相联系。只有采取这样的积极发展政策，才能解决一切军事的、财政的、政治的困难。而且可以解决敌人两次‘围剿’的形势。”信中断然要求红四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决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省委指定（以）下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事实上，是要杜修经监督红四军严格执行省委作出的“立即向湘南发展”的错误决定。

湖南省委还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写道：“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提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待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

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两封来信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省委巡视员袁德生、杜修经不顾客观形势，极力主张坚决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主力前往湘南的决定。毛泽东、朱德根据时局的分析，认真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认为当敌人内部处于稳定时期，而湘南地区敌人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各方面条件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红军远离根据地，出征湘南，不论对边界工作，还是对红四军本身，都是不利的。经过讨论，会议顶住湖南省委的压力，仍决定坚持罗霄山脉政权的计划，袁德生、杜修经最后也表示同意会议的决定。

七月四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特委的名义，在永新写报告给湖南省委，说明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袁、杜二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六月三十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11)然后，从红军、敌情、根据地，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陈述了六条理由，根据大量事实说明：“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仍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提出：“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12)

永新联席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转战于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时，湘军吴尚部趁机侵入宁冈。红军间道出击未成。为了阻止湘军同赣军会合，解除对根据地的威胁，红四军分兵两路迎战。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率领第二十八团、

二十九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迫使他们回退，不敢久留永新，宁冈；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经拿山打回宁冈，同朱德所部形成东西夹击湘军的态势。当第三十一团回到茅坪时，湘军已由龙源口退往永新。第三十一团立刻跟踪追击，直奔永新。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在七月十二日一举攻克地处湘赣边境的酃县县城。湘军在永新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在十四日匆匆退回高陇。赣军虽然跟着又开进永新，但两军汇合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又受到红军第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原来计划北攻茶陵。但是，吴尚已被迫由宁冈、永新一带返回茶陵。这样，红军大队攻击酃县以调动湘军回防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赣军侵入永新后对边界割据造成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改变攻取茶陵的计划，率红军大队折回同酃县接壤的江西宁冈，增援永新。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从第二十九团内传出要回湘南去的消息，还提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第二十九团团团长是胡少海，党代表是龚楚。这支部队原来由湘南起义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改编而成，指战员中家乡观念十分严重，上井冈山后，当地因人员骤增而在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不愿在井冈山地区继续过艰苦的生活，一心想回家乡去。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和第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又在下面鼓动群众闹着要回湘南。七月十二日晚，第二十九团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会议，“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十三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带路的人，出动的日期都决定了。”(13)那时，红四军中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参加部队的管理，维护军队的纪律，监督连队的经济，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做群众工作，罢免基层领导干部。军事主官的决定，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同意，就很难执行。

朱德、陈毅得知第二十九团内部出现的情况后，立刻写信给留在水新的毛泽东，并且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对第二十九团要返回湘南的行动加以阻止。“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因为那时永新告急，遂川亦增了兵，大部军队如去湘南，边界有立即丧失的危险，所以军队当时负责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山之危，再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14)当朱德向士兵讲演时说，“军部没决定，怎么能回湘南？底下就喊：军长带我们回湘南。朱老总讲，革命要听命令。战士讲，你带我们回湘南，我们就听你的命令。”(15)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不得不断然宣布撤销第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下令红军大队从酃县开往沔渡，仍准备回师井冈山北麓的永新。

七月十四日，红军大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离开酃县城向东开拔。但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16)红军大队从酃县到达沔渡时，刚一宿营，第二十九团的官兵又闹起来，仍坚持要回湘南。“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无用。”(17)红四军中再一次出现混乱。

十五日，为了整顿红军纪律和确定部队行动方向，红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和杜修经参加了

会议。会上，“朱德同志是不同意去湘南。”(18)龚楚却竭力主张把部队拉到湘南去，“还提出‘围魏可以救赵’，我们到湘南，把敌人引过来，可以促进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永新发展。”(19)随同大队行动并负有监督责任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支持去湘南的意见。当天，红四军军委复议后，仍不顾这些反对意见，坚持作出东进遂川以解永新之围的决定。这时，第二十八团内又有人提出不回永新，要去赣南，说是“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20)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迫使军委改变返回永新的决定，同意第二十九团去湘南的要求。但军委领导这时还有一层难处：“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团士兵不大愿去。”(21)这时，杜修经怕担当责任，便提出“部队不忙行动，待我去茅坪同毛泽东商量一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定。”(22)龚楚却说：“只能等一天，后天就不等了。”杜修经第二天赶到茅坪时，毛泽东却在永新。杨开明说：“你们既然作出决定，你们就去吧！毛泽东那里由我去说。”杜修经赶回部队，最后定下去湘南。部队由沔渡去湘南时，原有的军委取消，组织了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陈毅为书记。

七月十六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开到酃县水口。十七日，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从酃县水口出发，向湘南开进，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知道部队要去湘南，便派茶陵县委书记黄琳（江华）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追赶部队。这时，部队正在向湘南进军的途中。杜修经后来回忆说：“送来一封毛泽东要我们不去湘南的信，送到我手里，部队在休息，我看信时，陈毅在旁边，我看完后就给陈毅看。信是毛泽东写的，有两页。”(23)毛泽东这封写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的信，讲了许多不能去的理由。他说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形势的发展对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刻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他希望朱德、陈毅耐心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斗争。陈毅看完信后，杜修经问他：“怎么办？陈毅说宿营后，晚上军委开会决定。”(24)

大队宿营后，军委决定就地休息一天。“第二天，开连以上干部会”。(25)这次会议，是杜修经主持的。

会上，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朱德、陈毅拿来军用地图，摊在桌上，计算回去的路程。朱德提出要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要去湘南，劝大家赶回去解永新之围。他说：“回宁冈需要两三天时间。”龚楚是一直主张去湘南的。他说：“看来离井冈山近，但因大山相隔实在很远。”(26)还说回去走的是山路，而去湘南是下坡。仍坚持去湘南。并且提出这是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问题。两种意见，各不相让。萧克回忆道：“二十八团有意见，不愿去湘南。王团长（尔琢）就反对去湘南。杜修经在会上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非常专横跋扈，对王团长讲：‘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还是决定回湘南。”(27)会上虽然经过激烈争论，仍没有能改变杜修经、龚楚等坚持的要去湘南的决定。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28)和“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29)

后来，江华回忆起执行这次任务的情况时说：“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

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30)

红军大队一从酃县南下，以湘南农民为主体的第二十九团立刻一改原来那种“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的状态，行军速度飞快，一路上很少休息。第二十八团在后面紧追都跟不上。这时，朱德忧心忡忡，总觉得打郴州是凶多吉少。他后来说：“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八月很远的去袭击郴州，那样远，又那样热，真是好冒险。”(31)龚楚写道：“攻郴州计划决定后，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意外，决定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我们即率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二十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向汝城游击，二十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32)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来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郴州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范石生的部队。这正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当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时，曾得到范石生不少帮助。他们在韶关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遇到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况，使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33)杜修经坚持要打，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34)这时，红军大队已经开始行动，事实上也难于中止。

红军大队在“郴州城东十多里的地方，碰到了范石生的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下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果然很快就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他们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35)郴州城东有一条耒水绕过，并筑有一座大石桥连接两岸。攻城战斗进展得很顺利。郴州城内驻扎的不是范石生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36)他们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红军以飞快的动作，冲过大石桥，杀向城内。城里的守军得知这支攻城的红军部队是朱德的部队后，“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37)

郴州，是范石生的后方，刚刚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开郴州后，红军涌进城里。那时，湘南农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团士兵“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农民意识严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真不像个红军的样子。直到朱军长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38)第二十九团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

傍晚，第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约五六个团进行反扑，向城内发起攻击。第二十八团在朱德的指挥下，守住了大石桥，并命令部队迅速撤退。“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39)军部、第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都过来了。第二十九团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们在进郴州后，部队已自行散开，难以掌握；撤出郴州时又动作缓慢，被敌军切断，大部分没有过桥，直向宜章方向退散。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二十

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40)第二十八团安全撤出，损失不大。第二十九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一百多人。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他们从郴州撤向资兴。

七月二十五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军退到桂东、资兴、汝城之间的龙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这时，红军士气不振、思想混乱。于是，红四军军委决定进行一次整顿。

当红二十八团开到桂东沙田后，在何长工主持下，召开了营、连党代表会议，会上认真总结了打郴州的教训，严肃批评了把部队拉到湘南遭到失败的错误，许多人要求湖南省委给社修经处分。接着，由王尔琢主持召开士兵代表大会。会上，朱德、陈毅在讲话中，回顾了两军会师后在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分析第二十八团官兵当前的思想状况和困难处境，沉痛指出前此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把部队拉向湘南的错误。朱德宣布：“只有重上井冈山才能保存和发展这支部队，才能扭转目前存在的被动局面。”(41)会后，进行了整编，将军部特务营和第二十九团余下的一百多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还从地方武装和青壮年中动员了五百多名新兵充实第二十八团，为返回井冈山作了准备。

整编后，第二十八团实行分兵，在桂东地区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重新插标分田，帮助各区、乡恢复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朱德、陈毅在寨前、沙田、东水等地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说：“过去土豪劣绅剥削我们，种田的没饭吃，织布的没衣穿。他们把我们穷人压榨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要团结起来，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实现耕者有其田。”(42)在桂东东水的群众大会上，朱德宣布当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的要具备四个条件：一，家庭贫穷，受剥削大；二，没替反动派干过事，不是地主的走狗；三，勇敢坚决，不畏一切；四，年轻力壮，有点文化。在第二十八团的宣传和发动下，一个月内桂东各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

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后，毛泽东、宛希先等率领第三十一团在永新阻击敌人。为了拖住赣敌的进攻，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分兵三路，迎击敌人；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彼时敌军势力甚大，计有五团之众，加之第六军的张部及罗定邦亦有三、四团之多前来援助，合计兵力有八、九团之众。我军仅一团人与之周旋二十日之久，围住敌人城市二十里内外，不敢乱动。”(43)后来，国民党军队得知红军大队已西去湘南，便展开猛烈攻势。为了保存实力，毛泽东带领第三十一团一部，退到永新的小江区。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和平原地区相继失陷。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大部被破坏，“农民被屠杀者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44)

杨克敏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次失败，我们叫作‘八月失败’。”(45)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46)

八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九陂召开有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特委紧急会议，研究挽救井冈山根据地严重局势的对策。会议正在进行中，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又带着省委的指示信来到九陂。湖南省委仍命令红四军“向湘东发展”，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求红四军“毫不动摇”地执行。会上展开了

热烈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驳斥湖南省委的错误主张。正当会议进行期间，有一个给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农民带回了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与会者更加气愤，纷纷指责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会议的内容也转入讨论如何扭转局势，避免第二十八团再受损失，决定由毛泽东、宛希先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湘南寻找第二十八团；由朱云卿、何挺颖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会同袁文才、工佐的第三十二团留守边界，坚持斗争。第二天，毛泽东、宛希先就带着第三十一团第三营，从九陂出发，直奔湘南。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宛希先率部进入桂东县城后，就派人去东水红四军军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第二天上午，朱德、陈毅从沙田赶到桂东县城见到毛泽东。

随后，在桂东唐家大屋召开有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宛希先、杜修经等。下午会议仍在进行时，湘军吴尚第八军第三师有两个团在桂东县挨户团的配合下，突然分两路袭击桂东县城，插入城中，将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隔开。毛泽东和朱德立刻指挥第二十八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冲出城去，占据有利地形，进行阻击。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打退湘军多次进攻后，为了避开强敌，随即撤出县城，转移到沙田附近的寨前。在这里，前委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返回边界，继续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会上还撤销了七月中旬按湖南省委命令组织的前委，另行组织行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47)决定杜修经、龚楚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领导湘南人民的斗争。

八月二十五日，红军大队分两路回师井冈山。当部队到达崇义县的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伙同该营的副营长和党代表，擅自带着第二营四个步兵连和团部的机枪连、迫击炮连向思顺开去，企图叛变，投靠赣军刘士毅部。在行进途中，几个连的干部发觉方向不对头，感到袁崇全可能要叛变，连夜带着两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返回，向军部报告。朱德、陈毅立刻派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带着一个营前往思顺，追回了被袁崇全裹胁走的第二营第五连和迫击炮连。可是，当王尔琢带着警卫员进入袁崇全盘踞的村子喊话时，遭到叛徒枪击，不幸牺牲。但大部分部队还是回来了，袁崇全只带着几个人向遂川方向逃走，去投奔刘士毅。

王尔琢是红四军的优秀指挥员，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牺牲前是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作战勇敢，又会做政治工作，在部队中很受敬重。他的牺牲，是红四军的重大损失。杨得志回忆道：“我们怀着悲痛和对叛徒愤怒的心情，从烈士遗体边走过。不一会，朱军长来了。他悲伤地低着头，在王尔琢同志的遗体前脱下军帽，站了好久好久……。”(48)这以后，红军大队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继续向边界开进。

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主要责任在谁？毛泽东曾对江华说：“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问题，军队内部也有责任，二十九团的龚楚，还有些人附和他，结果去了湘南，就失败了。”(49)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也曾说：“‘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社修经起主要作用。当时军队由特委指挥，湖南省委要部队回郴州，在战略上不对。”(50)

九月八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回到井冈山南麓江西遂川境内的黄坳。

当红四军大队回到井冈山时，主力部队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的损失虽不大，但全军的数量质量都不如以前。杨克敏（即杨开明）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51）“不过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亦有进步，边界群众组织亦逐渐恢复。”（52）

那时，国民党“赣西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欺我败残，以五营追我至遂川”。（53）毛泽东、朱德在黄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制定了攻打遂川的计划。

九月十二日，红军由黄坳出发，到达遂川县的堆子前一带宿营。经过侦察，得知赣军在遂川城外已布下包围圈，打算派一支小分队引诱红军进入包围圈后加以歼灭。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将计就计，由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和遂川县赤卫队一中队作为前卫，突破敌人包围圈后，再杀回马枪，使敌人措手不及；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遂川县赤卫队二中队作为后卫，当前卫打响后，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形成前后夹击，实行反包围。

九月十三日晨，朱德作了简短动员后，两支队伍一前一后地出发。上午十时左右，第二十八团在草林附近，遇到一股赣军。打响后，赣军自以为得计，一面还击，一面朝遂川城佯作溃退。红军紧追不舍。赣军指挥官看到红军的炊事担子都过来了，以为红军已全部进入埋伏圈。于是命令设伏的军队迅速向县城移动，实行包围。这时，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县赤卫队二中队突然赶到，冲向敌阵。第二十八团也调转头来，杀了个回马枪，大败赣军，一举夺取遂川城。在遂川筹了一些款，还买了不少布疋和药材。这次战斗，红军以四个营，打败了刘士毅的五个营，“缴枪二百五十，俘营长、连长各一，排长三、四，士兵二百余，余部退赣州。”（54）在战斗中，红军击毙了叛徒袁崇全，大快人心。这是红军回师井冈山后的首战告捷。

九月二十四日，赣军李文彬部从泰和赶来增援；同时，刘士毅部独立第七师从赣州开来，企图合击红军。红军撤出遂川后，在九月二十六日返回井冈山上的茨坪。

这时，赣军正在调防，原来驻守在永新、宁冈一带的杨如轩和杨池生两部调去吉安整编。属于江西地方势力的国民党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周浑元接替“两杨”的“进剿”任务，进驻永新和宁冈新城。为了摸清红军情况，周浑元派两名女探子化装后到茅坪打探消息，被当地暴动队员抓获。经过审讯弄清敌军的情况后，朱德决定有意给那两个女探子留下红军大队未归的印象，并且故意造成让她们有脱逃的机会，放她们回去报告。果然，周浑元以为红军大队未归，便派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在营长周宗昌的带领下，会同当地地主武装靖卫团前来偷袭茅坪。

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朱德在茅坪召开各团干部会议，布置歼敌计划，决定利用坳头垅有利地形，设下包围圈。坳头垅在两座高山之间的一条狭长的山沟中，是从宁冈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在朱德指挥下，红军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第三营和第三十一团，埋伏在狭沟两侧的高山上；第三十二团袁文才部以少数兵力在沟口引诱周部；第二十八团第一营从正面出击，以便将

进入坳头垅的赣军一举歼灭。

十月一日，周宗昌带着六个连，拿着浸过煤油的草纸进入茅坪，准备大烧大杀。当他们全部钻入坳头垅后，朱德立刻下令各部队发起攻击，一营赣军挤在垅内进退不得。这次战斗，全歼赣军一个营，活捉营长周宗昌，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乘胜收复了宁冈全县。这就是二战二捷。

坳头垅战斗后，赣军李文彬部错误地估计情况，以为红军将进攻永新，便匆忙从遂川出发，绕道泰和增援永新，在遂川只留下独立第七师一部。朱德、陈毅经过周密研究，认为可以趁机拿下遂川为部队解决给养问题。十月十三日，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再攻遂川。赣军第七师留驻遂川的部队不战而逃。红四军再占遂川城。然后，分兵五路游击，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重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壮大地方武装，筹集到一万块现大洋和大批物资。

这时，周浑元旅乘红军主力在遂川，派出第二十七团在十月底从永新再次入侵宁冈新城，企图占据茅坪，进攻井冈山。同时，李文彬部的两个团在独立第七师的配合下进攻遂川。红军“为避免硬战”，在十一月二日退出遂川，回师井冈山。“欲以迅雷之势进攻敌力较弱之宁冈、永新，打破包围之一面。”(55)十一月九日，红军主力出击。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由茅坪出发，攻击宁冈新城之敌。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歼敌第二十七团一个营；赣军余部逃向龙源口，红军紧追不放，再战龙源口，又歼灭一营。一天之内，共歼敌两个营，击毙营长一人，俘虏副营长二人、连长一人、排长一人、士兵一百多人，缴枪一百六十多支。这就是三战三捷。

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后的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扭转了“八月失败”后的被动局面，重开了边界割据的新局面。

但当时边界在经济上越来越困难。“九月、十月，敌人不来攻打，专门围上不动，说是‘久困穷迫’。这是王均干出来的新政策。”“我们尽量发展地方工作，不大打仗，战士的生活都变得很苦，都是单衣，天天吃的南瓜。”(56)

十一月六日，朱德参加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特委委员、军队和地方活动分子共三十余人，还有湖南省委的代表袁德生。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六月四日来信，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例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党的最高机关立即组织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织之，毛泽东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57)

十一月十四日，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宁冈新城召开。到会代表七十九人，除第三十二团第一营远在永新执行任务，来不及选派代表参加外，其余各部队党支部都有代表出席。大会历时两天，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等各项重要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选举了二十二人的军委，朱德为书记（照中央指定），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前委。对外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58)

根据红四军“六大”决议的精神，从十一月中旬开始，红四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这时，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内军民

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至粮食奇缺。因为根据地内的土豪几乎已被打尽，筹款也有许多困难。连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59）都难以为继。一日三餐离不开红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依然光着脚，穿着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不怨恨什么人。”（60）当时，在红军中有两首歌谣，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生动写照：“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和储备一定的粮食，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这些粮食大部分从宁冈的大陇背来。大陇的粮食是碬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存在那里的。朱德也常去挑粮和背粮。来回一百多里地，翻山越岭，顶风冒寒，非常辛苦，有人回忆说：“一些人叫朱德同志伙夫头，他满身衣服上都是油，帽子上也有油，和我们战士打成一片。他挑粮我是亲眼看见的，他把裤子脱下来背米，把裤头、裤脚捆起来背米上山。”（61）他还常“穿双草鞋，戴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62）战士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为了照顾年过四十的朱德，把他挑粮用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就让人向老乡买了一根毛竹，又做了一根扁担，并在扁担上写下“朱德记”三个大字，以防别人再拿走。朱军长带头下山挑粮的事迹，在井冈山上传为佳话，战士们编成歌谣赞诵：

朱德挑谷上坳，
粮食绝对可靠，
大家齐心协力，
粉碎敌人“会剿”。

那条记录着红军光荣传统的“朱德扁担”，至今仍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

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朱德也处处作出榜样。他一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从不吹胡子瞪眼地训人，而是循循善诱地向战士们讲道理。他很懂得战士们心理。陈毅曾对人讲过一件事：“在一次部队作战失利退下来的时候，看到部队战士破坏纪律，乱拿老百姓的东西。他（指陈毅——引者）立即上去指责。那个犯纪律的战士，不但不听，反而扭转枪头放了一枪。陈毅同志对此气极了，把这事告诉朱德同志。朱德同志听到后说：‘傻子！打了败仗退下来，战士肚子里饿，违犯了纪律，这时你去批评他，他是不会听的。只有让他吃好，休息好，到第二天集合起来，提出批评才有用处。’由于朱德同志善于带兵，一般作战失利士气低落的部队，经他带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把士气提高起来。”（63）在平时，他也处处以身作则，十分关心战士。部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但他在行军作战中多半是步行，把骡子让给伤病员骑。因此，深深得到战士们的敬爱。

十三、向赣南闽西进军

红四军大队返回井冈山后，三战三捷，粉碎了敌军第二次“会剿”。一九二八年底，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蒋介石电令湘、赣两省组织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的五个大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先在砦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茨坪会见了毛党代表。”两军会合后，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不久，国民党当局任命何键为“会剿”总指挥兼湖南省“剿匪”总司令，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集合六个旅三万兵力，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初从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等地，分五路进攻井冈山。同时，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一月四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有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各地方党组织以及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共六十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一共开了四天。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大家认为：“六次大会的决议非常正确，我们欢踊的接受”，并决定油印五百份，散发给红四军所到的地方党组织，扩大影响。

接着，会议详细讨论了如何应付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会剿”。经过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后，“前委决定五军守山，四军向赣南发展。”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会议还决定两军合编，将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三团，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三团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三团党代表。红四军留下一批干部充实原红五军和地方党政机关。同时，从根据地各县抽调一批地方干部，随红四军南下，去赣南开展工作。

为什么红四军主力选择赣南作为出击的行动方向？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有许多有利条件：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同闽西、粤北山区相连接，红军能有比较大的活动和回旋余地；物产丰富，可以提供部队足够的给养；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由于交通不便，调动和集结都相当困难；大革命时期对这个地区有过较大的影响，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较好。这些有利条件对红军在这个地区活动和发展都将起重要作用。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千六百多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何键得知红四军出动的消息后，立刻从“会剿”红军的五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四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击，并尾追红军南下。

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同时，还颁布了《共产党宣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提出十大政纲。红四军的“布告”和《宣言》阐明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阐明对待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政策，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团结起来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最初的进展比较顺利。部队隐蔽地从井冈山靠江西一侧打出去，“每天行军五六十里路，一面还做群众工作，打破了几条封锁

线，一直向南走，沿着上犹，占领了崇义城。”在沿途中，部队得到了扩充。国民党军队并没有立刻发觉这是红军的大部队行动。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主力攻克了大余县城。

他们在大余停留了两三天。这时，国民党方面已弄清红四军主力的动向。二十五日，金汉鼎和李文彬就来进攻，“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遭受的一次重大失利，伤亡达二三百人。

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匆忙地撤出大余，“朱总司令与特务营营长毕占云亲自殿后，很安全地将全军撤向南雄北部的地区前进”。全军分两路翻过大余岭进入广东南雄县境的乌迳集合。在乌迳又遇到一次很大的险情。朱德回忆道：“到了乌迳，天也要黑了，都很疲倦了，就讲讲话，开开会，就都在平坝子上露营了。可是当时敌人却来了，正在晚上九点钟。我们丝毫不晓得，还（以）为敌人也十分疲乏，休息整理，准备进攻。就在这时，这里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我们即刻惊起，出发，连号都没吹。是冬天露营；所以说走就走了。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垮了。”

离开乌迳后，红军先到南雄的界址，再折入江西信丰县境。“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等非常困难。敌人又采取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所以，“连战皆失利”。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

折回江西后，他们在信丰只休息了一夜，便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经过安远，进入赣粤闽边界的寻乌县境，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又遭到了敌军的一次袭击。粟裕回忆说，“最惊的一次是二月初向罗福嶂开进时，听说那里是个山区，地形很好，山上还有几户土豪可打。当时，敌人离我们十多公里，我们一个急行军，一天走了六十公里，但敌人还是追上来了。凌晨，我们在项山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任第二十八团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身边仅有五名冲锋枪手跟随。敌人看到有拿冲锋枪的，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得很凶，越追越近。朱德同志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跑，自己带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险境。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因为军长威信很高，训练、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半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伍若兰受伤后被俘，受尽残酷折磨，二月十二日在赣州英勇就义。

对朱德在圳下村突围时的危险状况，还有人回忆道：“朱德同志身穿一件军大衣，他身边有个卫士挂了花，不能走。朱德很留恋他，跑了几步，还回来看他。”跑了一里多路，到一条小河边。“因为小桥又软又小，部队涉水而过。这时正是严冬腊月，雪花满地。毛泽东、朱德同志也同战士一样，在寒冷刺骨的水中过了河。”

红军脱离险境后，立刻冒着大雪向东北方向翻越过几座大山，在当天（二

月一日)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这里的地势十分险要,只要堵住路口,几百人也难冲上去。在这里休息了一天,召开前委会议。

从大余到罗福嶂的这些日子里,红四军主力一直处在敌军的追击和堵截中,处境十分危险,伤兵也很多。为了准备在遇到最不利情况时部队可以分散行动,前委拟定了必要时将红四军的团改编为纵队的方案。但这只是作为万不得已时的打算,事实上部队还是集中行动的。“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的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援救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1)

离开罗福嶂后,红四军本来准备北上会昌,后来探知国民党军队正在那里集结,便向福建的武平一插。朱德回忆道:“后面追赶的敌人以为我们过福建去了。他们也犹豫,因为他们跑得也很疲乏。谁知我们拐了一个弯,一下又折回头,插到江西瑞金。”(12)

他们打下了瑞金城,很快又撤出瑞金。在城外,红军第二十八团被优势敌人严密围住,局势十分危急。“朱军长看看大家,指指周围说:‘前面有敌人拦住我们,后面有敌人追击我们,我们还往哪里去呢?要是贪生求活,那就等敌人来时交枪投降,屈膝求饶;要是愿意为人民去死,那就干一仗,把敌人消灭掉’。”讲完后,他对四面的敌情进行观察,发现敌军已经合围,没有一点空隙。“‘全团一个方向。’朱军长斩钉截铁地说:‘一营跟着我从中间突破,二、三营左右配合,全团上刺刀。’说完这些话,他不再下命令,带头向敌人反冲过去。”(13)就这样,第二十八团终于冲出了重围,同三十一团会合,开到瑞金城北二十里的大柏地、隘前一带,下决心在这里伏击追敌。这时,正是农历除夕之夜。赣军刘士毅部,在项山战斗后,对红军紧追不放,一直跟在红军后面,仅差一天路程。

大柏地战斗是关键性的一战,扭转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长期被动局面。

到大柏地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决定利用麻子坳的有利地形,兵分三路,布成口袋阵,准备消灭追来的刘士毅部。粟裕有一段回忆:“这时,朱军长,毛委员已发现追击之敌刘士毅的第十五旅孤军突出的弱点,且大柏地地形有利,故决定再在大柏地有计划地打一仗。这天正是阴历年除夕(二月九日),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了个精光。吃饱喝足以后,我们离开大柏地,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的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等到下午,敌人没来。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继续设伏待敌。那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后又起风,风停了又下雨,衣服湿了刮干,刮干了又湿,时间显得漫长。下午三时,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埋伏圈,我军立即开火,双方激战竟夜,歼灭了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八百多人,取得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4)

陈毅在这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15)

大柏地战斗后,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士气大振,后面再没有尾追的敌军,就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筹了款,买了布,补充了给养,每人还发了五角钱的零用钱。接着,向吉安、兴国、永丰交界的东固靠拢。二月二十二日,到达东固。

东固,离吉安县城很远,处于数县交界的边境,地形险要,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在这里,有着原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

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独立第四团。这两支红军队伍，是在暴动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的领导人是李文林，全团有六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共八百余人，五百支枪，主要活动在新余、分宜、安福、吉安、吉水的阜田一带。红军独立第四团的领导人是段月泉，全团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当地老百姓有一个说法：“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16)

红四军经历了一个多月脱离根据地的艰苦转战后，来到东固才获得休整的机会。粟裕回忆说：“这块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17)

红四军同红二团、红四团会合后，在东固召开会师大会。会上，传达了“六大”精神。毛泽东在会上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并赞扬红二团、红四团和东固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朱德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说打朱、毛，可是朱、毛越打越多。你们都成了朱、毛”。(18)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会后，红四军向红二团和红四团赠送了一批枪枝，并决定留下毛泽覃、谢唯俊帮助他们工作。红二团和红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二千银元，还有一部分子弹。衣物。参加这次会师的杨得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对我们这些离开井冈山后一直在转战中的人来说，见到兄弟部队和热情的群众，有了可以停脚的地方，真像到了家一样。”(19)陈毅以兴奋的心情，即兴赋诗：“东固山势高，山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20)

不久，一直尾追红军的赣军李文彬部赶到东固，吉安的金汉鼎部也对东固采取攻势。红四军在东固不便久留。毛泽东、朱德、陈毅研究后，“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21)

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又酝酿着一次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二月二十一日，桂系军阀赶走蒋介石委派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平，蒋桂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下令从湘、粤、赣三省调集军队，准备向桂系军阀进攻，在湘、赣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已顾不得“追剿”红军。这是毛泽东、朱德早就预计到的，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从容考虑红四军下一步如何发展的机会。

闽西，是福建省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从一九二八年三月起，先后发生龙岩县“后田暴动”、平和县长乐暴动、上杭县蛟洋暴动、永定县金沙暴动，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同年七月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领导人是郭慕亮、张鼎丞、邓于恢。红四军转战赣南时，曾进入福建省的武平。福建省委认为“红军转战千里，旦夕不休，尤其是这两个月来长期的奔走，一定是很疲惫，并以子弹缺乏，目前回湘赣或开往广东很有困难，客观上的环境，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是有可能的，因为汀杭与赣粤相距较远，同时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22)他们指示上杭、武平、长汀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把当地的军政情况报告红军，“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23)

“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是确实的。当时，在福建并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除驻扎福州的海军杨树庄部外，只有几支福建的地方部队：漳州一带的张贞部，闽中的卢兴邦部，长汀一带的郭凤鸣部，龙岩一带

的陈国辉部，战斗力都不强。这是十分便于红四军发展的。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东固，掉头向东，经水丰、乐安、广昌、石城，向闽西进军。

三月十一日深夜，红四军进入福建长汀县境内，第二天到达四都。当晚，驻守在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派团长卢新铭带领一个补充团赶到四都。十三日凌晨，向红军进行偷袭，遭到红军有力还击。“我军主力乘敌军立足未稳，扑上山头。敌人支持不住，向长汀方向撤退。这时，朱军长口头命令：‘毕营长，追！不要让敌人中途集结！’”（24）特务营营长毕占云马上率领全营穷追猛打，一口气追到胜华山脚下的肢溪，方才奉命停下。随后，军部和主力也到达该地。这时，中共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陂溪。红四军军委正要召开扩大会议，段奋夫在会上汇报了郭凤鸣部队的情况和长汀县的革命形势：郭凤鸣是土匪出身，后来被北洋军阀招抚，北伐军人闽时又投靠了蒋介石；他的部队大多是当地的土匪，战斗力极弱，纪律败坏，受到当地群众的痛恨。“经过长久劳累，眼圈都发青了的毛党代表和朱军长，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县委的同志汇报。”（25）根据段奋夫汇报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然后乘胜夺取长汀，消灭郭凤鸣部。

长岭寨山岭绵延十几里，山高林密，毛竹、杂草丛生，地势十分险要，距长汀城十五里，是进入长汀的必经之路，被称为长汀的天然屏障，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三月十四日晨，红四军分兵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担任主攻，特务营迂回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退路。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迅速登上主峰，早一步控制了有利地形。“敌人刚刚要上山，我们劈头一打，只用一营人，把他两团赶到河沟里，一打打跨了。”（26）郭凤鸣亲自督战，组织一支短枪队打头阵，想再发起反攻。这时，整个战场已被红军控制，郭凤鸣的短枪队几乎被红军全部消灭，其余部队也溃不成军。郭凤鸣中弹受伤，在逃跑途中被红军击毙。特务营营长毕占云回忆道：“我们刚到达牛斗头附近，枪声已变得稀疏零落，战斗结束了。这时朱军长由对面大步走来，没等我报告，就笑眯眯他说：‘郭凤鸣给打死了。’‘怎么？这样快呀！，我感到有些突然。’真的！随后就抬下来。老乡们还要求在城内示众他三天呢！’接着，似命令非命令他说：‘走吧，进城去！’”（27）当天下午，红四军乘胜占领长汀城。中共福建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红四军进占长汀的情况报告道：

“红军第四军于三月十四日到长汀，部队共三千余人，好枪一千七、八百支，驳壳一百余杆，手机关八架，水机关四架，还有二、三架迫击炮。红军长官及士兵精神都好，军纪也严肃。”“他们到长汀后工作如下：（1）没收豪绅及反动派粮食财产，散发给城乡工农贫民，并派许多宣传员四出向民众宣传。（2）帮助工农成立工农会（长汀总工会已成立）并分派部队下乡发动农民群众斗争。（3）开士兵群众大会，由政治部做政治报告。（4）成立长汀革命委员会，委员九人，民众代表六人，红军三人参加，主席丘潮系同志。革委会分军事、宣传、财政等部，并组织赤卫队六十余人。（5）由革委会出布告禁止造谣及招募赤卫队。（6）没收十余家反动派财产，罚款子三万余元。（7）收买子弹（不多），招补兵额共有二、三百人，赶制军衣四千套。（8）除没收反动派财产外，并向商人筹借军饷二万元（资本千元以下者不派），因此，军饷颇能补充，到汀后红军即发日用费，官长、士兵、

俘虏一律平等待遇。(9)前委与汀委发生密切关系,并经过汀委与上杭、武定县委发生关系,除共同努力做群众工作外,侦探与交通工作都做得很好。”(28)

长汀是旧汀州府治,是闽赣边境上的重镇,汀州城建立在武夷山下、汀江之滨。汀江是闽西最大的一条河流,经过上杭流入广东,再汇入韩江,从潮汕出海少水运极为方便。所以,汀州又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有几万人口,是官商云集之地,也是一个较为富庶的中等城市。

红四军长期转战于湘、赣、闽、粤边境的山区,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富庶的城市。杨得志描写道:“街道两旁商店的大门上,搭着镶有蓝边的白布棚,店门口贴着七红八绿的商标、广告,店里面摆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商品,好阔气!但是我们谁也不曾进去。一是进城后领导上重申了纪律;二是我们身无分文;再说也没有逛商店的习惯。”(29)红军人城后,向商界筹借了军晌,购置了布疋,用缴获敌人的被服厂,赶制了四千套军衣。“几天后,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灰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带,两双‘陈嘉庚胶皮鞋’。”“听说就是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也是头一次得到这么齐全的装备。队伍拉出来,一色的新衣帽新鞋子,整齐划一,精神抖擞,人都好像变了模样,威武得很。”(30)

进入长汀后,朱德会见了当地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采纳傅的建议,在红军中普遍接种牛痘,防止天花蔓延,后来,傅连璋率领医院中许多医务人员参加了红军,组成红军中的医疗队。

红四军还在长汀附近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没收地主粮食物资,分发给当地贫苦民众。

为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前委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团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原第二十八团大部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原军部直属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加上原二十八团的一部分合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原第三十一团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相当于营。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相当于连。每个纵队有枪五百支,一千二百余人。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大队以上都设立党代表。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分散和集中都方便。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着重研究了江西、福建、浙江等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提出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来发动群众,以致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以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31)在长汀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后来经过选举正式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成为闽西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前委还对红四军下一步行动作了具体安排,计划用十天时间,继续在长汀一带工作;到四月初返回江西瑞金、于都活动;在赣南活动一个时期后,或回闽西,或留赣南,或到吉安方向接近蒋桂军阀的战区开辟群众工作,到时候根据军阀混战的局势发展而定。会议认为,不管将来的计划如何,“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32)正是在这种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才会在以后开创出包括赣西南和闽西在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月间，朱德和康克清在长汀结婚。康克清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三月，朱德和我在福建省长汀县结婚”。“我们究竟是哪一天结婚，我此刻已经忘记了。我们并没有举行婚礼。自从结婚之后，我差不多始终跟他在一起，只有在一九三一年占领了吉安之后，两人曾分别了一年。”(33)

这时，蒋桂战争爆发了。蒋介石调集在江西的部队参加对湖南的争夺，赣南的驻军大部调离，兵力空虚。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长汀，返回赣南。他们在长汀前后共停留十七天。

一直随军转战的张际春评论道：“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进军，到长汀战斗为止，转战赣粤闽三省边境，走路几千里，大小仗打了数十仗，以大柏地战斗和长汀城战斗为标志，它的胜利为尔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展开创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胜利，树立了先声。”(34)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长汀后，翻过武夷山，回师瑞金。四月二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赶到瑞金与红四军会合。

在柏露会议上，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在红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自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每团平均两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十、四十倍之比。重层围攻三昼夜，我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35)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滕代远不得不率部下山，突破敌人三层重围，向赣南转移，他们重新打出红五军的旗号，先后奔袭于都、安远两座县城，都取得成功。在安远住了十天左右，准备打回井冈山去。一天，“在县署反动文件中，发现有红四军在汀州消灭郭凤鸣旅，郭本人被击毙的消息。”(36)“得到红四军的确实情况后，即改变了打回井冈山的原定计划，经会昌进占瑞金县城。”(37)这时，他们已恢复到有六百多人，四百支枪。

红四军到瑞金同红五军会合后，因为蒋桂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瑞金周围没有敌情，部队得到一段从容休整的时间。四月三日，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在二月七日发出的《给润芝、王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中央二月来信》。这封信受到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的影响，加上二月初对红四军的情况不很了解，因而对红军的行动策略提出了错误的主张。布哈林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共“六大”上所作的报告“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38)《中央二月来信》要求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各村中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政策”，(39)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保存武装力量，避免被敌人消灭。来信中还提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40)

前委当即开会讨论中央来信，毛泽东、朱德等从实际出发，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消极的，所提意见是不适当的。四月五日，毛泽东为前委给中央写了复信，表明不同意见。复信就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

武装割据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作出了概括。并在分析南方数省的形势后，提出要创造革命根据地，造成巩固的赤色区域，夺取江西全省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直至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四、五月间，利用国民党军队在赣南兵力空虚的机会，红军比较放手地把部队散开，做群众工作，扩大根据地，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朱德回忆道：“慢慢发展到江西的宁都、兴国、瑞金、东固，都组织了，到处打开了些土围子，打上豪，分田地。几个月中间转了很宽，沿着兴国、瑞金、东固，工作都做起来了。”“打宁都也打开了。这时自己编成三个团，都还打得。各个团都可以说很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土豪归公，进出宣传都做得很好。譬如我们以前在大柏地打仗，吃了老百姓的东西，这时就去还钱了。还的方法是自动由老百姓报就给钱。开始以为假的，后来地痞流氓有些冒领的也发了，一下发了三千多块钱到老百姓中间去。”这一次政治影响非常之大，一方面做到了争取广大群众，一方面做到了争取军队守纪律。“搞了几个月，那时正是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作军阀混战的时候。等这混战一过，敌人又来了，不过我们的基础也稳固了。”(41)在兴国、宁都等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这中间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四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宁都召开了一次有赣南特委和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根据彭德怀“提出率部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42)的请求，会议决定红五军回师井冈山。五月初，红五军回到井冈山。

五月中旬，形势又发生突变。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以桂系失败退回广西而告终，但粤军徐景唐部仍宣布反蒋，同控制广东的陈济棠部发生冲突，广东战争又起。盘踞在闽西、闽南的军阀也卷入这场混战。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闽西军阀陈国辉率第一混成旅主力，离开龙岩，随驻在漳州的新编第一师张贞部，在五月中旬开入广东，同徐景唐作战。闽南、闽西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先后调走，驻地空虚。而在赣南方面，却因蒋桂战争的结束，原驻赣敌军纷纷回防。为了集中兵力应付这种变动了的局势，红四军从分兵地区返回瑞金集结。

这时，毛泽东、朱德、陈毅又接到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专人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书面报告，说明闽西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群众革命斗争高涨，急盼红军急速重返闽西。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了红四军的行动计划，决定趁有利时机，再次入闽，开创闽西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朱德写了两封信，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去闽西。一封信送交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诉他红四军正向闽西进军，要求待委准备策应；另一封信送交上杭地方武装领导人傅柏翠等，要他们在庙前等候，商讨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五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出发，再次大举入闽，向福建的灌田前进。国民党当局发觉红军的动向后，赣军李文彬旅立即紧迫不舍，闽军卢新铭团也在汀江东岸设防拦截，企图迫使红军背水而战，以期全歼。五月二十日清晨，红四军抵达汀江的水口，在当地群众援助下，汇集九只渡船，全部渡过汀江。当敌军赶到水口时，红军已安全进入福建连城境内。

红四军二度入闽和第一次大不相同。过去，闽西民众对红军是陌生的，有些人还因不了解而心存疑惧，但从红军消灭了长期在闽西为非作歹的郭凤鸣部以后，在这一带引起很大震动，闽西的穷苦人民就把红军称为“天兵神

将”、“救命菩萨”。因此，红四军所到之处，老百姓纷纷烧茶水，送干粮（红薯），青年人参军的也不少。（43）

刚刚渡过汀江的红四军，在第二天便离开汀江东岸进到庙前。连南地方的党组织根据闽西特委的指示，集中各乡的农民到庙前欢迎朱毛红军过境。

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庙前孔清祠会见上杭北四区地方武装负责人傅柏翠等，听取他们的汇报，在弄清情况后决定暂时不去攻打长汀，而是出敌不意地直取龙岩，再打水定或漳州，甩开李文彬，消灭陈国辉，相机打击张贞，来扩大红军在闽西的影响。为了争取时间，红四军不在庙前久留，立刻向龙岩进发。要求傅柏翠等做好后方侦察，阻击追敌，掩护主力进攻龙岩。

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接到宋裕和送来的毛泽东、朱德的信后，立刻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通知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各县县委发动农民武装暴动，配合红四军在闽西的军事行动。

红四军离开庙前后，经古田向龙岩前进，在五月二十二日黄昏时分到达龙岩城西三十里的小池圩。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小池圩的赞生店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特委派来的代表介绍龙岩城内陈国辉部的情况。当时，陈国辉的主力正在广东大埔参加对徐景唐的战争，在闽西只留下几个补充营。龙岩城里，只有旅部和特务连。机枪连防守着，兵力不足五百人。前委在会上定下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红四军第一、三纵队沿通往龙岩的公路，从正面奔袭龙岩，第二纵队从左翼占领龙岩城北门外的北山，对龙岩城实行包围夹击。

龙岩，在闽西有着重要地位，是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盘踞在龙岩、漳州一带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原是闽南一股打家劫舍、残害百姓的土匪部队，北伐军人闽时，陈国辉率部投靠何应钦。龙岩人民在陈国辉的黑暗统治下，陷入苦难的深渊。有首民歌这样唱道：“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筒，害得百姓尽吃亏。”消灭陈国辉，是龙岩人民的宿愿。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七时许，红四军第一、三纵队占领龙岩城郊的龙门圩，打垮了守敌的第一补充营，紧迫残敌，突破西门，首先攻入龙岩城；第二纵队按计划，占据北门外的制高点后，居高临下，向城内发起猛烈攻击。整个战斗很快结束，“九时占领龙岩城”。（44）这次战斗取得重大胜利，俘虏陈国辉部营长一人，连、排长九人，士兵三百二十四人，击毙官兵九十余人，缴获机关枪两挺、驳壳枪二十三支、步枪五百四十九支，子弹三十五担，迫击炮弹九担。（45）

红四军没有在龙岩停留，当天下午撤离龙岩，继续奔袭张贞部的总兵站永定城。朱德在途中向中央写信简要报告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和首次攻占龙岩的情况说：“我们以消灭闽西反动势力发动闽西工作，及参加闽粤赣三省农村土地革命之目的，决于今晚星夜出发袭击永定（永定为张贞总兵部所在）。”（46）当晚，朱德率部到达永定的坎市，住在裕源店。

五月二十五日，红四军在张鼎丞领导的地方武装配合下，占领了永定城。当天下午，在赖家祠的后楼大厅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朱德、陈毅、刘安恭、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参加了会议。二十六日，在永定城关南门坝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先后讲话。会上宣布成立闽西第二个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会后，军民们响应联席会议的号召，拆毁了永定城墙。

当红四军主力转向永定后，从龙岩败退到漳平、永福的陈国辉残部，在五月二十五日返回龙岩。红四军前委判断：张贞和陈国辉的主力仍在广东，一时难以回援；龙岩城内的陈部，是曾遭红军痛击的残敌，缺乏战斗力；而龙岩、永定的农村土地革命刚刚开始，需要得到红军的有力支援。所以，决定以第三纵队为主，二次攻打龙岩，调动陈国辉主力回援，待机加以消灭；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仍分别留在永定坎市和龙岩西郊龙门一带，继续发动群众。

红四军第三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率领下，同龙岩的地方游击队、暴动队配合，在六月三日拂晓迅速攻入龙岩城内。守军只有一个补充营和特务连，被痛击后逃到漳平的永福。五日，红军和地方武装在龙岩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邓子恢任主席。

正在广东参加军阀战争的陈国辉，得知龙岩再次被红军占领，大为震惊，日夜兼程地由粤回闽。红四军得悉后，决定暂时撤离龙岩，转攻驻守上杭白砂的卢新铭部的钟铭清团，引诱陈国辉主力回到龙岩，再待机加以歼灭。朱德还派出小股红军，沿途阻击陈国辉的部队，边打边退。陈国辉误以为红军不敢同他交锋，必定要退回赣南。于是，在六月六日上午回到龙岩，(47)举行“祝捷大会”，放假三天。

这时，撤出龙岩的红四军正集中主力，准备夺取白砂。白砂在上杭城东北，是上杭通往龙岩的咽喉要冲，也是一个大的集镇。当郭凤鸣部主力被红四军在长岭寨歼灭后，团长卢新铭收集郭凤鸣的残部，自任旅长，盘踞上杭。在红四军攻打龙岩城时，卢新铭派出钟铭清团（实际兵力只有一个营）驻守白砂，作为上杭的防守前哨。

为了歼灭白砂的钟铭清团，毛泽东、朱德于六月五日在龙岩、上杭交界的大池，召开红军干部会议，具体研究作战方案。同时，迅速集结部队，严密封锁消息，为攻占白砂进行准备。

七日，红四军在闽西红军的配合下，分三路向白砂进击。这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一，恰逢白砂举行抬“定光古佛”的庙会，钟铭清对红军的行动毫无察觉。当红军发起进攻后，钟部仓促应战，纷纷溃退。经过一小时的战斗，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火炮二门。钟铭清只带了二十名随从逃回上杭。卢新铭龟缩在上杭城里，也不敢出来活动。

白砂战斗结束后，红四军故意制造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六月十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沿着通往赣南的大道，开往连城的新泉。他们在新泉休整了一个星期，一面进行整训；一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造成连城南部广大地区的武装割据局面。

陈国辉得知红军开到新泉，更深信红军将撤回赣南。所以，他回到龙岩后毫无戒备。国民党的报纸还吹嘘说：“陈国辉班师进剿”取得“胜利”，红军“败退”江西。这时，红四军前委判断消灭陈国辉的时机已到，在六月十八日悄悄进抵龙岩附近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周密地部署第三次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朱德回忆道：“群众都组织得很好，城外十里地就有了游击队。我们到离城三十里左右的大池、小池集中，敌人还不晓得就去打。夜晚十一点钟出发，三十里走完将天亮了。敌人一旅三千多人，我们有六千多人，统统用上去。我带两个团在左面，另一个团在右面，切断通漳州的道路，正面按上一个新编成的团。将天光亮，恰恰完成了对城的包围，敌人出来下

操，就打下来。”(48)

三打龙岩的战斗在十九日拂晓打响，朱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攻击从北门开始，伍中豪率部突袭松涛山，抢占了陈国辉设在制高点上的机枪阵地。北门打响后，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在萧克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龙岩城南的屏障——莲花山锣鼓鼓阵地，消灭了一营敌军，为第一、四纵队直取南门扫清了道路。

这时，西门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守军凭借着街道房屋负隅顽抗。“陈（国辉）部队与郭（凤鸣）匪不同，武器弹药充足，多系北方人，均在当地安家落户，以匪为业，多是兵痞子，虽然只一个旅的兵力，但战斗力比郭凤鸣强。”“这场巷战是极其复杂、极其艰苦的。使用兵力多，则施展不开；使用兵力少，我军既没有刺刀、手榴弹，和有刺刀、手榴弹的敌人搏斗，确实吃亏。”“这样激战了两个多钟头，虽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战斗进展不算大，而且我军也有不少伤亡。”(49)

在这紧要时刻，朱德看清在巷战中逐房逐院地进行争夺，对红军非常不利，立刻传下命令：采取“掏墙挖洞打老鼠”的战术。对敌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向陈部喊话。退缩在几个大院子里的陈部终于竖起白旗，向红军投降。

红四军主力第一纵队在第四纵队的配合下，这时越过河上的浮桥，突入龙岩南门。陈国辉看到大势已去，带着少数亲信化装逃出。红四军前后三次攻占龙岩，合计消灭陈国辉部主力两千余人，“共缴步枪九百余支、迫击炮四门、水机关枪六架、手机关四架，陈国辉精锐部队损失过半。”(50)陈国辉经过这次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六月二十一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再次成立，由邓于恢任主席。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次入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抓住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忽东忽西，灵活作战，三次攻占龙岩城，连克永定、白砂、新泉，土地革命的巨大浪潮席卷龙岩、永定、上杭、连城五县，打开了闽西革命的新局面。陈毅为此写下了《反攻下汀州龙岩》的诗：“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51)

打下龙岩后，毛泽东等在蛟洋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联名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宣布：“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改变了过去井冈山《土地法》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的规定。“岩、永、杭三县打成一片”，“这些地方都是赤色区域。”(52)广大贫苦农民分得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十四、古田会议前后

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后，得到了一段休整时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在会上，由陈毅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和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七大”是在粤闽赣三省新的“会剿”将要到来的情况下召开的，准备得很仓促，会议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在这次会上，红四军内部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尖锐地暴露出来，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五月初，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等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一九二七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不久就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脱离了原有根据地，每天行军打仗，军情紧急，前委和军委显得重叠，所以一度宣布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五月间，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

临时军委撤销了，但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正如毛泽东在白砂会议后几天所说：“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即四军党部）”，“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反对建立军委的则认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

因此，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坚持要设军委的还提出，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集中”了，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并说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而主张不设军委的说，设立军委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必定是分权主义”，“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

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

这场争论在红四军“七大”前已日见发展。当年曾参加红四军“七大”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记得一九二九年六月，部队在新泉休整时，还专门召开过两次红四军前委会，朱、毛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作了答辩。”

林彪在这场争论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当时，林彪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白砂会议开会前五小时（一说是三小时）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平时，林彪也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的意见分歧。

刘安恭、林彪当时都是纵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刘安恭担任二纵队的司令后不久，在十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在这场争论中，他们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三小时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这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

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也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

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江华，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评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六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

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1)

红四军“七大”改选前委时，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派他带着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去上杭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给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红四军二次入闽、三打龙岩的节节胜利，震动了远近。国民党当局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三天，蒋介石发出“会剿”命令，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集中于瑞金、汀州，闽军张贞师集中于连城、龙岩，粤军蒋光鼐师集中于上杭、永定，限六月三十日前都要到达目的地。六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又下令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三省“会剿”“均归其指挥，受其命令，毋稍延违。”(12)不久，据三省“剿共”指挥部透露：三省参战兵力为“闽省七团，赣省四团，粤省三团，共两万余人。”(13)以赣省为主力，闽粤为堵截。

七月八日，红四军前委决定以游击战争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将全军四个纵队分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赤色割据区域，粉碎这次“会剿”。前委认为：“此时东江、赣南皆不能去，只有留在闽西，敌来当相抗对付，现在分兵在永定、龙岩、杭、汀、连之一部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赤色区域之势力割据，敌来当打破一面找出路。”(14)这就是红四军闽西分兵的计划。毛泽东去蛟洋指导闽西党的“一大”后，朱德、陈毅率领前委、司令部及直属队到达连城的新泉，各纵队按计划发动群众。

七月中旬以后，参与三省“会剿”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向闽西推进。赣军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的四个团占领了长汀；闽军张贞师分别向华安、龙岩行进，企图占据龙岩；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的第三师以永定、上杭为进攻目标，向粤闽边境开进。

七月二十九日，前委在新泉得到有关敌情报告后，为了商讨应急计划，朱德、陈毅立刻赶到上杭蛟洋，同正在那里的毛泽东等一起举行前委会。经过讨论，决定改变原来分兵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入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15)前委并决定第一、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集中，向闽中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红四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三省“会剿”。一九三七年，朱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这段历史时说：“红军这时也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另一支展开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16)

前委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四月五日来信中所要求“派一得力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精神，陈毅经厦门转道香港赴上海去向中央汇报。陈毅走后，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前委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的计划，在实施中有一些变动。第二、三纵队，在八月二日按时赶到白砂集中，由朱德率领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宁洋县城挺进，计划出击闽中，在外线打击敌人。但林彪率领的第一纵队，在上杭一带活动却因汀江水涨，过江迟缓，没有能按时同第二、三纵队会合，仍留在闽

西，会同第四纵队同国民党军队周旋。这样，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从外线打破“会剿”的兵力就比原计划大力减少。

朱德判断：“在前来进攻的赣、闽、粤三路敌军中，“蔡廷锴、金汉鼎是比较很难打垮的，张贞是比较有把握打的，结果就准备着打他。”(17)八月四日，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二、三纵队，攻占宁洋县城，在城内住了三天，做了三件事：一、刷制并张贴了标语和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的宗旨和工农革命的道理。朱德在大会上演说，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暴动闹革命。二、打击当地三个土豪，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分给贫苦群众。三、烧毁国民党宁洋县的衙门，处决了从连城押来的两个土豪劣绅。

八月七日，朱德率第二、三纵队离开宁洋县城，沿双溪南下。在过罗溪渡口时，朱德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选择有利地点，指挥部队泅水强渡，一举击溃守敌，乘胜追击，于第二天进入漳平，消灭了当地民团和张贞的一个营。

朱德在漳平召开了群众大会，他在会上号召当地的工农群众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会后，又把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他还召集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代表，分别座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组织了漳平县工会、漳平县农民协会和城防第一赤卫队，并武装了城区赤卫队。十五日，红四军前委开会布置跳出外线，出击闽中。十六日至十九日，分两批离开漳平。

闽中，是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的地盘。他有十几个团，上万的人马，还有个可造枪弹的兵工厂。他依仗着人多枪多，霸占着闽中、闽北和闽西二十多个县，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分庭抗礼。(18)当红四军人闽时，他的部队据守在各个县城里，以逸待劳。前委发动党员进行讨论，广泛听取群众对作战的意见。“朱德军长冷静地分析了形势，集中大家的意见，决定暂时不与卢兴邦匪部交战。好在红军与卢部没有直接打过仗，还可以‘礼尚往来’。在大田县城附近，朱军长派出信使到卢兴邦司令部，称‘借道过境’，卢兴邦这个‘山大王’毕竟老奸巨猾，怕我们‘暗渡陈仓’，借口‘本地地僻土瘠’，没有答应。”(19)八月二十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围攻大田县城不克，又转入永春、福鼎一带。

这时，闽中、闽西的形势对红军都不利，加上盛暑高温，病员急增，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二十天内接连攻占了宁洋、漳平两县后，国民党当局立即从德化、安溪、华安等地调兵向红军进攻。闽西特委这时也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调四军回闽西，在漳平一带工作。”

八月二十八日，红四军突然回师到漳平境内的杨美村驻宿。第二天。在当地农民带领下，从溪南后面的打鼓岭发动袭击，一举占领溪南圩，全歼张贞部的张汝劭旅一个团，击毙团副一人，俘敌二百余人，缴获大批枪枝弹药。红军乘胜前进，在八月三十日第二次攻占漳平城，又消灭张汝劭一个团，俘敌一百多人，缴获一部分军用物资。当时，《时报》有一段报导：“二十九日朱德突率部二千余猛袭漳平，宁洋也同时受袭。漳平守军以朱已远去，无戒备，且众寡不敌，应战一日，至三十日遂不支，退至永福。朱部复陷漳平。”(20)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漳平一带活动二十八天，足迹遍及十三个乡镇，近百个村庄。红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一律住宿在祠堂、庙宇、桥亭、市场等公共场所，买卖公平，一律付现款。有时用了群众的东西，群众

不在家，就留下信和钱。有的红军战士用了杨美一家粮店的米，老板不在家，就在墙上写下：“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有些红军战士喝了茶水，也留下铜板和银毫子。当地人民群众盛赞红军战士纪律严明。

张贞的“进剿”部队本来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漳平，一路再陷龙岩。当朱德率部回师闽西，再克漳平后，龙岩的守军弃城而逃。九月六日，红四军重占龙岩。这样，三省“会剿”中力量最薄弱的闽军张贞部已被击破。粤、赣两军无心恋战，也各自撤回本省。八月底，蒋介石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便以失败而结束了。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时间只有一个月，取得了重大胜利。

回师闽西后，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同第一、四纵队会合，准备攻打上杭城。

上杭，位于汀江中游，汀江绕城而过，城垣三面环水，有砖石建造的三丈多高的坚固城墙，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上杭是闽西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铁打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

那时盘踞在上杭城里的是卢新铭部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是上一年长岭寨战斗中被红四军打败后逃到上杭的。

九月十八日，朱德率红四军和地方武装一万余人秘密向上杭运动前进，前委会作了周密布置，同城内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要求各地赤卫队配合攻城。第二天，朱德带着有关人员登上山头，仔细察看地形，制定具体的攻城方案。红军主力部队，趁夜间能见度低，由当地赤卫队带路，从汀江上游水浅处渡过汀江。第一纵队攻西门，第二、三纵队主攻北门，第四纵队在赤卫队配合下攻东门，另一部分赤卫队佯攻南门。

战斗打响时，卢新铭部还蒙在鼓里。当赤卫队乘着无数竹筏，划过汀江，用机关枪和土枪进行轰击，同时在洋铁筒里燃放鞭炮。卢部分不清真假，只得扼守城池，胡乱放枪。当第一纵队的炮火把守军的主力引到西面后，第二、三纵队立刻在北门发起猛攻。朱德在北门外一个小高地上指挥作战。红军战士架起云梯，翻入城内。当卢新铭发觉中计，调兵增援北门时，北门已被突破，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蜂拥入城。朱德也随军进入上杭。这次战斗，除卢新铭带着十几个贴身警卫从南门冲出重围逃走外，城内守军全部被红军俘获。二十日，朱德在县衙门前的广场上主持召开了上杭军民祝捷大会。

红四军打下上杭，不仅粉碎了三省“会剿”，而且又为红军争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红四军人数发展到七千人，每个纵队由两个支队发展为三个支队。

九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陈毅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尚未回来，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蚊洋养病），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前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回到前委。

正在这时，广东的政治局势又发生重大的动荡。九月十六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反蒋活动，率部南下，试图配合广西俞作柏部进攻广东。十天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同拥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开战。有着长期革命历史的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村游击战争重新活跃起来。中共中央鉴于时局的变化，在九月二十八日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他们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南下，同时也估计到局势发展有几种可能性，允许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地采取行动：“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境游击，以发动群众。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21)但福建省委在十月六日给闽西特委转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却只提出全军开往东江的要求：“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22)“开往东江并不是放弃闽西，反是，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来，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23)“四军开往东江的路线是应当加紧向梅县、大埔、丰顺、兴宁，五华前进，与海陆丰联络起来。”(24)并主张“在这次斗争中要尽量扩大红四军本身的力量，充实本身的基础，同时要帮助东江群众建立并扩大群众的武装组织。”(25)省委还派谢汉秋前去巡视工作。

朱德对进军广东原来是一直持慎重态度的。这年四月十五日，东江特委曾给红四军写信，提出东江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计划发动东江暴动，但又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要求红四军前往帮助。朱德在五月三日给他们写了回信，说：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这是各地皆同的现象。“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去发动群众斗争”，不要“轻易去攻打城市”和“忙着公开干起来”。他又说：江西反动势力在全国是比较弱的，党组织有普遍发展的趋势，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因此，“红四军在赣南工作紧急，不能分兵远征，因为分了兵，力量就不好了，每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力量估计得太大。”(26)但这次福建省委说是中央要求红四军全部开到东江去，而且两广军阀混战的爆发看起来似乎确是一个机会。这样，他们虽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但还是遵照执行了。

十月十三日，福建省委派来巡视的谢汉秋抵达上杭。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粤边，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进攻蕉岭，占领蕉岭后，仍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推进，与闽西确取联络，留一个纵队（第四纵队）红军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前委将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央。并提出由于陈毅去中央未返回四军，而毛泽东又久病未愈，“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红四军领导力量单薄，希望中央派“粤省委、东委重要同志来指示我们的工作。”(27)

从十月十五日开始，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依照前委的命令，分别向闽粤边境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

国民党在广东的军事力量，比闽西和赣南要强大得多。红四军刚进入粤东，有着较强战斗力的粤军第七旅陈维远部就潮汕开往韩江上游堵截。红

军在广东的第一仗就遭受严重的挫折。十月二十日，前委由上杭抵武平象洞后，获悉刘安恭指挥的第二纵队在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市时“过于轻敌（前委没有指示他们去做，这一行动并且影响到整个工作计划）”，“是役牺牲了司令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长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伤数十人，为四军人闽以来未有之损失。”（28）在失利的情况下，红四军改变原有计划，转攻梅县松口。这时，粤军陈维远部一个团已抢先占领了松口，红军不得不取道蕉岭，转平顺、五华，以便引诱粤军到赤色区域内加以消灭。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回到前委机关。陈毅带来了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周恩来对红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会议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地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在中央“九月来信”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都作了重要的指示。

二十二日晚，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从松源出发，在次日抵达蕉岭，经侦察得知梅县城内没有重兵把守，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卫队。二十五日，红四军向梅县进发，守军弃城而逃。红军人城后，立即释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并召开群众大会。前委与县委召开会议，准备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但第二天粤军三个团突然向梅县猛烈反扑，红军猝不及防，被迫撤至丰顺边界。这时，前委才得知两广战争已经结束，粤军已有可能腾出更多力量来对付入粤的红军。东江地区原来留有蒋光鼐部两旅，陈济棠又将蔡廷锴部从梧州调回东江，力量对比红四军日渐不利。

但前委那时又接到一个错误的情报说，粤军占领梅县后，只留一个教导团驻守县城，于是又决定在三十一日第二次攻打梅县。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事实上粤军的守城兵力大大超过一个团。红军“本想一鼓而下，卒因包围大紧，敌遂凭城死守”，（29）加上第一纵队未能及时完成迂回任务，使第三纵队陷入孤军作战。战斗持续了七个小时，仍不能攻破梅县县城。

冒进东江，攻打梅县，给红四军造成重大损失。在回师闽西的途中，原来在上杭收编的俘虏兵大部分逃走了。红四军的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减员约一千多人，第一、二、三纵队只好实行缩编，这是继“八月失败”后，红四军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损失。这次失败，首先是由于对广东局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以为两广战争一起，粤军主力西调，东江空虚，红军正可趁机进入东江。没想到两广战争那样快结束，粤军能以重兵对付红军。朱德后来说：“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人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

(30)他还说：“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31)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孤军深入，缺乏群众配合，并没有弄清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匆匆攻人，匆匆退出，又匆匆反攻，结果受到严重损失。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红四军大队撤离东江地区，经赣南的寻乌回师闽西。十八日，到达上杭官庄。前委在官庄召开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再占长汀后，前委写信给毛泽东并告诉他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口头指示的精神，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的健康虽然没有完全恢复，还是立刻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蚊洋到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32)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写信向中央报告他已回前委工作。

当天，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和东江特委代表也赶来参加。这次扩大会议除同意官庄会议的决议外，更深一层地检查了红军的一般情况，决定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计划，认为如不加紧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会议认为：“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定能“打破会剿局面”，求得“出路”。(33)扩大会议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决定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开好这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长汀会议后，立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还在长汀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十二月三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县新泉。他们在新泉的望云草堂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政治、军事整训。

毛泽东、陈毅为了解部队真实情况，冒着严寒深入到连队座谈，同到会同志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内情况的调查，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各级党代表的会议。他还带领一些干部到周围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力起草红四军“九大”的决议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朱德负责军事整训，他克服各种困难，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亲自上课，言传身教，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他还主持制订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为克服红四军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和提高战斗力，也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创造了条件。

在新泉整训期间，前委得知国民党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仍以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十二月中旬，金汉鼎部再占长汀，向连城新泉一带逼近。前委为了集中力量开好“九大”，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在新泉一带警戒从江西来犯的敌军，其余部队向苏区中心后退一步，以便安全地举行“九大”。

红四军的领导机关这时移驻上杭的古田镇。古田是上杭县北部的一个大集镇，也是上杭、龙岩、连城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三条大道与外界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好，已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前委选择在这里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比较理想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主

持下召开。会议地点在古田镇的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宗祠）。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和士兵代表。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前委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中央关于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决定，还作了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的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会议的各个报告，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最后，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包括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错误倾向问题决议案等。

这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棋、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34)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有毛泽东对红四军建军经验作出的深刻总结和红四军“七大”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会前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人们常说的“古田会议决议”，作为一个纲领性文件，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35)

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指导下，红四军内部消除了意见分歧，统一了思想。会议一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这支军队，踏上新的征途。

当古田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已步步进逼。参加这次“三省会剿”的军队共十四个团，在金汉鼎统一指挥下，分三路向闽西革命根据地进犯。形势非常严峻。朱德、毛泽东决定利用三省军队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打破这次“三省会剿”。

这时，红四军面对一个严重问题：给养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敌人“过年后，即开始分道向赤色区域进攻，红军已定了计划，于最近分别来破敌人，但有一当前人问题，即是全军给养，业已告罄，当此敌情吃紧之际，若不能等数日内筹得一笔款子，……则在闽西久顿，将生困难。”(36)

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由古田北进连城，准备在这里筹款。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暂留古田，并在小他附近诱敌，掩护主力北进。

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到距古田五十里的庙前时，获悉国民党军队已步步进逼：在长汀和上杭的赣军金汉鼎部准备进攻庙前、新泉；在龙岩的闽军刘和鼎部已向西进至小池和大池附近，准备进攻古田；粤军陈维远部已北进至永定、武平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朱德从容不迫地仍按原定计划率部在一月六日赶到连城，立即着手筹款。两天后，赣军从新泉跟踪追到连城县境，切断了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同暂留古田的毛泽东部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和红四军其他领导干部对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认为：如果红四军在这时离开闽西转入江西，可以迫使这次“会剿”主力的赣军金汉鼎部回援江西。这样，闽西受到的敌军压力便会大大减轻，闽西革命根据地也可以得到巩固和扩大，对闽西的工作是有利的。而红四军进入江西后，又可以打通闽西、粤北、赣南三角地区的联系，扩大革命根据地。根据这个分析，朱德在同毛泽东联系后，果断地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移师江

西，威胁金汉鼎部后方，调动赣军回援赣南。一月九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连城出发，经清流、宁化向江西急进。次日到达宁化。从缴获的金汉鼎命令中得知，国民党军队这次“三省会剿”计划原来准备分七路围攻新泉，并约定在一月四日同时出动。由于红四军已离开新泉，结果扑了个空。

由于军情紧迫，红四军主力在宁化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向西翻越武夷山，冒着严寒，日夜兼程，进入江西石城县境。在石城，朱德宣传红四军在闽西开辟的大好革命局面，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一月十六日，朱德率部攻占石城以北的广昌县城。攻占广昌后，已有可能继续向北推进，再克南丰、南城、临川（抚州），逼近南昌。但由于红四军的目标是尽快打通闽、赣、粤三省的联系，并同中共赣西特委、江西红军第二和第四团会合，朱德决定不北上进攻南丰、南城、抚州，而是向西开赴宁都的东韶地区，准备在这里小憩两日后，再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这时，毛泽东也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离开古田北进，经连城、清流、宁化、归化（今明溪）县境，西越武夷山到达广昌，在一月二十四日来到东韶地区，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会合。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离开闽西进入江西后，参加“三省会剿”的国民党军队顿时失去了目标。闽军发生内江，纷纷撤离闽西；赣军因后方受到威胁，把主力撤回赣南；粤军见闽军和赣军都已撤走，也随着撤离闽西。闽西的地方红军乘机反攻，收复龙岩、永定等县城。国民党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就一无所获地被粉碎了。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四个纵队在东韶地区会合后，立刻决定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预定分兵十五天。这是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后的第一次分兵，各纵队都按照古田会议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开展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绩。第一和第三纵队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先后攻克乐安、永丰。第四纵队发起宁都战役，歼敌三百多人，占领宁都县城，并帮助中共宁都县委分配土地，组织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发展苏区。

这时，蒋介石同控制着晋、察、冀、绥和平、津六省市的阎锡山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原大战已一触即发，因而将第七师由江西调往皖北，在江西境内只留下第十二师、第八师两个旅和第五十师一个旅，兵力大大减弱。而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却发展壮大。一九三〇年一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等地方武装，在东固地区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同年七月改称第三军），以黄公略为军长、刘士奇（不久改为陈毅）为政治委员，在吉安到泰和一线的赣江两岸活动。红五军主力也由湘鄂赣地区开到赣西南的吉安、泰和一带活动。

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促进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至九日，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和红六军军委，在吉安的陂头村举行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朱德留守藤田主持军事工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联席会议分析了形势，提出三项任务：“1. 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 深入土地革命；3. 扩大工农武装。”（37）为了加强党的集中领导，联席会议决定扩大原由中央任命的指导红四军及它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的任务，统一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赣南、湘鄂赣、闽西、东江地区的工作。同时，调整了前委的组织，由十六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

刘士奇、潘星源五人为常委。红四军成立军委。为了培养军事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分校，由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会后，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全面展开分田运动。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满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次联席会议时说：“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38)

根据“二七会议”的精神，在军事行动方面，前委计划集中兵力夺取吉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二七会议”刚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红四军由藤田地区向吉安推进，同黄公略率领的红六军会合，准备先占吉水，后取吉安。

蒋介石得知朱毛红军逼近吉安，急忙命令成光耀旅死守吉安，金汉鼎部伺机占领宁都，湘军朱耀华旅开至乐安，戴岳旅在南丰、乐安之间集结。同时，急调湖北的唐云山部独立十五旅匆匆赶到江西，在二月二十日到达吉水县城至乌江镇一线。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形成包围圈，形势骤见严重。

朱德、毛泽东分析了这一态势后，认为红军不宜继续向北推进。吉水地处乌江北岸，不易涉渡。这一带又是当地地主掌握的会道门武装红枪会活跃的地区，红军不便在此作战。于是决定放弃原来攻占吉水的计划，改为诱敌深入、相机歼敌，将全军撤至富田休养待机。唐云山部发现红军向富田撤退，不知是诱兵之计，当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还在原地未动时，便孤军深入，分三路向富田冒进。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配合下，开始投入战斗。他们以一部兵力从侧后迂回，牵制右路和中路敌军，集中兵力向进至水南的左路敌军发起猛烈攻击。这次战役歼灭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大部，旅长唐云山被击伤，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武器很多。

这是古田会议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后来，朱德在谈到这次战役时说，“蒋介石派唐云山一个旅二十四个连，还附有炮兵来攻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先诱他到了吉安的富田，然后拿一部分兵力；由左面绕包直夏，正面一打就缴了枪了。正在需要枪的时候，又阔起来了，人也得到了补充，迫击炮什么都有了。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会合，一方面又有人送来这么多财富。”(39)这一胜利，有力地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久，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打垮唐云山部以后，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水南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联席会议决定，红军经广昌入福建建宁，取得给养补充后，再看事态变化来决定以后的行动。根据这一决定，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三月十日到达东固，准备向广昌开进。这时，获悉兴国和雩都（今于都）一带没有敌军。雩都北乡群众正准备攻打上围子里的靖卫团。朱德、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不去广昌，而乘兴国、雩都一带空虚之机移师兴国。

到兴国后，又得悉原驻赣州的金汉鼎部已全部调往福建去打地方军阀卢兴邦，赣州空虚。朱德、毛泽东于是决定留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兴国发动群众，红四军准备“以强攻之决心，施行奇袭之手段”，乘虚攻打赣州。但进攻赣州的战斗开始后，才发现得到的情报并不准确。本来，“屡据各方来报，有谓城中无敌，仅靖卫团百人，有谓城中敌人仅一营者，致使指挥官之判断敌

方兵力误为一营，实则城内之敌为七十团全部（三营，每营步三连、机枪一连）”。(40)守军数千人，凭险闭门拒守。

三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从东门、南门、西门三面发起攻击。由于守军顽强抵御，加上城周围有二十余里大河环绕，无法靠近城墙，红军又缺乏攻城的重武器，久攻不克，只得撤围。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朱德和前委在赣州城郊的楼梯岭，发布第三号《前委通告》。《通告》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指出：“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三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因对阎作战虽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又指出：“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部（卢兴邦部——作者注）进占福州。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的好机会。”(41)

鉴于蒋介石正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一时无力顾及南方，金汉鼎部主力又已入闽。《前委通告》在分析形势后，提出应该抓紧这个时机，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对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的行动作了新的部署：以三个月为期，分散在赣南、赣西、闽西、东江、湘鄂赣等广阔地域内，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赣、粤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前委通告》中指出在此时实行分兵的意义：“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中，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犯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42)

朱德、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三月十九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经验教训的训令，从这次没有能攻下赣州城的原因中，总结出六条经验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准确；二是对地形未预先观察；三是事先未充分准备；四是上下决心不一致；五是战场报告不确实；六是不按时实行总攻；七是部分指挥官指挥不适当。训令还要求各部队都要召开军官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报告司令部。(43)

为了实现第三号《前委通告》的分兵计划，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在三月二十一日到达南康县的唐江镇等地，第三纵队回宁都发动群众并开展游击战争。

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唐江镇以后，立即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部署下一步行动。并发布《关于整顿军风纪律的训令》，要求“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并强调：“凡违犯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予查究。”(44)

这时，赣军金汉鼎部第六十八团、第六十九团开来进攻红四军。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经过激战后，在三月二十三日攻克南康，二十五日攻克大庾。在大庾，朱德、毛泽东先后召开信丰、南康、南雄等县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和大庾、信丰、南康、崇义、上犹、南雄六县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发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朱德在会上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讲话。根据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并建立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四月一日，红四军在赣粤边境的梅岭关同粤军一个团遭遇，歼敌两个营，俘虏数百人。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乘胜追击，于当天攻克粤北重镇南雄。朱德、毛泽东在南雄得知赣军金汉鼎部发生兵变，认为这是打击敌人、扩大赤色区域的有利时机，立即率部回师江西，在十日和十六日先后进驻信丰和

会昌。

到会昌后，朱德除指挥部队作战外，还进行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四月二十日，他参加在会昌县城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会见雩都盘古山矿工和靖石的农民三百余人，指示他们组织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军第二十二纵队。四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在会昌县的筠门岭召开手工业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为了打通赣南苏区和闽西苏区的联系，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纵队和寻乌县的红十团，攻克寻乌的澄江，俘敌一千余人。接着又攻克寻乌县城，扫清了通往闽西的道路。以后，以寻乌为中心，在江西安远和广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的问题提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总指挥部，“以朱德同志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45)从此，朱德除指挥红四军外，还指挥红五军和红六军作战。

到五月间，古田会议召开已近半年。为了总结近半年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朱德、毛泽东在寻乌县的马蹄岗，召开红四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出红军管理教育的六条原则：第一，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第二，干部要深入群众；第三，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第七，赏罚要分明。这六条原则，是朱德、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经验。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个月的分兵发动群众和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过分田运动，赣西南的农村中出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都发生根本变化，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踊跃参加红军。没有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农村社会大变动，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局面也有了很大变化。闽西的分田运动早已开始，当红四军回师赣南、迫使国民党军队结束对闽西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地方党的领导下也有了发展：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由邓于恢担任主席；组建了红十二军，由伍中豪（后改罗炳辉）任军长，邓子恢（后改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普遍地分配土地，深入土地革命，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三〇年五月，鉴于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无力顾及南方各省，福建的地方军阀张贞、卢兴邦、刘和鼎之间又正在自相火并，红四军主力决定按原定部署第三次入闽，打通闽赣之间的联系，并取得经济给养的补充。

六月的赣南，骄阳似火。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头顶烈日，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由寻乌出发，向闽西开进。他们一踏上闽西的土地，便在上杭官庄击溃刚在兵变中脱离金汉鼎部的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占领武平、长汀县城，当时的《红旗日报》记述道：“朱毛这次到长汀，群众的欢声如潮涌，男妇老幼均持斧镰红旗欢迎，市面上顿现一番新气象。”(46)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历时半年的转战，扩大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两块赤色区域连成一片，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转战中，发展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为以后实现由以

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十五、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指导

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来看，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不仅赣南、闽西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有了迅速发展，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苏区和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苏区，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共十三个军，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这年五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说，都是空前的。双方参战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在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相互厮杀达半年之久，直到这年十月间才以阎、冯的失败而告终。这次中原大战，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派军阀之间的大混战，一方面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不满；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不少原来用以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队抽调到北方前线作战，拿江西来说，只留下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这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然而，这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却被有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原来在党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会议在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时，认为“在红军中不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便于全国政治有影响。如只束缚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农村中，朱毛就是如此。”并强调：“我们现在应集中红军攻坚。”

在三月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上，李立三又明确提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夺取中心城市。有人在会上提出：“朱毛红军要向江西的南昌发展。”并把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提出要“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经中共粤赣闽省委转给中共红四军前委一封信，传达了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说：“目前的全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革命力量的强大，显示了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当然先胜利前途之实现，无疑的即是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全国胜利的开始。”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要求红军“猛烈的扩大”，“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强调说，这“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哪些地区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前途呢？信中肯定地说：“目前首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指出红四军的任务，“是加紧配合这三省的工作，与这三省革命的力量，谋得共同的发展，在协同动作之下汇合起来，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也就是争取全国胜利的第一步。”这时，朱德、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在闽粤赣边境同敌人作战，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对朱德、毛泽东这一行动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

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信中指示红四军，“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中央对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也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提出要朱德、毛泽东“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

四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目前我们对红军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的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对全国红军的行动都作了具体部署。其中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在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转变路线”，就是要红四军由过去实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环境下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各地主力红军分别编成军团，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等问题。朱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这次会议，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政治报告。这两个会议，虽对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和建设在某些方面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这两个会议是在李立三的“左”的指导思想急遂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它的基调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左”的错误。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否定朱德、毛泽东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行之有效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迫”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说这些经验“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在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把过去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农民错误意识的反映”。强调指出：“目前红军的战略，是坚决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过去的不打硬仗，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分散游击等的游击战术，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不相合了，必须坚决地纠正过来。”

这两个会议结束不久，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样，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个决议在分析形势时，武断地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在这种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批评朱德、毛泽东所坚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根本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同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相配合，夺

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在决议中，还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决议最后强调说：“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对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

不久，李立三又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发展得更加完备。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这种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使党和红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于远处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各地红军和苏区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没有能立刻对红四军产生影响。六月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利用战争间歇时间，从六月十二日开始在长汀县的南阳（今属上杭县），举行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在十九日又移至长汀县城进行，到二十二日结束，对闽西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红军的整编和行动方针以及政治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六月十五日，正当朱德、毛泽东在南阳开会的时候，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信。信中一开头就严厉地指责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递……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又说：“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应当准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信的最后发出警告：“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红四军前委到十月份才收到。这封信中谈到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间的严重分歧。六月二十一日，较早受中共中央委派的涂振农，由上海来到长汀。这时，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正在长汀县城继续举行联席会议。涂振农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报告，传达李立三的许多“左”倾冒险主义部署和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决定，并严格督促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联席会议不得不表示原则上接受中央的指示，并通过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

根据中央指示，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共两万多人，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将闽西、赣南和赣西南的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等地方部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会议还根据中央指示，把原来决定向赣东游击、进攻抚州的计划，改变为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准备夺取九江、南昌。

联席会议虽然原则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中央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决定抱有怀疑，

认为把地方部队也编入正规部队，离开苏区去进攻中心城市，“苏区就毫无防卫力量，门户洞开，任凭占领，红军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对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执行，一九三七年，朱德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到过自己当时的矛盾心情：“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他又说：“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大可疑的。”“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尽管如此，朱德、毛泽东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理，尽力避免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

六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向第一路军发出由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指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11)这个命令既传达了中央关于进攻九江、南昌的指示，又留有余地，没有对夺取九江、南昌作出具体部署。朱德、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还决定将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仍留在闽西和赣南苏区坚持斗争，保卫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这是具有远见的决策。否则，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将会因缺乏防卫力量被敌人轻易攻占而导致严重后果。

当地群众知道朱德、毛泽东将率领红军北上后，在长汀县城南郊举行欢送红军北上大会。“到会的工农群众，达三四万人之多(全县人口二十余万)，多数从远隔数十里的乡村而来，赤脚、光头，有的持红旗，有的荷步枪，有的带梭标或鸟铳、刀棍，完全武装，红色遍野，成为赤色世界。这天演说的有二十余人，除了朱德、毛泽东和一台湾共产党的代表外，其余都是工农分子。”(12)这次欢送红军北上大会，体现了朱毛红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由长汀出师北上。六月二十五日，进入江西石城县境，敌军弃城而逃，红军解放石城县城。随后，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兴国，并在兴国召开北上誓师大会。当年参加这次誓师大会的萧华回忆说：

“一九三一年六月，红军根据中央命令进行北上战役，来到了兴国。七月中旬，在兴国县平川中学大操场召开北上誓师大会。各路军马纷纷聚集，红旗招展，梭镖闪光，昂扬的战歌声，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一派临战出征的雄壮气氛笼罩着大操场，忽然，热烈的掌声铺天盖地，如江潮一样汹涌而起——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政治委员等领导同志登上了讲话台！”

“毛泽东同志，我早已见过两次了，而朱德总司令，则是头一次见到。在我的意象中，这位领导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伟大人物，该是一尊英气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司令，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个头不高，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穿一双粗茅草编织的草鞋，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然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而慈祥的，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双深邃明净的大眼，稳重地环视着集结在草坪上的队伍。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就习惯地将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的缘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体就显得像钢铁一样坚强。”(13)

萧华那时刚调到红四军军委担任青年委员。他回忆到那天同朱德谈话的情况：“经毛主席介绍，我认识了朱总，我对朱总讲，我刚从地方调到部队，是一名新战士，对部队工作不熟悉。朱总笑着说，这没关系，你大胆去做，有军委的同志帮助你，搞一个时期就熟悉了。朱总说话时声音不大，也不着急，使人感到亲切。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又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和蔼可亲。”（14）

七月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在兴国发出向樟树推进的训令。“本军团决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15）这里没有说“夺取”南昌，而是说“窥袭”南昌。就是说，到南昌附近以后，视实际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里也是留有灵活的余地的。

按照训令，红一军团即日分三路向樟树推进，途中先后攻克永丰、新涂。七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攻取樟树的命令。这时，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及其所部滇军已调离江西，省政府主席改由湘军将领鲁涤平接充，他派第十八师五十三旅一百零五团赶到樟树。七月二十四日拂晓，红军开始进攻，击破鲁部两营，缴枪近二百支，俘虏一百余人。进驻樟树镇后，朱德、毛泽东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形势和红军的政策，并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人民，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援。

红军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向东夺取临川（即抚州），还是按照中央指示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七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在樟树镇召开红一军团干部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抚州有敌两团。戴岳部则有由新涂渡河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敌人前进，又不知何日将敌人结束。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16）针对这一情况，会议决定：既不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略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增援南昌的鲁部，而是向西渡过赣江，绕道逼近南昌。朱德、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发出西渡赣江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务要切实照办”（17）。七月二十六日拂晓四时前，全军团渡过赣江，向北前进，攻占高安、上高等十余县。

七月三十日，红一军团推进到距南昌城三十里处，这时，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调集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固守。南昌周围的防御工事密密层层，相当坚固。朱德、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中央指示硬攻南昌。只派罗炳辉带领红十二军的一部分部队，于八月一日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南昌守军躲在城内不还一枪。

向南昌鸣枪示威后，朱德、毛泽东在八月一日发出撤围南昌的命令。命令指出：“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18）并命令红十二军开赴安义，向九江方向警戒。红一军团于八月二日全部撤离南昌近郊。朱德、毛泽东这一决策是很高明的一着。如果不顾一切地强攻南昌，不仅难以攻克，并将使红一军团遭受重大损失。这也是朱德、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巧妙抵制。

红一军团从南昌近郊撤离后，国民党军队不敢出城追击。朱德、毛泽东抓紧这一有利时机，领导红一军团在赣西北的安义、奉新、靖安、高安、上高和宜丰等县休整待机，并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红军人数从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扩大到一万八千人。以后朱德回忆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

时期。我们大大扩充了红军，聚集资力，组织群众，许多新的村庄加入了苏维埃。”(19)这时，“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20)

如果红军在赣西北久待，集中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会前来攻击，红军将处于不利地位。又得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在七月二十七日攻占长沙。于是，朱德、毛泽东在八月十日命令各军西出万载。他们也随同总部于八月十二日进驻万载县城，还到县苏维埃住地会见县委党团书记辛克明等人，“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并指出县委必须在城内发展各种革命组织，特别是发展党的组织，从而把广大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说明红军不单纯是为了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21)

八月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由万载到达湘赣边界的黄茅。他们在黄茅获悉：由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部以优势兵力进攻长沙，彭德怀已率领红三军团于八月六日退出长沙，正在平江县的长寿街及其附近转入防御。何键率领十团以上的兵力主向红三军团追击，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率领四个团，孤军突出地盘踞在浏阳县的文家市和孙家段一线。朱德、毛泽东立即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决定乘戴斗垣部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奔袭文家市歼灭该部。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发出作战命令，指出：“何键残部约有兵力三团，盘踞文家市（约两团）、孙家段（约一团）之线，文家市与孙家段之间之青江，亦有敌之联络部队。”“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岳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22)命令规定全线总攻击时间为八月二十日拂晓。

次日，红一军团根据朱德、毛泽东的部署，兵分四路迅速进入阵地。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神速，戴斗垣根本没有发现。八月二十日拂晓，朱德、毛泽东乘其不备，指挥部队向文家市发起总攻击，一举全歼戴斗垣旅的三个团又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击毙戴斗垣，缴获步枪一千四百支，水机关枪二十挺，手机关枪和轻机关枪等十七挺，驳壳枪一百余支。这次战役使红一军团得到相当大的补充。这是红一军团自长汀回师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战果比樟树战役大得多。

文家市大捷后，朱德、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三日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到达水南市，同由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一万五、六千人胜利会师。这是朱德、毛泽东第三次同彭德怀部会合。

由李立三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此时仍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八月十日，在给长江局的信中，严厉指责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没有“向武汉发展”，“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并称：“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在这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进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在必要时，即使未下沙宜，亦应超沙宜攻汉阳；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武汉。”(23)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后，立即举行两个军团前委的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24)联席会议决定由这两个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共三万多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还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三十五人为委员。红一方面军的组成，对于实现集中兵力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中也提出：“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25)九月，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朱德为候补中央委员。

联席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第二次打长沙的指示时，朱德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26)朱德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的支持，但是，却被会议否决了。朱德一向顾全大局，他的意见既被否决，只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中央指示和联席会议决议，率领部队再次去攻打长沙。

八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指出：“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拟于明日（二十五号）由现在地出动”(27)。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分途向长沙开进，经过四天急行军，各路红军于八月二十九日先后进抵长沙东南近郊，对长沙城取包围态势，当红军向长沙推进的时候，何键率领三个旅于八月二十八日由浏阳退回长沙，同原来留守长沙的一个旅会合。此外，又增调其他援军进入长沙防守。他们修筑了欧式的重层配备的防御工事，碉堡、壕沟和电网等共有八、九层之多，还有飞机、军舰作掩护。

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深知，红军的长处是野外作战，尚不具备打攻坚战的条件，如果硬攻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准备将敌军诱出工事，逐个加以消灭。八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长沙敌军仍依据工事向我顽抗中”，“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28)朱德站在长沙城外的一个山头上指挥全线作战。他几天几夜没有睡眠，但仍全神贯注地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机歼敌，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九月一日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二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三日，何键部终于分三路向城外出击。其中陶广师的两个旅由猴子石出击，被红一军团驱至湘江边，大部缴械投降；陈光中旅由大托铺偷渡，被红四军迎头痛击，败退易家湾；公秉藩师一部和王东原、罗树甲，彭信仁旅，被红三军团击溃。这次激战中，共歼敌两个旅，虽然取得胜利，但未能攻进城去。九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再次向敌人发起全线攻击，连续冲锋四、五次，仍未攻入长沙。

这时，朱德、毛泽东对战场态势进行分析，认为已发起两次总攻击，虽然歼灭一部分敌军，但未能攻克长沙。而北方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已近尾声，蒋介石已开始调集兵力增援长沙，使何键增强了固守长沙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围攻下去，非但难以奏效，而且会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于是，他们在易家湾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说服全军领导干部主动撤围。这时，从长江局的来信中又得知，国民党张发奎军已开到湘潭。朱德、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时机，以先去湘潭消灭张发奎军、再取长沙为理由，在没有请示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果断地做出决策，于九月十二日发布撤围长沙转移到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

撤围长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州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离开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南，回师他们力量较弱的江西，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

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进攻吉安的命令，率领部队分途向江西进发。九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和红四军，由萍乡来到安源。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会后仅在三天内，就有一千多工人要求参加红军。朱德还深入到工人和战士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做宣传工作，说明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

回师江西，攻取吉安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可是，中共中央却命令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干部也不赞成攻取吉安的计划，要求按照中央指示回头再打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在部队由湖南回师江西的途中，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争论。朱德后来回忆说：“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29)异常紧迫的客观形势要求红军内部尽快结束这场争论，统一思想。否则，数万红军行动方向不明，迟疑不决，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九月二十八日，红军进占袁州。第二天，总前委在袁州城内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黄公略、蔡会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张纯清、吴溉之、袁国平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已争论数日而仍未解决的行动方向问题，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还是打南昌、九江的问题。

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和朱德坚持按原计划打吉安，不同意打南昌、九江。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干部不同意打吉安，主张按中央指示打南昌、九江，并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30)毛泽东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并对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进行比较，指出打吉安在战略上对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却无把握。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和毛泽东一起做说服工作。彭德怀后来回忆道：“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31)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按原

计划攻取吉安。这次会议使红一方面军又一次避免因硬攻南昌、九江而可能遭受的严重损失。

根据袁州会议的决定，朱德、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命令红一军团于次日拂晓由袁州到阜田集中，按原计划攻取吉安。红三军团按原计划经新余向临江一带开进，担任对南昌、九江方面的警戒任务。

这天晚上，当部队正在束装待发的时候，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八月二十九日的指示信赶到袁州，要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当晚，毛泽东同周以栗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最后周以栗被毛泽东说服了，同意改打吉安。

十月二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由阜田出发向吉安推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几万红军神速地赶到吉安城下，把吉安严密围住。可是，红十二军经安福向吉安前进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伍中豪中弹牺牲。朱德异常悲痛，若干年后，他谈到这位先烈时，还沉痛他说：伍中豪同志是黄埔军校学生，英勇善战，忠实于革命事业，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32)

吉安城守军约四个团，其中正规部队只有邓英师的不足三个团，分别布置在吉安城郊山岭一线，依托工事防守。在城内还有江西省警察大队一个团。十月三日午后二时，朱德、毛泽东在山前总部向红一军团下达总攻击命令。命令部队“于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限于五号拂晓前夺取吉安城。”命令中还明确规定：“进城后各官长士兵，须恪守纪律，不得乱拿东西。”(33)十月四日拂晓，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天激战，邓英见红军势大，不敢死守，在当天晚上八九点钟率部从赣江乘船逃走。午夜一点钟左右，红军攻入吉安城内。朱德也很快进入城内。以后，朱德回忆道：当时，因吉安周围的苏区有很大发展，所以，各地土豪都集中在吉安。到深夜一点多钟进城，土豪一个也未跑掉。红军一打就打到邓英的司令部，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土豪家里。我们先把他们统统看起来，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捉光了。这次的确筹到了足够红军使用的军费，为以后第一次反“围剿”准备了经费。(34)

“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业发达。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重视保护工商业，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命令部队要严格执行。”(35)

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围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手举红旗，兴高采烈地涌进城内。城内的工人和贫苦群众也纷纷走向街头，欢迎红军入城。十月七日，朱德出席在吉安县城中山场召开的有二十万军民参加的庆祝胜利大会。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等五十三人为委员。朱德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他说，我们工人农民，我们工农红军，要打他几十个州县，打天下嘛！(36)他的讲话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十几天内有一两万工农群众要求参加红军。朱德亲自出城会见他们，向他们讲述参加红军打天下的意义。红一军团在吉安“补增了新兵八千”(37)，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赣西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过去地方工农武装虽曾八次攻打过这座城市，都没有攻克。这次打下吉安，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对开展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十多年后，朱德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到吉安视察工作，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挥笔写下《忆攻打吉安》诗一首：

八打吉安未收功，
四面包围群众中。
红军速到声威震，
一充名城赣水红。(38)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虽对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产生过不良的影响，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等的坚决抵制，影响并不大。苏区和红军仍不断向前发展。一九四五年，朱德这样说过：“由于立三路线历来对苏区和红军不重视，后来看着红军的发展，虽一再强迫命令，企图利用红军作为其城市暴动投机的工具，但在各苏区或遭着顽强抵抗，或在执行不通时，即迅速掉头。因此，立三路线对苏区和红军工作的影响并不大，而各苏区和红军是一贯站在六次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者注）精神之下，正确地执行了和完成了其发展革命的任务。”(39)

十六、第一次反“围剿”

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局面较前已大为改观：整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包括县城十四个，并在三十多县范围内进行了分田运动，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建立起来。江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震惊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十月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的胜利后，立刻调集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红军。这样，红军便开始了反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剿”的斗争。

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在吉安一共停留了十天。在这个期间，朱德非常注意搜集并仔细阅读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和当时的各种报刊，认真分析时局变化的动向。他正确地判断：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必定要调集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他认为，这种进攻一旦发生，红军如果久留吉安将十分不利，应该迅速撤出吉安，以便机动作战。

为了做好这场即将开始的反“围剿”战争的准备，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吉安召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今后的行动计划。这时，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虽已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军事封锁和交通阻隔，全会精神还没有传达到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来，所以，少数领导干部仍坚持应按照中央和军委八月初的指示，去攻打南昌、九江。会上发生了争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灵活的方案，决定先向吉安以北、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在这里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并等待战机。

会议结束后，朱德、毛泽东在当天命令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于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拂晓撤出吉安，移师向北，到清江附近集中。十七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峡江，这时，他们已得到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的确实情报，并获悉敌人有六个师开到南昌，准备向樟树推进。

当晚，朱德在峡江县城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一夜，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时，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一）是否继续攻打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二）把即将开始的反“围剿”的战场摆在哪儿？

在争论中，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因为大前提还是敌强我弱，而且具体地看，湘敌强，赣敌弱，我们要避实就虚，‘诱敌深入’，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是，红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没有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坚持要在赣江西岸作战，反驳说，“井冈山就不要了？”为了维护红一方面军的团结，会议没有硬性作出东渡赣江的决定，而把问题留待继续讨论。朱德、毛泽东也没有立刻命令部队东渡赣江，而命令红一军团继续向袁水流域开进，同红三军团靠拢。

十月下旬，蒋介石加快了“围剿”江西苏区的步伐，从中原战场调集大量兵力南下，集结在南昌周围，开始部署对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大敌当前，形势咄咄逼人。在这个严峻时刻，必须尽快结束红一方面军领导干部内部的争论，把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战略方针确定下来。否则，必将贻误战机，陷

于被动。

十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县的罗坊，立刻在这里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决策会议，毛泽东，朱德、周以栗。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继续讨论峡江会议上争论而没有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朱德在讲话中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在强大的敌军已经在南昌、九江周围集结的情况下，决不能冒险去打南昌、九江。只能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东渡赣江，在革命根据地消灭敌人。经过毛泽东、朱德的耐心说服，对打不打南昌、九江的问题统一了认识。第二天，会议一致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式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取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

打不打南昌、九江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在什么地方同敌人作战？也就是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还是赣江以西？对这个问题仍继续发生争论。红三军团和江西省行委的少数领导干部，反对东渡赣江的方针，提出“夹江而战”的主张。彭德怀在回忆中写道：“在三军团渡江之前，因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千江、浏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从坚持长期战争这方面看，这些同志也还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实际上，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我说：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我说，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在回忆中也说：“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最后，大家终于统一了认识，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十月三十日，会议正式通过两个军团一起东渡赣江、“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罗坊会议是红军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统一指挥下东渡赣江，汇合在一起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红军的作战能力，标志着红一方面军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会议在极端紧急的时

刻，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原有部署，确认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这就为以后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罗坊会议一结束，红军在“诱敌深入”的正确作战方针指导下，立刻开始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一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东渡赣江的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涂、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并在命令中规定，各路红军在一个月内完成反“围剿”的准备工作。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主力按照命令，分别在十一月五日和六日迅速渡过赣江。五日，朱德同毛泽东暂时分手，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峡江县城东渡赣江；毛泽东由峡江前往吉安，参加江西省行委和赣西行委的扩大会议，对赣江以西地区如何坚持斗争和撤离吉安作了部署。

红军主力迅速东渡赣江，这是罗坊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正当红军主力东渡赣江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以先到的七个师和一个旅编成三个纵队，采取“并进长追”的战术，向红军发起进攻。十一月七日，他们推进到红军原来所驻的袁水两岸，但因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扑了个空。

朱德率领方面军总部东渡赣江后，立即指挥部队向新涂、崇仁、宜黄、南丰、南城地区推进，威胁樟树、抚州。并抓紧敌军尚未东渡赣江的时机，在这一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整训部队。十一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吉安，同朱德会合，一起指挥部队作战。

国民党军队发觉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立即改变部署：留下第三纵队在赣江西岸，而以主力第一、第二纵队尾随红军主力东渡赣江，企图在赣江东岸寻找红军主力作战。朱德后来说：“我们看（敌军）这样多不行，就向南伸。”

为了继续“诱敌深入”，朱德、毛泽东决定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和迷惑敌人，指挥主力部队隐蔽转移到苏区边沿的藤田、招携一带，在转移途中，朱德视察了各地坚壁清野和其他反“围剿”准备工作。这时，有些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害怕打烂坛坛罐罐的疑虑。朱德耐心地向他们做说服解释工作。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刚刚离开，各路敌军就分别进到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又扑了个空。

红军退却的终点应该放在哪里？朱德、毛泽东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红军刚转入运动战，必须慎重初战，不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同敌人决战。红军主力与其退却到苏区边沿地区，不如退却到苏区中心地区更为有利。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军的进攻，采取这种慎重的方针是必要的，为了不使红军在退却中过于疲惫，朱德、毛泽东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敌军诱到苏区中部的东固、南垅、龙冈地区；第二步再将他们诱到苏区腹地的黄陂、小布、洛口一线，在这里相机歼敌。

四万红军按照朱德、毛泽东这一部署，先后转移到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十一月二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总前委机关来到黄陂。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陂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以及当地群众，为了欢迎朱毛红军，搭起一座彩门，彩门两边用“黄陂”二字

题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黄虎出林啃白犬”；下联是：“陂水人潭养赤龙”。当朱德、毛泽东率部走来时，夹道相迎的群众中锣鼓、唢呐、鞭炮齐鸣，黄陂、小布顿时欢腾起来。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一起，会见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陂区委、区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赞扬他们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并鼓励他们继续支援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朱德虽然是红军总司令，但从没有一点架子。他来到黄陂、小布后，不仅经常找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谈心，了解地方工作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同红军战士打成一片。有个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小通讯员一次在打草鞋时，因为没有掌握好打草鞋的技术，手里拿着黄麻和破布，怎么摆弄也编织不好。他又急又气，拿起棍子在不成形的草鞋上乱打乱敲，嘴里气呼呼地说：“打草鞋！打草鞋！”这时，忽然听到背后有笑声，扭头一看，原来是朱德站在那里。朱德走向前去，对小通讯员说：“小同志，别着急，来，我来教你。”说着弯下腰去，指点这位年轻战士打草鞋。经过朱德的耐心帮助，一双又合适又好看的草鞋很快打成了，朱德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和爱兵如子的精神，在红军中人人皆知，广大官兵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

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进攻；并任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一个师又两个旅约十万以上的兵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边沿部署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形势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朱德来到黄陂不久，在十二月上旬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这时在革命根据地内部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那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在强敌围攻的险恶环境中，出于巩固后方的考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党组织在这年上半年开始展开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一些同志，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干部反对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错误地指责它是“右倾”、“逃跑”的方针，仍主张夺取中心城市，这又加深了高级干部内部的矛盾。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当时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所在地——吉安县的富田，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成立的一个反动组织，在第二年四月就已解体。）李韶九到富田后，相继逮捕了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赣西南特委书记、省行委常委段良粥，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并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将被错定为“AB团”并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逮捕，在十二月十二日带领部队在富田包围当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人员，并将全军拉到赣江以西地区。他们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信中说要古柏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的主犯。字体“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他们故意将这封伪造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红二十军由赣江东岸拉到赣江以西的永新、莲花一带活动时，沿途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些极端错误的行动，严重地分裂了红军，只能有利于敌人的“围剿”，而不利红军的反“围剿”，朱德收到那封伪造的信后，一下

就看出了破绽，立即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着问朱德：你怎么还送给我呀？朱德回答：我不相信这封信是你写的。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十二月十七日联名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严厉地批评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他们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错误口号是“分裂革命势力”，并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会议的路线相符合。”宣言维护“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出：“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革命，敌人利在速战，使红军深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要利用敌人弱点，看明敌人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定策略。我们所采取的大规模决战，诱敌深入赤色区域，配合群众，这是实际消灭敌人，实际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唯一的正确策略。”宣言还明确表示：“朱、毛、彭、黄团结到底。”

十二月十八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又联名发表《给曾炳春等的一封信》（曾炳春是红二十军政委——作者注）。公开信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出：“富田这次行动，唯一的借口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右倾’。泽东同志平时主张彻底平田，坚决在政治上反对富农领导，经济上反对富农剥削，相当的武装地方群众，巩固苏维埃政权，这些主张……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信中强调：“只有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大举消灭敌人主力，在野外消灭敌人，工事也无用了，这就可以长驱直入，南昌、九江不攻自破。这种战略才是实际的布尔塞维克的战略。”“凡是真的布尔塞维克同志，都（应）当无条件的执行。”并指出：“这一个战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泽东同志‘右倾’，等于无的放矢。”公开信最后严肃地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塞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11)由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的坚决态度和说服教育，克服了“富田事变”造成的严重危机，维护了团结，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内部得到稳定和巩固。这对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富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和苏区内部出了问题，正是乘机大举进攻的好时机。于是，他下令将国民党“围剿”军队分为八个纵队，于十二月十六日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起全线进攻。在红军正面的右、中、左三个纵队，由北向南“分进合击”。由于苏区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后到处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因而陷入困境，停顿不前。他们在战报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到赤区作战真是黑漆一团，如同在敌因一样”(12)。

“围剿”军已被诱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决战即将开始。这一仗该怎样打？先打对方哪一部分？朱德和毛泽东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左翼的张辉瓒部第十八师或离红军主力最近的谭道源部第五十师。因为“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13)然后进行各个击破，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这样，总前委选定远离敌人后方的龙岗、小布地区为退却终点，准备转入反击。为了打好第一仗，十二月下旬在小布河畔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侧，挂着毛泽东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14）。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和朱德先后讲话。他们号召全体军民努力杀敌，勇敢冲锋，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土地革命，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卫家乡，保卫工农的天下。（15）

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得到情报：在源头的国民党军队谭道源师，正在大量拉夫，准备向南进犯小布。朱德、毛泽东认为，小布的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好，对红军有利，正是在运动中消灭谭道源师的好机会，决定先打谭师。他们在当天下午一时发出命令：“方面军决于明（二十五）日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16）次日早晨，指挥红军主力由黄肢向小布以北轻装疾进，设下埋伏。这时，正是隆冬时节，北风阵阵，寒气袭人。红军指战员在冰冷的战壕里等待着。可是，从早晨一直等到黄昏，始终没有见到敌军的影子，只得撤回黄陂。二十六日午后，谭道源派出一部分兵力进到距小布十五华里的树陂，前哨放到距小布只有七华里的假坑。朱德、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在当天夜里十点钟又发出命令。“方面军决于明日进至小布附近，待机由树陂来犯小布之敌围攻而歼灭之。”（17）红军指战员在第二天拂晓前，再次进入原来的设伏阵地。可是，从拂晓等到天黑，仍然没有见到动静，只得再次撤回黄陂。

谭道源师为什么没有进犯小布？并不是情报不确实。谭道源确曾下达进攻小布的命令，先头部队并已出发。但由于谭师力量较弱，不敢轻进，也有记载说由于有人从苏区逃去报告了红军在小布设伏的消息，谭道源便下令部队停止出发，并将已经出发较远的前卫部队撤了回去，盘踞在源头一带迟疑不前，源头一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谭师居高临下，硬攻对红军不利。两次在小布设伏都没有打成，有的指战员便产生急躁情绪，有的还说起怪话。朱德、毛泽东非常冷静，认为红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重大，它将影响全局，必须打胜，必须在敌情、地形、人民等备方面条件都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情况下才能动手，否则宁肯持重待机，这时，又探得张辉瓒师正向龙岗方向推进。于是便决定暂时不打谭道源师，先打张辉瓒师。

当红军主力在小布设伏准备伏击谭道源师的时候，朱德、毛泽东已派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带领该军第三十五师会同地方武装，将张辉瓒师一步一步从东固引向龙岗，并指示罗炳辉：在诱敌过程中，只许打败，不许打胜。

准备担负正面攻击张师任务的是红三军。二十七日，朱德来到红三军，在全军指战员大会上宣布作战任务。他说：“谭道源溜了，张辉瓒来了。”“总前委认为，敌人已被调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时机已经到来。”“总前委决定：你们红三军担任正面攻击。希望同志们努力打！要初战必胜。”他扫视一下队列问：“有没有信心？”队列中爆发出响亮的回答：“有！”“坚决打垮张辉瓒！”当时正在红三军红九师担任参谋的耿飏回忆道：

“总司令简短的动员结束了，但他的话久久地回响在指战员心中。我是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以前，从众多的关于他的传奇式传说中，我得出了一个印象：他是一员威风而严肃的战将。现在，当他站在我的面前时，那一对浓浓的眉毛和总是微笑的嘴唇，使我感到了他的睿智和亲切。”“现在，就

是这颗被国民党悬赏二十万光洋的头颅，就是这个被多次宣布已被‘击毙’，的英雄人物，正指挥我们在反‘围剿’战争中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18)

第二天下午，朱德、毛泽东正式发出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19)

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由黄陂、小布地区挥戈向西，于当天到达龙冈以东三十华里的君埠隐蔽待机。这一天，张辉瓒师的先头部队戴岳旅的第一、四团于上午十时进抵龙冈。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神速，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所以，张部进到龙冈后，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已在君埠地区隐蔽集结，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之外，毫无顾忌地准备由龙冈继续东进。

龙冈圩地形十分险要，后面是一座大山，前面是一条河，河的对岸是一座小山，东面不远处有个黄竹岭，是张师东进的必经之地。朱德后来说：“那山地的确险要。有些怪地方，山顶上的小路，一般军队都不能走，没有人领路，那就会迷失在树木草丛石壁中间。”(20)这里的地形极有利于红军隐蔽和集结。当晚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天由君埠向龙冈运动，利用有利地形，趁敌军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将它围歼在龙冈山区，并在军事上作了周密的部署。

十二月三十日清晨，龙冈山区大雾弥漫，群山遍野云宠雾罩，如同黑沉沉的夜间，真是“雾满龙冈千嶂暗”(21)。红军在浓雾掩护下悄悄地进入阵地。朱德、毛泽东带着总司令部很少几个参谋人员，进入设在小别山上的指挥所。过一会儿，云消雾散，一轮红日徐徐东升，龙冈山区晴空如洗。红军指挥员居高临下，将整个龙冈圩尽收眼底，密切注视着张辉瓒部的行动。上午九点左右，张师先头部队戴岳旅进到龙冈以东的小别村附近登山时，早在这里隐蔽待机的红三军第七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

这时，尚在龙冈的张辉瓒，对红军的情况一无所知，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还远在黄陂、小布一带，戴岳旅所遇到的不过是游击队，不是红军主力。他既没有及时地增援前方，也不戒备侧翼，而是命令戴岳旅拼命抵抗。战斗打到中午时分，戴岳旅逐渐展开两个团的兵力，战斗一时打得相当激烈，这时，在正面迎击戴岳旅的只有红三军的第七师（实际上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向总部指挥所请求增援。可是，总部指挥所只留下一个连警卫部队，还担任着其他任务，只能派参谋处长到前线了解情况。朱德说：凡是部下请求增援，就必须派兵去，多少总要派，没有兵就派将。(22)不久，红三军第八、第九两师和红十二军的一部分，向戴岳旅的两翼猛烈发起攻击。戴岳旅在红军三面猛攻下，难以支持，向张辉瓒告急，张辉瓒派出一个团前去增援，还没进入阵地，就同戴岳旅一起被红军全歼。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被击毙，戴岳夹在士兵中逃出。

下午三时左右，左路红十二军、右路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一部，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已按预定计划分别迂回到龙冈侧后，占领当地山头，截住张辉瓒部主力四个团的退路，切断他们同东固。因富的联络，从背后向龙冈发起攻击。整个龙冈被红军紧紧围住，张辉瓒部成了瓮中之鳖。

下午四时左右，朱德、毛泽东下令发起总攻击。各路红军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猛冲下来。张辉瓒指挥部队伍往西北方向突围，突不出去。红军迅速冲进张辉瓒师部，活捉第五十三旅旅长王捷俊。张辉瓒换上士兵衣服逃跑，也

被搜获。当天黄昏，战斗全部结束。朱德和毛泽东从小别山上总部指挥所走下山来，向龙冈走去，沿途听到很多红军战士高兴地喊道：“前头捉了张辉瓒。”(23)

尤冈战斗，在朱德、毛泽东的周密部署和巧妙的指挥下，只打了一天，歼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还缴获电台等其它军用物资。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张辉瓒部的惨败，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大为震动。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的伤心语。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24)

张辉瓒被俘后，朱德把他押到总司令部，同他谈话。朱德故意问他：“你看我们下一步应该去攻击敌人的哪个部队？”张辉瓒毫不迟疑地建议红军去攻击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并且把十九路军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朱德一听便知道他是在欺骗。因为这时红军已经去追击谭道源师了，而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这时远在兴国，攻击该军不是红军的迫切任务。张辉瓒、谭道源两师同是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那样说的目的是想转移红军的进攻目标。

张辉瓒师主力在龙冈覆灭后，鲁涤平急忙电令在源头的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迅速向东转移，同洛口的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和头陂的毛炳文第八师靠拢，以免被红军各个击破。

朱德、毛泽东早已预料谭道源师一定会向东逃跑。为了在谭师同许、毛两部靠拢前加以消灭，朱德、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元旦率部东向，当天赶到小布。谭道源得知朱毛红军追来，第二天一早就率部东逃。它的主力到达东韶，准备按照鲁涤平的电令，同洛口的许克祥师靠拢。但许克祥师已退到头陂同毛炳文师会合，谭道源只得在东韶匆忙地赶修工事，抵抗红军的追击。

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二日晚十时，下达对谭道源师的追击命令，指出：“视此情形，敌军似有全线退走之模样”，“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两师，以树政治上之声威。”(25)命令下达后，各路红军立即向东韶急进，追击谭道源师。朱德和毛泽东也迅速进入阵地，站在一个小山头上指挥全线战斗。一月三日上午，担任中路的红十二军先头部队首先同谭部接战。随后，红军主力很快赶上来，发动猛攻。谭道源部因上一天刚到东韶，立足未稳，饥饿疲惫，工事也未修好，仓促应战，在红军的猛烈进攻下，无力支持。到下午三时左右，阵地被突破。谭道源趁红三军的迂回部队尚未赶到预定地点的机会，率残部突围。红军在追击中消灭逃敌一部。东韶战斗共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获枪支两千多件。谭道源残部向南丰方向溃逃。

红一方面军在五天内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胜仗，共歼张辉瓒、谭道源等部约一万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一万二千多件。东韶战斗结束后，侵入中央苏区的其他国民党军队，相继退出苏区。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小布召开庆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他充分肯定龙冈、东韶战斗的巨大战绩，说：这次龙冈战斗打得很漂亮，敌人没有走掉一兵一卒，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我们活捉，这是红军史上破天荒的胜利。东韶战斗只消灭敌军两个团，是因为阻击战没有打好。但总的说来，胜利还是伟大的。接着，他针对部队

中一部分人因胜利而产生的骄傲情绪，号召全军指战员，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说：敌人决不会甘心这次失败，今后还会有更多更大的仗打。全军指战员要万倍注意，不能骄傲松劲，更不能恃勇轻敌。现在的胜利，不过是一个开始，一定要取得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26)

为了迎接新的战斗，朱德十分重视抓部队的军事训练。他不仅号召战士们刻苦训练，而且，还经常深入到战士中间，带领战士们一起训练。当时刚参加红军不久的新战士严德胜回忆说：

“那时，我们在黄陂。大家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把每天的早操时间都用来练习抢山头、追击、射击、迅速集合；游戏活动的内容也改成刺杀。枪术、测量、跳高、跳远、撑杆跳高、赛跑等；在中午和下午则开展军事、政治和文化学习，练习打手榴弹。爬竹竿、爬绳、过独木桥、越障碍物等。朱德同志经常到实地检查练兵情况，有时还亲自伏在地上，观察我们瞄准的每一个动作。发现问题，立即手把手地纠正。

“有一次练习撑杆跳高，有的同志双手拿着竹竿，可就是撑不起身子来；有的虽然撑起来了，但身子跃不过去横竿……正在大家为难时，谢礼宜大声喊起来：‘总司令来了！’我们回头一看，见朱德同志笑眯眯地站在我们后面。看样子，他已经悄悄地看了一会了。

“朱德同志先把执竿、起步跑、撑竿点地、两手爬竿和丢竿子，跃身跳下的全套动作的要领讲了一遍。接着，就给我们做示范。他轻捷地跳过横竿，我走近标杆一看，有八尺多高。大家都鼓掌喝彩。

“在练兵运动中，我们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还进行了一次军事体育比赛。比赛的项目很多，有长短距离赛跑；有跳高、跳远、撑杆跳高；有射击、掷手榴弹；还有整装待发的技术比赛……

“朱德同志还倡导了一个背人赛跑的比赛。他说这是锻炼体力的办法。在战场上十分需要。他还亲自当裁判，还勉励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搞好军训，增强体力，练好本领。只要平时练得好，战时才能打胜仗。”(27)

自红军创建以来，朱德一直关心建立红军的无线电台，认为这是红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由于红军既没有电台器材，也没有电讯技术人员，打起仗来，只能靠通讯兵传递命令。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立即指示把俘虏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利用缴获的一部收报机和一部十五瓦的无线电台，创立起一个无线电通讯大队，任命王诤为大队长，冯文彬为政治委员。朱德、毛泽东等又接见了原第十八师的机务、报务人员。朱德对他们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将来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陆续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28)朱德还送给他们“麻雀牌”香烟，表示鼓励。这些刚解放过来不久的机务、报务人员，被感动得热泪直流。不久，朱德亲自主持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他在会上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勉励学员们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在建设红军通讯事业上发挥尖兵的作用。(29)半个月后，朱德、毛泽东又命令从各部门选调一批学员到训练班学习，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材。在朱德、毛泽东的关怀下，红军从此建立起第一支电讯队伍。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不久，项英于一月上旬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一月十五日在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

因为周恩来在上海未能到职，由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中央局委员。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兼往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项英没有军事工作的经验，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这时实际上仍由毛泽东、朱德主持。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虽然失败，但他仍把十几万大军摆在革命根据地周围，伺机发动第二次“围剿”。

为了做好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朱德、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乘胜向革命根据地边沿区域发展，一边整训部队，一边袭击骚扰敌人，发动群众，打土围子，扩大红军，筹措给养，组织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准备再次打破敌人的“围剿”。

在这些日子里，朱德经常到部队和群众中了解情况，听取反映，或参加部队和群众的集会，利用一切机会勉励广大军民抓紧整训部队，积极发展生产。经过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开拓了新苏区、争取了几十万人群众，拔掉了不少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筹集了相当多的给养，从而为以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向运动战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这样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

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30){ewc
MV IMAGE, MV IMAGE, !09100020_0237_1.bmp}

十七、 第二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毛泽东预计到国民党方面的进攻不会放松，立刻着手准备第二次战争。但蒋介石有了第一次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军事布置上相当审慎。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他们为了实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计划，除参加第一次“围剿”的兵力外，又向江西增调十多万军队，共有二十万敌军云集在中央苏区周围。

四月一日，国民党军队分为四路，分别由蔡廷锴、王金钰、孙连仲、朱绍良指挥，构成一条从赣江到福建建宁的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推进。同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鉴于第一次“围剿”时因轻率冒进而遭到惨败的教训，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由“长驱直入”改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这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坚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第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

二十万敌军压境，形势十分严重。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比第一次反“围剿”时还少一些，只有三万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破第二次“围剿”呢？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意图，是想从南、西、北三面向东推进，把红军推到东海边，然后一举加以消灭。针对对方这一战略意图，朱德，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采取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打法，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找敌方在行进中暴露出来的弱点打，各个击破。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这次“围剿”中投入的兵力比上次大得多，要实现这个任务自然就更为艰巨。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由中央苏区北部边沿向南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引入中央苏区腹地，寻机歼敌。

这时，由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四月初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到达前不久，三月间，由项英主持在宁都的黄陂曾召开过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决议，中央代表团来后，四月十七日在宁都的青塘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作为上次会议的继续，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朱德作为中央局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传达讨论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会议决议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共产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汀州会议后，“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但攻打长沙后，“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决议又指责“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

但当时最紧迫的是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因此，在中央局

扩大会议后，立刻召集了几次由中央局委员和各军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会议。在第一次讨论时，“当时大多数同志以敌人包围得这样严密及在军事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相差得太远，我们此时主要的是如何退敌。所以当时的策略是‘分兵退敌’。那时认为我们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当时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项英提出‘牵牛’的方针对付敌人，即红军将敌引出革命根据地外打击敌人。”还有人根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中所说的“为着保全红区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提出必要时可以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并且以斯大林曾说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作为他们主张的依据。

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不赞成“分兵退敌”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过了几天，苏区中央局又召集第二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这次，多数人赞成毛泽东、朱德的意见。认为现在马上分兵不好，应该先同敌军打一仗，然后再考虑分兵问题。会议还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留在中央苏区打。这样，打还是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先打敌军的哪一路？对这个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朱德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也主张先打在西面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因为它是蒋介石收编的杂牌军，同蒋介石有矛盾，实力较弱，内部也不统一。它又是北方军队，不善于爬山，在南方作战水土不服。如果先打这一路，各方面条件都对红军有利面对对方不利。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后，多数人接受毛泽东、朱德的主张，决定先打王金钰部，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以击破这次“围剿”。

朱德后来回忆起这次会议的情景时说：最后我们决定打。当时敌人的夹夹形的阵势，像螃蟹螯似的已经形成。我们先打敌人的哪一股呢？大家相当有些争论。我们主要是先拣弱的打，一找就找到了北方军队王金钰部。这个正确决策对以后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一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即于四月十九日下午五时，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准备先打王金钰部的命令，指出：“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的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歼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命令下达后，各军急速向吉安东南的龙冈、上固地区集中，四月二十三日全部集中完毕。接着，朱德、毛泽东又司令部

队从龙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移驻距东固二公里半的做上。东固以西离王金钰部进驻的富田只有二十公里。因为王金钰部在富田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如果硬攻，就得打攻坚战，这对火力不足的红军是不利的。因此，朱德、毛泽东决定在东固一带长时间地秘密集结，耐心等待，继续“诱敌深入”，在王金钰部脱离他们的坚固工事后再在运动中待机歼敌。

事情看起来真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为什么红军三万多人能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达二十多天而不被对方发觉？这同东固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群众条件有关。东固地处中央苏区腹地，在五个县的接壤处，离各县县城都达五十多公里。周围丛山峻岭环抱，只有五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可以通往山外。山内土地肥沃，盛产大米等物品，有二百九十多个村庄、一万五千多住户。这里又是老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七年九月党组织领导并发动了东固暴动，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是在这里产生的。经过土地革命，群众觉悟很高。红军主力到这里集中后，又采取了严密的封锁和保密措施，因而能有可能做到大部队长期在此埋伏而消息不致外漏。

在东固待敌期间，朱德于四月三十日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军事会议，对作战方针再次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比前几次会议前进了一大步。参加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

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用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会议一致肯定了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还通过了毛泽东、朱德精心制定的整个战役中连续作战的方案。

但是，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时间内集中隐蔽在东固这个不大的山区内，毕竟会带来严重的困难。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包围和进攻，实行经济封锁，大肆抢夺粮食，恣意破坏生产，使中央苏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生活极度困难。三万多红军集中在东固地区，缺乏足够的粮食供应，生活非常艰苦。尽管东固地区的人民群众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自愿地拿出来支援红军，但毕竟因人多粮少，不能满足红军的需要。当时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的陈伯钧有一段回忆：“那时正是五月份，粮食少，吃饭都成问题。东固的老百姓把所有的粮食都接济了我们。我们也上山采笋子，下田拣田螺，生活很苦。”“我们一个司令部只有两盏灯，师长、政委一盏，作战科一盏，就是这样过日子”（11）。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没有因为自己是总司令而有什么特殊的

地方，而是和广大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他回忆说：“我们住在东固很苦，没有粮食，就拿笋子来充饥。”(12)当时在红三军任第二十六团团长的李聚奎曾回忆起：“朱总司令组织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前来我团参观，由于缺粮食，我们不知用什么来招待这个百余人的参观团，只好发动大家一边挖工事，一边拔竹笋摸田螺，把仅有的一升多米掺上竹笋、田螺煮来请大家吃。我盛了一碗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还说蛮好吃。实际上那有什么好吃呢，百余人一升米，又有油又有盐”。

为了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朱德、毛泽东于五月五日发布《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指出：“敌人长期进攻苏区及红军，大举抢粮食拔去秧苗，使农友马上缺食不能耕种，及将来无秋收希望。”“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担任放哨、侦探、运输等工作，所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我们全体红军在不妨碍作战及警戒外，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住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并强调说：“红军帮助栽秧耕田全是一种应尽义务，不要吃农友的饭及任何酬报，并且要十分和气，不得有不好态度对待农友。”“各级战斗员、指挥员，应将此种工作视为作战中之一种重要任务，如能按期作到耕种完毕，是二次战争首先胜利之一，务祈全体动员努力此一工作，但决不能妨碍作战。”(14)

五月八日，项英、毛泽东、朱德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节省经费的训令》，对节省经费作了具体严格的规定：伙食费“从即日起每日吃两餐，只发伙食费八分。柴自己采，菜自己采一部分。”“每个机关每月从三元起至八元止，按照至低限度的需要开支。总司令部不得超过八元。除上列规定外，过去各种开支，如挑伕费、药费、交通费、侦探费等项一律停发。”(15)

朱德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但他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他经常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次在总司令部干部会议上动员说：“同志们！不怕敌人多，不怕没饭吃，只要我们团结努力打敌人，一打出去敌人就会送来大米白面！”大家一听都振奋起来，说：“总司令说有办法还怕什么。”(16)朱德的讲话鼓舞了大家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

红军在东固一直等了二十多天，仍不见王金钰部有离富田东进的迹象。这时，不少红军指战员因求战心切而产生了急躁情绪。朱德经常深入部队，说服大家耐心等待，说明敌人是会东进的，战机很快就会到来。

事情不出朱德所料，等待已久的战机终于来到。对方沉不住气了。五月十二日，得到情报说，王金钰部的右翼部队第四十六师一个旅和第二十八师，正由富田出发分路向东固进犯。当晚十时十五分，朱德、毛泽东向全军断然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敌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17)

正在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于五月十四日黄昏时分又截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驻在富田的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师部电台同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电台通报时，用明码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18)

他们以为红军和过去一样还没有无线电台，所以敢于大胆地用明码谈话。台长王诤立即把这个重要情报报告总部。与此同时，朱德、毛泽东还获悉：王金钰部的右翼部队正分两路东进：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沿中洞向东固攻击前进。

从富田至东固相隔二十公里，只有两条大道相通，都有一段是险峻峭拔的山岭间的隘路。

朱德、毛泽东在掌握王金钰部已经东进的确实消息后，立刻商量歼敌方案，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钻牛角尖”，即：红军主力从北面的郭华宗师和南面的蒋光鼐、蔡廷锴部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中隐蔽西进，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敌军后背，消灭王金钰部的第四十六师和第二十八师。五月十四日下午八时，朱德、毛泽东发出攻击富田敌军的命令。

“牛角尖”能不能“钻”通而又不被对方发觉，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五月十五日拂晓，各路红军按照毛泽东、朱德的部署开始行动。毛泽东在半夜来到从中路正面迎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找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进一步调查西进路线情况。经过调查，发现在东固至中洞大道南侧，还有一条过去不知道的小路。毛泽东立即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包围公秉藩师的右翼。这一改变，对歼灭该师具有重要意义。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等率领总部部分人员登上东固至中洞大道北侧的白云山，因为时间紧迫，毛泽东只能在一个小镇上留下字条，将这一改变通知朱德，并要朱德率领总部也上白云山。但朱德因为还不知道红三军已改变西进路线，在这天拂晓前仍按原计划率领总部由东固做上出发，沿东固通往中洞的大道向西行进。当到达白云山下时，同正在东进的公秉藩师的先遣部队遭遇。朱德立刻命令作为总部警卫部队的特务连，在林木丛生的山坡上进行阻击。公秉藩部先后以三个营的优势兵力猛扑过来。朱德指挥特务连且战且退，引着敌军向前走了二里多地。毛泽东在白云山上听到山下激烈的枪声后，立即指挥部队从山上扑下来，把追敌击退。朱德和毛泽东一起登上白云山，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担负中路的红三军已沿山间小路进到中洞南侧，在草丛密林中隐蔽前进。因为红军行动秘密，苏区人民又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后，得不到一点军事情报，始终没有发现红军主力的踪迹，误认为红军主力还远在宁都地区，便大胆地向东行进。当公秉藩师的后尾部队全部离开中洞后，红三军突然从高山上猛压下来。公秉藩师刚从北方调来不久，很不适应南方的山地作战。红军这一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使公秉藩师霎时间乱成一团，四处逃散。到下午四时许，歼灭公秉藩师大部。

与此同时，左路的红三军团也迂回到固肢，消灭公秉藩师的兵站，并于当天夜间从侧后攻入富田。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全部被歼。师长公秉藩被俘，他知道红军宽待俘虏，便混在俘虏中领了三元银元跑掉。副师长王庆龙被击毙。次日上午九时，红三军也进入富田。

多少年后，公秉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五月十六日早晨，我和平常一样，清晨运动完毕，率师直属部队从固肢圩出发。”“后方各地都平静得和水一样”，“沿途看不见什么征候”。上午十时抵达山坑，突然“在一声炮响下，步枪、机关枪齐发，山鸣谷应，响彻云霄。正在行进中的部队被打乱了，有的人马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横倒竖卧在山路和两旁的田地上。尚未死亡的官兵乱成一团，莫知所措。”“一个一万多人编成的师，一下子就被

歼灭光了。”(19)右路的红四军、红十二军，在追击中，又将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一个旅大部歼灭。五月十六日，各路红军在富田胜利会合。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富田战斗胜利结束。

五月十九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向白沙猛烈追击，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乘他们军心恐慌，士无斗志，将郭华宗的第四十二师一个旅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残部全部歼灭，共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战斗——白沙战斗胜利结束。

白沙战斗结束后，朱德、毛泽东按原定计划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向东横扫。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六师正奉南昌行营命令由南团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五月二十一日，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到达中村。五月二十二日拂晓，红军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分两路包抄中村，全歼该先头旅，重创高师师部。其余残部向乐安溃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立刻命令李松昆的第二十五师于五月二十三日由东韶撤往宜黄。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战斗——中村战斗胜利结束。

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于不便随军行动而留住龙冈。为了更好地指挥前方作战和做好战地地方工作，避免因事事需要请示中央局而贻误战机，五月二十四日在南团重新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朱德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国民党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所属胡祖玉的第五师、毛炳文的第八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开始由头陂等地经广昌向南丰撤退，五月二十四日深夜，朱德、毛泽东命令全军于次日向东急进，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占领南丰城。随后率领总部于五月二十五日到达宁都和广昌交界的洛口圩严坊村。当晚八时，朱德在严坊村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分析了敌军的动向，指出：“毛（炳文）、许（克祥）部二十三日早由洛口退，到二十四日午后才退完，估计敌人今日可在广昌、头陂一线集中，头陂之敌明天或许可集中广昌城。”“头陂敌人（毛部一师）有退却形势，我们以第一军团去打他，是可以击退他的，但三军团还是在吴村，如果我们打下头陂，追到广昌，则三军团相隔百里，赶不上增加（援），不易消灭敌人。因此，我们有集中两个军团全力去打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的必要。”(20)会议最后决定，全军于二十六日开到广昌县城西北面的苦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

五月二十六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苦竹后，得到情报说，在头陂的毛炳文部已向广昌撤退，广昌城驻有国民党军队三个师，有向南丰退却之势。当晚八时，朱德在苦竹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再次讨论：是按原计划先攻占南丰，还是改为先攻占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因此，我们应先夺取广昌城，击退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取得二次战争更好的胜利形势，然后猛追该敌，逼他放弃南丰城，使我们以后筹款工作更加容易。”(21)会议决定，次日开始进攻广昌城。

五月二十六日清晨，细雨濛濛。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冒雨直逼广昌城下，从北、西、南三面发起猛烈攻击。国民党军队凭借城外山头上的

坚固工事，阻击红军的进攻，掩护主力向南丰撤退。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每个山头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朱德和毛泽东登上城西面的乌石岗，在这里指挥战斗。晚上九时，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攻进城里，全歼城内守敌，夺取广昌城。

这次战斗，因国民党军队大部向南丰逃走，只歼灭胡祖玉的第五师一个团，师长胡祖五在城墙上视察阵地时被击成重伤，不久死去。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战斗——广昌战斗胜利结束。

广昌战斗前，何应钦、朱绍良曾把驻守福建建宁的刘和鼎部第五十六师调到安远策应广昌。广昌被红军夺取后，刘师匆忙地从安远撤回建宁。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朱德在广昌城北的沙子岭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讨论红军下一步行动问题。会议认为，因通往南丰城的桥梁已被破坏，此时如向南丰追击逃敌已赶不上。“在战略上和形势上，我们都应追击刘和鼎，先他夺取建宁城，以便以后的筹款。”(22)

会后，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三军团、红十二军主力，日夜兼程向东急进，直指建宁城，刘和鼎师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来到建宁城下，毫无戒备。五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趁敌不备，指挥红军从建宁城背后突然发起攻击。又命令一个师迅速渡过建宁河，从建宁城前面包抄。“刘和鼎在建宁城内无路可走，带了两个马并在河边抢了一只船，准备顺流而下。但由于自己不会驾船，同时水急滩险行不多远以及红军集中人力的射击，结果小船撞碎在岩滩石上，刘是在落水时，被马并们抓住腿，倒拖到岸这边来的。”(23)战斗进行到当日黄昏，共歼敌三个多团，夺取建宁城，缴获大批西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战斗，也是最后一个战斗——建宁战斗胜利结束。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打得痛快淋漓。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一方面军，从五月十六日到三十一日，短短半个月内在由西至东的八百里战线上，“横扫千军如卷席”(24)，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共歼敌三万多入，缴枪两万多支。此外，还缴获粮食、西药、电台、弹药等大量军雨物资。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了。

朱德后来说：“这一仗打下来是一个大的胜仗，可以说是三次‘围剿’中间最大的一仗。缴获非常之多，被打垮了的也多，有些是自己根本就不情愿打，自己就垮下去了。王金钰还是满清时编起来的陆军旧队伍，在作战中间捉了无数的俘虏，但都大批的放出去了。”“北面很长的一线，由吉安到建宁，都打垮了。”“这时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战争。”(25)中共中央在同年八月的指示信中，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也给予很高的赞扬，说：“一、三集团（军）二次冲破敌人的‘围剿’，十四日之内转战四、五百里，战败敌人在八师以上，这种伟大的胜利，是无可比拟的。”(26)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气焰。国民党各路军队被迫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

在这个时期内，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三月一日，蒋介石突然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四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为此事弹劾蒋介石。五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唐绍仪、孙科、许崇智、古应芬、李宗仁、陈济棠等，在广东又成

立一个“国民政府”，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粤系军阀还准备进兵湖南。蒋介石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惨败和国民党内部反蒋声浪的高涨，“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大骂其部属无能，不禁痛苦失声。”(27)

六月二日晚，朱德在建宁城外出席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分析打破第二次“围剿”后的形势，认为蒋军各部现已退出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暂时转入战略防御。两广的反蒋军队正准备进军湖南同蒋军作战。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28)红一方面军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转入战略进攻。基于这一分析，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进攻分三期进行。

会后，朱德、毛泽东按照会议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实施第一期工作计划，指挥主力部队向北推进到宜黄以南和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的闽赣边境，在这些地区积极开展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筹款等各项工作。

但不久就发现蒋介石有对两广军阀取守势而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的可能，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及时地改变原有部署，决定红军主力向东推进到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开展工作。因为这一地区地势偏僻，受敌人威胁较小；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有款可筹，一年以内不愁给养；群众很多，可以扩大红军。六月下旬，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开进这一地区。

在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分兵在赣东、赣南、闽西、闽西北的广大区域内，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大量给养和经费，整训军队，组建新部队，为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朱德等坚决从实际情况出发，毫不动摇地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一九四四年，朱德在总结这次胜利的经验时说：“一九三一年五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有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29)

十八、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来得非常快，甚至超出了红军原来的预料。第二次“围剿”在五月底刚被打破，第三次反“围剿”在七月初便开始了，中间相隔只有一个月，没有给红军留下多少休整和补充的时间。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三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五中全会，着重讨论。“剿共”问题。会后不久，蒋介石就在六月二十一日带着美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认为，前两次“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参加“围剿”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所以“围剿”不力。这次他下决心增调五个嫡系师到江西，担任“围剿”主力。他们是：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卫立煌的第十师，共计十万人，加上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非嫡系部队等，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计三十万人。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蒋、何都坐镇南昌指挥。

蒋介石对这次“围剿”非常自信。他认为以三十万装备精良的大军消灭三万装备很差的红军是有把握的。他表示：“这次‘围剿，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又说：“限三月之内‘肃清’江西共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

由于有前两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第三次“围剿”在许多方面都有改变。因为“围剿”兵力的增加和蒋介石的自信，在战略方针上把“步步为营”又改为“长驱直入”，在进攻部署上，把“围剿”军分为“进剿”部队和“驻剿”部队两部分。“进剿”部队担任“长驱直入”的任务，寻找红军主力作战；“驻剿”部队担任在已占领的地区修筑工事，作为“进剿”部队的依托，并就地“清剿”，巩固已占领地区。在行动上，把以一个师为一路独立行动，改为以两、三个师为一路，互相策应，避免被红军各个击破。对苏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企图使红军失去生存的条件。

第三次“围剿”来得那样快，那样突然，而红军各部还处在分散状态，主力远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这对红军自然是很不利的。六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朱德出席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南丰康都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分析了当前的军事形势，讨论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场选在什么地方问题。认为从当前敌人的态势来看，这一次“围剿”不大可能只集中一路进攻，很可能分成几路从不同的方向齐头并进，夹攻红军。但不管他们分几路进攻，红军仍应该“诱敌深入”，把他们引到赣南中央苏区腹地来打。朱德后来说：“我们知道这一次比第一、二两次更困难了，知道硬打是不行的。”因此，红军把未来的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场预定在赣南的兴国、雩都、宁都、瑞金地区。

七月一日，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以急风骤雨之势向中央苏区“长驱直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朱绍良的第三军团、蒋鼎文的第四军团、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共七个师的兵力，由南城、南丰方面向广昌、石城、宁都猛攻，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

令，指挥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孙连仲的第二军团、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共七个师的兵力，分别由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一线，向富田、东固、崇贤、沙溪、莲塘、宁都等地深入，实行“进剿”和“清剿”。他们的总的战略意图，是想把红军驱赶到赣江边而一举歼灭。

这次大举进犯虽然来得很快，很突然，但朱德、毛泽东仍旧沉着镇静地应付。他们当机立断，决定按照“诱敌深入”的方针，一边指挥留驻赣南的部分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进剿”军的前进；一边指挥正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回师赣南，诱敌深入到兴国、雩都、宁都、瑞金预定的作战地区，相机转入反攻，以打破第三次“围剿”。

仅有三万多人的红军，在没有得到必要休整的情况下，要打破超过自己十倍的三十万敌军的大规模“围剿”，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朱德十分清楚，要胜利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除了确定正确的作战方针之外，还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军队的素质，强调集中指挥和统一训练，以增强红军的战斗能力。他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分别在七月七日和七月十四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连载。

朱德在文章中指出，在当前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怎样创造铁的红军呢？朱德提出了六个基本条件：

第一，“确定红军的阶级性。”文章中说：“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

第二，“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文章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工农红军成长的过程来论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政治部及政治处）实行它的领导作用。”

第三，“政治训练的重要。”文章中说：“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

第四，“军事技术的提高。”朱德一向重视不断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他在文章中说：“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我们从敌人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第五，“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文章中说：“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为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

第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朱德指出：“要使红军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灭它的阶级敌人的武装。”

正当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进攻的时候，朱德发表这篇论文，对提高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作战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也有很大的意义。

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很快。七月上旬，何应钦指挥左翼集团军日益逼近红

一方面军总部驻地福建建宁。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红军的主力所在。何应钦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已由闽赣边界向广昌、石城、宁都转移，命令军队继续向南推进，于七月中旬先后进占{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020_0257_1.bmp}广昌、宁都，结果并没有找到红军主力，扑了个空。接着，他又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可能在宁都西北地区，命令军队奔向这一地区，又扑了空。陈铭枢指挥右翼集团军按计划向富田、东固、宁都一带推进。当时天气炎热，他们进入苏区后，因地形不熟和到处受到袭扰，又找不到红军主力作战，东奔西突，陷入狼狈的困境。朱德曾这样描写道：“他们追着追着，天天爬山，还没接火，已经不知累死热死好些了。”

这时，如果红军主力从闽西和闽西北驻地直接插向预定的作战地区宁都、兴国一带，将同敌军主力相遇，对红军是不利的。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采取“磨盘战术”，向南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敌军进攻的锋芒，从中央苏区南部插入敌人背后。朱德通俗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先躲开他（敌人），疲劳他，等他疲劳不堪了，再开始打。”

七月十日前后，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和总司令部，由闽西、闽西北驻地出发，从敌人的左侧，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向南急进。盛夏季节，烈日当空，气候闷热。再加上缺少粮食，吃饭极度困难，每天只能以稀饭充饥。但是，红军依然精神振奋地向中央苏区南部进发。

七月中旬的一天，朱德率领队伍由广昌的尖峰向石城、瑞金方向前进，路经北坑时见到当地的游击队员热情地前来相迎。“朱总司令从马背上跳下来，走到大家面前，用关切的口吻告诉他们：敌人许克祥师的部队已经从南丰出发，尾随我们。他们的前头部队已经到了尖峰的黎花山一带。我们部队按照毛委员的决定，要甩开这里的敌人，转到后面去消灭他们。说到这里，朱总司令关切地叮嘱游击队员们：你们要提高警惕，坚持斗争！说完，矫健地跨上坐骑，朝大家挥挥手，带领部队继续前进。”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队伍，在连续十几天的急行军中，经安远、宁化、长汀、瑞金等地，绕道千里，于七月二十二日，到达零都北面的银坑地区，隐蔽在深山峡谷中。在这里同红三军主力、红三十五军和由广西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的红七军会合。朱德、毛泽东率部在银坑地区休整了几天并观察了敌军动向后，于七月二十八日又率部向西北方向转移，来到兴国北部的高兴圩。部队在这里一面休整，一面准备转入反攻，并进行了战前的政治动员。

不久，国民党军队已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集中，并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有西渡赣江的意图，便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形势险恶，红军应该从哪里突破敌军的围攻？朱德、毛泽东在率部到达高兴圩的当天，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针。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按照这一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于七月三十一日向全军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

先夺取富田、新安。”并命令红一、红三两军团，于八月二日夜间开始向富田、新安发起进攻。进军途中，得知红军的行动意图已被敌军发现，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已抢在红军前头进占富田。这两个师是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战斗力强。为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朱德、毛泽东立刻改变原定计划，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返回高兴圩，再寻歼敌机会。

这时，国民党各路军队云集在兴国及其周围地区，将红军包围得严严实实，使红军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极端危急的局面下。兴国县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失陷，只剩丁高兴圩及其周围几十里地方留在红军的控制下。怎样击破敌人的严密包围圈，成为放在朱德、毛泽东面前的严重课题。

朱德、毛泽东对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蒋光鼐的第一军团、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和蒋鼎文的第四军团，多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不易击破；而正在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容易被击破。

根据“避实就虚”的原则，他们立刻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以部分红军会同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伪装红军主力，向西佯动，示形于敌，把战斗力较强的陈诚、赵观涛、蒋鼎文各部吸引到赣江边去；把蒋光鼐、蔡廷锴部牵制在兴国北面。出其不意地集中红军主力从中间突破包围圈，迎击正向兴国东部的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部，取胜后相机扩大战果，各个击破敌人。

八月五日晚，朱德、毛泽东趁赵观涛部和陈诚部被部分红军向西吸引到赣江边的万安、良口地区的机会，率领红军主力在夜幕掩护下，从崇贤和兴国两地敌军之间仅二十公里的空隙中，冒着绵绵细雨，踏着打滑的山间小路，悄悄地翻越陡壁悬崖，沿着深壑峡谷，迅速地向东穿插。朱德不时地站在三岔路口，关照指战员们不要拥挤，告诉大家要一个一个地跟着走。经过一夜又半天的急行军，于次日午时到达莲塘，部队隐蔽在莲塘附近的吴公山上的密林中。

红军主力刚到莲塘，获悉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已进到莲塘以北十五公里的良村，它的前卫部队第四十六师第二旅已进到莲塘附近，同红三军团的警戒部队接触。朱德、毛泽东判明，这是各路“进剿”军中战斗力较弱的一路，又是北方军队，不善于南方的山地作战，决定迅速歼灭该敌。

朱德深知，这是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第一仗。能否打好，对以后的战斗关系极大。为了有把握地打胜这一仗，他到莲塘后没有休息，就登上莲塘附近的大窝峡，打开军用地图，手举望远镜，向对方来路十万洲、半经方向的狭长深谷盼望，仔细观察敌军动向，并向当地群众详细了解这里的地形情况。

在弄清敌情和周围地形后，朱德还和毛泽东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并指挥部队于当晚隐蔽进入阵地。

部队进入阵地后，“朱德同志亦亲临督战，在阵地上对战士们说：”敌人出了告示，谁先拿下莲塘，就奖给二十万元。你们怕不怕呀？”“不怕！”战士们回答十分响亮。朱德同志笑道：“对啰，别看他们叫得凶，明天早上四点钟就缴他们的枪啰！”

八月七日拂晓，朱德、毛泽东趁敌不备，下达了攻击命令。前敌指挥彭德怀立刻指挥各路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上官云相部发起总攻。红军指战员迅速冲下山岗，同敌军展开白刃战。只用了两个小时就结束战斗，全歼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第二旅和由良村派来的一个侦察营，击毙第二旅旅

长谭子钧。上官云相只带了两三个参谋副官和几个马弁逃回龙冈。这次战斗打得如此神速，上官云相部被打得晕头转向。有个俘虏说：“昨天通报还说你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围在高兴圩，那晓得今天你们却在这里包围了我们！”（11）

接着，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挥戈北向，乘胜进取良村。朱德带领一个警卫排向良村插去。在途中同正由良村增援莲塘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一个旅遭遇。按预定计划，红四军应该抢先占领路旁的山头，但他们没有按时到达，所以被郝部抢先占领了。朱德到达山脚下时，才发现这个情况。当时，他身边只有几个参谋人员和一个警卫排，立刻投入战斗，坚持到大部队赶到后，经过激战，歼敌一个团，击毙旅长张奎诏，残敌向良村溃退。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追到良村，将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包围起来，发起猛攻，又歼敌一部。在追击时，击毙第五十四师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溇。上官云相和郝梦龄只得夺路向龙冈逃去。良村战斗只用了几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

莲塘、良村战斗胜利后，红军指战员的斗志更加高昂，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却一落千丈。朱德、毛泽东决定发扬红军连续作战的传统，乘胜北进，再歼龙冈敌军。这时，龙冈驻军有周浑元的第五师四个团，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还有从莲塘、良村溃退去的约两个团，共八个团的兵力，八月八日午后二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于九日拂晓向龙冈发起总攻击。当部队行进时，在途中得知龙冈守军已有准备，在驻地周围修起许多坚固工事，又获悉毛炳文的第八师刚刚从君埠、南陵地区撤回黄陂。朱德、毛泽东立刻果断地改变原来计划，不去龙冈，出其不意地改去黄陂攻打立足未稳的毛炳文师。

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毛泽东在君埠召开战前动员大会，并做了周密部署：以红三军佯攻龙冈，牵制周浑元师，转移敌军的注意力，麻痹黄陂的毛炳文师；红军主力却转而向东，突然进攻黄陂，打他个措手不及，朱德、毛泽东随即率领红军主力向黄陂急进。经过三天急行军，于八月十一日清晨赶到黄陂附近，将总部指挥所设在城江山上的松林里。红四军、红十二军担任主攻，从黄陂南侧攻击；红三军团、红七军向黄陂东侧迂回，断敌后路，阻击东面增援之敌。

各路红军进入阵地后，很快同毛炳文师接上了火。当天中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朱德、毛泽东指挥各路红军攻进黄陂街，歼敌两个团。毛炳文率余部向洛口、宁都突围。红军乘胜追击二十余里，又歼敌约两个团。当天下午，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打得干脆利落，时间不长，缴获颇多，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算，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12）

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红一方面军在五天内连续打了莲塘、良村、黄陂三个胜仗，共歼敌万余人。

在黄陂战斗中，从毛炳文的师部缴获一份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紧急电报，称这两个师已向黄陂地区开来，现已进到离黄陂仅十公里的砍柴冈。毛泽东、朱德根据这份紧急电报和其他有关情报分析：

国民党“进剿”军主力被部分红军向西引到赣江边后，并未找到红军主力，已发现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莲塘、良村两次战斗后，他们又发现红军主力已在东面黄陂一带集结，并估计有北上进攻临川的意图，于是，蒋介石、何应钦便命令敌军主力第一路进击军、第二路进击军和第一军团掉头向东，向黄陂地区猛扑过来，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围歼红军主力于这一地区。

毛泽东、朱德断定敌军主力很快就会到来，红军不宜在黄陂久待，命令部队于当夜立刻离开黄陂，向君埠地区隐蔽集中，休整待机。果然，第二天（八月十二日）赵观涛的第六师、卫立煌的第十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和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就气势汹汹地进占黄陂。因为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个空。接着，国民党其他部队也很快从四面八方方向黄陂、君埠开来，从东、南、北三面对红军主力形成密集的大包围，准备进行决战。

这时，红军的处境是第一次反“围剿”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如果决策和指挥稍有失误，便会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八月十三日晚，朱德和毛泽东在君埠一座家庙里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出席会议的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需要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军，掩护红军主力悄悄西进，回到兴国的北部和西部隐蔽待机。

会后，朱德、毛泽东计对蒋介石、何应钦害怕红军北攻临川的心理，命令红十二军伪装红军主力向乐安佯动，并指示他们要白天行军，大造声势，故意暴露在敌军面前，使他们造成错觉，误认为红军主力真的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

八月十五日夜，在红十二军佯动的掩护下，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悄悄地由君埠地区向西急进，迎着正由西向东开进的敌军，从蒋光鼎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仅十公里的夹缝中穿插过去，突破重围，他们借着星光，翻山越岭，攀藤附葛，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蜿蜒西进。在整个夜行军中，朱德始终手拿指南针，走在队伍的前头。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到达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一边休整，一边静观敌军动向。后来，朱德谈起这次突围的情景时说：“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二十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13）

红军主力在白石、枫边休整期间，朱德出席中央局和总前委会议。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朱德特别强调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训练。为了密切军民关系，他亲自带领红军指战员帮助驻地群众割禾、挑水、劈柴……。驻地群众见到这种情景深受感动，自发地组织起慰劳队、洗衣队，用最好的食物慰劳红军，帮助红军洗缝衣服，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封锁消息。这种鱼水般的军民关系，成为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经过半个月的休整，红军的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而国民党军队却丝毫未觉察。

为了掩护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向北佯动的红十二军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率领下，相机攻占了乐安县城。这下，蒋介石、何应钦更以为这一支确是红军主力，并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将进攻临川，急令卫立煌的第十师由黄陂速回临川，又令赵观涛的第六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陈诚的第十四师等部由黄陂、君埠地区向北追击红十二军，准备决战。红十二军趁此紧紧地

牵住敌军主力，专走险路。红军携带的是轻武器，行动起来非常灵活。国民党军队携带了许多重武器，行动十分不便，被拖了半个月，弄得饥疲不堪，士气沮丧，最后还是没能找到红军主力决战。

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发现又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急令“进剿”军主力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这时，国民党军队已陷入饥饿疲惫的困境，红军却已养精蓄锐，休整了半个月。为了继续调动敌军西进，进一步疲劳他们，寻找更加有利的战机，九月初，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再向西转移到兴国、赣县、泰和、万安之间的山区，隐蔽集结。国民党“进剿”军主力回头开到兴国北部时，又扑了个空。

由于毛泽东、朱德的巧妙指挥，进入中央苏区已两个月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东碰西撞，多次扑空，始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实行决战，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再加上苏区的坚壁清野，游击队、赤卫队的随处袭击，把进犯军搞得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同红军作战。国民党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官陈铭枢也叹息道：“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14)这时，反蒋的两广当局正向湖南进兵，也对蒋介石构成威胁。这样，蒋介石不得不结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下令各路军队撤退。

朱德、毛泽东得知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消息后，认为这是对他们进行袭击的好机会。这时，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蒋光鼐的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正由兴国经高兴圩、老营盘向泰和、吉安撤退。朱德、毛泽东准备抓住这一时机，出其不意地先消灭正在运动中的蒋鼎文师和蒋光鼐的两个师，然后相机扩大战果。

九月六日晚，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向高兴圩、老营盘疾驰。当天晚上，各路红军进入阵地。

次日拂晓，战斗打响了，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首先抢占蒋鼎文师北撤时必经的黄土坳，切断了他的先头旅同后续部队的联络，从北、南、西三面包围这个先头旅，发起猛攻。下午二时左右，全歼这个先头旅，俘敌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枝二千余件，迫击炮十门。

同一天，朱德、毛泽东又指挥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圩的蒋光鼐的两个师发起攻击。这一次战斗没有取得胜利。在历时两天的激战中，虽然毙伤蒋部二千余人，但因为战斗力较强的蒋部已先占据有利地形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战斗打成对峙局面，红军的伤亡同敌军几乎相等。朱德在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时，曾这样说过：“这一仗打得不好，确是骄傲一点。当时，大家都很高兴打。其实那计划是错了的。因为他们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时，又不可能完全消灭他。”“如果当时不打蒋，蔡，专打蒋鼎文的部队，可能缴到更多的枪。”他又说：“凡是高兴的、着急中决定的事情，总是有问题的。”(15)最后，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主动撤出战斗。

国民党军队在老营盘、高兴圩战斗中受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后，不敢再经这条路北撤，改变了撤退路线。朱德、毛泽东在九月十一日午后九时，命令红军主力向东急进，进行追击。十五日拂晓，红军主力赶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张家背附近，抢先控制有利地形。韩德勤师的六个团和蒋鼎文师的一个炮兵团进入红军的伏击圈。朱德、毛泽东乘其不备，指挥部队发起攻击，将他们全部歼灭。韩德勤被俘后，扮成士兵混在俘虏中逃走。这次战斗共歼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枝四千五百余件。

这次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遇敌机轰炸牺牲。朱德痛惜他说：“我们有一个有名的大将黄公略，被飞机击死。黄同志是智勇双全的人材，是我们顶大的损失。”(16)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实行“诱敌深入”和“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其中除高兴圩战斗打成平手外，其他五次战斗都取得很大胜利，共击溃敌军七个师，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亲自指挥三十万敌军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三万红军较量了两个半月，最后仍以失败告终。蒋介石“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再次破产。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出现了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新形势。首先，国民党各路军队已退出中央苏区，转入守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难以再集中兵力发动新的“围剿”。第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矛盾开始激化，民众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九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责问：“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请问：国民党的军阀们怎样实行着他们‘保国卫民，的责任呢？”(17)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镇压的声浪日益高涨。第三，各派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两广当局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更趋发展。第四，国民党军队退出中央苏区后，苏区内的地主武装因失去靠山而恐慌不安。这些，都为红军的扩大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

九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命令全军主力向福建的长汀转移。命令中指出：“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二十五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七天行程（第五天休息一天）开到汀州城集中。”(18)十月二日，朱德率领方面军总部抵达长汀。

红军在长汀经过短暂休整后，分兵波浪式地向闽西、闽西北和赣南、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展开工作，主要任务是：筹措给养，整训部队，扩大红军，拔掉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开拓新的根据地，将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地方武装等。在这些任务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拔掉革命根据地内部残留的一些由地主武装控制的上围子。朱德、毛泽东于十月十四日发出训令说：“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19)

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红一方面军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取得很大成绩。先后攻克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并在长汀、雩都、武平等县开展工作，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使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扩展到三十个县境，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同时，在新占领和重新收复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了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达到全盛时期。

取得这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经验是什么？朱德作过这样的概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
(20)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共同创立的基本作战原则已经形成。这些作战原则，对以后的中国革命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十九、参加中华苏维埃一大前后

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这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后叛变，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九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博古）负总责，临时中央成立后，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动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在新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更加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对立。在九月二十日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

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相对抗，为了统一领导各苏区和各路红军的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原来准备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但是，由于各地代表尚未选出，交通不便，中央苏区又正准备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因此，项英、毛泽东、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于六月二十日发出通令，将大会延期至十一月七日举行。

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要先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召开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朱德、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错误地批评毛泽东、朱德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政治、红军、工会运动等决议案。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错误地批评中央苏区的党，“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而立三路线的残余，右倾机会主义局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严重。”提出“要集中人力反对右倾”。在政治决议案中，指责中央苏区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提出“要坚决的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并强调：“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斗争”，“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反对农民的落后意识”，在红军问题决议案中指责说：“目前红军中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游击主义的传统，还是深远的保留着”，“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提出：“在红军中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样为目前第一个最大任务，只有在无情的坚决斗争中，才能走到国际的正确路线上，才能保护红军团结和战斗的提高。”在这个决议案中，还规定在红军中取消党的委员会，以政治委员为全权代表，代替党委会的集体领导。

尽管这样，中共临时中央对这次大会仍很不满，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批评这次大会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

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在临时中央看来，这次大会只批评毛泽东等是“狭隘的经验论”远远不够，应该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苏区党代会闭幕后，朱德又于十一月七日出席在瑞金以东的叶坪举行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开了十四天。出席的正式代表有六百一十人，列席代表有五百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琼崖苏区；还有些来自红军、全总、海员等处。

代表大会开幕那天上午，在叶坪广场举行阅兵典礼。受检阅的红军队伍，身穿整齐的灰布军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排排站在广场上。朱德、毛泽东等登上主席台。随后，他们在总参谋长叶剑英陪同下，骑马检阅了部队。下午，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项英致开幕词。晚上，在会场附近举行提灯晚会。朱德被代表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十一月九日，在大会主席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又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十一月十五日，朱德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他走向主席台时，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久久不息。朱德首先概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说，中国工农红军产生于中国的土地革命，这在世界上要算是一个特点。中国工农红军是经过三、四年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从游击战争中日渐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他接着说：中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有阶级性的。它的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使它能够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必须努力扩大红军的数量，提高红军的质量，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政治、军事的教育，创造铁的红军。

十一月十九日，大会进行选举，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六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会上举行隆重的授旗授章典礼，以表彰红军指战员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朱德获得大会授予的奖章。大会还通过关于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草案、经济政策的规定、红军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十一月二十日，代表大会闭幕。

十一月二十五日，由十五人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兼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取消第一方面军番号，所有红军统一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下设九部一局，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

当时，各苏区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苏区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但是，中共临时中央的着眼点，是基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片面地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要求“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似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近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中共临时中央起草并为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规定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

对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的。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驻在江西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这个部队里工作过，共产党的主张在这个部队中有一定的影响。

一九三一年的中原大战中，西北军的重要主力孙连仲部投向蒋介石，被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该路军总指挥，于一九三一年春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剿赤”。第二十六路军是北方军队，并不愿意去南方同红军作战，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中，第二十六路军的第二十六师被红军歼灭过半。那些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曾耳闻目睹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和红军官兵一律平等的事实，看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士兵过同样艰苦的生活。他们被释放回去后，便把所见所闻在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中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要求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又引起第二十六路军的强烈反响。蒋介石对“杂牌军”的种种歧视和压制，更激起官兵们的极大愤慨。

赵博生等和地下党组织，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决定派袁血卒（又名袁汉澄）到瑞金向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等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听取指示。袁血卒到瑞金后，先在红军总司令部见到朱德。袁血卒回忆说：

“到了总司令部，朱总司令很快在他的宿舍接见了。朱总司令以和蔼的态度、亲切的语调问我：‘你是地下党员吗？’我说：‘是。我是朱瑞叫来的。’他亲手给我倒满了一碗水，继续问：‘你们二十六路军有多少人？’我说：‘浦口点名时有两万人，实际上没那么多。后来病死了不少。’朱总司令说：

‘这么干好得很。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创造了第一个红军，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二个红军。你们能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你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样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要报告毛泽东同志。’”

第二天，朱德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到会的有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有左权、李富春、刘伯坚。会议听取袁血卒的汇报，并讨论了起义的具体部署。会后，毛泽东接见了袁血卒，对武装起义作了重要指示。袁血卒带着朱德、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迅速返回宁都，并向赵博生、董振堂和地下党支部书记刘振亚等作了汇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率领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名官兵，带着两万支枪，在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义后，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第五军团。经毛泽东、朱德共同签署，委任季振同为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第五军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第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

朱德十分关心这支刚刚获得新生的部队。十二月十六日，起义军刚开到苏区石城地区，朱德就从瑞金赶到这里。他去看望起义军的伤病员。伤病员

们流着眼泪说：“在宁都时，因痢疾病死了几千个弟兄，宁都城的郊区埋满了弟兄们的尸体，都无人过问一下。今天到了红区，不但为我们治病，朱总司令还来看望我们，这真是白区红区两重天呀！”

第二十六路军都是北方人，在南方有语言隔阂，难以做群众工作，在生活上也有很多困难。为了帮助他们，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命令从红军中调一批战斗员充实红五军团。

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德出席在石城的秋溪举行的庆祝整编胜利大会，并在会上讲话，勉励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巩固整编成果，不断加强政治和军事训练。二十四日，朱德又出席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叶坪召开的庆祝红五军团成立和欢迎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大会。他在会上讲话说：宁都暴动有很大意义，希望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能和我们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及帝国主义。

十二月三十日，朱德和王稼祥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指出：“苏维埃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死敌”，要“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而国民党却“把东三省送给了日本”，还“不准兵士抵抗”。号召：“全国被压迫的兵士们，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哗变到红军中去！打倒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与革命的工农群众一起努力！”

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后，不少官兵都想见一见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凡是同朱德谈过话或是见过面的人，都对他的平易近人和简朴作风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参加宁都起义的孙毅回忆说：

“我最早见到朱总司令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当时，我们宁都暴动的队伍开进苏区整编。整编前，我在赵博生同志兼任军长的十四军军部任参谋。赵让我首先带着近三百人的参观团到瑞金参观。”“第二天，听说朱老总要来给我们讲话，大家很高兴。早饭后，我把队伍带到驻地的祠堂前，我对大家说：‘今天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要来讲讲话，我们要遵守纪律，注意听，能做笔记的做笔记’……我这么说着，朱德同志已经来了，他说：‘我就是朱德。’我一听，赶忙从讲台上下来，请他上台讲话。朱老总讲了个把钟头，主要讲了红军与白军的区别；为什么要当红军；为什么要打白军。他说：‘红军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的，白军是代表地主、土豪、资本家的利益的。我们当红军就是为了解放广大劳苦大众的。就像《国际歌》里讲的那样，广大穷人要坐天下。’他讲的通俗易懂，大家很受教育。”(11)

另一位参加宁都起义的苏进也回忆道：

“大约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一天上午，季振同、卢寿椿和我三人，在刘伯坚的陪同下，到瑞金东北十五里的叶坪（当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去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军委其他首长。”“朱总司令的房间里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桌子，几条凳子，中间地上放着一个炭火盆，床上一条红色的长毛毯子，算是这里唯一的高级用品了。朱总司令热情地接待我们，亲自夹木炭，把火生得旺旺的，让我们围炉喝水。我们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请他讲解十大政纲中我们不大了解的部分，并请他谈谈自己的经历，如何从旧军队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很高兴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大家愉快地谈着，不觉红日西沉，天色已晚，我们就住宿在叶坪了。”(12)

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不久，朱德和周恩来介绍季振同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支旧军队很快成为一支红

军的中坚力量，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日益扩大，中央红军不断壮大。但是，从全国总的形势来看，革命力量仍然是弱小的。

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估计革命的力量，相继下达许多错误指示。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提出：“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断言：“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13)十二月三日，在一个紧急通知中要求：“尤其是中央区，现在必须立刻向敌人进攻，向西南发展，同湘赣苏区打成一片。”(14)第二天又发出训令，再次要求，“应以红军主力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15)。同月六日，在《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十二号电》中提出：“江西敌情现侧重保持临川至宁广之线，以固南昌，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如何望讨论执行。”(16)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这样估量当前的形势：“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稀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根据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设想，他们要求红军立即行动，“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17)

毛泽东、朱德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这时仍然是敌强我弱，不赞成中共临时中央对形势的过高估量和占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也不同意红军主力向西进攻夺取赣州、吉安等中心城市的意见。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多次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当时最迫切需要确定的问题，是要不要攻打赣州。对此，会上发生了争论。参加过这次会议的聂荣臻回忆说：

“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同志也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中央一月九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赞成打的占了多数。……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18)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只得执行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局会议的决定。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提出中央红军的目前任务应该“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

前途。”(19)训令还规定红三军团、红四军为主作战军，江西、闽西的六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以彭德怀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陈毅负责指挥支作战军。后来，红三军、红五军团也参加了攻打赣州的战斗。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地处贡水和章水两条河流的汇合点上，东、西、北三面环水，唯有南面是陆地，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赣州又是赣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赣、闽、湘、粤四省的交通咽喉。国民党军队为了控制这个战略要地，在又高又厚的城墙周围又修筑了密集的堡垒群，防御工事十分坚固，素有“铁赣州”之称。城内驻有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是马崑，约三千人。此外，还有集结在这里的各地地主武装约一万人，守军共达一万三千人。离赣州北面不远的峡江、吉安、万安等地，驻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的第十八军，随时可以增援赣州；在赣州南面粤、赣边境的大庾、南雄、韶关一带，还驻有粤军陈济棠的部队。地形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对红军都是十分不利的。

一月十人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命令部队向赣州开进。二月四日，进攻赣州的战斗打响了，首先扫清了外围工事。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攻城。由于地形不利，大雨使挖坑道难以进行，守军又进行顽强抵抗，所以，经数日围攻和多次坑道爆破都未奏效，红军伤亡很重。二月二十八日，朱德、王稼祥赶到赣州城附近的红三军团总指挥部驻地，同彭德怀一起指挥攻城战斗。二月二十九日，陈诚奉蒋介石的命令，派罗卓英指挥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和两个独立旅共约两万人，由泰和地区驰援赣州，进至赣州西北郊。攻城红军共约一万四千人，双方力量悬殊。罗卓英以一部潜入赣州城内，会合守军向红军攻城部队出击；以另一部包抄红军侧后，使红军处于遭受内外夹击的危险境地。

三月一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又发布训令：“我军围攻赣城直到现在，经过二十四天，中间一度爆炸，以技术不精，攻城未克，而敌援已至。可是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开展中国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红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每一个红军战士，应该克服一切困难，迅速的完成这个巨大的使命。”(20)尽管如此，由于双方力量对比相差大大，守军占据有利地形，红军经过几天激战，仍不能攻进城去。中革军委不得不在三月七日下午下令撤围赣州。

这次攻打赣州的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红军伤亡巨大，仅红三军团就损失三千多人，还丧失了发展苏区和扩大红军的有利时机，教训是沉痛的。

朱德对这次历史教训，在若干年后仍牢记心中，并经常用来教育后人。一九四四年他曾指出。

“这一胜利（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作者注）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

又保障不了供给。”(21)

曾在朱德身边工作的沈毓珂回忆说：

“一九六一年二月，朱德同志经江西铅山县到闽西视察。

途经武夷山时，汽车沿着公路盘旋而上，到达岭头时，他特

意走下车来，爬到一个小山包上盼望了好久。当他看到那一带层峦叠峰，连峰矗天的形势，曾感慨万分地说，“一九三二年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力推行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当时以红军一部分去攻打赣州，结果没有打下来。

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方针，提出向闽、浙、赣地区挺进，从这一带一直向浙江方面发展，但这正确主张未被采纳。结果力量分散，使我军更加被动，直到毛主席率部攻下漳州后，才扭转了当时的形势。”(22)

那天晚上，往事仍然萦绕在朱德心头，使他久久不能入睡，挥毫写下《经闽西感怀》：

不听仙人指：

寻求武夷巅，

越过仙霞岭，

早登天台山，

赣闽成一片，

直到杭州湾。

出击求巩固，

灭敌在此间。(23)

撤围赣州后，朱德等指挥红军主力转移到赣州以东和以南地区休整。三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发出整编部队的训令：红四军、红十五军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七军、红十四军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红三军、红十三军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

三月中旬，朱德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会议总结了打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经过争论，最后决定红军主力沿赣江两岸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

根据江口会议的决定，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于三月十八日发布训令，指出：“我工农红军应乘着目前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时机，积极的向苏区邻近几个中心城市威胁，广泛的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包围几个中心城市，以影响时局，以变动形势，造成许多夺取中心城市的优越条件，而相机夺取之，以开展和迫近革命在湘鄂赣首先胜利的前途。”训令中规定：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训令中对两路红军的任务的部署是：

“西路军应赤化河西，贯通湘赣及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以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中路军（第十四军另有任务）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以威胁吉安、樟树、临川、南丰、甫城之敌，俟敌情变动，即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24)

三月十九日，朱德率领中革军委移驻雩都。同月下旬，中革军委根据中

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改中路军为东路军，向闽西活动一段时间。“其主要任务是在消灭闽西主要敌军张贞，乘胜打击侵入苏区的粤敌，以巩固并扩大闽西苏区，并筹足红军作战经费，以应付目前开展着的锐利的阶级斗争。”(25)以后再按原计划，集中东、西两路军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这以后，毛泽东率东路军开赴闽西；彭德怀、滕代远率西路军西渡赣江，进到上犹、崇义地区。朱德、王稼祥率中革军委移驻长汀。

东路军入闽后，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月十日攻克龙岩，歼灭闽军张贞部一个主力团。接着向南推进，四月二十日攻克沿海的闽南中心城市漳州，再歼张贞部约四个团，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批军用物资。大部残敌向闽粤边境溃退。这一胜利，“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斗、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26)

二十、第四次反“围剿”

一九三二年春，民族危机更趋深重。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尚未结束，在东北又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悲愤填膺。可是，在三月间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基本国策，准备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五月一日，何应钦抵达南昌策划对这一地区的“清剿”。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侵华日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将坚持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五月中旬，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又侵入赣西南大片地区，向零都窥进，对中央苏区构成很大威胁。

六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大规模“围剿”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先把重点放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革命根据地；第二阶段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五月下旬已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随即调集九十个师共五十万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于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

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势，中共临时中央在六月五日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要求：“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

根据临时中央这个指示，六月八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在福建上杭县的官庄，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入赣粤军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东路军迅速回师赣南，同西路军会合。次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率领东路军由闽西出发，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向赣南急进。回师途中，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军团，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军行动。同时，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

六月二十一日，原东路军到达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时，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决定，首先向入赣粤军的后方基地——粤北的南雄发起进攻，并于当天命令全军：“首先要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

命令下达后，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立即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向南雄推进。彭德怀、滕代远也率领红三军团，从湘南回到赣西南的大庾东北地区，以箝制由赣南后撤的粤军。

侵入赣南的粤军，得知红军主力由闽西回师赣南，并有夺取它的后方南雄的意图后，急令李振球、叶肇两师共八个团向大庾集中，企图在东、西两路红军会合前实行各个击破。七月一日，当李、叶两师向南推进到南康、大庾间的池江附近时，遭到红三军团截击，四个团被击溃。七月四日，红三军团开始向大庾粤军发起多次围攻，但因粤军凭险固守，双方打成对峙。

七月七日，粤军第四师由赣南的信丰到达南雄附近的乌径，独立第三师、第五师由韶关增援南雄，企图南北夹击由闽西回师的红军部队。七月八日至

十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等部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同这两股粤军展开激战，经过三天三夜的肉搏战，击溃粤军十个团。这次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斗的聂荣臻回忆说：

“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经过大庾、水口等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并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进犯。这就使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但是，这次战役也有不少教训，主要是前方误报敌情，红军兵力又不集中（红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只将敌军击溃，并未大量歼灭，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朱德很重视这次战役的教训，在七月二十日发布训令说：

“当战斗间，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常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临机应变的处置。在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的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这是我各级指挥员须特

别注意的。此次作战中，如三军团误报大庾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转变作战目标。又五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我军追蹶不及，致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使该敌不能迅速歼灭，延长战局至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量不足，亦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又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

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原来要求，红一方面军应乘胜立刻从赣州上游西渡赣江，沿江北上，夺取赣州、吉安，以打通同湘赣苏区的联系。

半年前进攻赣州已曾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现在该怎么办？这时，红一方面军各军团正在信丰一带休整。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由后方来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讨后，认为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已集结四十个团以上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

按照这一决定，朱德命令部队由赣粤边境北上，八月上旬先后到达兴国、零都地区。

随着红军的北上，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也沿赣江西岸北进，在八月上旬到达遂川地区，第二十八师向万安集结，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八月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在兴国县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在兴国召开会议。这两个会议重新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认为赣江以西有敌军重兵防守，红军如按预定计划由万安西渡赣江，必将陷于被动；而赣江以东的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特别是乐安、

宜黄地区只有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驻守，容易攻克。基于这个分析，决定放弃西渡赣江的计划，改为北上直取乐安、宜黄。

在这期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七月二十五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电称：“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中央局同意这一提议后，八月八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

当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训令指出：“从目下敌军配备上与行动上看来，判断敌军是以扼制我军渡过河西贯通湘、赣之目的，将主力摆在河西，赣东敌军数量较少，其中以乐安、宜黄方面为最薄弱”；“应该针对着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与我军运动较利的一面，集结本方面军的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高树勋所部。”

八月十六日拂晓，进攻乐安城的战斗打响。第二天下午二时，乐安城被攻克，全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一个旅又一个营，共俘三千余人，击落飞机一架。红一方面军北进首战告捷。

接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红军乘胜前进，又先后击溃高部两个团，直抵宜黄城下。驻守宜黄城的是高树勋部第二十七师的四个团，还有保安队一个团。八月二十日拂晓，红军发起猛攻。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在当晚将守军大部歼灭。逃往临川的余部也被红三军在追击中大部消灭。

至此，乐安、宜黄战役痛快地结束了。共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虏五千余人，缴获枪枝四千余件。在此期间，红十二军乘胜进驻南丰县城，闽西独立第七师攻克宁化县城。红一方面军在七天内取得的重大胜利，“不仅直接援助赣东北、赣西北，策应鄂豫皖、湘鄂西，并且调动了赣河敌人，使粤敌难于深入中区，给河西苏区及红八军以发展机会，并可进逼吉安。”

乐安、宜黄战役胜利结束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指挥部队向东急进。八月二十四日进至南城近郊，准备乘胜攻取南城。经过实地侦察，发现南城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地势险要，城内外有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的三个师共十七个团凭险固守。这时，周围形势也发生新的变化：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十四、九十等师正在东进，已逼近乐安，企图增援南城，同红军主力作战；而红一方面军自北进以来，行军作战多日，没有得到休整，全军上下已很疲惫。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按原计划硬攻南城不易得手，而同敌军在南城城下对峙则极不利。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放弃攻占南城的计划，也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北上夺取抚州、南昌，而是改令红一方面军在撤围南城后，南移至中央苏区北部的东韶、洛口地区休整待机。这一决策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可能受到的重大损失，保持了主动地位，对以后的作战具有重要意义。

这时，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进入异常艰苦的阶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这两个苏区的反“围剿”斗

争十分关注，作了不少正确的指示。

八月间，“围剿”湘鄂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十万人，分几路向洪湖根据地分进合击，重兵包围。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拒不接受红三军军长贺龙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而是从单纯防御的观点出发，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决定分兵堵击。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这一行动计划后，立即复电指出：红三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箝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而且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依然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不久洪湖革命根据地全部落入敌人手中。红三军不得不全部撤离。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更为猛烈。他们以三十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向红四方面军大举围攻。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没有接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提出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地进攻”，使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一份电报中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方针提出具体意见。徐向前回忆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异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11)

当国民党军队向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之间，对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

对红一方面军撤围南城转移到东韶、洛口一线休整这一正确决策，中央局十分不满。九月七日，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批评方面军“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是不正确的决定”。并说：“如方面军尚未移动或集中在洛口附近，仍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12)九月八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局说明：从当前敌我力量对比和红军疲劳状况来看，“袭取永丰将成不可能。”“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13)

根据国民党军队在中央苏区北线部署的实际态势，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九月二十三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提出意见：

“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迫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14)

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完全否定他们提出的这一正确布置，指责说：

“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我们认为，红军主力配合现联系力量积极的出击敌军，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给以打击，并求得消灭此敌。如因有敌三面增援之困难，十分不易得手，则可主力由南丰、黎川之间，突击或佯攻南城，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

(15)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天立刻回电，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说：

“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如攻乐安，以过去经验，急切不易得手，必引起西路强大增援，内外夹击，将陷于不利。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无作用，无法打增援部队。”“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16)

周、毛、朱、王考虑到前方同后方的意见分歧很大，难以很快统一认识，因此，在该电中提议立刻在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并希望中央局全体成员都参加，共同讨论目前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

九月二十六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来电，指示红一方面军要北攻在乐安的吴奇伟部第九十师。还提出：“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17)

当天，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央局北攻乐安的意见，说：“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要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最后提出：“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为妥。”(18)

月一天，朱德、毛泽东向全军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对当前敌情作了全面分析，提出：“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19)

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朱德、毛泽东的这个训令意见很大。九月二十九日，致电周、毛、朱、王，一开头就指责说：“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并指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如军队已出动白区，则应集结兵力于适当位置。”(20)九月三十日，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质问：“方面军是不向北行动？”严厉地说：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21)。

这样，中央局同前方在作战意见上的分歧已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准备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形势日益严峻。于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九月三十日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中共临时中央，指出：“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并已

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22)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朱德在前方宁都县的小源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会议。会上的争论十分激烈。会后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写的会议简报中，称此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23)

实际上，会议所反对的并不是什么“错误倾向”，而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正确主张。会议特别“集中火力”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会议却把它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24)毛泽东、朱德曾反对攻打赣州，会议把这种正确主张，说成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乐安、宜黄战役后周、毛、朱、王不强攻中心城市而在新区展开群众工作的正确部署，也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因此，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会议还认为“泽东同志更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25)所以，会后便以“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26)为理由，将毛泽东调离前方，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认为需立即有紧急充分动员，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27)

会后，朱德、周恩来继续赴前线指挥红军作战。临行前到毛泽东住地话别。事隔多年后，朱德还经常谈起宁都会会议这件往事。他曾多次说过：“宁都会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28)

十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宁都会会议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通令说：“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29)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决定，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

宁都会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先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后来到达川陕边地区。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但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

十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此时已离开部队)、代总政委周恩来，在广昌发布作战计划，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发起进攻，以策应其他苏区红军的作战，并同赣东北苏区取得联系。

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从广昌出发向东急进。在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五天内，连续攻克建宁、泰宁、黎川、邵武四座县城。十一月八日，攻克光泽县城。十七日，北上攻克资溪县城。十九日，又攻克金溪县城。陈诚见连失七城，便命令原驻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和原驻临川的孙连仲部第

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金溪。十一月二十日，当第二十四师进到南城东北时，朱德、周恩来乘该师正在运动中，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三军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迅速消灭该师一个团，打破了这次夹击。红一方面军的北线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为了准备迎击即将到来的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向全方面军发布紧急训令，明确指出：“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集中一切精神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30)

朱德、周恩来具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他们深知，要打破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大举“围剿”，只有政治上的动员是不够的，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加紧军事训练。为此，他们发布了加紧军事训练的训令，提出：现在“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战斗问断的瞬间，拟予以迫切的训练。”(31)

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又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各作战区指挥部发出密令，指出一定要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准备在整个战线上运动作战，以消灭敌人。同时又指出，必须估计到这次敌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围剿”时增多了，“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紧张和努力的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32)

在这期间，朱德还命令全方面军利用敌人没有大举进攻的时机，进行战前改编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以加强前线作战能力。在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十二月三十日，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命令。参加这次“围剿”的兵力共二十九个师又两个旅，约五十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其中左路军由蔡廷锴任总指挥，向闽西苏区进攻；右路军由余汉谋任总指挥，由粤、赣边界向中央苏区推进；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指挥蒋介石嫡系的十二个师为“进剿”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红军只有五万余人，双方兵力是十与一之比。一九三三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当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训令，强调：“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33)。

朱德、周恩来随即指挥部队向北隐蔽急进，一月五日，歼灭黄狮渡守军一个旅，俘虏一千余人，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由于红军的行动迅速而秘密，被俘的周士达供称：“红军包围了黄狮渡后，才知道大部红军到了。”(34)接着，朱德、周恩来又指挥部队向金溪秘密运动，很快占领该城。

在红军的进攻面前，驻在临川的国民党三个师经济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

战于浒湾东南地区。针对国民党军队这一作战意图，朱德、周恩来乘他们尚未会合之际，在一月七日下午下达攻击浒湾的命令。次日上午九时半，浒湾战斗打响了。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由临川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三个师全部被击溃，红军占领浒湾。由南城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消息后，便撤回南城。这次战斗共歼敌两千余人，缴获不少。但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黄狮渡、浒湾战役的胜利，为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战役结束后，朱德写了《谈黄狮渡到逼近抚州的一个战役》，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指出这次红军作战的主要战术原则是：“秘密、迅速、坚决、大规模协同作战、务须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35）

黄狮渡、浒湾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是什么？战场应摆在哪里？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又产生了意见分歧。这事实上是宁都会议上那场争论的继续。

周、朱、王主张红军主力继续北上贵溪地区，打通同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苏区，待北线敌军发动进攻时，将它消灭在运动中。一月十二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报告了前方的这个意见。（36）为了实现这一行动计划，同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又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他们“应将作战中心转到信河南岸”，协同红一方面军将闽浙赣苏区同中央苏区打成一片。（37）

一月十六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不同意前方的意见，提出要“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38）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央，提出不同意见。（39）

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命令道：“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他，”“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最后要求：“立刻将你们和前方的决定，清楚直接电告我们”，“并电告我们执行之结果。”（40）

前方依然不同意中央局这些指示，周恩来多次致电中央局和中央陈述前方的意见，明确提出强攻坚城南城和南丰的不利条件有五点：一是暴露我军企图；二是容易受敌人夹击；三是损伤太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提出应在敌人部署未完毕前，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在运动中解决敌人。并特别说明：“上述意见，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大都同意。”（41）

这时，国民党当局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一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久，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并采取“固守城防”的新策略。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朱德、周恩来等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他们便在二月二日率领部队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的时间日益逼近了。二月三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央局：“连续不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42）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远处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处处干涉前方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但这个意见仍没有被中央局所接受。次

日，中央局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回电说：“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并称根据中央指示电，“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43）

中央局的意思已很清楚：对攻打坚城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必须坚决执行。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在二月七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再次陈述意见：“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的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44）

由于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朱德、周恩来只得在二月九日率领方面军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地区开进。十二日黄昏后，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丰城西北面的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但因守军工事险要坚固，经过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歼敌不足一营，而红军却损失四百余人，师长彭鳌和两名团长阵亡。

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以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因此，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并指挥中路军各纵队由北向南挺进，特别是要求罗卓英率领的主力第一纵队（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迅速向宜黄地区集中，准备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朱德、周恩来很快看清陈诚的这一意图，认为如仍按中央局的意见继续强攻南丰，必将遭受国民党大部队的包围，使红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他们果断地决定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留下一部分兵力佯攻南丰城以迷惑对方，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撤离南丰，秘密转移。

这时，陈诚所部由吴奇伟指挥的第二纵队也正向南城前进；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乐安集中；罗卓英亲自率领的第十一师正向宜黄推进。他们准备在第一纵队主力同第二纵队会合后，将红军主力围歼在南丰、广昌地区。

看准了陈诚部渴求决战的这一意图，朱德、周恩来毅然决定，派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急进，引诱陈诚部主力东向。而红军主力在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再向南秘密转移到宁都北部的东韶、洛口一带，一边休整，一边隐蔽待机，准备将敌军消灭在运动中。朱德、周恩来这一正确决策，对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时，陈诚误认为红军主力真的到黎川方面去了，便令第二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地区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第一纵队纵队长罗卓英，为了配合第二和第三纵队的行动，于二月二十四日亲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准备到黄陂同第十一师会合。然后，三个师合力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的退路。这样，陈诚所部中路军的三个纵队被分隔在两个相距比较远的地区，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击破造成了有利条件。

朱德、周恩来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后，在东韶召开军事

会议，认为向黄陂推进的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现已暴露在红军面前，而且同在黎川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两纵队相距较远，处于孤立地位，正是将它们消灭在运动中的大好时机。黄陂一带山高林密，层峦叠嶂，道路崎岖，地形险要，是打伏击战的良好地势。会议决定，在黄陂地区预先设下埋伏，打一个大兵团伏击战，以歼灭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

会后，朱德、周恩来发出向黄陂地区进军的命令，指出：“乐安敌人两个师，有于本（二十六）日向东、黄陂前进，宜黄敌人一个师自神岗、党口前进模样。”“我方面军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45）命令中还规定，全方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包抄敌军。

一切部署就绪后，朱德、周恩来立刻率领四、五万红军迅速向黄陂地区进发。二月二十六日，各部队先于对方一天秘密地到达预定的黄陂、蛟湖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由于当地群众帮助严密封锁消息，红军如此大规模的运动竟没有走露一点消息。朱德、周恩来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并给以指示，当他们来到设在登仙桥右侧山头上的左翼队指挥部时，朱德向聂荣臻询问：“情况怎么样啊？”聂荣臻介绍情况后，朱德强调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这就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周恩来接着说：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敌人进来时，要沉得住气，放手让他们往前走。东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放过去的敌人是跑不了的。（46）

二月二十六日上午，细雨绵绵。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还以为红军主力远在黎川地区，毫不戒备地向前行进。朱德、周恩来在总指挥部密切注视着敌军的行动。下午一时许，当第五十二师进入红军左翼队的伏击阵地时，它的前卫部队第一五五旅刚通过，朱德、周恩来立刻命令红军突然发起全线攻击。第五十二师毫无戒备，不知所借，顿时丧失抵抗能力。只经过三小时的战斗，该师师部和一五四旅的一个团被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死去。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于桥头。接着，又在红一军团协同下，将一五四旅主力歼灭于蛟湖。第五十二师全军覆灭。

与此同时，第五十九师也进入红军右翼队在霍源两边山坡上的伏击圈。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红十二军迅速冲下山来，将该师截成数段，压到谷底展开激战。经过两天鏖战，将第五十九师大部歼灭在黄陂、霍源地区。该师师长陈时骥率领残部向乐安逃跑时，被红军左翼队歼灭，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共歼敌两个师，俘虏师长两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枝。朱德后来说：“那都是最精锐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因为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这次的袭击算是最大部队与最大的成功。”（47）三月一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全体指战员，祝贺黄陂战斗的胜利。指出：“这次方面军的空前伟大胜利，是给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拳的回答。”（48）

罗卓英指挥下的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被歼后，朱德、周恩来本想乘胜再歼第十一师，“只因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军指挥均不易达到”，“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49）；再加上在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二纵队

的三个师，正在西援第一纵队，企图从新丰截击红军主力的归路。为了避免被围，朱德、周恩来于三月一日命令部队迅速向南转移到小布、南团、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当国民党援军到达黄陂、东陂时，又扑了个空。

陈诚还想寻找红军主力再战。但他鉴于黄陂失败的教训，改变了作战方式，将原来三路“分进合击”改变为一路“中间突破”。将中路军原来的三个纵队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和第三纵队第五、九两师为后纵队，共六个师的兵力，梯次轮番地向东南方向的广昌搜索前进，目的是直取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朱德在谈到陈诚的这一新计划时，说：“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之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50)

朱德、周恩来针对他们这一弱点，决定将计就计，分散敌人，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予以各个击破。一方面命令红十一军到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佯攻吴奇伟指挥的前纵队的先头部队，示形于敌，使他们误认为红军主力就在广昌地区，吸引前纵队向广昌方向急进，拉大同后纵队的距离，为红军主力相机消灭后纵队造成有利战机；一方面命令红军主力隐蔽地向北急进，集结于东陂、草台岗一带，准备伏击他们的后纵队。

陈诚部果然被这样调动了。三月二十日，前纵队已进至洽村、甘竹一线；后纵队第十一师正向草台岗、徐庄地区前进，第五十九师残部尾随跟进，第九师在东陂、五里排。前后两个纵队相隔很远，形成一条长达一百华里的长蛇阵。后纵队态势孤立，出现了各个击破的良机。

朱德、周恩来抓住这一良机，在当天向全方面军发出命令：“本(二十)日，敌十一师有进到草台岗、徐庄可能，九师当在东陂不动。”“方面军拟二十一日首先消灭草台岗附近之敌，继续消灭东陂之敌，并击破其增援队。”(51)当第十一师在当天午后进到草台岗、徐庄时，朱德、周恩来再次发出命令：“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52)

红一方面军各路部队遵照朱德、周恩来的命令，于三月二十一日拂晓，以一部分兵力箝制东陂地区的第九师，切断该师同第十一师的联系；以大部队向草台岗第十一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首先争夺草台岗南侧的黄柏岭制高点。经过几次冲锋和肉搏，终于将占据黄柏岭制高点的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歼灭。接着，又向在徐庄的第十一师师部发起进攻，很快将该师部和一个团歼灭，师长肖乾被击伤。到下午三时许，陈诚的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基本被歼。

随后，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向东陂追击第九师，迅速歼其一部。陈诚所部的前纵队眼看着后纵队被歼，却因相隔太远，增援已不可能，只得经南丰向临川仓皇撤退。

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人，缴获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不曾有过的。朱德说：“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打垮了。四次

‘围剿’也算告结束了。”(53)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54)

朱德、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既运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又从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采取新战略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原有的经验，首创了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

为了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创造的新经验，朱德在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文章。

他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指出，黄陂、东陂两次战役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实行了战略转变。“内线作战的原则，是在敌人分进而来合击时，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以少数兵力箝制其另几路或迷惑之，次第各个击破敌人。”“红一方面军灵活地运用上述原则，这一次不是诱敌深入到苏区内部，‘待敌人集齐，使其疲惫，择其弱点，集中主力以袭之。’”“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55)在谈到战术原则时，朱德说：“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56)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中，朱德强调中国工农红军要加强理论研究，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提出并论述了六条战术基本原则：

“一、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二、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箝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三、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四、要求得大兵团协同动作，一定要每个兵团、每个部队在受领本身任务时，明了首长决心的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务在首长决心中占何等地位。”“五、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所以，各级指挥员都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六、在山地用几个平行纵队作战，因道路少而小，没有适当的平行路，行军长径拖长，展开迟缓，彼此策应不易，特别是变换正面困难。劣势军在山地对优势军作战，如能掌握上述特点，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则必使敌军运转不灵，应援失效。”(57)

朱德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对指导红军的作战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朱德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加上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陕甘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三十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艰难的革命低潮中坚持土地革命战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七月十一日批准这个决定。这年八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隆重纪念自己的建军节。朱德为此写了《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指出：英勇的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屡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中锻炼、壮大，“真正成为苏维埃巩固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他要求红军加紧教育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准备迎接更严酷的斗争。

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局势确已日见险恶：敌兵压境，碉堡林立，战云密布。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后，立刻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旬，他从南京乘军舰到江西，在南昌、临川等地召集将领训话，总结失败教训。五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他提出第五次“围剿”的“方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使政治与军事相辅而行”。尽管这年年初以来，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全省，长城一线战斗激烈，华北危急，他仍扬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只是“皮肤小病”，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大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侈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甚至强调：“我们总是以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统统集中于一点，从事剿灭赤匪，才是我们的任务和出路”。他制定“剿匪临时施政纲要”十三项，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改变原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代之以在苏区周围构筑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企图步步为营，处处设碉，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压缩苏区根据地，最后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

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筹措战争经费，还向英、美、意、日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军火，并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聘请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美国、意大利的军事教官，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和搜索战等新战法。蒋介石还对上前线的军官赐赠短剑，勉励他们“不成功，则成仁”。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以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开始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分北、南、东、西四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北路军担任主攻，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辖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北路军的主力是陈诚的第三路军，拥有十八个师和一个补充旅，依托堡垒，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

义错误，更加重了危机的程度。这年年初，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开始在苏区进一步推行“左”的政策，他们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开展反所谓“罗明逃跑退却路线”的斗争，并从组织上控制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在临时中央提议下，五月八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并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由博古、项英主持中革军委工作，由他们在瑞金指挥红军作战。

朱德、周恩来曾于五月十七日发布通令传达这一决定，并说：“中央苏区除东南阵地各军、西南阵地各军、各军区及独立军、团、师和其他苏区军区及二、四方面军等均直归中革军委指挥外，凡第一方面军所属各兵团及北面战地各指挥机关各部队均归第一方面军指挥”。可见，在中革军委移驻瑞金并由项英代理主席后，朱德、周恩来在前方只能指挥第一方面军和北部战线各军区，指挥权限缩小了，并且要听从中革军委的命令，更要服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领导。

一九三三年六月，博古、项英等不顾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新的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的严峻事实，依照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身在前方建宁红军总司令部的朱德、周恩来曾提出不同意见，表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但博古、项英根本不听这样的意见，而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名义再三重申，要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结果，在八月中旬，把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的东方军冒着盛夏酷暑，远征闽西北，连续作战；以红一军团为基干的中央军在中央根据地北线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域活动。

在这个正需要集中兵力对付国民党军队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的严峻时刻，将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三个月，虽然取得一系列局部作战的胜利，但红军自身战斗力受到相当削弱，也未能阻止敌人碉堡封锁线的完成，徒然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当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时，红军陷于仓卒应战的不利地位。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四个师的兵力，一举夺占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恰在这时，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不懂军事，又要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在军事上，就处处依靠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兵上过前线，也参加过一九一九年创建苏维埃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街垒战，一九二八年到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春毕业后被派来中国。

博古和李德震惊于黎川的失守，匆忙地确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略。为了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及黎川附近的敌军，强调：“对于命令的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

朱德和周恩来考虑到硝石有敌军重兵扼守，并且处在敌军各有三、四个师

驻守的南城、南丰和黎川之间，不可冒然攻打，由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说明：“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中革军委却断然拒绝这个合理意见，回电说，“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企图”。这样，由彭德怀率领东方军主力只得深入到敌军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连攻五日不克，被迫退出战斗。接着，又按李德的计划去攻打国民党军队设有巩固阵地的资溪桥、潭头市，连攻四日未能占领。十一月初，中革军委又命令红三军团和刚刚组建的红七军团远离根据地，插入国民党军队后方战略要点抚州（临川）地区活动，想借此调动金溪和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军队给以打击。结果，既没能夺取浒湾、八角亭，也没有调动对方，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伤亡，再次被迫撤出战斗。这以后，红三、五、七军团辗转于抚州、金溪、黎川等地区堡垒群中，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与此同时，在抚河以东的中央军红一、九军团奉命北上策应东方军，被国民党军队以十个师的优势兵力围截，蒙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腹地转移。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的几次失利，是由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造成的，但是博古、项英、李德等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早已对他们提出过不同意见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身上。十一月二十日，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责“方面军首长”——也就是朱德和周恩来对军委的“意旨没有了解”，贯彻是“动摇的”，甚至说“若想在自己的决心上与上级的决心之间去寻求一中间的调合的决心，那只是对决心意旨的曲解和动摇，并延误时间而已。”这封信中硬性规定：“必须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协调一致”。(11)

朱德和周恩来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仍然尽心尽责，一方面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汇报前方的情况，提出建议，一方面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决策，只能在实际运用时尽量考虑得周到细致，尽量减少因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对这种处境，朱德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过：

“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钉子，才能吸取教训。在这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情况就极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条条，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增长才智。俗语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到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12)

李德到瑞金后，不对前方的作战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13)。那是在他到来以前博古要人为他单独修建的一座房子，在沙洲坝距军委、总政治部、党中央机关都不远的地方，人们称它为“独立房子”。当时替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李德“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他“以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14)。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朱德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大约在十一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来到前方在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

他们这次去的目的，据李德自己说“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15）。这说明李德还要进一步掌握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他还提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住。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16）。

朱德对中共临时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以往红军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来影响他。伍修权回忆说：“朱德同志开始还是很尊重李德的，比较经常地到李德那里，同他讲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红军作战的传统，还对他说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以后，朱总也很少去李德那里了”（17）。李德也承认：朱德“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指毛泽东）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18）

在扩充红军方面，朱德同李德的意见也不一致。他后来说：

“在这中间，我们整顿队伍的缺点，是没有好好把新兵补充到老兵里面去。一、三、五军团都很强，但是没给很好的补充——在这些问题上，李德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一般部队本来都从游击战中间产生出来的，带有游击队习气，但是他们都有基础，有组织，打也打不乱。新的军队则没有经过很好训练，就拿去打，都打垮了，老军队也没得到补充，……”

李德与一部分同志抱有一种意见，说老的军队习气不好，不用。我们认为这人不顾实际了，固然国际指示叫我们扩大军队，但扩大军队决不是赤手空拳扩大得起来的。实际说，红军还不都是新的军队、都是在苏区中才产生出来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质量，都注意到搞新军队那方面去。搞起几个新的师来，但是吃穿都非常困难，这些新军队都很勇敢，敢打仗，但是每次都是牺牲很大，又不把他们编进老军队去，譬

如一个军团一个师只剩下一两千人都不管。其实扩军应该从老的军队里带出来才可能，否则，想重新建立新军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19）

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不久，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出现过一次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极好机会。这就是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事变发动前，十九路军曾在八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同正在福建作战的红军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接洽停战和联合抗日反蒋。朱德、周恩来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建议党中央接受谈判。朱德、毛泽东还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第十九路军代表，向他们表明赞同红军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十月二十六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变更原来的军事部署，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和京沪线上抽调十一个师的兵力去“讨伐”福建政府。为了配合第十九路军的作战，朱德、周恩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指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他们“应抓紧这一机会”在赣东北、闽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准备随时截击或箝制敌行动部队（20）。同日，朱德、周恩来又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已

推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调集兵力东进入闽，要求以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的入闽部队，望中央早作决定。

但是，抱有“左”倾观点的博古、项英、李德等，拒绝朱德、周恩来提出的配合十九路军的正确意见。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规定：“我们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第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我们要看新的第一路军与十九路军作战的结果以及敌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将我们的主力转移到西方对付敌人的第二路军”（21）。他们声称：“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22），“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并且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23）。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博古、项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配合第十九路军，相反，决定将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域，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

朱德后来说：“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掣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就是同十九路军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被缴了枪。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24）

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为了保障他们进攻第十九路军的翼侧安全，以一部从黎川南出，向团村、东山、得胜关进犯。十二日，有两个师开到团村地区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朱德立刻命令已奉命西调而尚在团村附近的红三军团等部，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反击，但因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分离作战”，兵力不足，只打成一个击溃仗，那两个师大部逃脱，朱德深感惋惜，他和周恩来在十三日致电项英，说：“我东方军昨日战斗相当激烈，杀伤敌虽近千，恐缴获不多，非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使我战略转移”，“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并指出：如不这样集中优势兵力而分兵作战，实行干部战士都不了解、不熟悉的所谓“新战术”，不仅不能赢得大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25）。周恩来在电文后特别说明：“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然不至如此”。朱、周在电报中建议应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同敌军主力决战。

这个极好的建议又没有被博古、李德、项英接受。十三、十四日，中革军委连电朱德、周恩来，不同意前方的提议，仍坚持将红军主力西调去攻打永丰一带的堡垒线，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这种主观、武断、轻率、不尊重红军前方最高指挥员的作法，使朱德和周恩来都很愤想。周恩来不得不致电博古、项英，批评他们“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并再次明确要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

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请”（26）。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

一月中旬，朱德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错误地认为：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朱德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月下旬，他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在大会开幕那天代表红军致词，在二十八日作了《红军建设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两年来红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战绩，提出红军建设中的各项任务。朱德为这次大会起草的军事报告手稿中，还特别强调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写道：“谁都知道，我们备苏区壮大的红军，许多都是从小的游击队繁殖生长出来的，宽大的巩固的苏区，许多都是从流动的游击区转变过来的。”“开展游击战争是国内战争取得胜利条件之一。”（27）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会后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军事人民委员和中革军委主席。二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朱德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在会议期间讲话，他指出：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它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惧的百战百胜的红军（28）。他在讲话中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29）。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形势已更加严峻，更加困难。蒋介石在一月间扑灭了孤立无援的福建事变后，将入闽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改组成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完成对中央苏区四面合围的部署，从东、北、西三面向苏区中心区域步步进逼，南面则由陈济棠所部粤军负责防堵。朱德后来也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苏区周围还是在打着，分做了几条战线，东、南、西、北三四处都在打，成为一种消耗战的状态了，苏区渐渐被缩小着，什么都遭受了封锁，盐贵到一块七角钱一斤。”（30）

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可以更不受阻碍地推行错误的作战指导。他们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企图以此达到粉碎“围剿”的目的。在这种消极防御方针指导下，从一月下旬到三月底，几个红军主力兵团分兵数路，都担负起修筑碉堡的任务，依托碉堡实施“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不仅没有打破或阻滞敌人的进攻，反而使自己付出很大代价，陷入愈加被动的局面。

四月十日，北线国民党军队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包括陈诚所部精锐主

力第十一师、十四师等，分左右两路，沿抚河两岸向南推进，企图攻占广昌，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直取瑞金。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全力保卫广昌，调集红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兵力，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敌军“决战”。为了指挥这次战役，中革军委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实际的决定权握在李德、博古的手中。这样，朱德只得随他们到广昌前线，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

广昌保卫战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残酷激烈的一场战斗，从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打了十八天。三万红军被指定在抚河两岸同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对峙，筑堡挖壕，展开阵地战。由于敌军有着飞机、大炮、轻重机枪和自动步枪等新式武器，尽管红军浴血奋战，仍无法挡住敌军的进攻。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指导，给红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朱德眼看着一道道防线被突破，一批批指战员倒下去，心情异常沉重。这种状况，在他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对着军事地图摇头叹气，自言自语地说：不能这样搞啊，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啊！

四月二十七日，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陈诚部四个纵队从抚河东西两岸同时发起进攻，广昌城已在炮火硝烟笼罩下。红军虽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也达五千五百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博古、李德在这个地区进行“决战”的打算，已由严酷的事实证明是无法行得通的。当晚，博古、李德、朱德急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称：“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31)（具体战斗情况是在二十九日才电告周恩来的）在周恩来复电同意后，朱德于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下达放弃广昌的命令。

广昌失守后，在它的东面，红军还进行了保卫建宁的战斗。这里原来是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所在地。红军作了坚决抵抗，仍未能守住。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日见匮乏，红军坚持内线作战已难以继续下去。

鉴于这种形势，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但此事还需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并需进行繁重的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从事转移的筹划。伍修权回忆道：“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向二、六军团靠拢。所以，进行长征是有半年的准备时间的。”“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32)

国民党军队在攻占广昌、建宁后，气焰更盛。自七月上旬起，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发起全面进攻。红军在博古、李德的命令下，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同节节推进的敌军展开阵地战，继续拚消耗。结果，哪一路都无法挡住对方优势兵力的前进。八月底，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以南的重要阵地——驿前。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也被打开缺口，西线和南线日趋困难。

在四面告急的局势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消极了。朱德担负起在转移前支撑战争局面的指挥责任。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地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九月初，在东线取得了温坊大捷。

温坊（现名文坊），位于闽西长汀县东南。九月一日至三日，在朱德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相配合，在这里接连打了两仗，给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部的李延年纵队以重创，歼敌四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使红军得到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也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李延年纵队共四个师、十九个团，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在对十九路军作战获胜后十分骄狂，轻视红军，不满足于步步为营式的筑垒推进，有时一次就急进几十里。朱德从八月初起就密切注视这股敌军的动作，了解他们轻敌而又十分疲惫的特点，决定在运动战中给以有力打击。

八月三日、五日、八日、十一日和十六日，朱德多次电令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向李纵队推进的方向运动集中，伺机给以打击。李纵队发现红军主力的动向后，又采取筑垒推进战术，使红军一时难以找到战机。八月二十三日，朱德命令红一军团向西移到长汀以北的曹坊、罗溪地区待命。这一来，李纵队又放胆地集中四个师兵力向连城、朋口一线大踏步推进。朱德看准这个机会，在八月二十六日电令红一军团秘密地迅速东返，会合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在朋口西侧的童坊及河田地区隐蔽集结；同时，指示红一军团以一部伪装成整个军团从宁化继续西撤，以迷惑对方，又指示红九军团及独立第二十四师伪装成地方部队“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纵队大胆地向长汀跃进。这一切，果然使李纵队造成错觉，以为红军主力已远离闽西地区西去，立即向长汀急进。

朱德断定李纵队从朋口向长汀急进途中必将经过温坊，而朋口至温坊沿途二十里间地势险峻，两侧高山绵亘，可以埋伏大部队，是有利于在运动中歼敌的极好地形。于是，他在八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时向林彪、聂荣臻发出急电，指出：“敌李纵队于明一号起向温坊中屋村筑碉前进”，“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应在温坊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33），并指出需要注意的各项战术问题。根据朱德的部署，一、九军团迅速地隐蔽集结于温坊附近山地。九月一日中午，李纵队的第三师第八旅三个团果然闯进红军埋伏圈，又没有后续部队。傍晚，红军向尚未完成构筑工事的敌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先截断它的归路，再由两翼发动猛烈攻击。到第二天早晨，全歼进入该地区的两个团，只有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和少数部队脱逃。

二日凌晨，朱德接到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的温坊初战结果的报告。报告中说：“温坊之敌于今早二时即解决，但约有一营左右逃脱，……一军团俘虏约一千六百左右，轻重机枪约在三四挺以上，迫（击）炮数门，步枪弹药数目现尚无法统计，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因夜间战斗我军伤亡不大”（34）。朱德为初战告捷感到欣慰，同时又发现红军现在所处地理位置存在着危险，立即回电指出：天明后敌机“有向我现在阵地及中屋村东西大道轰炸的可能”，“我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现在地域过于突出，目标亦大，”（35）规定各部队应分别转移隐蔽。朱德料定李纵队不会甘心失败，还会再派部队向温坊反扑，在二日晨八时再次致电红一、九军团，指示他们“准备遭遇和消灭朋口李三师来援部队。”（36）

事情正如朱德预料的那样，李纵队的先头部队被歼后，他们仍没有弄清红军兵力虚实，继续派出第九师和第三师三个团，再次向温坊推进以求报复。朱德获得这一情报后，立刻在三日凌晨二时向前方发出急电，指示红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应在温坊阵地前，给敌以短促突击，以消灭其先头部队”

(37)。当天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红军在温坊打了第二仗，再次给进犯敌军以沉重打击。

在整个温坊战斗过程中，红军先后打垮李纵队第三师、第九师共十个团。国民党东路军主力的惨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枪毙只身逃回的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并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温坊战斗胜利后，朱德写了《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一文，结合这次战斗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几个重要的军事原则。第一，这次战斗具有经过“长期并精细准备的特点”，充分地了解敌人，掌握敌情，指挥上有“计划性”，是“胜利的主要的和第一的因素”（38），第二，这是运动战的胜利，红军高度机动灵活，“能迅速的隐蔽的转移”，迷惑并引诱敌人，使他们“不知我军位置”，“不知我虚实”，“敢于跃进”，我军则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进攻方向”，“预先占领了待机位置”（39），以逸待劳，给运动中的敌军以突然袭击。第三，在“敌我兵力比较，敌占优势”的情况下，在战役和战斗上“我们取得集中了较优势兵力，迅速地干脆地各个击破了敌人”，并肯定了发起进攻时“坚决果断”、速战速决，打歼灭战的战例，批评有的部队强攻设有巩固阵地的敌人，“盲目的再三重复不利的冲锋”，有的部队“没有迅速地勇敢地截断敌人的退路”（40），使可能被歼之敌逃脱。第四，肯定红军“夜间战术相当熟悉”，在优势装备的敌人面前，夜战能发挥红军的长处，达到好的效果；肯定红军“在火线上瓦解白军工作有成绩，政治宣传起了作用”，敌军“有六个部队派代表来缴械”（41）。朱德在总结中论证的这些指导原则，坚持并丰富了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是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左”倾指导下一系列错误军事方针相对立的。

但是，温坊战斗这样的个别胜利毕竟不能改变第五次反“围剿”中整个战略指导错误所铸成的大局。到九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几个县。

这时，朱德又提出一系列不同于李德的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强调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反对拼命主义，要避免那种付出重大牺牲的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尽量采取“运动防御”。九月十五日，他以军委名义颁发《关于战斗问题的训令》（训字第一号），指出：“无论如何应该以保存自己有主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们作战的第一等基本原则。保持地域，不轻遗寸土予敌人，这应该放在前一原则之下来遂行的”（42），二十四日，他致电林彪、聂荣臻说：“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及侦察，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以后抗击周敌行动中，第一等的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43）二十五日，朱德又发出《关于目前战斗问题给各军团电》，指出：“二十六日晨，蒋敌向我行总的攻击”；“诸兵团应再度估计情况，并检查自己的决心。一方面你们应给敌人相当的损失和抵抗，另一方面应很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并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在飞机轰炸及炮兵集中所威胁不利的条件下，及我们工事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适应当放弃先头阵地，以便于（在）我们阵地的纵深内实行突击”；“在失利时，应有组织地退出战斗”。（44）

这些指示，完全不同于博古、李德那种要红军“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的拼命主义。在这一新的精神下，红军不再同进犯军死打硬拚，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避免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作战，因而没有再遭受大的损失。九月二十七日，当北路敌军陈诚部向石城逼近时，朱德

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指出：“目前三军团及十五师基本的作战任务是迟滞陈路军向石城前进，只在有利的条件（下）以局部的突击消灭敌人的先头和侧翼部队，必须避免坚决的战斗，而首先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万一陈路军在这次的战役中能一下占领我们所有的支点时，军委决定放弃石城”，“应充分的适时的准备放弃石城时的全部的撤开”（45）。同日，他在给罗炳辉、蔡树藩的电报中，嘱咐九军团在阻击东线敌军的战斗中，“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46）。对在西线抵御的红一军团，朱德也有同样的指示。十月二日凌晨，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须特别注意在不利条件下，你们不应进行坚决的突击而应改为运动防御迟滞敌人进兴国”；“特别要注意在开阔地作战须极端隐蔽，不要堆集一起并应利用地形，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与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47）。

进入十月，中央红军的突围长征已进入实施阶段。朱德不断地向各军团领导人发出指令，周密部署各主力兵团同地方部队换防，集结休整，补充人员，筹集物资，准备长征行动的开始。

二十二、遵义会议前后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傍晚，苍茫暮色笼罩着赤都瑞金。朱德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

他身着一套退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已年近四十八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在行军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病员。和朱德一起行军的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回忆说：“行军途中，朱德同志经常不骑马，腰插一支小手枪，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军。他沿路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减轻大家的疲劳。我真佩服朱老总，他肚子里的故事可真多，而且慢悠悠的讲得那样风趣幽默，大伙听了都乐呵呵的，走起路来也觉得轻松多了。”

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仍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但是，有关红军的行动部署和作战命令大部分由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有些命令由他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联署。就现在保存下来的档案来看，单在十月二十三日一天，由朱德个人署名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有十五件，向他们通报敌情，对部队的行军和作战作出周密部署。他要求部队在行动时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在大兵团集中运动与战备行军条件下，亦必须隐蔽露营”。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救护和收容。”

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把它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有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计八万六千八百余人。留下红军一万六千人，由项英、陈毅率领，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十月十八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二十一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十一月八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

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所以能比较顺利，除由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陈济棠作为广东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北线、东线、西线打得都很激烈，但在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的南方战线上却一直比较平静。双方已开始作试探性的接触。这年七月间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九月底，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称：“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指出“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军则增兵于赣闽，福建事变，可为殷鉴，“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

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信中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建议，说明“日内德当派员到（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信中说的黄师长，是指陈济棠所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楨。十月初，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带着周恩来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当红军突围西征时，陈济棠执行了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四十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红军是十月二十一日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朱德在第二天的一个电报中说道：粤军“余汉谋部已总退却”，第二道封锁线的北端汝城在湖南境内，南端城口在广东境内。朱德在致三、八军团电中说：“估计在汝城北面没有打开前进路的可能，汝城南面的道路已有初步的保证。”红军主力顺利地越过这道封锁线。这是朱德、周恩来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打开通道的成功之举。

为了突破湘南郴州、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朱德在十一月七日发布“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这道封锁线的命令，红军分三路继续西进。这里是朱德领导湘南起义的旧地。在当地群众积极配合下，红军顺利地占领宜章城和白石渡，迅速跨过粤汉铁路。

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不顾大局，企图拣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为此，朱德曾致电批评红一、九军团行动的无计划和执行命令的迟缓，“使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成问题”，同时，以军委名义通电各军团，“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朱德还致电中央二纵队的司令员李维汉，命令他率部在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宿营，牵制敌人，等待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九军团，收容掉队的零散队伍。这时，庞大的后勤队伍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拖累了整个战斗部队的行动，问题已越来越显露出来。

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他任命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周浑无两部共十六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国民党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十一月中旬红军分两路进入广西北部。二十五日十七时，朱德向各军团、纵队发布命令，明确指出：国民党军队的“企图是在湘江阻止我们，并从两翼突击我们。北面为敌之第一、第二路军，南面则为广西的主力，而敌之第三、第四及第五路军则直接尾追我们”（11）。针对这种状况，他作出全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的部署。这时，兴安、全州一线正是湘江封锁线的薄弱环节。桂军白崇禧为了防止红军深入广西中部，刚将这一线的部分桂军撤防自保，而湘军还没有来得及接防，“全州、灌阳、兴安暂无大部敌军”（12）。这对红军是极为有利的时机。如果全军能轻装急进，完全

有可能抓住这个间隙迅速抢渡湘江。但由于部队携带的物资太多，行动迟缓，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十一月二十七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二百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一万四千多人，有一千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一百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他们作出具体部署后命令：“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13)经过四天四夜激战，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斗。“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五军团）卅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都已渡过湘江。”(14)红军虽然突破了最后一道封锁线，保存住了主力，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惨痛的损失，引起全体指战员的深思。朱德曾沉重地总结这一阶段的教训说：“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因此，部队动起来很慢。”(15)

由于吸取了这个教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十二月四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并要求检查携带的物资，不必要的立刻抛弃或毁坏，使部队能够轻装前进。

过了湘江，红军“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16)，进入峰峦连绵的西延、龙胜山区，行军更加艰难。天上是国民党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脚下是山险路滑，周围山头上又常有反动民团打来的冷枪。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反动势力派了许多便衣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房烧粮，然后散布“共匪杀人放火”的谣言蛊惑民众。朱德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总司令部十二月七日这一天的行军日志中记载：

“朱总司令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17)

十二月十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他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于

是，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此作出决定。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18）。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十五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八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挫折和教训使他对毛泽东更加信服。因此，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19）。这个决定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了部署，规定分成两路纵队，队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20）。

在通道和黎平期间，中革军委曾就部队整编问题先后作出两个决定，一个是将长征前不久新组成的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另一个是将军委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下辖三个梯队。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十二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三十一日，朱德连续电令：“我三军团应迅速渡过乌江”（21），“一军团限今晨八时前全部渡河完毕”；“军委纵队限今十时渡河完毕”（22）。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23）猴场会议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

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红军分三路渡过乌江天险。七日，先头部队袭占遵义。八日，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领导人，告诉他们：“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24）。

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月十二日下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红军的主张，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李富春和遵义群众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朱德还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在短短十几天中，有四五千青年报名参加红军，使红军队伍得到突围以来最大的一

次补充。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即遵义老城批把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

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有着直接的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在会上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25）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分清了红军战略战术中的根本是非，肯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26）。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7）。会后不久，常委再行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8）。这以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在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时刻作出的关键性抉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二十六年后，朱德在缅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这样的诗句：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29）

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三万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周旋，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经过四渡赤水战役，终于跳出敌人的围堵圈，使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才发觉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已经改变，急忙命薛岳等部以重兵向黔北地区进逼。因此，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黔北创建新苏区的决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红军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地区开进，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命令战斗力较强的川军以重兵封锁长江，并进入赤水、习水、土城地区阻击红军。

一月二十四日，右路的红一军团进占土城，继续向赤水县推进。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到达土城。这时，获悉川军刘湘的模范师一部四个团正尾追红军，向土城开来。毛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歼灭这

股敌人，给川军一个迎头痛击。他责成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三、五军团进行这一战斗，以红九军团及红二师担任预备队。二十八日晨五时战斗打响，但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这时才发现情报有误：原来以为川军是四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上来的是六个团万余人，而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这也是最初估计不足的。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倚仗优势兵力，突破红五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不能把它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毛泽东决定，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的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反冲锋。朱德到干部团指挥他们抢占有利地形，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根据当时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围堵红军的新情况，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一月二十九日三时，朱德发出野战军西渡赤水的命令（即《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随即重返前线指挥战斗，掩护全军西渡赤水河。

他来到王开湘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阵地。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那时也在这里。他回忆说：“当时，天下着雨，刘湘的模范师向我们阵地压来。朱老总手提驳壳枪，来到我们这里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我很担心朱总的安危，几次劝他赶快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同我们坚持到天黑，才和我们一起渡过赤水河”（30）。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

朱总司令在我们阵地的前沿，仔细观察战斗情况后，当机立断，下今后撤。我们从前沿撤下来了，突然，又传来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团长和我又带了二十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敌人像着魔似的一个劲儿往我们阵地压来，我们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

朱总司令，他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我与王开湘同志，六团长朱水秋、王集成同志都来了，大家都为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来，但是看看朱总司令，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无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我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总司令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我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王开湘和朱水秋也说：“我们急得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总司令亲切地笑笑，用从容、风趣的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31）

这就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长征途中，朱德曾多次这样在危急时刻亲临前线，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镇静、从容。这种作风，给广大指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有十二个旅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薛岳部和黔军也向川南急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为了甩开追敌，红军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地区。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队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一线，而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突然折回黔北，根据会议决定，二月十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待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32），并规定了具体办法。十五日，朱德电令各军团：“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33）

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克桐梓，夺娄山关，再取遵义，并在遵义城外重创吴奇伟、王家烈部。这次遵义战役，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约三千人，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朱德为此致电九军团，要求他们在桐梓附近多贴捷报，召集当地群众开祝捷大会，以扩大红军的影响。

红军的遵义大捷，使蒋介石大为震动。他飞抵重庆指挥，准备以重兵围歼红军于遵义地区。三月四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后，故意将部队在遵义地区徘徊，而当国民党军队被诱赶来时突然掉头西进，于三月十六日经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并摆出准备从这里北渡长江的架势。这样，又将各路追敌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为了进一步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一支部队继续佯攻古蔺，主力却用神速动作掉头东归，于三月二十一日晚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渡河前，党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发展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34）抢渡赤水后，红军立刻南渡乌江，把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岸和乌江以北，跳出了他们的合击圈。

当南渡乌江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陈赓和宋任穷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后来，他们得知殿后的红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宋任穷回忆说：

我们到宿营地时，“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场。他们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

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七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

宋任穷立即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四十里返回乌江边，连夜突击把浮桥重又架起，等候九军团的到来。但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诱敌北进，以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一度失去了同中央军委的联系，后来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才同大部队会合。对这件事，宋任穷感慨地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

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35)

红军南渡乌江后，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将有较强战斗力的滇军主力调出云南。为此，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部向黔东方向佯动，作出东进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却直趋贵阳。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而贵阳城内兵力空虚，急忙向滇军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调滇军三个旅赶往贵阳保护。

滇军主力被调出，后方空虚，进军云南的门户已经敞开。四月七日，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36)。八日，红军以一部佯攻贵阳，以一部佯攻龙里，主力在第二天从贵阳至龙里间约三十里宽的地段阔步穿过湘黔公路，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

红军进入云南后，乘滇军主力已东调入黔之际，直趋云南省会昆明。四月二十九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红军两个月来的机动作战，一般追敌已被甩在我军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现在金沙江荫岸空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37)

威逼昆明只是佯动。由于滇军主力东调，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深恐红军进占昆明，只得急调原来驻守滇北的部队回援昆明，使金沙江南岸的守军兵力顿时空虚。这个目的一达到，红军在昆明附近只是虚晃一枪，随即出人意料地大踏步北转，直奔金沙江。

金沙江是中央红军北上的第一个严重天然障碍。这里谷深流急，地势险要。江北岸的川军控制了大小渡口，并把所有船只都掳了过去，阻止红军过江。如果红军不能北渡，就有被国民党军队压在金沙江南的深谷遭到歼灭的危险。

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斗争。红军如此神速地向金沙江挺进，是国民党当局万万没有想到的。五月二日，朱德部署红军分别进取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三个渡口，其中通往龙街渡的是大道，其他两条是商道。(38)五月三日晚，刘伯承指挥军委纵队干部团在皎平渡乘对方没有戒备一举偷渡成功，并在这里找到七条渡船。随这一路行动的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乘船过江后，在江北岸石壁上一排山洞里，组织渡江指挥部。那时，进占龙街渡的一军团和进占洪门渡的三军团在渡口还没有找到渡船。五月五日，朱德电告一军团：军委纵队本日已在皎平渡渡江完毕，三、五军团将分别在七日上午和八日下午渡毕，“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皎（皎）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毕，否则有被敌隔断危险”。(39)这样，全军凭靠七只小船在皎平渡往返运输，经过六个昼夜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

朱德后来谈到中央红军在云南的经过时说：那时，“云南的五个旅也还在贵州，昆明城内只有一个教导团。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占领昆明，而是引诱敌军来援，同时更故意向西去占元谋、禄劝，佯向龙街企图过金沙江。这样，引得大部敌军趋向元谋，而我们折回头，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40)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把原来紧紧尾追的国民党军队甩在江南，行程相距一个多月，夺得了主动权，也获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当时，林彪等对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这样大规模迂回机动的运动作战十分不满，说这尽是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甚至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朱德、毛泽东下台。在会上，毛泽东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41)。朱德和周恩来也严肃批评林彪，肯定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今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西进，越过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合，并决定组织先遣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五月中旬，蒋介石飞抵昆明，调动中央军十余万人，川军五六万人，部署在大渡河畔堵截红军，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42)。蒋介石判断红军不敢从彝族区通过，因而把守备重点放在大树堡一带。为了避开蒋军主力，红军偏偏选择了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冕宁至安顺场之间那条小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彝族人对于汉族疑忌很深。红军一些人听说彝族人“厉害”，“野性子”，有些紧张。毛泽东对他们说：彝族人最痛恨的是白军，对我们就不同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你们怕什么呢？

五月二十一日，红军进达彝族地区的冕宁县。朱德在有彝、汉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他还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43)

这个布告到处张贴，鲜明生动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担任先遣任务的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得到彝族同胞的信任，并在他们帮助下，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

五月二十五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由十七勇士在惊涛骇浪和枪林弹雨中强渡大渡河，攻占了对岸渡口。接着，用仅有的一只小船来回不停地运送后续部队，一天一夜才渡过一个团。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安顺场。朱德对到村头来迎接他们的刘伯承说：“先遣队逢山

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刘伯承说：“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44）

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架桥，附近又找不到其他渡船，数万大军如果只靠现有的一只小船，即使昼夜不停，也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全部通过，而迫敌正气势汹汹地向大渡河扑来，时间决不允许那样做。毛泽东主持在大渡河畔开了个小会，决定以急行军抢占大渡河上游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会后，朱德向各军团发出《关于控制泸定桥渡河点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两路都向泸定桥急进。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三百四十里路程，两岸是悬崖陡壁挂着羊肠小路，又有数十条山涧溪流将小路切断，加上大雨不停，行路更为艰难。朱德同战士们一样，在大雨中跋涉，还要随时掌握整个部队的进军情况，发出新的指令。五月二十八日一时半，他致电林（彪）刘（伯承）聂（荣臻），指示左路先头部队四团“今二十八日应乘胜直追被击溃之敌一营，并迎击增援之敌约一营，以便直下泸定桥。二师部队迅速跟进，万一途程过远，今日不及赶到泸定桥，应明二十九日赶到”，同时指示右路“刘聂率二团亦应迅速追击北岸之敌一营，以便配合四团夹江行动”（45）。同日，他又致电红一、五军团领导人，指示：“我左、右两纵队之先头部队，明二十九日均应赶到泸定桥及其西岸，并力求于正午前迅速袭占铁索桥，消灭该处守敌，以控制该桥两岸，并准备与援敌作战”（46）。

红四团接到朱总司令的命令后，以一昼夜二百四十里的速度急行军，终于在二十九日拂晓赶到泸定桥，抢占全桥。当天傍晚，林彪致电“朱主席”，报告红四团已攻占泸定桥的消息。朱德的警卫员回忆说：“我们走在朱总司令身旁，雨水从他的脸上不断流下，长途跋涉，他的眼窝已经深深的陷下去了。但从他那浓眉下两道奕奕有神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47）

朱德来到泸定桥头，看到由十三根铁索组成的铁索桥悬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一些临时找来的木板铺在铁索上连成桥面，桥下急浪滚滚，令人目眩眼花。朱德仔细询问前面的部队过桥时的情况，了解到有些马匹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大慢，有一匹马还掉下江去了，立即吩咐参谋：“告诉部队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渡河的秩序，务必使部队尽快通过，把马匹拉开。有些马不敢过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以免影响别人过桥，每隔十分钟派人检查一次桥板，踩开的桥板要及时更换。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在后面就要及时把桥板弄好。那个部队过完桥，就要负责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

轮到司令部的队伍过桥了。朱德从容地走上去，一边走，一边鼓励身旁的人：“沉住气，不要怕，别看水，看桥板。”走在朱德身边的警卫员回忆说：“正走着，朱总司令突然停下来，仔细观察一处桥板。那块桥板和另一块桥板已经脱离开，露出一个大缝。朱总司令弯下身去，把这两块桥板合拢起来。总司令这种行动，给我增加了勇气，我的心情也开始镇静下来，并深深为总司令给我们铺桥板而感到惭愧不安。”（48）

抢渡大渡河的胜利，使蒋介石要红军重演七十二年前太平军石达开部失败的历史悲剧，要“朱德、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灭了，过了大渡河，红军便开创了继续北上的新局面。

二十三、艰难的时刻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东南的达维一带，同从岷江地区西进的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经过八个月万里征战、历尽艰难困苦、有三万人左右的红一方面军，同有八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感到十分兴奋。夹金山下一片欢腾。

六月二十五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迎接从杂谷脑（今理县县城）前来会见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当天，举行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在大雨滂沱中，朱德和张国焘先后讲话。朱德在讲话中热情地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张国焘的讲话语气傲慢，流露出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左的意向，说：“这里有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这给两军会师后的欢乐投下了阴影。

为了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第二天，即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松理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朱德等都发了言。朱德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

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在两河口时曾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朱德提醒张国焘，蒋介石虽然派来十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朱将军建议由它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一口拒绝。”

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准备趁国民党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坚决地攻占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刻率领红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仓德梁子）等几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七月十六日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

从懋功北上后，环境十分艰苦。这不仅因为雪山连亘，雨雪无常，道路泥泞，自然条件恶劣，而且因为这里是藏族区域，没有多少做买卖的，藏民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恐吓而大多藏匿起来，部队粮秣得不到接济，连两餐青稞、养麦、红薯也难以为继。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上一顿，也只能吃个半

饱，或者以野菜充饥。成仿吾回忆说：“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组织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把大家吃过的野菜都挖来，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解决了不小的问题。”

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沟谷地带，七月中的青稞麦已呈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由于部队已近绝粮而又遇不到当地居民，红军总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进行十天割麦，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去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朱德“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还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对着他笑。”

可是，在一方面军出发后，张国焘却迟迟不指挥四方面军北上，他在两河口会议上虽曾表示同意北上方针，但看到红一方面军兵力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在会后又致电中央提出另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

并要求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唆使他的追随者致电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企图将红军置于张国焘的控制之下。

红军总部在七月十日到达芦花后，见四方面军没有跟上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七月十八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周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二十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将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并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这时，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芦花。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在芦花开会，听取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对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法。朱德在发言中认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11)。

但张国焘却在暗地里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而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有少数人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错误地提出“军阀主

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批评，还公开写文章抨击，这也引起了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反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这些复杂的情况，使朱德对两军会合后的团结问题感到忧虑。

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他同四方面军指战员接触时，总是多讲他们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地以诚相待，因而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徐向前回顾当时的情况说：“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12)

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经中央批准，原在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月底，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到达毛儿盖地区。这时，敌情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蒋介石调往川北堵截红军北上的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中，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原来担负追击任务的薛岳部和川军也从东南方向压来。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时机贻误，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八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三日，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十几天后对编组又作了一些调整，规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北进，首先占领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在准备北上时，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四日至六日在毛儿盖以南不远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13)。同时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摇。朱德在发言时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14)。

沙窝会议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这以后，朱德同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暂时离别。要同张国焘共事，朱德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小事”。他后来曾回忆道：

“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两河口去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的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15)

朱德与党内同志共事一向以宽宏大度、谦虚礼让著称，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一贯是目空一切、专擅用权，在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便尽力排斥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而以个人意志挟制总部领导，进而同党中央对抗。

朱德和张国焘率总部去左路军后，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16)但张国焘仍坚持西出阿坝，甚至提出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夏挑战役和以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17)，它正好适应敌人希望把红军赶到人烟稀少的西部边睡地区的需要。《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改变了夏挑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

会后，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立刻率领右路军进入艰难的草地行军，同时，将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和朱德。随右路军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几次致电催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向夏、洮、岷前进。八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攻占包座，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区等候左路军的到来。

朱德指挥左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攻占阿坝，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部队在阿坝延宕不动。在党中央和右路军一再催促下，八月三十日，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二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

部队在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被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这条河本来很浅，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一时显得水势滔滔。它却被张国焘用来作为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会合的借口。他独断地以“朱、张”名义致电中央，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提出要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18)

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情况，朱德亲自到河边，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潘开文后来回忆道。

噶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噶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蹚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19)

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陈明义回忆道：“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20)

张国焘置朱德、刘伯承的反对于不顾，重新布置左路军的行动。九月五日，他在由噶曲河返回阿坝的途中，电令正要北上的第二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

那几天，等待在巴西的党中央几乎天天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矛盾的办法。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朱、张，说明“胡（宗南）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21)。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又在九月八日以“朱、张”名义致电徐、陈，要右路军准备南下。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向左路军发出电报，电文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炉、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 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 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接到中央电报后，朱德力主左路军应该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张国焘只得在九月九日单独用个人名义致电徐、陈并转中央，坚持他的南下主张。中央当天回电：“陈谈右路军南下的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22)

九月十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情况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地决定率一、三军先行北上。十一日抵俄界后，又致电张国焘，指令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23)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竟于十二日亲拟电致一、三军领导人，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一、三军“速归”，“南下首先赤化四川”(24)。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在朱德过去的生涯中，曾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两大红军主力会合整整三个月后，就这样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可是，这里还有由八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书写“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25)。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这才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

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26)会场气氛更加紧张。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看到一部分人这样蛮横地攻击朱德，刘伯承挺身而出，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27)这一来，把一些人的攻击目标转移到刘伯承身上。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阿坝会议没有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28)

有一次，张国焘等在会上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愤然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29)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九月十七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于十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在张国焘的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30)

为了扩大伪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31)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不一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了一阵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32)

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同志都关心他们，张国焘终于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

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中，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有了同部队接触的机会，就来看望这些指战员，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在五军团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33)

随左路军行动的总政宣传队也被迫跟着南下了。刘志坚和李伯钊不知怎么办好，先后冒着危险去探望总司令。朱德对他们说：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上豪分田地，主要是缺少政治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34)

由于朱德的引导，这些原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增强了信心，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到部队下层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就是一些一时不明真相，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态度。对他十分爱戴。

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那些坚持原则、反对他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朱德很为这种情况忧虑，一面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一面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朱德找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35)

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了，把他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朱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立刻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36)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这封信半途落到张国焘手里，张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的胸口上。朱德见状，上前把抢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

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让彭绍辉“回去吧”（37），使彭幸免于难。

还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住五军团二十多个掉队人员，给他们强加了一个罪名：“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武装叛乱”。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又是由于朱德的制止，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被抓的二十多人也回到了五军团（38）。

受到朱德保护而免遭不测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总卫生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

十月中旬，南下的红军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那时，张国焘渐渐觉得南下后没有办法，打不开局面，没有出路了，消极起来。朱德就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和徐向前等一起指挥作战。徐向前回忆说：

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

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和川军打过交道，对军阀部队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说：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要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朱总司令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的（39）。

经过多天的战斗，红军连克绥靖、崇化、丹巴、抚边、达维和懋功等地，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五个旅又两个团，毙俘敌三千余人，取得南下初战的胜利。

十月下旬，红军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邓（州）、大（邑）”战役，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进行中，朱德缜密地研究敌情、地形和战斗特点，及时了解战况，总结经验，作出战略战术上的指导。他先后撰写了《绥崇丹懋战役中我左支队二十七师两河口、抚边、达维、夹金山、日隆关、巴郎山一带战斗经过及其模范教训》、《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追击之失败》、《雪山老林的战斗》、《搜获俘虏之疏忽》、《对防空应注意之点》等文章。

在《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现存有手稿）中，他提出隘路战攻击时应注意之点：先头团要选战斗力强的，火力要强；要用迂回包围；侧击截断敌人退路，才能消灭敌人，并可使守敌动摇；突破敌人隘口时要猛烈追击，使敌人不能节节抵抗；遇某一要点或工事不能打开时，可以派队包围或监视之，大部队可绕路袭取敌后。

在《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一文中，他从部队已打出川西高原山险隘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这次战役在战术上应和绥崇丹懋战役有所不同，地形较平坦，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多是山地、隘路。作战

形式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但红军一般的战术原则，在这种地形上也是适用的，即集中兵力打敌人的弱点；机动地寻求打运动战，而不是被迫硬攻堡垒；即使打城市和打堡垒，也必须在野战中击溃敌人，再乘胜直追袭取之，或是在夜间或是在拂晓时发动袭击，并须注意对付敌人的阵地反击。

《对空防御应注意之点》一文，针对部队进入开阔地形条件作战、蒋介石投入大批飞机参战的情况，强调要加强防空教育，指出：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是拜物教主义者，绝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又要承认敌机确有杀伤威力，要研究采取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和具体措施，不应该空喊不怕，那只会使红色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文章对如何组织对空射击、对空侦察、对空隐蔽和伪装、疏散队伍及战斗中应注意之点，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红军迅速翻越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击溃杨森部、刘湘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共十七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广大地区。

蒋介石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薛岳部两个军迅速参战，刘湘也指挥川军主力倾全力扼阻红军向川西平原推进，在遭红军进攻的名山、邛崃一带集结了八十多个团二十余万人的兵力，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

南下作战一路告捷的红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十一月十六日，在攻占邛崃、名山之间大路上的重镇百丈后，遇到优势川军反扑，仓猝地展开决战。这是一场异常剧烈的恶战。川军由六个旅增加到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北、东、南三面反攻，以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接着，薛岳部又从南面压来。百丈一带地势开阔，无险可守。红军指战员浴血坚持了七天七夜，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出百丈地带。这一仗，虽然毙伤国民党军队一万五千多人，红军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

百丈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红军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这以后，他们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重兵相持。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拒，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下来。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经过几个月的苦战锐减到四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清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是一个转机。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40）。

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刻里，朱德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立场，又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始终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以取得进行说服教育的可能。以后，当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同中央会合时，他对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二十四、率领二、四方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北上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仍保持着电报联系。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十一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迅速扩展，民族危机急遽深化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些消息，都使处在困境中的朱德受到鼓舞，增强了他的斗争信心。

毛泽东到陕北后不久，曾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这番充满深情、信赖和期待的话，同朱德的心是相通的。

一九三五年岁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时，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复给朱德，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接着，就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

然而，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这是朱德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

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

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

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

不敢把事情做绝。

“转圜”的时机终于到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他是在这年十一月回到陕北的）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来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这对张国焘不啻当头一棒。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一些曾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张国焘进退两难，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陕北，要求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回电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作为过渡办法，同意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同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目前为一致对敌，夺取战争胜利，应有统一战略方针，方不致有利于敌。”

从这时起，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在军中的处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月初，战局对四方面军发生更不利的变化。国民党以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经过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朱德率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在战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总不断向朱总司令汇报敌情及我军情况，亦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长期相持拼消耗了，而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

正在这时，又接到中央来电，说明“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1），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二月中、下旬，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康北地区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前进路上，首先要翻过位于宝兴和懋功之间的三千多米高的夹金山。翻越这座雪山，对四方面军来说，是第二次，对朱德和原一方面军的部队来说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翻山是在夏、秋季，这次却在隆冬时节，当地有“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的歌谣。然而，五十岁的朱德率领红军不仅第三次征服了这座雪山，而且在向道孚进军中，又翻越了“万年雪山”党岭山。

党岭山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当地藏族人把它奉为“神山”，在隆冬时节更没有翻越的先例。朱德却率领着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向着它挺进了。

部队迎着风雪，向直插云天的陡峭冰峰攀登。越往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觉得喘不过气，头晕脑涨，四肢无力。到山顶时已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加上风雪弥漫。就像傍晚一样昏暗。接着便是漫漫长夜，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多少战士被暴风雪吞噬。但几万红军依然相互搀扶着越过了这座雪山。徐向前回忆说：“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12）。

翻过党岭山后，红军在三月一日占道孚，十五日克炉霍。到四月初，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现新龙）、泰宁，北连草原的大片地区。朱德率领红军总部驻在炉霍。

康北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域辽阔，但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物产贫瘠，对部队的生存发展都极不利。红四方面军原来不打算在这一带久留，只想在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这时，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传来。为了策应他们北进，红四方面军改变原有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

这一改变，是根据朱德的意见作出的。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仍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军团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黔南、滇东，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占领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台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13）。三十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以尽力策应”。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自行判断决定的余地：“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14）

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抢渡金沙江。

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同志（二、六军团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谈起过这次决策的经过：“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进”，同时，他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15）。

这中间，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几乎使原来的决定发生改变，多亏朱德的

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才使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策应二、六军团北上的决策没有动摇。当时，张浩曾来电，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16)。这个电报，曾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不知该怎么办。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17)

为了这个目的，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地区等待了整整四个月，这是异常艰苦的四个月。

曾亲历其境的老红军回忆说：“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员多达上千人。”(18)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四月一日，朱德领衔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此后，全军就在“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迎接二、六军团”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开展部队整编、军事训练、筹集粮食和御寒物资等工作。

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要求大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他又找来随红军行动了一段时间的“通司”谈话，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四月，春天已悄悄来到高原上。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正等待着耕耘，就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胞把地种上。他在动员大会上讲，“俗语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不能！这一季种不上，藏胞们将来吃什么呢？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19)。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锄头，在田间一起干，把许多事留到晚间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藏民们陆续回来，疑雾逐渐消除了，炉霍镇重新喧腾起来。红军在康北地区和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红军在藏族地区执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他们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穷人”的宗旨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听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格达活佛见到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艰苦朴素、亲切慈祥，更积极地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波巴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全国解放初，格达活佛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去西藏做地方政府的工作，为

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后来在昌都圆寂。

四月二十七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20)同时，电令已奉派南下雅江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西出理化（今理塘），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

由于同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已指日可待，四方面军便加紧北上的准备工作。部队精简机构，减少指挥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力，全军经过整编后辖六个军约二十八个团。为了在北上途中侦察道路、对付敌军骑兵的袭击，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师，由许世友任师长。骑兵师成立之日，在大草原上举行阅兵式。朱德在检阅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顺利北上同陕北主力红军会合作出贡献。

北上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筹集粮食和赶制御寒装备。红军总部责成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组成粮食委员会，筹集粮食和牛羊。但当地物产贫瘠，征集到的食品仍很有限，因此，要严格控制部队在康北期间的消费，分配给每个指战员的粮食每天只有几两，不足的部分要靠野菜等代替。朱德自己领导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其中有老农和医生，由他亲自带队，从漫山遍野的野草中，找出二十几种可食的野菜，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连队。各连队还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节约粮食。

对御寒物资的准备，当时在总部供给处工作的杨以山回忆道：

“总司令对我们说：不仅要学会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学会同雪山草地这个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革命才能胜利。

他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解决部队长征御寒问题。他每次参加总部机关开会，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并推荐一些织得好的毛织品，让大家传看学习；表扬那些织得好、织得快的同志，他每次到我们供给部门来，手里总是捻着毛线，一边捻，一边亲切地给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过雪山草

地的准备工作，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来的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多准备些御寒衣物。”(21)

在朱德的带领下，经过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为了活跃部队生活，红军总部在纪念“五一”和“五卅”这两个日子里，举行纪念大会，并由朱德倡议，举行了运动会、展览会。运动会上，最别出心裁的项目，是朱德提议增设的烧牛粪比赛，这也是为过草地所做的必要训练。朱德在运动会上讲话时说：这次运动会是对我们的思想、意志、军事、生活等方面的一次大考验、大演练、大检阅，同志们都做得很好。这再一次证明我们工农红军是钢铁的红军，是永远打不败、压不垮、拖不烂的(22)。

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红四方面军南下策应的部队抢占雅江，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会合业已在望，朱德立刻召集会议，布置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这时，党中央也在五月二十日来电，表示对他们“采取北上方针一

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23)，这使朱德感到欣慰。张国焘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便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他的分裂活动终告失败。

这时，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的时机也很有利。六月中旬，党中央根据两广事变发生后胡宗南等部被调南下、甘南地区敌军空虚的形势，来电指出：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时，“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24)。二十五日又来电询问：“兄等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同时说明：“胡宗南业已南调，空军亦大部调去。兄等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浅。”(25)四方面军在六月二十五日作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迅速北进，乘虚出岷州地区的决定。六月二十二日，沿雅砻江北上的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带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朱德从炉霍赶到甘孜，前去普玉隆迎接。三十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也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又前往迎接。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二、六军团领导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伪中央等情况，两军前锋会合时，张国焘又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同二、六军团领导人分别谈了话。他同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前来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26)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27)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张国焘答应把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编到二、六军团一起行动。二十多年后朱德回忆起这事时说：“后来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人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28)

七月一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当天，党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29)。

会师后，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辖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约一万六千余人。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参加这次盛会的老红军回忆道：

“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艰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谁能抑制住内心的激情？”

“总司令迎着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和无数兴奋激动的笑脸在主席台上出

现了。他个子不高，不像我想像中那样高大、严肃，稍稍有些黄瘦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他向全场巡视了一下，用响亮而有力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

“总司令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铭记在全体指战员的心里。”(30)

在甘孜，朱德主持召开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说明中央来电要二、四方面军趁甘肃敌方兵力空虚，速出甘南；并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李先念率先头部队已开始行动，二方面军在甘孜稍事休整后，随左路跟进，分成两个梯队北上。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一部署。会议决定，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实现“迅出甘南”的计划，七月一日，朱德从甘孜致电在炉霍的徐向前，要他率领中路纵队立即出发，“迅速向松潘前进，勿失良机”(31)。三日，朱德和张国焘、任弼时率领左路纵队由甘孜出发。七月中旬，右路纵队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北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三路纵队先后通过茫茫草地，在八月上旬到达巴西、包座地区。这次北进，对于第一次过草地的红二方面军来说，困难自然很大。朱德清楚这一点。他经过噶曲河时，见红四方面军的兵站正给各部队分发新缴获来的牛、羊，便对大家讲：同志们，谁都知道，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后面，那就更苦了。沿路的野菜都被前边部队吃光了，他们连野菜都吃不上。所以，总指挥部决定，各单位所有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昨天缴获的羊和牦牛，全给二方面军留下。他把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也牵来交给兵站，嘱咐兵站负责人说：“记住，告诉部队负责同志，牛皮、羊皮和肠、肚都不能丢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不能浪费。这关系到四方面军后卫和二方面军几万同志的生命啊！”(32)

{ewc MVIMAGE,MVIMAGE,!09100020_0379_1.bmp}

七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八月一日，毛泽东等得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走出草地、占领包座后，来电表示“无任欣慰”，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33)同一天，朱德等回电中央，说明“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桃、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并表示：“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34)八月三日，党中央复电朱德等：“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

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35)

八月五日，朱德和红军总部制订《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将四方面军分成第一、第二纵队，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洮、西地区；以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策应第一、二纵队。大军随即由川北挺进甘南。八月九日抢占进入甘南的天险腊子口，十日攻克哈达铺，接着在一个月先后攻克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以破竹之势横扫甘南，岷州也处在红军的包围之下。红二方面军则由哈达铺向礼县、西和、成县、徽县、两当、略阳一带发展。这时，党中央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令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征军，在聂荣臻、左权率领下，西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三个方面军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

九月初，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大道，隔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通路。

根据情况的变化，朱德等在九月十三日致电中央，提出“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36）的作战建议。毛泽东等同日回电说：“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西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指马鸿逵部）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
(37)

九月十四日，毛泽东等再次来电指出：“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38）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毛泽东等接连来电，说明敌情，要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将被截堵隔断，并说明一方面军已派第一师向隆静大道北侧运动，加以策应，“机不可失，千祈留意。”（39）

在不断接到中央来电的同时，朱德多次找张国焘、陈昌浩等商量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力主按照中央要求，迅速北上至隆、静线。张国焘畏胡宗南部如虎，又看到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就打算改变主意，主张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陈昌浩被朱德说服，同意迅速北进，实现同一方面军的会合。

九月十六日开始，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西北局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主要是讨论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西北地区的地方工作等问题。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时，朱德说：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它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要马上执行，并进行传达和教育，使大家对此都能有所理解。（40）每天会后，朱德都同张国焘争论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陈昌浩也站在朱德一边，双方总是争论到深夜，会议开到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

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成员赶到张的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41）

九月十八日晚，朱德和张国焘、陈昌浩联名向在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42）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要求各部带四天干粮，极力轻便伪装，尽量采取夜行军。同日，将这一作战计划电告中央。

岷州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赶到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朱德回到红军总部部署各部队的北上行动。二十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告诉他们：“甲、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乙、每晚请通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丙、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迅速取得会合在静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丁、请扩大动员拥护这一会合。”（43）中央接电后，在二十一日回电说：“四方面军北上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44）朱德接到电报后，在二十二日回电说：“合组军委集中指挥，我甚同意。张、陈两同志现去前方，征求意见后再复。”（45）

就在这一天，事情突然又发生变化。

张国焘到达漳县前敌指挥部后，立刻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西渡黄河的主张，还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46）。接着，又提出一套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足点的方案，并且不经朱德同意，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去密电：“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47）企图切断朱德同党中央和各方面的联系。

朱德在几天后举行的会议上谈到那几天的经过：“当时国焘同志表示不干，我就回来作计划。我们同昌浩又到国焘同志那边去，讨论，结果大家还是赞成第一个方案（按：指北上会宁、静宁的方案），国焘同志表示服从这个决议，结果国焘同志先走了，昌浩就赶上来。而结果国焘同志到前面来，完全改了。”（48）

这又是一个关键时刻。

朱德在这种关键时刻是十分坚定的。他一夜没有睡，在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致电张国焘等，说：“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赞同，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并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49）。同天，他又排除阻挠，致电党中央和在陇南的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告诉他们：“（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乙）现在将西

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50）朱德还发出电报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西北局成员兼程赶赴漳县开会。天一亮，他立刻骑马奔往漳县，一天内赶了一百二十里路。

九月二十三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他平时讲话一向很平和，这次却同张国焘展开激烈的争辩。他说：“第一个战役计划和第二个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个计划是有利的。”“所以我坚决第一个计划。现在即决定第二个方案，对整个形势不能抓住，会合要迟，联合战线受影响。”他反复阐明，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他向张国焘提出一连串尖锐的责问：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张国焘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地说，他是书记兼总政委，调动部队他完全负责，经他决定了可以不经朱德同意，当他不能执行职权而别人要调动军队时，他要提出抗议。由于张国焘宣传他所以主张西进，是因为这时黄河容易渡过，又可以避免同强敌胡宗南在西兰大道上决战，将来仍可以达到会合的目的，等等，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表示他坚持岷州会议原案，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任，并把这个决定报告中央。他斩钉截铁地说：“若强我们赞同是不可能的”（51）

漳县会议后，张国焘立刻命令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西向洮州进发，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

九月二十六日，党中央致电四方面军，告诉他们：“确息：胡宗南部到略阳，本月底其后续部队将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指出四方面军“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52）

这一天，张国焘向中央连发四封电报，语气已经软下来了。其中，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在十二时发出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现已按此调动，不便再更改，务祈采纳。”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在最后说：“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53）这是张国焘第一次表示他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接受党中央领导。在同日二十时发给贺龙、任弼时等并党中央的电报称：“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长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此心此志，千祈鉴察……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54）在同日二十二时发给中央的电报称：“请重看甘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55）同时又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56)这时，张国焘已接到西进先头部队反映：从老乡处了解到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感到进退两难，骑虎难下，因此，表示尊重党中央意见，再作最后决定。

二十七日，中央回电明令停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甲）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的危险”；“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57）。同日，中央又来两电，前电介绍敌情，指出“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58），后电介绍拟与南京谈判问题，又嘱：“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禱至盼。”（59）

这一下，张国焘再也没有拒绝北上的借口了。同一天，朱德和张国焘、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甲）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同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的先机之利。（乙）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静，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60）

九月二十九日，中央来电对四方面军决定回师北上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61），并告诉他们策应的部署。同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作五路纵队，自岷州、漳县等地北进。

十月二日，一方面军前来接应的部队占领了陇东的会宁城。五日，四方面军第三十军重点占会宁南面不远的通渭，全军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向会宁挺进。

盼望已久的会师日子终于来到了。

朱德率领总部在十月九日到达会宁。他见到党中央派来的一方面军部队时十分激动，同红一师师长陈赓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还同在九十里外界石铺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了电话，萧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四川口音，使我真兴奋得要跳起来，给我打电话的，正是我们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我是多么想念他呀！总司令首先关切地问：“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这次电话，打了足足有半个钟头，真不知有多少话要说。”（62）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大会合。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也胜利到达会宁以东的静宁县东北的兴隆镇、将台堡同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使蒋介石受到很大震动。他下令以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追击，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将它消灭在黄河以东地区。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赶到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二十一日，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等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合力作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给追击的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歼灭一个多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这次进攻。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山城堡举行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的庆祝胜利大

会，朱德在讲话中兴奋地指出：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给追击的胡宗南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63)。第二天，由朱德领衔，和张国焘、彭德怀、周恩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联名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报告：“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听了中央军委代表及各红军领袖的报告之后，一致在党中央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领导全体指战员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任务，……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强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定能够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64），这标志着全体红军终于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十一月底，朱德和周恩来、张国焘同行，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同中共中央会合。他受到党中央和根据地军民诚挚而热烈的欢迎。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分离后的情况和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斗争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65）。

“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这十个字，确实是对朱德一生，特别是他在充满着惊涛骇浪的这一年表现出来的超乎常人的思想品格所作的最好概括。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整整两年时间，朱德经历了红军长征艰难曲折的全过程。从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西北实现三大主力的大会师，他作为红军总司令，始终挺立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在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他坚定不移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他身陷逆境，却能如中流砥柱，稳若泰山，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化险为夷，终于完成把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在一起的历史使命。这是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又一伟大历史贡献。

长征胜利结束后不久，朱德对他这种艰苦备尝的经历，留下的却是如此轻松、生动的回忆：

“在长征中间，身体很强健，路上就没有病过了，多半是夜间走路，白天睡觉。有事马上就办。我只有一个担子，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马伕，四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

“我的脑筋也是与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就是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

当过草地的时候一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的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逢到极困难事情，一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他也就变得好些，不那么慌张了。当为一个领导者，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愈危险，

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置得很恰当。” (66)

在极端复杂而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乐观、冷静的态度，做到履险如夷，这是朱德十分可贵的品格。

二十五、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情势稍形平静，朱德获得了一次学习和休整的机会。这在他长期的戎马生涯中是很难得的。他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历史著作，回顾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参加“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研究会”，在红军大学教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

这时全国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势力迅速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年十二月九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要求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决议中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表明国共关系在严重民族危机下已发生重大变化。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日本侵略者指挥的伪蒙军正向绥远大举进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奋起抗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同毛泽东联名致电傅作义，称赞他“孤军抗战，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同月月底，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县，同中共中央会合。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等暨全体红军发表《致蒋介石书》，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争取和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这时正在顺利开展。十二月十二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主张抗日、反对“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去催逼他们“剿共”的蒋介石，对他实行“兵谏”。几天后，蒋介石向前去看望他的周恩来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遭到蒋的软禁。国民党中央军顾祝同部正准备从潼关向西安推进。大局一时还没有完全明朗。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现在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应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反对内战”。二月一日，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表示：“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也”。他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遵守原已许诺的“国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兵之命令”，并声明已“将红军各部队停止于苏区边境，对苏区邻近之各国民革命军部队不加以任何攻击，确守互不侵犯原则。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之成立。”

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在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

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二月二十一日通过了一项事实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是红军新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

将要到来的全国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朱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群众力量的组织动员问题，说：“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因此，他强调：“首先应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否则一切全是空的。”“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

他认为游击战争将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党校与红大要加强训练游击战争的干部，以后要派一批干部到地方去当教师，游击队的队长、政委主要要从当地创造”，“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是可以培养出这方面的干部的。”他还指出：“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不打。最要紧的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他总结了过去军队工作中的两个教训：“一是大革命时代的教训，只做上层工作；一是大革命以后，只做下层工作、破坏工作。现在，我们要打入进去，上层、下层都要做工作，不做破坏工作，只准备进行争取。”

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组织了一个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于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重要任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目前军事教育、国内战争经验教训各项问题，并拟具体意见提交执行机关。”这个委员会由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五人组成，朱德任主任。

这个时期，朱德和红军其他领导人为了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朱德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

一九三八年发表的朱德的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对抗战初期敌后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抗日游

击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知道再不抗日不行了。但是，要抗日就要联共，对这一点他仍很犹豫，国内团结的形势仍蒙着一层阴影。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接见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学者T·A·彼森时指出：

“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为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必须跟我们合作。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甚至全中国四万万人都不够。国民党如果以为只要用它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错了算盘。那它是不明白，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能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尽管蒋介石还在犹豫，日本军国主义者全面侵略中国、“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的“根本国策”已定。六月三十日，日本近卫文麿担任首相后，就采纳扩大侵华战争的建议。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驻北平的日军制造借口，向驻守北平西南郊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突然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还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的号炮响了，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在全国人民中立刻掀起了新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站在这个爱国运动的最前列。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发表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在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指出：

“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通电发出后，红军立即从事开赴抗日前线的行动准备。七月十一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同天，毛泽东、朱德就这个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甲、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请即令二十八军、三十二军两部加以训练，准备从他军补给该先去部队子弹；二十七军即开洛川，暂维交通。乙、红大增加抗日课程，准备派出。”（11）

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

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电令红军各部：限十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并要叶剑英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与长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12）同一天，朱德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题写下了誓词：

“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

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12）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396_1.bmp}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即：团结抗日，实现民主，改善民生。朱德写了《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他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时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指出，“和平已到了绝望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这篇文章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

十八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二十二日，抵达云阳。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他这时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解决。但日本侵略者毫不让步，更加咄咄逼人。同月二十七日，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特别议会上发表演说，称：“军部已决意向前进行，克服一切困难，俾能达到膺惩华军，令其失去战斗精神之目的以前，亦决不罢手。”第二天拂晓，日军猛攻二十九军阵地，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这时，增援的侵华日军陆续抵达华北。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全国震动。

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的谈判已难继续下去，蒋介石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七月二十八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第二天，正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

八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去。六日，朱德和周恩来从云阳抵达西安，会同已在西安的叶剑英在九日同机飞抵南京。

十一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14）

当时，蒋介石虽然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但仍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不肯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他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分别直属行营，分割使用，不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

权指挥。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无法接受的。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八月十三日，恰如朱德两天前所预料的那样，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不得不放弃原来对红军的无理要求，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在二十二日正式发表这项任命。一个月后，拖延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公布，蒋介石同时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

由于在主要问题上已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为了早日完成红军改编，出动抗日，朱德决定提前离开南京回到陕西。八月十六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洛甫、毛泽东，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除初步商定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外，国民党当局同意每月发给军饷五十万元，另拨开拔费二十万元及一批物资。电文的最后提到：“朱于本日乘车回陕，叶仍留京进行各种联络及交涉补充款等事宜。”

八月十九日，朱德回到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加紧进行红军改编工作。第二天，他和彭德怀率全体指战员发布《留别西北同胞书》，说明：

“敝军要与相聚八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父老兄弟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那时再回来与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见，过快活的太平日子。”

同时，发布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表示，“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上前线去，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

还发布告抗日友军将士书，指出：

“我们和你们同是黄帝子孙，同是中华军人，同是患难

中的朋友。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

在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等改编全部就绪，就开始出动。八月二十二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

朱德在对红军的改编和出动迅速作了部署后，就赶到洛川县冯家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举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它从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共开了三天，着重讨论了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方针问题、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朱德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多次发言，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发动游击战争。

在军事问题上，朱德主张，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估计日本[军队]是外国军队，便利我们的行动。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出动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人家（指国民党军队）败了，不好。”（15）“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能速决。持久战，主要是发动

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他认为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但“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日军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并且在群众方面、地利方面，白军作战都要失掉一些效用，[红军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因此，“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我们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16)“局势变化，可能我们有一部去绥东。”(17)整个来说，“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18)他还要求，在红军出动后，后方也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19)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要处理好，“我们要谨防扒手！但过分防了也会限制自己。看清楚，我们自有办法。”(20)在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又说：从边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的同志，“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糊里糊涂[会]被人吸引[过去]”；“个别[同志]是应警觉，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要打破……有了革命的环境、革命的理论、革命的阶级，我们是能争取吸引国民党的胜利。”(21)他号召大家发扬红军吃苦耐劳的长处，做好工作。

在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等十一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22)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

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副主任。二方面军、二十八军、二十七军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梯[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副主任。第四方面军及二十七军（原文如此）、二十九师、三十军等部，改编为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以上之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成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此外，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九月，萧劲光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后方留守部队。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战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党的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

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组织之。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统辖。(23)

八月二十九日，朱德、彭德怀向全国发表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表示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24)二十六日，他们又签发《八路军总指挥部布告》：

本军奉命抗日 为求民族生存
拥护中央领导 驱逐日寇出境
团结全国各界 联合法苏美英
保卫中华领土 收复失地完整
实行统一战线 抗日救国纲领
本军纪律严明 买卖照常公平
禁止拉夫拉车 禁止侵犯百姓
凡属中华同胞 一律保护认真
汉奸敌探间谍 严办决不容情
望我国人奋起 共负救亡责任
抗日战争胜利 大家共享太平

这时，日军增援部队已从国内源源开到，以平、津地区为出发点，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华北发起新的进攻。由于形势紧急，除已提前出发的第一一五师外，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又在八月三十日向中共中央建议第一二一师和一二九师于九月初出动。当时山西地处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从陕北东出抗日，必须首先进入山西。山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同中国共产党已初步建立起合作抗日的关系。因此，由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先去山西，安排八路军开赴前线的有关事宜。

九月二日，第一二一师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到敌人后方去，把华北广大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并要求大家英勇作战，严守纪律，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三日，该师整装出发，继第一一五师开赴华北前线。

二十六、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随着第一二 师的开拔，八路军总部也在九月六日由朱德率领从云阳镇东进。

八路军总部的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举行。大会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主持。全体指战员跟着朱德一字一句地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总部出发的那天，濛濛细雨压住了道路的尘埃，队伍中除总部机关外，还有随营学校的三个团和警卫总部的特务团。

九月十六日，总部到达韩城县芝川镇，决定在这里渡过黄河。先前出发的一一五师和一二 师都是从这里过河的。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搭乘同一条船，木船在汹涌翻滚的波涛中渡过黄河后，他们就踏上正燃烧着战火的山西大地，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朱德在总部出发前一天，给四川的亲属写了一封信。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写家信。信不长，但充分反映出他此时的心情和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操。信中说：

“别久甚念。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等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理书（二哥之子）、尚书（大哥之子）、宝书（朱琦）等在何处？

我两母亲（生母和养母）是否在人间？……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我从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

这个月的下旬，他又写了一封家书：

“理书、尚书、宝书、许明扬（大姊之子）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耐劳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好办……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不久，他的外甥许明扬等随第四十一军来到山西，找到了他，他才知道家里的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迫害的情况，家中经济非常困难，所幸生他、养他的两位母亲还健在，都已八十高龄。这一年正是荒年，难以度日。他只能向川中好友戴与龄借贷二百元寄到家中，稍尽心意。

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一过黄河，队伍就向同蒲铁路南端的侯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020_0406_1.bmp}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020_0406_1.bmp}

马镇（今曲沃）跑步前进。到了侯马，火车站里外挤满了人，观看八路军上火车。其中有不少沦陷区逃来的难民，对开赴前线的八路军更抱着强烈的期望。

这时候，华北战场上七八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除一部分部队进行了抵抗外，大多一触即溃，有的甚至还没有同敌人接触就望风而逃。日军一路烧杀奸淫，如入无人之境，国民党溃军的纪律也很坏，人民痛苦不堪，心情异常焦急。红军在一年多前曾渡河东征到过山西，许多人对红军的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留有深刻的印象。因此，八路军东出抗日的消息传出后，关于八路军和朱德总司令的种种传说在民众中广泛地流传开来。有的说八路军已开到山海关。有的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有种种神奇的本领。跟随朱德东进的潘开文回忆说：

“在过去对于红军有过深刻印象的山西人民，如今能亲眼看着这支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开上抗日前线，自然感到无限的兴奋。八路军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进，直到原平下车。

这一路上所过的城镇、车站、村庄，莫不遇到广大群众扶老携幼的夹道欢呼。我们有一列兵车，过太原时，已在深夜十二时，而大批男女群众，特别是东北的流亡学生，都拥挤在车站上，整夜不眠地欢送八路军上前线。”

朱德率总部每到一地，当地群众更是热烈欢迎。当时担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的傅钟回忆说：

“火车在吕梁山东麓、汾河东岸向北开进，沿途的车站越来越多地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无论商人、学生、工人、农民，都拼命往前挤，要看看红军——八路军的朱总司令。朱总司令的四川话人们听不懂，但看到那位向人们招手的长者，衣着和别的军人一样，脸色比别人黑一点，像长年辛劳的庄稼汉，面容纯朴，慈祥……人们便以喜悦的神情、亲切的语

言，表明自己的感触：八路军的总司令不像国民党军队的长官，老百姓是可以亲近的！这，便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像一座桥使八路军和人民的无穷力量相连接起来。”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东进途中，在九月十一日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由于八路军出师后，这个名称已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尽管它改变了番号，但除正式公文外，一般情况下，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八路军。

那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根据战场形势，将临战地区划分了五个战区。八路军到山西参战，山西属第二战区，八路军列入该战区序列，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

阎锡山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手段灵活、具有一套特殊统治办法的地方实力派首领。他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又处处提防蒋介石把势力伸入山西。他同日本人联系，又拒绝参加日本人在华北发起的“五省自治运动”，并在侵华日军窥伺晋绥时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表示他不反日，只是不让日本人占领他的地盘。他反共，但又佩服共产党有人才，有办法。所以，他在抗战初期任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用某些共产党的办法，想利用共产党帮助他“守土抗战”，而又暗中设法抵制共产党。正是这种特殊情况，使他在抗战初期采取了某些开明的措施，有利于山西抗战局的开展。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朱德到达山西省会太原。当天下午阎锡山派一名高

级参议接朱德到雁门关以西的太和岭口的前线指挥部去商谈。已在太原并同阎锡山见过面的周恩来陪同朱德前去。他们一行乘汽车第二天清晨抵达太和岭口，会见了阎锡山。这次会谈比较顺利。阎锡山允许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不好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还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阎锡山也要求八路军帮他抵抗向山西进攻的日军。二十三日，朱德回到在上一天移驻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部，把这次谈判的结果报告中共中央。

八路军开到前线后，当地群众迫切希望它能早日参战并取得胜利。彭德怀回忆说：“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急切。”萧克也回忆道：“有一次，我参加太原一个群众大会，我在会上讲，八路军上前线去，是不会退下来的！就这么一句话，全场掌声雷动，非常热烈。”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期望，强烈地感染着八路军的广大指战员。

但是，八路军能不能战胜日本侵略军？有些人因为看到八路军的武器装备比较差，心里还存在着疑问。就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内部也有人感到不是很有把握，因为面对的敌人是过去没有交过手的，有大炮、飞机、坦克等现代装备的日本侵略军。朱德却信心十足。他综合政治、经济、人、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对战争作出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他认定，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不可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他们对地形不熟悉，对山地作战的训练也不够。虽然武器装备比较好，但武器不是万能的，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力量；同时，它也有可以被制服的方法。再加上日本是小国，兵员和经济力量都有限。因此，他坚定地认为“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我们能够打败日军。

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决心选择时机，在山西先打一个胜仗，以打击日本侵略军的骄狂气焰，鼓舞全国人民和友军的士气，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在第一一五师担任团长的杨得志回忆道：

“朱总指挥和彭副总指挥号召八路军全体指战员以‘与华北共存亡’的决心，兵分两路迎战日寇。一路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一二师，驰援雁门关；另一路就是我们一一五师，从侯马乘阎锡山派出的接兵车，沿同蒲路日夜向平型关急进，迎击进犯之敌。”

八路军的作战方法，不采取国民党军队那种“节节防御的办法。”朱德后来说：“这样摆起来，要想处处防守，结果什么地方都没有防守得住。”

“我们八路军专门打敌人的侧后方。八路军八月渡河，九月参加作战，首先我们就决定把八路军用在敌人的侧后方。”(11)

这时，平绥线日军正分两路南下，其中一路由蔚县、广灵、涞源进攻平型关。这一路日军是精锐的板垣师团，刚从日本本土广岛开来，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骄横异常，来势凶猛。平型关告急了。

平型关是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的重要隘口。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在群山之间，通向灵丘、涞源，地势险要。九月二十三日，阎锡山电告朱德：二十二日夜间日军忽然奇袭平型关阵地，发生激战，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这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正向平型关附近开进，朱德、彭德怀立刻电令：“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12)；同时，电告毛泽东：“灵丘之敌

于昨晚迫平型关附近，正在激战中。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并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13)朱德还把一一五师准备进攻和一二一师开进的情况，也向蒋介石、阎锡山报告。

这样，八路军开到了日本侵略军的后方。从此，“敌人的后方就有了我们的队伍了，”“在这以前敌人后方没有队伍。那时我们的秘密敌人不知道，相反的，我们知道他的秘密。在敌人后方发展是不是很困难呢？敌人宣传的那样厉害，大炮、飞机、坦克那么多，结果恰恰相反的，没有过去打仗那样危险，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敌人那里的群众是我们的。”(14)“从前敌人后方一向是很安全的，几千里路无人搅扰。八路军去了，使敌人的后方不安起来。”(15)

八路军开到山西后打的第一仗，便是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斗。

九月二十四日深夜，一一五师主力根据总部命令，在黑夜中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以东前进，拂晓前抢占了通向平型关的汽车路两侧高地，在这里冒雨设伏。这里是日军开往平型关的必经之地，公路两侧的高地，居高临下，地形很好。上午七时左右，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进入该师伏击地。一一五师吹起冲锋号，指战员们立刻向山沟中的日军扑去，战斗开始。朱德后来说：“精锐而骄傲之敌，警戒异常疏忽，我主要部队已进而切断敌由南至北之交通线时，敌尚未发觉。直至我方开始射击，敌才知道。我以迅速进攻之手段，夺取敌之主要阵地。”(16)由于利用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手段、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和近战特点，日军的飞机和大炮也难以发挥威力。经过一天激战，共毙敌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日军的秘密文件，其中包括日军华北作战计划及目标的日文地图。“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便是秘密、迅速、坚决，是采用白刃战解决的。”(17)

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同日军作战，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大捷。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向八路军致敬和慰问的电报、函件从全国各地雪片似地飞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以及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朱德、彭德怀报告毛泽东说：“红军地位已成了神奇古怪的东西。多数国民党军队，特别晋军有专靠红军吃饭样子。”(18)连处在日军进攻直接威胁下的民众也热烈举行庆祝。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回忆说：“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敌机的空袭都忘记了。”(19)这次胜利对敌后抗日民众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群众因之有了信心，敢以很小的队伍来袭击敌人，敌人也因之而胆怯。”(20)

毛泽东对这次胜利很满意。二十九日，他致电周恩来、朱德等，表示：“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但须计算这仅是战役的暂时的局面，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21)十月一日，毛泽东又致电正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等，向他们通报了平型关战役的结果，并说：

“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其中有蒋介石、杨虎臣[城]、马鸿逵、范长江、龙云、孙蔚如，上海大公报、上海职业救国会，杭州、福州、湖北、广东、陕西、开封各省党部，武汉行营，开封绥靖公署，浙江、福建各省政府，浙江抗日后援（救国）会等。”(22)

“平型关战斗一结束，朱总司令即带领一些同志到一一五师驻地参加总结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23)他对前来采访的史沫特莱、周立波、舒群等中外记者分析了日本军队的强点和弱点。他认为，日军的强点：一是武器较好，并善于发扬火力；二是作战顽强，不肯缴枪。他解释说，因为他们杀死我们很多人，怕我们报复，他们的长官就是这样欺骗他们的。三是能按计划行事，退却快，援军也能很快开来。他们的弱点：一是战斗精神差；二是防守时不善于做工事，警戒疏忽；三是爬山不如中国兵；四是胆怯，怕肉搏战。他阐述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他说：“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补给。在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永远避免阵地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我们发展游击战，扰乱、吸引、分散和消耗敌人。我们的游击战给敌人增添了很多困难，这就便于我们的正规部队在有利情况下展开运动战。”(25)不久，他在一次讲话中又指出：

“我们以劣势武器要战胜现代化的强敌，在战术上就必须善于灵巧机动的使用自己的兵力和兵器，发挥自己旺盛的攻击精神，选择有利阵地与时机，抓住敌人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和兵器，采用秘密、迅速的动作，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进行肉搏，坚决消灭之，否则即难于成功。”(26)

八路军东进时，原定目标是集中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恒山地区挺进。九月十七日，毛泽东鉴于日军的战略计划采取以大迂回的姿势包抄太原，便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并依据战局发展趋势，变更战略部署，要求八路军各部准备分别转至管涔山区、吕梁山区，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将来依情况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区。(27)

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朱德根据中共中央这一部署，迅速将八路军各部由集中配置改变为分散配置，实行大规模战略展开，并大体划分了各部的工作地域：第一一五师控制五台山、恒山，活动于晋东北，着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控制管涔山，活动于晋西北，并以一部到冀西活动，这里是即将沦陷的地区，朱德要求该部“在最短期内将群众发动起来，每三天将工作情形电告一次。”(28)

九月二十八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洛甫、毛泽东等提议：“敌人深入山西后，我们在山西发展前途，应以山西人民、地形、交通诸具体情形及华北大势来作一总的估计。”他们认为：“黄河北岸以现在情形看，被敌占去极大可能。”“无论怎样，我们应有决心争取晋东西两大山脉，将巩固游击区，使入晋敌军陷入我群众重困中。我们应以一切力量争取抗日运动的扩大。”他们建议：“一二九师应即出动，暂以娘子关南北为目的，因我已取得相当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且在有利地形条件下，不会被迫决战。在今天局势下红军与敌决战没有好处，但在有胜利把握下，部分袭击敌人，扩大声威，提高友军士气是必要的。”(29)三十日，刘伯承率第一二九师先遣队从陕西富原县庄里镇出发东进。这个师先进入正太铁路以南的平定地区，然后着手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根据地。此外，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还率领一批干部，前往日军尚未到达的晋西吕梁山区开辟工作。

这样，八路军各部在山西一带分布的基本格局便大体确定下来。

八路军各部在山西一带实行战略展开后，朱德就命令各部在各自的工作

区域内，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政治上，着重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经济上，立即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并没收汉奸大地主的土地；在军事上，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并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不断消灭敌军小部，兴奋友军。朱德要求各部要模范地遵守纪律，积极团结友军，帮助他们改变呆板死守的战术；同当地政权机关采取合作态度。(30)各部根据总部指示，向各地派出大批工作团，积极创造抗日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并陆续派出有力支队向平原及更深远的敌后发展。

八路军从出师东进起，到这时才一个多月，便已在华北抗日前线创造出一个很好的局面。

十月三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等，把八路军在山西展开并深入敌后的情况报告他们：除以主力位于平型关、雁门关、朔县一线的两翼侧外，已组织了四个支队，挺入敌人后方。“各该支队均以袭击敌之后方、截击运输连络部、破坏交通道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扩大游击战争等为任务。”“现涞源、广灵、灵丘交通已被我完全截断，敌白天已不敢运输，改由夜间行动。”“据各该支队报称，敌后方极为空虚，民众抗日情绪很高，对我军热烈欢迎与帮助，特此奉闻。”(31)

八路军的到来，使山西、河北战地的群众有了凝聚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号召和领导下，在八路军支持下，纷纷起来组织抗日游击队。

在河北，发展得比较快的是共产党员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游击队。杨秀峰原是北平的大学教授。抗战开始后，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特派员的名义，带领一批学生来到冀西的赞皇、元氏、临城、内丘、沙河各县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配合八路军骑兵支队打开被日军占领的临城和内丘两座县城，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在山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基础更好，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对推动群众抗日起了巨大的作用。牺盟会和决死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产物。它们名义上是当时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领导的团体和部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组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团体和革命武装。九月三十日，朱德、彭德怀曾兴奋地电告毛泽东：“阎决组织新军队几个团，以牺牲同盟为基本，以决死队为骨干，其中主要干部系同志。决死队有政治委员制，权力很大。决死队政纲减租减息、减税减价，已开始撤换旧县长，实现民主。”(416)决死队最早成立的是第一纵队第一总队，相当于一个团；以后发展成一支具有正式番号的五十个团的队伍。当日军深入山西腹地时，在八路军和“牺盟会”、“决死队”的推动下，各地群众纷纷起来组成游击队，广泛发展抗日的武装斗争。

这年九、十月间，担任决死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薄一波率领第一纵队的第一总队北上五台，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他在从五台去盂县的路上遇到朱德总司令，向朱德汇报了自己的打算。朱德早就知道薄一波是共产党员，听了汇报后，就很明确地对他说：“你不要在这里，马上离开五台地区。这个地区是个战略要地，形势很好，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直趋太原，是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不要在这里了。”朱德还告诉他：“我从延安出来时，毛主席和我谈论过，

我们要把军队插到敌后去，创造抗日根据地。现在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和下围棋一伴，先要在敌后沦陷区做出几个活眼，以便在敌后同敌人长期周旋。现在，我们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三个战略要地”；“现在给你一个任务：马上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去，要占据那个地区。”(33)并且给决死队派来不少军事干部。不久，薄一波在设法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后，便把已开到五台地区的决死队转而南下到晋东南沁县地区。

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进攻面前，各地群众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但是，要把他们的这种抗日要求变成坚强有力的抗日行动，需要进行严密的组织工作。朱德说：“如果群众只有对付日本的心思而没有组织，也就不能抗日。”(34)为此，八路军派出大批工作团、工作组。这些工作团、工作组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可以这样说：哪里派去了八路军的干部，哪里就会出现生气勃勃的抗日游击队；哪里的群众准备组织游击队，他们也就会要求八路军派干部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曾说过：在八路军总部南下越过正太铁路时，有一个伙食班班长，因为在参加长征时受过伤，行动不方便，掉队了。可是，他遵照朱总司令关于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教导去实践，半年以后，他成了一支有一百多人的游击队的队长，重新与总部取得了联系。(35)这类事例在当时是很多很多的。

作为华北游击战争骨干和支柱的八路军，在刚到前线时，只有两万八千余人，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朱德把扩大八路军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注意吸收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军。他和彭德怀、任弼时一起发布扩军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在持久抗战中壮大本身是极重要的任务。”“我工作人员初到新区，开始一星期内应以深入宣传，争取个别扩大新战士为最中心工作。”(36)在这个指示中，他们规定各师在两、三个月内应该各组织两个新的团，总部的特务连扩充为特务团，在蔚县地区的独立团扩大为三个团的独立师。并对扩兵的方法以及新兵训练等问题都抓得很紧很细。各师派出大批干部，到自己活动范围的人口稠密的地区进行扩军。到这年底，八路军扩大到八万余人。

八路军已得到这样大的扩充，部队在发展过程中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遇到极大困难。朱德有着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带兵、养兵、练兵、用兵的丰富经验。他指示，除向敌军缴获外，各部应该努力收集当时大量遗散在民间的枪枝弹药，可以出款收买，规定一支步枪出十元，一百发子弹二元，轻重机枪和炮酌量决定；所需被服除在西安订制一部分外，由各部自己购布缝制，所需费用，在已恢复或建立政权的地区可以有计划地筹集，包括没收汉奸的财产和罚款、向各地富户进行救国募捐等；同时，强调节俭。经过努力，大体上解决了部队面对的困难。

同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败退形成鲜明对照，八路军不断地袭击日军，打了大大小小许多胜仗。这就使八路军的威望越来越高，不但人民群众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就是处于困境中的友军也希望得到它的帮助。在华北发动游击战争的初期（主要是太原失陷以前），八路军不但在战略上起着配合友军作战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战役和战斗中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八路军出师后的短时间内，便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十月上旬，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进攻下，国民党军队放弃从雁门关到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忻口东西一线阵地。战线南移，忻口会战已成为山西战局的中心。

十月中旬，忻口会战开始。阎锡山调集八万兵力，由刚率部入晋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他还将第二战区的部队分为左翼军、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队。右翼军由朱德指挥，主要是留在日军占领区的部队。

忻口会战是八路军同国民党友军配合作战取得较好成果的一次战役。

忻口在太原以北九十公里，境内并没有便于阻击日军的险要地形。朱德说过：“忻口的形势还不及长城的十分之一险要，只不过是一座几十米达高的土丘。”(37)但是，负责正面防守的卫立煌是一个爱国将领，指挥部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八路军则在日军侧后展开，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作战。各长城隘口没有挡住的日军，在忻口却被挡住了二十多天。

忻口战役开始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华北形势和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指出华北形势危急，友军作战着着失利，但是，尚无军队叛变；八路军发展并巩固了在恒山山脉的根据地。他们在报告中对八路军各部在华北的部署提出一个全盘的打算，指出晋东北、冀西的广大地区虽十分重要，但如果局势“发展到某种不利时期，主力转向晋西或晋东南，此地只能留适当兵力，派得力干部主持。”表示：“我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的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使友军一下子不过黄河，消耗日寇力量，逐渐提高友军胜利信心，渐次改造友军，推进民主，扩大（八路军）本身。”(38)第二天，毛泽东复电认为八路军总部这个“部署是正确的。”(39)

为了支持忻口友军的正面防御，八路军的各部在日军侧后投入了作战，起了重要的战役配合作用。

十月十三日晨，当日军向忻口发起猛攻前，朱德、彭德怀电告第一二师领导人贺龙、萧克：“敌正集结兵力于忻口以北之平地泉地区，今明日有积极向我忻口镇正面攻击模样”，命令正在该地区附近的张宗逊旅“以灵活动作，配合友军作战。最好从崞县、轩岗间由北向南袭击大牛镇敌之侧背，与轩岗马旅（按：指以马延守为旅长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七旅）联络。”(40)张旅接到命令后，立刻攻占大牛店，不断袭击进攻忻口的日军的翼侧。一二

师还根据总部命令，派出宋时轮支队，挺进雁门关以北地区，袭击井坪，威胁大同。十八日，一二师主力在雁门关附近伏击日军辎重部队，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并收复了雁门关，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

对一一五师，朱德、彭德怀在十四日晨电告林彪、聂荣臻：“敌昨十三日猛攻忻口镇一带阵地”，“我张旅主力昨晚攻占大牛店（镇），现正向南攻击前进中。”命令他们：“着徐（海东）旅派兵一团占领平型关，相机袭占团城口、大营镇，其主要任务袭击汽车，破坏道路”；“杨（成武）独立团一营在涞源地区活动外，主力应向灵丘、广灵之间活动。”(41)徐海东、杨成武接到命令后，在小寨附近截击日军汽车队，夺回平型关、团城口、沙河、大营等地。徐旅组成的东进纵队深入冀西，向平汉铁路发展。杨独立团和师直属骑兵营组成东北挺进支队，向察（哈尔）南、冀西地区出击，直到北平外围，先后收复涞源、广灵、灵丘、蔚县、曲阳、唐县、定县七座县城，切断了从张家口经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使日军难以迅速调动第二线部队增援忻口作战。

这样，雁门关和平型关这两处要隘先后被一二师和一一五师分别收复，使大同和张家口向忻口日军运送人员、物资的两条通路一度都被八路军

截断。八路军还对这两条通路不断发动袭击。朱德说：“敌人受了平型关的教训，还没有马上变他的战略战术，他还是老一套，车子日夜的运，所以我们每天打，打的他不敢走。”(42)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需要，战斗力大大削弱。

但是，日本飞机的活动仍很猖獗，除运送物资外，还不断轰炸，使友军遭到很大损失。如何消灭日军这些飞机，已成为坚持忻口会战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时，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以陈锡联为团长的七六九团已到达前方，暂由总部直接指挥，被部署在阳明堡、崞县之间。十五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友军李默庵部，透露了准备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的意图，要求李部抽出一部分兵力，协助破坏道路，并袭击日军，以便八路军这个团能“相机破坏其飞机场”，“袭其降落之飞机而焚毁之。”(43)十九日，陈锡联团一个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获得成功，一举焚毁日机二十余架。这个消息由八路军总部转告友军。友军最初还不相信它是真的。可是，第二天日机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再由太原派出侦察机到日军机场侦察后，才证实了这个消息。

以前日军在华北的进攻几乎是长驱直入，汽车在公路上奔驰，几乎不需要设防。经过八路军多次袭击后，不敢再这样了，只能慢慢地前进，每处桥梁和支点都要用部队防守，给养也难以充分供应。十来天内，情况就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自然是有力的援助。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正面守军卫立煌部作战很英勇，该部第九军军长郝梦麟、第五十四师副师长刘家骥等高级将领都在前线壮烈牺牲。但是，如果没有八路军在日军侧后积极活动，截断他们的交通线，正面友军也很难坚守二十一天之久。

朱德在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时指出：

“我军以配合由卫总司令指挥扼守忻口正面英勇抗战之军队作战，分派许多游击支队在敌主要后方联络线上到处袭击，断绝敌之交通。”“(日军)前送后送之人马车辆材料多被我杀伤破坏，甚至完全断绝。沿途被我杀伤的人马不亚于正面战线上的伤亡”；“这一时期中，虽未能达到将敌大同、崞县间后方交通线完全断绝之愿望，但敌已陷于十分困难之境地。敌每后送或前送一次车辆，空中必用飞机掩护，陆上则配以工兵、骑兵，车上装载步兵，装甲车等随行掩护，并盖铁甲。虽然如此，仍不断受我袭击。最后，敌不得不用飞机接济弹药粮秣。贵族军队的日本‘皇军’也因为牛肉和饼干来源断绝而不得不尝尝小米滋味，官兵相对哭泣。”朱德还从战略的高度对游击战争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指出：

“要使劣势的兵力与兵器，在持久的阵地战求得胜利，战胜高度技术的敌人，就必须在敌人的后方，特别是在其主要联络线上积极动作起来，断其交通，绝其供给。须知愈是机械化部队，愈须依[靠]好的后方供给，一旦供给断绝，其机械部队则复成死的机械了，而减少对正面战斗的威力。同时，由于在其后方联络线之积极活动，又使敌不得不从前线抽出足够的兵力以维护交通，而这些兵力又非步兵不行，故可分散敌正面作战之突击力量。”(44)

在忻口会战期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在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的制度。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因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干涉，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各师的政治部改称政训处，使政治工作遭到削弱，十月十九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

“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

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某些损失。”“需积极的从组织上得到适当的解决。”

“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旅应设政治处”，“师政治[训]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导员。”(45)

十月二十二日，洛甫，毛泽东复电朱，彭、任，邓并告周恩来：“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二十四日，八路军总部以转发中共中央决定的方式，把恢复原有政治工作制度精神下达各部，并向中共中央军委先后提名任命了各师、旅的政治委员，由聂荣臻兼第一一五师政委，关向应兼第一二九师政委，张浩兼第一二九师政委，保证了八路军各部工作的顺利开展。

日军进攻山西的主力本来用在晋北一线，但因在忻口受阻，就转而以七八万兵力沿正太铁路向晋东进攻。这一路的中国守军战斗力较弱。十月二十八日，晋东门户娘子关陷落。

当娘子关告急时，朱德急令刚到山西的第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一部星夜驰援。但是，八路军还没有赶到，娘子关的第一道天险就已失守。陷于日军包围中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余人被一二九师救出。同时，还援救了其他一些友军部队，并收容了他们的大批溃兵和伤兵，对伤兵进行了必要的治疗，然后，把他们集中送还给各友军部队。这些援救工作，加强了八路军和友军的团结合作。

娘子关失守后，忻口的后路有被包抄的危险。十月三十一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十一月二日，北线数万守军撤离忻口阵地，退守太原一带。这时，西进日军本来可以从娘子关沿正太铁路直捣太原，切断忻口中国军队的退路。但由于八路军不断截击，使日军西进时步履艰难，进展缓慢。朱德这样说：“我们有×个团，就从敌人后面去抓，要把敌人抓住，也就等于进攻。用进攻抓住敌人，使他不能继续前进，这就叫作我们的防御。”(46)其中比较重要的战斗有：

七亘村伏击战，共歼日军四百多人，缴获骡马三百多匹。

黄崖底伏击战，歼日军三百多人，毙骡马三百多匹。

第一次广阳伏击战，毙伤日军近一千人，俘三人，缴获骡马七百多匹、步枪三百多支和大批军需物资。

第二次广阳伏击战，歼日军二百五十多人。

由于八路军的伏击，迟滞了日军的西进，帮助忻口和太原的国民党友军获得向南转移的宝贵时间，免受更大的损失。

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从华北各地撤退，迅速改变了战场形势，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主力不宜仍留在晋东北一隅，当娘子关告急时，朱德命令一一五师主力和一二九师驰援该地，随后在正太铁路以南迟滞日军西进。他自己也率八路军总部南移，在十月二十六日在寿阳景尚村越过正太铁路。这样，八路军在阻击日军同时，完成了将主力南调的部署。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这标志着华北战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朱德等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他们在给洛甫、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太原已失，东西两线友军溃乱不堪。”“山西正规战争已开始结束，开始游击战争的新阶段。”(47)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八路军显然将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体。

太原失守的上一天，朱德已率领八路军总部转移到晋东南和顺县的石拐镇。石拐是正太铁路以南的一个小镇，离战区不远。八路军总部到来前，这里人心惶惶，颇为冷落。八路军总部移驻此地后，人心重新安定下来。当时随八路军总部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十一月九日记载：

“这一地区正在组织游击队。离八路军总部四里远的一个镇子上已有了三百名游击队员。在另一个方向，离这里五里远的那个村子里则有一支二百名阳泉矿工组成的民兵。

“离这儿几里远的地方还住着八十名满洲的义勇军战士。

他们全都是从北平来的学生。

“由著名作家丁玲率领的战地服务团已经来到八路军总部。服务团在群众和战士中间开展各式各样的宣传工作……

今晚，战地服务团在街头演出。服务团把一个城门口当作剧场。他们在城门口修起一个六英尺高的舞台，拉起红色帷幕，并公布上演的剧目。城门前的街道上和稍远处的十字路口都挤满了群众和我们的战士，周围屋顶上也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舞台上的灯光就是两盏古旧的挂灯。

“一个演员，手打竹板，出现在帷幕前面。他运用那种传统的说唱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十大原则。(48)他用韵文把十大原则讲完，然后再逐条加以发挥。他的表演使观众们不断发出阵阵笑声。下一个“节目”是一位手执乐器的盲人。他来到一户人家。给大伙唱了中国各条抗日战线的情况。他说，

他还给大伙带来了八路军，也就是‘朱——毛红军’的消息，也有阳泉矿工游击队的消息。他还唱出了他们跟日军交战的场面。

“今晚，有两个人从满洲学生所住的村庄里来到八路军总部看望我们。这批学生部是从太原来的，沿途步行着寻找八路军总部。他们听说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河北交界处，所以他们找遍了晋东一带地方。他们想参加八路军，去打日本人。”(49)

到石拐镇来找朱总司令的，还有曾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两个东北军的师长，一个是原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另一个是原一一师师长张政枋。他们准备以东北流亡学生为骨干，拉起一支队伍，打回老家去。在太原时，周恩来曾同他们谈过话，并写了一封信介绍他们来找朱德，朱德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告诉他们，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已从前线溃退，要他们把这部分溃兵收容起来，把成分好的留下，作为建立军队的基础。委派他们两人为这支部队的正、副司令，并派在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周桓去当政治部主任，嘱咐他们一定要废除旧军队不民主的军阀制度，搞好官兵关系，搞好纪律，爱护老百姓。可惜，由于溃兵不听指挥，这两位师长又都是旧军官出身，队伍抓不起来。下一年一月，这些溃兵一部分由川军解决，另一部分被八路军收编。(50)

十一月十一日，朱德在石拐镇八路军总部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除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外，已转移到正太铁路以南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山西新军决死队负责人薄一波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兵力部署和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

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等问题，决定：一一五师除聂荣臻率领一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外，主力迅速转移到汾河流域和晋南，进行群众工作，并留一部在太行山，配合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创建根据地；一二九师仍在晋西北同蒲铁路北段活动。这时，决死队第一纵队已由一个总队（团）发展成三个总队和两个游击团，薄一波并被阎锡山任命为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和决死队第一纵队政委。他在会上提出，第三行政区主任公署和新军是否可以去掉“山西”这顶帽子，直接归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朱德立刻明确地说：“不行！我们同阎锡山搞抗日统一战线，讲得很清楚，要帮助他抗日。现在统一战线建立了，我们不能随便把他一脚踢开。共产党是讲道义的。对于阎锡山，弃之则不义。”并且耐心地解释说：“现在，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嘛！军队也受八路军指挥，只不过戴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这样做有许多便利之处咧！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51)为了帮助决死队成长，朱德还派毕占云(52)去决死一纵队当参谋长。鉴于当时国民党军队大批撤退，影响了华北一部分人民的抗日信心，八路军总部及时提出：“坚持华北抗战”，“坚持山西抗战”，“八路军誓与山西人民共存亡”，“创造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变敌人后方为前线”(53)等鼓舞人心的口号，决心和华北人民共同坚持敌后抗战。

石拐会议后的第二天上午，朱德率领总部向晋南的洪洞、临汾一带转移。在转移途中，每到一地，朱德都要同群众见面和讲话，鼓舞大家的抗日斗志。十一月十二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并带了两名日军俘虏来到榆社县郜村，使当地居民兴奋不已。曾同朱德见过面、谈过话的人，更是滔滔不绝地告诉别人：朱德如何朴素、坦率和真诚。十三日晚，在榆社县县城宽敞的文庙内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讲了话。史沫特莱记载道：

“当朱德从人群闪让开来的地方向前走的时候，全场的人们全都站起来，高唱中国歌曲。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是怎样受到人们热情欢迎的场面。当地的和邻近城镇的游击队、县城的警察、山西军的一个连、当地的救国会以及全体居民都在欢迎他。”(54)

朱德讲话时声音不高，但充满了赤诚的感情。他讲了在晋北，八路军怎样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打击日本侵略军，讲了人民群众如何同八路军一起打击侵略军的办法，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同日本人民的区别，讲了世界形势，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

“这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他就站在黑夜里讲话。全场上人人聚精会神，鸦雀无声。他说，从一些战死的敌军口袋里还发现了日本共产党的声明。这份声明向日本士兵指出，中国人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他说，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得到许多国家和很多日本人民大众的支持。‘有了这样的帮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而且必须打败敌人，赢得胜利’。”(55)

朱德讲话后，一位日军俘虏也讲了话，表示：“我们日本士兵不要打仗”；“八路军待我比我的战友还要好。以后，我要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日本的军国主义者。”(56)

十一月十四日朱德率总部抵达武乡县段村，十五日抵达沁县开村，十六日抵达沁源县官军村，十七日抵达沁源县城，二十日抵达安泽县白素村，二十一日抵达洪洞县苏村，二十二日抵达韩家庄，二十五日抵达高公（功）村，十二月三十日把总部移驻洪洞县的马牧村。(57)

在洪洞时，朱德处理了八路军内部的许多重要事情，如组建炮兵团，培训干部等，还接待了许多慕名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其中有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海军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等，他们对朱德和八路军非常钦佩。“美国军人卡尔逊竟至对这位中国人产生了敬爱之心，这种感情只有对他的父亲才产生过。他的整个生活从此以朱德为榜样而重新开始。”(58)后来，卡尔逊学习八路军的办法训练了一支部队，在南洋一带同日军作战，取得很大的成功。(59)斯特朗离开后，也写了许多关于八路军的报导。{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430_1.bmp}

二十七、东路军总指挥

太原失陷以后，晋南重镇临汾成了山西省的临时省会。第二战区和山西省的党、政、军、民各种机构大多撤退到这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后勤机构也都随着转移到此地。当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到达洪洞时，卫立煌刚晋升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已率领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移驻临汾；阎锡山也退到临汾附近的土门镇。他们正忙于对从前方退下来的大批军队进行整编。日军占领太原后，“感到后方交通断绝，极端痛苦，于十一月十七日不得不将其疲劳已极的板垣师团及另一部向北撤退，以便到那里去补充整理和进攻我们的游击队。”因此，山西战场上暂时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

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朱德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听史沫特莱介绍国外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日双方各种情况的报道和新闻分析文章中的种种观点。他听得很认真，无论是亲日的还是反日的议论，他都专心地听，还不时作些笔记，或同总部其他人交换一下看法。他十分重视了解日军的战略意图和战场动态，并把敌我双方的情况结合起来研究，制定对策。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朱德、彭德怀在总结入晋作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运动战、游击战指挥的五条基本原则：

“（一）自主的有计划的去进攻和进扰敌人，切忌被动

的应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应毫不留恋的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地带撤退。

（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的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五）战斗胜利，应估计敌之援兵可能与否，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当地带，不要久驻一地。”

这个月中旬，朱德发现晋东、晋北的日军调动无常。他认为，这种调动，除了对付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游击队外，还有“向南进击，压迫华军退过黄河南岸之企图。”他提醒各部密切注意这种动向，并命令各部抓紧部队教育，“在政治方面加紧民族教育，军事方面应加紧战术、技术的教育，使大批新战士迅速的成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之熟练战士”；“各级军政首长及司令、政治机关，应有计划的进行军、政教育的指导与检查。”不久，他又和彭德怀提出对日作战的十六条战术原则，发挥了他一贯主张的“迅速、秘密、坚决”这三项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和在反击多路围攻之敌时以小部牵制各路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粉碎其中一路的战术思想。他关于游击战争的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也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陆续发表，并在十一月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这部著作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战胜日军的重要思想武器。

在山西战场相对平静的情况下，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八路军方面由朱德、彭德怀和三位师长参加。

朱德一行先到临汾，再在一月十三日乘火车南行经风陵渡过黄河到洛阳。在临汾，朱德同卫立煌第一次会面。卫立煌行伍出身，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成为蒋介石的一员得力将领，曾参加过对中央苏区和

鄂豫皖苏区的军事“围剿”。但是，他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抗战开始后，他看到华北前线这么多中国军队都吃败仗，只有八路军打胜仗，内心非常佩服。他对朱德心仪已久，朱德也很赞赏他积极抗日的态度。在忻口会战中，他们指挥部队协同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彼此对对方都有很深的印象，却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次同车去洛阳，给他们提供了一次长谈的机会。两个人谈得很投契。朱德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高级将领变成红军总司令的不平凡经历以及所讲的抗日救国道理，给卫立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朱德对卫立煌的印象也很好。从此，这两个有着类似出身而走过截然不同道路的中国军人之间的友谊开始发展起来。

历来在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主要是听他训话，很少展开认真的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朱德只是想在会上了解一下蒋介石的想法和打算，以便研究八路军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同时，对国民党上层军事领导人做些统战工作，发展团结抗日的形势。他带去一些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其中送给白崇禧一把日本指挥刀，送给何应钦一头军犬。蒋介石在“训话”中虽然没有改变片面抗战的错误思想，但他当时对抗日还比较积极，准备在津浦路南段同日军会战，准备保卫武汉，还要求反攻太原。他不让阎锡山、卫立煌的部队退过黄河。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这个时期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枪毙。

当时，日军正向河南、安徽进攻，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估计山西的国民党军队可能退过黄河，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下一步究竟向南去河南发展有利，还是向东去河北、山东发展有利，一时还没有确定，但比较倾向于向河南发展。王明、周恩来等建议八路军在长江、黄河之间的鲁、豫、苏、皖地区发展，并要求将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处长彭雪枫调去河南工作。毛泽东也主张把一一五师转入豫鄂西地区。他曾考虑把山西、鄂豫皖、苏浙皖赣边、陕甘、鄂豫陕边及湘鄂赣边六个地区作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冀南、热冀边、大青山等几个地区作为辅助区。因此，向河南发展是很重要的一步。在会议期间，蒋介石有一次同刘伯承谈话中，曾表示有意让一二九师去鄂豫皖地区，刘因为不了解朱德曾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讨论过八路军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所以，没有向蒋表示态度。以后，朱德才知道这件事，但已失去同蒋进一步商谈的机会。在这次会上既然确定阎、卫所率军队不过黄河，八路军也就改变了主力向河南发展的这个打算。

洛阳会议还决定要反攻太原。按照这个计划，八路军担负着截断同蒲铁路北段及正太铁路、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的任务。但反攻太原的计划没有实行。洛阳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到武汉去了一次，蒋介石问他八路军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时派队伍袭击津浦铁路，声援徐州会战。彭德怀回来同朱德研究后，他们认为可以策应徐州会战，并向东发展，决定“派出得力支队出平汉线以东向津浦线袭扰。”(11)

为了加强对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袭扰的力量，卫立煌从他的部下抽调六个团交给朱德指挥。朱德把其中两个团配属给一二九师，四个团配属给一二九师（邓小平在一月十八日接替张浩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2)他命令一二九师在这四个团到达指定地点后，由宋任穷率领一个支队，乘平汉路、津浦路敌军空虚的机会，深入到冀南活动。这个支队的任务除配合徐州会战外，还要在这个平原地区“发动民众抗日斗争，组织武装游击队”，为今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准备。朱德谆谆嘱咐刘伯承等，要正确地使用拨归一二九

师指挥的友军部队，给他们以必要的照顾和帮助，不要使他们受到敌人的意外袭击，也不要把他们使用在过分艰苦的境域和过分复杂的环境，要求各部做到以热烈、虚心，诚恳的态度对待友军，切戒骄傲自大，看不起友军；另一方面，也提醒要防止友军中有些人以吃喝、金钱等来引诱八路军指战员走上邪路。(13)

这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是阴历春节。这一天，卫立煌同他属下的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到八路军总部驻地朱德等人拜年。这一天风和日丽，马牧村的土墙上贴满了“欢迎劳苦功高的卫总司令”等标语，在村口还挂上横幅。欢迎会上，朱德高度评价了卫立煌及其部下在忻口战役中的表现和功绩。卫立煌在讲话中也表示很钦佩八路军的英勇善战。他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14)卫立煌还要求朱德介绍一些人到他部队里去工作，当时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当记者的赵荣声（即任天马）被卫要去当他的秘书。(15)

这以后，朱德和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每次见面，两人总是促膝谈心；有时关着门密谈，甚至接连几天长谈。康克清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表面看来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六中全会前，朱老总路过卫立煌处，卫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朱老总对这两样礼物很爱惜，直到后来不能使用了，还专门交代要留下保存好。”(16)朱德也经常送进步书刊给卫立煌。卫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同朱德的友谊也日益加深。

从抗战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初，国共关系比较融洽，卫立煌与朱德的关系当然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他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大多同八路军也能友好相处。甚至连后来积极反共的朱怀冰、石友三等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曾要求八路军给以帮助，要求朱德派人去他们的部队传授抗日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争的经验。

二月十六日，阎锡山、卫立煌电约朱德面商就任“右翼兵团总司令”（即东路军总指挥）问题，朱德感觉到“其中似包含蒋（介石）意不使八路军过黄河南岸之企图。”(17)所以朱德和彭德怀向中央书记处建议朱德不去晋东而由彭德怀前去指挥。(18)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彭去晋东指挥，朱在后方较妥”，并提出：“准备以一二九师出安徽，请周（恩来）、叶（剑英）注意选择适当时机向蒋提议，但此刻时机未到，还不要提。”(19)二月十七日，朱德赶赴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同阎锡山、卫立煌等会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会议期间，朱德看到阎锡山情绪低落，精神不振。知道他因为丢了太原，军队也垮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鼓励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军队垮了，不得了，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是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是让开点和线，退到敌后打游击，让敌人去占领一些点和线，分散他们的兵力；它越多占领一些地方，补给线越长，那样我们就越有机的余地，可以越打越强。不要以为你那旧军垮了怎么样，旧军还有底子，同时要赶快组织新军。希望你阎长官和我们一起坚持敌后。(20)

在土门会议前，阎锡山、卫立煌已经决定将第二战区的部队重新划分为西路军、南路军和东路军。西路军主要是重新集结在晋西的晋绥军，会后，阎锡山将他的指挥部转移到晋西吉县去指挥这支军队。南路军主要是卫立煌

指挥的集结在晋南的中央军，准备在同蒲铁路南段同日军作战。东路军分布最广，包括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和滞留在晋东南敌占区或接近敌占区的中国军队，其中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军队。

土门会议上决定，由阎、卫拨出七个半师（主要是滞留在晋东的军队）归朱、彭指挥。(21)因此，东路军除八路军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外，还辖有：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九十四师、第十七师、骑兵第四师、第五二九旅等部队。(22)由于晋东局势紧急，阎、卫又坚持要朱德就任东路军总指挥一职；朱德感到“不能在此危难之际不受命”，致电毛泽东表示，决心同彭德怀一起组织野战司令部在晋东南前线指挥作战。这样，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23)

二月二十日，朱德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洪洞县的马牧村，准备去太行前线。随行的除十来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二百人。彭德怀比朱德早一天乘车带了一部电台先去长治。

这时，山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侵占了太原的日军在完成对部队的整理、补充后，看到中国军队在积极活动，蒋介石还打算反攻太原，便抢先发动攻势，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北路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进展比较顺利。但八路军一一五师师直和一个主力旅正在晋西南活动，随时可以给南下日军以打击。晋南还集结着卫立煌部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朱德在临汾时曾同卫立煌商量过对日作战的对策。卫接受朱德的建议，准备在灵石县一带利用韩信岭的险要地形，好好打一仗。因此，对北路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是有所准备的。而东路军在敌后广大地区分布很散，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还在正太铁路一带活动，原来担负正面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自溃。所以，当东路日军在二月二十日攻占长治并沿临（汾）屯（留）公路西进时，沿途并没有足以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这一路日军对临汾构成最大的威胁。

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到达当时安泽县县城所在的岳阳镇。他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立刻作出相应部署：命令离日军较近的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和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赶到屯留附近阻击日军；命令一二九师主力迅速从正大铁路一带南下；总部暂驻安泽。当他知道这个县的县长邓肇祥是共产党员后，很高兴，应邀向该县的政府工作人员、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骨干、武装自卫队员以及个别开明士绅讲了话。

战场局势的变化很快。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安泽逼近。晚上，毛泽东从延安来电，告诉他们有一部分日军已到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县军渡一带，请朱德判断这路日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二十二日凌晨，东路日军的先头部队苦米地旅团已进入良马镇，良马地处屯留和安泽两县的交界处。朱德判断东路、北路敌军的直接目的，都是攻占临汾。因此，他答复毛泽东的询问说，北路日军的一部分进到离石军渡一带，可能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24)当天深夜，毛泽东即致电朱德，对日军意图作了类似的估计。他判断日军这次行动的目的，在夺取临汾、潼关，然后进攻西安、武汉。要求朱德和阎、卫两部“在好的情形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25)

那时，朱德身边只有二百名警卫通讯战士。他所在的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是很容易的。但是，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

占临汾，对局势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晌，因此，朱德不但没有向山地转移，反而毅然率领他身边那些数量很少的警卫通讯部队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进行阻击。

二月二十四日，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在古县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附近同日军先头部队接触。友军曾万钟、李家钰两部没有依令及时赶到。朱德只得派左权率领少数部队前往阻击。下午两、三点钟，朱德向毛泽东等通报了情况，说明“手中无兵，阻敌不易”；“总部现在古县，拟于明日向南转移。”（26）但到傍晚六、七点钟时，曾万钟部已接近屯留，朱命令他迅速截断屯留、良马之间的大道；李家任部一个团也已向府城急进，准备同曾军夹击日军。另外，阎锡山表示准备抽一个团，卫立煌也准备抽一个师，星夜来援，情况有所缓和。因此，朱德致电彭德怀及八路军各部并报毛泽东等人，表示：准备以手中现有的两个连尽量迟滞敌军，“以待上列各部赶到而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27）

第二天，战场局势更加严重，友军却没有能阻止日军西进。毛泽东连连致电朱、彭（彭当时不在总部），提出御敌对策。对北路日军，除令林彪率陈光旅配合卫立煌部作战外，还提出巩固河防的部署。但他最担心的仍是东路日军，指出：“进入府城之敌欲用间进急趋手段袭占临汾”，要求朱德设法抽调有力兵团“于临汾府城间，正面迎击顿挫该敌，否则临汾不守，有牵动大局之虞。”（28）他又通知在临汾的刘少奇、杨尚昆（北方局书记），吴溉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负责人）作好转移的准备。（29）下午三时，毛泽东电告朱德：“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但请预告阎、卫，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应决心在敌后打。”（30）

这时，东路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通讯部队。于是，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的驻地古县镇。然而，日本空军驾驶员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31）下午四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总部驻地之古县在何处？是否府城西之旧县镇。”（32）这几天外界完全失去朱德的消息，大后方的很多人，包括对中共和八路军友好的外国朋友，纷纷向八路军驻武汉等地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晚上七时，敌军攻占古县镇，朱德率总部退出镇外，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垣村，并致电彭德怀请他迅速向总部靠拢。这时，从临汾派来了五个营援兵，布置在尧店一带。在日军继续西进时，朱德派他身边的那两个连同尧店的友军夹击日军。这两个连从侧面袭击日军，取得成功，还夺到两门炮和几挺机枪，但正面的友军不但没有出击，反而被日军突破了防线。因此，这两连撤退时，无法将战利品带回，营长刘鹏负了重伤。（33）日军继续向临汾迫进。

二十六日，总部特务团第二营赶来报到，这是一支新扩建的部队，除班长以上人员外，全部是徒手新兵，每人只有一颗手榴弹。朱德决定由这支新兵袭击日军的后续辎重部队。这些新兵“以手榴弹突然猛袭，很勇敢的一致冲入，完全获胜。计缴获步枪三支，军毯二百余床，大衣、食品甚多，文件数捆，新式通讯灯一，烟幕筒一，六五弹千余发。”（34）又一次打击了西进日军。但临汾终于在二月二十八日失陷。

日军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中间不过百余里路程。朱德以那样少的

兵力迟滞敌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时在总部经历这场战斗的陆定一在第二年撰文说：

“他（朱德）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我亲身看见，当苦米地旅团

由长治进攻临汾的时候，朱副司令长官（朱德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只带了两个连，在良马、府城一带与敌不期遭遇。那时，他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会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亲率了仅有的两个连与敌人打了三天之久。”（35）

接着，朱德又指挥部队向东北方向转进，打破了日军打算将中国军队逼到黄河边上加以歼灭的企图。朱德曾生动描述过这段经过：“他（指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将我们压到黄河转弯的地方，那个小角角里面去，你还往哪儿跑？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这个办法倒很聪明，但是我们也聪明。那时候我们八路军已经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指挥着一部分国军。我们就全部向东北打出来，让你去打向黄河边上。结果他打到了黄河边上，朝四处望望，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已经失败了。”（36）

“同时他也不能过河，是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们整个的队伍在敌人的后方，他不敢过河，他只有退回来。”（37）

当东路日军进入临汾时，北路日军曾几次攻击军渡、碛口等黄河渡口。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动向。如果日军在这里突破黄河河防，就可以进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为了防备万一，朱德和左权向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及当地群众介绍了对付日军进攻的办法：（一）扼守黄河河口守兵应少；（二）坚壁清野要做得好；（三）扼隘口并作运动防御；（四）腰击侧击，占领要点埋伏，以手榴弹掷之；（五）尾迫截击；（六）彻底破坏道路；（七）动员群众与游击队四出袭击扰敌；（八）防敌烧杀。（38）

这时候，毛泽东又获得一个重要情报，说华中地区的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奉召回国反映了日本战略计划的变更：准备停止在东南的动作而用全力肃清黄河以北，并向西北发展。三月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要他们调动部队西移。以加强河防，保障后路，而留一部分部队在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并告诉他们。“上述方针政治局会议完全同意，望坚决执行，”（39）

这时，彭德怀已回八路军总部。朱、彭联名回电表示：现在留在晋东南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归我们指挥，此时决不能离开此地。同时，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在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军渡、文水、交城一线的日军不超过一个旅；山西全省的日军也不过四万人，要想大规模进攻西北是不可能的。何况目前敌正集中主力在徐州会战。要想转移兵力到华北，扫清八路军，进攻西北，也得等到攻下徐州以后，至少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表示：到了真有必要的时候，八路军可以西渡，保卫陕北，目前仍希望去太行前线指挥作战。（40）第二天，他们率领总部转移到安泽县的南孔滩村暂驻。

张闻天、毛泽东、任弼时十分关心八路军总部和朱德、彭德怀的安全，在三月三日联名致电朱、彭：“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同时，主张朱、彭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在前方指挥，也只宜留在吕梁山脉等不被敌人隔断的地区，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41）四日，毛泽东又电朱、彭

问：“总部现在何处，朱、彭是否已会合？”“望考虑总部取何道移至吕梁山脉，为安全，为便利，如临汾以南现尚无敌，是否迂道临汾以南回来。”(42)

朱德、彭德怀经过慎重考虑，在三月七日再电中共中央，申述他们东进太行的主张，指出：“现在华北的中国军队共有三十余万人，分东、南、北三路。(43)东路由朱、彭指挥，在此时不宜过河。并提出：“八路军总部准备转移到太行山区的沁县，在那里召开东路军少将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以求得友军同八路军的行动大体一致。要求中共中央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44)三月九日，毛泽东电复朱、彭，同意在目前阶段，八路军主力暂不过河，在不被敌隔断的条件下，配合友军作战；但必须巩固吕梁山脉，布置好太岳山、王屋山地区工作，以保障将来转移便利。(45)同一天，朱德等致电一二九师领导人，重申：“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我们确定方针。(46)”

三月十日，朱德率领总部向太行山进发、途经安泽的英寨，屯留的良马、中村、西村，沁县的郭村、白家沟，在三月十五日到达沁县的小东岭。那时，重要的问题是要在太行山区站稳脚跟。朱德在半年后说过：“我们当时在东路上差不多有十个师。我们也不去打他（指日军，作者注）。我们在山里开会，教育我们，讲一条一条的战略战术，同时也补充了自己，把群众也组织了起来，统一战线也做得很好。”“我们把战略战术说清楚了，大家有了胆子。”(47)

小东岭在沁县县城东南约十五里。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朱德在这里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曾万钟、李家钰、朱怀冰、赵寿山等三十多个友军将领参加这次会议。(48)由于交朱德指挥的南路军卫立煌部的几位将领同时参加会议，所以，人们有时也把这次会议称作东、南两军将领会议，沁县是决死一纵队纵队部和山西第三行政公署的驻地，该纵队政委、公署主任薄一波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彭德怀作报告，要点是：（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另外，对俘虏政策和对汉奸的政策，也作了详细说明。(49)朱德在会上讲话，着重分析了抗战形势及敌后游击战和运动战问题，还讲了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问题。(50)

会议的议程是：（一）报告、讨论目前战争形势与任务；（二）改善部队政治工作与健全组织；（三）确定与统一民运工作方针及敌军工作方针；（四）确定作战方针，建立根据地，武装民众；（五）由东路军开办地方工作、敌军工作与部队政治工作训练班。(51)

这五天的会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会前，友军将领因为临汾等重要城镇相继失陷，阎锡山等逃往黄河西岸，而对坚持敌后抗战缺乏信心。通过这次会议，对坚定敌后抗战信心、稳定友军情绪，起了很大作用。

小东岭会议快要结束时，八路军一二九师计划在河北涉县和山西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在日军侵占临汾后，从邯郸到长治再到临汾的大道成了日军的重要后方交通线。响堂铺的地形条件好，一侧是悬崖峭壁，不易攀登，一侧是起伏高地，便于隐蔽和出击，是邯长公路上理想的打伏击战的地方。朱德批准了一二九师的作战计划，由徐向前担任这次战斗的前线总指挥。为了加深友军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术的认识，朱德邀请会议参加者到战场附近的高地上，实地参观这次战斗。(52)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当日军

第十四师团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进入伏击圈后，战斗立刻打响了，在两个小时内干脆利索地全部解决。接着，又打退日军的增援部队。这次战斗，把日军两个汽车中队共约一百八十辆左右汽车全部焚毁，护车队的日军官兵一百七十多人大部分击毙，缴获迫击炮四门、各种枪几百支。通过这次观战，增强了友军将领对游击战的认识和抗战的信心；而组织这种观战，非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是办不到的。

朱德任东路军总指挥时期，可以说是抗战期间国共领导下的两军团结御敌的最好时期。

二十八、佇马太行

抗日战争初期，对八路军说来，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完成了在山西的展开，在地方党配合下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着重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一直移动在大行山区的武乡和沁县之间。太行山脉北起滹沱河，南抵黄河，绵直在山西、河北等省之间。它居高临下，地形险峻，向东可以控制河北、山东；向西同太岳山相接，中间的盆地是晋中富饶之地；北面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相邻。朱德佇马太行，便于从这里指导整个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

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辟敌后游击战争，是极端艰难的壮举。如果没有建立起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是根本不可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去并得到发展的。它对整个抗战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德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年》的报告中，对八路军为什么能坚持并发展敌后抗战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第一期抗战中，虽参加不久，已尽了大力，如平型关，娘子关。第二期抗战中更起新的作用，即建立游击队和敌人后方作战。我们在晋北、晋东都在敌人后方打。第二期我们三个师都在敌人后方，包围敌人，并切断平汉路。”敌后抗战的环境是极端艰苦的，“别人无论如何不能把军队放在敌人后方，而我们以实际例子起了好的作用和影响。别人争相退去，而我们则反伸向敌人后方去。”八路军的战术，不用死守的办法，而是独立自主的灵活地行动，这是在长期经验中学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朱德说：“八路军是由人民中产生的。”“灵活战争没有人民是不行的。所以说军队是鱼、人民是水，鱼离水亦不能生存，有人民才活动自如。人民不是都了解八路军的。经过各种的多次的实际行动，军民打成一家，灵活战术由此发挥了。”他说：“我们在敌人后方已立定脚跟了，建立了支点，我们在吕梁山、太行山、恒山、五台山等建立了根据地，我们的各司令部都能站着指挥作战。此等作战队伍在华北不下十余万人。”“华北人民当时甚希望中国军队再来，八路军常去收复各城市，影响民心甚大。民众因此才能更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因为八路军创造了七个根据地，华北抗战由混战转为坚持局面。”

日军在二月下旬发起徐州会战，在台儿庄遭受沉重打击。当徐州会战吃紧时，日军曾想从别处抽调部队进行增援，却难以抽调。对这个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氏陈诚曾说过：“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袭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能远离铁路一步。其他平汉线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日本侵略军也深深感到八路军坚持的华北敌后抗战对它已构成巨大的威胁，认为八路军“扰乱我占领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决定“在占领区内进行肃正讨伐。”

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开始，日军以很大的决心，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力，调集三万以上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它的主要

目的是企图把八路军总部逼到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加以消灭。

对日军准备发动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在三月底就从许多迹象中觉察到了。他们注意到：日军在晋东南修筑机场，打通公路，运送物资。频繁地调动兵力。这些情报都不断送到朱德那里。在一二九师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又发现一张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作战计划图。因此，当日军发起攻击前，朱德已筹划了对策：“以一部兵力箝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参加这次反围攻的部队，有一二九师和配合该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还有决死第一、第三纵队以及属于东路军序列的各友军部队。

朱德把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的一二九师作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命令他们转入外线，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同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由地方游击队 and 自卫军不断袭扰敌军，破坏道路，捉拿敌探，肃清汉奸，并帮助八路军和友军搬运伤兵，进行联络，筹粮，运输，配合作战。由于事前已有准备，晋东南军民对日军的这次大规模围攻便能沉着应付，朱德说：“当时敌人的九路进攻，当敌人追到我们，近起来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惊慌的，这是在第一期抗战中是不同的地方，”“从前他们说山西的民众是顺民。现在估计起来，从前因为他们没有枪；现在有了枪，经过了我们的组织，山西的民众已经不是顺民了，也能够起来干，打仗。”

四月初日军出动后，一二九师主力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团立刻遵令向东转移到日军合击线以外的山西麻田至河北涉县一带集结待机。朱德还派左权去沁县统一指挥三四四旅主力及决死一纵队阻击从西面进攻的日军。

各部已遵照总部命令作好了迎击准备，但到四月六、六日，却发现日军部署有所变更：各路日军放慢了进攻速度，南面日军停止北进，转向南攻，进犯阳城；另一路日军转向河南，进占该省的温县、孟县。鉴于这一变化，朱德决定暂不发表已经起草好的动员和部署反围攻的训令。情况很快就弄清了。原来日军得到一个错误情报，误认为刚从晋西脱险入陕的卫立煌将从垣曲渡河回山西，所以重新调动部队，准备再次截击卫立煌。事实上，卫立煌到陕西后，接到蒋介石的通知，要他去洛阳开会，卫决定乘机绕道延安，拜访毛泽东等后再去洛阳。此时已在去延安途中。当日军发现情报不准确后，重新发动向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四月八日，朱德、彭德怀命令左权、刘伯承指挥各部以机动、坚决、勇敢的精神，乘日军分进之际，集结优势兵力，从侧背给日军以各个打击。朱德对八路军各部的指挥，可说是得心应手，但对东路军友军部队就很难如此。因此，他必须分别准备两种对部队和民众动员的工作纲领。

四月十日，南路日军先头部队进占沁源、虢亭、襄垣一线，即将向北发动进攻。八路军总部从沁县小东岭移驻武乡马牧村。这一天，朱、彭向东路军友军将领发出《粉碎日军围攻的战役战术指示》，考虑到友军不善于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指示比较具体，要求他们：“应乘其进攻我军时，采取灵活的、运动的游击战术，在敌未进入利害循环变换线时，采内线作战姿势，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其一路，余路箝制之。如已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则应由间隙中转入外线，袭击敌侧后，仍以各个击破之。”“敌之任何一股前进时，我军应以小部，以一连或一营为单位，采取运动防御之姿势，配合本地自卫军。游击队，昼夜袭击，疲劳敌人，分散敌人，迷惑敌人主力，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而消灭其一部。”朱德还发布了《粉碎日军大举进攻之部队

政治工作纲领》，号召东路军各部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并协助地方政府切实动员民众作好战斗准备。

大行山峰峦起伏，山高路险，日军的机械化装备难以发挥它的优势，当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处处给八路军以帮助。在朱、彭的统一部署下，各路日军到处都遭到中国内线部队的猛烈拦截阻击，一时不敢深入。

四月十一日，南路日军北进至下良镇。这一路日军是这次围攻的主力，由骄横的苦米地旅团长指挥。苦米地在日军中是一员善战的猛将。这年二月间，朱德在临屯公路上就曾同他交过手。他因比北路日军先攻入临汾，曾得意地写信给他女儿说：“天皇因我先入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已挂在左胸前，我的右肩也高起来了，你看我象不象墨索里尼？”朱德早已判断这路日军有经沁县、武乡进攻榆社的可能。他们在进占沁县后果然向武乡进攻，在十三日占领武乡县城。朱德准备在武乡、榆社间夹击消灭这股敌军。

沁县和武乡县城失陷后，八路军总部的处境相当艰难，经常处在敌军的包围中，需要不断地移动驻地；而朱德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再无别的部队。在一次转移中，朱德率总部来到漳河边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三面都是敌军，一面又是临河，情势非常危急，朱德立刻决定把总部移到漳河对岸去。当时河水猛涨，渡河很困难。他披着雨衣，亲自在河边察看水势，决定让水性较好的孙决泅渡过河去联络部队，还要他带过去一根大绳子，固定在对岸。随后，朱德一手抓住马尾巴，一手抓住绳子，和其他人一起渡过漳河，脱离危险，并同附近部队取得了联系。(11)在武乡、榆社附近的东路军友军部队有曾万钟的第三军、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和武士敏的第一六九师。朱德命令朱怀冰部集结在榆社、武乡一线两侧的云簇镇附近；武士敏部除在驻地阻击敌军外，以一部向沁县方向游击；曾万钟部以一部向武乡以北边战边退，而将主力隐蔽集结于附近山地，待日军通过武乡后，立刻猛烈尾攻，同朱怀冰部夹击日军。同时，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及三四四旅一部迅速赶到战地参战。(12)由于有的友军没有按照朱德的指示行动，这次夹击计划没有实现。苦米地部日军进抵榆社后，因为群众空舍清野，破坏道路，又退回武乡。

四月十四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按总部计划跳出日军合击线外隐蔽待机的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负责人，指出从榆社退回武乡的日军，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退回长治，一是去子洪地区救援被友军武士敏部包围之敌。命令他们迅速向武乡靠近，寻机打一个歼灭战。(13)

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团，接到总部命令后，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下，在四月十五日傍晚飞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原来在武乡的日军刚从这里带了辐重骡马弃城沿浊漳河向襄垣方向退去。刘伯承下令分左、右两个纵队迅猛追击。第二天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把他们夹击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地区。日军被截为几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已通过长乐村的日军回头救援，又遭到八路军顽强堵击。激战到当天黄昏，共歼灭日军下元熊弥（第一八）师团的柏崎联队和苦米地（第一四）旅团的工藤联队及炮、骑、工、辐各一部，共二千二百余人，击毙战马五、六百匹，并缴获一部枪枝和其他军用品。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苦米地因这次战斗失利而受到处分。(14)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打得很艰苦，并付出了相当代价，伤亡八百余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团长、优秀的年轻指挥员叶成焕的在战斗中负重伤后牺牲；这是八路军的重大损失。朱德以非常悲痛的心情，亲自前去向叶成焕的遗体告别。

在粉碎日军围攻的战斗中，根据地的民众已经起来，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德说：“老百姓也学会了，知道打得不对就要避一避，打胜了就要追。”“我们消灭他零零碎碎的，合拢起来便是一个大胜利。”“虽然不是全靠游击队，然而游击战是创造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却是不可否认的。”(15)

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南路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这样，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计划便以伤亡四千人的代价而宣告破产。到四月二十六日，八路军和友军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壶关、安泽、屯留、黎城、潞城、长子、阳城、沁水、长治、高平，晋城及河北涉县等十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即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站稳脚跟，进而向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这些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并得到八路军派出的先遣部队和军事干部协助，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发展起来。八路军总部并已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扩展。

晋东南粉碎“九路围攻”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毛泽东等就在四月二十一日向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群众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扩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要求八路军和当地党组织，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在收复地区建立政府，“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16)

发展平原游击战，表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又跨出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大步。

毛泽东来电的第二天，朱德不失时机地电令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三四旅迅速派兵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四月下旬，先后成立冀南军区和晋冀豫军区，由宋任穷和倪志亮分别担任司令员。以后，徐向前和刘伯承、邓小平也先后来到冀南，加强对该地区的领导，并积极向山东发展，逐步形成横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被日军看作后方交通动脉的同蒲、正大、平汉、津浦、德石、陇海等铁路和华北各地的战略要点都处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直接威胁下，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

直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回延安前，朱德一直驻马太行，从这个地区指挥着华北各地敌后的抗日战争，在这个期间，八路军总部驻扎时间比较久的是武乡县的王家峪。现在，八路军纪念馆就建立在这里。

除积极向东部平原地区发展外，朱德还令第一二一师的宋时轮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进据冀东、热（河）南、察（哈尔）东北，创建冀热察根据地；(17)派第一二二师李井泉率骑兵支队，北上绥远大青山地区建立根据地。(18)

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华北八路军已发展到十三万多人，但国民党当局已在限制八路军的发展，仍按四万多人的编制发给经费。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破坏，使部队的物资、经费、

弹药供应都异常困难。朱德、彭德怀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解决困难的方针是：发展生产，有计划地经营和统制公私贸易；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的原则下，整理税收、田赋；加强敌占区工作，争取运入根据地所缺乏的物资；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开展自愿献金、献粮；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清除贪污浪费；成立华北总财政经济委员会。(19)

除经济上的困难外，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开始，八路军在政治上遭遇的麻烦也日益增多。当日军在华北大举进攻时，蒋介石、阎锡山放弃了大片国土；而当八路军赶走日军，在敌后艰苦地创建起大块抗日根据地后，他们却企图从八路军手中来“收复失地”。对此，朱德说：“这是意料中的事。”(20)他提出：加紧发动民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说明日军随时有可能转移兵力来华北，从积极方面去转变或减少那些来争夺地盘的人的军阀割据和偏安一时的心理；强调团结，在群众中造成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舆论，揭破挑拨离间者的阴谋，肃清汉奸。(21)并发出训令，要求各部加强训练干部，加强政治工作和党员布尔什维克意识的锻炼。(22)

对于八路军的今后任务，他提出：第一，发动广大的民众；第二，广泛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第三，巩固和扩大现有的抗日根据地（如冀察晋(23)边区，晋西北区，晋东南区，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区等）；第四，与各方友军更加亲密团结，共同坚持华北抗战；第五，坚持华北抗战，抑留华北敌人，把华中、华南的敌人调动到华北来，以保卫武汉、保卫西北、保卫华南；第六，积极行动，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求改变敌我形势，聚集许多大小的胜利，最后达到全国战略上的反攻，把日寇赶出中国去。(24)

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后，日军把下一步主攻目标指向武汉，暂时不能抽出更多兵力到华北战场对付八路军。朱德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发展八路军，扩大敌后根据地。但是，这个时期在共产党内部却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上年十一月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提出了一系列违背中共中央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干扰了中国共产党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和华中敌后工作，对华北的工作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中共中央为了总结抗战一年多来的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决定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知朱德回延安参加会议。

朱德在七月五日离开总部动身回延安。他准备顺路拜访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上层人士，加强团结合作关系。在途经日军控制的沁河流域时，他觉得这里地形复杂，粮食也多，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就致电彭德怀、左权，要他们派人到此地加紧工作。(25)十二日，他到达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所驻的沁水县端氏镇，应邀在该旅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着重结合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的形势和该旅情况，讲解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

八月上旬，他到达山西垣曲辛庄的卫立煌驻地，受到卫立煌热烈欢迎。他们两个单独长谈了两整天。朱德提出：八路军已经比从前大大扩充了，准备向蒋介石要求增编三个师。卫立煌表示同情，并答应接济枪枝、弹药和炮弹。后来卫立煌对人说，“朱王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26)朱德在垣曲停留期间还给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缙绪写了一封信，勉励他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建国大业奋斗到底。

离开垣曲后，朱德一行从浍池过黄河，来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

河南洛阳，拜会了战区司令长官程潜。(27)到西安后，朱德多次应邀给学校、抗日团体及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作报告，出席座谈会，还拜访了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28)他两次前去看望正在西安养病的原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老师李根源，知道他不久将取道成都去昆明，就把已写好的给王缙绪的信托他带去。他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希望他在动员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封信给四川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鼓励他发扬民气，组织民力，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起模范作用。这两封信托李根源一并带去。在从西安到延安途中，他从洛川转道到晋西古贤村会晤阎锡山，鼓励他坚持抗战，还商定加强八路军总部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的办法。(29)

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抵达延安。这是他在前方战斗一年后第一次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天，延安各界召开万人欢迎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介绍华北抗战形势，要求后方把书报刊物大批地输送到前方去，后方的干部与学生也大批地到前线去工作。(30)

以后，不断有单位邀请朱德去作报告，朱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这些报告中，他除总结抗战一年来的经验、分析日军战略战术的变迁外，着重讲了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所取得的胜利，他揽：“我八路军可使敌后方变前方”；“游击战的应用，牵制了敌人，且巩固了自己”；“游击队约有十余万人，要给养、伤兵等等，所以建立根据地是重要问题，五台山根据地现已发展到五十余县。”(31)他勉励大家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在朱德从太行前线返回延安这段时间，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河北省保安司令，到河北来同共产党、八路军争夺领导权。鹿钟麟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是一个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中间派人士。但蒋介石知道鹿钟麟在当了省主席后，一定会尽力把共产党、八路军挤出河北，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如果鹿同共产党发生矛盾，那就可以使人以为是共产党容不得中间派人士，而不是他蒋某人容不得共产党。为了保证这一意图的实现，蒋介石还在省政府领导班子中安插了一批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以控制和影响鹿的行动。其中，省政府委员、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在抗战前就是冀中一霸，是河北博野一带地方反动势力的头子。日军侵占冀中前，他随国民党军队一起逃跑了，八路军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后，他又回到博野，发展武装，成立民军司令部，自任民军总指挥，是一个积极反共的“磨擦专家”。尽管这样，在鹿、张的任命宣布后，中国共产党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还是表示欢迎，同时也保持必要的警惕。

鹿钟麟接受任命后，渡过黄河，到长治访问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动身回延安，由刘伯承出面同他商谈在河北合作抗日的问题。九月中旬，鹿钟麟到达冀南南宫地区后，就开始排挤共产党和八路军。张荫梧更是强行向晋察冀边区的平山、行唐、阜平插手。

在国民党当局如此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九月七日，朱德、毛泽东等致电聂荣臻，提出对策：边区各军政机关，如果没有得到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指示，拒绝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并禁止任何其他人在边区进行军事、政治活动；如果河北省政府和张荫梧正式派人来交涉，须给以礼遇并与之谈判。(32)十八日，朱德、彭德怀又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联名致电徐向前并左权、刘伯承等，指出：看来鹿钟麟似已开

始向我方进攻，请你们向鹿提出严重质问，鹿如能诚恳进步，我们应与之合作建立抗日根据地；如他对冀南军政系统采取打击和破坏的政策，则不能向他让步，必须坚决防御。(33)

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朱德在会上作八路军工作报告，共谈了五个问题：八路军抗战的经过，敌人战略战术的变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八路军本身的问题，一年来抗战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了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错误，提出了党加强对抗日战争领导的战略规划。朱德在会上以一天半时间作了关于华北八路军的报告。他详细的叙述了八路军一年来抗战的经过和经验教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问题。报告最后说：八路军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争取友军，巩固本身。”“眼前的任务就是发展华中，也要八路军担负一部分的作用。”(34)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由于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危急。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到武汉去了解情况，并鼓励蒋介石继续坚持抗战。那时，日机经常空袭武汉。朱德冒险在十月二十二日搭乘战斗机飞抵汉口，随即由周恩来陪同去会见蒋介石。朱德向蒋介石报告八路军一年多来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情况以及取得这些胜利的原因；并且强调：只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即使退到重庆也不要紧，日寇是一定能够打败的！(35)并提出了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增发经费和弹药的要求。

当天晚上，朱德住在鄱阳街一号郭沫若家里。郭沫若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曾随朱德率领的第九军南下。起义失败后，郭流亡到日本生活了十年，这时，正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故友重逢，格外欢欣，郭沫若作了一首白话诗相赠。朱德和了一首题为《重逢》的诗，作为纪念：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
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
又在汉 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
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
胜利也说不完。
寇深入我腹地，
我还需坚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
相见必期鸭绿江边。(36)

第二天，朱德匆匆飞回延安，继续参加六中全会，并向全会介绍了在武汉了解到的情况。他认为，军队中对局势悲观失望的人比较少，而在政界比较多，特别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再放出“和平”空气，但国共关系还不

至于破裂。(37)朱德回延安后两天，汉口就失陷了。十一月六日，六中全会闭幕。这次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杨尚昆任北方局书记。(38)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冀中、冀南、豫北、鲁西北等地的顽固分子无理地不断进攻八路军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朱德、彭德怀致电驻守这些地区的八路军指挥员，要他们动员群众，破坏顽固分子联合进攻的阴谋；并且命令一二九师立刻派遣有力部队进入河北南宫县城及近郊，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领两个团进抵鲁西北聊城；而在豫北方面实行必要的让步。对顽固分子的进攻，总的仍采取“防御斗争原则。”(39)

六中全会结束后，朱德动身返回华北前线。十一月十三日到西安。(40)稍作停留后，在这个月下旬渡过黄河来到吉县会晤阎锡山。朱德鼓励阎坚持抗战。指出：悲观的亡国论是不对的，盲目乐观的速胜论也没有根据。他还应邀对晋绥军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作了《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的讲话，强调要坚持持久战，发动全面抗战，争取主动，在战术上要做到机动、秘密、迅速、坚决，改变死守硬顶的战术和加强群众纪律，勉励他们成为真正抗日的新的军队。(41)

十二月一日，朱德回到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这时，敌后局势已日趋复杂，国共关系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情况下，国民党顽固分子却在冀南加紧制造磨擦，鹿钟麟的态度也逐渐恶化。为了扩充实力、滥编武装。地痞、流氓、受汉奸利用的反动会门势力等都成为他收编的对象。各地的失意政客、反动军人也都麇集在他的门下，他不积极抗日，却醉心于夺取权力；他迎合少数土豪劣绅的要求，反对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他公开宣传反对八路军的言论，散布谣言，破坏统一战线；更严重的是竟悍然宣布取消抗日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撤换各地抗日县长。(42)

面对步步进逼而来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就会重新丧失，抗战大业就会遭到重大破坏。但是，八路军仍坚持把民族斗争放在第一位，不愿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朱德、彭德怀提出冀南反磨擦斗争的原则是：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丧失政治立场原则。并且指出：冀南是我兵员器材来源和连贯鲁省的要道，已经取得的政权决不可轻易放手。为此，要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对鹿钟麟，要避免同他发生武装冲突，如果他先向我开枪，则给以有力的打击；同时，指示收集鹿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以便必要时加以揭露。(43)朱德把这些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来电指出：“鹿本无甚力量，只有省府合法地位。他拟采取排挤八路军而扩充自己力量的方针，因此估计与鹿合作须经过一般激烈斗争，否则鹿恐难觉悟。”“我们基本方针是促其改变态度与我合作，但目前当其无理进攻时，应给以有力反抗，在政权机关中、在群众团体中、在群众中应公开说明我们的立场，揭破其污蔑”，“取消主任公署事我们不宜让步。”(44)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活动的重点仍放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方面。朱德回到晋东南不久，就指出：“相持阶段快要到来了。”“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敌人后方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45)八路军各部主力继续向更深远的敌后平原地区挺进。十二月二日，朱德、彭德怀电令贺龙、关

向应率一二 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统一领导该地八路军各部队；命令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两个团到苏鲁皖地区和山东开展工作。(46)这个重要的战略性行动，大大加强了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顽固分子制造磨擦的同时，日军也紧锣密鼓地不断发动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开始，再次对晋察冀进行“扫荡”；十一月开始对冀中“扫荡”；十二月对冀南和绥北“扫荡”；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对晋西“扫荡”；一月对冀鲁边“扫荡”；二月对晋西北“扫荡”；三月对平西“扫荡”；五月，对鲁西“扫荡”；六月开始对鲁南和晋冀豫“扫荡”。

对晋冀豫的这次“扫荡”，又称作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这里是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驻地，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和神经中枢。日军在这次“扫荡”中调集的兵力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达十三四万人。他们还提出“治安肃正”的口号，也就是“肃正讨伐”加上治安工作，即暴力加欺骗。他们除军事讨伐外，在政治上提出“以华制华”，利用汉奸、伪军，并唆使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八路军进行磨擦；在经济上肆行抢劫、封锁、破坏，甚至放水决堤，制造灾荒，加上倾销毒品。这就使根据地军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严酷。

正是这种困难的环境，才更能显示出革命者克服困难的聪明才智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朱德总结了长期以来同敌军作战的经验，提出争取主动，趋利避害的机动作战原则，那就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47)各抗日根据地大体上都按照这些原则来对付日军的“扫荡”，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政治上，朱德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群众，积极建立。发展和保卫民主政权，保障根据地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除倡导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统制贸易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克服困难，其中包括创立冀南银行发行货币，建立小型兵工厂，号召“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要开荒种麦，非战斗部队尤须注意这一点。”(48)等等。

由于方向正确，措施得当，调动了各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积极性，尽管环境险恶、困难重重，华北各地的抗日斗争依然蓬勃发展。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在全国受到广泛传颂，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人士到根据地访问。据不完全统计，国际友人：美国的史沫特莱、斯特朗、卡尔逊，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德国的王安娜等；国内的自然更多，有周立波、丁玲、吴伯萧、卞之琳、宋之的、黄钢、刘白羽、李伯钊、阮章竞、杨朔、陈荒煤、李公朴、徐懋庸、华山、罗峰、杨骚等。他们不但把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和抗日经验广泛地向国内外传播，增强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了解，也帮助并推动了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发展，除医疗卫生外，根据地的报刊、戏剧、绘画、音乐、文艺创作等都很繁荣，著名作家赵树理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朱德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致友人信中说：“近来华北抗战较去年更为艰苦；”“日寇恨我们刺骨，我们也得日敌之深恶毒恨为无上光荣，坚持华北抗战当能持久。德虽才薄能鲜，爱国当不敢后人，以慰故人之希望。”(49)这些话充分显示了他对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坚强信心。

二十九、反磨擦斗争

朱德从延安重返前线后，华北局势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多数国民党友军部队同八路军的关系疏远了，曾划给东路军指挥的大部分友军，这时已南下归还建制，有的不久就公开反共。这种变化自然是朱德不希望看到的。它的根源来自国民党最高当局，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暂时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同时又加强政治诱降活动。蒋介石虽然仍继续抗日；但是，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却发生很大的变化。

武汉失陷前，蒋介石尽管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的防范，例如：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他命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严防共党非法活动”；四月二十六日又命令蒋鼎文和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严防共产党徒冒充伤兵入川”；对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的监视也很严密。在他指挥下，河北的磨擦活动也已开始。但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他对抗日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同时，他在正面战场的部队一再败退，也需要八路军在敌后帮他拖住日军的进攻，所以，他那时不反对，还多次主动要求八路军深入敌后积极活动。可是，当正面日军压力减轻以后，特别是看到八路军在敌后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朱德对此曾作过生动的说明。他说：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八路军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象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象雨后春笋地兴起，也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看到以前的旧政权被根据地民众选举产生的新政权所替代，想把它重新夺回来。于是，他就设法派大批人员到华北敌后来“限共”、“溶共”，加强磨擦。这就严重恶化了抗战初期那种团结抗日的良好气氛。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下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县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不再邀请八路军将领参加，这是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发生变化的明显征兆。会议期间，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由重庆潜逃出国投敌。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回到前方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彭德怀到西安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二十四日，彭德怀偕同林伯渠、王明会见蒋介石，但蒋急于回重庆处理汪精卫外逃问题，约彭去重庆再谈。

彭德怀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时，蒋公开采取偏袒鹿钟麟的态度，强调要维持国民党政府原来在河北的行政系统，八路军只能，向省府推荐行政人员；同时，提出由程潜、卫立煌派大员同彭一起去河北调查解决磨擦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愿意通过这种共同调查的办法来解决磨擦问题的。因此，彭德怀便到洛阳去会程、卫。程潜原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时已决定调任天水行营主任，遗缺由卫立煌接任。一月中旬彭德怀到洛阳时，他们二人正忙于交接工作。程潜决定派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和彭德怀同去河北，调查处理磨擦问题。

一九三九年元旦，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创刊。创刊号上发表朱德的《迎接一九三九年》一文，强调：“巩固与扩大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他针对蒋介石、阎锡山压制敌后民众运动的企图，指出：为了在华北长期支持抗战，“今天的问题不是将已有的民众运动组织加以取消的问题，而是将已有的组织加以培植与扶助，未有组织的，加以组织起来，树立起一支伟大的力量，使他们积极的援助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工作。这乃是最迫不容缓的任务。只有这样做去，才有利于国家民族。”

这一天，由山西第三、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在沁县联合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晋东南各界“拥蒋反汪”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表示支持蒋介石继续抗日，强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蒋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开驳斥了日本近卫首相的诱降声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他又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除汪的一切职务。朱德及晋东南各界人士支持拥护的就是蒋介石继续抗日的这一面。

但是，蒋在抗日的同时，又要限共，把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成限共抗日，特别是极端无理地要取消在华北敌后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日民众运动，要取消已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在工作中卓有成效的抗日民主政权，要把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赶出河北。这就使河北，特别是冀中和冀南，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积极活动，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很沉重。日军看起来占领了整个华北，但他们自己也承认，“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

他们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

‘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企图改善华北的“治安”状况，只是苦于兵力不足。“但到汉口作战结束以后，由于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项工作始得逐渐具体化”。

从这时起，日军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极端残酷的反复“扫荡”。如果蒋介石真以抗日大业为重，这时自然应该要求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决不应该制造磨擦，自行削弱抗日力量。

可是，蒋介石却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不借削弱抗日力量，在敌后以至全国推行反共方针。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后，又在十二月四日任命鹿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十二月十二日，决定将原来驻在山东的第十军团石友三部开往冀南，归鹿指挥。二十九日，也就是彭德怀在重庆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的第二天，重庆政府军令部正式颁布冀察战区的战斗序列，下辖：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第十军团石友三部；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豫东游击司令孙殿英部；河北保北保安团及冀察各游击队。这样，把驻在豫北的国民党部队中力量最强的朱怀冰部也列入冀察战区。将重兵陆续调集到这个地区，显然是国民党当局扩大河北磨擦的重要步骤。

尽管朱德一再派人同鹿钟麟商讨解决河北磨擦问题。鹿在口头上也讲团结抗战，但行动上却不断制造事端，加剧磨擦。进入一九三九年后，令人痛

心的河北磨擦事件层出不穷，情况日益严重。面对这种使人不安的状况，一月七日，朱德致电鹿钟麟指出：

“最近各地发生武装冲突，逼收政权、互相残害之惊人事件层见迭出。”“目前一切问题，弟已电令敝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主任邓小平就近与兄相商，共同解决。必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遇事相商，采取互助互让办法，勿使事端扩大，集中力量以对外敌，实为当前之急务。”“彭德怀同志此次赴渝谒委座，对华北问题已得面谕，并曾示以各方文电。委员长决定电程、卫司令长官派大员，协彭德怀同志到兄处共同商决办理一切，想必能更彻底解决，精诚一致，共赴危难。”

这时，日军正集中约三万人的兵力，准备分十一路“扫荡”冀南。尽管大敌当前，鹿钟麟仍只想“取得冀南，再进而攫取冀中，分割晋察冀边区。”

彭德怀进见蒋介石也好，朱德致电鹿钟麟也好，都不能扭转对方积极反共的既定方针。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一月十日，国民党当局任命一向顽固反共的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正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游击部队分别归冀察战区及苏鲁战区指挥。也就是说：限定八路军不得在河北、察哈尔、山东活动，反而要将这些地区内经过八路军长期艰苦工作所发展起来的游击队，统统划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这自然是欺人太甚的无理要求，鹿钟麟又“企图乘机扩充势力，武力接管关卡、政权。”在对方采取如此蛮横态度的情况下，一月十四日刘伯承遵照朱德指示同鹿钟麟所进行的第三次谈判当然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局势，朱德不得不作出相应的但仍很克制的部署。他命令：八路军及各游击队积极向日占区活动，粉碎日军对冀中、冀南的进攻；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及六八六团进入冀鲁边区，由罗荣桓率干部去山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整理山东纵队；调整各新编部队，加紧对整个部队的统一战线及军政教育，增强战斗力；加强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深入与巩固各地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缺点，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对鹿钟麟准备作某些无害大局的让步，以求得减少磨擦。(11)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国民党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久，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北，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性质也日益严重。

朱德对此立刻作出反应。一月三十一日，他和八路军其他重要将领致电延安，请转发致蒋介石电，电文说：“自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各地磨擦纷起，冲突时有，力量抵消，莫此为甚。”他们要求蒋介石“明令禁止防止异党办法之流行，并对抗日阵营中之矛盾现象作彻底之调整，对暗藏之汪派作彻底之清洗，用以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则俾益抗战实力多多矣。”(12)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开会期间，日军正向冀南、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他们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消灭河北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队，然后转向山地进攻，从而完成巩固华北占领区的任务。(13)一月下旬，彭德怀陪同程潜所派的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到达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正忙于指挥部队

准备消灭一股进犯晋东南的辽县的日军。这股日军约二千余人，朱德分析他们的目的是配合冀中、冀南的“扫荡”，扩大平汉铁路两侧的占领地区，以保障平汉铁路的安全。(14)这股敌人被击退后，朱德发现日军还准备对晋南发动进攻。晋南是卫立煌防区。在当时磨擦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卫立煌能够坚持抗战，不搞磨擦，是真正共同抗日的友军。朱德非常关心他们的安全。二月二日，朱德致电卫立煌，告诉他“翼城已陷敌手”，日军在同蒲线南段不断增加兵力，有进犯晋南模样，“实堪注意，请饬晋南各友军严为防范。”(15)

尽管军情如此紧张，彭德怀陪同刘古风来到八路军总部后，朱德仍立刻抽出时间来认真接待。他和彭德怀、杨尚昆、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等商量了一个同鹿钟麟谈判的纲领，力争在此基础上恢复双方的团结合作，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这个纲领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动民众、武装民众、两党合作、共赴国难、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减租减息等原则，提出了合理的财政经济政策；同时，在统一行政、实行合理的统一军事指挥等问题上作了必要的让步。(16)

二月中旬，彭德怀带着这个谈判纲领同刘古风来到冀南找鹿钟麟，不料，日军开始“扫荡”冀南时，鹿钟麟的部队同敌人接触三、四次后损失不小，连电台也丢了，便丢下地盘，“落荒而走”，逃过平汉铁路，躲进山区安全地带，(17)不但当地的干部、群众无法找到他，就连按蒋介石电令委派的刘古风和专程前来同他商谈合作抗日问题的彭德怀，在冀南转来转去，也打听不到他的行踪。这些热心于磨擦而缺乏群众基础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冀南后，在日军面前竟那样地不堪一击！由于反“扫荡”战斗越来越剧烈，彭德怀只能留在当地指挥作战，刘古风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也只好空手回去。直到八路军、游击队和根据地民众粉碎了日军这次“扫荡”后，鹿钟麟才再次露面。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日军“扫荡”期间，鹿钟麟的部下对抗日那样无能，对制造磨擦却并未放松。二月上旬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在束鹿附近同日军作战时，该支队第一营第九连因失去联络，遭到鹿的部下袭击。该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桥、排长一人、班长四人、战士十五人及带路的老百姓二人被杀，长、短枪二十一支被缴。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在一、二月份内活埋八路军通讯员、地方工作人员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人员和医务人员，挖去八路军埋藏的经费、机器多件。三月份，该部又活埋八路军第五支队副官、侦察员数名。(18)朱德将这些情况报告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要求他们严厉制止这种破坏抗战的反共罪行，却被搁置不理。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河北等地的磨擦日益加剧问题发出指示，首先指出：“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关于对鹿钟麟的政策指示，指出：“鹿在河北整个期间之行动，是有害抗战，破坏团结，阻碍三民主义之实施，分离军、政、党、民之一致，制造磨擦，使河北平原抗战根据地之巩固受到重大损害，而在敌人进攻时，鹿即放弃责任率队逃跑。我八路军则与敌血战，坚持河北抗战。彭亲赴冀南指挥并求与鹿见面讨论抗战办法，竟无法找到鹿之所在。因此鹿应受到澈职处分，以河北省政交与八路军及其他无恐日病有责任心之人员负担，否则河

北前途甚为可危。”中共中央的这些意见，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转告国民党最高当局，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在河北制造磨擦事件。

二月四日，国民党当局任命石友三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十四日，任命张荫梧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三月四日，委任石友三和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司令。针对中共提出的以朱代鹿主政河北的主张，他们在三月二十日任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个任命的真实意图，是要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晋绥境内，不让它在河北发展。在国民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下，国共双方在河北的矛盾自然日趋激化，磨擦势必加剧。

六月间，鹿钟麟同彭德怀会谈时，尽管八路军方面作出不少让步，鹿仍坚持要取消冀南主任公署，“最后无结果”。(19)朱德后来愤慨地说：“河北及各地抗日政权是人民自己赶走敌人、自己选举出来的。行政工作人员个个都不要钱，不怕死，天天背包袱，打游击”。“顽固分子一定说他非法，要取消，另来一套。”“事实证明，敌后抗战坚持必须抗日政权的配合，如果把过去那些失职的官僚都搬到河北去当行政人员，成天两台花酒、四圈麻将，那立刻会断送一切。我们八路军对于此问题是当仁不让的。”(20)

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河北制造的反共磨擦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被称作“磨擦专家”的张荫梧更公开表示：“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以为无论他们怎样为所欲为，中共方面也不敢进行反击。他尽力在八路军内部进行策反，制造了一个“柴恩波事件”。

柴恩波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连长，抗战开始后在冀中组织武装，一九三八年九月接受八路军改编，担任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经张荫梧等人策动后叛变，被国民党当局委任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他公然扣押原该支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大队长等一百多名干部、战士，包围文安县抗日政府，逮捕该县县长，还经常残杀抗日干部、群众，无恶不作。后来又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做了汉奸。在柴恩波投降日本侵略者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公然为柴辩护，提出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21)张荫梧本人也经常利用日军“扫荡”的机会，袭击八路军的后方。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部包围八路军驻河北深县刘家庄的部队，残酷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这就是震惊国内的“深县事件”。事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说：“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的机会。”(22)

对张荫梧这些日益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朱德实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下令反击。六月二十二日，一举歼灭张部二千余人。他也致电蒋介石等，报告了“深县事件”的事实真相，要求他们彻查真情，制止张荫梧的罪恶行动，以免事态继续扩大。但朱德仍很有节制，希望鹿钟麟、张荫梧等能吸取教训，消弭磨擦，共同抗日。这时，贺龙已率一二师主力到达冀中，朱德要求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加强同鹿钟麟的联络，向他报告冀中、冀南的敌情和对日作战等情况。朱德指示他们，“加紧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磨擦亦须适可而止。”(23)

七月，日军开始对晋东南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时，河北连降暴雨，水势猛涨，日军乘机掘堤放水，冀中、冀南尽成泽国。正当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

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磨擦专家”张荫梧又在八月一日从背后袭击，派兵包围八路军驻中马峪村的赞皇工作团，捕杀八路军工作人员十余人，并将该工作团的公私财物及文件抢劫一空。十二日，张荫梧部三千余人再次袭击八路军赞皇工作团及独立支队第二大队。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了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在这样确凿的证据面前，受害已久的当地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民众坚决要求清算张荫梧的罪行，为被杀害的兄弟报仇。

八月十二日，朱德在晋东南各界纪念“八一三”暨追悼平江惨案殉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行为，指出，这是为日寇灭亡中国的反动目的服务的。他严正提出：政府要继续领导抗日，就要严厉制止这类投降派的活动。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查张荫梧部已屡次肇祸于冀中、冀南，今值敌寇大举西犯时，又复迭次扣留，杀害、诬蔑职部”；要求蒋介石“迅予制止，彻底解决”。同日，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六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

在河北反共磨擦愈演愈烈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山西的磨擦活动也开始升级。山西的情况和河北有所不同。八路军是在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应邀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并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拖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使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得到重新整理和补充的机会。八路军又是正式列入第二战区序列的。山西的群众工作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山西反共磨擦的重点不便直接指向八路军，而是主要针对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三月下旬至四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一次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宣扬同日军和平妥协和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言论；并企图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共产党组织，由旧军来吞并新军，由于进步势力的抵抗，阎锡山的企图未能实现；但是，山西的政治气氛从此大变，磨擦事件日益严重。

当时，山西顽固派制造一种舆论，说共产党、八路军力量的不断壮大是一种威胁，因此，必须进行“限共”、“防共”。朱德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回答了这种论调。他说：我认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还是大小了，还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两年来，共产党、八路军的确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受到威胁的只是日本侵略军。如果以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太大了，要想“限共”，那就是限制抗日力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24)

到十一月间，国内的形势愈益严重。这个月的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由过去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改变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并发布《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会后调兵遣将，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山西新军的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鉴于险恶的风暴即将来临，彭德怀在十月中旬受命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商讨对策；并在沿途视察八路军各部的准备情况，访问国民党军政大员程潜、卫立煌等。十二月四日，彭德怀在途中接到朱德、杨尚昆来电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在华北重新调动力量与布置主力，企图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估计今后磨擦将有更尖锐的展开。”电报中也告诉彭德怀，总部

针对这种情况所进行的部署。(25)当彭德怀途经陕西宜川同阎锡山谈判的时候，阎锡山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因此，彭德怀在延安只匆匆停留了几天，就赶回山西。根据总部的部署，在晋南的阳城等斗争最激烈的地区，组织当地新军和八路军反击；日军的进攻。

正当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刻，一个普通的日子——朱德的生日来到了。这一年朱德满五十三周岁，虚岁五十四岁。朱德一向反对为自己祝寿，但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内心里激荡着一种对自己总司令热爱的激情，纷纷提出要为朱德祝寿。尽管朱德本人坚决反对，总部也尽力劝阻各地军民不要派人前来祝寿，一再压缩庆祝规模，最后只在总部内开了个小型庆祝会；但是，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抗日团体仍发来许多贺电、贺信、贺幢和祝辞。朱德所在的党支部还送给他一面写有“模范党员”的贺幢。《新华日报》华北版这时也发表题为《庆祝朱副司令长官五十晋四诞辰》的社论，指出：

“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两年来的奋斗，已经获得了一万万民众的拥戴，也引起了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的惧怕和仇恨。每一个爱国人民都在热烈拥护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而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则以危害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为快。”“华北军民在今日热烈庆祝朱副司令长官的五十晋四诞辰，其真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示华北军民对朱副司令长官的衷心爱戴，而且在于，这一次的庆祝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路线的热情拥护，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八路军的兄弟的友爱，表示了华北军民在新的艰苦环境中衷心接受朱副司令长官的领导，赞助八路军与中国共产党。”

当天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还发表陆定一写的《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四寿诞》的长文，赞颂朱德的功绩。(26)八路军总部在驻地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席棚，把各地寄来的贺信、贺幢、祝辞等张贴在里面，前去观看的人非常多。(27)

当时正在大行的作家访问团的杨朔写了一首《寿朱德将军》的诗：

立马太行旗颭红，雪云漠漠飒天风。

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

朱德读后写了一首《和杨朔作学原韵》：

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换尽血流红。

这首诗在一九四一年公开发表时，将末句改为“河山依旧战旗红”；题目改为《赠友人》。

山西的“十二月事变”表面上是新、旧两军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同样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军的行。十二月中、下旬，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也日益扩大，主要冲突地区在晋东南及晋西北，同时，陕甘宁边区和河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局势日趋恶化。

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德同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联名通电全国，沉痛地指出：“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应挑拨争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电文呼吁团结抗战，消弭内争。(28)三十一日，朱德对山西“十二月事变”发表公开谈话，指出：“在此被害之进步分子中，亦有共产党员及八路军工作人员，

八路军对此亦不能漠不关心。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分子之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密切注意中。”(29)一九四一年元旦，朱德在《迎接一九四一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敌寇一九四一年，将会更加紧其对华北敌后的军事‘扫荡’”；“然而当这严重关头，一部分旧中国的残余、旧的力量、旧的人物、旧的制度和旧的思想，却在拼命地阻碍着新的力量、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之发展”；“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是大大开展反对汪精卫及抗战营垒内部的投降派的斗争，是拥护蒋委员长坚决抗战到底，制止一切投降派的言论和行动，是公开击破反共、反八路军、反新四军、反陕甘宁边区、反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的投降本质。”(30)

在朱德、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新军在事变中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旧军并没有达到他们原定的消灭新军的目的。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的破裂，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在山西仍对阎锡山作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他，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这样，山西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但河北的磨擦却进一步升级了。

这时张荫梧因通敌有据，已被撤职，由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由乔明礼接任河北民军总指挥。蒋介石又准备从黄河以南增调第四十一、七十一两个军到河北，以增强反共军事进攻的力量。当时河北磨擦的重心仍在冀南。单由一二九师来打退这次规模很大的反共军事进攻，困难较大。朱德决定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支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斗争。

朱怀冰在奉调列入冀察战区序列后，立刻从豫北率部北上，成为同八路军搞磨擦的主力。在河北各地顽固派军队中，因朱怀冰部实力最强，各种游杂武装都听他指挥，他进到冀西后，就抢占战略要地，指挥早已通敌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塘部及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进攻，朱德当机立断，下令歼灭这两支“已无争取可能”而又向八路军发动新的进攻的顽固派军队。(31)在八路军歼灭这两部的大部后，日军出动二千五百多人，以飞机配合，袭击正在乘胜追击的八路军，(32)使侯、乔二人得以各率残部逃到奕城和石家庄附近公开投敌。

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公然命令八路军撤至白(圭)、晋(城)路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随即调动国民党军队向太岳(33)、太南(34)地区推进，企图把八路军排挤出这两个地区。朱德拒绝了蒋介石这个错误命令，并令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及总部特务团移驻大岳区，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会合，陈兵临屯公路一线，和薄一波统一指挥这个地区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保卫太岳根据地，挫败了蒋介石的企图。

由于侯如塘、乔明礼两部被歼，晋察冀南下增援部队又到达太行，朱怀冰部孤悬冀西，不免胆怯。二月初，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朱怀冰、鹿钟麟一起撤至冀豫交界处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同冀南的石友三部、豫北的了树本部和山东的沈鸿烈部相呼应，等候从黄河以南增调的两个军开到太南，准备会合后再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晋察冀增援部队南下时，聂荣臻和冀中军区负责人吕正操也随军南下。自从八路军总部移驻太行后，聂荣臻这是第一次来到总部。此外，罗瑞卿率领的抗大总校准备迁到晋东南，也随南下部队同行。南下部队到达后不久，

朱德就在黎城桐峪镇召开作战会议，作出反磨擦斗争的新的部署。

在反磨擦斗争中，朱德主张对顽固派军队要利用矛盾，区别对待，集中力量彻底解决其中的一股或数股。他感到八路军在山东的兵力比较弱，又有分散兵力的缺点，以致未能给某些反动力量以严重打击，要他们注意改进；同时，他又提醒处于反磨擦斗争前线的各部指挥员，不应忽视主要敌人仍是日本侵略者，不要放过一切有利时机给予日军和伪军以沉重打击。(35)

这时，八路军掌握了石友三勾结和准备投降日军的证据。二月三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彭等，指出：对石友三已不适用争取方针，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之。石友三得知八路军将给予打击，就在日军掩护下逃到卫河以东。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反击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联成一片，化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极大地发展鄂中、鄂东，以便与全国形势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磨擦与反磨擦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

二月十八日，自恃拥有相当实力的朱怀冰部突然袭击冀南磁县西贾壁村、大湾村八路军驻地，杀害八路军指战员一百多人。二十一日，朱德、彭德怀就如何消灭朱怀冰部的准备工作致电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并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一场反击反共顽固派军事进攻的激烈战斗即将开始。

朱怀冰在东路军时期曾受朱德指挥，这时竟气势汹汹地来到八路军总部，打着“军令政令统一”的旗号，要八路军把河北让给他。朱德后来曾叙述过这次经过。他说：朱怀冰蛮横地问，究竟是让还是打？我就对他说，我们建立根据地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要让？再说，大革命时期我们让过一回，让坏了。大革命一失败，国民党右派来了，要杀我们，我们那时候没有军队，领袖陈独秀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能让他杀。现在我们有八路军；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为什么还要让！朱怀冰威胁要打。我就对他说，你要晓得，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没有打过内战；但是，你要打，我们一点也不怕。(36)朱怀冰碰了钉子，并未就此罢手。

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是：在反磨擦斗争中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争取丁树本中立。当时，石友三刚败退到卫河以东，立足未稳；移驻武、涉地区的朱怀冰部离国民党其他主力部队距离较远，位置孤立突出；国民党当局准备增调到河北的两个军还在黄河以南；鹿钟麟已辞去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搞磨擦表现消极；国民党当局宣布以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冀南参议会等通电反对，这正是八路军反击反共顽固派的有利时机。

八路军总部在三月四日发起打击石友三的卫东战役，到十一日共毙、俘石部三千六百多人，后来，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被枪决。三月五日，发起磁、武、涉、林战役，反击朱怀冰部。战役开始后，朱德得知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正向林县开进，立刻致电庞炳勋：“贵部骑兵张旅开林县，当飭本军予以方便，惟林、武、涉地区朱怀冰军现正与本军磨擦甚烈，希贵部开抵该区，勿加磨擦，免生误会。”(37)庞炳勋慑于八路军的威力，为保存实力，不敢继续东进。孙殿英部也不敢介入，使八路军得以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

朱怀冰挑衅时虽然傲气十足、实际上却不堪一击，到三月九日已被打垮。朱德立刻下令停止进攻，并主动后撤，准备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这次战役共

歼灭朱怀冰部第九十六军及游杂武装一万余人，俘虏中有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参谋长王斌、武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等。当时有人还想活捉鹿钟麟。朱德说，不要捉，捉到了又怎么放呢？(38)因此，故意让开一条路，放他逃走。对俘虏和朱怀冰部军官眷属（包括朱怀冰的妻子），也加以优待，不久后全部放回。

三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八路军将领阐述反磨擦斗争的方针：“今天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主要的斗争方式是对日寇的武装斗争，这是丝毫不能放弃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也是用武装斗争方式，这是统一战线的不幸。但为着争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政治路线的胜利，这是必要的，这是要由上层资产阶级负责的。”“倘若没有今天反磨擦的局部武装斗争，就必然会分裂，而发展为全部的武装斗争，那是我们不希望的。”(39)

从歼灭朱怀冰部、击退石友三部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再没有力量可以同八路军闹大规模的磨擦了。所以，毛泽东说：打朱怀冰是华北根据地的一个决战。(40)朱德也说：自打了朱怀冰，便确定建立华北政权，实行独立自主，从此形势反而好转了。(41)

河北这一仗，结束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仍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说：蒋介石有个好处，你把他打赢了，他就不开腔了，这一点确是一个好处；假如他打赢了你，那你就不得不下台，你打赢他，他一点腔也不开。(42)这是朱德长期同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之谈。周恩来也曾谈到这一点。他说：“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一个第一次谈判。”(43)

三十、回延安

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朱德仍坚持以抗日的民族大义为重。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注意掌握分寸，在军事反击中适可而止，及时主动后撤，作出适当让步，以争取国内和平，为下一步谈判打开大门，使顽固派知难而退，并争取中间分子同情，从而继续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日。

但当时有些干部并不完全了解这场反磨擦斗争的性质和方针，只是沉浸于军事斗争胜利的兴奋中，想给对方以更大打击。朱德及时提醒大家：要“防止单纯军事观点、图快一时的盲目行动。” 还有些干部误认为国共双方在河北打起来是一种决裂，并认为将从小决裂发展到大决裂。针对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明确宣布：坚持国共长期合作抗日的方针不变。

局势确实比较复杂。如果不是全局在胸，不是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容易被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所迷惑；从而作出过分的反应。在朱怀冰部被击败后，蒋介石下令胡宗南把第九十军调到晋西，命令庞炳勋、范汉杰、刘勘、陈铁各部主力集中到太南周围，还准备再增调六个师渡河北上，摆出一副准备大打的架势。但他也知道已不可能再从八路军手中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夺过来了，因此下令：“冀察战区鹿忠司令所属庞炳勋军、石友三军、朱怀冰军、孙殿英军、孙

良诚游击队，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及其他游击队、地方团队等着概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统一指挥。” 这实际上是被迫撤销了原有的冀察战区。

朱德看清了蒋介石的意图，尽管形势诡谲变幻，险象环生；但他胸有成竹，沉着应付，始终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这种形势下，卫立煌的处境却非常困难。他是蒋介石的部下，又是朱德的挚友。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同八路军打起来以后，他非常焦急和为难。他致电朱德，希望适可而止，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他这个意见符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反磨擦斗争的方针，因为进行这样的反磨擦斗争本来是不得已的，中共和八路军方面决不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在接到卫立煌来电后，朱德就下令部队停止追击，适当后撤，准备谈判。但是，蒋介石仍一再命令卫立煌调兵向八路军进攻，并要他去重庆汇报。这使卫立煌焦虑异常。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日，他匆匆从洛阳北上渡过黄河来到山西晋城，表面上是前来部署向八路军进攻事宜，实际上却是希望同朱德会晤。他在离开洛阳时，曾向驻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表示希望同朱彭会谈。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报告后，致电前方，表示：“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并提出了谈判要点，除重申团结愿望、划分作战区域等外，还提出八路军增饷、扩编等要求。

由于八路军主动后撤，双方在实际上已停止军事冲突；但是，相邻驻军之间的对立情绪仍很严重，仍发生一些小的磨擦。日本侵略军借此挑拨国共关系，在长治城内贴满了“中日联合起来铲除八路”的标语。他们还乘机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形势的紧张，使朱德暂时无法抽身前去同卫立煌会面。而由于晋城受到日军攻击，卫立煌也不得不回到洛阳。

卫立煌在晋城时，朱德把八路军各部最近同日军作战情况和取得的胜利，给他送去了报告。卫将这些转报蒋介石，还报告了八路军主动后撤等情

况。但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这时却向蒋介石转送了晋城华北战地服务督导组一个叫郭鸿群的反动分子的报告，说：“现第十八集团军及决死队、牺盟会等又乘中央军调动之时，攫取地方政权，强行共产主义”，丝毫不提八路军与日军艰苦作战的情况。这两个报告反映了对抗日和磨擦问题的两种不同态度。

卫立煌还派一个少将高级参议申凌霄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找朱德，但从晋城到八路军总部需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交通很是不便。申凌霄在四月十六日才到达八路军总部。两天后，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战区分会副主任委员王藻真一行也来到八路军总部，目的也是为了商讨国内和平，共同抗日的问题。这时，中共中央准备尽早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等一再致电前方，希望朱德早日回延安。朱德安排好前方工作后，准备南下。他决定先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转回延安，再去重庆。申凌霄见到朱德面交卫立煌信件后，先回去复命。朱德和王藻真一行同去洛阳，随行的有康克清及总部供给部政委周文龙等人。主权抽调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送朱德去洛阳的随行卫队。

朱德这次南行，很快引起各方的瞩目。中共中央期望他同卫立煌的谈判不仅能解决划分防区、停止军事冲突，继续团结抗日的问题，还能解决八路军的扩编、增的问题。蒋介石希望朱德在谈判中能再作让步，并要求朱德在洛阳会谈后经西安去重庆向他“述职”。卫立煌更盼望朱德前去，商量解决军事冲突和共同抗日的问题。日本侵略者则希望朱德同卫立煌的谈判失败。八路军各部都担心朱德此行的安全，因为南下途中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和某些对八路军对立情绪仍很严重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区。但朱德却从容沉着地对待这一切。出发前，他先去潞城北村一二九师师部同刘伯承等研究工作。四月二十五日，等王藻真一行来到北村后，就一起出发，前去洛阳。

朱德他们在四月二十六日到达壶关附近的龙溪镇宿营时，恰逢该地驻军一二九师暂编新一旅旅长韦杰结婚，朱德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韦杰曾担任过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团长，朱德很了解他。在婚礼上，朱德风趣地讲了些祝贺喜庆的话，接着就讲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说：范汉杰、孙殿英等国民党军队就在你们周围，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同他们交往中注意又联合、又斗争，决不先打第一枪。(11)当他了解到韦杰前几天曾截击一部日军、缴获甚多后，很高兴，要了一些战利品，准备带到洛阳去送人，使他们了解八路军抗日的实际情况。

四月二十六日，他们经过新一旅同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六师防区的交接地带。前不久这一带曾被日军侵占，这时已被打退，国共双方军队在这里也曾发生过一些小的冲突。知道朱德一行要来，二十六军军长范汉杰派队前来迎接。二十八日，他们到达范汉杰驻地附近宿营，随行卫队加强了警戒，再前进就需通过日军的封锁线。二十九日，为了探清前进路线并和范汉杰商谈解决新一旅同范部冲突的问题，他们曾停留一天。三十日，范汉杰加派一个连护送。

五月一日，朱德一行到达第四十六军军长李家钰的司令部。李家钰在东路军时期，曾接受过朱德的指挥。二日，因为天雨，又停留一天。朱德利用这个机会向李家钰介绍了晋东南的敌情，谈了团结抗日的必要性。由于他态度诚恳，讲得有理有据，收到较好的效果。三日，李家钰也派一连步兵护送。

五月四日，又要通过日军封锁线，由第九军派人前来迎接。当朱德一行

正准备越过封锁线时，日军忽然发来炮弹五、六十发，因此到黄昏后才重新前进。当夜十时通过博（爱）晋（城）公路晋庙铺的封锁线。这里离日军驻地不过五六里路，白天还有二百多日军曾停留在此。过封锁线后，由当地群众作向导，走小路西行。一路上，经过高山峻岭、浅溪深谷。月色昏暗，只有星光稀微，隐约照人。凌晨到达马街，第九军一个营在这里迎候。五日，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在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血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他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赋诗抒怀。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太行》就是这时写的：

“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

诗前题道：“ 一九四一年五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 ”

五月六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七日，渡过黄河，卫立煌派人到码头迎接。下午六时许到达洛阳。卫立煌早就盼望朱德前来。为了便于交谈，他把朱德和康克清安排在自己的驻地住宿，其他随行人员住在第九军军部。当时洛阳的情况很复杂，既有大批国民党特务在活动，又有不少在反磨擦斗争中吃了败仗而又不甘心的顽固派头面人物，他们企图为难甚至加害朱德。但是，卫立煌是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并兼河南省政府主席。他对朱德热情接待，使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刚到洛阳，朱德在卫立煌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全国人民需要这种团结，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需要这种团结，共产党、八路军坚决要求这种团结。只有日寇、汪精卫等汉奸、投降分子和磨擦专家害怕这种团结。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朱德在洛阳期间，卫立煌天天开招待晚会，豫剧著名演员陈素真、常香玉等都曾在晚会上演出过。膳食都很丰盛。朱德回到延安后，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工作时，强调了团结中间分子的重要性。他说：洛阳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中的地方，但因为卫立煌这个中间力量在，情况比西安还要好些。毛泽东非常赞同朱德的这个意见。

卫立煌和朱德的会谈，气氛很融洽，朱德提出的要求，卫立煌几乎都表示支持和同情，但有些事情他作不了主。在他们交谈过程中，国民党政府的参谋总长何应钦致电卫立煌，提出种种限制陕甘宁边区活动和八路军发展的意见。朱德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等，指出：这是国民党方面“ 已经提过的问题，是讨价还价，毫无诚意，难得结果。在华北他们利用中间力量来磨擦 ”；“ 我们只有同卫（立煌）弄好关系，注意实际配合，加强争取，同时忠告卫，我们决不与他争。 ”（12）

卫立煌本来还准备向胡宗南就陕甘宁边区问题作些调解。但蒋介石知道后，立刻电卫说：“ 这个事你不用管。 ”（13）事实已经表明：尽管朱德在洛阳的谈判比较顺利，但如果到重庆去谈判势必会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不容易得到结果。这时，到苏联去治病的周恩来已回到延安，他对同蒋介石谈判有着丰富的经验，又是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团团团长和南方局书记，可以较长期地留在那里。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朱德同

卫立煌谈判后就回延安，不再到重庆去见蒋介石。

在朱德一行去洛阳的过程中，随行的卫队中有人在晋城和洛阳都发现过去决死队、八路军的战士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还有一些人被关押在那里。这些人都是在上一年冬晋西事变和河北磨擦事件中被抓去的。朱德把这个问题向卫立煌提出后，第二天，卫立煌就下令把这些人全部释放，一共一百多人。由周文龙在洛阳领取军响后，把这些人带回八路军总部，重新分配工作(14)。

五月十六日上午，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的委员们来看朱德。朱德同他们谈话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不少问题。

在回答最近华北敌人的企图和我们应有的对策时，朱德指出：华北敌军不包括伪军在内约有五六十万人，正在加紧修筑堡垒；公路和铁路，同时不断“扫荡”抗日根据地；但八路军、游击队也很活跃，力量相当强大，冀东、平西、门头沟、西山也都是我们的活动地区。现在敌人把利诱和威胁配合起来，除用武力外，还采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我们的对策就是巩固和发展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谈到河北灾情和八路军对放赈的意见时，朱德介绍了河北各地遭受的兵灾、水灾、旱灾、虫灾的严重情况。指出，根据地军民正在依靠自己，克服灾荒造成的困难。他说：河北同胞听说中央要放赈，就往大后方打电报呼吁，望眼欲穿；可是直到现在还得不到实惠。最近平原地区正在修堤，要化八百万元，希望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完成这项工程，这样下半年河北的河水就不致再决口了。

在回答国共两党如何才能亲密合作时，朱德说：我们共产党当前是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并没有自己的私利。凡是有共产党的地方，抗战就热烈；抗战热烈的地方，共产党的力量就大。可是，有的人对抗战的兴趣不大，却积极限共、防共、反共，限制八路军发展，不断制造磨擦，甚至利用汉奸队伍来反共。长此下去，国就要亡了。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取消妨碍抗战的东西，国共两党才能亲密合作，共同抗日，否则是没有出路的。(15)

第二天，朱德结束了在洛阳的会谈，乘火车经潼关去西安。他

到达西安时，早几天从延安来西安的周恩来到车站去迎接。自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他们快有两年没有见面了。这次周恩来将要代替朱德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两人深入地交流了情况和意见。

当时西安是联接前方、重庆和延安的枢纽，南往北来的干部常常在这里相会。西安七贤庄没有八路军办事处。它虽是经过国民党当局同意设立的合法机关，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它周围安插了二十多个监视点，有时还秘密绑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来访人员。朱德来到这里后，教育工作者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鼓励大家学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还提出了一套对付特务监视、跟踪的办法。当他了解到交通科有一位姓贾的战士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走后，就亲自出面交涉，迫使特务机关把人交了回来。由于日本飞机常来轰炸西安，办事处在北郊范家村附近挖了几孔窑洞，朱德、周恩来等就在那里开会。

这时，又有一批准备去延安的干部、进步人士和青年，因被国民党当局阻拦而滞留在西安，其中有著名文学家茅盾和理论家张仲实。他们意外地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朱德和周恩来。茅盾早就认识周恩来，同朱德却是第一次见面。他对朱德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话语不多的敦厚长者。”周恩来说：

“你们不论是去参观还是去工作，我们都欢迎。正巧有个好机会，总司令过几天要回延安，你们可以同他一道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了保证。”“现在去延安不象三七、三八年那样容易了。不过，你们这次搭总司令的车队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是不敢为难的。”(16)朱德、周恩来还向他们介绍了当前的局势。

在西安期间，朱德拜会了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主任谷正鼎等。

五月二十四日，朱德一行离开西安回延安。为了把一批要去延安而滞留在西安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带走，把一批国民党当局禁运而延安又急需的通讯器材也带去，朱德不坐小汽车而坐大卡车。他们一行由三辆卡车组成车队，共有四五十人，大多穿了军装，充作朱德的随从。朱德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他坐在第一辆卡车的司机旁边，国民党特务不敢盘查和阻拦。

上午八时，车队出发。傍晚歇宿在铜川。朱德和茅盾的住处相近。晚饭后，朱德前去拜访茅盾，他们侃侃而谈的话题是杜甫和白居易。闲谈中，茅盾发现“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素养。”(17)第二天下午一时许，经过中部县时，根据朱德的提议，前去拜谒黄帝陵。车队停在桥山脚下，大家拾级而上，来到陵前。驻守黄陵的卫兵说，这里是国防重地，奉令不让参观。但黄陵管理处的负责人看到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前来，就特别通融，陪同参观。朱德请茅盾向大家讲讲黄帝的故事。茅盾记载当时情况说：

“总司令接着讲话。他很幽默他说，刚寸沈先生(18)讲了历史上的黄帝，现在我再讲讲当代的黄帝——我们这些黄帝的裔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

现在这个古老的民族觉醒了，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想妥协投降，这种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

总司令的话不长，却极富煽动力，我才发现总司令还有很好的演说才能。”(19)

当天下午四时左右，车队通过最后一道国民党军队的关卡，进入陕甘宁边区。

朱德在华北前线和敌后那样复杂的环境中指挥八路军坚持抗战，已将近三年了。他们在敌后广泛发动民众，光复了大片国土，建立起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创立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抑留了侵华日军的大量兵力，使他们无法开发并利用华北的丰富资源，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八路军自身也从原来的三个师发展到有正规部队二十二万人（游击队还没有计算在内），在全国人民中具有巨大的威望。这一切自然同朱德、彭德怀对八路军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五月二十六日，朱德一行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干部和军队、民众的热烈欢迎。本来决定在第二大开欢迎晚会，但是，听说朱总司令回来了，许多机关、学校群众自动整队来到南门外操场上，只好临时决定当天先在这里举行

一次欢迎大会。朱德应邀在会上讲话，他说：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这奠定了华北抗战胜利的基础。尽管敌人“扫荡”、破坏，顽固分子制造磨擦，可是华北广大人民已把自己组织成伟大的独立的力量，他们不但不会消灭，而且将日趋坚强。(20)茅盾等也参加了这次欢迎大会。他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热烈而质朴的场面，很受感动。

第二天，延安各界又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也参加了，鲁艺的二百多师生演出了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欢迎会上，朱德兴奋地告诉大家：“今天，坚持华北抗战已以八路和一切进步的力量为主力了。因此，华北的前途是光明的。”(21)

前方的同志，包括朱德本人没有想到他这次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让他留下来协助毛泽东清理党内路线是非和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没有再回华北前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三十一、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抗战

朱德这次回延安，正是国际国内风云险恶、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时候。

当时，国际法西斯势力正十分猖獗。在欧洲，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击破英、法等国组成的联军，接连占领欧洲许多国家。法同贝当政府已经投降，德国已准备对英国本土实行登陆作战。在远东，日本侵略者同德国法西斯遥相呼应，扬言要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他们一方面发动湖北宜昌等战役，并截断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对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地进行“扫荡”，力图巩固它的占领区。在如此严重的困难面前，中国抗日战争阵线中一部分人更加动摇，国民党内出现一股妥协投降的暗流。蒋介石对抗日前途感到悲观，妥协思想有所抬头。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打击日本侵略者，摆脱抗战困境，争取时局好转。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指导思想仍存在分歧。先后犯过“左”倾和右倾严重错误的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延安，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在朱德这次回延安前不久，王明又将他一九三一年所写的鼓吹“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重新出版。朱德在党内和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尽管华北前线非常需要他，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朱德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工作。

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留在延安自然仍协助分管军事工作。这以后，从延安发出的重要军事文电一般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工稼祥三人署名。朱德离开前方后，八路军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但八路军总部发出的重要文电仍由他和彭德怀等共同署名。因此，有些由八路军总部发出而有朱德共同署名的电报，收件人中又有“并报朱总”的字样。此外，由于朱德还担任着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因此，同国民党军事当局之间的文电，一般也由他和彭德怀两人或由他们和叶挺、项英共同署名。

朱德回延安后还有一项任务：许多需要中共中央领导人出面的活动，往往由朱德担负。这就减轻了毛泽东的工作负担，使他能集中更多精力来研究重要问题。所以，朱德的兼职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他在这一时期的兼职就有：筹备中共七大的军事问题委员会负责人，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负责人，整风学习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组组长，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工作委员会成员以至延安新体育会会长等。

由于抗日战争正面对着严重困难，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国内团结、战胜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便成为放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其中，特别需要注意团结的是还保存着抗战积极性的广大中间势力。这些中间势力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

五月二十九日，朱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华北磨擦问题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强调要继续争取中间力量，继续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对中央军，我们经常有人和他们来往。我们和卫立煌的关系很好，使他在国共两党的磨擦中保持中立。卫立煌表示要坚持进步。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毛泽东很赞同朱德的意见，插话说：朱总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派

也要争取与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局问题的会议上，朱德又说：目前我们要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把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对立起来。地主、资本家一般也还有民族思想，不要把他們看成汉奸。统战工作做得好，地主愿意把粮食供给我们；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他们会跑掉。

当抗日战争跨入第四年时，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明确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投降危险和战胜困难而斗争；并要求必须取消现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因为它已产生削弱抗战力量、引起人心不安的严重结果。同时，在党内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提出全党必须执行“的十六项政策，其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同时也说明：在敌后，“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过去的斗争也正是为着争取团结。”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日。

朱德这时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一文，说明：“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是早已失败了，于是日寇便想用‘以华制华’的方法，引诱中国上层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来奴役我全中华民族；用‘以战养战’的方法，将战争的负担放在中国人民身上，来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文章指出：由于一部分上层地主资产阶级不愿意进步，就形成今日新的投降妥协的严重危险，文章还总结了华北军民三年来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斗争的经验，指出：“三年以来，在华北与人民呼吸相关的军队非但没有被敌寇消灭，反而日益巩固和壮大起来，非但没有被削弱和疲惫，反而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英勇了！”“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应当归功于民众，归功于民主。”强调要继续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

这时，日本侵略军急于“迅速处理支那事变”，“迅速摧毁敌人（指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企图”，决心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他们把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视为腹心大患，在反复进行“扫荡”的同时，竭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来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因此，这时华北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焦点便是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开展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

早在抗战初期，朱德就曾指出：“交通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交通并非不可变的。可以修理，亦可以破坏和阻塞。因此我军对于敌人的交通，要经常进行破坏，使敌人的交通由最便利的变为不便利的。”

敌人的“囚笼政策”是企图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发挥他们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来消灭八路军，荡平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保存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交通破袭战势在必行。在朱德动身去洛阳谈判前，他和彭德怀综合敌军在华北的活动情况，指出：敌军近日“加强铁道线军事封锁线及经济封锁”；“强化交通，增修道路”，“且于道侧掘深、宽之沟，此不特妨害

军事；且妨害根据地之经济流通”。因此，他们下达了破坏敌方主要交通干线的命令，规定从四月十日起开始动作，并向毛泽东等人作了报告。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大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平绥铁路到同蒲铁路还不能通车，石家庄到德州的铁路也远未修通。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正大铁路看成是连接山西和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八路军的交通破袭战，也把重点放在破坏正大铁路上。

朱德回到延安后，在六月二十二日和彭德怀、左权向八路军各部正式下达破袭正大铁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命令中对发动这次战役的缘由，这样指出：“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于八月间进犯西安企图。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大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大路。”战役主要在正大铁路沿线进行，“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命令规定“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二十二个团”，要求在八月十日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军委。

八月八日，朱德、彭德怀、左权正式下达战役行动命令，对战役部署和作战地域区分作出具体规定，并“限八月二十号开始战斗。”

八月二十日晚，大规模的破袭战正式开始。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迫切要求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二十二个团，结果实际参战的兵力超过了一百个团。战役开始后一天多的二十二日中午，朱德、左权作出指示：“正大战役是抗战以来华北军队积极向敌进攻之空前大战，总合兵力共约百个团，故名‘百团大战’，以便向外扩大宣传。”从此，“百团大战”的名称不仅轰传中外，而且永垂史册。

由于此次战役的突然性，加以八路军各部之间和军民之间的紧密配合，给了日军以出乎意外的沉重打击，八月二十一日还一度攻占日军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二十五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致电参战部队进行嘉奖。为了扩大战果，二十六日，又对参战部队作了进一步部署。到九月二日，破袭正大铁路的预定计划已基本完成，朱德、彭德怀、左权指示参战部队，基本上结束正大战役。

但是，敌军在华北平原地区推行“囚笼政策”的情况仍很严重。他们通过构筑交通线，准备把冀中、冀南分割成许多小块。如果听任他们继续构筑，将使八路军有“在平原地区无法立足”的危险。因此，朱、彭、左在九月七日电令冀中、冀南部队领导人，“应乘百团大战之胜利，敌已被调集中平汉、正大、同蒲沿线及青纱帐未倒以前”的机会，大规模破击敌军交通线，以粉碎他们不断分割抗日根据地的图谋。电文强调：“必须知道，没有交通上之胜利，坚持平原是不可能的。”(11)

九月十六日，朱德、彭德怀、左权部署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规定这个阶段作战的基本方针是：“1、继续破坏敌

寇交通；2、克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12)这一阶段作战，从九月二十二日到十月上旬，重点在太行山区的榆社、辽县一带，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日军已有准备，而八路军在连续作战中过于疲劳，牺牲较大。十

月五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令基本结束这个阶段的作战，要求各部集结主力进行战后整理和整训，恢复体力，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这一个半月连续不断的破袭战，使受到沉重打击的日本侵略军恼怒异常。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势，他们从华东、华中抽调兵力回援华北，以两万多日军加上大批伪军，开始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他们从晋东南开始，然后扩大到平西、北岳区和冀中区，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不及进行休整的八路军立刻投入反“扫荡”斗争，直至十二月上旬才粉碎这次“扫荡”。至此，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宣告结束。

百团大战确如朱德、左权所指出的那样，是抗战以来华北战场上空前未有的主动积极向日军进攻的大会战。在华北前线直接指挥这次战役的彭德怀后来说：

“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大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未通车。收复大量县城，有些得而复失。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13)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

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话：百团大战真是今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14)

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击敌、和友”作为“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要求：“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对于友军则不论何部，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者，在目前时期中，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或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取缓和态度。”(15)

在百团大战取得初步胜利后，陕甘宁边区各界人士兴奋异常，热烈举行庆祝活动。九月十九日，哪甘警备区在陕西郿县（今富县）召开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纪念“九一八”大会，正在那里工作的朱德应邀参加。他在会上赞扬百团大战取得的胜利。第二天，延安各界也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纪念

“九一八”九周年大会，参加的有两万余人，毛泽东和朱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朱德刚从哪县回到延安，就匆匆赶到会场，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百团大战是我们对付敌人“囚笼政策”的办法，这个办法还能拖住敌人，延缓他们进攻我后方的计划。

几天后，朱德又为《新中华报》撰写代论《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指出：百团大战虽然是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战役进攻，但它带有全国性的伟大战略意义。他号召全体指战员和政工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力更生，做到部队给养部分自给，只有这样，敌后抗日武装才能继续坚持，才能扩大已得的胜利。(16)中共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都赞扬了百团大战的巨大胜利。

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也交口赞誉。象卫立煌这样对八路军友好、坚持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曾命令在晋南的中央军向白晋、同蒲两路南段积极进攻，以配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17)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18)但他又害怕由此更扩大共产党、八路军在全国的影响，在十月十九日由侍从室通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百团大战“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应绝对禁止登载，希即饬遵。”(19)

由于百团大战充分显示了八路军的力量，日军随即从正面战场抽调更多兵力到华北，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根据地遇到严重困难，有人对百团大战以至华北早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否正确提出疑问。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朱德在中共六大作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时，回答这个问题说：华北抗战一般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因此，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两三万人，到一九四一年已发展到几十万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反磨擦斗争也是正确的。至于百团大战，在战术上是有成绩的，部队打仗也打得好。问题在于当时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单独战胜敌人，在敌人进攻，我们防御以至退却的时候，却用我们的力量去阻止敌人的进攻，成了攻势阻御，这一点是错了。另外，在百团大战中有几个比较小的战斗带有攻坚性质或正面防御性质，这也是不该打的。

尽管百团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尽管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击敌、和友”的方针，国内的政治局势却越来越险恶了。

这种变化，直接受着当时国际形势急遽动荡的影响。九月二十六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抗日，加入他们的同盟。英、美两国也愿以种种条件争取国民党政府加入他们的同盟。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使蒋介石自感身价陡增，得意忘形。毛泽东在十月二十九日有一个分析：“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20)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为时机对他有利，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便下了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决心。

正当百团大战后期反“扫荡”战斗还在继续时，十月十九日，也就是蒋介石密令对百团大战的新闻“以后应绝对禁止登载”的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各部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这就是皖南事变前震动中外的“皓电”，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一九三九年春，中共中央已委托周恩来同新四军负责人商定“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但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向北发展的方针始终犹豫观望，迟迟不作有力部署。在国民党顽固派积极活动时，毛泽东、朱德等十分担心新四军特别是军部的安全。九月六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新四军领导人：“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准备自卫，皖南尤须防备。”十月八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向他们指出：“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21)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但是，项英仍强调困难，不准备将主力北移。十月十二日，毛、朱、王再次向他们指出：“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有的部队就是这样在东江失败的。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项英仍不听劝说。

当新四军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时，朱德正在第三五九旅视察工作。十一月三日，急于寻找朱德的毛泽东致电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请他转告朱德：“有事待商，拟派汽车来接，请准备回延。”如此急迫地需要朱德回延安商谈的，就是新四军北撤问题。这时，离何、白“皓电”规定的新四军和八路军一部北撤时间只有十几天了。如何回答“皓电”，涉及对整个形势的估量和斗争的策略。经过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在十一月九日复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他们在“皓电”中的无理命令和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尖锐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为了顾全大局，朱德等在复电中仍表示新四军在江南的正规部队将遵令北移。这就是得到国内中间分子广泛同情的“佳电”。

可是，正当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后移师北上时，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这就是同室操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名发表通电，向全国揭露皖南事变真相，要求国民党军事当局“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但是，国民党当局仍一意孤行，悍然发布通令宣布：“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消，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国民党军事当局发言人还同时发表谈话，诬称新四军“叛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历数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种种事实，揭露他们有计划地在皖南围歼遵命北移的新四军的阴谋，指出：

“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

当时，党内外一些人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战可能全面爆发。但日本侵华战争正在继续，大敌当前，全国上下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坚定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克制态度，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在军事上严守自卫。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继续坚持在长江甫北的敌后抗日战争。同时，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事宜的办法。

经过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由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不得人心，遭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使它不得不放弃反共的军事进攻计划。日本侵略军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并不希望把新四军和八路军全部调往华北，在一月下旬，在正面战场上发动新的猛烈进攻。这也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他的反共战争计划。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作了指示：统一战线原则不变；注意收集皖南散失力量，加强指导；积极布置皖西、鄂东及河南方面的游击战争。

以后，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当局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企图再次发动反共高潮，进攻边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朱德在七月四日致函胡宗南，指出：

“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道，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

六日，他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和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中共中央指示，将朱德致胡宗南电等文件印成小册子，向边区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散发。国民党当局看到中国共产党已有准备，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终于维持到抗战胜利，没有破裂。

三十二、呕心沥血渡时艰

一九四一年以后，是各抗日根据地物质困难空前严重的时期。这种困难，是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经济封锁所造成的。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当时边区只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财政经济极其困难，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鞋袜穿，冬天没有被子盖，没有菜吃，没有油吃，甚至吃粮也很困难。”

早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已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

朱德回延安后，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情况。他看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深感非采取重大措施，不足以扭转局面。因此，他邀请正在延安的中共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和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负责人一起到各地去视察工、农、商各业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一九四一年十月到年底，朱德先后发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完成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阐述他对发展边区经济的构想。他在文章中指出：“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问题，提出已经相当久，而且也取得相当成功，但因这问题尚未引起各方面最广泛的注意，并为某些条件所限制，直到今天还未达到应有的成绩，所以有重新提出的必要。”他认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最基本的困难有两个：“首先就没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其次，我们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还远不足以应付工作发展中的需要，我们缺乏重工业机器，现在自制不能，又难于购买。”此外，“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物资难于流通；边区内部各系统的经济建设机关，互相的连系尚不够密切。”

怎样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经过调查，朱德把注意力集中到在陕甘宁边区蕴藏量很大、又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上来。边区境内有五个盐池，产量很大，边区内部根本消费不了。当时，大家都还没有想到用盐去换钱以积累资金。朱德考虑到，如果把盐销到附近需要食盐的陕西、山西、河南各地，不就可以换口大量资金吗？当时，这些地区缺盐，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不可错过。”朱德明确地提出：“现在，自力更生是目前全党全军之极重大任务。”“我的意见先从盐下手。”“定边盐池为陕北经济策源地。”“我们下紧急令，派军队全体动员。首先从盐井来冲锋，冲破这些困难。”为了完成这个计划，他提出六点意见：

“一、开足五千亩以上晒盐田，今年不必再多；二、修好通庆阳大车路及他路大车路；三、设置转运站、饭店、骡

马店，统制出口商店；四、购足骡马；五、购足运输工具，大车、小车；六、开煤炭厂熬盐，运水运炭，在适当地点熬盐或引盐水到有炭地方去。”

“以上意见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他还指出，盐价应随时价涨落，不能固定不变，现在井地售价太低，以

致公家收入有限；同时，必须毫不姑息地严惩贪污腐化分子，“不惜用严法以至没收、枪毙之法”，“才能点滴归公”

除食盐外，朱德认为羊毛也是边区的一大优势。全边区有羊二百万只以上，单绵羊产的羊毛，每年就有二百五十万斤以上，纺成毛线、织成呢子，不但可以自用，还可以出口。边区不宜植棉，棉花较少，可以用毛、棉或毛、麻混纺来解决穿衣问题。他提出：“目前只应以盐及羊毛为重心来建设，以后当以次第及于他种工业”

怎样解决缺乏技术人材的问题？朱德也提出了几项措施，那就是：一面“欢迎边区以外的熟练工人，到边区来工作”；一面靠自己培养。他要求：

“边区的熟练工人要安心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更要耐心教育，教会工人学徒的真本事。我们的工人学徒，则要认真学习，要每人都下决心，在最短期间内培养自己成为熟练工人。”“这里的工厂同时又是学校，他们（指边区工人）在工作和学习中，”能够锻炼和培养自己，在政治上和技术上不断进步，成为将来工作的干部和领导者，成为技师、工程师和各种专门家。”

朱德雷厉风行地抓经济工作，措施有力，很快推动边区经济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十一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采纳朱德的意见，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十二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朱总司令最近曾到过我们边区各地、各工厂参观过，贡献给我们很多宝贵意见，对于我们明年的生产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

这年年底，朱德又撰文号召边区全体军民完成边区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从半自给到完全自足自给”；“解决吃饭、穿衣、日用品和军需的事。这件事不办好，抗日战争就难于支持，抗战的胜利就没有保障”

克服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一九四一年是关键的一年。

边区经济困难中最紧迫的是吃饭问题。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要养活原有的一百多万老百姓，本来就不富裕，现在又来了几万干部、学生、军队，都是脱产人员，单靠当地人民来养活是不可能的。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正调集大批军队，企图进攻边区。朱德回延安时，胡宗南二三十个师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边区，天天进行蚕食和挑衅活动。为了加强边区防务，保障中共中央的安全，朱德回延安后不久就下令从晋西北调一个主力旅回到陕甘宁边区，以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这一来，粮食的困难更增加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德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

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道：“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屯田，朱德是很熟悉的。早年他在读《三国志》时就很赞赏曹操“开芍丘（今安徽省寿县）屯田”的作法，认为这是解决军队生活必需品的好办法。现在，他也准备采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边区眼前的困难，而在规模上比曹操当时的屯田要大得多，不仅进行农业生产，还准备从事农、林、牧、副、渔以及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综合开发。为此，他找好一大

片荒地，准备把军队开去大干一番，这就是南泥湾。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约九十里，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但土地肥沃，有三条河川流经此地，是适宜于垦荒的好地方。相传过去这里曾是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因为战争的缘故，人民非死即逃，变成了荆棘遍野、杂草丛生的荒地。以前有过一些单位曾想来这里开垦，但都因人力不足，没有能站住脚。当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奉调回陕甘宁边区后，朱德决心以这支主力部队为骨干，带动边区的其他部队、机关、学校一起前去开垦。边区的北面联接着晋西北根据地，受顽固派军队的威胁较小，而南面所受威胁较大。把这支主力部队部署在南泥湾，一方面用来防备顽固派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可以进行开荒种地。

朱德把开垦南泥湾当作克服经济困难的一项重点工程来抓。

当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前来向他报到汇报工作的时候，他就把军垦屯田的想法告诉王震，王震很赞同；但他提出，这么多部队到哪儿去找开垦的土地呢？朱德笑笑说，土地倒是有，而且是块“大肥肉”，好多人想去啃，都啃不动；你王胡子敢不敢去啃？王震生一副连腮胡，同他相熟的人都叫他王胡子，朱德也这么叫他，他一听说有土地，高兴地向朱德保证一定能啃得动。

康克清后来回忆这一段情况时说：“南泥湾政策是朱总先提出，毛主席、党中央同意的。朱总原来就有军垦屯田的思想，但下面也要有人坚决执行才行；否则也不能搞得那么快、那么好。王胡子很坚决，开创了一个好传统。”

开发南泥湾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需要统一认识。不少战士从日夜战斗的前线回到边区，一心想的是打退顽固派的进攻，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可是，到了边区却要他们拿起锄头去开荒，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他们还认为当兵吃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有当了兵还要种地的道理？一些干部对指挥作战有一套，但组织开荒却没有经验，开始时也感到很不适应，朱德嘱咐部队领导干部：要想把生产自给运动开展起来，必须充分作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要鼓起大家的信心，要用我们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业。(11)他深入到战士中去，了解大家的思想，解答大家的疑问，说明为什么要进行军垦屯田的道理。他经常引用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问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我们是饿死、解散还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呢？他谆谆告诉大家，饿死、解散不是出路，只有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才是我们的办法。

除了思想上的障碍需要扫除以外，实际工作中的困难也很大。为了搞好开垦南泥湾的准备，一九四一年开春后，朱德带了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和军委行政处处长邓洁“还有一位农业技术员，到南泥湾去实地踏勘。”

从延安到三十里铺这一段路骑马还比较好走，可是从三十里铺折向东南到南泥湾的六十多里崎岖山路就很不好走了。到南泥湾以后，根本没有路，有的地方只能靠砍刀、斧子砍出一条路来。朱德感到，开发南泥湾，交通是个大问题，必须从三十里铺到南泥湾修筑一条平坦的大道，以便运输。他把这项任务交给炮兵团三营九连去完成。九连指战员在边区政府建设厅的指导下，克服没有经验、缺乏工具等困难，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当时的南泥湾，不但没有路，也没有住处，连老百姓也很难找到。朱德一行在踏勘时，白天披荆斩棘，爬山涉水，观察地形、研究措施：晚上简单地搭个窝棚，歇宿荒郊。在踏勘时，朱德访问了当地能找到的唯一的一位老乡，是姓唐的老汉。朱德同他攀谈起来。这位唐老汉原籍也是四川，是他父

亲从四川逃难来此地时把他带来的，住在这里已经几十年了，目前只剩下孤身一人。他对南泥湾的情况很熟悉、详细地向朱德作了介绍。后来，唐老汉在开发南泥湾过程中成了开垦部队的编外“顾问”。

经过几天踏勘，朱德对南泥湾的实际情形做到了胸中有数。传说这里的水有毒，不能喝；他们来时自己带了水。临走时，他又取走当地的水样和土样。由于延安化验条件差，就把水样、土样送到重庆周恩来处，请他找人化验。(12)最后，弄清当地有些水由于长年经过腐花烂叶的浸泡，喝了有害健康，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解决。这就为不久后开垦大军的前来创造了条件。

不久，三五九旅六一七团首先开进南泥湾东面的临镇。开进前，朱德又同王震等去南泥湾周围察看。以后，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和七一九团也先后开进南泥湾一带。一九四二年，三五九旅旅部进入垦区，驻在金盆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也陆续来南泥湾参加开垦，军委炮兵团到了离南泥湾不远的陶宝峪，掀起了开荒生产的热潮。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各单位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军委在南泥湾设了一个办事处，负责这项工作。

二月二十五日，朱德在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生产运动的报告。他说，“我们党的负责同志，要把生产运动看严重一点，看远一点。因为是一个战争的环境，现在边区周围有二十儿万军队、五道封锁线，企图把边区蚕食取消，它的力量很大，可能打进来，所以我们要把经济建设看远一点，要把力量准备一下，应付他们的来打我们。”他提出了这一年边区粮食生产的任务：“今年边区计划生产四十万石粮，这个任务是要我们实际来做的，就是我们施肥、灌水、挖井，来增加收获。”他还提出种麻、种棉花、织毛、挖药材、养鸡、养鸭、养蜂、养羊、养牛等。要求并规定了边区工业、盐业、运输业、商业、税收工作等方面的任务。(13)他领导军委机关工作人员在王家坪附近开了个菜园，还亲自抓机关食堂，改善伙食。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渡过了边区这段最困难的日子。

打仗需要武器、弹药。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当局曾供应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分武器、弹药和军饷。可是皖南事变前就已断绝这种供应。在朱德等人筹划下，延安的兵工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每月可造步枪子弹六万发，如果弹壳供应有保障，每月可以生产二十万发以至更多（所以战士打枪后要收回弹壳上交）；每月可造手榴弹二万枚；小迫击炮五门，炮弹一千发；制造无烟火药的工厂也即将开工；造火药时需要硫酸，又建设了一个硫酸厂，每月约可生产硫酸四百磅。(14)当时，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把缴获敌军的武器、弹药作为主要的军需来源，后方的产品作为补充。

一九四一年五月份，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朱德又一次来到南泥湾，在王震陪同下视察了刚来南泥湾不久的七一八团的生产情况。他看到正在成长的谷子，听了团部的汇报，又到战士中找人谈话，征求大家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向大家讲解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他说：“边区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我们这么多机关部队，都要靠人民负担，怎么行呢？我们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生产。毛主席说：敌人要封锁我们，我们对敌人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15)

六月二十日，朱德写了一封长信给三五九旅的七一八、七一九两个团领导人，对南泥湾生产作了具体指示：

“七一八团陈、熊(16)两同志转七一九[团]陈、晏(17)及生产委员会：

你们两团的生产有成绩，有了基础，望你们每天都向前推进，建立起模范的生产运动。你们要知道此一工作的重要性，它不但解决了日前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也为边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将来即是国家一部分优良的产业。

目前你们的农业生产将告结束（指开荒），你们应当乘此机会，建立起下边这些事业来。

一、畜牧业——养鸡、养鸭、养猪、养大、养鹅、养兔、养牛、养驴等，这些东西可由少到多，由无到有，不可忽视。

二、运输业——将牲口集中起来，组织大规模的运输队，到定边驮盐下来，或驮土货到上边去买，要多做大车，利用临镇至延安的大车路贩运货物，能做到每天有到延安的大车就好了。大路两边应多修骡马大店，堆粮、堆草，运草、运菜来延安。

三、手工业——建设手工厂，木厂、铁厂、农具厂、编物厂、食品厂、酱菜厂等。多做多开，不可大开，唯大车厂要大大的开，今年要做大车五百辆至一千辆，卖给边区军政民，以广运输。如铁不够，可到山西招贤镇大大的订购，因为你们有很好的大车工人，大车要做得很好，将来全边区都要用你们的大车。如你们能做，延安可来订购，先定合同，先交一部分款子。

四、商业——商业要做，但不可大做，能和你们的农业、工业、运输业配合起来就行了。不可投机取巧，把资本放到不可靠的方面去。最好运土货到延安换取必需品，以物易物最为适宜，土货以药材为主，可发动军队和老百姓去开采，盐店是主要的，但不可看利太重。饭店、酒店、豆腐店可附带的去开。运输生意可大做，没有运输即没有生产可做。做生意你们七、八两团(18)要配合一致，不可互相冲突，与军委系统也要配合起来。对边区、整个商业要有政策，不可看小利而失大利，眼光要大，组织要严密、统一。

以上四项，是目前农闲时要抓紧的工作。目前边区军事一时尚不吃紧（但无[毋]松劲），望你们在生产运动中建立起永久的基础，这是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

你们每月应有生产总结，除向旅部作报告外，并应向我们作书面或日头的系统报告。我们最近设有财政经济部，有系统的来指导你们，要与它密切联系，对你们是很有帮助的。

纪律问题要严格遵守，办事人不准贪污腐化，不准在法律外去求赚钱。

你们建立的家务，虽然是你们经营的，同时也是国家经营的。我们是共产党，要时时刻刻想着为国家建立一个很大很好的家务，这样才能‘共产’啊！不要忘了整个人民的利益。只求自给自足，结果就会走到自私自利的道路上去，那是走不通的。望你们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发展生产事业，这才是正确的，才有前途，望你们正确地执行。

此信应在生产小组中讨论。

此致

布礼并祝你们胜利！

朱 德

六月二十日于延安” (19)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朱德当时对生产的领导是多么具体、细致。

除三五九旅各团外，朱德也经常到从事屯垦的其他部队视察。例如：对在陶宝峪从事开垦的军委炮兵团，他至少去过两次，给他们讲解屯垦的意义

和必要性，帮助他们解决缺乏生产工具等具体困难。(20)对参加南泥湾屯垦的陕北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他也同贺龙一起去视察过。看到他们种的糜子长得好，就称赞他们“不仅是一所培养干部的马背学校，也是开荒种地的好手。”(21)

在大生产运动中，朱德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个特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几位特务员年纪很轻，没有种过菜，朱德种菜却是个能手。他就手把手地教他们。为了积肥，他还带头拾粪。(22)朱德有着丰富的农业知识，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是很有名的。朱德的菜园经常有人前来参观。朱德同他们交流种菜经验，向大家推荐蔬菜的新品种，还常请人品尝，朱德的部下去看他时，他常留他们吃饭，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大家。他们种的菜吃不完，经常用来送人。

朱德带头种菜，在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大家认为他领导全军进行作战、生产与训练，工作十分繁忙，每天还要批阅文件、考虑问题、参加会议、接待来访者等等，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兼之他年近花甲“因此，部队中、机关中、老百姓中，集体地、个人的纷纷来信恳求替他代耕，以便他能为人民为革命保重身体，在生产的时间内稍为休息一下，但总司令总是婉言的谢绝，他说他的生产任务自己可以完成，生产虽然要花费劳动力，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这对整个革命，对他自己的身体都有好处。按照他的计划，生产任务的完成是完全有保证的。”“总司令在生产中的这种模范作用，感动了所有看见他生产的人，成了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家务的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鼓舞着大家去创造奇迹。”有些不积极生产，游手好闲的后进战士，也彼朱德的精神所感动而有了转变。(23)

516

南泥湾屯垦的第一年气候条件比较好，当年秋天就获得较好的收成，解决了边区部队相当一部分的日粮问题。朱德指出：一年多的生产运动取得很大的成绩，解决了经济上许多困难问题。十一月要大大的忙一个月，把粮食收起来。事前要准备好，直送到部队中去。他说：屯田的办法很有用，以后还要用这个办法，在边区的所有部队都要参加屯田。他举七一七、七一八两个团的例子说：七一八团在将下种时才去开荒，但是现在收割的粮食至少够半年吃。七一七团去得比较早一点，他们一年的收获就可以把家务建立起来，所以，无论怎么忙，都要抽一部分人来做这件工作。(24)

当经济情况初步好转后，有些人开始不冷静了，产生要建设重工业。大盐业、大军工等脱离边区实际的思想。十一月一日，朱德在边区工业局召开的厂长联席会议上指出：根据边区目前的环境和条件，想把手工业式的生产方式一下改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对的。边区工业建设的方向应该是根据边区的需要、边区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来决定，我们的任务是为解决边区物质困难和前方的需要多生产物品，而不是为了赚钱互相竞争。

这一年冬天，驻守内蒙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南下换防，有进犯边区三边地区的企图。朱德命令组成野战兵团，开赴三边，严阵以待。三五九旅中最早参加屯垦的七一七团也奉命参加。由于边区有了准备，何文鼎不敢冒然进犯。边境空气又缓和下来了。过年后，各部队重归原有防区，七一七团在返回南泥湾途经延安时，延安军民开了一个欢迎晚会。当时，太平洋战争刚爆发不久，朱德在晚会上讲话时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在打大仗，

目前第一个任务是打倒法西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一支坚强的队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决不落在人家后面。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充分的物资就不能取得胜利。你们去年在临镇生产，搞得不错，今后还要开荒种地，养猪、养牛、养羊，做到丰衣足食。(25)

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比一九四一年已好得多了。这年年初，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说：“此问财经问题，今年可解决，并在去年打下了基础。”“边区经济今年更有计划的组织了人民的、部队的及机关学校的劳动，大发动了生产运动可能向上发展，在不受灾的条件下勿须外援。”(26)这是边区军民一年多来辛勤劳动取得的丰硕果实。

为了促进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好转，三月二十二日，朱德在延安召开高级技术干部会议，讨论边区的经济建设和技术建设问题。会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七项建议，提出“设立全边区的生产建设企划委员会，以统一和统筹全边区的生产建设事业。”特别强调“精兵简政”问题；要求“裁汰各生产部门中的冗员，合并同类性质的工厂，力求合理的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使人尽其力，物尽其用。”(27)

在精兵简政工作中，朱德直接领导中央军委机关的整编。他把军委的许多下属单位，如总后勤部、直属队政治部、卫生部（包括所属和平医院、医科大学）以及经济建设部所属各单位，统统划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建制，同相应机构合并。军委直属机关从原来的七千人精简到二千人。下一年，又进行一次整编，取消了原来给团以上干部配备勤务员的制度，把勤务员改为公务员，编为青年队，直属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统一负责军委机关的勤务。

一九四二年夏天，南泥湾一带的庄稼长得很好，眼见丰收在望。当时延安有五位年岁最大的老同志，人称延安五老。除朱德外，其他四位是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和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以后，朱德邀请其他四老同游南泥湾。这时的南泥湾和一年半以前相比已全然改观。朱德兴致很高，赋诗一首：

纪念七七了，
诸老各相邀。
战局虽紧张，
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
共载有五老。
行行卅里铺，
炎热颇烦躁。
远望树森森，
清风生林表。
白浪满青山，
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
一览群山小。
丛林蔽天日，
人云多虎豹。
去年初到此，

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
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
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
水田载新稻。
屯田仅告成，
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
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
清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
养生亦养脑。
薰风拂面来，
有似江南好。
散步咏晚凉，
明月挂树杪。

这一年秋天，南泥湾获得丰收，边区其他地方的经济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家务大了，保管问题就突出出来。朱德对负责保管工作的干部说：现在与过去不同了，已经建立了许多家务，就是需要大家保管好的仓库、粮草等等。他勉励大家认真做好保管工作。(28)

十月十九日，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话时针对边区的实际情况指出：“现在我们党内对于生产运动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思想上应该转变到每个同志都要自己参加生产，帮助生产。”“所以明年特别要把各种各样的生产事业搞起来，用这个作主体，其他的事情才能办好一点。边区劳动力缺乏，过去我们组织生产运动，首先以军队着手，军队有五、六万人，大部分是有劳动力的，所以从军队着手。”他说：军队开工厂、办农场，直接参加生产，有没有成绩呢？成绩相当大，这叫屯田制度，古时候有过的。现在这种环境逼得我们搞屯田运动，并且已经发生了效力，今后还要搞下去。边区有的是土地，只要这样做，自己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讲了军队在南泥湾开荒取得的巨大成绩，讲了运盐来换外面东西的问题，他还讲了边区发动人民参加大生产运动，强调说：“这样子搞，问题就能解决，事情也好办了。我希望高干会要把这个东西抓住。”(29)

这次西北局高干会议，前后开了三个月。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德再次前去讲话，又讲到“南泥湾政策”。他说：“为什么搞南泥湾政策呢？就是因为经济困难了，[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发饷，军队没有饭吃，这样逼出来的。”他说，顽固分子封锁我们，同时，时时刻刻要打进来，边区不安全。边区养不起军队，而顽固分子就欺侮我们这一点。你愈没有军队，他愈要打进来。你有了军队，他又不来了，问题就解决了。靠了南泥湾政策，边区去年能够渡过去，今年更顺利，这是个战略问题。他还系统地谈了对边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商业、运输业等方面的问题。(30)

十二月十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一篇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

策”》的社论，其中谈到：

“朱总司令从前方回延后，竭力提倡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丰富的劳动，投入有用的活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朱总司令这种克服物质困难、支持长期抗战的远大打算，在三年以前，有些人曾是不了解的。为了实行这一正确主张，朱总司令不但苦口婆心，作了许多解释，并且亲自踏看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当时，南泥湾是空无人烟的地方，那里鸟兽纵横，蒿蓬塞路。当朱总司令去踏看的时候，晚上只能找到一个茅棚住宿。但是，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江南’。

于是，‘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

由于经济情况好转，这年年底，朱德、彭德怀下令改善前方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522_1.bmp}

广大指战员的生活，自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起，每人每天增发食油二钱，每月增发津贴费五角，每年发洗脸毛巾两条。(31)

陕甘宁边区在一九四二年渡过了难关，到一九四三年情况就更好了。六月二十八日，朱德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弼时，认为边区财经工作是目前最中心的工作，延安生产运动不能以丰衣足食为满足，不能不为将来的各方面设想，从十分发展的方向做去。(32)这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大会开幕式上，朱德号召大家努力生产，厉行节约，把发展生产和保卫边区结合起来。大会闭幕式上，他又指出，军队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开会期间，还举办边区生产展览会，会上展出了朱德亲手种出的一个大冬瓜，大家看后都很感动。有一个干部看后，当场写了一首诗：

工余种菜又栽花，
统帅勤劳天下夸；
愿把此风扬四海，
逢人先说大冬瓜。(33)

延安县劳动英雄杨步浩在会上听说朱总司令工作这么繁忙，还要每年生产三石细粮交给公家，表示愿为朱总司令代耕一石，使他有更多时间处理国家大事。第二年六月，他给朱德送来了为他代耕的一石新麦。朱德留杨步浩吃饭，并带他去参观自己经营的菜园。第二天杨步浩回去时，朱德又送给他一口袋自己种的西红柿。

在朱德的策划和带动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克服了困难，发展了生产，渡过了难关。它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胜利地渡过这段物质困难空前严重的时期，也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三十三、胜利前夕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整顿全党作风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走过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多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的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中共七大迁延多年未开，除战争环境的客观困难以外，党内对过去历史经验认识没有统一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九三八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出土地革命后期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个指示、事实上指明了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尖锐地批评那种“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的作风”，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还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件《六大以来》，供高级干部学习。这部书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正式出版。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主要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他说：主观主义的特征是“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应该“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并且指出“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是打击，但未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遗毒仍存在。”会议着重批判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上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会议的第二天，朱德发言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指出：过去上级党组织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要求打长沙、打袁州、打赣州、打黄歧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他特别提到，当时受中共中央完全信任、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完全不顾红军的传统和组织系统，独断地组织红军乱打乱仗，他不是以老部队为基础扩大红军，而是随便组织新部队，所谓扩大百万红军，这些新部队不能打仗，长征时，大多在路上散掉了。他批评：长征是一种搬家式的长征，事前一切准备工作都不通过我（朱德当时是中革军委主席）。长征前期，李德只是领着部队沿途逃跑，不敢同湖南军队打。他分析主观主义的原因是一些知识分子不懂实际情形，拿着马列主义当招牌，随便批评坚持正确主张的老干部。他强调，不切合实际的理论，便是不正确的理论。做什么事情总要从实际出发，就是战斗条令也要根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不顾实际是不能正确解决问题的。他还谈到一九三五年在川西北同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独断专行，硬说党委会委员要服从书记，也就是西北局委员要服从他张国焘。朱德针锋相对地提出，书记要服从委员会的决议，否则书记便要取消资格。他说，这是组织原则问题，他就

是用这个原则说服大家，同张国焘斗争。关于宗派主义问题，朱德指出，军队中宗派主义的表现主要是不敢用新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干部，不敢利用俘虏，不打破这种思想，不但部队难以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三三制等都无法实行。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中共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高级组的成员，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其中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之下，设立军事高级学习组，以朱德为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这以后，朱德一直领导着军事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后，全党整风的条件就渐次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八日，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标志着延安整风已由高级领导干部学习的准备时期转入普遍发动全党学习的阶段。全党整风从此开始。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开幕，朱德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发言内容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朱德也发了言。他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在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功绩，勉励大家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批评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有一位作家自视太高，瞧不起工农兵群众，宣称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个作家，而且还要做世界的第一个作家，针对这种思想，朱德指出：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要由工农兵批准才行！有的作家感到在延安怀才不遇，没有受到更大的重视，借用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两句后来发泄不满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意思是说在延安这个地方没有知人善任的韩荆州。朱德批评说，你到哪里去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韩荆州就在工农兵当中，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还有些作家不愿写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的作品，朱德说：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在这次文艺座谈会上还发生了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的争论。朱德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并且举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的，我只是为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还有些作家嫌延安的生活太苦，朱德针对他们的这种思想状况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延安的生活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里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朱德的这次讲话，在延安文艺工作者中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个座谈会在一个月內开了三次。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作了结论，成为长期来指引文艺工作者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重要文献。

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学习，并决定延长学习时间。各单位的整风学习热烈地开展起来，上级机关也加强对下级机关的检查和帮助。七月份，朱德率领检查组对留守兵团的工作作了

检查。他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对检查结果作了结论，肯定留守兵团在保卫边区、整训部队以及生产建设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对地方党和政府不注意团结和不够尊重，对军民关系注意不够；有些干部总想扩大队伍，打出去发展，把留守边区看成是暂时的，因此，对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指示压下不好好讨论；对生产建设工作不够积极。朱德分析他们思想上的毛病，指出：你们从主观出发，等到主观与客观有了矛盾，还硬要按主观行事，这就是主观主义思想方法在你们身上的表现。做事情要搞出成绩来，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要把握住正确的思想方法，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把一切私念去掉，真正为党、为阶级忠实工作。他还批评他们中有的人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指出：我们在工作中即使有所成就，那也是阶级的事业，不是个人的业绩。必须看得起群众的力量，看得起最笨的人。世界上的一切大事，常常是那些老老实实的人干出来的；要干成功点事业，也只有老老实实才行。

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朱德在各种会议上引导和启发广大干部、党员提高认识。他在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和有人争当领袖的问题。他说：要想作成几件事，只有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方法。他批评有些人刚念了几天书，背了几条原则，就自高自大，以为是万能，毫不虚心，这是不好的，结果一定是害自己、害别人、害革命。他指出，有些人脱离群众，只知道处处卖弄教条，搬运走不通的最高原则，那样是会把事情弄坏的。有些人，开口闭口社会主义原理原则，结果不少事情就是他们弄坏的；他们对世界各国的事都懂（自然也是皮毛的），就是眼前的实际实事他不懂。他还说：有的人时时刻刻想做领袖。领袖是群众封的，不是自己想于就能干的。

中共中央西北局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自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开幕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结束，开了将近三个月。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批评了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倾向，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前去讲话。

十二月四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过去犯的主要错误”，“就是‘左’的幼稚病，在中国很长一个时候犯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一次清算了一下，很好”，分清了路线是非，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错误的东西过去能统治得那样久呢？他指出：这是因为大多数同志学习马列主义不够，分不情真假马列主义。同时，中国又非常需要马列主义，因此，当错误路线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时，大家就相信了。所以，今后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使那些冒充的马列主义、假招牌的马列主义非收起来不可，没有办法作怪。他进一步指出，过去“左”倾机会主义是一种幼稚病，但又不简单是一个幼稚病的问题，还因为有些人为了争当领袖而要推翻已有的领袖，都想当中国的列宁。但是，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再争了，还是坦坦白白、诚诚恳恳地作一点工作，能作什么就作什么，叫作什么就作什么，这样，最后或许能成为一个领袖人物也很难说。

朱德在这次会上还谈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党也是一元化的，不过因为领袖犯错误，一元化就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现在路线正确了，以后我们党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一元化。他说：“服从组织有

两个方面，一个是机械的，一个是自觉的。”“如果自觉的话，对的要服从；不对的要讨论执行，再向上申诉抗议，提出问题来，但组织原则一定要服从，过去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的。”他还说：在我国，党是有威信的，军队也有威信，就是政府威信差一些，这与历史情况有关，在革命中先有党，然后党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搞暴动。暴动成功后，就组织军队，然后才搞政权。有很多地方是军队去了才组织政权的，因此，有人就有点看不起政权；但这是不正确的，军队以后一定要尊重政府。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朱德再次前去讲话。他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很好，特别是解决了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军队同志一定要下决心，因为对军队的同志不少人是惹不起的，军队的干部不应该单是一个指挥员，而且应该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要遵守纪律，听从党的指挥，服从政府的法令，倾听群众的呼声，向群众学习”

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把整风运动再延长一年；同时，提出审查干部、肃清内奸的问题，认为：“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开始时，审干肃反工作进行得还比较正常，但从七月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发动“抢救运动”后，情况就很不正常了。从国民党统治区或沦陷区来延安参加革命的人，很多被怀疑为“失足者”或“内奸分子”。

这时，朱德根据“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精神，领导着军委系统的整风审干工作。当“抢救运动”在延安各单位盛行，普遍发生乱批、乱斗、乱打人的情况时，他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严肃、认真、稳重、严格地掌握党的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好人。

当时，军委系统中有一些人看到其他单位搞得轰轰烈烈，也跃跃欲试。军委机关有一个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有一个高级参谋名叫白天，曾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参谋长，更是引人注目。有人怀疑他是混进来的军统特务，提出要批斗他。朱德派人了解白天的全部历史，认为这种怀疑没有根据，不同意进行批斗。他指示高参室的领导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党的政策，不能乱来。这时，几个高参精神上都感到压力很大，对写自传更是顾虑重重。朱德找他们谈心，勉励他们消除顾虑，实事求是地向党交心。受到一部分人严重怀疑的那个白天，不仅思想负担很重，而且也感到很委屈，写了三首诗贴在自己住的窑洞门口，表示自己投靠共产党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特务。朱德看后，和了他三首诗，表示欢迎他投身革命。白天看到朱德信任他，关怀他，原有的顾虑和委屈情绪就消除了大半，重新调动起工作积极性。别人看到朱总司令对白天采取这种态度，也不再提批斗的事了。

据有的老同志回忆，由于朱德的领导，在当时“抢救运动”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11)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表现在几个问题上，如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大堆统一(12)等等。只要谁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他就说你破坏统一战线，我有些不高兴。他不要政权，忽视八路军，忽视游击战争，对自己看不起，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

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相反，他对蒋介石看得起，把他看得又大又好，说成是“中国唯一”、“雄才大略”。对小党派他也看不起，这样就把统一战线统光了。在党内，王明目无中央，以代表国际来指挥中央自居，对书记处闹独立性，在党内关系上采取一打一拉的手法。“总之，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在群众工作方面则硬搬西欧的一套。朱德尖锐地指出：“我们的革命家务，他也没有出过力。搞掉革命的家务，当然不伤心。结果只有跑到大资产阶级营垒去，可惜蒋介石太蠢了，不要他！”

朱德还把抗战初期的王明同陈独秀相比较，指出：他们的相同点是：第一，不要领导权，不要武装，把革命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第二，看不见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大；第三，看不起游击战争；第四，就是怕统一战线破裂；第五，对资产阶级不要批评、不要斗争，只要团结。王明和陈独秀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有共产国际做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第二，新陈独秀主义是法西斯时代的产物，有法西斯的色彩。(13)

接着，中共中央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地深入研究了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此基础上，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进行了十一个月，深入地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分清是非，统一认识，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重要文件，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极重要的准备。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四项决议：（一）全会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五人为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和主席团主席；（二）全会的任务是准备七大及处理日常工作，全会期间，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工作（由主席团代行它们的职权）；（三）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四）七大议事日程。(14)

在整风运动进行的这个时期内，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法西斯德国在同盟国军队的强大反攻中节节败退，已陷入困境；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取得很大胜利，日军的败象已日益明显；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兵力严重不足，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后，力量更加壮大，普遍展开了攻势作战。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不远了。朱德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进行指导，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准备反攻。他说：仗打了七、八年了，世界上和我们一起打仗的同盟国越来越多。我们的部队很勇敢，再加上技术，就能天下无敌，要积极准备反攻，把八路军、新四军造成最模范的军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5）

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时也有所改善。当时担任中、印、缅战区参谋长和美军司令的约瑟夫·华伦·史迪威将军和在中国的谢伟思等一批正直的美国外交官，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满，认为中共是抗日的新的政治力量。为了在中国战场上对日军发动反攻，他们主张同中共领导的军队合作。

当时到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很多。一九四四年夏天，美军观察小组又来到延安进一步了解情况，沟通联系。这个观察小组曾派人到朱德领导的军委高参室和作战部帮助做技术工作。有一个美军中士描图员是大学生，天天前来帮助标图。在工作中，他了解到朱德的许多革命事迹，非常钦佩。当他将要离开延安时，提出希望能得到一张朱德的照片。军委机关工作人员向朱德

汇报后，朱德满足了他这个要求，还送给他一块当地自织的绒布，使这位中士非常高兴。(16)其他到延安采访或工作过的国际友人，对朱德也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英国记者根瑟·斯坦因写道：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兵士们敬爱那个六十岁(17)的老农民，象父亲一样。他宽阔的面孔焕发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热烈与乐观，他有力的握手唤起人们的信心。

我所发现的，随处都自发表现出来的士兵与人民的爱戴和信赖中，他同毛泽东实际上是同等的。

朱德和毛泽东一样，穿着没有徽章而对于各阶级都同样的军装，各处走着，不带卫兵或秘书。”(18)

爱泼斯坦谈到对朱德的印象时说：

“五十八岁的朱德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满头浓密的黑头发，面部宽阔，两眼炯炯有神。他身材健壮，步履稳健，他的直率使见到他的人一下想起了亚布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相反，他看上去象一位普通的父亲，在于完一天艰苦而又个人满意的工作之后，回到家中，解开钮扣斜靠在椅子上休息，谈起话来面带安详的微笑，充满成熟而又淳朴的智慧。这种智慧来自他长期熟悉的生活，并己与他自身融为一体。”(19)

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写道：

“我首次拜会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国西北的延安。作为共产主义军队的总司令，他在‘枣园’的生活是极之俭朴的。他当时约六十岁，就好象一位慈祥的祖父一样，他亲切的脸孔，时常挂着笑容，使最怀批评性的访客也会消除敌意和顾虑。

在那个年代里，他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发言人，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外交官和几乎所有到延安去的人，而且都是持之以同等的幽默感和耐性。当他笑的时候、向朋友递香烟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礼貌，都使人感到一阵阵温暖，冒出很强的感染力。”(20)

以上几个外国人对朱德的印象很相似，反映了朱德的特点。可是，不久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矛盾尖锐起来。在蒋介石的坚持下，美国政府宣布召回史迪威，改派赫尔利为美国总统特使前来中国，并且很快就全力支持蒋介石。随后，美国驻延安的观察小组成员谢伟恩等也被召回国。史迪威在离开中国前，给朱德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朱德将军：

由于我已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我谨向您致意。

真挚的 J·w·史迪威美国将军”

这封信的原件已经遗失，但它的留底仍保存在美国陆军部档案中。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史迪威病逝。十四日，朱德致电史迪威夫人吊唁，电文说：“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但使美国丧失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21)

当历史进入一九四五年时，抗战胜利已经在望，这时，延安正在准备召

开七大，在这里集中了大批干部。朱德向中央提议：七大要早开，开了，人好出去工作。各地的历史问题讨论可以先搞个草案，交七大参考，有些争论也容易解决。总之要早点出去，要赶上苏联参战，要有精神准备。对蒋介石谈判也要有精神准备。(22)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推迟多次举行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开幕。朱德在开幕典礼上讲话。他说：二十五年来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大众的党，受到中国人民爱护的党。我们党一开始就作武装斗争，一直没有离开过武装斗争，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特点。因此，尽管中国的封建势力要杀我们，外国的帝国主义同样要杀我们。很多时间敌人宣布我们的党已经没有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在我们党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锻炼了我们的同志，同时在这个斗争中间创造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指出：在今后的斗争中仍有许多障碍，要打破这些障碍，就要靠我们武装同志及全体同志的工作。他说：毛主席那一天讲过，我们不想等到儿子一代才取得胜利，我们这一代人就要取得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朱德的讲话博得全场代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四月二十五日，朱德向大会作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这个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解放区的战争是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是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并从建军原则、兵役制度、养兵、带兵、练兵、用兵、政治工作、军队指挥等方面，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解放区军队今后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23)

在中共七大举行的日子里，德国法西斯在五月八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十一日，朱德和林伯渠等欢宴苏、美、英等国盟友，庆祝同盟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在席间，朱德致词说：欧洲战场的胜利不仅是苏、美、英三盟国的胜利，也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民主的胜利。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在东方只剩下一个法西斯日本，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配合同盟国击败日军。(24)

五月三十日，朱德在七大上作关于军事问题讨论的结论，对代表们在讨论军事报告时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百团大战，反攻的军事转变，对敌、伪、友、顽军队工作以及军事干部等问题，作了解答。他强调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人民需要武装斗争，中国农民多，武装就是农民武装，武装在农民里面才能产生出来，这就叫土地革命。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也可以说大部分是毛主席的思想产生出来的。”他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对这个军队的重要性。朱德说：这个军队同以往军队的不同在于它“来自人民，取自人民，依靠人民打仗。”因为这些，也就发生了战略战术的不同。他认为，毛主席的这种军事思想，经过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两个阶段，现在已经是成熟了。(25)六月九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闭幕。朱德在闭幕式上讲话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指出，“我们以后的问题，就是团结全党争取胜利。”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胜利是可以得到的，”“只要我们的党团结一致，争取广大群众，一定会胜利的。”他还说到：这一次选举，军队里的负责同志当选的相当多，所以，有些同志担心将来会不会以军治党？这个事情，请同志们放心。因为我们党不是才发展起来的，又经过了整风，又有毛主席的路线，是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的。抗战八年来，我们军队是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的。另外，我们军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无条件去服从党。我初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就宣誓服从党。因为我是军人，应无条件的服从党，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这些军事干部都是党培养成的，我们每一个军事干部都一定要服从党。“我们的军事干部离开了党，那他就一样也做不成，一样也做不了，一切问题要靠党。”(26)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由这五人组成的核心，领导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

中共七大闭幕后不久，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兴奋地看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十四、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喜讯传来，革命圣地延安一片欢腾，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蒋介石立刻把注意力转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对付其他民主势力方面来。朱德一面同延安军民一起共享胜利的欢乐，一面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国内外的政治动向。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使华北、华中日伪军的大部分处在它的四面包围之中。因此，当日本外务省在八月十日通过中立国向中、苏、美、英四国政府表示要求投降时起，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在两天内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包围日伪军的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行动，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到抗拒，应坚决消灭之；命令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所部、张学思所部、万毅所部及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向东北进发。但是，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却在八月十一日连下三道命令，一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逼进。国民党发言人把朱德发布的命令称为“唐突和非法的行动”；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应钦、冷欣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约定，趁日军尚未遣散之际利用日军参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内战危险十分严重。

面对着严峻的内战危险，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针对蒋介石不许解放区军队要求日军投降的命令，朱德、彭德怀以延安总部正、副总司令名义在八月十三日致电蒋介石，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八月十六日，朱德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提出六项制止内战的主张并要求蒋介石公开收回他在十一日的错误命令。电报说：

“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千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我们至今犹打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电报强调：“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制止内战的办法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

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

针对蒋、日、伪的暗中合流，朱德在八月十五日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同日，朱德还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说帖，阐述了中国解放区、沦陷区抗日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八年抗战的实绩，揭露国民党政府“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请三国政府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并向三国政府提出下列声明和要求：

“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已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

蒋介石对朱德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但他的精锐部队在抗战期间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一时来不及调运足够的兵力到北方，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因而只好作出和平谈判的姿态。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这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建议毛泽东去重庆同蒋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枣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尽管蒋介石主张和平谈判只是一种姿态，但中国共产党还是力争能借此实现国内和平，从事国家建设。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指出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要学会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工作。还要把准备打仗作为重要的任务。

会议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确

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依靠人民力量，同蒋介石的反动方针作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以和平途径实现一定的政治改革，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决定朱德继续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兼任副主任。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

力争实现和平民主，又准备在不得已时进行自卫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订的明确方针。

战争与和平，风云变幻莫测。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共中央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为了表明自己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二十五日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代表，一起前往重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作了应付局势万一恶化的准备。

同一天，一架绿色的DC型美国运输机从延安东关机场起飞，飞机上坐满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共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滕代远、宋时轮、杨得志等二十多人，他们将分赴各解放区战场，准备在遭受对方武装进攻时以军事斗争来保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

行前，中央领导人分别同他们进行谈话。杨得志回忆说，他是由朱德向他交待任务的，当时他正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教导一旅旅长，朱德通知他：“中央决定你离开陕北，回冀鲁豫去。”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地区统归刘邓指挥。

杨得志问：“什么时候走？”

朱德说：“尽快，要尽快。你先走，部队由其他同志带着随后。怎么样，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杨答：“有的，不过没想到这么快。”

朱德说：“是呀，毛主席在七大闭幕时讲过，把中国引向黑暗还是把中国引向光明在互相斗争着。这个斗争今天更现实更尖锐了。日本人愿意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愿意向我们投降的！蒋介石已经行动了，杀气腾腾。他是决心要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的，我们当然不答应。所以，你们的任务很急。冀鲁豫的地理位置你是知道的，很重要呀！”

八月二十八日，朱德送毛泽东、周恩来等前往重庆谈判。当天下午。朱德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将要出发去东北工作的干部作报告，谈了他对形势的看法：整个世界要和平，中国人民也要和平，国民党虽然不要和平，要消灭我们，但事实上行不通。这次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安全回来的可能性大。谈判会有结果，但不会那么顺利，我们是要民主、团结、和平，建设新中国。如果他要打，那就消灭他一部分，再来谈和平，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准备好，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不致被人家抢去。

朱德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象日本占领东北那样。打日本我们有办法，对他我们就没有办法吗？不怕！朱德还讲到，有些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有些灰心。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现在失望了，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但是要知道虽然有个条约，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

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东北工业发达，又挨着苏联，不受夹击，就是打退却，也应该向东北退，退华北还不够。现在要派五万队伍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是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是争取三千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到东北去是做事，不是去做官。蒋介石派人是去做官的，国民党在那里没有底子。东北必须是民主的东北，我们大有希望。”

朱德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可以说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重大战略方针的雏型。

九月十四日，从冀热辽边区率部向东北挺进，担任了沈阳市卫戍司令的曾克林，陪同苏军在东北的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乘苏联军用飞机飞抵延安，苏军代表向朱德转达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热河省平泉县（今属河北省）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行撤退，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

朱德表示，热河、辽宁各一部，在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朱德还与苏军代表达成协议，即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伪“满洲国”曾设“锦州省”，辖辽西十四个县）、热河两省完全交给八路军接管。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曾克林汇报东北工作。朱德向曾克林再三叮嘱：“东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的压迫，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党和人民的军队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入人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朱德在这次会上发言说：“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四十万至六十万军队。”（11）

三天后，刘少奇、朱德致电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力争东北，控制热察，除派部队去东北外，必须立即调十万到十五万部队到冀东、热河一带，江南新四军主力须转移到江北，调到冀东，或到山东由山东调出部队去冀东、热河。

在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同意后，中共中央电示各中央局：“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12）同一天，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蒋介石对我们的办法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暂时避免打，他们设法把各地联系起来，甚至与日本人合伙起来打我们。三个月打不起来，要打至少得六个月，我们要争取主动，争取时间”；“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失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苏北、皖中、长江流域，准备做交换条件，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13）

向北发展，关键就在争夺东北。由于贯彻实施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进入东北的人民军队已达十一万人，

从延安和各战略区抽调的党政干部已有两万人到达东北。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政委，统一指挥进入东北的部队。地方民主联合政府纷纷建立。到今年年底，东北人民军队总兵力发展到二十八万多人。

在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朱德和刘少奇在延安做的另一项重大工作，就是在自卫原则下指挥必要的军事斗争来配合重庆谈判桌上的斗争。蒋介石虽然打出“和谈”的招牌，但一点也没有放松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对这一点，中共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决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对将领们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14)朱德坚决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指导思想。八月三十日，他和刘少奇、任弼时打电报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说明毛泽东赴渝谈判是必要的，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蒋介石不敢不保障毛泽东的安全，“目前在前线上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15)

当时，国民党当局加紧调兵遣将向解放区进攻，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多月内，调集了三十七个军七十三个师的兵力，其中大部分用于向华北解放区进犯，企图控制整个华北，分割、压缩各解放区，并打开它进军东北的通道。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刘少奇、朱德的主持下，密切注视对方的动向，指示各解放区对从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铁路干线推进的国民党军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阻滞，在各铁路沿线开展交通破击战，集中力量组织几个战役。

在这些战役中，最主要的是上党战役。上党，是晋东南长治一带的古称，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日本投降后，阎锡山立刻派五个师一万七千余人袭占了这一地区，企图控制整个晋东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指示晋冀鲁豫军区要把侵占上党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除掉。八月二十五日刘伯承、邓小平从延安返回晋东南后，立刻着手准备上党战役。中央军委在八月二十八日复电刘邓，同意他们“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消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的部署。三十一日再电指示：“阎部一万六千兵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唯诸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个城，各个击破，不宜同时攻击。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究竟如何打法，请你们详加考虑，我们意见仅供参考。”(16)

上党战役从九月十日开始，到十九日，相继解放长治外围各城，形成对长治的三面合围，以围城打援的方法，先在屯留西北地区歼灭从太原出动的援军，再歼由长治向西突围的阎部，在十月十二日获得全胜，共歼阎锡山部十三个师三万五千多人。上党大捷，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对重庆谈判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就在上党战役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共双方在十月十日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

在这前后，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朱德和中央军委又指挥华北解放军进行了平汉（邯郸）战役、平绥战役、承德保卫战、津浦路徐济段的自卫作战，相继取得一系列胜利。在平汉战役期间，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所部一万余人于十月三十日在马头镇

战地起义。十一月二日，朱德和毛泽东致电高树勋，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17)

蒋介石集团向中国人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蒋介石依靠美国的援助，将他的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军队空运、海运到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地区，抢占战略要点和铁路交通线。美国海军陆战队从九月底起，先后在天津、烟台、青岛、秦皇岛等地登陆，协同国民党军队侵占冀东等解放区的许多重要城镇。

面对美军的这种行径，朱德采取严正立场，同他们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九月二十六日，朱德以总司令名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通过延安美军观察组伊万·叶敦上校向美军总部声明：山东省烟台市、威海卫市和河北省秦皇岛市都已在第十八集团军的控制之下，附近并无日军，“如果美军事前未经与十八集团军总部作任何协商和决定，突然在上述地点登陆，将引起中外人士怀疑美军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朱总司令希望美军不要在上述地点登陆。”(18)但美军无视这一警告。十月初，美国军舰出现在烟台海面上，先是声称不准备在烟台登陆，只要求允许它的士兵在崆峒岛休息，接着，又“要求十八集团军部队及烟台市政府负责有序地将烟台市移交美方接管。”(19)朱德接到这一事态的报告后，十分诧异，十月六日，命令叶剑英致函美军观察组，向美军郑重声明：

“一、烟台市早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为本军部队收复，烟台市之日伪军队，早经完全解除武装，市区秩序早复常态，今美军突然要求在该处登陆，我方认为毫无必要。至要求本军部队与当地政府撤离该市，尤属无法理解，因此，请美军总部报贵方有关司令部转烟台海面美海军陆战队勿在烟台登陆。二、美军如未经与本军商妥，竟然实行在该地强行登陆，因而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应由美军方面负其全责。”(20)

十一月四日，朱德就美军在十月十八日搜查冀中军区驻天津办事处以及美机于十月二十一日在河北省固安县、安次县上空寻衅等事，致函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提出抗议，要求美军今后不再发生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及参加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解放区的行为。

二十八日，朱德接见美国《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美联社、法国通讯社记者，发表声明，阐述中国共产党对美军在华行为的态度。声明说：

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承认美国在中国近代化、民主化事业上的重要性，并努力促进中美两大民族的互不可少

的合作。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在抗战中与抗战后，都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与美国军民相处的。但是，中国的反民主分子竭力煽动美国在中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为他们“火中取栗”。不幸美国政府官员与海陆军官中，已有一部分人听信他们的见解，他们想从不公平的干涉中寻找中国的友谊与美国的威信，从参加中国的大规模的因此必然是长期的内战中，寻找中国的统一安定与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和生命财产的安全。事实上这样作法不仅伤害了中美的传统的友谊，而且损害了美国人民与世界和平的利益。国民党当局不经过与中共正式协定而经过美军援助，硬把他们的军队开进由八路军和人民创建的冀热辽解放区，这就是今天北宁路上发生内战的原因。倘使这一情形继续下去，我们的抵抗亦将被迫继续下去。解决这些纷争的根本原则是彻底实现国民党与中共的协议，并由此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在

此之前，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应该得到合法地位。(21)

解放区军民经过四个月的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在上党、平汉、津浦、绥远各线的进攻，共歼敌十一万人。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掀起了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蒋介石在初战失利，大打又未准备好，国内外和平民主力量对他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在十二月表示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使战争在全国范围内（除东北外）停止了一个时期，同月十日起，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达成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这两件事，给渴望和平民主的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朱德衷心希望这些协议能得到完满的实现，但他对蒋介石扩大内战仍保持着警惕。二月三日，延安各界两万余人举行庆祝和平、民主大会，朱德在会上发表演说，称赞政协会议的成功，表示要努力使政协决议彻底实现，同时指出：无论什么好决议，既不会自己产生，更不会自己执行，世界上有援助中国和平民主的人们，还有阴谋破坏中国和平民主和政协决议的人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一切拥护和平民主的人们亲密团结，长期合作，保证国家的民主化。(22)

按照政协协议确定的整军原则，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经过多次协商，在二月底达成军队整编方案。三月四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延安，朱德和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当晚，朱德在欢迎晚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表示中共抱有全部热忱实现中国的统一、民主与和平建设，中共对于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一定切实执行。不可否认，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建设事业还有许多障碍、许多困难，整军方案的实现更不容易一帆风顺，我们对于中国的前途是乐观的，中国一定能够建设成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23)朱德的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力求排除障碍，严格履行政协协议、争取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

但是，蒋介石对履行政协协议并无诚意，而是在“和平”的掩护下，继续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三月十三日，国民党军队在苏军北撤后开进沈阳，立刻向周围扩展，对中共领导的军队展开猛烈进攻。在关内，他们部署对中原军区李先念部发动“围剿”。

朱德对这种严峻的局势，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朱德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没有一点缩编队伍的样子。东北他们一定要打，我们也就打。打就能生存。武器他们比我们好，士气我们比他们强。国民党现在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方，中原五师方面对我们形势不利。”(24)四月初，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的反动派还是不愿意中国人民享受民主。他们正在寻找各种名义来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来继续保持独裁，来继续进攻已经得到民主权利的人民，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25)

到五月间，国内局势日益恶化，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朱德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感慨地指出：“我们中国的问题，麻烦得很。在这半年来，要和平，要和平，事实上不和平，打得不得下台。”“因为反动派不要我们这样的和平，他们要他们的独裁制。所以蒋介石讲好了又翻了；讲好了又翻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他不翻，他就独裁不成了。”如果大打

起来，局势会怎样发展呢？朱德详细地分析了各解放区的现状，特别是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满怀信心地说：“蒋介石要把我们搞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比以前的把握多得多。”“他们是给我们送枪的人。”“虽然国民党有坦克，我们现在不怕，可以把他的坦克打破的。”(26)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自以为内战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由于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区各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凭借美国的援助和他们在装备上、数量上的优势，抢占了一些战略要点，侵占了解放区的一些重要城市。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进攻，朱德多次发表谈话，分析国民党军队必败、人民解放军必胜的基本因素，鼓舞人们的斗志，坚定人们的信心。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是极端不得人心的，也引起国民党军队内一些爱国将士的强烈不满。朱德对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极力重视。当时，国民党开入东北的几个军中，有两个军是云南部队。朱德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威望和同国民党某些高级将领的关系，积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早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他就从延安中央党校选调云南籍干部刘浩等前往东北，待机策动滇军起义。他对刘浩说：“在东北我们要着重做好滇军的工作，因为滇军受歧视，同蒋介石的中央有矛盾：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有不满情绪，有些军官受当年护国讨袁影响还有爱国思想，他们迟早会看到，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没有前途的。”(27)五月，国民党军队第一八四师（滇军）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在辽宁海城起义，朱德驰电祝贺。以后解放长春时，在争取国民党第六十军（滇军）军长曾泽生部起义的工作中，潘朔端、刘浩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六月底，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等驾飞机抵达延安。朱德在欢迎会上说：“我们始终坚持和平，但我们并不怕国民党内好战分子所燃烧起来的这股凶焰，我们有力量扑灭它！”七月二十六日，延安各界群众举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号召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军官和战士，学习高树勋、潘朔端、刘善本等，退出内战。为人民服务；号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要敢于进犯解放区的反动派以坚强的反击，拼死保卫解放区；号召国民党统治区一切民主人士要坚决勇敢地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八月下旬，全面内战已经进行了两个月了。朱德在杨家岭向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作时事报告，他首先分析了蒋介石为什么要发动内战：“如果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同赶快恢复经济，当然可以不打。他那里搞的不好，我们这里搞的很好。他不打我们，把他那里搞好，就好了。这样中国岂不是就和平民主、经济恢复了吗？他那里不好，你这里好也不行，要把你这好的地方打烂才甘心。这样能够得到和平民主、经济恢复吗？当然不能够，所以就打起来了。”

朱德在向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作的这个报告中指出：我们确实要和平，但前一段同国民党和谈时，我们并没有上当。他们要打，我们也有准备，打了几个胜仗，没有吃亏，现在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万。中原我军已经胜利突围。粟裕指挥的部队在苏中连战皆捷。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向陇海路出击。“蒋介石想打通铁路线，集中兵力打我们，但是行不通，

而我们却把兵力集中起来了。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我们就全面抵抗。”

朱德接着分析道：从力量对比来看，“蒋介石政治上的优势是失掉了，他要独裁，要卖国，要掀起内战，这是他不利的地方。我们要和平，要民主，要独立，这是我们有利的地方。在军事上说，他有飞机大炮坦克，我们有群众，我们也可以比得过他，在经济上说，他大后方的一切生产都很困难。我们的生产运动都发展起来了。我们是自己动手，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同他打。没有子弹也可以从他手上拿。”“蒋介石全面进攻他还有弱点，兵力不够，运输经济都来不及。”他断言：“开始时有些人害怕我们打不赢，现在打了几仗，证明美蒋并不那么可怕，我们有条件有力量打赢他。”(28)

也在这个月，朱德对美国记者阿·蒂·斯蒂尔发表谈话说：“共产党不要战争。和平可以使我们把解放区建设的更好，并在全国推行民主化与工业化，这个利益对共产党人是显然的。”“人民都知道，此次内战是美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搞起来的，如果这些反动派的计划成功，就是中华民族的灭亡，所以全体中国人民热烈支持我们。”“城市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但人民的愿望与军队的有生力量有绝对的重要性”，“依靠人民是最重要的。”(29)

九月三日，朱德在一次会议上讲话，又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战争最重要的特点是人民战争。他说：“我们靠什么呢？我们靠老百姓。”他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形势，以苏中七战七捷为例说：“七战七捷都靠老百姓。敌人进入了我们的区域，瞎子摸鱼，东西看不见，我们明明白白，要打他那里就打他那里，结果很快缴了械。这个缴械并不是偶然的。”他说明：解放军的作战不是只顾一些城市，守不住的时候可以让他拿去，把他们的军队消灭后又拿回来。他引用毛泽东指出战争要打五年，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一切问题是准备长期战争。”(30)

十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月总结》，朱德发言说：“下棋要下活，作战也是一样，也要打得灵活。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需要放弃一些城市，放下一些包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用俘虏补充我们的队伍是个好办法”；还提出在冬季要普遍开展练兵运动。(31)

从未德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三个多月，中国共产党不仅对战胜蒋介石早已有着充分的信心，而且由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对应该怎样战胜蒋介石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三十五、人民的光荣

一九四六年秋冬之交，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解放区的自卫作战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力量上处于劣势，却在七月到十一月间消灭了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三十九个旅，约占它的总数的五分之一；但蒋介石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以为可以凭借他们军事上的优势，实行速战速决。他不顾中国共产党一再发出的警告，在十月十一日强行侵占华北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当天下午，便撕毁政治协商会议上达成的有关协议，单方面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十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结束同国民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国民党军队积极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延安正处于紧张的备战气氛中。

这年十二月一日，是朱德六十寿辰。人们在这个严峻的历史时刻为自己的总司令祝寿，有着一种特殊的心情，自然地把朱德的名字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形成热烈、真挚的感人情景。

祝寿前夕，《解放日报》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中共中央祝贺朱德六十寿辰的祝词和《朱德将军年谱 1886—1946》，从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天。党、政、军、农、工、商、学各界，纷纷举行庆祝活动。有的献上刚从前线缴获的胜利品，有的献上自己亲手种植的丰收果实。

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都为朱德的六十寿辰题词、撰文、致电，表示祝贺。毛泽东的题词是“朱德同志六十大寿 人民的光荣”。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中共中央的祝词说：

“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固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名利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你的六十大寿是中国共产党的佳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佳节，是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佳节。今天反动派还在进攻，”“你的寿辰正是战斗的号召，胜利的号召！全解放区军民，一定要用胜利的自卫战打退和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作为替你祝寿的纪念品！”

周恩来的祝词说：

“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二。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全党中，你首先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十一月三十日，是祝寿活动的高潮。《解放日报》以整整两版的篇幅，刊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题词，刊登各中央局的贺电，刊登彭德怀、

林伯渠、陆定一、习仲勋等的祝寿文章，刊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的题词：“为亿万人民寿”。寿堂设在中央大礼堂大厅内。寿堂正中墙壁上是毛泽东的题词和中共中央的贺幢：“万年长青”，周围墙壁挂满了各方送来的贺词贺联。下午一时，朱德穿着灰布军装，身披斗篷，乘吉普车来到寿堂，接待络绎不绝的各界祝寿代表。他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不必祝贺我，我要祝贺你们，祝贺党，祝贺人民。”当时正在延安的一些外宾，如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苏联医生米尼柯夫斯基等也来祝寿。

这天晚上，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祝寿晚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首先致词，接着刘少奇上台讲话。他称赞“朱总司令六十年来为中国人民所作的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结晶，给予党和人民极大的光荣。”周恩来在晚会上宣读了他的祝词，他那热情洋溢、铿锵有力的声音，激起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最后由朱德致答词，他首先感谢各界代表对他的祝贺，接着他深沉坚定地说：

“中国人民很早就于革命，前仆后继，但屡次遇见革命伙伴，就往往不大靠得住。那些伪装革命而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人，在获得革命果实后却反转来镇压革命，致革命屡次失败，人民屡次上当。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有农民的儿子都是要革命的，那时不成功是模不到路，后来找到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反动派一定失败，中国人民一定胜利，我相信我可以亲眼看到中国革命获得成功。”

同延安的热烈气氛一样，各解放区军民也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朱德六十大寿的祝贺。哈尔滨市各界代表五万余人集会庆祝，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致祝词。晋绥解放区各界代表五千余人集会庆祝，贺龙司令员致祝词，参议会副议长、民主人士刘少白讲话，称赞朱德“有如冬日之可爱”，晋察冀军区、华中军区也都集会庆祝，聂荣臻、粟裕分别致祝词。冀鲁豫军区在集会祝寿的同时，还在十一月三十日举办了一个缴获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展览会，陈列出战利品六百二十九门大炮，十八辆坦克，作为向朱德祝寿的礼物。在解放区内，真可说是“普天同庆”。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纷纷庆贺朱德的六十寿辰。董必武从南京寄来两首祝寿诗：

其一

虎略龙韬尽革新，
平生戎马为人民。
河山破碎劳收拾，
田土纠纷要试均。
欲挽狂澜于既倒，
不随流俗与同沦。
存雄是谓能行健，
合有春秋似大椿。

其二

革命将军老据鞍，
豺狼当道敢偷安。
骨头生若铁股硬，
胸次真如海洋宽。
要作主人不作客，

甘为民仆耻为官。
乌延黎庶欣公健，
此日江南一例欢。
朱德读诗后，依原韵和诗二首：

其一
大好河山应革新，
推翻封建属人民。
乾坤锦绣欣同有，
肥沃原田思不均。
六十于今多扰攘，
期年以内望清沦。
平分广土归耕者，
裁遍神州满地椿。

其二
历年征战未离鞍，
赢得边区老少安。
耕者有田风俗美，
人民专政天地宽。
实行民主真行宪，
只见公仆不见官。
陕北齐声歌解放，
丰衣足食万家欢。

董必武诗中所说的“此日江南一例欢”，真切地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许多进步人士的心情。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上海，文化界、新闻界的很多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与迫害，出席了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为朱德祝寿而举行的座谈会，并在一块红缎上签名留念。

为朱德六十诞辰祝寿，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而举行的一次动员。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位著名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正在伏案撰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用笔倾注她对中国革命、对朱德的敬爱之情。

史沫特莱曾经在一九三七年初到延安。在那次采访中，她打定主意写一本朱德的传记。她对朱德说：“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中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他说；

‘等一等，你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再作决定吧！’”

后来史沫特莱因病回到美国，但一直关切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渴望重回中国”，“希望恢复自一九三七年中断的与朱德的谈话”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莱说：

“我们音信断绝已经多年，现在终于有可能建立联系了。

这种可能是由于美军观察组的到达才出现的。”又说：“此刻，我们特

别怀念那些最早给我们以援助并在敌后为我们的军队和人民作出牺牲的美国人。在他们当中，我们经常谈到你。”

“我切盼在可能的情况下，你能重来中国住一段时间，以便了解我们的人民和军队在你离华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许多变化。”

信的最后说：虽然胜利在望，但是中国的反动势力仍在负隅顽抗，有时甚至比过去更力顽固，更为残暴。“他们的政策不但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的灾难，而且最终将造成他们自身的毁灭。而这里，正象世界各地一样，潮流是正朝着人民胜利的方向前进。”一九四五年底，朱德接到史沫特莱托董必武带回的来信后，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又复信史沫特莱，说：

“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虽然遭到了中国反动派（在美国反动派的怂恿和合作下）的破坏，然而我和所有的同志都坚信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反动派的阴谋，虽然在表面上可能得逞于一时一地，但终将为中国人民的浩浩荡荡的大军所击败。”“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地坚持着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答应所求。”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也就是朱德六十寿辰到来的时候，史沫特莱又写信给朱德：

“我的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

我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由于内战，您和您的全体同志都蒙受了极大的痛苦。我了解，我国应对这种痛苦负责。看来，表示伤心毫无用处，然而我必须这样做。我不得不向您倾吐我沮丧的心情。

你今年七月的来信我最近才收到，您嘱我相信中国人民，您还指出您也相信美国人民。我已从您的来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贺年片上，寄发给所有为中国的胜利出过力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尽最大努力为中国工作，但是日前在美国进行这一工作是很艰苦的。”(11)

从朱德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往来函电中，可以看出，朱德和他所献身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已赢得世界上许多主持正义人们的尊敬、理解和支持。朱德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尽管朱德得到人们由衷的敬爱，但他总是那样谦逊。他说过：“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生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12)这样的话，他讲过多次。

朱德刚刚度过六十寿辰，蒋介石、胡宗南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步伐更加紧了。十二月十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号召边区军民：“从备战动员转入战斗动员，坚决粉碎蒋胡军的进犯。”一九四七年元旦，朱德发表广播词，指出：“今年的一年，将是中国人民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他提出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头一条就是：停止反动派的进攻，收复失地(13)。

二月一日，朱德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朱德在会上发言说：现在到了快打出去的时候了，准备工作要做好，革命高潮的基础仍然是土地革命。土地问题解决得愈彻底，我们胜利的把握愈大，内无后顾之忧，外有发展之途。去年最大的成绩是土地改革，否则战争的进行没有那么顺利。东北能够站稳脚跟，也是靠土改。我们打这

么大的仗，部队有饭吃，就得靠土改。上改要一村一村地搞。你来打，我就打运动战；你不来，我就搞土改。部队打出去以后，除了打仗就要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4)。

正象朱德预料的那样，国民党军队由于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受挫，到一九四七年初不得不转为重点进攻，将进攻矛头集中指向山东和陕北。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进犯陕北，企图以攻占延安，打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并消灭西北解放军来鼓舞沮丧的士气。三月，胡宗南等部以二十五万兵力向陕北解放区大举进犯。三月八日，延安各界召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战斗动员大会，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等出席大会并讲话。朱德说：

“我们今天开动员大会，为什么动员呢？国民党蒋介石已把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和平谈判的使节送回来了”。（指蒋介石要京、沪、渝卫戍警备机关限令留在上述三地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在三月五日前全部撤回）“蒋介石已经关死了和平的大门，要坚决打内战下去，我们当然也只有打下去。”“胡宗南进犯延安，大家要动员起来，打垮他的进攻。打胜仗不是容易的事情，大家一条心，真正不怕死，就能打胜仗。”“民兵的战法是一方面要打仗，消灭敌人，另一方面要坚壁清野，到处埋地雷，使敌人进来，一点东西找不到，只剩下空窑洞，他将进退不得”，“敌人就愈多愈会感到进退两难，困也困个半死，大军一到就更容易消灭它。”“正规军有民兵，就会打得更好；民兵有了正规军，也就愈打胆越大。这次我们决心要打胜仗，要在边区里面消灭胡宗南。”(15)

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二万六千兵力，将胡宗南部的绝大多数吸引在陕甘宁边区给以打击。这一天，朱德和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撤出延安，向瓦窑堡、清涧一带转移。二十日，在子长县王家沟同于十八日晚和毛泽东一起撤离延安的周恩来会合。

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第七天，西北野战兵团取得了青化砭战役歼敌三千人的胜利。朱德得知这一捷报，兴奋地来到子长县好平沟的一座小庙看望从延安迁来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叮嘱播音员，查清战果后就要把青化砭大捷的消息播向全国。

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于长县任家山，同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会合。三天后，又转移到清涧县枣林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开会，讨论中共机关是否留在陕北和领导人谁留下来的问题。中央书记处的几位书记都表示愿意留在陕北。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

三十一日，朱德和刘少奇从陕北绥德县石嘴驿出发，东渡黄河。行前，朱德召集中央警卫团连以上干部开会，叮嘱说：“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可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是无法补偿的。”他指示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战士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他还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望远镜拿来，亲手送给骑兵连长，说：“你们担负着武装侦察的任务，是中央的耳目，拿着它去发挥作用吧。”(16)

三十六、在战略进攻中开创新局面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晚，朱德一行东渡黄河。四月二日，到达中共后方委员会所在地山西省临县三交镇。

随后，他们途经兴县、静乐、宁武、崞县（今原平县），了解晋绥地区土地问题等情况。二十四日，朱德、刘少奇给中央写报告，指出在这个地区存在的问题：负担过重，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破坏其再生产；一切为了保障公家收入的错误财政经济政策；一九四三年以来的群众运动在许多地区是破坏性的，吃大户运动给生产以很大的破坏；许多地区违反自愿原则的大变工组织，上万人变工开荒，及数百人一股变工种地，妨害农民生产等。并说明：晋绥分局已将上述各项运动停止，采取措施帮助农民恢复生产，还准备减轻负担，精兵简政，以便使群众透过气来。中共中央随即将这个报告转送给西北局。

朱德一行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在四月二十六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朱德离开延安后的一个月里，西北野战兵团又相继取得羊马河、蟠龙镇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豫北发动反攻，该军区所属的大岳纵队在晋南发动反攻。晋察冀军区主力在正太路也展开反攻。国民党军队虽然暂时占领了延安，但它的重点进攻战略已被打破，开始陷入被动。朱德把这种形势概括为：“解放区天天打胜仗，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就是新高潮的前夜。”

他们到达阜平的时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正在前线指挥正大战役。五月初，正太战役胜利结束，朱德、刘少奇同军区领导人聂荣臻等共同研究晋察冀解放区的土改和军事工作，确定了进一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的部署。

朱德充分肯定了晋察冀军区取得的胜利，同时也指出：

“你们最近打了一些胜仗，只是仗打得零碎了些。如何打大歼灭战，你们还没有十分学会。从张家口退出来以后，没有很好地把兵力集中起来。河北这个地方很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民兵和地方武装也很多，如果你们学会了集中兵力，一定能够打大胜仗。”“打歼灭战，是红军的传统战略思想。我们历来是靠歼灭战来壮大自己，你们一定要贯彻打歼灭战的思想。”“党政军民一定要团结一致，军队的纪律必须整顿好，要依靠人民群众，依靠民兵和地方武装，到处打敌人，把野战军腾出来专门打歼灭战，决不能叫主力到处去抵抗，分散兵力去保卫地方。相反，应该加强地方部队的建设，从地方部队挤出一部人来充实野战军。现在是吃饭的人多，打仗的人少，这不行。要实行总力战，党政军民结合为一体，共同对敌作战。”

这些话，是朱德在晋察冀中央局、冀中军区讲的。他在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后很快就确定了“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把“打大歼灭战”的思想贯彻下去，朱德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统一干部的认识。朱德同军区领导人商定，由聂荣臻分别召开各纵队、旅、团级干部会议，总结晋察冀军区作战的经验教训。朱德亲自给军区高级干部作报告，多次出席晋察冀中央局会议，并同一些指战员座谈，反复讲解形势，阐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意义。他强调打歼灭战需要做到三点：一、集中兵力，主动作战；二、打敌之侧背，包围歼灭敌人；三、利用有利

的地形。并且分析在平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以增强干部的信心。

第二，在组织上进行调整，组成强有力的野战军指挥机构，加强野战部队的实力。经请示中央决定，组建晋察冀野战军，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建立军区后勤部，统一领导供给、卫生、兵站、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使野战军脱离后方勤务，只管训练与打仗两件事。这样，野战军就可以轻快有力，灵活运用，从而适应打运动战与打大歼灭战的要求。

对野战军领导机构的组建，朱德抓得很细。当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的杨成武调任野战军第二政委后，朱德亲自找他谈话，交待任务。杨成武回忆说，他在阳泉接到中央工委的电报，赶到朱德所在的行唐县上碑镇，朱总向他宣布中央关于组建野战军的决定和组成。

“象个循循善诱的老师，和我促膝谈心，谈了很久，涉及的方面也很广。我深深感到，朱总司令的话，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是对部属的殷切希望，我生怕忘记，很快地挥舞手中的笔，把朱总司令的指示，一条一条地记录在本子上：

- 一、要团结。
- 二、戒骄戒躁，做事不要粗枝大叶，要细心谨慎。
- 三、注意组织军队，保证满员。
- 四、注意连队工作，加强深入下层，帮助连队。
- 五、干部有问题，要直爽地和他谈，帮助他。
- 六、注意巩固部队。
- 七、注意纪律，保证物资交公，即为筹款立功劳。
- 八、成信问题，上下级间有问题可以疏通，不要顾虑过多，要把工作做好。工作交给你两杨负责。
- 九、处事处人要有严密戒备，不要乱说话，要谨慎，不要慌忙，不要口松，多听人说，自己少说，生活、工作态度均要如此。
- 十、关心机关干部，注意对下层实际问题的帮助、解决，团结他们。
- 十一、静坐当思已过，反省旧日说话做事对人不周之处，加以警戒，加以反省，纠正之，加以这方面之学习，团结大家，锻炼自己。
- 十二、一切问题注意调查研究，加以综合，综合群众的意见后再发言，再说话。
- 十三、了解情况，了解干部（谈话、征求工作意见），否则不发表意见。”

第三，动员地方上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力量，配合野战军共同打击敌人。朱德几次到冀中军区，都强调整顿军队纪律，加强军民团结。他指出：“整顿纪律要自上而下地整，守纪律首先从上边守。”他要求冀中军区挤出一万到两万部队充实野战军。他还提出按军区、分区、县、区组成后勤指挥部，民兵、民夫都按班、排、连、营、团组织起来，各级政府的主席、党的书记担任后勤指挥部的司令和政委，统一指挥，打破各自为政、分散力量的局面。

第四，加强野战部队的训练与整顿。除整顿作风，整顿纪律外，朱德特别强调战术、技术的训练，对在平原地区如何调动敌人，如何攻城打碉堡，如何使用大炮、炸药、步兵协同动作实行攻坚等问题，都同指战员一一研究，进行具体指导。

朱德、刘少奇率中央工委到晋察冀边区后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都及时

向留在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在六月十四日致电朱德、刘少奇说：“各电均收，处置很对。”然后详细通报了陕北战场情况及其他几支大军的动向、打算，并说：“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朱德一直很关心。他一到晋察冀边区，就指出：“各个地方都打了许多胜仗，有什么经验教训？主要是土地革命，发动了群众，为保护土地，农民就要打仗。我们为人民服务，农民也不觉得打仗只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事情，就有了打胜仗的基础。”这年七月十六日至九月三日，中央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订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朱德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报告和讲话，还接连听取各解放区负责人关于土地改革及其他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在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土地”，强调“主要的就是先把群众发动起来，把封建势力压下去。”“把贫雇农发动起来，把中农联合一起，彻底平分土地，给地主留一点最后的生活”，并且“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去进行。在会议的闭幕词中，朱德兴奋地说：“希望各代表同志将这个正确的政策——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带到各地去坚决实行。”“土地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会成为富强的繁荣的新中国。”

但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工作重点仍放在“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上。

继正太战役之后，晋察冀野战部队于六月份接连进行了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11)。这两个战役规模虽然不大，但对锻炼部队协同作战、提高攻坚战术却有重要作用。

以保北战役打固城一战为例：固城是河北徐水、定兴两县之间的一个镇子，国民党守军一个团，全部用美械装备，构筑的工事很坚固，有大小碉堡五百余座，大部分是钢筋混凝土筑成的永备性工事。镇周围还有五米宽的外壕，解放军以一个旅一个团攻击固城，以一个旅在固城以北阻击援兵。国民党军队为解固城之围，以四个团的兵力，在航空兵、炮兵掩护下，向解放军猛攻。解放军一面顽强地抗击这些援军，一面集中优势兵力，以炮兵与步兵协同，攻破国民党军队的坚固设防，全歼守军。

固城战场的硝烟未散，野战司令部领导人杨成武等就到现场同指战员一起研究总结攻坚的经验教训。朱德这时正随野战军司令部行动，他对这样的作战指挥和领导作风极为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六月底致电军委说：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打堡垒及攻城的战术、技术都相当的提高，能步炮协同及善于使用炸药，能迅速秘密组成，故能成功，对于打歼灭战大有进步。”又说：“现士气旺盛”，今后华北作战“已转为主动，仍是围城打援为宜，在平原作战为有利，大炮能自由运动，攻城器械能搬运便宜，群众甚好，供给容易，即使是较坚的城堡，如准备的好，时间宽裕，亦可攻破。”(12)

从四月到六月，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南下正太，东取青沧，出击保定，三战皆捷，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朱德对这个转变很满意。在七月二十日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报告道：

“晋察冀工作，这三月来已有转变。”“现在野战军已完全组成，所委人员已到职，人员补充也正在进行，约可得一万补充兵。”“后勤已组织好，

支援前线已较前合理而有力，兵

工有大进步。”“最近野战军进行了青沧战役及徐固北战役（即保北战役——作者注）后，引起敌人大集中”，“好好打一次十个团的歼灭战，此间敌人就能大转变，转到守，成为被动，这是很有可能的。”（13）

打大歼灭战需要充分的准备。朱德同刘少奇、聂荣臻等研究后，认为部队刚经过频繁的战斗，必须好好休整，认真总结经验。八月初，朱德、刘少奇致电中央：“敌主力退大清河以北扫荡，我以军区部队配合民兵对付之，野战军急须整顿至八月二十五日。”（14）八月中，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向野战军司令部指出：“如暂时各方均不好打，可多整训十至十五天，将部队补充完整，好好训练，俟秋高时大举进攻三角地带，三条铁路（15），或再攻石家庄。”（16）

打大歼灭战的时机逐渐逼近了。朱德、刘少奇在八月三十日致电野战军司令部，对部队应如何作战作了明确的指示：

“你们应寻求运动中消灭敌人。”“部队行军宿营都要紧缩，灵敏，避免笨重累赘，善于利用群众掩护和地形熟习的条件，即能寻求在运动中突然袭击或打埋伏的好机会，去消灭敌人。如多次布置无效亦不必灰心，下级亦不宜说怪话，能长此灵活运用，一年内能一二次收效亦可算成功，或可大量歼灭敌人。”（17）

一九四七年夏天，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依次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朱德说：“整个形势变了。敌人的盛气凌人的进攻，大规模的进攻，以为三个月把我们消灭，最多半年把我们消灭，现在证明是一场春梦。”“所以今年的精神是进攻。”（18）整个战局已发生对蒋介石不利的根本变化。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的转折点。

晋察冀同其他解放区一样，这时已具备发动强有力进攻的有利条件。经过前面所说的几次战役，人民解放军已控制晋察冀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地区只剩下平、津、保三角地带和石家庄等几座孤城。但是，他们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仍占有优势，平、津、保三点距离很近，调动增援很快，而人民解放军还缺乏打大歼灭战的经验，这是不可忽视的困难。如何调动敌人，捕捉战机，成为当时打大歼灭战的首要问题。

在部队经过休整后，晋察冀野战军所打的第一仗是于九月初发起的大清河北战役（19）。这次战役虽然消灭国民党军队五千多，但由于战役之初围敌过多，口子张得过大，打成一个消耗战，没有达到全歼的目的。晋察冀野战军新的领导机构建立不久，这一仗打得不理想，部队的情绪便有些波动，有人说：“肉没有吃到，倒把门牙顶掉了。”朱德对这一情况很重视，立刻和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大清河北战役因围敌过多，不能最后解决。”“但此次士气旺盛，干部之有牺牲精神，较以前不同。罗因病未去，聂初离开，杨、杨（20）初出马，未获大胜，后方干部难免浮言。朱拟去野战军整理一时期，随同杨、杨等打一两个好仗，将野战军竖立起来。”（21）

接到这个电报后，毛泽东立刻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刘少奇和晋察冀野司，肯定大清河北战役虽然未获大胜，但指战员战斗精神很好，“只要有胜利，不论大小，都是好的。”考虑到朱德的安全，电报中又说：“朱总

是否亲临前线，请加慎重。”(22)中央领导人对野战军的这些鼓励，使广大指战员更加坚定了打大歼灭战的决心。野司领导利用休整时间，集中各级干部开会，认真研究作战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制订新的作战方案。

打大歼灭战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九月中，蒋介石从平、津、保地区调兵增援东北，晋察冀野战军抓住这一战机，准备再次出击保北，吸引国民党军队出动。十月三日，杨得志、杨成武为组织保北战役向军委、工委和晋察冀军区领导提出报告。朱德和刘少奇在十月五日复电：“同意你们出击保北并仍以寻求打运动战为主之方针。”(23)结果，由此演变成为著名的清风店战役，打了一个漂亮的大歼灭战。

清风店战役，又称保定南北战役，起初先在保定以北打响。十月十一日，解放军以一个纵队围攻徐水，主力集结在徐水以北，意在诱敌增援，在运动中加以消灭。国民党军队从北面调集了五个师十个步兵团和一个战车团，多路齐头并进，同解放军阻击部队在狭小的徐水、固城、容城小三角地带发生激战，形成对峙，这对解放军是不利的。为了迫使南下的国民党军队分散，解放军采取诱敌西进，这时正在北平的蒋介石，以为解放军兵力不足，即将败退，急忙命令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部北上，夹击解放军。野战军司令部获悉这一情报后，当机立断，以小部兵力在保定以北继续阻击，而将主力以强行军速度兼程南下，一昼夜行军二百多里。二十日，突然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合围于清风店地区。二十二日，全歼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另一个团，共一万七千余人，活捉军长罗历戎。捷报传来，全军振奋，朱德赋诗祝贺：

南合村中晓月斜，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笳。
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清风店大捷，是朱德到晋察冀解放区后的一次大歼灭战。获得这次大胜的条件是多方面的：第一，野战军领导人的指挥灵活机动，善于调动敌人，捕捉战机，集中兵力作战。第二，广大指战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赢得了围歼敌人的时间。罗历戎从新乐到清风店只有九十华里，解放军从保定以北赶到清风店相距二百多华里，但硬是靠一双脚板抢先赶到对手的前面。在保定以北，解放军留下四个旅在平原地区顽强抗击南下的国民党军队十个旅的兵力，伤亡不小，但始终没有让他们越过保定南下，保证了主力在保定以南的清风店地区全歼罗历戎部。第三，地方党政军民的有力支援。在短促时间内，冀中人民组成的民工队伍达十万人，担架一万一千副，牲口九千六百头，大车三千四百辆。数以万计的民兵，保护着军用电线。地方武装埋地雷，打冷枪，进行突然袭击，使罗历戎的部队疲于应付，想快走也不可能，终于全军覆没。

回顾清风店大捷，人们自然会想到：如果没有从上到下地普遍确定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如果野战军没有几个月来在实践中得到的锻炼和切实的整理补充，如果没有统一而有效的后勤供应以及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即使出现战机也未必都能抓住，这次大歼灭战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一切，正是朱德到晋察冀解放区以来一直强调并且亲自精心指导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对这一点，罗瑞卿在一篇回忆清风店战役的文章中讲得很清楚：“朱总司令对战役的指导是非常具体的。为了使指挥方法适应打大歼灭战的要求，

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指示我们成立了前线指挥机构。他鼓励我们一定要树立打大歼灭战的信心和决心，并且明确指出：善于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是夺取战役胜利的关键。他从战略指导原则，战役指导思想到具体指挥方法，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为我们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清风店歼灭战是我们贯彻毛主席运动战思想的一个生动体现，也是实践朱总司令关于学会调动敌人的指示的一个成功的尝试。”(24)

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十月二十二日），聂荣臻、刘澜涛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立刻向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提出“乘胜夺取石家庄”的意见。朱德完全同意。第二天他和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批准聂荣臻的计划。同一天他们复电聂荣臻等：“我们同意乘胜打石门。有可能打开。即不能打开，亦可能引起李文、袁朴(25)等南援，在石、保间可能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对我有利。请你们预为准备各种补充。待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朱拟即去野司。”(26)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攻打石家庄的计划。朱德在二十五日赶到驻在河北省安国县南关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同野战军领导人一起，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动员和攻坚准备。

石家庄，又称石门，是联结平汉、正太、石德三条铁路的枢纽，是华北的战略要地。虽然在正太战役以后它已陷于孤立，但仍象一个楔子，横亘于晋察冀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之间。它的防务在日军侵占时就修筑得比较坚固，蒋介石派重兵进驻后又不断加固，逐步形成局长六十华里的外市沟、三十多华里的内市沟和市内坚固建筑群三道防线，碉堡达六千多个。它虽然没有城墙，但深沟层层，暗堡林立，电网、铁丝网交织，地雷密布，被称为“地下城墙”。国民党军队得意地宣称：“石门是城下有城，凭工事可以坚守三年。”

朱德对攻打石家庄的有利条件和困难作了具体分析。特别是看准原来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在清风店战役中被歼后守军兵力不足，军心不稳的严重弱点，对攻克石家庄充满了信心。他起草的给军委的电报中说：“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石门无城墙，守兵仅三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其主管官被俘(27)，内部动摇，情况亦易了解。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28)；同时，他对石家庄防务的坚固和攻坚的困难也有清醒的估计。他在战前动员中，反复强调要作好充分准备，高度重视攻坚的战术与技术，并且学会把军事进攻同政治瓦解相结合，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

强行攻克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在解放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朱德对炮兵、步兵、工兵（爆破）协同作战极为重视。

他在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从野战军司令部到达安国县西北的西伯章村炮兵旅驻地，先听取领导干部汇报，然后深入到各个炮团实地视察。他虽然已年过六旬，仍迈着稳健的步伐，在坑洼不平的田野里检阅炮兵部队。他走近大炮，看前看后，向指战员提问：炮的性能、射程怎么样？有多重，如何挽驮？弹药准备得怎么样？检阅完毕，他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向大家表示慰问，并发表讲话，他说：

“咱们的炮兵有发展，东北部队的炮多，炮兵有十几个团，千把门炮了。山东有一个炮兵纵队，太行等地也有炮。你们也有一个旅了，很好。你们有前途，装备好，还要继续发展扩大，将来要准备打出去。”“炮兵很重要，为步兵开辟道路，可以减少伤亡。炮不打，口不开，打开缺口可以胜利向纵深推进，扩大战果。”“在战术上要注意，接近敌人要秘密，打炮时要猛，

要突然，火力齐整集中，集中里面还要再集中，还要注意运用不同地形实施射击，不打则已，一打就打得猛，打得准，打得狠。步、炮协同好，胜仗不断打。”(29)

这一天上午，朱德又骑马，又步行，连续到了六个村庄，视察了两个团、两个营和四个连队，到下午两点才返回旅部吃午饭。

当天下午，朱德又给炮兵旅团以上干部传达讲解中央《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讲述全国的战况：南面，刘邓已率野战军打出外线，打过了黄河，这一行动震惊中外；北面，晋察冀军民已把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五十万正规军和二十万杂牌部队）压缩在平、津、保、石家庄和张家口等几个大、中城市内，敌军处境被动，进退维谷，他说：“要打石家庄了。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打攻坚战，学会打大城市，还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意义都很大。”并且提醒大家：“石家庄敌人经营了多年，有坚固的工事，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阵地攻坚战。炮兵对这个课题应该学得更好。要研究运用炮兵为步兵打开突破口，把敌人碉堡打掉，支援步兵向纵深发展。”(30)这一天，朱德在炮兵旅工作了十二个半小时，直到晚八点多才离去。

接着几天，朱德还分别召集部分连、排、班干部和战士座谈如何打石家庄，还找过俘虏兵了解敌方的情况。在他的提议下，十月三十日，野战军司令部由参谋长耿飏主持在安国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会，集中研究如何打好阵地攻坚战。朱德参加会议，同大家一起具体研究如何打低堡、暗堡，如何实施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如何运用炮兵火力炸平防御沟，以及在巷战中炮兵、工兵如何配合等问题。他仔细地听大家发言，不时启发大家多设想几种情况，多研究几种打法和战术。最后他讲了一段话：

“这个会开得好，一是民主空气好，一是求实精神好。石家庄是一个很好的课堂，大家要好好学习，在作战部署上，主要进攻方向兵力火力要集中使用，大集中里面有小集中。迫击炮要能伴随步兵一起行动，山炮、野炮、榴弹炮，要组成火力队，在主要进攻方向上支援突击队。”(31)

十月三十一日，野战军司令部召开旅以上干部会，宣布攻打石家庄的命令和部署，朱德到会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他提出：这次战役必须统一计划，统一指挥；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发扬军事民主，加强党委领导和党支部的保证作用。他以严肃的神色凝视着大家，语气很重地说：“今天到会的都是旅以上干部，你们如何学会攻坚战术，对这次作战将起重要作用。要把石家庄当作一所难得的学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从挎包中拿出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另一本是刘伯承翻译的《诸兵种合同战术》，要求大家好好学习这两本书，并说：“马上就要打石家庄了，对这样坚固设防的城市，不讲究战术行吗？《诸兵种合同战术》关于进攻战讲了八条，你们要结合自己的经验，看看讲的有没有道理。石家庄战役打的是攻坚战，要勇敢加技术。”(32)

会后，野司把朱德一向提倡的“勇敢加技术”这个响亮的口号传达到所属各部队，坚决贯彻执行。

为了确有把握地攻克石家庄，朱德同野战军领导共同拟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以两个主力纵队、四个独立旅组成攻城集团，以一个主力纵队、一个独立旅组成打援集团，配置于定县、新乐县之间阻击援军。为了能先期发现援军动向，朱德指示野战军组成一支骑兵快速侦察支队活动于保定附

近。为了增强攻击石家庄的火力，他下令从华东野战军调一个榴炮营来加强前线。为了隐蔽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他又下令察哈尔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路北平、保定段出击，箝制吸引平、保一带的国民党军队。

攻坚战就要开始了，朱德仍留在野战军司令部。国民党的飞机不断地来轰炸，大家都为总司令的安全担心。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朱德到了前线，很不放心，致电刘少奇说：朱总到杨得志、杨成武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举行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33)。杨得志回忆说：“我们几次劝他到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县去，他却摇头不肯。他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专来找我朱德’。我知道他是关心着战役的发展情况，便说：‘你到河间，我们会随时向你报告的。’朱老总笑了。他幽默地说：‘野战军司令向总司令下了逐客令，没得办法，我只好去找孙胡子（指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同志）了。’”（34）

十一月一日，朱德离开安国，到达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县。行前，他致电聂荣臻、萧克等，告诉他们：“我到此已去看过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过会，讨论攻石门技术问题。又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了攻石门计划，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他要求晋察冀军区为保障战役的胜利，“物资必须准备充足，特别是炸药、炮弹。”并准备好人员的补充(35)。

晋察冀军区坚决贯彻朱德的指示，为打好石家庄战役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组织调动了近十万民兵、民工和万余副担架、万余头牲口、四千多辆大车的支前大军，把八万发各种炮弹、一百五十万发各种枪弹、六万余斤炸药、二十万斤各种攻坚器材、二十四万斤主副食品送到了前线。

石家庄战役从十一月六日拂晓开始。

解放军在炮兵掩护下，以爆破、突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法，迅速扫除了石家庄的外围据点。接着实施土工作业，把坑道挖到对方阵地前沿，以炸药实行坑道爆破，为步兵开辟道路。炮兵部队按照朱德关于“集中火力，集中里面再集中”的指示，把迫击炮以上火力都集中起来，编成炮兵群统一指挥，造成在主要地段短时间内的火力优势，并组织一部分山炮、野炮抵近射击，摧毁对方的人力点。战士们高兴地说：“我们的大炮上了刺刀，炸药长了腿！”

正当战斗激烈地进行的时候，朱德在午夜打电话问杨得志：“仗打得怎么样呀？”杨得志简要地报告了突破内、外市沟的好消息，朱德满意地说：“打得好呀！祝贺你们。按你们的计划打下去。告诉大家，后面的同志可是都望着你们哪！”（36）九日，朱德又打电话给杨得志，指示：（一）突破市内沟后，一定要猛推、深插、狠打，不让敌人有半分钟喘息；（二）充分做好打巷战的准备；（三）全歼一切敌人，包括还乡团在内(37)。朱德在电话中的鼓励和指示，很快传达到全军，给大家巨大的鼓舞。当解放军攻入市内、同守军发生激烈巷战时，朱德又打电话给杨成武询问战况，并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城市政策，特别要保护好几个大工厂。石家庄是我们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要做出榜样。我们军事上要打胜仗，政策上也要打胜仗，”（38）

经过六昼夜激战，石家庄守军两万五千余人在十一月十二日全部被歼。

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形势图上，第一个在大城市插上红旗的就是石家

庄。战役结束的第二天，朱德发来祝贺电：“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39)他还赋诗一首，题为《喜闻收复石门》：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
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
从兹不虑鬓毛斑。

十一月十八日，朱德来到束鹿县东小庄村，参加由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召开的总结石家庄战役经验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强调：“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击战术，这是我军建军以来经过三次革命战争的新课题，它意味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打下石家庄，只是上了第一课，而更大的课题、更艰巨的实践还在后面。”(40)

十一月下旬，朱德再次来到野战军，在晋县侯城村召集参加攻打石家庄的五十多位指战员，座谈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参加座谈会的，有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等，更多的是来自战斗第一线的连长、连指导员、排长和班长。

座谈会从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开了三天，朱德亲自口问手记，同大家切磋研讨，既总结攻坚战斗的具体经验，又从政治思想上进行启发教育。当时代替黄华（因去参加上改工作）担任朱德秘书工作的何其芳回忆说：“汇报和谈话都是在总司令住的一间普通大小的屋子里进行，而且一个长炕占据了屋子的相当一部分面积，所以每次都是多则八九个人，少则五六个人来。总司令总是和蔼地亲切地面对他们坐着，注意地仔细地听他们谈。他们每批人汇报完了以后，总司令总是对他们讲一段或长或短的话。这些情景、这些场面、这些讲话，都异常感动人。”(41)

三天座谈会后，十二月一日上午，朱德在侯城村对晋察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做了长篇讲话。他先讲了形势，指出：以前说是革命高潮的前夜，现在革命高潮已经来到了。我们南线反攻取得了大胜利。你们这里也是空前胜利。他说：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很大，使敌人失去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并且把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接了起来。

他接着分析了打石家庄的经验，主要是：有了充分的准备；动员工作做得好，在战斗中发扬民主；讲究战术，做到了勇敢加技术；利用政治瓦解，善于利用俘虏，等等。勇敢加技术，可以多消灭敌人，自己伤亡小。

他针对部队进大城市后曾发生某些争缴获、争功劳、秩序一度混乱等问题，谆谆告诫大家：凡是依靠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就能取得胜利。相反，个人英雄主义，一切听我的，就不行。这次开展了立功运动，动员了群众，但争功就要不得。人家的功，你争来有什么用？功是谁的？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中国的工人、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流了许多血，世界上晓得他们英勇，但不晓得那样多的名字，那样多的详细的事迹，有时就记住了他们的领导人。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而夸功，那岂不可笑！

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纪律很重要。打开了城市，缴获的东西，第一不能打烂，第二必须归公，决不能归私。以后大城市打下来以后，一个时期内应实行军事管理。一面打仗，一面建立家务，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要这样建立起来。”(42)

十二月四日夜里，朱德驱车来到硝烟还没有散尽的石家庄。第二天一早，冒着大雾视察了这座刚刚解放的城市，特别是城市中的重要工厂。他参观了炼焦厂、大兴纱厂等，听取了市领导人对石家庄工业和经济等情况的汇报，并就汇报中提出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夜幕降临后，他离开石家庄回到中央工委所在地西柏坡村。

十二月十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转中央，报告他到野司、冀中、再由石家庄回中央工委的经过及所见，肯定晋察冀部队经过整顿，士气旺盛，清风店战役“开创了晋察冀歼灭战的好例，接着再打石家庄，又得胜利”，“这几个战役中，学会了打运动战、防御战、攻坚战”。他在信中特别讲到，这次在攻打石家庄的过程中，发扬了军事民主，发动了士兵群众，上下一致，因而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报告中又谈到：他在河间及石家庄听取当地负责人的汇报后，感到工人待遇过高，已当面向工会负责人说明，这样会使公私工厂大部关门，工人失业，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政策”，这种作法，现已纠正(43)。

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十分重视，把信转发给各中央局、野战军，并且强调指出：朱总司令这封信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这种做法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如果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而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要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所存在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44)

三十七、在大决战的日子里

石家庄解放以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华北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四七年冬，蒋介石急忙飞到北平，撤掉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的指挥职务，取消北平行辕及保定、张垣（张家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傅作义担任总司令，统揽华北五省（晋察冀热绥）的指挥大权。傅作义大力扩充地方武装，把他在绥远的主力部队抽来集中在北平附近，把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的部队编组为三个机动兵团，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战法，处处猬集一团，力图反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

为了打破傅作义这一新的作战计划，并配合东北解放军的攻势，朱德和刘少奇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向晋察冀野战军提出新的作战方针，要求他们按照中央军委预定计划，向平绥、冀东方向行动，并学会大踏步进退，进行大的战略机动的一套本领，“克服各种不愿长途行军，不愿急行军，不愿爬山吃苦等思想，并须改变某些不适宜于大踏步进退的组织形式和习惯。现天气已暖，笨重行李必须丢掉，紧缩的宿营必须学会。”以便在更大的战略范围内适时地调动国民党军队，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把它们各个孤立起来，打通华北解放军各部的战略联系，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三月五日，朱德和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傅作义主力现集中平、津、保及张家口地区，每当发现我军主力所在方向，即集中三、四个军的兵力与我周旋，常形成顶牛形势，于我不利，而其绥远后方极为空虚，因此，杨得志、罗瑞卿要求军委将绥远地区划作他们机动作战的范围。他们拟在适当时机以一两个或三个纵队向大同、丰镇，集宁及归绥方向行动，打击傅作义后方，破坏平绥路西段，调动分散敌人，以便求得战机歼灭敌人。他们这一要求我们已同意，请军委批准并通知晋绥军区。

朱德又致函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傅作义初上任，必欲建树，不惜本钱寻求与我决战。我军当以不速决为是。因此，敌集中了主力，必放弃许多地方，凡有可乘之机，你处当乘之，决不可错过。东北大胜，已将你们前面之敌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援东北）全部消灭，另一九四师亦同时消灭。”他明确地判断：“今后你们南面无战事；一意向北。”要求你们注意战术技术，如：“围点打援，小部队亦可利用”；“坑道战术，是你区的特长。可发展”；“要大量生产炸药，制造手榴弹、炮弹，游击队也可以配备炮。”

四月，他写信给孙毅指出：打敌人骑兵，要“用民兵守据点、坑道口，作单个打冷枪或架好机枪在坑道口突然袭击之。”六月，他再次致函孙毅：“夏季作战，更应配合热河、冀东战役。乘傅对付热河之际，你们应更加活动。南减河以北均划归你区，对天津、北平、保定区域更应负责，现南面无顾虑，应努力北面，长期斗争，以至收复平、津、保为止。”

由于这些正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得到贯彻实施，华北军区部队在一九四八年春夏，先后在察南、绥东、热西、平北，冀东、保北广大区域内周旋，轮番进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五万余人。这样，就拖住了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使它无力出关，从而保证了日后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发展，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重要城市的任务已被突出地提到面前。攻坚，必须有足够的炮弹、炸药等物资和源源不断的后勤供应。

朱德对这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早在一九四七年春，朱德随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解放区时，就着手抓军工生产，特别是重武器炮火的制造。据当时担任晋察冀军区兵工部副部长的刘鼎回忆说，朱德找他到西柏坡，对他讲：“我们就要开始战略大反攻，前线需要炮兵，需要炮弹，兵工生产要抓紧，多生产一些炮弹，越多越好！”当刘鼎组织技术人员研制出一种爆炸力强、性能安全可靠的新型炮弹，进行试验射击时，朱德亲自赶到靶场，参观试射，“当他看到试射的各种科目准确无误时，十分高兴，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正适合战争的需要，要尽快投入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嗣后，他命令军区把收存的迫击炮全部启封使用，同时命令炮兵加紧训练，把炮兵的建制尽快恢复起来。”

当时，晋察冀地区的军事工业分散在各地，管理也不统一，远远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朱德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要把分散的军工生产统一起来，要大规模发展炸药和炮弹的生产，“这与打垮蒋介石的时间有很大关系，”为此，他要求实行企业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要动员各地保证军工原料的供应；要搞好运输线，保证军工产品及时送到前线。他在七月十一日致电毛泽东讲了这些意见。七月二十日，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召开兵工会议，交通运输会议等，提出：我军反攻时，在补充方面最重要的是炮弹、炸药的大批补充。同时运输也很重要，我们应该早注意。兵工会议迫切需要召开。各地均有大小规模的工厂，技术问题许多地方尚不能解决，须交换经验教训。晋察冀兵工厂经整理后，生产可增加一倍以上，我与董老决心将此兵工厂尽量使用，多余炮弹炸药可供各根据地前线使用。

朱德还对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如，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他致函晋察冀边区工业局负责人姚依林、刘鼎等，说：

“晋察冀的兵工厂两三月来整理后大有进步，再加以二等军区兵工厂均统一指挥领导后，更加便利于大发展。我要求你们以确实可靠为准，任务能做到支援全国性的反攻军所用，以炮弹特别是山野炮弹、炸药、绵药为重要，其次是迫[击]炮八二、五、六的为适用，其它是机枪弹，以上这些任务你们是否有可能做到，并要争取时间尽先完成，又要能适用，取得各战地的赞美，那时自然不愁款项无着。但是你们计算（指产品成本——作者注）不可过于太贵，应尽现有材料，或征发民间钢铁等，尽量减低成本，发动工人为前线义务服务，如有急需昼夜开工等等。计划就现有统一兵工基础上，本月底能生产多少出品？八月份、九、十、十一、十二月份，每月增加数目字请详细列表告诉我，以便进行总的计划，过剩生产或各地要求的特别生产均由我们负责调济款项。又，明年一年计划分上半年、下半年，能生产出多少产品，需要款多少，亦请详细告诉之。总之，此地兵工事业应尽可能范围内来发展，扩充技师、工人、机器、原料来解决来计算。这一光荣任务给你们，请努力完成，你们如何计划，做成后即速派人送来。今后望你们直接向我作负责的报告，至少一月一次。”

经中央同意，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交通会议，除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外，晋绥、山东和大别山刘邓部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是以战争来{ewc MV IMAGE, MV IMAGE, !09100020_0591_1.bmp}结束战争。军工生产对我们胜利的快慢有重要意义。要提早结束战争，要拔掉大的点，就要有大量的炮弹、炸药、手榴弹。我们现在主要靠缴获，这是

不得已而为之。军工生产要有规律地进行。参加军工生产就是在后方出汗，打倒蒋介石。要大量生产，提高技术，加强工厂管理，力求减低成本。军工生产上了轨道，对整个工业也会产生好影响。要搞好交通运输业，把军工产品很快运到前线去，把我们需要物资运进来。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朱德又在军工会议上着重谈了军事工厂的管理问题，认为军事工厂应该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方法，应该有一个大的转变。企业化管理的提出，是一个新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朱德说：过去我们在军队里实行军事供给制，是靠政治吃饭。有饭大家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延安时，工厂一般是派原来的军事人员去当管理员，他们的成份大多是农民，种庄稼是内行，比如开辟南泥湾，说种就种起来了，但管理工厂是外行。他们起过组织的作用，这个功劳在历史上是不能磨灭的。但他们不懂机器，有的就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甚至搞出了乱子。我们的机器，比手工业生产多得多，不发展，一切行不通。

他说：“世界上都是变化的，一天比一天新，都是推陈出新的。”现在要发展生产，不变不行了。军工厂要企业化，管理要严格。军事工业要帮助民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把同农民的关系搞好。管理工厂要靠老干部，还要靠有管理经验和生产经验的工程师、熟练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提拔起来，就管理好了。不能把他们看作外来人，不相信他们。有些专门家、工程师，并不比我们这些老干部差，甚至比我们强，将来非他们负责管理不可。造成这批干部不是一年两年的事。造成的这些人，可以把现有的工厂办好，还可以发展新的企业。工业局或工业部，要把军事工业和地方轻工业都领导起来。当然，资本家还存在，但大的工厂、矿山、铁路归国家。“过去不合理的事情已经成了过去，现在交给那些新起的同志去办，把家务办起来。”

这次会议结束后，朱德立即致函晋绥军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此次兵工会议有成绩。太行、晋察冀向企业化道路前进，兵工与公营轻重工厂合组，统一领导，互相补助，将一切家务整理好，成为核算制度。”你区也以“逐次变为企业化为好。炸药、炮弹、手榴弹成为决定战胜的重要因素。你处因经济及原料不足，不能大量生产，仍希望将炸药一项多出一部。运输线组织对你区供给弹药是十分需要的。望秋夏季在交通线上设粮草站，以便由各地转运弹药及其他物资帮助你们。”(11)

他还致函冀中军区：“我们这里军工会议、交通会议均开得好。”你区必须制造大量炸药、炮弹、手榴弹，“如财政不足，可省衣节食，如原料不足，可发动广大群众熬硝，公家统制、收买，无论多少，产出必照预定价全数收买。”“你区对冀东交通十分重要，不仅军火、炸药、炮弹急需从冀东运来外，今后医药器材、电信器材及兵工器材，不能购买的都希望从东北运来，望你们设法有计划的打通平津交通。”(12)

由于朱德对军火保证这个重要问题想得早，抓得紧，抓得具体，使晋察冀和其他解放区的军工生产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保障了各个战场的需要。如攻打石家庄、临汾、济南、太原这些设防坚固的城市，使用了大量炸药和炮弹，都是华北解放区的兵工厂供应的。战略决战时的淮海战役，由华北和东北军工送往前线的弹药达一千六百四十万吨，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

兵工厂根据攻坚战的需要还研制出大口径掷弹筒（也叫炸药抛射器）和

粗膛迫击炮发射炸药包，在战场上大显威力。凌空爆炸，甚至使方圆几十米内的敌军聋瞎丧生。战士们高兴地把这种武器赞喻为“土飞机”（象轰炸机从空中投炸弹），国民党军队有的惊呼“共军有了原子弹”。因为有了这种威慑性火力，毛泽东就可以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警告国民党军队：“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13）

的确，在战略决战阶段，解放军的炮弹和炸药所形成的火力，已大大胜过了国民党军队，这就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这和朱德的深谋远虑和切实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月二日到五日，中共中央工委举行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这次中央工委会议对形势、军事、土改、纠正“左”的错误等问题展开讨论。朱德在会上谈到产生“左”的错误的的原因。他说。产生“左”的错误的根源之一是阶级分析的错误。中国社会有若干过渡阶层，对这些阶层分析不清就会发生偏差。

同月，他在一次财经工作的会议上批评了对待城市工商业政策上的一些“左”的错误。他说“我们的政策是打倒四大家族，对中小工商业者实行争取的方针。“工商业要保护是我们一贯的政策，但保护总不够，一保护就怕人说是‘右倾’，是‘保护资本家、地主、富农’。就是这一怕吃了亏，使社会财富破坏不少，造成无政府状态。”他强调：进城应该有秩序，一切都不破坏。旧的经济机关如工厂、商店、作坊都应该保存，不能把城市变成农村。一切以不动为好，让他们照常工作，从旧的基础出发改造它。他批评道：“听说（山东）德州一解放，城市无人管理，工人、贫农靠斗争吃饭，一个斗争接一个斗争，直把城内斗了个光，最后生活仍无着落。”他称这种做法是“自取灭亡”，并说“石家庄因为开头讲了很多，所以比较好。”他还说：“有人要问假若农民要求怎么办？我说应该是解释，耐心的说服。因为我们的政策不是群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没有领导。”“保护与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工业，因为工业生产的财富比农业生产的多得多，发展工业对国家利益最大。”（14）

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早平县。同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工委合并，中央工委随之撤销。这以后，朱德作为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协同毛泽东、周恩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加强华北、中原解放区的领导及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听取了华东野战军负责人陈毅、粟裕的汇报，赞同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下，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建议。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华北军区，还决定加强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

五月十日，朱德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代表中共中央赴濮阳地区（今河南濮阳市）对华东野战军进行慰问并指导工作。

在奔赴濮阳的途中，朱德的心还挂着晋南战场。那里，徐向前正率领晋冀鲁豫部队一部围攻临汾。战役从三月开始，已经五十多天了。当时，整

个晋南只有临汾一座孤城仍为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守军二万五千人，装备精良，城防坚固，被阎锡山称之为“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担任攻城的部队是新组建的，装备比较差，缺少攻坚经验，屡攻不下。朱德认为，为了解决内线敌占城市，需要培养出、锻炼出专门的攻坚部队，同时，培养攻坚兵团又是争取战略反攻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环，要知难而进，拿下临汾，为全国提供对大城市发动攻坚战的经验，因而对攻打临汾给予坚决支持。他和刘少奇曾在四月十二日致电徐向前、薄一波，说：攻打临汾可采用攻打石家庄的经验，首先是“炮炸协同，击开突破”，也就是以大量重迫击炮、榴弹炮和野炮，集中打一点，并利用挖好的坑道，用一千公斤到五千公斤黄色炸药进行爆破，必能炸开突破口。大量炸药爆炸后，国民党守兵在十数分钟内，都聋哑难以行动。趁这时以步兵冲进，再使用大量手榴弹及少量炸药，就可占稳突破口，再向两面发展。请必须充分准备炸药五万到十万斤，炮弹须有五万到十万发。(15)

在这次出发去濮阳的路上，朱德从和陈毅、粟裕的谈话中了解到，有些领导干部中有一种“暂时放弃临汾，回师东向，集中力量保卫石家庄”的议论，而指挥临汾战役的徐向前“尚有决心打开”，立刻于当晚在石家庄宿营时，写信给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说：

“我很顾虑你们怕伤亡，又打不开，不如不打。这样决心，那就前功尽弃，敌人守城更有信心，我们攻坚的信心又会失掉，部队也学不会攻坚。如此损失更大，又毫无代价。请你们考虑，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我意临汾在敌人无增援的条件下，一定可能打开；又在敌人增援不多而我又能打援队，而援队被消灭或打退之后，也一定可打下临汾城。不过是时间早迟而已，决不是城中守兵能长期维持打不下去的。”

他又说：赴濮阳途中，在元氏县车站休息时，同陈毅、粟裕一起去看了地方部队用炸药炸开该县城墙的遗迹，了解使用炸药炸开缺口的办法，即用棺材装二千五百斤炸药炸一个缺口，几个缺口同时爆炸，威力很大，请你们再参考攻元氏战例，鼓励攻临汾战士，以大力支持他们，一定能打下。(16)

战事正如朱德所预料的，由国民党军队占据的临汾经过七十二天的战斗，终于在五月十七日解放了。后来，指挥这次战役的徐向前回忆说：“朱总司令的果决、信任和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部队顽强战斗，终于攻克这座堡垒城市，锻炼成为攻坚的铁拳头。”(17)

赴濮阳途中第二天，沿京汉路东侧南下，道路更不好走了，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泥泞的道路上颠簸前进，不时遇到炸弹坑、封锁沟、界限沟等等，时走时停，有时只好绕着走。过邢台后的一段路上，大卡车曾陷进一个泥坑，开不出来，朱德和陈毅都跳下吉普车，不顾头上还有敌机在盘旋，跟战士一起往外推车。

过了邯郸，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只能乘夜赶路，竟遇到一次险情：陈毅乘坐的吉普车走在前头，发现前面路上有国民党军队二百人左右，正沿公路朝东南方向步行，有人提议是不是把车停一下。这时行驶在后面的大卡车上的人也报告：“后面发现敌人几辆汽车，朝我们方向开来，我们要不要向旁边躲一躲？”朱德考虑片刻，果断地回答：“前后的敌人都不用管它，车子继续前进！准备战斗，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当汽车冲近前面的国民党军队

时，那队人一齐躲往路边。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一闪而过的车队里正坐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跟在后面的国民党的汽车，也一直相隔一定距离。后来遇到岔路，他们便朝冀鲁交界的馆陶方向开走了。

朱德的车队一直向南，抵达黄河北岸的濮阳。华东野战军的指挥部，就在离城不远一个叫孙王庄的村子里。

华东野战军是在新四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朱德对这支部队是十分熟悉的，但已有根久没有见面了，五月十三日晚，他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直属队欢迎会上讲话，兴奋地说：新四军是党和人民的军队。十多年来，在战争的锻炼中，更加巩固和扩大了，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我今天见了你们非常高兴。

从这天起到十八日，他还先后在一兵团欢迎会上，团以上干部会上，连、排、班士兵代表会议上，分别作了长篇讲话，先后听取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的汇报，还到战士中间寒问暖，当场解答战士代表提出的各种问题。朱德在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华东野战军表示亲切慰问，并着重他讲了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

他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反复强调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重要性。他斩钉截铁地提出：“许多问题可以妥协，政策纪律上的问题一点不能妥协。”他说：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蒋介石，消灭封建势力，消灭官僚资本，使中国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央经过反复的讨论，已规定了各种政策。”“正确的政策规定出来以后，还需要我们全体党员、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好好的去执行。同志们拿枪歼灭了很多的敌人，得到了很大胜利，还要在政策上打胜仗，要用政策去消灭敌人，才能使敌人很快瓦解和投降。”

“要保证政策的执行，便要有良好的纪律。同志们要坚决遵守人民军队纪律。纪律是我们的命脉。纪律遵守得好，我们就可以少杯一些仗，胜利也可更快的到来。”(18)

在谈到军队建设时，他说：

“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只能都好，不能哪一个单独好。”“我们与国民党军队所以不同，主要就是我们有了政治工作。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军阀的队伍。”

“有坚强的政治工作，部队才能巩固，士气才很高，才能打胜仗。”“要有坚强的整体观念，要有全国观念，过去的那些山头主义，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军阀主义倾向等，今天都要去掉。”“希望大家认识今天强调统一的重要，去掉大大小小的山头。只有把各种力量集中起来，才能胜利”。(19)

在谈到作战问题时，朱德特别强调学习战术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完全有根据的。但到了战场上，对具体的敌人作战时，就一点也不能轻视敌人，否则就会犯错误。“不要以为敌人快要死亡，在战术上就一点变化也没有。他吃了许多亏，迫得他也要有些改变。”大家都要学习战术，既要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战术，也要研究敌人的战术，蒋介石某些战术有变化，我们某些战术也要相应地改变，大家要想办法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几个主力部队。

怎样对付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朱德用生动形象的譬喻，提出了一个重要主张，要用“钓大鱼”的办法。他说：

“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个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尚未疲困它。拚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搅上几个钟头，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就把这个大鱼钓到手了。对第五军就要用这个办法，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

朱德还指出：对不同的敌人要有不同的打法。打小敌、弱敌，可以用此较简单而直接的办法，可以来一个猛冲；打大敌、强敌，必须定出系统的斗争方针，必须懂得摆布它，懂的用迂回曲折的战术。打仗要看清对象。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看什么天候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等等，都是重要的战术原则。(20)

朱德这些内容深刻、语言生动的讲话，给了华东野战军指战员们很大的教育。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后来回忆说：“五月十四日，朱德同志向团以上干部讲话，分析了战争形势，对部队的任务和建设作了重要指示，并动员大家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敌整编第五军等部。随后又向营以下干部和战士代表讲了话。朱总司令在华野广大指战员心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老人家亲临视察和给予指示，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鼓舞斗志，增强战斗力，起了极大的作用。”(21)

在朱德视察华野期间和离开华野以后，华野总部将他的讲话汇印成册，发给广大指战员学习，华野总部和所属各兵团高级将领根据朱德的讲话，结合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为行将到来的战略决战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

朱德离开不久，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率领下，审时度势创造战机，从六月中旬至七月初，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豫东战役（包括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一度攻克河南省会开封，再寻歼援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九万三千余人，创造了在一次战役中歼敌数量的新纪录。这次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也是全国军事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开始。

一九四八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数量上这时也比国民党军队占有优势了。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夺取全国胜利已经近在眼前。

在这个关键时候，朱德经常到解放军总部作战局听取汇报，发表重要意见。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他在战况汇报会上对战略决战的地点、时间、条件和有关政策提出看法说：

“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二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只要我们在军工生产上努力，今后不会有什么攻不破的城市。”“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

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我们的胜利，在今天来说，是更有把握了。但如果我们的许多政策

土地改革、工商业、镇压反革命、生产、争取俘虏等，有一条执行的不正确，都可以使我们失败。在军事上争取俘虏的成功（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这是一个大胜利。”（22）

九月中旬，朱德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在大约五年左右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目标，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可以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取得，同时必须努力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于现状。要经常整训，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站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连续作战。他还富有远见性地提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23）

九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取得济南战役的胜利，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同时，辽沈战役第一阶段正在激烈地进行，东北野战军已接连攻克绥中、兴城、义县，威逼锦州，截断北宁线，堵住了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向华北撤退的退路。十月一日，朱德在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讲话，指出：“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敌人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他说：“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在中原地区决战，对我有利的条件是：第一，群众是我们的；第二，我们的力量比较大；第三，我们的运输线较前顺利；第四，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的弹药。他强调：“运输，对今天几十万人的作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后要把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还要组织好医院、担架队等。（24）

十月十四日至十五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取得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捷报传到西柏坡村。第二天，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讲话，指出：“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他的长蛇阵如果被我们一击，就可以切成几节。”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它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蒋介石近来也跟我们学，放弃城市，进行机动作战，也不要后方，也搞大队行进。但他没有群众，所以没有饭吃，而且这样做已经迟了。”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人员补充问题是我们继续取胜的重要条件。另外要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兵工生产，准备决战。（25）

十一月初，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接着，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在中原大地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胜利发展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二兵团又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兴奋地指出：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

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他说：我军在徐州地区集中的兵力，数量上比敌人多一点，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比敌人也不差。敌人现在徐州集中了三个兵团不易打。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兵团共十一个师，兵力大，他估计我们不敢打他，实际上兵越多越容易乱。队伍一乱就很快可以把他解决。我以四五个纵队监视徐州敌人，决心连续作战，不怕伤亡，随时补充俘虏，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我们无产阶级队伍才能如此。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固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朱德断言：“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26)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起，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一百四十二天，共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人，使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基本上被摧毁。这个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震撼了世界，预示着蒋介石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即将告终。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抢掠人民财物，施放毒气，破坏武器弹药，毁坏市政水电设备、工厂、建筑，毁坏文化古迹罪行者，均以战犯论罪，应依法惩处；凡采取有效办法而使人民生命财产、城市建筑及物资获得安全和免受破坏者，则应予以奖励。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人员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27)这个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起了巨大的震慑作用，不仅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也减少了战争带来的破坏。

战略决战胜利后，各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先后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同时成立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原五大军区，原华北的三个野战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它意味着各个野战大军将跨出原来的地域，向全国进军。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德于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主持召开全军军工军械会议、全国后勤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讲话说：蒋介石企图以长江为防线，但他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我们就要过长江了。大军出动就要求后勤工作做好准备。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后勤工作，要依靠和发动群众，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大规模的后勤体系；要逐步做到统一集中，消除过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地域观念；要建立统一的装配样式和各项规章制度；要有计划地进行军工、军需生产，用物资来保障战争的胜利，并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8)

三十八、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当历史进入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全国已处在革命胜利的前夜。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胜利，一九四九年一月，朱德在一次会议上兴奋地说：“中国局势，在这一年内可以完全统一起来。”“这一点，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已经估计到，现在则是任何人都可以估计到的了。”新中国即将成立，自然将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朱德在这次讲话中强调：“全国政权力我们所有，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今后一切要有正规建设的观念，一切事情要用心办好。做事需要专门化，一切事情经过研究，彻底搞好。各种人将要转到建设上来。”

对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朱德一向十分关注。这以前不久，他说过：“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是生产建设；土改为了什么呢？也是为生产建设。要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以便把各种力量组织起来搞好生产。”

他在担负中央工委领导工作期间，亲自在冀中对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银行工作等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对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提出有创见的指导意见。他认为土改以后不论党务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团体工作，都要注意发展生产建设，土改后“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产）才能往上长，以后一直往上长，才是兴旺的新中国。”石家庄解放后，朱德很快到市内几个大工厂视察，出席石家庄市工商界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话，指出：“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每个人都要学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永远是我们的天下了，生产要天天往上升，否则和敌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他在华北工商业会议讲话时谈到私有企业问题，说：私人工商业家不要起恐慌，不要担心被挤掉。“为什么不会挤掉呢？拿国家的贸易来说，不论开的店也好，做什么事也好，有限的很，怎么能供给广大人民交换呢？国家管不到，私人就可以做。拿工厂来说，国家搞大的都搞不过来，何况小工厂呢？怎么能搞得赢呢？所以私人资本的发展，是有很好的前途的，这个前途有利可图。”“我们是不怕私人资本发展，相反的，我们是怕这些工商业家不发展。他们不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也会发展的更慢，并且使我们国家的税收也会减少，人民也就会多受苦。如果发展的快，那我们的国家生产事业可以很快的兴旺起来。”

对在新解放地区接管的原国民党政府所属的工厂和铁路运输业，他强调不要打乱原有机构，并要放手使用原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九四九年一月，他说：“我们对工程师、旧职员的政策：国民党的政权机构、军队、警察等等，是腐化了的，非彻底予以粉碎，彻底改造不可；但铁路和工厂的机构则不应打烂，打烂了是没有好处的，要大胆放手使用他们，这一政策必须执行，这对人民是有好处的。如东北有个工厂，其中有一万多人，厂长以下原薪原职，我们都用了，马上就可以开工，这很好。”

他还多次强调要艰苦奋斗，工人增加工资不能过高。他在视察冀中经济工作时再一次强调：“许多工厂管不好的原因，一是不会管，二是工资高，只知道发动工人改善生活，而不知道教育他们好好生产。工资过高，对生产发展是自杀政策。”

为了顺利实现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确定全国胜利后党在

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工作报告，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以及为适应这个转变而采取的基本政策。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于六日在会上发言，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这是个大转变，从乡村转到城市”。过去从城市到农村是个大转变，现在从农村转到城市又是个大转变。我们的工作要适应这个大转变。军队要由战斗队逐步转变成工作队，这也是个大转变。我们的部队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要培养出会做事的人。将来管理生产，搞生产建设，也要靠他们。今后我们进了城市，取得全国政权，就有了自己的国家，就要搞好国防。要实行征兵制，建立自己的海军、空军、炮兵、步兵等，建立和训练国防部队，敌人来了就得打。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这样的国家建设好，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凡骄傲者都是幼稚的人。”

七届二中全会一结束，朱德立刻到石家庄面粉厂、玻璃厂、卷烟厂等几个大工厂宣讲二中全会精神，号召各厂党员干部坚决执行二中全会所确定的方针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努力恢复生产，管理好城市。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启程向北平迁移。行前，后勤供给部门考虑到当时北平天气还相当冷，给一些同志补发了棉军鞋，也给朱德补发了一双，“可是总司令拒绝了，他说：‘我的这双鞋虽然破了点，可补一补仍然可以穿嘛！把这双新鞋拿到前方去吧，前方的战士比我更需要。’朱总司令就是穿着康克清大姐缝补的那双棉鞋走进北京城的！”

二十五日，他们抵达北平。当天下午，朱德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受到北平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到北平的第三天，朱德在一次内部的会议上说：进城是件大事情。对管理国家，从负责同志到勤务员都要重新学习，在实际中学习。

从四月起，朱德一面协助毛泽东、周恩来部署二百万大军的渡江作战，一面对城市的生产建设进行具体指导。四月十一日，他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对即将南下的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讲话，指出：

“现在国内形势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敌人的主力兵团约五百万人，已被我先后消灭。现在敌人所余下的仅是残余的军事力量，总共二百万人左右，其中战斗部队不过一百四十万人，而且派系庞杂，各自为政，已无强大的抵抗力量，战斗意志极为低落。因此反动政府要找我们和谈，企图借和谈拖延时间，重整力量，部署江防，以图负隅顽抗。我们不要被敌人欺骗，我们要积极准备迅速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

他要求南下部队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争取大多数，一步步战胜敌人；同时要担负起工作队的任务，学会做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及接收等工作。取得全国的最后胜利。(11)

当国民党政府拒绝在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共同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四月二十一日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12)随着这命令的下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省江

阴，西至江西省湖口，长达五百公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天堑，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国民党当局苦心经营的防线。

四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联名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估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速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须投诚报到；（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此布告，希望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13)这个布告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传遍全国，昭示天下，给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带来安宁，带来希望和生机。一个新的人民的中国即将诞生。为了迎接她的诞生，各行各业在筹划兴治，一系列人民团体的会议先后召开。从四月到八月，朱德先后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筹备会成立大会、中华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中华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在这些会议上，他或者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或者发表重要讲话。

他勉励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应该继承过去的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的核心，作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工作中的助手和后备军”，“要善于引导广大青年团结在青年团的周围，要领导大家好好地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文化、科学、生产、军事知识。要在斗争、工作、劳动中学习，要使新一代青年都真正成为能文能武，样样精通的新中国建设人才。”(14)

他对科学工作者说：

“今后我们要自力更生，使中国能在困难中建设起来。中国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科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科学工作者要加强团结，并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建设新中国的大业。(15)

他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说：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拥护中国革命胜利的人，必须承认这个真理，注意这个真理，研究这个真理。”“中国社会与历史还有许多荒地需要社会科学来开垦，需要从研究当中得出科学结论。”(16)

他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说：

文学艺术和革命斗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新文艺的光荣”。“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起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这主要的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人民是要兴旺起来的，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文学艺术，也一定要兴旺起来的。”(17)

他对教育工作者说：

“在经济上要把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在文化上要从一个文盲遍地、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教育普及、文化发达的新中国。教育工作者在今后的建设工作中将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全体教育工作者必须拿出无限的忠诚和才能，来完成中国人民所给予的光荣任务。”(18)

他对工会工作者说：

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应当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在国营企业中，工人阶级应该面向生产，学习经营管理，努力提高政治和科学文化水平。在私人企业中，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等于无限制地增加工资。如果这样，那就是经济主义的路线，是落后工人的情绪，而不是真正工人阶级的利益。革命的终极目的就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工业。只有发展生产，工人阶级的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他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节衣缩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组织起来，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努力。(19)

他对妇女代表说：

在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之后，发展生产，不仅对中国社会前进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提高妇女地位也有着决定的意义。要动员与组织妇女参加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只有妇女自己努力奋斗，培养起独立工作的能力，在经济上有了地位，才能彻底地冲破过去中国封建社会所加于妇女的束缚，并从对男人的依赖、等待别人的帮助以及贪图享受等等落后传统意识的影响下解放出来。(20)

朱德对城市的生产和政策执行情况极为重视。五月中旬，他参加在北平香山召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和刘少奇、陈云等一起讨论了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还讨论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经济组织机构的设置等问题。五月十七日，他接见华北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时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巨大历史任务，必须很好地掌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建立新的劳动态度，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21)

五月二十日，朱德复电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强调要组织劳资双方共同努力发展生产，电报中说：“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到城市，但各地在执行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上，曾经发生过并继续存在着若干偏向。偏向的表现有‘左’的，也有右的，有的地方甚至‘左’右两种偏向同时存在。”他分析了这两个偏向的种种具体表现后说：

“我在铁道部运输会议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在劳资关系上，主张两方面都要顾到，既不要‘左’，也不要右。既要照顾到工人生活，也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自然，我们所说的双方照顾是有重点有立场的，是依靠工人阶级，是从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争取团结工商业资本家。”“只有广大工人群众与正当的私营工商业资本家都动员起来了，才能恢复与发展生产。”(22)

六月初，朱德在聂荣臻陪同下，先后到秦皇岛市、唐山市和天津市视察，了解这些地方的城市接管工作和生产恢复情况。他深入到一些工厂、机关、学校，同工人、干部、职员、师生座谈，还在天津解放后首届工程师节纪念大会上讲话，勉励工程技术人员加强团结，把一切技术贡献给人民自己的国家，号召他们和工人密切合作，发挥工人的力量和才干，把建设事业办好。

六月下旬，他逐个听取了北平市关于电车公司、汽车公司、门头沟煤矿、清河制呢厂，以及玻璃厂、制药厂、造市厂等厂矿情况的汇报。

七月一日，朱德参加北平各界庆贺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盛会。他在会上兴奋地说：“二十八年来，我们的党经过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终于到今天取得了中国革命基本的胜利。”“不久，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中央政府就要宣告成立了。中国人民五千年历史的新的一页，不久就要正式开始了。”他指出，新的更伟大、更艰苦、更复杂的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当在伟大经济建设中，把我们的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只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我们民族的独立才有基础，我们人民的生活幸福才有保障。因此，经济建设就成了全国胜利以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23)

当天下午，他来到北平西郊的石景山钢铁厂，出席这个厂庆祝全面开工的大会。他走进到处是荒草乱石的厂区，登上用木板临时搭成的台子。向热烈欢呼着的钢铁工人招手致意，高声祝贺他们以主人翁精神用很短的时间取得了开工生产的胜利，他说：“过去我们打仗，走南闯北，打起背包就出发，不能不打烂一些坛坛罐罐。现在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国家了，搞建设就象建家务，就要搞起大量的坛坛罐罐。这就要迅速清除敌人造成的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你们多炼一吨铁，就是给我们国家增加一份家当，革命的家当是越多越好。”他还对驻厂的几位军代表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我们都是打仗的，懂得放枪放炮，不懂得炼铁炼钢；现在要搞建设，不懂怎么成呢？国内外的敌人看着我们，他们算定我们搞不成。怎么办呢？就要学习，向老工人学习，向技术人员学习，拜他们为师，老老实实地学，恭恭敬敬地学，只要钻进去，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你们就能变成搞钢铁的行家。”(24)

当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时候，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正在北平顺利地进行着。

六月中旬，朱德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开幕式上，他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预祝会议成功，并满怀激情地说：

“中国的历史，从此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全国人民都感到万分地兴奋和愉快！”“现在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了，在这些条件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残余的敌人现虽然还在继续勾结帝国主义企图继续挣扎，但是他们的最后全部消灭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忠实的支持者，而在现在它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现在，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建立，人民解放军将成为这个人民的政府的坚定不移的柱石。”(25)

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的常务委员。

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九月下旬，朱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二十四日，他在大会上发言，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宣布：

“我们一致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愿意坚决服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并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完全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26)

在三十日的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同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胜利闭幕，朱德致闭幕词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全体代表始终团结一致、和衷共济。

这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气象。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地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27)

十月一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命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新中国的成立，引起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极大关注。建国前夕，朱德在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文章《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文章强调，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胜利，是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而逐步取得的。

“约在二十一年前，即一九二八年初，中国人民在弥漫全国的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建立小块的革命根据地，作为保护革命力量反对反革命力量的战略出发点。由夺取小块农村到夺取大块农村；由夺取几个分散的根据地以至许多的根据地，到把几块分散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根据地；由夺取乡村以及在可能条件之下包括小城市中等城市的根据地，到夺取在可能的条件之下包括大城市的根据地；由夺取小部分中国到夺取大部分中国；由夺取大部分中国到夺取全中国。这就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的整个革命战略计划，同时也就是我们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二十二年来所经过的具体道路。”

他论述了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共产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指出：

“这个武装斗争，不能够是孤立的单纯的军事斗争。这个武装斗争是建筑在坚固的工农联盟基础之上，同时联合其他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这个武装斗争是密切地同农民的土地革命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拥护农民土地革命，就不可能组织这样的武装斗争；同时，如果无产阶级在农村当中不能够恰当地和农民及其他可能联合的力量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政策上来取过‘左’的冒险主义，也就不可能引导这个武装斗争到胜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不只可能进行巩固的工农联盟，而且还可能与广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同盟，而在可能的条件下，还需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或者中立它。不但如此，我们还需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利用帝国主义在中国相互间的矛盾，利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的矛盾，以便利中国人民的斗争。”“这样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必须很正确地把自己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广泛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才能领导这个武装斗争，并使之得到胜利。”

“但要领导武装斗争，要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能够把二者很正确地结合起来，这就需要一个坚强的共产党的领导。”

文章最后说，毛泽东总结出来的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经验：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是浓靠这三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去取得胜利的(28)。

朱德从青年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他将满六十二岁的时候成为生活中的现实。{ewc MVIMAGE,MVIMAGE,!09100020_0617_1.bmp}

三十九、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在二十八响礼炮声中，作为新中国象征的五垦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首都北京市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集会，隆重庆祝新中国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

朱德在开国大典上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由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然后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他那宏亮的声音在整个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着：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这个重大课题立刻被突出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防是国家独立自主的武力保障。要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要不受别国的欺负，没有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是不行的。

新中国成立的六天前，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曾庄严地宣告：

“共同纲领又要求人民军队应当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继续加强，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建设空军和海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我今天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坚决地这样做，一定要建立一支统一的、现代化的、政治上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充分有效地保卫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朱德这个讲话，明确地把现代化作为建国后军队建设的总任务和总目标提出来，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

相隔不到一个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十月十九日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贺龙等为委员，由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十月二十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中南、西南进军和军队建设问题。朱德强调：“建立强大的国防军，是我们面前迫不及待的任务。”并说：“我们部队在阶级消灭之前，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军队近代化的科学知识，学习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方法和技术。”

一九五一年初，朱德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个报告。报告中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了大陆上的战斗（除西藏外），现正收编整理中。”

他提出要迅速建立海军、空军、工程兵和铁道兵，并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全军从精简整编、组建新军种、发展军工生产、建立军事院校、进行文化教育和战术技术训练、制定条令和条例等七个方面开展工作，以加速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他对许多重大措施，提出了具体建议。

正如杨尚昆所说：“建国后，朱德同志年事已高，但他仍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辛勤操劳。他参与领导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关心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注重军事院校建设和部队训练工作。”

实现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必须建立起科学的统一的编制体制。一九五一年四月，朱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的问题。当时，人民解放军总人数已达五百五十万人。由于全国解放战争已近尾声，全国形势稳定，没有必要再以大量的军费来维持庞大的军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大规模整编，全军的总人数压缩到四百万人，撤销在解放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四个野战军和兵团的番号。

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参谋工作会议。朱德在会议开幕时到会讲话。他强调军队要实行统一编制并很好地整顿，提高部队战斗力，使它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这次会议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全国设立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东北、华北六个大军区。军、师、团、营、连实行三三制（即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每团三个营……）。步兵师的总人数一律编为一万人左右，并统一武器装备和火炮、机枪的配备。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工作。这是建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精简整编。

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联合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一年度的复员工作决定》，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除台湾和西藏待解放外，人民解放军将从战争状态转入正规建军的新时期；还必须复员一部分人员，去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以帮助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此，中央决定复员武装人员一百四十万人。

但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紧接着，美国又下令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公然干涉我国内政，还派飞机不断侵入我国领空、领海。根据国际形势中发生的这个突然变化，为了防备美军扩大侵略战争，中共中央军委在七月七日召开国防军事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朱德、聂荣臻、罗荣桓、林彪等出席，初步商定组建东北边防军。这个方案得到毛泽东等的同意。七月十三日，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下辖第十三兵团和炮兵三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约二十五万五千人，驻扎在邻近中朝边境的地区，捍卫祖国的边疆。

八月二十三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军委的会议，再次讨论东北边防军工作问题。九月五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在认真分析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后，提出：“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作长期打算。我们除整顿陆军外，应抓紧建设空军、海军以及装甲兵、工兵、炮兵、铁道兵等特种兵。现存的陆军除整编以外，大部分可转为新式兵种。”

局势的发展越来越紧急了。当美军向北推进到三八线地区时，周恩来在北京发表讲话指出：中国人民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十月初，美国不顾中国的警告，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面对这种严重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会议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十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

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十月十九日黄昏，志愿军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

朱德对赴朝参战部队极为关心。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遇到重大的战斗行动时，他经常亲自向部队作动员。这次也是一样。十月二十九日，他到山东曲阜看望即将赴朝参战的第九兵团，向第九兵团的干部作报告说：美帝国主义不顾我们警告，越过三八线，直趋我国边境，还有侵略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保卫祖国，支援友邻，我们肩负着光荣职责。我们有世界民主阵营的支持，一定能胜利。

当第十九兵团准备赴朝参战、从西安到达山东兖州后，军委通知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到北京。杨得志回忆道：

“在中南海，朱总听过我们汇报后，又详细询问了部队集结的各种情况，从武器装备到思想动态，从部队纪律到生活管理，都一一问到了。他对着朝鲜的地图，向我们讲了彭总率领先期入朝部队的情况，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我和志民同志只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请朱总到山东兖州去参加兵团即将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象打石家庄时那样给我们作指示。我们回部队不到一周，朱总就赶到了兖州。十二月下旬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他一到就和兵团领导交谈，了解会议准备的情况。会议开始前，他要到连队看看战士，我们和医生都说天气太冷，部队住处分散，建议他在有木炭火的房间里分批接见一些指战员的代表。他笑着说：‘毛主席要我到十九兵团来，可不是只来看看杨得志、李志民你们几个人啊！’就这样，他冒着冷风，看望了几个步

兵和炮兵连队。由于疲劳和天冷，朱总感冒了，而且发烧、咳嗽。即使这样，他还是带着病给我们十九兵团团以上干部作了报告。他讲抗美援朝的意义，我们兵团的任务，指出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求干部和战士一起摆出困难，找出解决的办法，做到和敌人交手时有胜利的把握。讲完话之后，他还在寒风中与大家合影留念。临离开部队时，他送给师以上干部每人一本刘伯承同志翻译的《兵团战术概述》，并在每本书上亲笔题字。”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原定的军队复员人数不得不大大缩减，在一九五二年只复员了二十五万人。但部队精简整编仍在继续进行。

一九五二年一月，朝鲜战场出现了有可能实现停战的形势，国内剿匪等任务也已获得显著成效。中央军委决定继续压缩军队总人数，主要是裁减陆军，而海军、空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部队的员额有了增加，军队院校有所加强，从而为实现军队现代化打下了重要基础。

朝鲜战争实现停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十二人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认真讨论了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三大制度；将六个大军区改为十二个大军区；对公安部队进行整编；还讨论了部队军事训练与干部军事学习等问题。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毛泽东主席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分别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接

着，毛泽东主席又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参加中国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是德高望重的元戎，但他一向谦虚谨慎，从不居功。他曾说：“目前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而在我们党方面则应该首先归在毛泽东同志身上。试想想，在将近三十年与反革命敌人残酷的斗争中，不知有多少先烈付出了他们的鲜血和头颅，如果没有他们的英勇牺牲、前仆后继的英雄行为，那我们要取得胜利是很难想象的。在我们党方面，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不断地纠正了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就不能使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得到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发展，则胜利的获得也同样地是很难想象的。”“解放军打了很大的胜仗，很多人说是我的功劳，我就知道他们把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说的。我个人应当认识，解放军的胜利是全体同志的功劳，我不应该夸大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我的能力有限，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大的荣誉呢？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面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11）

现代战争是前后方浑然一体的立体战争，是诸军兵种一致行动的联合作战。为了实现军队现代化，必须改变单一步兵的状况，建立并发展各军兵种，向合成方向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过去基本上是单一的步兵类型的部队。在三年解放战争中，由于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了一批新式的重型武器，才初步建立起炮兵、装甲兵和工兵部队，但它们的数量和质量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为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的军兵种，朱德曾为此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张爱萍回忆说：

“为了尽快使我军编制和战斗编成达到合成化，朱德同志亲自抓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先后从陆军中抽调大批骨干充实到这些部队，以欣喜的心情看待这些具有强大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的新军兵种的诞生。他在各军兵种所作的许多重要指示中，一再指出这是把我军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历史性变革，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大事。在此后的年月里，朱德同志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仍一直关心着各军兵种的建设和部队合成作战能力的提高。”（12）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建立的新军种是空军。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各大军区也陆续成立航空处，以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军区空军领导机构。

接着，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构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后来，相继建立了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

同年八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关成立，陈锡联任司令员。

也在这一天，铁道兵团进行整编，滕代远兼任司令员。一九五〇年三月九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部成立，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构成立，许光达任司令员。

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领导机构成立，周士第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治委员。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人民解放军大体上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各个新的军兵种相继创立的过程中，朱德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他明确地把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学习现代战争的作战方法，作为军队建设的一个战略转变。他在各军区、军兵种领导人集训会上说：“二十多年的战争过程，军队建设和作战方式上几经转变，即游击战——运动战——攻坚战——现代化战争。现在的转变，是在新的经济基础上的转变，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学习。”（13）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同时在北京开幕。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庆功大会。朱德在会上说：

“只有建设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坚决地反对国内外的反革命战争，才能确保民族的自由、人民的和平与幸福。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已经获得的胜利果实，才能保卫正进行的和平建设。”（14）

这支现代化的国防军应该具有怎样的要求？朱德认为：

“这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在政治上，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必须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军事上，必须通晓与掌握联合兵种作战的指挥及兵种学术，并有坚强的后方勤务工作。这支国防军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计划性和准确性；必须有正规的生活秩序及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总之，必须有高度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15）

朱德对具有强大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的新军兵种的创立十分关心。他接连出席各军兵种的重要会议，分别提出各军兵种建立后的工作原则和方针，号召全军努力学习新的军事技术。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央军委军事训练部召开各兵种司令员、参谋长及各军区参谋长、军训处长集训会议，朱德到会讲话。他叮嘱道：

“我们建立了海军、空军和坦克部队、工兵部队、防空部队和铁道兵部队以及大量的炮兵部队，有了这样复杂的军兵种和大量使用复杂的战斗器材，这就是现代化的标志。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武器，是世界上较好的武器，有的是相当先进的。由于各军兵种的武器及战斗器材复杂，为了能掌握技术和学会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就必须有正规、统一的训练计划。”“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所进行的战争，从各方面来说，都和过去不同了。如果不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那末就是有现代的装备，也不能达到真正的现代化。”（16）

几天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阅兵式上，朱德发布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要“毫不满足地认真学习，熟练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本领，提高现代化军事科学和指挥艺术的水平，加强各种工作的计划性、组织性和准确性，巩固和提高军事纪律，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17）

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空军的就没有制空权。朱德认为，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必然遭受侵略。他

大声疾呼：“建设空军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不管家务大小，困难多少，我们非好好办不可。”他向广大空军官兵发出号召：“建成一支完全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这支空军，要在我们所有的领海和领空上初步取得制空权，能够击退任何侵略者的进攻。空军里的每一个人员，都要清楚地了解这个任务，并想种种办法，尽一切可能去完成这个任务。”(18)

朱德对空军建设十分关心。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的高厚良回忆说：“朱德同志曾在百忙之中抽出身来，出席空军召开的一些业务会议，参加空军航校开学、毕业典礼，参观空军的飞行表演和教学展览，利用一切机会直接给部队指战员做思想工作，勉励大家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加强训练，努力掌握技术，按照毛泽东思想加速建设起一支新式的人民空军。他对空军的建设，大到建军路线，小到伙食改善，都有详尽的指示。我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开飞典礼，就是朱德同志和邓颖超同志亲自主持的。一九五一年，当我们部队飞赴朝鲜战场前夕，朱德同志顶风冒雪，到前线机场检阅部队，勉励指战员们要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19)

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和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朱德提出要精心研究科学技术，“建成一支完全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他指出：

“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不能完成任务。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钟一秒钟的事情。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为敌人所打败。因此，所有的人员都应当学会技术。”(20)“目前对你们最大的要求，就是要很好地把队伍训练和组织起来，精心研究科学技术，并好好地掌握它，使我们一出马就能打胜仗，收复沿海诸岛，光荣地完成彻底解放全国的伟大任务，并为建设新中国的强大空军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21)

他还经常去视察空军部队和机场设施，参加航校的开学和毕业典礼，参观飞行表演和教学展览。

对人民海军的建设，朱德同样十分关心。海军刚刚组建时，他对从陆军中调来的指战员说：“要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建设一支人民的海军。”他不辞辛劳地视察了海军的码头、舰艇、学校和修理所等。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三日，朱德给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等写了一封信。萧劲光回忆道：“几天以后，我又专门去向他请示过一次工作。我先向他汇报了我们的拟制三年建设计划的初步设想，他听了很高兴，还作了不少重要指示。他说：‘应该利用现有的时机和兵力，首先把沿海海岸各要地及岛屿的防御工事、防御设备建立起来，把各基地组织起来。这一任务应成为当前的工作任务，且应成为首要任务之一。’‘不能单从打台湾打算，而忘记了海军的基本建设。’他再一次提醒我们注意解决燃料问题。他给我们出主意，说：‘给军委打个报告，要求重工业部注意发展燃料工业。’他强调‘中国地方宝贵，寸土都要保护’海军的‘防卫在海上’。他提醒我们‘招兵要注意招水性熟悉的人’，海司要‘在海上建立生产，建立家务，等等。”(22)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朱德参加在青岛召开的海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海军是防内不防外，封建势力的海军，蒋介石的海军都是这样。我们建立海军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任务很重。我们的海岸线很长，要保卫海防，首先要靠海军。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仅两年时间，我们的海军就建立起来了。目前这支海军的力量虽然还不够强大，但它是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建立的。我们强大的陆军曾经过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相信，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中国人民也必将拥有一支强大的和陆军同样英勇善战的海军部队。”(23)

他对海军的建设，从政治工作到技术训练，从开办学校到建设军港，从海岸炮兵到鱼雷快艇等等，都有许多具体指示。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他就海军建设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加强海军的防卫力量，建议批准海军领导提出的以空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建立海军航空兵。在毛泽东、朱德的关怀下，海军航空兵得到迅速发展。一九五三年九月，朱德到大连海军学校视察，“检阅了全校师生员工，会见了苏联专家，听取了学校建设情况的汇报，观看了教学设备，还为学校题词，勉励大家‘努力掌握现代海军作战技术’。”(24)直到一九七四年朱德八十八岁高龄时，他还登上军舰出海检阅北海舰队，他看到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奋斗，人民海军已初步进入现代化的行列时，非常高兴，写下“增强革命团结，加速人民海军建设”的题词，勉励海军官兵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继续奋斗。

朱德也十分重视装甲兵的建设。他在装甲兵干部集训会议上说：“装甲兵是我军的一个新兵种，它的主要装备是坦克。现在的坦克兵是从步兵、炮兵调来的，对坦克技术还不熟悉。从司令员到每个干部、战士都应该把坦克技术摸熟。要建设好装甲兵这一新的兵种，技术具有决定的作用。政治工作要保证技术的提高。军事任务要靠技术来完成。”他还指出：“今后的战争是诸兵种的联合作战，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发挥坦克兵的作用。它是有掩护的炮兵，是陆军中的骨干。要破坏敌人的碉堡，要追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要靠掌握技术、发挥坦克的威力。”他殷切地希望装甲兵能尽快地掌握技术，说：“坦克兵的任务就是要很快消灭敌人，现在就要加紧学习技术，能熟练到什么程度就要熟练到什么程度，保证在敌人来时坦克能开得动、打得准，不然问题就大了。”(25)

朱德对炮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的建设也都倾注了不少心血。他说：“有人说过炮是‘战争之神’，这话是有道理的。现代战争仍然要重视炮的使用。”(26)他向工程兵部队提出“建设一支能掌握现代化技术的建筑工程队伍。”(27)他认为铁道兵不论平时还是战时都十分重要，他说：“铁道兵是我军的技术兵种，是现代化国防军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你们的技术要学得很好，本领要练得很大，平时积极参加祖国铁路建设，战时担负起抢修任务，保证军事运输。在现代化战争中，没有铁道的支援，就不能很快地把部队运到前线去，就难以使用大兵团作战。所以你们的任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都是艰巨的、光荣的。”(28)

实现军队现代化，离不开人和物的结合。朱德从一生的军事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在战争中，人与物相比较，起主导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物。对现代化的军队来说，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是重要的物质基础，而更重要的是人，首先要把人“现代化”起来。所以，他始终把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放在军队现代化的首位。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召开的各兵种司令员、参谋长及各军区参谋长、军训处长集训会议上，他指出：“今后的战争，将使用大量的军事技术与战斗器材，并有大量的人员参加作战，如果不能掌握复杂的武器技术和学会诸兵种的联合作战，就不能战胜敌人。”(29)

朱德特别重视干部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张爱萍回忆说：“朱德同志对这一带战略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没有一支政治觉悟高，军事素质好，专业能力强的干部队伍，军队现代化是化不起来的。他要求各部队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加强对各级指挥员的培养。”(30)

一九五四年三月，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了以朱德为主席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对学员进行考核。朱德在对学员的讲话中着重提出：

“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有德有才，也就是必须忠心耿耿地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而服务，努力学习，使自己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有现代化军事科学知识和为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所必须的文化水平，并能掌握业务，富有革命事业心。”(31)

朱德认为要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就必须有文化科学知识。二十天后，他在铁道兵第三次庆功大会上说：“要学习文化，技术兵种的指战员没有文化是不行的。”(32)一九五一年元旦，他曾在军委举行的同乐会上发出“学习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以加速部队的现代化建设”的号召。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解放军成员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很低的，文盲和半文盲数量很大。因此，全军上下把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作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来抓，很快形成学文化的热潮。到一九五三年，全军基本上消除了文盲和半文盲，战士们普遍达到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这对军队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培养一大批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的优秀指挥员，朱德特别重视建立各种类型的军事院校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他在全国第二次军校工作会议上强调地提出：“建设正规化的学校，培养训练干部，是我们国家当前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33)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学习内容、对学员的要求等，朱德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他指出，院校应首先明确自己在国防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正规院校应有统一的训练计划和制度；应有完善的设备和良好的教材；学习要有较长的时间保证；学员从入学、升级到毕业，都应有严格的国家考试；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不能丢掉我军光荣传统；要认真研究作战对象的特点，吸收抗美援朝的作战经验。

军事院校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到一九五七年已先后建立一百多所包括各个军兵种的院校，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先后培养了二十多万干部，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国防现代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发展军工生产，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朱德对国防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历来特别关心。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把发展军工生产，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部队，当作国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从红军到解放军都是“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武器装备的来源，主要取之于敌。那时，解放区虽然也有一些兵工厂，但规模很小，技术落后，生产能力也低。建国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要同世界上头号工业大国美国的军队较量，需要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国内原有的兵工厂虽然大力增产，仍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中国政府在一九五一年五月派出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并购买了一批武器装备。

但是，解放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何在？朱德认为：现代化是买不来的，也是买不起的。我们的国家底子薄，连年战争，百废待兴，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实现现代化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办法，靠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双手去发展军工生产。变过去的“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为现在的“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他给萧劲光、王宏坤、刘道生、罗舜初写信说：“海军和飞机是近代化的兵种最高的必需的，要加强这两个兵种，就必须有造船厂、飞机厂。有了这两种工厂，能制造还不够，必须要有石油厂，才能强化起来。”(34)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四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对制造坦克和发展汽油工业应该抓紧，并建议把它们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他就一九五二年工业生产计划致函李富春时，又提出要利用已有的工厂、机器、充分发挥现有工程技术人员、熟练工人的作用，发展兵工事业，并把海军的造船、修船包括在内。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原有的兵工厂进行了技术改造，并新建一批占全国重点成套项目百分之三十的重点工程。先后扩建了七十四个规模较大的飞机、火炮、坦克、弹药、雷达、指挥仪、通信设备和电子元件等工厂，参照苏联的技术资料，先后仿制成各式武器，火炮、通信器材、工程机械、防化器材和各种弹药等。同时，加快飞机和舰艇的制造。到一九五四年，全国军工厂共试制成功二十三种武器，并正式投入生产。

进入六十年代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步入以自行设计、自行制造为主的新阶段。从仿造到自己设计生产，实现武器装备国产化，这对军工生产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飞跃，使国防工业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朱德还比较早地重视发展尖端武器的问题。他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给中共中央的访问苏、波、捷、德、匈、罗、蒙七国报告中提出：现在世界已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国务院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务院体制的会议上，他提出要发展尖端武器、搞原子弹和导弹的主张。这个主张，当时得到周恩来的肯定，他说：“朱老总讲得好。你有了两弹（原子弹、导弹）人家对你就不同了。这对科学技术有好处，尖端和基础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九六〇年十月，朱德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的军队一定要下决心用尖端技术武装自己。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装好，再加上先进的装备，那就会成为天下无事的军队。这样就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侵略我们。”(35)

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直接关怀下，我国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自力更生地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成功地爆炸了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原子弹，标志着新中国的国防工业真正跨入了现代化的行列。

对国防工业，朱德从一开始就倡导要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就提出过军工生产要统一领导，兵工要带动民用工业。(36)朝鲜战争停战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在这种情况下，朱德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说：“国际形势看来，十年八年打不起来。”因而，在工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他认为“一开始就搞和平工业。光搞兵工恐怕有问题。”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时，他提出了“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为辅。国防工业建设应和民用工业结合”（37）的主张。

一九五七年，朱德视察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辽宁等地，发现许多国防工业的工厂，军工生产任务不足，多余的生产力没有发挥出来，造成很大浪费；而民用工业又急需新建同类型的工厂。他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正确办法，是国防工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他同薄一波、黄敬等分管经济和国防工业生产的领导人谈话时不只一次他讲过“军工要剪为和平工业”，“军工要搞民用产品”。并先后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过七八份报告。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他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这次看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重庆、成都、云南、广州等地存在着，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一般说来，兵工厂的特点是投资大、厂房好、职工多、设备新、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大。这些厂去年就吃不饱，今年情况较去年更为严重。

现在有些厂就到处揽活自寻门路，有些厂还没有想到办法，只得让一部分设备和人员闲着。长此下去，损失很大。看来兵工生产在和平时期兼产一些民用物品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及早解决，否则损失更大。”（38）

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方案。一个是把当时管兵工生产的二机部同管民用生产的一机部、电机部合并，平时多生产民用产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产品；另一个是把管兵工生产的二机部缩小，专搞原子武器的研制，其余的生产能力分出来，转向民用生产。国防工业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实践证明：朱德一向倡导的国防工业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是正确的。

现代化的战争离不开现代化的后勤保障。朱德及时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后勤工作的主张。一九五五年十月五日，他在全军各大军区后勤部长会议上指出：“后勤是平时准备，战时应用。能否打胜仗，后勤起一半作用。”“我们将来是打大仗，故后勤工作要以现代化战争着眼进行准备，后勤工作很要紧。”“我们争取尽快地建设好现代化的军队，后勤工作的任务很大。首先是陆军，要把它装备成新军队。再者是空军，现在已经有了，应当把飞机配起来，同时还要解决一连串的问题。”（39）他为后勤学院题词：“建立现代化的后方勤务工作，是巩固国防，保卫我们伟大祖国最重要的工作。”（40）他要求后勤部门工作必须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好好学习新的业务知识，改进自己的工作，再不能只靠过去的老经验了。并为《后勤通讯》题词：“发扬后勤工作的创造性与毅力，向正规化的后勤建设而迈进！”（41）同时，他还再三叮嘱从事后勤工作的干部：军队的后勤工作要照顾大局，要根据国防经费办事。要建立强有力的财政监督制度，大公小公要划清，用款要有规定，要注意节约。

朱德清醒地看到：现代战争是使用大量的现代化武器的战争。他再三强调，为了搞好现代化的后勤，平时就要做好准备。“若做不好，打了败仗你们负责，打了胜仗你们有半个功。”（42）

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并且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迈出了新的步伐。

四十、党的第一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为领导全国的执政党。党的队伍面临着新的考验：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已关系到党能不能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因此，就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工作，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党在成为执政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坚持执行党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朱德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立即主持创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一批优秀干部从事这一工作。他要求中纪委定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在很短时间内，中央及各地中央局，省、市、地委的纪委机构都相继建立起来，开始受理有关违纪案件。一九五〇年三月九日，朱德向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主席书面报告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检机构建立和初期开展工作的情况，并概述了目前党的队伍存在的一些亟待纠正的问题。

当时，党的建设面对的情况是：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随着全国性胜利的到来，党员由三百多万人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以上。广大党员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是很高的。但是，也存在两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少数党员在革命胜利后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另一个是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不少违犯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行为。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着重整顿党的干部的整风学习。

根据中央的这个决定，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朱德首先阐述了纪律的重要和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党的二十八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象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他特别强调，由于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如果有一部分甚至即使是很少数的党员有不好的言行，那就会破坏党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因此，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在今天就更有特殊重大的意义。”

他尖锐地指出目前党内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情况中几个比较突出的表现：第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第二，官僚主义的作风进厂步滋长起来；第三，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在某些党员干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第四，贪污腐化的行为比过去增多了。

为什么这些现象在这个时候增多起来？朱德分析它的原因，在客观上，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容易使一些革命意志不够坚强的党员干部产生政

治麻痹、思想松懈、骄傲自大等许多坏东西；另一方面，是由于周围环境的包围与影响。他指出：由社会遗留下来的恶劣思想、作风和风俗习惯等等“这些根深蒂固的坏东西，不但在目前，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可以通过各个方面来不断地影响、侵袭和腐蚀我们。”而在主观上，是由于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为此，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经常抓紧纪律检查工作，并同发扬党内外的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群众监督相结合；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同执行纪律相结合，对那些党曾告诫在先而仍违反政策和纪律以及犯了错误仍拒不改正的党员，必须给予应有的纪律处分。

朱德认为，纪律检查工作要特别重视怎样保证党的路线、政策能够顺利执行，怎样克服一切破坏党的路线、政策的行为和倾向。“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中有没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有无违犯国家法律和法令、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如果有，就应很好地制止，使之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就应很好地预防，使这些坏的东西不能产生出来。”

朱德提出“检查和处理案件要本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要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处理问题一定要有根据，要把工作做细，弄清是非和轻重，防止因错误处分而伤害同志。他一直主张：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以执行纪律为辅。

朱德强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党的纪律只是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还有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法律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这些“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要求从事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认清是非，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有些案件要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教育全党和人民。

根据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朱德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抓住一些典型事件及时处理，以教育全党。他还常常过问中纪委负责处理的重大案件，并按时间向中央报告工作。

建国初期，有些地方的党员干部在进行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减租、土改等项工作中，往往为了单纯完成任务而强迫命令、作风蛮横，发生不少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情况，引起群众的不满。如，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一个通报中反映：浙江省萧山县有两个区多山产竹，耕地极少，大部群众以造纸为业。但当地工作却忽视这一地区特点，有的村在划阶级时将槽户主划为地、富，工人划为贫雇农，劳力强，工资收入多的工人划为中农；在反霸时斗争了槽户主，而在征粮时又对没有田的手工业者派粮，无粮可缴的只好抛售土纸，使纸价暴跌，形成绝大多数槽户倒闭，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竹山荒毁殆尽。

朱德对这个通报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立即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通报和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指出：

“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二年一月，朱德又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一起利用职权、压制民主、诬陷好人、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一九五一年九月间，武汉市医务部门曾有人匿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官僚主义、工作失职（拒绝接收南下大军的急症病伤员，致使个别病伤员失治而死）等错误，中央要求武汉市委负责处理，武汉市政府将来信转给卫生局党组织查处。宋瑛见信后，却认为写信人是“动机不纯，有意破坏”，臆测这封匿名信是市属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纪凯夫等三人所写，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市政府党组和副市长周季方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在这个期间，第二医院一九五一年四月发生一起盗窃保险柜公款的案件，周季方、宋瑛等又蓄意嫁祸纪凯夫，命令公安局将纪逮捕，长期拘押逼供，并逮捕配制盗款所用钥匙的铜匠，逼使铜匠隐瞒真相诬陷好人。至此，他们还没有罢手，进而将盗窃案说成是“政治阴谋”，捏造证据诬陷纪凯夫是“特务”，并对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些党和干部进行压制打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了解真实情况后，都对此事提出不同意见，《人民日报》还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于“党的生活”专栏公开批评宋瑛、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错误，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干预下，一九五一年十月间，以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首，包括十一个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样一个明显简单的事件，竟弄得如此复杂，久不得决，是由于周季方、宋瑛等人宗派主义和极端恶劣的思想品质以及武汉市委负责同志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严重，不仅是诬陷了纪凯夫，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错误，竟发生在武汉市的领导机关，而领导人直到现在尚不觉悟，故有向您报告的必要。”二月三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中南局严肃处理周季方、宋瑛的意见。

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共中央中南局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并发表社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亲自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并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坚决保护人民检举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所犯错误的民主权利的。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

中共中央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后，朱德立即指导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紧张地投入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展开办案定案工作。运动开始不久，即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开展运动的情况，并说：这次运动把过去整不到、整不掉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丰富了整党的内容。经过这场运动，不仅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刷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污毒，而更要充实和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发扬民主作风，改善党群关系、上下关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思想水平，保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

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在新的形势下 643 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见。他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反对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加强党的纪律性，巩固党的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和获得一定的成绩，但纪检工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主要是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不够重视，没有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工作，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和委员一般均系兼职，无暇顾及或很少顾及纪律检查工作，加以办事机关还很不健全，专职干部的配备迄今不足半数，这样对重大案件的检查，困难就更多。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朱德提出三点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委应给予及时的指示，在检查处理案件时，党委应给予纪检干部以有力的支持。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毛泽东对朱德这个报告十分重视，在第二天就批示：“同意这样作，请安子文同志根据此项意见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简单的指示（不要太长）。”

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规定：第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在检查和处理案件时，党委应予纪律检查工作干部以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第二、要选调和提拔一批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到纪律检查部门工作，应该健全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第三、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可酌情实行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加强联系，做好工作(11)。二月初，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全党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标准八个问题的教育，并分期分批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重新登记，这项工作到一九五四年春基本结束，有三十二万八千余人被开除党籍或被劝告退党，与此同时，接收新党员一百多万人，全国党员人数从一九五一年底的五百八十余万人发展到六百三十六万余人，新建立党的支部八万二千多个。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朱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说：“三反”运动开展以来，有效地揭露了党员干部中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根据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六月初的报告，揭发出的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中，党员占百分之十六点五，其中将有二万人左右被开除党籍。报告说：“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有领导的、发动群众的、全体规模的、有系统的纪律大检查运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验，证明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受到了应得的处分。

报告还指出，运动暴露出我们在纪律检查工作和干部工作中存在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第一、过去有些党的组织发现了党员干部有违犯党纪的错误，不是正面地及时地提到原则高度予以批评纠正，而是采取旁敲侧击、轻描淡写的方法去对待他们，或片面地从所谓照顾干部的历史、情绪等出发，不敢或不愿正面提出批评；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不宜继续担任原来工作的高级干部，没有坚决地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使党纪松弛，党内各

种错误倾向更加发展。第二、有些党组织平时对干部的了解很差，不听群众的反映，一些坏干部就以一种极不正派的手法骗取信任、以达到个人的目的。第三、有些部门用人单纯强调技术，忽视政治，放松了党的领导和党内的思想斗争，失去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造成了干部中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形。第四、在处理党员违犯党纪的案件中有两种偏向：一是不够严肃，有怜悯、姑息观点；二是简单化，不慎重。第五、有些党员干部对国家的法律、法令，对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不重视、不研究，常常不自觉地犯错误。

报告提出，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健全党内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党组织要对党员进行遵纪守法的教育，使党员养成奉公守法的习惯。(12)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13)转发到省、军级以上各级党委。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反”运动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发生过一些过火的行为。在运动收尾阶段，朱德根据中央意见指导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定案处理和复查工作。到一九五三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进行了重点复查，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过火行为和处理中的偏差作了严肃的纠正。朱德将这一工作情况，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写了报告。

一九五三年，国家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建设。中共中央也在这一年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朱德对党的这条总路线由衷拥护，并提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保证总路线的顺利执行，防止并克服一切破坏总路线的行为或倾向。

这年十一月，朱德主持召开第二次党的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十一日，他在会上作了《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阐述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义和四项基本任务：第一、保护生产，保证国家计划的切实执行。要通过党纪教育和重要案件的处理，使党的发展生产的政策正确地执行，使国家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顺利地实现。第二、防止并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腐蚀，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要从思想上，组织上两方面来巩固和纯洁党的队伍，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第三、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党只有在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监督的条件下，才是强有力的，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阻力，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14)他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关心群众的利益，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坚决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坚决反对违法乱纪的行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注意检查和纠正党员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认真处理对党员干部的检举、控告、申诉案件，切实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以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使我们党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取得广大群众的真诚拥护，坚强地立于不败之地。第四、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朱德认为，这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为此，要坚决反对分散主义，防止党的个别组织和党员向党闹独立性，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发生，同时，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一九五三年底起，中共中央内部开展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在全国胜利后不久，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中出现这样严重的斗争，这是朱德原来没有想到的，他后来说：“直到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我才认识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面目，认识了反对高饶斗争的严重意义，并坚决地拥

护这一斗争。”(15)他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说：

党内要大大提倡团结。历史一再证明，当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团结一致的时候，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能充分地得到发挥，革命事业就大大地向前发展；反之，党的

政治领导作用就削弱，革命事业的发展就受到损失，受到挫折，以至于失败。我们应当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指示下，提高阶级觉悟，清除那些不健康的现象，增强党的团结(16)。

朱德认为，目前不利于党内团结的就是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计较个人的地位荣誉，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以功臣自居，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接受人批评监督，甚至产生一种极端危险的思想，认为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政权是军队建立的。这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如果不受到坚决制止，任其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可能走到破坏党的团结的地步，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害。为了肃清高岗散布的“军党论”的错误影响，朱德多次在军队干部中讲话，强调，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17)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朱德再次作了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发言，要求全党同志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朱德出席了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他指出：目前的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十分有利的。只要我们党能够保证正确领导而不犯重大的错误，只要我们党能够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就一定能够团结六亿人民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他说：我们只要能够在新的情况下，正确运用我们三十五年来所获得的丰富的建党经验，就能够防止发生严重的错误，就能够及时地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使小错误不致变成大错误，使暂时的错误不致变成长期的错误，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党的统一和团结(18)。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朱德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前后共五年七个月时间。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改成监察委员会，由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朱德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五月六日，他在会上讲话，对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作了总结，对新建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殷切的希望。

在这以往的五年多时间里，朱德主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些时间内处理了近三十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曾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王从吾回忆说：“朱德同志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在全国解放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和各级纪

律检查委员会对违犯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方面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19)

作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身体力行，为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表率。

他多次尖锐地批评一些党员干部居功自傲。他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举世皆知的，他却总是谦虚谨慎，把功劳归于人民，归于党，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看作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解放初，他家乡四川仪陇的乡亲中有几十人串连起来，背着柴禾，带着米袋，走出大巴山，经过南充，乘木船沿嘉陵江到了重庆，要上北京。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告诉重庆的负责干部：要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劳动生产，一个也不要来；他们中要求参加工作的，也要根据党的政策，量才录用。贺龙替朱德接待了这批乡亲，派人陪他们在重庆游览后仍送返家园。一九五一年朱德六十五寿辰，仪陇家乡派人到北京到看望他，并提议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了赶紧说：这怎么使得？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20)。

朱德要求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自己始终如一地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他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清扫环境，高兴他说：

“每个人都要锻炼，要能吃苦，有朴素作风。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我们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21)

他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处处自奉节俭。建国初期，朱德住的中南海永福堂，是三间老式平房，东头一间是他与夫人康克清的卧室，西头一间是他的办公室兼书房和会客室，中间一间隔成两半，前半间是过道兼饭厅，后半间作储藏室。后来搬到中南海西楼，住房也并不宽敞，连饭厅都留不出来，节假日子女回来，还得临时搭铺。

吃的方面，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回忆说“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从解放进北京到一九七一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四、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22)平时，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家吃特灶的只有朱德自己，每顿都是一小碗米饭，三小盘菜，一个汤。三小盘菜中，一个素菜，一个半荤半素的菜，一个常常是他亲手腌制的泡菜，汤则是一碗普通的菜汤或鸡蛋汤，几乎天天如此。如果饭菜剩了，他不让倒掉，下一顿还要接着吃。为了不使他吃剩饭剩菜，厨师就严格地按他的饭量做，吃多少，做多少。有时来了客人，朱德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时再上一点泡菜，从不铺张。他对厨师说：“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生活水平之上。”(23)

有一次，机关供应站进了一批对虾，邓师傅买了几个精心烹好，上到饭桌上。朱德一见，就问是从哪里来的，多少钱一斤。然后说：“者邓啊，对虾是好吃，可你知道吗？一吨对虾到国外就能换回好多钢材哟！我们国家穷，

缺钢材，对虾少吃一口有啥关系，进口钢材更要紧。记住，以后再有对虾不要给我买了，买了我也不吃。”邓师傅说：“您是国家领导人，就是顿顿吃对虾能吃多少？”朱德说：“国家领导人就更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反正以后不要吃就是了。”（24）

穿的方面，朱德的衣着总是非常简朴，他经常穿一身布衣服，有的衣服穿了多年，汀了补丁，还继续穿，有两身较好的服装，也只有参加大的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换上旧衣服。

他去各地视察，常常带着自己的行李——还是战争年代开始用的绿色的被褥，绿色的挎包，绿色的搪瓷缸，即使招待所预备了被褥、用具，他也不带。招待所桌上备了茶叶，他不喝；备了水果，他让撤下去。他每天起得早，当服务员来整理房间时，他早已把自己的铺盖叠好，房间收拾干净。他到哪里，都说好按规定用餐，不接受吃喝一类招待，也从不接受下面的礼物。

有一次，他去山东视察，正逢水果收获的季节。地方上的干部知道朱德很称赞莱阳梨，就装了两筐，在朱德离开时悄悄抬到他坐的火车上。火车开动后，两筐梨被他发现了。朱德立刻把随行的工作人员找来，严肃地说：“我们下来是工作的，不是来搜刮的，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今后订下一条，下来工作，不许接受礼物；谁接受了，就让谁原封送回去。”接着，他又吩咐：“这两筐梨一个都不能动，到下一站火车停住，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工作人员只能照他的意见办了。

朱德坚决反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中有些人自以为可以享有特殊地位和权利的错误思想。他自己从不利用职权为个人谋利益。他的儿子朱琦、女儿朱敏，小时候都没有在他身边生活。

朱琦在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朱德立刻要他到部队基层去当普通士兵，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右脚致残，只好转到抗大行政部门工作。一九四八年在石家庄，朱琦带着他的爱人来看父母亲。他们结婚已经有两年了，这是第一次有机会来见父母亲。朱琦说，他们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后，将转业到地方去工作。朱德嘱咐说：转业到哪里，安排什么工作，要完全听从组织分配；无论做什么，都是革命的需要，都要干好，务求上进。后来，朱琦由组织分配到石家庄铁路机务段，从当练习生干起，再当司炉，而后才当上司机。五十年代初，朱德在一次外出中，坐了儿子开的火车。朱琦事先不知道。火车到目的地后，朱德见了穿着工作服，满身油渍的儿子，为他学到了开火车的本事而高兴。

女儿朱敏小时候被送到苏联读书。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被德国法西斯关进少年集中营，吃了许多苦。一九五三年，朱敏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朱德就要她搬到学校去住单身宿舍，嘱咐她不要常回家，要好好工作，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朱敏已经结婚，但学校的新宿舍没有建起来，她就在单身宿舍里住了四年。

朱德常对儿女们说：“你们不要总想着我这个家。我生活、吃住都有组织来管，条件比大家好得多。这些是党和人民给的待遇，可你们不能享受。你们在节、假日里来这住几天是可以的，但不能常住。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工作上也不要靠我去当官，共产党不是凭哪一个人就可以做官，而是靠自己的本领，能干什么就于什么。”（25）

朱德以身作则，清廉自律的作风是始终一贯的，凡是同他有过接触、了

解他的人没有不深深感动的。前面所说的，只是建国初期他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时的一些情况。

四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一九五四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大会通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这时候，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战胜严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原来十分落后的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样才能较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怎样逐步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建国不久的当时，对这些全新的课题谁都缺乏经验，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它也成为朱德关心和思考的中心问题。

朱德被选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已经快满六十八周岁。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已是年近古稀。一九五五年底，他患过一次654 夕比较严重的肺炎，中央曾决定他到外地疗养了三个月。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他仍不辞劳苦，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农村、工厂第一线，找当地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农民谈话，调查研究，同他们交换意见，然后给中央写报告，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重大决策。为此，朱德跑遍了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省、市、自治区他都到过。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西北高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对经济建设工作，朱德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对这方面就一直给予特殊的关注，花费了不少精力。南泥湾的开垦、军工事业的建设等，都是显著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前夜，他更一再强调这将成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他在纪念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大会上指出：现在，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国胜利以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又说：“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旧中国留下的破烂的摊子，朱德深知，要顺利完成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积极性，万众一心地共同努力。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朱德在和煤矿工作干部谈话时指出：“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中心已开始转向经济建设方面，”应该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方面的人来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就全国来讲，共产党员无论如何只占少数，我们要是不善于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生产建设的任务也是不容易顺利完成的。”一九五年一月十日，朱德在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团结，不但工人阶级本身要团结，而且要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农

民，共同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朱德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他明确提出“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依靠群众完成工程”的观点。第二年八月，他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又强调：自然科学工作一定要同全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国防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对发展自然科学是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朱德认为，为了发挥科学技术在建设国家中的作用，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积极培养各种有文化、懂技术的人材。一九五〇年他在机械工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技术人员这样少，这样缺乏，假若再使用不当，不能让他们很好地工作，贡献力量给国家，则对我们的工业建设将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我们必须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和技术，号召老干部学习技术。”一九五一年，他在全国纺织工业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为数很少，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知识和业务知识的知识分子，是国家重要的财富。”

为了团结全国人民投入经济建设工作，朱德十分重视要正确地决定政策。他曾多次强调要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五二年的“五反”运动中，没有把城市独立劳动者和小业主同一般资本家很好区别开来。为此，朱德于三月二十二日写信给刘少奇，提出对独立劳动者应该采取正确的政策。他说：

“在‘五反’中，我们曾将城市工商业者，按照他们的行业和守法与违法的程度加以划分，这是必要的。”“但是，最近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城市工商业者，还必须从其阶级关系上、经济活动的性质上来加以区别，并以此来作为我们决定政策的基础。”

“城市中的独立劳动者（包括大量的小手工业者在内），应该与资产阶级严格区别开，不应把独立劳动者与一般资本家放在一起统称为工商业者。”“这些独立劳动者，虽然占有很小一部分资金，但他们不雇人或只雇很少几个学徒，并且他们都是直接参加劳动的。所以，决不应把他们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而应该看作是与农村中的中农同一性质的阶层。在这次‘五反’中，也证明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各城市中的守法户与基本守法户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属于这一阶层。”

“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帮助他们大部分组成生产合作社，使其与国家经济联结起来。”“国家对于独立劳动者的政策应与资本家有原则的不同，在税收上，在贷款上都应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给以优待。”“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同时也更有利于城镇的生产。”

建国初期，过去长期战争年代中形成的各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分散管理、分散经营的状况一时基本上还没有得到改变。随着国家的统一，国家财政也必须统一。一九五〇年二月，朱德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说：“财政的统一是我们多年来争取的事”，“今后我们必须在统一的基础上来建设全国的财政。”同时，他又认为不能过分强调中央集权，提出将来要建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的设想。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谈了如何充分发挥银行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他说：“过去我们也有银行这个工具，但是没有好好利用，只是发点票子。”今后，“全国要广泛建立银行网。银行必须负起很大的责任来，掌握资金，监督生产。”“财委要经过银行来掌握家务，使银行成为国家的总会计。银行不仅是一个发票子的机关，国家的投资都要成为银行的贷款。”对国家的建设事业，“银行必须起监督作用”。一九五二年，朱德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今后“除逐步建立农业银行之外，我们还应逐步建立工业银行、基本建设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对外贸易银行，以加强对各该部门的业务活动，并使总行更便于执行总的调剂职能和进行监督。”

一九五一年，中共中央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准备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并转中央财委，对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五条意见：

（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钢铁、石油、煤炭、有色金属、机械、电力、化学等工业的经济和技术基础打好，同时，适当发展建筑工业和纺织等轻工业。（二）关于财政统筹统支问题，统倒好，包不了，而且也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对划分地方预算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现在还认识不足。划分出地方预算，至少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可以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二是可以节约国家开支；三是可以解决地方开支的需要；四是可以帮助地方发展工业。因此，必须逐步而又迅速地实现地方财政和区乡财政。（三）注意发展地方工业，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应当明确划分。（四）必须保证对外贸易的平衡，并力求部分出超，以形成对某些国家的储备，以备转口之用。（五）农业除兴修水利、改良技术、这种除虫外，还应逐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移民开垦。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这一方面是由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拿钢铁的人均产量来说，在一九五一年只有二点三七公斤。钢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资料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材料。为了获得能依靠自己力量来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为了给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机器设备，需要尽可能使重工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

朱德对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在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不久，便在这年十一月四日视察了北京西南郊的石景山钢铁厂。

石景山钢铁厂是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当时的规模还很小。朱德早就到那里视察过。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给石景山钢铁厂全体职工写了一封信，里面说：“你们的厂目前虽然还只能每年生产儿十万吨，但国家对它希望很大，它是有很大发展前途的。因此，我希望你们更好地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钢铁生产方面的新技术，为石景山钢铁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11）朱德这封富有远见而又热情洋溢的信，给了全厂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以后，他又多次地到这个厂去视察，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包头钢铁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当时，我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的条件还很困难。包钢在规划设计上存在着贪新、贪大的思想，没有考虑充分利用旧包头原有的基础，而是主观地设想在离旧包头市几十公里的荒原沙漠上建起一座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而且在厂房没有建起前，就先盖起几幢高标准的西式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和其他设施。朱德认为，这有悖于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应该重新考虑这个规划方案。

为了进一步弄清包钢的筹建情况，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朱德先找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周荣鑫、宋裕和，听取他们的汇报。他在听后说：“包头

是否要建成一个新城市？而且又搞得那么漂亮？值得考虑。”并且指出，盖办公楼之类的房子标准不要太高，比老百姓的房子稍好一些就可以了，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钱，省出钱来多发展工业。(12)

六月五日，朱德带了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包头实地考察。十日，到达包头，听取中共包头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说服他们重新考虑规划方案。他提出：城市规划是否要那么大？建筑标准是否要那么高？然后说：职工宿舍要和老百姓的住房相称才好，要“穿草鞋”。包头的人口将来不会发展得很快，不宜规划过大。要就地取材，适应当地习惯，不要大搞西式建筑，企图一劳永逸。要降低建筑标准。(13)他在到建筑现场察看后，十二日又对包钢负责人说：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来。目前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在生活上要向下看。(14)

六月十四日，朱德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和包头市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都是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热心是好的。但是，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的经验做不到。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学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在建设中，能省的就要省，尽量做到就地取材。对包头旧城的一切要尽量利用，不能完全丢开旧的去建新的。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会事与愿违。原来的设计规划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失败的。要重新考虑新的设计规划，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力求做到省和好。(15)

六月十五日，朱德参加中共年蒙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分局主要负责人发言说：“朱总司令这次来内蒙大家都很高兴，帮助内蒙解决了很大问题，尤其是包头建设规划问题。分局和地委的干部思想基本上通了。”(16)朱德在会上就内蒙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经过朱德耐心地做工作，内蒙和有关部门的干部都想通了。他们根据朱德的意见，重新修改了规划方案，为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

对重工业建设中利用原有基地、提高产品质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等问题，朱德很注意。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他对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说：过去我们对石景山、本溪、上海等地钢铁工业的老底子注意不够。在五年计划中，建设新的工厂固然重要，但改建老厂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做又快又省。建设工业，大的厂要搞，小的厂也要搞，而且小厂有时候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17)同月二十四日，他对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说：要特别注意保证产品的质量。东德的蔡斯工厂技术很高，产品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所以它的产品在世界上有很高的信誉。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18)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对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何长工说：矿砂出口比粮食出口值钱得多，用这些东西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就能加快我们的建设。(19)

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朱德视察成都量具刀具厂后，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表扬了该厂在建设中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企业的做法，建议向全国转发该厂的经验。(20)这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同黄敬谈话时又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了很多厂，但缺乏原料，现在不得不返回头来搞原料。我主张把钢、铁、煤等原料工业搞突出些。如果缺乏钢材，还可以进口一些。(21)

我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自己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本上是沿用苏联的做法，强调中央集权。这在当时说来是必要的，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来建设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但它也存在弊端，主要是中央统得过多、过死，限制了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

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些弊端就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了。

朱德对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认识得比较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多了、统死了的错误，相当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权的积极性，因为想办事没有钱，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22)他认为，要比较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只靠中央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起能同时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当时他更多注意的还是如何在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朱德指出，今后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进一步贯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财政分级管理的方针”。(23)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同黑龙江省领导人欧阳钦谈话时说：“要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4)十二月七日，朱德在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现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25)

在工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也主张将部分工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一九五六年五月，他视察山西省的工业生产后，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今后中央有关部门最好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小矿和小型炼铁炉让给地方去搞。地方工业利润问题，请中央考虑能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经中央批准，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26)六月，朱德又到辽宁省视察工业生产情况。回京后，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上边统得大死”，“我认为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27)

在商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主张放得更活一些。他向来认为国家在这方面不要管得过多过细，应该放开一些。他说：象蔬菜、水果这类东西，要放开，让合作社去办，可以养活很多人。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要流通。经济流通了，国家才能发展。(28)小商品的生产 and 经营，也应该让合作社去搞，不能把什么都收归地方国营企业所有。否则，一方面国家要吃亏；另一方面对群众也不方便。“社会主义不一定什么都交给国家搞，合作社搞也是集体经济。”(29)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他还对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商业部门是管商业流通的，要多想生产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光想赢利，不能说赚钱越多越好。(30)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个讲话给了朱德很大的激励。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在八月间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思想作了许多重要发挥，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的问题。在谈到四级财政体制问题时他认为：“起码也应该先把中央和省（市）这两级划分清楚。至于省（市）以下的那两级，可由省（市）量力而行，能划分下去的就划分下去，不能划分下去的就由省（市）暂时包起来。”(31)在谈到工业体制问题时，针对那种认为地方上管不了、管不好的错误观点说：“难道地方党不管就可以搞好吗？重要的问题在于把职权划分清楚。”(32)在谈到商业体制问题时说：“如果全归国家所有，一

方面商业业务复杂，涉及面很广，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国营商业很不容易领导起来；另一方面在工资、福利、修建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困难……国家很难全部背起来；再一方面是失去了群众的监督与关心，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33)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朱德对此是赞成的。同时，他也很强调发展轻工业。他在《意见》中说：“轻工业在我国是有基础的，不仅可以积累资金，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就是产帮助兄弟国家上，在对外贸易上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应该适当地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来改建、扩建或新建一部分轻工业工厂。对手工业工场，也应该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它逐步地由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这也是发展轻工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34)

在工业建设中，朱德很重视利用我国原有的工业基础。广东的丝织业是有着历史传统和良好基础的。朱德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张广东应该多发展养蚕事业，适当提高蚕茧的收购价格，宣布不增加桑田的农业税，对在山坡上种桑的五年内免税，并适当贷款，发放蚕种，加强技术指导。(35)

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结合的问题。并且多次建议中央考虑把军工和民用工业的生产结合起来，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的《意见》中指出：“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是很快的，旧的东西不断为新的东西所代替、更换。因此，军人装备不宜大量生产，过多积压，而要充分运用这些工厂的设备能力，进行多种生产，使之服务于经济建设，并使投资有所效益。”(36)

朱德鉴于国际局势的缓和，多次向中央提出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意见。他在《意见》中说：“过去对沿海工业的疏忽，主要是怕打仗，怕打烂。当时这样估计也是对的。”“但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的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如能充分地发挥现有潜力，结合以合理地扩建或者改建，就能大大增加生产力量。同时，沿海工业还可以作为‘母鸡’来支援内地工业建设。内地工业的建设，如果不在设备上、技术上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而企图完全靠国外来解决问题，就会是错误的作法。”(37)

朱德对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的重要贡献，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着重指出了两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的观点。《决议》强调：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朱德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等特点出发，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他认为，只有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才能致富，国民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快。

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时，着重谈的就是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他说：“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劳动力相对剩余的问题。对于这部分劳动力，必须预先计划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还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

情况，向多种经济方面发展，使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果木园艺，以及运输、打猎、编制、种茶、养蚕、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蜂等副业密切结合起来……真正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38)会议期间，朱德在同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欧阳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谈话时指出：东北人少地多，无霜期短，农田劳动有半年闲，可以把劳力转到副业、林业生产上来，不要闲着。林木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拿出来就是钱。“农业必须向多种经营发展。”(39)

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所写的《意见》中说：“当前在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食、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这些产品不仅是国内的工业原料和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而且还是出口物资，对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40)

对注意发展手工业的问题，朱德在这个时期谈得更多，抓得更具体。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我国农村的生产资料百分之九十靠手工业，农民的生活资料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手工业品，城市居民也需要手工业品，全国有五百多万个体手工业者和一千二百万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发展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薄一波回忆说，朱德“一再要求我们要重视手工业的生产，并且多次提出书面意见。”(41)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前和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听取主持会议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主任程子华等人的汇报并作指示。程子华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朱德同志“有时叫我去，有时他就来，往往事前不通知，他就来了，在他面前，并无拘束，可以畅所欲言。”(42)

十二月四日，朱德在会上讲话中，针对有些人轻视手工业，认为敲敲打打，没有发展前途的错误看法指出：“有的同志说：‘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43)

在这次讲话中，朱德谈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还着重谈了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法、形式、政策等

问题。他说：“在组织方法上，主要是由他们自集股金，自备工具，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工合作，按劳分配。”对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在朱德讲话前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人主张用公私合营的形式；有的人主张只用生产合作社的形式，不用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形式。朱德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他说：“开始组织的时候，一般地应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条件具备时，也可以一开始就组织生产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订立许多繁杂的制度等，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在讲到政策问题时，他指出：“关于小手工业者板的人社问题，我看只要他放弃剥削，本人有技术，而又愿意参加劳动，服从领导，是可以让他入社的。……至于未雇正式工人而只带学徒者，则应按政务院规定，仍应算作独立劳动者，不应划为老板。”(44)

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朱德讲话的精神，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确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程子华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朱德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肯定了我国手工业的地位和作用。”“他还明确了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几种形式，以及改造的步骤和方法。这就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方向。”(45)

会议结束后，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一些冒进的苗头。朱德一直注视着这个进程，经常找薄一波、程子华等了解情况，并告诫他们要防止冒进。薄一波回忆说：“朱德同志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主张稳步前进。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也曾多次发表过意见。”(46)程子华回忆说：

“当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朱德同志曾经提醒我们，要防止盲目冒进，当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有的不适当地强调集中生产，有的盲目地将小社合并为大社，有的盲目地追求机械化。他说，这样做，脱离了实际情况，违反了自愿原则，往往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反而影响合作社的发展。朱德同志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出现的苗头讲的，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敲了警钟。”(47)

为了总结前一段手工业合作化的经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第四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在会上作了《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的讲话。他提出国家要扶植手工业，还特别强调要保护和发展各种工艺美术品行业。他说：

“有根高手艺的老师傅是勤学苦练成功的，应该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and 爱护，给他们优待。老师傅把很高明的手艺传给青年后辈，是新社会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希望他们不要保守，否则‘人亡艺绝’，绝技就要失传了。”(48)

一九五五年冬，在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的推动下，手工业合作化也迅速掀起了高潮。在这个高潮中，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简单划一，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有些地区不适当地办大社，办多行业的综合社，盲目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使有些行业打破了原有的供销关系。有些地区的服务行业不适当地撤消或合并了服务网点，造成群众生活不便。第二，自由市场已基本不存在，手工业者原来自购原料、自销产品的传统受到种种限制，以致不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停工待料，造成某些手工业产品供应紧张。第三，公共积累偏多，影响了社员的收入和福利。他们说：“工人有劳保，农民有五保，我们无一保。”因此，不少人要求把手工业合作社交给国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工业，自己去端“铁饭碗”，严重影响了生产积极性。

朱德对这些问题是很担心的，他认为，问题虽然是在前进中出现的，但必须重视并加以纠正，否则就会严重影响生产的发展。为此，他多次找有关方面负责人了解情况，提出意见。他向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指出：组织大社一定要具备条件，否则会垮的。集中起来生产有盲目性，必须马上制止！凡不适宜集中生产的就不要勉强集中，仍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组织起来后，产品的品种要更多，质量要更好。这样人民才更加满意，才能真正体现优越性。手工业的行业复杂，品种繁多，劳力又这么多，过分强调机械化要注意。手工业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群众的福利应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加到国家身上。国家不可能解决六亿人口的全部福利问题，主要靠人民

自己动手解决。(49)白如冰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的谈话，“使我们心悦诚服”。

一九五六年底，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需要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来加以巩固。可是，有的人却因头脑发热又急于想把刚刚组织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迅速转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朱德认为，这种变动事关重大，应该采取慎重态度。他多次说过，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人们的思想觉悟也还不高，若过早地把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势必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给人民带来不便。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同时存在。

朱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有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利用国际上一切有利条件，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早在建国前夕他就说过：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及一切民主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我们需要他们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50)他还说过：要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内外交流’。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但有好东西他们还是需要我们的，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向他们买。”(51)

建国后，他在出国访问中看到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更加强调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进行建设都不能自我封闭，中国也不能例外，必须放眼世界，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基本上建立起来，经济建设上也取得很大成就，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于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

大会全面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确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九月十七日，朱德在会上发言，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德在发言中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必须反对在党内关系上任何种类的宗派主义情绪，每个同志都要学会和其他同志团结，特别要学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团结。”(52)

九月二十八日，朱德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八大以后，朱德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继续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一再提出一定要改变那种过分强调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朱德对薄一波说：工业一定要下放，否则，地方上什么都找

中央不得了。只有下放，中央才不致当“怨户”。地方财政一定要划分出来，否则，地方上年年当“长工”，积极性起不来。放下去造不了反。他从国际形势已进一步趋向缓和这个判断出发，更加强调军事工业要同民用工业生产结合起来。他说：“我看短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相当数量的军工厂，可以改为和平工业，军队也要大大裁减。军工厂如不改为和平生产，要犯错误。”(53)

他更多地到全国各地进行实际考察。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三月，朱德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省、自治区，对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进行调查。这时他已满七十周岁了。

朱德的工作作风是十分重视实际的。在到各地视察时，他特别注意根据各省、自治区的不同特点和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如何发展当地经济的具体主张。

在广西视察时，他看到那里物产丰富，发展土特产和经济作物很有前途，但由于在管理上过分强调集中统一，使地方和群众没有权力也没有财力去发展生产，严重地限制了地方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月十五日，朱德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为了发展广西的土特产，必须给地方以应有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制止上述不合理的事。”“否则就会自己整死自己。”又说：“我以为，根据广西的特点，在建设方针上，除了增产粮食，发展制糖、造纸等工业以外，如何大力发展土特产和开采矿产，是一个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54)

第二天，朱德赴海南岛视察。他是建国后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安全，他所乘坐的小飞机是贴近海面低飞到海口市的。在当地领导人陪同下，他从海南岛北边的海口市开始，经过中路，到南端的榆林港，进行全面调查。他对当地负责人萧慎辉说：“海南有三百多万人口，有平原，粮食可不成问题；要利用有利的经济条件，多多发展经济作物。”(55)他特别重视热带作物的生产。当时担任琼海县委书记的吴俊民回忆说：“朱总当时问我：琼海除种植香蕉外，还可发展什么经济作物？我回答说：琼海历史上种菠萝、椰子，五四年后胡椒也在琼海发展起来了。”“他很重视，叫我要抓紧发展胡椒生产，说这是大有可为的事，大力发展。”(56)他还十分关心在海南岛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的情况，在过五指山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颂他们的斗争。

经过调查，朱德认为海南岛是个“宝岛”，并致电中央建议开发这个“宝岛”。他在一月二十日的电报中说：“所谈所见，说明了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这样好的地方，我以为只要财力所及，即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工作。”(57)在二月十日的电报中又说：海南岛“在水路交通上四通八达，岛上的许多港口既可以成为军港，又可以成为商港；欧洲来船也比较近，尤其是邻近香港，正可以成为出口的基地。”(58)

朱德到云南视察时，发现当地经济作物的种植只限于国营农场，没有推广到农业合作社中去。二月二十六日，他致电中央和毛泽东：“云南适宜发展茶叶、咖啡、紫胶、木棉、剑麻等经济作物。”提出：今后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应该广泛地推广到农业合作社中去，使农业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和副业三者的生产结合起来。“不要单靠国营农场来经营经济作物。因为国营农场终究是少数，只能起指导和示范作用，而大量种植还要靠农业生产合作

社。”(59)

朱德在四川视察了军工生产后，于三月十九日致电中央和毛泽东：“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迟早非解决不可的。要转还是早转好，早转少损失些，越转的晚损失越大。”(60)

朱德回京后，在四月十八日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外出视察的报告》中，综合反映了这次外出视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并对经济建设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系统地提出建议。其中谈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再一次说：“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以为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方面的权力都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机动之权。”(61)

《报告》谈到工业问题时说：“据两广、云南、四川了解到的材料看，这几个省的矿产资源是比较丰富的……问题是国家对这些资源统得太死，地方和群众都没有活动的余地。”“对于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国家又无力开采的矿产资源，我认为应当允许地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采，但必须保证国家矿山资源不被破坏和浪费。”“有些东西如煤炭等还可以酌情开放一点自由市场，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我认为应给每个省下放个把象样的机械制造厂，以便为本省生产工业、手工业、农业所需要的产品，并做一些机器修理工作；或者把某些中央管理的机械制造厂划出一部分任务交地方支配，根据地方工农业生产需要进行协作，这样才能解决地方工业发展中的困难。”

他这次所到的地方，有不少是贫苦的山区。对发展山区经济问题，《报告》说：“目前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山区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单靠农业贷款和民政部门救济还不能解决问题。应该看到，通过外贸系统从价格政策和各个方面来使山区经济获得发展是当前解决山区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收到双重利益的。”(62)

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十八日，朱德到会讲话，尖锐地指出：“山区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同志不重视山区工作。他们不懂得，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他指出：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都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山区有无穷的自然财富，不仅国内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资。朱德强调：“山区的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改善山区的交通运输，对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山区，对利用山区的富源支援全国都有重大的意义。”他还指出：“建设山区不仅是农业部门的任务，也是工业、商业、财政、税收、文教、科学、卫生等各部门的任务，需要各部门做一系列的工作。”各部门都要“把支援山区建设的工作认真重视起来。”(63)

第二年一月十一日，朱德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时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把一些加工工业都搬到城里来办，一方面运输不便，同时也不利于农民对副产品的利用。有些加工工业应该下放给集体去搞。集体企业发展了，同样是给国家增加了财富。(64)

他的这些主张，都是深入实际、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实际国情而很具创见的。

对发展对外经济交往的问题，朱德这时越来越重视了。

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外出视察的报告》中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说：

“ 无论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是为了加强国际交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必须大大地加强和发展。要扩大出口，必须手头上有一大批东西。”
“ 解决的办法，只有从发展生产、适当节约消费、寻找代用品等方面着手，以便尽量挤出东西来出口。” “ 这样，我们就能换回大批的进口物资，我国的建设速度就能加快，政治和外交影响也会更加扩大。” (65)

一九五七年五月和十二月，外贸部门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外贸局长会议，讨论如何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问题。朱德两次都到会讲话，阐述对外贸易的意义、方针和政策。他还提出：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我们既“ 要学习外国的经验，也要吸收过去我国商人的某些经验，要注意了解国外的生产和供需情况。” (66)

朱德认为，我国现行的外贸管理体制太死，影响外贸事业的发展，必须进行调整。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他在视察东北后提出：“ 如果能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允许他们根据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邻省份组织某些货源，就会便于更好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这是一个有关体制问题，我认为在研究体制问题时，应该加以注意。” (67)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广西南宁召开扩大会议。十日，朱德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要继续注意调整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过分悬殊的购销差价和地区间的差价，认真做好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他在发言中，又一次谈到发展对外贸易问题，更加系统地阐述他对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思想，尖锐地批评“ 民族闭关自守”、“ 民族孤立发展经济” 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加强国际经济联系的客观规律和当前国际有利形势的。他说：

“ 我主张使对外贸易有更大发展的主要出发点是，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和形势，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 为了更快地发展出口贸易，首先就要打破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当实行‘ 闭关自守’ 的错误想法。” “ 在实际行动上，就是单纯地追求各方面的在一国范围内的自给自足。” “ 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主要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有六亿人口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以外，还要力争外援，还要根据世界经济的客观规律，利用必然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联系，来发展我们的建设事业。” “ 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违反早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的。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国际经济联系必然进一步加强。上面这些思想，就更加是不对头的了。”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 外销要服从内销”。朱德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主张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他说：

“ 我以为不应当在内销和外销究竟谁应当服从谁这个范围内打圈子。年销和外销都必须服从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整体利益。从这个利益出发，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内销尽量加以节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否则，如果要等到充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后再外销，那么我们是永远也不会有出路的，那就只会使对外贸易萎缩下去，因此，也就会使整个国家建设事业受到损失。我认为正确的提法是：在保证满足国内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之下，必须积极地扩大对外贸易。” (68)

在发展国际交往中，朱德不只是重视发展对外贸易，还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早就说过：“ 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 (69) 他说：“ 不能看不起美国的技术，好的东西还

是要拿来。”(70)一九五八年四月，朱德视察南京无线电制造厂谈到如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时说：“对比是个好办法，要和外国的比。否则只在国内比，矮子里选高的，结果还是不高。”(71)

他主张加强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包括接受国外的投资。他多次说过：“现在的经济是世界化了，不能关起门来。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同我们交换，日本就需要我们的煤、铁。”“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也干，挖出东西来以东西还账。”(72)有些产品如石棉、硼砂、铁砂等，“都可以和兄弟国家签订长期合同，也可以接受他们的投资建矿，以矿产品还账。”(73)“要鼓励国外资本家向国内投资，不一定现钱，货物也可以。”(74)

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发展我国旅游事业的主张。他认为这是创收外汇，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的好方法，也是打破“闭关锁国”，加强国际交往的重要途径，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他对李先念说：“公家的疗养地和风景区有许多房子，可以利用起来，办成国际旅游社，这笔收入是很大的。”(75)八月三十日，朱德在和城市服务部部长杨易辰谈话时又说：可以“把旅店、招待所全部统一起来，办成国际旅行社，接待外国人，可以赚钱。把游玩的地方，甚至祠堂、庙宇都搞起来，一是对内服务，一是对外服务。”(76)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离开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出现了一次重大曲折，这就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的三年“大跃进”。

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右倾”。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方针性错误。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五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

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会议还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77)。并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一个全民上阵大炼钢铁和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在全国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在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取得了一些建设成就；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使以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破坏。

运动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上述历次中央会议他都参加了，而且对中央每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也是赞同的。他认为，总路线可以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跃进”可以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也曾多次谈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重要意义。

但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在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不少问题。尤其对各地出现的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作法产生了怀疑。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他在煤炭工业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针对一些浮夸现象说：“要有实干精神，劲要鼓。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就不要讲。”(78)九月下旬，他在视察太原钢铁厂时说：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质量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岂不是浪费？(79)

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的乱子。从这时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一九五九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朱德根据这三次会议的精神，努力注意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尤其重视纠正急于改变所有制形式、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绝对平均主义、命令主义等“左”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朱德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80)十二月十日武昌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指出：“要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对人民公社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很重要。”(81)第二天，朱德在听取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人们总想走得愈快愈好，但总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82)

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那股“共产风”，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83)朱德对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作法很怀疑。二月十七日，他在听取中共江门地委负责人汇报公共食堂情况时说：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群众的生活如果也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六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84)四月十五日，朱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是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要瘫痪。”(85)

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86)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都是比较冷静、比较实事求是的。

作为国家副主席，朱德在到各地视察、对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意见的同时还担负着大量的国务活动。其中包括：一九五五年率团前往朝鲜；同年底至第二年初率团访问苏联、东欧五国和蒙古；一九五七年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以他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应邀赴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朝鲜解放十周年庆祝典礼。朝鲜对这次庆典十分重视，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非常隆重。十三日晨当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车进入朝鲜境内的新义州市时，就受到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和劳动群众三千余人的热烈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崔庸健次帅等专程前来迎接，并陪同中国代表团同车到达平壤。在平壤，欢迎的场面更加盛大，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者中以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

八月十五日，平壤各界举行庆祝朝鲜解放十周年的盛大集会。金日成首相在大会上做了报告。朱德也在会上讲话，指出：

“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怀着兄弟般的友爱和敬意。中国人民象珍贵自己的胜利成果一样珍贵朝鲜人民的每一个胜利和成就。中国人民因为有朝鲜这样一个英雄的兄弟邻邦而自豪。”“在朝鲜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三年正义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朝鲜人民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朝鲜民族的利益，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建设和安全。朝鲜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人的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热情。”(87)

二十五日，朱德一行满载着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的深厚情谊回到北京。

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日起，朱德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民主德国总统皮克八十寿辰庆典，并对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进行友好访问。

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一行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朱德不顾旅途劳累，当天就同前来迎接他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交谈发展农业和石油工业的经验。他对罗马尼亚在中国石油开采方面给予的技术援助表示感谢。二十三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朱德率代表团出席大会。当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贺词时，不断博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和起立欢呼。

在罗马尼亚期间，朱德一行参观了罗马尼亚的工厂、革命博物馆、军事学院和研究所等。他们还参观了罗马尼亚石油中心产区之一——普罗也斯的城。

接着，朱德又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民主德国，参加皮克总统的八十寿庆活动。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他抵达阔别了三十年的柏林。

三日，参加祝贺皮克总统八十寿诞的活动。代表团还前往位于魏玛的前布痕瓦德集中营，凭吊被法西斯杀害的德同共产党领导人台尔曼牺牲处，并献了花圈。

十三日起，朱德率代表团前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十七日，他又率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陪同他参加一些活动的捷国民议会主席兹德涅克·费林格对朱德说：我童年时就知道你是中国红军总司令，今天能陪同你，是终生荣幸。(88)曾在一九四五年到过延安的捷牙科女医生罗别愁得知代表团来访，专程赶来看望朱德和代表团成员聂荣臻、刘澜涛。朱德对罗别愁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钦佩和感谢。朱德还应捷国家电视中心站的邀请，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作电视广播演说。

一月二十九日，朱德率代表团到波兰访问。列车驶入华沙车站时，受到隆重欢迎。朱德在车站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在波兰，代表团还到

了克拉科夫等地。在克拉科夫，参观了波兰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诺瓦·胡塔列宁联合冶金企业。朱德在有万名职工参加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感谢波兰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与帮助。

对波兰的五天访问结束后，朱德率代表团乘坐专列，在二月四日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莫洛托夫、米高扬、朱可夫等苏联领导人到车站迎接。他们先后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参观克里姆林宫的列宁的办公室、会议室和卧室后，朱德

题了词：“列宁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和后代学习。”这时正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朱德应邀在莫斯科的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对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

当代表团即将结束访问时，接到国内通知，中共中央组成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由朱德担任团长，团员有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这样，聂荣臻、刘澜涛等先回国，朱德继续留下，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二月十五日，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致祝词。他在祝词中介绍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展情况。全体到会者起立，热烈掌声经久不息。二十四日晚间，赫鲁晓夫作有关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没有邀请朱德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会后，朱德又到苏联南方的高加索等地区访问。他前后在苏联共停留了四十多天。

回国途中，他又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在蒙古进行了三天友好访问。

四月二日，朱德率代表团回到北京，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欢迎。此行共一百一十四天。

在出国访问期间，朱德认真地考察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并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四月二十五日，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出访报告中说：国际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这看法是切合实际的。他说：“我相信我们能够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在这种局势下，我认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现在已经是可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了。”

他还强调：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89)他在访问苏联时，对驻苏商务参赞李强说：“现在我们不要关起门来，用小套套把自己套死。”(90)随同朱德出访的聂荣臻有一段回忆：“全国解放以后，朱德同志毫不懈怠，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五六年二月中旬，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陪同朱德同志出访东欧六国。在访问期间，他常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要积极争取外援，注意学习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请外国专家到我国来工作，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91)

一九五七年四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其中，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由朱德陪同访问沈阳。他们参观了鞍钢无缝钢管厂和沈阳第一机床厂。二十一日下午，朱德陪同伏罗希洛夫出席沈阳市的欢迎大会，有五万多群众参加。伏罗希洛夫结束在外地的参观访问后回到北京。许多活动，朱德都出席作陪，直到伏罗希洛夫离开北京。

四十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灯光辉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这里选举国家领导人。九时三十分，大会宣布：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时，朱德已近七十三周岁高龄了。

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是朱德提议的。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议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书记处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这封信，充分表现了他那无私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信是这样写的：

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

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因此，名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686_1.bmp}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687_1.bmp}

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此致

敬礼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德担任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以后，他又连续当选第三、四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十七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负责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决定特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任免等。

朱德担任委员长期间，主持了一百七十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听取并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年事已高，每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前，他都要对审议的议案和会议程序，认真地进行研究和安排，并提前到会，详细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同副委员长们商谈有关问题。

“决定特赦”，这是《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之一。一九五九年九月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

这一建议由《人民日报》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朱德多次主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特赦问题。对那些战争罪犯实行如此宽大的政策，当时有些人一时还想不通。朱德耐心地做了许多工作。

他在一次人大常委会讨论特赦问题的会议上说：我们党十多年来对战犯一直实行宽大政策。有人说我们“宽大无边”，这是不对的。现在看来，对战犯也好，对其他犯人也好，还是实行以教育改造为主的政策好，这样可以争取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只要他们转变了，人民就应该宽恕他们。

在这次特赦中，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释放了。当时国外报纸上有评论说：这件事表明中国统治的巩固。它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朱德在一次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碰头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又说：他们要反对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社会主义确实好。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消灭了，人却留下来，阶级斗争变成了思想问题。我们这个办法比较好，连宣统皇帝也是可以改造的。

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这样，所有在押的战犯都获得了释放。

朱德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直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他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很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确是他自己实际行动的写照。

七十多岁高龄的朱德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继续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视察，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

当他就任这个新职务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仍在全国各地继续向前发展。朱德对许多地方急于改变农业、商业、手工业的所有制问题十分担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说：过去的商业网点被打破了，结果东西没有了，吃了亏。这实质上还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即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三者的关系混淆了。

五月二十七日，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视察。沿途朱德反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六月一日，他在听取中共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

六月十日，朱德在中共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还是要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食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

六月十五日，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前往吉林省视察。次日，朱德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他在谈到手工业问题时说：手

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的要转回来，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要实行国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六月二十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辽宁、吉林两省时看到的情况。报告中说：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大大落后于工业。报告中还以很多篇幅谈到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他们说：“在当前的群众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常年食堂，原因是：（1）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里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2）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里那样饭热炕暖；（3）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里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4）群众感到在食堂吃饭，对来人待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便。”他们建议，“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

当天，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又前往黑龙江省视察。回京前，朱德向省委负责人尖锐地批评“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朱德、董必武、林枫回京后，又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黑龙江省时看到的情况，并且谈到应该鼓励群众自己修建住房。报告中说：“在公社化以前，群众建筑了不少房屋。公社化以后，由于群众对住房私有政策一度发生误解，对自己居住的房屋不修不建。根据这一情况，今后除贯彻执行房权私有的政策外，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群众自己修建房屋。黑龙江省委最近提倡建房储蓄，并准备供应群众一部分木材和玻璃，这一措施是很好的。”（11）

在这前后，山东省有人给朱德写信，反映当地公社党委虚报粮食产量。朱德立刻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马上派人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及时作了处理。这年夏天，朱德还亲自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干部谈话，严肃批评了“共产风”，指示他们根据宪法和党的有关决议，研究保护公民合法的生活资料所有权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央参考。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常称为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的最初目的是：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

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七月六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12）

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发表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针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来的。

六月八日，他对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

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13）

七月九日，他向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损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问题是要认识社会主义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经济活动要实行商品等价交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到达共产主义。”

在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朱德说：“如果去年不发那阵疯，不知要多拿出多少东西来出口。但是，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责备外贸部外销太多，而外贸部也居然承认错误。”“我看广东还是要多搞外汇，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国际市场。”他提议可以从国外买回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他说：“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对有些人还说不服，就是买回原料制成成品出口，比如进口橡胶、棉花，出口胶鞋、棉布等。这样的事不让搞是不合理的。”对价格政策，他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求情况有升有降。他说：“限制价格的办法值得研究。有些东西价钱给少了，生产也就少了。一提价生产就能发展，涨一点价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多了再降价。”“凡是出口需要的和国内需要的东西，还是要提价。”（14）

七月十一日，朱德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朱德还强调：“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15）

七月十三日，朱德又对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的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16）

七月十六日，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了解河南省的“大跃进”情况。吴芝圃汇报说：河南省现在“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不愿吃食堂，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吃食堂，这是历史形成的。”朱德听后说：“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吃好吃坏自己负责，不要实行包的办法。”“你们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员愿意回家吃要允许，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视。”又说：“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怪下面，问题在于‘跃进’的速度和时间，没有条件办的也硬去办，如大炼钢铁。去年是拿钱买经验。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伴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17）

正当大家对纠正“左”倾错误讨论得很热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七月十四日

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封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坦陈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但它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讨论。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评彭德怀的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并提出要进行批判。

于是，会议的方向陡然发生逆转，由纠正“左”倾错误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这种风云突变的情况下，朱德对彭德怀虽然也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仍很注意分寸，没有乱扣帽子，并且一再肯定彭德怀的信的积极一面和他的优良作风。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在第四小组会上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18)七月二十六日，彭德怀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当天，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检讨”时，朱德在小组会上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19)毛泽东对朱德的发言很不满意，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批评朱德的发言“未抓到痒处”。

八月二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在庐山举行。会议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八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八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离开庐山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于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严肃地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迫作了“检讨”。在批判朱德时，林彪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积极。九月十一日，他在会上恶意攻击朱德是什么“老野心家”、“想当领袖”，甚至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地宣称朱德在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朱德听到后只是平静地对康克清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他又说：“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20)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中央军委作了重新调整，并于九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知：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等为常委。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十月，中共中央将朱德在这次会议上的“检讨”在党内下发。

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错误的斗争，打断了原已开始的在经济建设领域内纠正“左”倾错误的积极进程，严重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提出要在全国掀起“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否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客观事实；再度确定钢铁和粮食产量的高指标；把“包工”、“包产到户”等正确作法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提出在三到八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要求在全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认为这是有助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

朱德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作法虽仍持有不同意见，

但由于已受到错误的批判，使他难以继续公开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他以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仅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十一月的两个月内，他在北京视察了石景山钢铁厂等三十多个工厂企业。一九六〇年又先后视察了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市的一些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朱德在外出视察时，一再强调要发展科学技术和农业多种经营。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日，朱德视察广东省从化县城郊人民公社综合农场时指出：“你们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要搞综合利用。”(21)

这年三月，朱德在视察陕西、贵州和四川重庆后，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回到他离别了五十多年的故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这是他离乡后第一次回去，也是最后一次。他曾七次到四川视察，但只有这一次回去探望了家乡亲人。

三月九日，他们从南充市出发，乘车沿着群岭逶迤、排峰突兀的大巴山北行。经过蓬安县和营山县时，听取这两个县委负责人汇报工作。他向营山县委负责人叮嘱道：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22)在听取仪陇县新寺区委负责人汇报时，他说：你们要注意发展社办工业，增加社办工业的比重，还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23)

朱德回到家乡后，用祖上传下的客家话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通通地说：“还不是因为肚子吃不饱！”朱德听后，用拐杖猛敲了一下地面，摇摇头说：“我知道了。”(24)

当天，马鞍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朱德：前几年看到他关于多种茶树的指示后，马鞍公社已种了三百亩茶树，办了一个茶场，计划今年把茶田扩大到一千亩。还发动群众采山货，挖药材。朱德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我们四川号称‘天府之国’，那是指成都坝子一带。象我们这些山区，就是要发展多种经营。”(25)他特别指出，要根据山区的实际情况，开发山区的土特产。

仪陇县委请朱德参观在他的旧居举办的陈列。土改时，仪陇县曾计划修建朱德同志革命纪念馆，向中共川北区党委请示。朱德知道后，从北京打电话给川北区党委，要求他们立即转告仪陇县委：纪念馆不要修。农民世代生活在那个地方，不能让他们迁走。要把那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利于发展生产。一九五九年，因为来访的中外宾客很多，仪陇县将朱德父母住过的几间瓦房修整好，建立起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还陈列着朱德少年时代用过的劳动工具和学习用具。朱德看完后说：“不要搞这个了。在这里办所学校，节省开支，让娃娃们念书。你们看现在就改好不好？”事后，他又几次给省委、地委打电话，再三叮嘱：把那个陈列馆办成学校。以后仪陇县委书记到北京，朱德见面后又问：“学校办起来没有？”县委书记告诉他办了一个班。朱德说：“太少了，多办几个班嘛！”县委书记解释道：天天有人来参观访问，得留几间房子陈列展品。朱德坚持说：“琳琅寨那个陈列馆，请保留我的意见。”(26)

三月十一日，朱德回到仪陇县城，在同中共仪陇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仪陇这个地方，有山林竹木、山货药材，可以发展蚕桑、油桐、白蜡，还可以种植果树，生产潜力是很大的。你们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

部和群众，开发山区富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品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并嘱咐，“你们要老老实实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27)第二天，朱德回南充后，在听取中共南充地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速农业的发展，对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有很大意义。要大力发展山区生产。“山区也有山区的长处，要根据地形的不同，从实际出发，适宜于长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律。”(28)

三月二十日，朱德到河南省视察。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向他汇报农业问题。朱德指出：“农业的重要问题是改革技术。”“工业一定要支援农业。”(29)

四月二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报告中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相同，农作物的种类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30)朱德坚持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这些主张，实际上表明他对“以粮为纲”和取消商品生产这些“左”的错误仍是不同意的。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的继续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一九五九年的工农业生产遭到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破坏。从一九六〇年上半年起，全国的市场供应日趋紧张，粮食供应更是严重不足。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31)

朱德对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极为关注。六月十一日，他在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致函刘少奇，对解决当前粮食不足问题提出四条意见：一、要多种红薯、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数量。同时，还要多种瓜、菜，以代替粮食，做到有啥吃啥。二、在新疆、青海、内蒙和东北等高寒地区，要多种深根作物，如糖萝卜等。三、在粮食吃法上，应提倡粗粮和细粮混吃。四、要注意发展短途运输，以便把“死角粮”运出来。(32)中央很重视朱德这封信，把它作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之一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

严重的经济困难，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一九六〇年下半年，中央开始注意纠正以“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调整有关政策。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33)朱德对这些规定十分赞赏。

不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等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他着重讲了“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农村工作情况和“农轻重”的关系搞清楚了，摸到了底。过去我们虽然也常说“农轻重”，但实际上没有那样做，仍然是“重轻农”。我国的轻工业和手工业是有底子的，今后应注意发展轻工业。钢铁工业宁肯少建设一点，也要多给轻工业一点投资，这应该成为今后的长期方针。轻工业发展了，可以多出口一些轻工业产品，换

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来。今后的对外贸易，主要应出口轻工业产品，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主要出口农副产品。这是一件大事，应该重视。(34)

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进行整风整社。一月十八日，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高兴他说：今年我们是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很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发展重工业，这是正确的方向。他还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发展农业一定要注意开荒和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运输业要特别注意发展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因为我国的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比较落后，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了，就可以减少人力运输，以便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和轻工业生产。(35)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次会议是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重要转折点，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会议刚一结束，朱德立刻在一月二十日离京南下，到上海、浙江进行调查研究。一月二十六日，他在视察杭州西湖人民公社龙井茶叶生产队时，健步登上狮子峰，俯瞰盘山条田和碧绿的茶树，怀着喜悦的心情对陪同人员说：我国荒山很多，如果都能象这样开发出来，在南方种上茶树、柑桔，在北方种上核桃、柿子，能创造多少财富啊！这才叫“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呢。他还即兴作了《看西湖茶区》诗一首：

狮峰龙井产名茶，生产小队一百家。

开辟斜坡四百亩，年年收入有增加。(36)

朱德在浙江视察时，认为在养蚕中实行“四包一奖”制的经验很好。一月三十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浙江养蚕的经验是，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量、包产值、包工分、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四包一奖”制。凡实行这一办法的地区，群众满意，包产顺利。(37)

随后，朱德又到福建、江西、广东视察了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并听取三省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和八届九中全会精神情况的汇报。当时担任福建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的梁灵光回忆道：

“我向他汇报了福建的工业生产情况和发展经济的设想。

朱总听得很认真，听后谈了一些意见。我现在记得的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要重视对外贸易工作，发展对外贸易，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产品的数量，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就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外汇，加强经济建设；二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702_1.bmp}

是除了发展工业外，还强调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发展工艺品，这样既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也可以组织出口，赚取外汇。

当时福建面对金门、马祖，被强调为地处前线，资金摊不到，项目排不上，发展工业有困难，成了沿海各省中经济最落后的省分。朱总根据当时情况，强调多发展工艺产品。现在看来，朱总的这些意见都是很对的。”(38)

对福建的农业，朱德“主张搞多种经营，认为国营农场应成为多种经营的基地，不能单打一搞粮食。”(39)

在福建期间，他还去看望了原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并且事前叮嘱：“不要告诉他，如果告诉他，他就要来的。”他们谈得很欢洽。第二天，

陈绍宽带了一束自己种的鲜花去看朱德，朱德也还赠了一盆兰花。陈绍宽很受感动，“经常对人讲，朱总司令为人好。”（40）

三月六日，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福建、江西两省的情况时着重指出：包产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指派的办法，使生产指挥权真正掌握到群众手中。“群众普遍反映有七满意：对退赔兑现满意；对分配兑现满意；对超产奖励满意；对自留地满意；对‘三包’落实满意；对于部作风转变满意；对春节供应满意。”（41）

在广东视察期间，朱德于三月十三日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要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来，我们对兄弟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多些，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则做得比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主观上注意得不够。就现在的形势来看，帝国主义的‘禁运’是禁不住的。”因此，今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他提出：在外贸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这两条”，“所谓‘以进养出’，就是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所谓‘以出带进’，就是只有多出口才能多进口。”他还说：“我们的对外贸易不是搞一年就拉倒，而是要长期搞下去。”（42）

三月十四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会后，在三月二十四日离开广州，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视察。朱德看到四川省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感到十分高兴，四月三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自中央紧急指示信传达贯彻以后，四川的手工业、自留地和集市贸易都恢复得比较快。小商品、蔬菜、食品等均不太缺乏。集市贸易很热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农民很高兴。今后要使市场比过去更繁荣是完全有可能的。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增加，使农民家家富裕起来，生活过得好些，也是有可能的。（43）

朱德回京后在五月九日给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并对一些问题提出意见：

第一，“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第二，河南省虽然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困难仍然很大：农民体力弱，患浮肿病的人还不少，牲畜死亡多。第三，四川农村的公共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陕西的群众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

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豫东调查，允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

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第四，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存在不少问题。第五，集市贸易恢复后，市场活跃了，产品增多了。但是，也出现了投机倒把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营商业对集市贸易的领导。第六，现在县与县、社与社之间，仍然进行经济封锁，物资不能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迅速打破。第七，国家规定“不许长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44）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继续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问题，制定《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等文件。

朱德在会上先后两次发言。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的发言中说：农民对一九五七年是很留恋的。这说明高级社时期的工作走上了轨道。一九五八年以后就搞乱了。现在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问题。农民总要有点多余的粮食，这些粮食国家就不必去统了，可以用来解决市镇本身的需要。农村市镇上的茶楼、酒店、饭馆要恢复起来，这是农民十分需要的。有些工厂、合作社合并不当的，要恢复原来的状况。(45)在六月六日的发言中，他指出：现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办法太死，收购的种类也太少，这样不好。今后要改进收购办法，扩大收购种类。另外，现在的收购价格也不合理。如今年的水果比往年增产，但收购上来的却很少，原因之一就是收购价格太低。这几年农村的牲畜死了不少，农具损失了很多，生产力遭到了破坏，这是个大问题。现在要把农村集镇的铁匠、石匠等手工业者都迅速地组织起来，恢复生产，帮助农民建立家务。(46)会议结束后，为了了解“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执行情况，朱德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和武汉、广州等地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报中央。七月二十九日，朱德在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三条意见：

第一，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劳力安排恰当，分配合理，这方面的生产是大有可为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建设速度，抽出较多的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第二，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户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又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第三，现在城市人民公社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制度很乱，职工在这方面的意见不少。如果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在工资福利上，各厂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一定的工资福利标准，酌情自行调整。(47)

十一月二十一日，朱德在转报《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说：

“武汉市和广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业调整为手工业合作社或单独核算的小集体企业，结果很好。我的意见，全国城市工业，均应参照武汉市和广州市的办法，适当进行调整。”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工人的雇佣关系、合作关系和师徒关系分不清，以致将不少手工业技术工人错划为小业主。应该指示各地，根据一定的标准，适当纠正。”(48)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困难还很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二月三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他在总结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

教训时说：

“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经过这次会议，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住。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朱德还根据他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指出：

“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工作发生了错误，只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评，下面怨气就容易消。”“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49)

朱德在发言中还总结了生产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说：

“这几年出了歪风，但生产积极性、工作积极性还应该保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应该搞。问题是要稳步地、实事求是地搞好，这样积极性就会更高。干了一件事再干一件，不搞盲目的积极性，不能做不到的偏要做，强迫命令，惩办主义。那一套‘左’的歪风要痛改。”“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的搞。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个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50)

为了将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及时贯彻下去，进一步执行调整方针，更好地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德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启程赴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等地视察。他在视察中，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耐心地向当地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反映下面的实际情况，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朱德在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话时指出：要搞东西，搞家务，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手工业由全国包起来吃亏不小。平均分配制度，再过二十年也搞不起来。还是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51)

视察浙江和江西两省后，朱德在三月三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群众感到满意的是：第一，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第二，把生产队划小；第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四，允许种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第五，停办公共食堂。又说：群众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等，不仅不影响集体生产，而且是集体生产必不可少的补充。(52)

朱德在视察中发现，有些地方在恢复供销合作社时，将国营商业和供销

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混淆了。他回京后，在四月十六日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应该严格区分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信中说：

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分工，不是在售货种类方面的分工，而是在所有制方面的分工，即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供销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两者应平等互惠地做生意，依照合同和规章办事，实行经济核算，彼此不能混淆。又说：我国地广人众，尤其山区交通很不方便，只靠国营商业是不行的。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减轻国家负担，国营商业也才能办得更好。(53)

五月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八日，朱德在小组会上针对那种认为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倾向”的错误看法说：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农业）和副业两不误。“农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54)

会后，朱德从五月十五日起，又先后去陕西、四川、云南三省视察。五月二十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

现在陕西、四川集市上的饭铺都没有了，农民赶场买不到饭吃，感到很不方便。可以允许私人或供销社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这样既能养活一部分人，又方便群众。陕西省的煤炭企业现在普遍赔钱。大型企业亏本出售还可以由国家贴补，小煤窑长期赔下去就无法再维持生产了。而小煤窑的生产在解决当地民用煤方面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因此，煤炭调拨价格可以不变，但是小煤窑的零售价格应当允许地方上适当调高，不要统死。这样做，群众也不会有太大意见。否则，这些小煤窑赔垮了，当地群众在烧的方面将会更加困难。(55)朱德在四川西昌地区视察时，曾派人重点调查了一个生产队。五月二十六日，朱德致电中央，如实反映了这个生产队的情况：

“这里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这个生产队的群众，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只有十斤（十六两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十一斤四两。在夏季插秧大忙季节，一个全劳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口粮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执行政策上也还存在问题。如公社规定，在完成征购和储备任务后，即使生产队还有余粮，每人每天的口粮也不得超过十二两。口粮是十天一发，主要是怕群众吃了‘过头粮’。对群众开垦小片荒地还有限制。总之，对农民箍得太死，因而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56)

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思考过许多问题。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说：

第一，全国在统一政策下，具体作法要因地制宜。各地可以有细则，有区别，不能强求一律。如所有制、责任制、经营管理等，各地可以有所不同。第二，当前主要是反“左”，而不是反右。要提意见，不要怕说右了。第三，今后建筑部门可以出国，搞劳务出口。第四，商业部门完全统一有问题。粮食部门要有利润，不能赔钱。第五，集体副业与家庭副业要同时并举，有许多事情要靠家庭而不是靠社会去解决。第六，要鼓励农民开荒，可以规定几年不征税。(57)

八月，朱德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又指出：

第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很好地解决。个人没有住、没有吃、没有家，集体如何巩固？因为生产没有劲了。反之，家庭生产发展起来，生活改善了，集体才会巩固。第二，“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第三，要发展机关生产，不能因为有贪污分

子而把机关生产一笔勾销。对贪污分子要以法惩办。第四，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开放自由市场利多弊少。既然开放，就必然有两个市场，两种价格。(58)

九月六日，朱德看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后，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提出四条意见：

第一，应该迅速恢复供销社渠道，这是促进生产和繁荣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第二，应该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促进生产和流通。改变过去那种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第三，要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做生意，抽调一批好的党员干部充实和加强商业系统。第四，要注意调整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长远来看，应该按照价值规律，逐步缩小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在价格上的不合理的差距，使价格走向合理化。在当前，应注意调整价格中可能产生的更加扩大的差距。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应逐步解决粮价倒挂、粮棉差价和工业亏损等问题，建立各种价格合理的比例关系。(59)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据。会议把在农业上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会议仍决定继续进行经济上的调整。毛泽东也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九月二十五日，朱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说，由于我们在工业上贯彻了“八字方针”，在农业上贯彻了“十二条”和“六十条”，国内形势已大力好转。再加上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补充，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农民是很高兴的。“农民今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60)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三年二月的将近两个月里，先后视察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看了不少工厂、农场、矿区和人民公社，听取各级党政负责人汇报，对经济工作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在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你们要多搞出口产品。”“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61)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对上海市商业局、外贸局负责人说：国营商业与基层供销社是买卖关系，不能平调。要使基层社有利可图。不办好基层供销社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而且居住分散，只靠国营商业统不了。要通过基层供销社与广大消费者发生关系。(62)

一九六三年一月，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视察，考察了琼崖县的集市贸易，向当地负责人说：对集市贸易应该加强领导，不可硬反。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反不得。(63)陪同他视察的海南军分区副政委陈青山回忆说：

“车过嘉积市（琼海县城），他叫停车。我请他到县委休息一下，但他不休息，叫下车。一下车，他就转入集市中去看了，我只好跟着。他逐一问价格，菜多少钱一斤？鱼、肉多少钱一斤？原来他是就地调查研究。他向群众打听，我在旁边为他翻译。快离开集市的时候，他被群

众认出来了，都说：朱总司令来啦！围上好些人。我有点着急，请他快走出集市。他说：‘不要紧，别这么紧张嘛！’后来慢慢走出集市，上车继续前行。海南很穷，嘉积是当时比较富的地方了，朱总看了很高兴。”(64)

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又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强调：海南岛一定要以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为主，因为全国只有这一个地方最适宜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65)

在河南时，他对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说：煤炭的价格问题要解决，不能长期亏本，长期亏本就不能发展生产。(66)

一月三十日，朱德在广西对桂林市的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一定要摆好，只顾那一头都不行。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育国家、集体的发展。他说：“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那能建成社会主义？”(67)

朱德回北京后，在三月二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报告，对今后如何办好供销社和开发海南岛的问题，再次提出建议：

目前应加强基层供销社的工作，通过社员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等活动，恢复以往那种民主管理、群众办社的优良传统，使供销社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供销社。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应抓紧开发，并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从战略和长远规划上来看，海南岛必须做到粮食自给，但从目前开发阶段来看，国家必须在粮食、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援。要动员生产队以及社员个人广泛地种植热带经济作物。(68)

朱德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在三月十六日前往陕西、四川两省视察。他在听取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9)

三月二十一日，朱德到了四川省剑阁县的剑门镇，顺着赶场的人流漫步街头，对集市贸易进行现场调查。三十日，他在成都听取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杨超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朱德插话说：粮、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容易落空。粮食每年增长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几。你们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计划。要发展多种经营，畜牧业要大发展，以便解决人民群众的吃肉问题。(70)

四月十三日，“朱德在重庆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谈话时指出：对私商单纯取缔不行，在边远山区还需要私人贩运。公家办不了，办了也要赔钱，如向山区挑盐就是这样。(71)

朱德回到成都后，又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四川原来是很富的地方，为什么这几年穷了？不能只怨大旱。除天灾之外，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自“大跃进”以来，这也不准搞，那也不准动，限制太死。收购价格也不合理。搞生产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适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又说：你们可以多生产些出口物资，也可以开放游览区，以增加外汇收入。(72)

回京后，朱德在五月十三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反映视察陕西、四川两省的情况说：

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应该“水”字当头。从长远看，这是保收和增产的根本办法。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如竹、木、藤、棕、丝、茶、桐油、山货

药材等，应大力恢复和发展。“现在农村的经济作物和多种副业生产虽然在恢复，但还远未达到过去水平。因此，应当十分注意发展集体和社员家庭的副业生产。否则，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对于集体经济的巩固也是不利的。”(73)

五月十八日，朱德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常称为前十条）。他在会上发言说：农民对我们党是很信任的。但是，由于过去法律不健全，往往靠行政命令办事，有时第二个命令把第一个命令否了，第三个命令又把第二个命令否了，因此，农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不行。又说：“在农村搞政治运动，必须达到增产的目的。”(74)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后十条）。九月十八日，朱德在华东组会上发言。他在谈到“统一集中”问题时说：“我赞成‘统一集中，合理布局’的意见。但是，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如果什么都统起来也会出问题，国家背不动。因此，必须区别情况，该统一的一定要统一起来，不该统一的不要硬去统一。有些东西可以分散依靠群众自己解决的，不要都由国家包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75)

会议期间，朱德了解到煤炭生产因价格偏低而影响生产的情况后，在十月十五日写信给周恩来说：

“现在大部分煤炭企业的生产仍然亏本，这个问题是应当加以考虑的。”“作为工业燃料和原料来讲，煤炭工业是基础，应当有合理的价格”，“应当保持盈利，不应当亏本。同各国比较，我们的煤炭价格偏低了。”信中提出：“在发展生产中，怎样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应当指定一些人，切实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总结一下这方面的教训，并且在三年调整中，逐步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价格政策来。”(76)

一九六三年五月至九月间，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五省部分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成灾。当时我国刚刚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有限。

十月十六日，七十七岁高龄的朱德赶往灾区，了解灾情，指导抗洪救灾。他首先到了河北保定，这里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连下七天的暴雨，把杨各庄一棵五百多年的槐树都冲倒了。朱德听完中共保定地委和保定市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说：今后应注意多种点耐涝的高秆作物。沙土地不适合种粮食可以种花生。水边可以多种苇子，它是很好的原料(77)。当天，他又到石家庄、邢台、邯郸了解灾情。

第二天，他到了河南安阳。安阳地区灾情之严重也是多年未遇的。洪水自卫河、漳河涌来，有七个县、六千余村庄被水包围，一千多个村庄被淹没，八十七万人急待救援。朱德在当地强调：救灾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78)

接着，他又先后到河南新乡、郑州、开封、商丘，江苏徐州，安徽宿县、蚌埠、合肥，山东济宁、泰安、济南、德州，河北沧州等地了解抗洪救灾情况。朱德对中共新乡地委负责人说：盐碱地可以植桑，种水果，不一定种粮食。(79)他对中共开封地委和开封市委负责人说：开封是交通要道，直通安

徽、山东。在救灾中，要恢复过去的经济渠道，现在很需要小商贩，供销社也要活跃起来，去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收购农副产品。(80)他对中共蚌埠市委负责人说：在救灾中，对长途贩运要放宽一些，还可以有组织地去搞。(81)他对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要调整好，农民有家底很重要。生产稳定了，干部团结了，就能取得群众的信任。”(82)

回北京后，朱德在十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反映五省抗洪救灾的情况。信中说：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的抗洪救灾工作，灾民已经初步安定下来。目前灾区的主要困难是群众的口粮不足，药品缺乏，特别是奎宁奇缺。受灾各省都希望能从邻省的非灾区调一些于菜支援灾区，卫生部能调拨一批药品供应灾区。为了帮助灾区尽快克服困难，应当加强灾区的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应当为灾区的副业生产积极组织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收购，帮助灾区同外地挂钩搭线，组织物资交流，并向缺少资金的社队发放贷款。(83)

经过几年的调整，到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这时，一些干部中急躁情绪又开始抬头。朱德既看到经济形势有好转的一面，也看到仍有困难的一面。

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至四月六日，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又在近一百天的时间里行程万里，连续视察了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他每到一地，都注意从各地的不同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视察上海后，他在一月十七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说：现在上海市基本上成为一个生产门类比较完整、物质基础比较好和技术力量比较强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今后应该更加充分地发挥这个基地的作用。(84)在福建，他向省委负责人指出：福建临海，你们要多注意海外的事情，有几百万人在海外，要努力做好海外的工作。(85)在江西，他对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说：现在群众搞多种经营的劲头比干部大，干部应该来一个大转变，大抓一下多种经营。(86)三月十四日，他在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广西这块地方是亚热带，是全国少有的好地方。不仅发展农业大有可为，而且发展林、牧、副、渔业也大有可为。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地下的许多宝藏还没有开发出来，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十分优越的条件。(87)

四月二十三日，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外出视察报告，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当前，不论农村还是城市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很好。”但是，“困难还是存在的。当前农业生产包括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还没有全面恢复和发展起来。一些老灾区要全面恢复农业生产，还要做很大的努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这些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88)

这时，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左”的思想指导下，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常称为二十三条）中，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国内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但是，朱德仍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工作上。一九六四年六月至八月，他又赴内蒙和东北三省视察，调查了解国民经济恢复情况。

十二月十五日起，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二十三条”。二

十七日，朱德在会上发言，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也有坏的。从点上摸的情况来看，当权派好的不多。应该说还是好的多。有些同志看到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就急躁起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该审判的人还是按法律办事，要少杀人，把工作做细一点，把坏人当人来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好人，这样才好。(89)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讨论调整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问题时，朱德在会上提出：“供销社要到农村去换东西，不拿票子把农村的东西收起来，是最大的损失。”“要合理合法地把生意做活，生意做活了，财富就有了。农民手里有了钱，就可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90)朱德的意见，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和李先念等人的赞同。十二月三十日，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91)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持续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经济调整工作，被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所打断。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些正确主张和意见，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

朱德有一个业余爱好，那就是种养兰花。兰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中历来被看作坚贞高洁的象征。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初参观北京中山公园兰花展览后，曾经写了一首诗赞颂兰花的这种品格：

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

朱德一向喜爱兰花。建国后，他年事已高，种养和欣赏兰花便成为他很少的业余闲暇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不仅有丰富的养兰经验，对兰花的鉴赏也有较高的水平。他以兰会友，结交了不少兰友，其中有兰花专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寺院和尚和业余兰花爱好者。

广州华南热带植物园养兰女工程师程式君回忆同朱德的交往时说：

“朱总每次来，都很随便，同我们以兰友相交。他到兰圃参观时，也把我们带去，借以交流经验。当他了解到我们植物园经费和人员都不足时，便对我们说：‘我们交个朋友，我把北京的地址留给你，你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随时给我写信，我尽力帮助解决。’他的和蔼慈祥和亲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92)

北京中山公园内有许多名贵兰花是朱德赠送的。当公园建立“兰室”时，想请他题字，朱德欣然答应下来。几天后，他非常认真地写了几幅字让公园挑选。朱德对公园“兰室”的建设抱着很大的希望，叮嘱他们：“作为国家的珍贵财富，要好好保护这些兰花。”(93)

朱德养兰花，还着眼于推广繁殖，供人民群众观赏。解放前，兰花可以说是只供有钱人玩赏的。一些名贵品种，一般百姓更难以见到。朱德曾经说：“兰花不能象过去那样只供少数人玩赏，要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94)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对南方一些省的代表谈了要重视种植兰花的问题。“他说，这既可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又可组织出口，赚取外汇，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95)

朱德广交的兰友中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北京中山公园的虞佩珍工程师讲了一个“花为媒”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期，日本知名人士松村谦三作为友好

使者来到中国访问。他和朱德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在访问期间曾到中山公园兰室观赏，他向公园点名要了四个兰花名种，不久又回赠了几个日本品种的兰花，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三次会议后，在长达八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再也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连朱德种养兰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说这是“资产阶级情调”。朱德看到后，只是很平静地对康克清说：“种兰草有这个事”。“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96)

四十三、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新中国成立后空前的政治浩劫。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朱德正是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

当“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的前夜，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早已处处可以感觉到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旨，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伪证，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借林彪身体不好，逼林“让贤”。同时，还对罗瑞卿不赞成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提法进行批判。在会上，朱德实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的，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他没有料到，这次发言以后竟成为林彪、康生等人攻击他的重要口实。对于罗瑞卿的所谓“篡军反党的问题”，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样，事先毫无所知。康克清后来回忆说：“朱总参加上海会议（指那次中央紧急会议）后不久，到了杭州。当时，我正在江西搞‘四清’，便赶来看他。吃饭时，我发现他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摇头。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他这个样子，我很担心，就问他：‘老总啊，身体不舒服吗？’他摇头不语。饭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就不要多问了。’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后来，他的秘书告诉我是因为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我才知道朱总忧心忡忡的原因。”

这以后，局势发展得很快。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反党集团”的吓人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

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

“文化大革命”会那样发展，是朱德原来所没有想到的。这一年，他已经八十岁了。当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叛徒”、“走资派”，受到批斗、抄家，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个当时在朱德身边工作的秘书回忆说：“一九六六年冬的一天，我去给朱总送文件时，看到他仰靠在沙发上，紧闭双目，直到我走近前，他才睁开眼睛，他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他说：‘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连老的也保不住了。’看他当时的表情，心事很重。”

但他在参加中央的会议时，还是但然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十二月六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九天后，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

可是，整个局势却越来越恶化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比以前更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一月十一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这自然使朱德更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

一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康克清回忆说：“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团的造反派们围在楼前，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我们家里，墙上、地下，到处都是。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他们一直闹到很晚才散去。”

当朱德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了攻击朱老总的大字报。周总理闻讯赶到朱老总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体，劝说老总到比较平静的玉泉山休息。在老总身边工作的同志告诉我，朱老总已去看了那张大字报，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说那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11）

一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大街上。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梓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她在会上说：“清华大学揪出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12）

会后，她给康生打电话，探询中央文革的态度。康生回答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13)于是，聂元梓几次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面对突然袭来的恶浪，朱德泰然自若地向康克清谈了两点看法：第一、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14)

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在开会的前一天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大会没有开成。事后，戚本禹责备造反派们：“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15)

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保护了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这年二月，在他的具体安排下，正受到造反派批斗围攻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从外地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江渭清回忆说：

“我到北京后，听到朱德同志也受到批判、攻击的消息后，很为他老人家担心，便拨了个电话给朱德同志。接电话的是康克清同志。我提出想去探望朱德同志，她很快答复欢迎我去做客。

之后，我来到朱德同志的家中。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和安全情况。说心里话，在当时那种处境下，听到他老人家的一番问候，我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今天请你来，我们随便谈谈心。’朱德同志微笑着说。我更加感动。

落座后，我把自己心中的疑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我向朱德同志叙述了江苏省‘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我说：‘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抓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朱德同志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苏的情况。我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接着，朱德同志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

他又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他老人家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启发了我。我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谈话后，已近午时，朱德同志留我吃饭。这时，我不免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顿饭就会受牵连吗？’他开心地笑着说。我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可还是犹豫不决。康克清同志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朱德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我听了他老人家的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16)

可是，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就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

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没有参加这几次会议。但从此以后直到党的九大的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不再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权。朱德的文件被停发了，他的保健医生被调离，他的行动也受到各种限制。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表示：我要保他。他才没有遭到残酷的人身迫害。

这年五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许多地方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公检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遭到冲击，银行、仓库、机要档案部门遭到抢劫，铁路交通遭到破坏，违法事件不断发生，整个社会处在大动乱中。康克清回忆说：“朱老总听到有些地方武斗很凶，甚至有的部队也参加了武斗的消息后，很痛心。他说，‘用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矛盾，怎么行呢？’”（17）他的秘书在谈到当时情况时说：“这一段时间，朱总一直很沉闷，他想去找主席谈谈，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有一次，朱总要我陪他去找总理，可到了总理门前，他又犹豫了，最终还是没有进去。”（18）

一九六七年，对于朱德说来，是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中度过。有些人不敢再接近他。个别曾在他那里工作的人甚至写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来批判他。他的夫人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弄去游街、批斗。他的子女被禁止进入中南海、他的儿媳赵力平回忆说：“这时，中南海已不让我们进去了。一次，我们到北京，是妈妈（康克清）从妇联来接我们，然后在前门外的一家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交谈。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19）

然而，林彪、江青等没有就此罢手。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他们更加紧了打击迫害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一九六八年七月，康生将他分类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送给江青。名单中，刘少奇、邓小平等八十九人被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朱德、陈云等二十九人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七人，有病的三人和去世的二十八人，只余下三十七人（名单中漏了林枫和黄克诚）。前两项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

同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七百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20）不久，康生在谢富治送审的报告上批道：“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奸们的阴谋罪行。”（21）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十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四十四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四百余件，制造出一起起假案、错案。

这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九人。朱德参加了这次会议。当一些人在会上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朱德在小组会上依旧坦然地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师，是否真正反毛主席？”（22）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在十月十七日的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23）

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八十二岁的朱德始终泰然处之。正如萧克后来评价的那样：“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钦佩。”(24)他在全会结束以后，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三百八十件讲话稿、文章重新认真地翻阅了一遍，检查自己的言行。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到九大召开的五个月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继续加紧对朱德等的攻击和诬陷。十一年后，吴法宪、邱会作等被押上法庭时，在事实面前，承认他们所讲的话“没有根据，都是捏造的，就是为了突出林彪”，“完全是跟着林彪摇旗呐喊。”(25)

在他们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中，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份荒诞离奇的供词，却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汇报后说：“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诸就是个大成绩。”直到党的九大以后，谢富治仍对办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26)

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九大上，尽管林彪、江青一伙百般阻挠，由于毛泽东的表态，朱德等还是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就在九大开幕前夕，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当时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的估计，在九大后开始全国性的备战工作，并决定：十月二十日前，将在京的老同志疏散到各地。董必武、朱德、李富春等去广州；陈云去南昌；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后去郑州）；徐向前去石家庄；叶剑英去长沙……

十月十八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紧急传达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康克清回忆说：“战备手令下达后，朱总对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27)

十月二十日中午，朱德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随后，住进广州郊区的从化温泉宾馆，在这里居住了九个月。

在广东的这些日子里，朱德的生活虽然清静，却受到种种限制和冷遇。平时只能在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连去一次广州市区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到工厂、农村去看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多次在会议上攻击朱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朱德接到通知：准备参加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他离开广东返回北京，住进西郊万寿路的“新六所”，没有回到他居住了二十年的中南海。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突然袭击，准备夺取更多权力。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在这次突然袭击中打头阵的陈伯达。

庐山会议后，随着批陈整风的进展，毛泽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一伙的权势。林彪一伙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因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仓惶乘飞机出逃，终于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集团失败后，朱德的心境舒畅多了。他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时，在军委直属组说：我好几年没有和军队同志在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28)

他仍十分关心生产，随着处境的好转，又能到工厂、农村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并且恢复了会见外国议会代表团和外国友人的活动。

一九七三年八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后来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老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领导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29)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处理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30)

尽管毛泽东这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错误的。当局周恩来在批判林彪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时，毛泽东又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因而又错误地支持江青一伙把林彪集团的性质定为极右而不是极“左”，使周恩来等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努力归于夭折。江青等乘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周恩来等。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在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以“批林批孔”为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不指名地进行攻击。康克清参加了这次大会，她回忆说：“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向朱总讲了。我说：‘听了江青的

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听了我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 (31) 事隔两年多，当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党内健康力量同“四人帮”之间发展到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康克清乘车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她后来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叶帅，他把我带进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音量放得很大。他问我：‘朱老总逝世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就把朱总对形势分析的那段话说给了他。他听后说：‘噢，朱老总还有这样的分析。’” (32)

这年八月，八十八岁的朱德来到秦皇岛海军基地，在接见舰艇指战员时，又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党的老干部是宝贝呀……我们做的事情是光荣的，是有前途的。” (33)

这年，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了七年半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走出监狱，便来看望朱德。朱德对他说：“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兴时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 (34) 这次谈话，正是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夜。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经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朱德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久，他又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他在七三年也曾多次写过这一内容的条幅。” (35) 在这以后到他逝世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频繁地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单单出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就达到四十多次。

{ewc MVIMAGE,MVIMAGE,!09100020_0735_1.bmp}

四届人大后不久，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九个月里，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

对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朱德是十分欣慰的，他称赞道：在毛主席的领导

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36)原辽宁省委书记周桓回忆说：“一九七五年底，我去看望总司令，他对我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接着，他又谈到，要抢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嘛？！他们要打倒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是党树起来的，要打倒我，就得先打倒共产党。现在虽然有人还在捣乱，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胜利。”(37)

然而，整顿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同时，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正是在这样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全国人民顿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他是一九二二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五十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一九七四年六月才住院的。朱德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作“八段锦”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

“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现在是四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五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五点半可以离开，六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未一趟。’

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五时五十分，朱老总到了，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朱老总已八十九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老总说：‘这个可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开始了两位老战友的谈话。”

“六时十五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38)

周恩来这样快地去世，是朱德怎么样也想不到，也难以相信的。她的女儿朱敏在第二年回忆道：

“去年元旦，我父亲病刚好一些，就出了院。他在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总理病重的消息。一月八日，总理逝世时，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

那天下午，他正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妈妈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他听了后，连这也不相信，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敬爱的周总理会这么快去世，他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呀！晚上八时，当他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父亲掉泪的。一九七四年，我哥哥因病突然去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没有掉一滴眼泪。”

“当他听到总理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便很严肃地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我们：‘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我们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他却说：‘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就开始讲总理革命的一生。当时，我们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向总理遗体告别时，父亲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在总理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总理举手致敬！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他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是就在出发之前，九十高龄的父亲，由于哀悼总理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39)

周恩来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挽联、悼词……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这年四月“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朱德有一次同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谈话，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40)这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朱德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而朱德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在放有冷气的房间里等了近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他便感到身体不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二十五日晚，朱德因病情加重，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但进入七月后，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

朱德住院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委托他的女儿“几乎每天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朱老总的病情。”(41)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同看望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七月五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当他看到站在病床前的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人时，“他努力地要抬起右臂和他们握手，却终于没有抬起来。在场的老师、大姐们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42)很快，朱德就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朱德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享年

九十岁。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里。

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听完华国锋的报告，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43)

朱德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街，含着热泪，目送着灵车西去。

朱德的逝世，在各国或地区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是：

“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

“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

“无私地忠于职责的典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是朱德九十周岁诞辰日。一个多月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一天，康克清携同家人来到绿荫环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她把一束鲜花放在朱德的骨灰盒上，她要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告诉九泉之下的朱德，让他和中国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

十年后，朱德一百年诞辰的时候，胡耀邦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隆重的纪念大会上对朱德的一生作出高度的评价：

“朱德同志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气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功盖千秋，更令人怀念的是，朱德同志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士兵，堪称楷模，他的德行与日月同辉。”

“朱德同志光辉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伟大胜利融合在一起的。

四十年前，在他六十诞辰时，毛泽东同志称他为‘人民的光荣’。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给他以高度评价。对这些称誉，朱德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他一生思想的高尚，人格的伟大，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印象。它将传诵千古。对新一代年青的领导者的成长，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44)

注 释

一、佃农的儿子

袁鸿裔：《朱世林墓碑寿文》，1925年立。

(13)(14)(15)(16)(17)朱德自传（1886—1937），手抄稿本（这是朱德在1937年口述，由他的秘书孙泐等笔录的）。

访问朱代良记录，1978年5月18日。

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3、114、111、112页。

高光照：寿文，《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第11、12页。

(11)访问席绍华谈话记录，1978年5月16日。

(12)《朱德委员长的青少年时代》（邓新整理，《人民的光荣——朱德委员长光辉战斗的一生》（一），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内部本，第256页。）

二、走向广阔的世界

刘长征（刘寿川的儿子）：《回忆尊敬的朱委员长》，未刊稿。

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体育学堂章程，四川学报，2年3册，光绪32年3月。

《体育学堂甲班学生第二学期积分表》，原件。

《体育学堂第一学期学生姓名籍贯年龄册》，原件。

(11)萧向成：《朱德故里》，文物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9页。

(12)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2页。

(13)(15)[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90、92页。

(14)访问张与九记录，1978年4月24日，1983年5月13日。

三、奋身军界

(15)(24)(29)朱德自传，年抄稿本。

《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宣统元年7月，陆军教练处铅印所排印本，第1、2页。

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6月版，第136页。

马伯周：《回忆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的部分革命史实》，1978年11月26日，未刊稿。

《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人录》，第39页；《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第一队学生姓氏录》，原件。

(11)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1977年11月，未刊稿。

(32) [美]宁谟·韦尔斯：《朱德的一生》，《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2月版，第118、119页。

《朱总司令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前线》第11期，1940年1月1日。

(18)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12)周开勋：《云南讲武堂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167页。

(13)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第322页。

(14)《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号，1906年10月15日。

(16)(17)(18)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78、379、381、382页。

(19)(21)[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00、101页。

(20)黄兴、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第60页。

(22)詹秉忠、孙天霖：《蔡锷对云南同盟会的态度》，《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8页。

(23)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同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版，第30页。

(25)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1977年11月，未刊稿；马怕周：《回忆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的部分革命史实》，1978年11月26日，未刊稿。

(26)(27)朱德：《辛亥革命杂咏》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卷首。

(30)任可澄：《批迤南剿匪事务所督办详情赈恤黄喜被烧店房一案》，原件，1914年11月18日。

(31)王景弗（建水县知事）给云南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报告，原件，1915年9月29日。

(33)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6页。

四、护国名将

《朱德早年诗十八首》，《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第30页。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12月出版，第348页。

滇声报：《云南起义实录》，《护国历史资料选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第29页。

《云南都督府委饬第×号》（1915年12月30日），《共和滇报》，1916年2月2日。

《云南都督府委饬第×号》（1916年1月6日），《共和滇报》，1916年2月7日。

《董鸿铨入蜀讨袁日记》，《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37页。

《蔡锷致梁启超书》（1916年1月5日），《松坡军中遗墨》，《近代史资料》第4期，1963年。

杨如轩，《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步兵第十团）第二营入蜀讨袁日记》，《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85页。

(11)(13)《朱德陈述所部作战经过与唐继尧来往函》，《护国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清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20页。

(12)李曰垓：《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护国文献》，第670页。

(14)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15)《罗佩金、赵又新命令》（1916年2月18日），《护国之役总司令部作战命令》。

(16)《蔡锷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2月29日），《松坡军中遗墨》，《近代史资料》第4期，1963年。

(17)(24)李曰垓：《客问》，《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79、680、681页。

(18)《蔡锷致各支队长命令》，《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62页。

(19)孟雄成：《护国军蜀战通讯》，《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90页。

(20)庾恩旻：《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云南图书馆1917年印，第10页。

(21)《蔡松坡家书》，《近代史资料》第4期，1963年。

(22)《政府公报》第64号，1916年3月10日。

(23)《护国军第二梯团战斗详报》，《蔡总司令命令》（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25)《朱德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4页。

(26)吴玉章：《庆祝人民军队的创造者朱总司令玉阶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朱德委员长光辉战斗的一生》（一），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内部本1977年12月版，第23页。

(27)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五、从黑暗中走出来

《唐继尧通告由滇启程北上先平川乱电》，《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306页。

但懋辛：《川军驱逐滇、黔军概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96页。

朱德致唐继尧电，1917年12月1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1977年11月，未刊稿。

朱德、金汉鼎等致唐继尧电，1918年2月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朱德致唐继尧电，1918年3月13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欧阳励清：《跟随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的片断回忆》，1977年1月4日，未刊稿。

泸县文教局：《朱德在泸县》第64页。

朱德：《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解放》第11期，1941年3月30日。

(19)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85、386页。

(11)(12)(13)(14)《朱德同志早年诗抄》，《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15)《朱德早年读史批语选》，《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16)王嘉烈：《进德斋日记》，1920年1月9日条，泸州市政协档案。

(17)《朱德致任锐信》，1945年3月24日，手稿。

(18)(20)(21)(22)(23)[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50、145、177、150、152页。

(24)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25)(26)邓锡侯：《一九二一年川、滇、黔军阀混战前后》，《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44页。

(27)顾品珍：《自述由川战败回滇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91页。

(28)《邓泰中等致云南周省长、省议会等电》，1921年2月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9)《顾总司令就职之布告》，《义声报》，1921年2月25日，第5页。

(30)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公函第2号，1921年3月8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31)(32)《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3页。

(33)安恩溥：《顾品珍之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6页。

(34)靖国军总司令部训令，第31号，1922年3月2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3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六、远涉重洋追求真理

(28)[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71、173、175、178、193页。

李景泌：《我对朱委员长的回忆》，1978年4月27日，未刊稿。

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朱德在哥廷根的市民登记证，原件。

访问谢唯进记录，1978年2月27日；访问刘鼎记录，1978年6月1日。

(11)(26)访问房师亮记录，1978年3月8日。

(12)访问郭先彦记录，1978年4月27日，5月2日。

(13)入学注册证，1924年3月，原件。

(14)(16)魏时珍：《关于朱德总司令的回忆》，1978年4月24日，未刊稿。

- (15)访问李景泌记录， 1978年4月27日和4月30日。
- (17)访问刘鼎记录， 1978年6月1日。
- (18)段可情：《关于朱总在德国留学期间的一些活动情况》， 1978年5月27日，未刊稿。
- (19)刘鼎：《追求真理的足迹》，《红旗飘飘》第2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45页。
- (20)朱德致季子、莘农信， 1925年3月7日，原件。
- (21)访问谢唯进记录， 1978年3月15日。
- (22)(27)访问刘鼎记录， 1978年6月3日。
- (23)《德国警察为同盟国服务——警察对外国大学生的暴行》，《红旗报》（德文）， 1925年6月20日，原件。
- (24)(2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七、在北伐革命中

- 朱德的一次谈话， 1966年6月1日。
- 秦青川日记，秦蓉芳提供。
- 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25页。
- 杨森致外交部电， 1926年9月1日；《万县九五惨案史料汇编》，政协万县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第23页。
- 杜钢百：《万县惨案和朱德、陈毅同志》，《万县九五惨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88、389页。
- 《万县海关报告》，《万县九五惨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7—88页。
- (11)莫湘：《缅怀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1982年11月，未刊稿。
- 《中国共产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向导》第173、174期合刊， 1926年10月10日。
- 《旅鄂川人对万案之愤慨（续）》，《国民公报》（成都版）， 1926年11月6日。
- (12)刘伯承：《纪念杨闇公同志》，《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70页。
- (13)叶英俊：《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沿革表》， 1948年3月12日。
- (14)廖宾儒：《回忆朱委员长在1926年临万县政治学校讲话实史》，未刊稿。

八、南昌暴动

- 莫湘：《缅怀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1982年11月，未刊稿。
- 徐震球：《大革命时期跟随朱德委员长的片断回忆》， 1978年3月10日，未刊稿。
- 赵鞅：《朱德同志在南昌军官教育团》，《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人民出版社1977年6月版，第6—7页。

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14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1927年2月21日。

赵镕：《朱德元帅革命事迹回忆片断》，未刊稿。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47页。

(11)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赵镕致陈友群的信，1981年10月10日。

(12)金汉鼎：《八一起义前后见闻点滴》，1964年，未刊稿。

(13)张适南：《1927—1928年朱培德、王均在江西》，1964年，未刊稿。

(14)朱德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的谈话，1961年2月16日。

(15)朱德：《在北京市各界人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8月1日。

九、保存革命火种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59页。

赵镕给陈友群的信，1981年10月10日。

《起义军指挥员名单》，《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朱其华：《一九二九年底回忆》；正林：《南昌起义》（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辑；《党史资料》1954年，第6期。

(11)(17)(51)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44、48、55、69页。

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未刊稿，1978年4月6日。

宋之的：《从南昌到井冈山·伟大的朱德》，《星火燎原丛刊》1980年10月第2辑，第8页。

(5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43)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未刊稿，1977年11月。

(12)访问赵镕谈话记录，1985年6月14日。

(13)赵鞣：《关于南昌暴动中二十军的斗争情况报告》，《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08页。

(14)(15)《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第342页。

(16)廖运周：《回忆南昌起义前后的七十五团》，《南昌起义》，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328页。

(18)周士第：《起义中的二十五师》，《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49页。

(19)(20)(29)(35)(37)(38)(39)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

(21)(22)《一次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饶平党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4页。

(23)(34)[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42、245页。

(24)《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版，第 36—37 页。

(25)张启图：《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1927 年 12 月 22 日，于上海），《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第 135 页。

(26)(28)(41)(45)杨至诚：《艰苦转战》，《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79 年 11 月版，第 110、111、114、116 页。

(27)(36)(40)(42)(44)(46)(50)(52)《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394、125、395、页。

(30)(32)(33)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第 26 页。

(31)朱德：《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同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纪要》，《文献和研究》1986 年第 6 期，第 5 页。

(47)严中英：《南昌起义后朱德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侧记》，《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版，第 23—24 页。

(48)(55)严中英：《回忆朱德总司令》，1978 年春，未刊稿。

(49)马伯周：《范石生》，《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版，第 14 页。

(53)《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 年 6 月 15 日。

(56)李中奇：《朱德同志教我们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初选稿，第 1 卷，第 1 辑。

十、领导湖南起义

(18)《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第 396、129、397、397—398 页。

中共湘南特委：《湘南暴动计划》，1927 年 12 月 6 日。

(14)《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1927 年 12 月 2 日；朱德在军直小组会上的发言，1927 年 6 月 14 日；朱德自传，手抄稿本；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7 月版，第 57 页。

陈茂：《从湘南到井冈山》，《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第 559 页。

(12)(24)萧克：《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7 月版，第 81—82、83、84、86 页。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 4 月版，第 255、256 页。

(11)《湖南民国日报》，1928 年 3 月 19 日。

(13)《湘南暴动在耒阳》，中共耒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3 年 11 月编印，第 77 页。

(15)黄克诚：《在永兴暴动的日子里》，《星火燎原》丛书之一，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 6 月版，第 92 页。

(16)唐天际：《安仁农军上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336 页。

(17)陈列菊：《一位巾帼赛须眉的女英雄》，《光辉的人生》，衡阳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第207—211页。

(19)访问萧克谈话记录，1977年10月31日。

(20)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6月。

(21)《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工作决议案》，1928年6月17日。

(22)访问欧阳毅谈话记录，1974年9月14日。

(23)朱德：《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2—3页。

(25)萧克：《〈湘南起义史稿〉序》，《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页。

十一、会师井冈山

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之报告》，1928年6月。

访问曾志谈话记录，1977年10月27日。

访问黄克诚谈话记录，1984年8月28日。

李奇中：《在湘南》，《星火燎原丛书》第一辑，解放军出版社1966年6月版，第113页。

(2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98页。

(29)《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7、77页。

(20)萧克：《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90、94页。

杨至诚：《艰苦转战》，《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16页。

(14)(15)(17)(19)(35)(39)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19、139、140、143、145、165、167页。

(11)《回忆录选辑》广州军区编印，1986年第5期，第3页。(12)王紫峰：《井冈山斗争史的一些回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57页。

(13)谭冠三：《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星火燎原》丛书之一，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34页。

(16)陈士榘：《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18)《毛泽东给江西省委转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19日。

(21)《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22)《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1928年5月25日。

(23)《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

(25)《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0月版，第64页。

(26)(4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27)熊寿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8页。

- (28)《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函参字第 1303 号》，1928 年 5 月 3 日。
- (30)(31)萧克：《四打永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394、395 页。
- (32)(33)访问何长工谈话记录，1978 年 5 月 12 日。
- (34)(43)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未刊稿，1977 年 11 月。
- (36)《湘赣边特委致省委转中央的信》，1928 年 6 月 16 日。
- (37)(38)(40)《朱德给周恩来的信》，1972 年 12 月 20 日。
- (42)“两只羊”指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和第九师师长杨池生。
- (44)《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 3 月版，第 24 页。
- (45)朱德：《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8 页。
- (46)萧克：《“朱毛红军”侧记》，《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5 期，第 121 页。

十二、八月失败前后

- 《湖南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80 页。
- 《江西省委致中央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第 95 页。
- 《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126 页。
- 《湖南省委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136 页。
- 《湖南省委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139 页。
- 《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143、142、144、144、142 页。
- (11)(12)《中共湘赣特委和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148、150 页。
- (13)(14)(16)(17)(21)(43)(44)(45)(5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253、254、255、256—257、256 页。
- (15)(27)访问萧克谈话记录，1973 年 8 月。
- (18)(20)《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出版，第 189、190 页。
- (19)(22)(23)(24)(25)(33)访问杜修经谈话记录，1987 年 9 月 12 日。
- (26)杜修经：《八月失败》，《革命回忆录》（一），人民出版社 1980

年4月版，第17页。

(28)(29)(40)(4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60、61页。

(30)访问江华谈话记录，1974年9月13日。

(31)(56)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32)(37)《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月版，第191—192页。

(34)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26页。

(35)(36)(38)(39)(48)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第29、29、29、30、34页。

(41)(42)《八月失败》，《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二版，第199页。

(47)(53)(54)(55)(57)(59)(60)《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

(49)江华：《井冈山斗争时期几事的回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48页。

(50)朱德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谈话记录，1962年3月5日。

(52)《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60页。

(61)贺礼保：《随茶陵游击队上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25页。

(62)朱良才：《红军的连队生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37页。

(63)李克如：《红军的政治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48—249页。

十三、向赣南闽西进军

(35)(36)(37)(4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13、114、117、125、126、127页。

《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彭德怀：《关于五军四军会合后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29年4月4日。

(12)(26)(41)(48)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15)《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61、361、362页。

(13)陈茂：《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挺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574、581—582页。

(14)(17)《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1—82、83页。

黎崇仁、谢甫鹏：《圳下战斗和罗福嶂会议》，《回忆中央苏区》，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2 月版，第 52—53 页。

(11)(21)(32)《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 年 3 月 20 日。

(16)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2 月版，第 13 页。

(18)李祖轩：《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9 月版，第 41 页。

(19)(29)(30)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第 47、48、49 页。

(20)(51)《陈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版，第 4 页。

(22)(23)《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 年 2 月 24 日。

(24)(25)(27)(43)(49)毕占云：《三战闽西》，《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9 月版，第 344、345、346、348、349、350、351 页。

(28)《中共福建省委报告》，1929 年 3 月 19 日。

(31)《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 年 4 月 5 日。

(33)[美]尼姆·韦尔斯：《红色女战士—康克清》，《记康克清大姐》，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 年 2 月版，第 59 页。

(34)张际春：《向赣南、闽西进军》、《星火燎原》（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9 月版，第 337 页。

(38)《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第 184 页。

(39)(40)《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1929 年 2 月 7 日。

(44)(46)《朱德来信》（1929 年 5 月 23 日），《红旗》第 25 期。

(45)《红军捷报》，1929 年 5 月 26 日。

(47)《福建省政府给蒋介石、谭延闿电报》，1929 年 6 月 19 日。

(50)(52)《中共闽西特委关于武装斗争党务工作的报告》，1929 年 8 月 22 日。

十四、古田会议前后

(11)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 年第 5

期，第 37、38、39、40、41 页。

毛泽东：《复林彪的信》，1929 年 6 月 14 日。

访问傅柏翠谈话记录，1980 年 9 月。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6 月 22 日。

(12)《时报》，1929 年 7 月，第 8 版。

(13)《三省“剿共”兵力》，《时报》，1929 年 8 月 6 日，第一版。

(14)《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前委、党委信》，1929 年 8 月 8 日。

(15)《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374 页。

(16)[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 4 月版，第 299 页。

- (17)(39)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 (18)(19)赖毅：《出击闽中》，《闽西的春天》，福建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第 91 页。
- (20)《时报》，1929 年 9 月 12 日。
- (21)《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 年 9 月 28 日。
- (22)(23)(24)(25)《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1929 年 10 月 6 日。
- (26)《朱德给东委信》，1929 年 5 月 3 日。
- (27)《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关于开往潮梅一带游击情况的报告》，1929 年 10 月 18 日。
- (28)《巡视员谢运康给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1929 年 10 月 25 日。
- (29)《梅县县委给东江特委报告》，1929 年 11 月 7 日。
- (30)(3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129 页。
- (32)(33)《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11 月 28 日。
- (34)(36)《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1930 年 1 月 6 日。
- (35)《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 年 7 月—1930 年 4 月。
- (37)《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 年 2 月 16 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1 月版，第 58—59 页。
- (38)《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第 60 页。
- (40)(43)朱德、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司令部训令》第二号，1930 年 3 月 19 日。
- (41)(42)《前委通告》第三号，1930 年 3 月 18 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1 月版，第 61、62 页。
- (44)朱德、毛泽东：《关于整顿军风纪律的训令》，1930 年 3 月 21 日。
- (45)《中央给四军前委转三、四、五军总前委的信》，1930 年 4 月 24 日。
- (46)《另一个世界的闽西》，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1930 年 8 月 28 日第四版。

十五、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指导

-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会议记录，1930 年 2 月 17 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记录，1930 年 3 月 10 日。
- 《中央给四军前委的信》，1930 年 4 月 3 日。
- 《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 年 4 月 15 日。
- 转引自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11 月版，第 43 页。
- 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1930 年 5 月 30 日。
- 《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5—91 页。
- 《中央致四军前委信》，1930 年 6 月 15 日。
- (26)[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

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 4 月版，第 316、 317、 320 页。

(11)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0 年 6 月 22 日。

(12)《另一个世界的闽西》，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 1930 年 8 月 28 日第四版。

(13)萧华：《艰苦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 11 月版，第 50 页。

(14)(36)访问萧华谈话记录， 1984 年 6 月 20 日。

(15)《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训令》， 1930 年 7 月 11 日。(16)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关于我军在赣西一带新的军事行动概况》， 1930 年 8 月 19 日。

(17)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命令， 1930 年 7 月 25 日。

(18)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命令， 1930 年 8 月 1 日。

(19)[美]宁谟·韦尔斯：《读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年 2 月版，第 362 页。

(20)(29)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4 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129、130 页。

(21)欧阳鹏：《红一军团二打长沙经过万载》，《江西党史通讯》（总第 1 期—26 期）， 1981—1984 合订本，第 755 页。

(22)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命令， 1930 年 8 月 18 日。

(23)《中央给长江局的信》， 1930 年 8 月 10 日。

(24)(3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157、 158、 159 页。

(25)《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 1930 年 8 月 29 日。

(27)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命令， 1930 年 8 月 24 日。

(28)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命令， 1930 年 8 月 31 日。

(30)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 6 辑，第 253 页。

(32)(3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33)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命令， 1930 年 10 月 3 日。

(35)《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版，第 92 页。

(37)毛泽东给中央的信， 1930 年 10 月 14 日。

(38)胡国强：《朱德诗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6 月版，第 266 页。

(39)朱德：《建军报告初稿》， 1945 年。

十六、第一次反“围剿”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第 114 页。

何长工：《回忆中央苏区的有关历史》，《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109 页。

访问陈正人谈话记录， 1967 年 12 月。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930 年 10 月 26 日。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160—161、166 页。

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 6 辑，第 254 页。

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命令，1930 年 11 月 1 日。

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1930 年 12 月 17 日。

(11)《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1930 年 12 月 18 日。

(12)(24)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 45 辑，中华书局 1964 年 4 月版，第 74、75 页。

(13)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217 页。

(14)刘新裕、刘欣大整理：《反第一次大“围剿”》，《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版，第 7 页。

(15)访问萧华谈话记录，1984 年 6 月 20 日。

(16)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 年 12 月 24 日。

(17)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 年 12 月 26 日。

(18)《耿飏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版，第 111、112 页。

(19)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 年 12 月 28 日。

(21)(23)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 年春，《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版，第 30 页。

(22)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版，第 28 页。

(25)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 年 1 月 2 日。

(26)蔡馥兰：《新编第一师》，《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93—94 页。

(27)严德胜：《朱德同志关心战士》，《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204—205 页。

(28)(29)钟东林整理：《红军无线电通讯队》，《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版，第 24、25 页。

(30)《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1931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

十七、第二次反“围剿”

(27)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版，第 35、52 页。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 年 9 月 3 日。

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931 年 4 月。

曾山，《“牵牛”与“钻牛角”》，《江西党史资料》第 18 辑，第 180 页。《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1931 年 3 月 2 日。

(12)(2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4月19日。

(11)陈伯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情况的回忆》，报告记录稿，1959年5月。

(13)李聚奎：《回忆二次、三次反“围剿”战役》，《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9页。

(14)朱德、毛泽东训令， 1931年5月5日。

(15)项英、毛泽东、朱德训令，第一号， 1931年5月8日。

(16)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92页。

(17)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5月13日。

(18)《曹丹辉日记》，《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2页。

(19)公秉藩：《我参加第二次“围剿”被俘脱逃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89、98页。

(20)《总前委第一次会议纪要》， 1931年5月25日。

(21)《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 1931年5月26日。

(22)《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 1931年5月28日。

(23)郑正：《刘和鼎部在建宁被歼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113页。

(24)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6页。

(26)《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8月30日。

(28)《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 1931年6月2日。

(29)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131页。

十八、第三次反“围剿”

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57页。

黄健民等整理：《千里回师兴国》，《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106页。

(15)(16)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朱德：《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6页。

邓帮福整理：《北坑游击队》，《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101页。

(14)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9、208页。

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7月31日。

萧华：《模范的兴国，英雄的人民》，《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48页。

(11)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7月版，

第 196 页。

(12)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1931年8月12日。

(13)(20)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1页。

(17)朱德、毛泽东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

(18)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9月23日。

(19)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10月14日。

十九、参加中华苏维埃一大前后

(13)《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46、148、149页。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十四号》，《战斗》第一期，1931年7月1日。

《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

《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31年11月。

《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32年5月20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242页。

朱德在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军事问题报告，1931年11月。

袁血卒：《宁都暴动纪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3页。

廖颂真、揭国法整理：《秋溪整编》，《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226页。

朱德、王稼祥：《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1931年12月3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76—278页。

(11)访问孙毅谈话记录，1984年3月16日。

(12)苏进：《从黑暗走向光明——回忆宁都起义前后》。《回忆宁都起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94、96页。

(14)《中央紧急通知——关于反革命进攻鄂豫皖苏区问题》，1931年12月3日。

(15)《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政治委员的训令》，1931年12月4日。

(16)《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十二号电——指示红军攻取赣州》，1931年12月6日。

(17)《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98页。

(18)《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7页。

- (19)《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1932年1月10日。
- (20)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革军委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1932年3月1日。
- (21)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1—132页。
- (22)沈毓珂：《踏遍青山人未老——回忆敬爱的朱委员长体育生活片断》，《湖北文艺》，1977年第四期。
- (23)朱德：《经闽西感怀》，1961年2月9日，《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9月版，第60页。
- (24)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央军委关于今后行动方向和部队部署的训令》，1932年3月18日。
- (25)朱德、王稼祥：《中央军委关于战略方向和军事戒严等问题的训令》，1932年4月12日。
- (26)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1932年4月22日。

二十、第四次反“围剿”

- 《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1932年6月5日。
- 《红一方面军准备进攻南雄之敌的命令》，1932年6月21日。
- (5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6、176页。
- 朱德：《红一方面军关于各级指挥员应经常向上报告军情的训令》，1932年7月20日。
-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当前作战方向问题给中央局电》，1932年7月25日。
-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部队改设政委制毛为总政委》，1932年7月25日。
- 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令》，1932年8月8日。
- 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央军委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1932年8月8日。
- 周恩来：《关于乐安宜黄战绩、敌援兵动态和我下一步作战部署的报告》，1932年8月。
-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湘鄂西分局并中央电。
- (1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07页。
- (12)《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1932年9月7日。
- (13)《周恩来关于乐安、宜黄、南城地区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1932年9月8日。
- (14)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敌情及红军行动问题致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中央电，1932年9月23日。

(15)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分散兵力羌赤化城市再歼敌之布置意见》，1932年9月25日。

(16)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当前重大问题与对作战行动的意见》，1932年9月25日。

(17)《中央局关于部队应向北移动靠近边区问题给周毛朱王电》，1932年9月26日。

(18)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方面军行动与中央局全会会址问题的意见》，1932年9月26日。

(19)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1932年9月26日。

(20)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1932年9月29日。

(21)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应集中力量歼击乐安之敌致周恩来电，1932年9月30日。

(22)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敌人进攻苏区的情况与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问题的报告》1932年9月30日。

(23)(24)(27)《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25)(26)《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问题之说明》，1932年11月12日。

(28)朱德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1959年8月。

(29)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1932年10月12日。

(30)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中央军委关于准备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紧急训令》，1932年11月24日。

(31)朱德、周恩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训令》，1932年12月2日。

(32)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1932年12月26日。

(33)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向北行动工作的训令》，1933年1月1日。

(34)(35)朱德：《谈黄狮渡到逼近抚州的一个战役》，工农红军学校编印《红色战场汇刊》，1933年6月。

(36)周恩来：《关于我两次战绩统计及敌我新部署和敌俘情况与改编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12日。

(37)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关于闽浙赣与中央红军协同动作的指示》，1933年1月12日。

(38)项英、任弼时：《关于我军今后作战部署的意见致周恩来、朱德电》，1933年1月16日。

(39)周恩来、朱德：《关于目前战局的分析和向中央、中央局的几点建议》，1933年1月21日；《请中央局速派人到河西领导红军及对中央局几点建议》，1933年1月23日。

(40)《中央局（苏区）关于作战新计划之指示》，1933年1月24日。

(41)周恩来：《关于敌罗、周、吴等师动态和申述攻城对我不利向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30日。

(42)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敌人新进攻的形势下我苏区的作战区的划分和干部的任免及对中央的要求》，1933年2月3日。

(43)《中央局（苏区）关于作战新计划致周、朱、王电》，1933年2月4日。

(44)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同志到前方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了解红军状况》，1933年2月7日。

(45)《第一方面军命令》，1933年2月26日。

(46)刘立明整理，《反第四次大“围剿”》，《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385页。

(47)(53)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48)《中央电贺红一方面军之伟大胜利》，1933年3月1日。

(49)周恩来：《东黄陂战斗情况及敌我动态》，1933年3月2日。

(50)(56)朱德：《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1933年5月28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9、10页。

(51)(52)《红三军团草台岗战斗经过详报》，1933年3月21日。

(55)朱德：《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1933年5月28日。

(57)朱德：《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1933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16页。

二十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朱德：《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革命与战争》第1期，第5页，1933年11月出版。

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年5月8日。

蒋介石，《对剿共军高级将领的训话》，1933年4月7日。

蒋介石对汉口政委会演辞，《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第37页。

朱德、周恩来：《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通令》，1933年5月17日。

周恩来，朱德致苏区中央局电，1933年6月18日。

《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1933年6月13日。

项英致朱德、周恩来电，1933年10月2日。

周恩来致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电，1933年10月4日5时。

项英致朱德、周恩来并转林彪、聂荣臻电，1933年10月6日。

《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13页。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6、60、63页。

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71页。

访问伍修权谈话记录，1984年5月9日。

(2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朱德、周恩来：《对赣东北闽北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1933年11月24日。

- (21)《中革军委关于方面军动作的训令》，1933年11月25日。
- (22)《福建的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红旗》周报第63期社论，1934年1月1日。
- (23)中共临时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斗争》第38期，1933年12月12日。
- (25)朱德、周恩来致项英电，1933年12月13日2时。
- (26)周恩来致博古、项英电，1933年12月16日。
- (27)朱德：《第二次全苏大会上的军事报告》，手稿，1934年1月。
- (28)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1934年2月7日。
- (29)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34年2月。
- (30)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 (31)博古、李德、朱德致周恩来电，1934年4月27日19时。
- (32)访问伍修权谈话记录，1984年5月9日。
- (33)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8月31日4时。
- (34)林彪、聂荣臻致朱德电，1934年9月2日。
- (35)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9月2日2时。
- (36)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电，1934年9月2日8时。
- (37)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9月3日2时。
- (38)(39)(40)(41)朱德：《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1934年10月1日。
- (42)《中革军委关于战斗问题的训令》（训字第一号），1934年9月15日。
- (43)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9月24日。
- (44)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电，1934年9月25日。
- (45)朱德致彭德怀、杨尚昆电，1934年9月27日。
- (46)朱德致罗炳辉、蔡树藩电，1934年9月27日18时。
- (47)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10月2日3时。

二十二、遵义会议前后

-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15页。
- 朱德致罗炳辉、蔡树藩电，1934年10月19日。
- 陆定一：《长征大事记》、1934年10月30日条。《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0页。
- 朱德：《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1934年9月。《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8页。
- 朱德致董振堂、李卓然电，1934年10月22日8时半。
- 朱德致彭德怀、杨尚昆、周昆、黄甦电，1934年11月4日16时。
- 朱德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电，1934年11月7日16时。
- 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电，1934年11月10日10

时。

《中革军委关于表扬三军团首长及全体指战员的命令》，1934年11月11日。彭、杨，指彭德怀、杨尚昆。

朱德致一、三、五、八、九军团，一、二纵队的作战命令，1934年11月25日17时。

(12)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11月25日23时半。

(13)朱德致一、三、五、八、九军团，一、二纵队电，1934年11月28日15时。

(14)朱德致林、聂、彭、杨、董、李、周、黄，罗、蔡电，1934年12月1日17时。

(1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16)朱德致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周、黄、叶、罗电，1934年12月3日16时。

(17)《红军总司令部行军日志》，1934年12月7日。

(18)朱德致各军团、纵队首长电，1934年12月13日21时半。

(19)《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34年12月8日。

(20)《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1934年12月19日。

(21)朱德致彭德怀、杨尚昆电，1934年12月31日3时。

(22)朱德致林、聂、彭、杨、董、李、罗、蔡电，1934年12月31日2时半。

(23)《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1935年1月1日，《军事文献》(二)，1942年编印。

(24)朱德致各军团、军委纵队首长电，1935年1月8日。

(25)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季刊，1982年第1期。

(26)(27)(28)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手稿。

(29)《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9月版。第68页。

(30)访问萧华谈话记录，1984年6月20日。

(31)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86、87页。

(32)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1935年2月10日。

(33)朱德致林、聂、彭、杨、董、李、罗、蔡电，1935年2月15日。

(34)中共中央、总政治部致林、聂、朱、彭、杨、刘、董、李、曾、罗、蔡、黄、陈、宋电，1935年3月20日。

(35)宋任穷：《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49页。

(36)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4月7日。

(37)《中革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

(38)朱德致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电，1935年5月2日。

(39)朱德致林、聂、李、黄、陈、刘电，1935年5月5日。

- (40)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 (41)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记录稿，1972年6月10日。
- (42)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26页。
- (43)朱德，《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9页。
- (44)宋科：《记长征中的刘伯承》，《老师在长征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84页。
- (45)朱德致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电，1935年5月28日1时半。
- (46)朱德致林彪、刘伯承、聂荣臻、董振堂、李卓然电，1935年5月28日。
- (47)(48)姚国民：《庐定桥畔》，《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189、191页。

二十三、艰难的时刻

- 莫休：《大雨滂沱中》，《党史资料》，1954年第三期。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36年6月26日。《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26日。
- [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77页。
- 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版，第94页。
- 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5月版，第295页。
- 张国焘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电，1935年6月29日。
- 张国焘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电，1935年7月1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国焘电，1935年7月10日。
- 《中革军委关于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通知》，1935年7月18日。
- (11)(32)(40)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252、261、266页。
- (12)(30)(3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32、459、461、462页。
- (13)《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年8月5日。
- (14)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35年8月6日。
- (1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 (16)中共中央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15日。
- (17)《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
- (18)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电，1935年9月3日。
- (19)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 (20)访问陈明义谈话记录，1983年5月11日。

- (21)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5年9月8日9时。
- (22)中共中央致张国焘电， 1935年9月9日。
- (23)中共中央致张国焘电， 1935年9月11日。
- (24)张国焘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电， 1935年9月12日。
- (25)访问余洪远谈话记录， 1983年5月10日。
- (26)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红旗飘飘》第24辑，第18—19页。
- (27)《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59页。
- (28)访问康克清谈话记录， 1983年7月29日。
- (29)(30)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376、378页。
- (31)朱德谈与张国焘斗争的情况， 1960年11月9日。
- (34)刘志坚：《安息吧，共过患难的伯钊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5月12日。
- (35)伍云甫，《战士的伟大榜样》，《红旗飘飘》第17辑，第102页。
- (36)曹里怀：《我在长征路上》，《郑州党史通讯》1986年第2期，第8页。
- (37)张纬：《独臂将军的一生》，《人民日报》1981年7月30日。
- (38)欧阳毅：《在草地——回忆朱德总司令》，《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208、209页。

二十四、率领二、四方面军北上

- 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27页。
- 朱德致毛泽东、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并转林育英电，1935年12月30日。
- 毛泽东致朱德电， 1936年1月1日。
- (16)(4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74、475、483、497页。
-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1月版，第276页。
- 林育英致张国焘电， 1935年12月16日9时。
- 林育英致张国焘、朱德电， 1936年1月24日。
- 张国焘致林育英、张闻天电， 1936年1月27日。
- 朱德、张国焘致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电， 1936年1月28日。
- 张继争：《在跟随徐总北上的日子里》，《艰苦的历程》，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144页。
- (11)林育英、张闻天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6年2月14日。
- (12)徐向前：《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光荣》，《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页。
- (13)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 1936年3月23日。
- (14)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 1936年3月30日。
- (15)(28)《朱德委员长谈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

- (16)林育英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6年4月1日。
- (18)肖永正：《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天津文史资料》第7辑。
- (19)(22)贾守仁：《在跟随朱总司令的日子里》，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1月版，第27、39页。
- (20)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 1936年4月27日。
- (21)(32)杨以山：《永不泯灭的记忆——回忆朱总司令过草地的几件事》，《红军长征回忆与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99、100、101页。
- (23)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5月20日。
- (24)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电，1936年6月19日。
- (25)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6年6月25日。
- (26)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59页。
- (27)王震：《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纪念贺龙同志》，《解放军报》1977年7月28日。
- (28)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庆祝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致朱德、张国焘等电， 1936年7月1日。
- (30)谭常维：《甘孜会师》，《星火燎原》（3）， 1959年12月版，第330、331页。
- (31)朱德致徐向前电， 1936年7月1日。
- (32)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1日。
- (34)朱德、任弼时、张国焘致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电， 1936年8月1日。
- (35)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1936年8月3日。
- (36)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电，1936年9月13日。
- (37)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电，1936年9月13日。
- (38)林育英、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9月14日。
- (3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电， 1936年9月17日。
- (40)西北局会议记录， 1936年9月16日。
- (41)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 (42)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徐向前电， 1936年9月18日。
- (43)朱德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 1936年9月20日。
- (44)育英、洛甫、恩来、博古、稼祥、泽东致朱德、张国焘等电， 1936年9月21日。
- (45)朱德致育英、洛甫、恩来、博古、稼祥、泽东电， 1936年9月22日。

- (47)张国焘致子昆、潘同，广化电，1936年9月21日。
- (48)(51)朱德在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23日。
- (49)朱德等致张国焘、徐向前、周纯全电，1936年9月22日3时。
- (50)朱德致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电，1936年9月22日。
- (52)育英、洛甫、恩来、博古、稼祥、泽东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9月26日。
- (53)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致英、洛、泽、恩、博、稼、贺、任、关、刘电，1936年9月26日12时。
- (54)朱德、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致贺、任、关、刘及党中央电，1936年9月26日20时。
- (55)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育、洛、泽、恩、博、稼并告贺、任、关、刘电，1936年9月26日22时。
- (56)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1936年9月26日22时。
- (57)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电，1936年9月27日。
- (58)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9月27日。
- (5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9月27日。
- (60)朱德、张国焘、徐向前致英、洛、泽、恩、博、稼并贺、任、刘电，1936年9月27日20时。
- (61)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电，1936年9月29日22时。
- (62)萧华：《红旗漫卷西风——忆中央红军一九三六西征》，《伟大的长征》，甘肃人民出版社1978年11版，第207页。
- (63)萧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191页。
- (62)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周恩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致毛泽东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电，1936年11月24日。
- (65)胡耀邦：《在朱德同志百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日。
- (66)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二十五、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 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中电，1936年12月25日。
- 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7年1月2日。
- 《红军总司令朱德关于红军行动的谈话》，红军总政治部油印件。
- 朱德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5月5日。
- 《朱德将军讲演》，《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文献》油印件，1937年4月。
- 朱德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37年6月9日。
- 朱德就中央军委已组织军事研究委员会事致各兵团首长电，1937年

6月30日。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68页。

[美]T.A.彼森访问朱德，《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第236—237页。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刘伯承致宋哲元等电，1937年7月8日。

(11)毛泽东、朱德致彭、任、邓电，1937年7月11日。

(12)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13)朱德誓师词，手稿复印件。

(14)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记录，1937年8月11日

(15)(17)(19)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

(16)(18)(20)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21)朱德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

(22)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8月23日。军委最高领导职务是军委主席，但会议记录写作“书记”。

(23)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前方设军委分会及军政委员会的命令，1937年8月29日。

(24)朱德、彭德怀就职通电，1937年8月25日，《六大以来》。

二十六、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23)傅钟：《敌后抗战的开端》，《八路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63、65、68页。

朱德家书，手迹，1937年9月5日。

朱德家书，手迹，1937年9月27日。

访问潘开文记录，1978年10月28日；1979年1月17日。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21页。

萧克：《谈 八路军 史料丛书编纂工作的几个问题》，《党史资料通讯》

1987年第3期。

(34)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9—57、56页。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

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207、208页。

(11)(15)(37)(46)朱德：在延安抗大的讲演《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1938年8月29日，《解放》周刊第53期。

(12)朱德、彭德怀关于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的命令，1937年9月23日。

(13)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 115 师部署和总部行动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37 年 9 月 23 日。

(14)朱德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华北抗战战略战术的变迁》记录稿，1938 年 9 月 7 日。

(16)(26)(44)朱德：《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新华日报》1938 年 2 月 9 日。

(17)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1938 年 9 月 14 日。

(18)朱德、彭德怀致毛泽东并告林、聂电，1937 年 9 月 26 日。

(19)黄绍竑：《娘子关战役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 54 辑。

(20)朱德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稿，1938 年 10 月 2 日。

(21)毛泽东关于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我军应坚持游击战方针问题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 年 9 月 29 日。

(22)毛泽东为通报平型关战役战果致博古、叶剑英，潘汉年电，1937 年 10 月 1 日。

(24)密勒士评论报：《朱德谈日军优点和缺点》；舒群：《西战场上的朱德》，均载于《朱德传》华中图书公司 1938 年 2 月版。

(25)[美]艾格妮丝·史沫待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 1979 年 4 月版，第 411—412 页。

(27)毛泽东致朱、彭、任、林、聂、贺、关、刘、徐电，1938 年 9 月 17 日。

(28)朱德、彭德怀关于积极发动群众问题致王震电，1937 年 9 月 29 日。

(29)朱德、彭德怀致洛、毛、周、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电，1937 年 9 月 28 日。

(30)朱、彭、任关于作战方针问题给各师负责人的指示，1937 年 9 月 21 日；

朱、彭、任关于军事部署方针的训令，1937 年 9 月 25 日。

(31)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程潜、阎锡山等电，1937 年 10 月 3 日。

(32)朱、彭就山西新军内部情况致毛泽东电，1937 年 9 月 30 日。

(33)(51)薄一彼：《朱总司令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的成长》，《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版，第 78—79、81 页。

(35)李树槐，《缅怀朱德同志》，《人民的光荣》（二），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编内部本，第 5 页。

(36)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对八路军扩军工作的指示》，1937 年 10 月 4 日。

(38)朱、彭、任关于对形势的估计与八路军战略方针问题致中央军委电，1937 年 10 月 12 日。

(39)毛泽东关于华北战区的重点等问题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1937 年 10 月 13 日。

(40)朱、彭关于忻口战役 120 师作战行动问题致张宗逊等电，1937 年 10 月 13 日。

(41)朱、彭关于徐海东、杨成武部之行动问题致林、聂电，1937 年 10

月 14 日。

(42)朱德：《华北抗战战略战术的变迁》，记录稿，1938年9月7日。

(43)朱、彭关于要求派兵协助八路军一部军事活动问题致李默庵电，1937年10月15日。

(45)朱、彭、任致洛甫并告周恩来，邓小平电，1937年10月19日。

(47)朱、彭、任致洛、毛并告周、北方局电，1937年11月14日。

(48)指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49)(54)(55)(56)《中国在反击》，《史沫特莱文集》（4），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127—130、139、141、142页。

(50)访问周桓记录，1978年11月12日、27日。

(52)毕占云（1903—1977年）四川广安人，1927年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营长，

1928年9月在湖南桂东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路军第5军参谋长。

(53)左权：《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1939年7月2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10册。

(57)《王政柱日记》未刊稿。

(58)[美]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172页。

(59)[德]王安娜：《一个美国叛逆者》，《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5月版，第218—220页。

二十七、东路军总指挥

朱德：《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

《中国在反击》，《史沫特莱文集》（4），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230—232页。

朱、彭致徐、黄电，1938年2月4日。

朱、彭、任关于坚持山西持久战局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的布置，1938年1月13日。

《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训令——关于战术原则的指示》，1938年1月25日。

访问潘开文记录，1978年10月28日；1979年1月17日。

陈绍禹、周恩来等致朱德等电，1938年2月13日。

毛泽东致朱、彭电，1938年2月17日。

毛泽东电（原件无收件人），1938年2月21日。

朱、彭致毛泽东、滕代远并陈、周，叶、博及林彪电，1938年2月17日。

(11)朱，彭关于策应第五战区作战的命令，1938年2月5日。

(12)朱、任就卫立煌抽六个团归八路军指挥事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1月26日。

(13)朱、彭、任、傅钟关于对卫立煌部的使用指挥问题致刘伯承等电，1938年2月2日。

(14)任天马、袁勃：《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群众》第1卷，第9期，1938年2月。

(15)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54—

60页。

(16)访问康克清记录，1988年7月2日。

(17)(18)朱、彭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2月17日。

(19)毛泽东致朱德等电，1938年2月18日。

(20)访问薄一波记录，1981年4月27日。

(21)(23)朱德关于组织野战司令部问题致毛泽东电，1938年2月19日。

(22)中共山西省委调查研究室《国内外大事记》。

(24)朱德关于后梯队由吴慨之指挥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2月23日。

(25)毛泽东、任弼时关于敌情判断和八路军行动问题致朱德（总部）等电，1938年2月23日。

(26)朱德关于敌情及部队行动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2月24日。

(27)朱德关于阻敌西进作战部署致彭德怀等电，1938年2月24日。

(28)毛泽东就企图袭占临汾之敌的处置方法问题致朱、彭电，1938年2月25日。

(29)毛泽东关于我方驻临汾机构转移问题致刘、杨、吴电，1938年2月25日。

(30)毛泽东关于须尽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问题致朱德电，1938年2月25日15时。

(31)刘白羽：《朱德将军传》稿本，该书注明“这材料是根据粉碎晋东南围攻时缴获的文件。”

(32)毛泽东为询问总部驻地事致朱德电，1938年2月25日16时。

(33)(34)朱德为通报情况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2月27日。

(35)陆定一：《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四寿诞》，《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2月19日。

(36)朱德：《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1938年8月29日。(37)(47)朱德：《华北抗战战略战术的变迁》，记录稿，1938年9月7日。

(38)朱德、左权关于如敌侵入陕北的对付办法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3月1日。

(39)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巩固河防的部署致朱德等电，1938年3月3日。

(40)朱、彭关于八路军在晋东南坚持和必要时一部西渡黄河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等电，1938年3月2日。

(41)张、毛、任关于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应本之方针问题致朱、彭电，1938年3月3日。

(42)毛泽东为询问八路军总部取何道转至吕梁山脉事致朱、彭电，1938年3月4日。

(43)此时西路军改为北路军，由傅作义指挥。

(44)朱、彭关于配合友军作战及作战方针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等电，

1938年3月7日。

(45)毛泽东关于中央政治局战略决定的基本精神问题致朱、彭电，1938年3月9日20时。

(46)朱、彭、傅（钟）致刘、徐、邓电，1938年3月9日。

(48)(50)再访周恒记录，1979年5月10日。

(49)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7月版，第43页。

(51)朱、彭关天东、南两路军将领会议的情况致张闻天、毛泽东电，1938年3月28日。

(52)吴伯箫：《响堂铺》，1939年2月，《吴伯箫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二十八、伫马太行

朱德在前总直属队干部会上的报告，记录稿，1938年7月3日。

《陈诚部长谈台儿庄会战经过》，《新华日报》1938年4月12、13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73页。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87页

朱德：《华北抗战战略战术的变迁》，记录稿，1938年9月7日。

朱、彭关于收集敌情问题致刘伯承等电，1938年4月8日。

(26)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78、126页。

朱、彭关于东路军须立即动员民众配合八路军作战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938年4月10日。

朱、彭致曾军长、朱、武师长电，1938年4月10日。

(14)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5页。

(11)访问潘开文记录，1978年10月28日；1979年1月17日。关于渡漳河的时间，还有另一种说法，据有的老同志回忆在1939年7月。

(12)朱、彭关于消灭武乡、榆社之敌的部署致曾万钟等电，1938年4月11日。

(13)朱、彭关于准备机动打击敌军问题致刘伯承等电，1938年4月14日。

(15)朱德：《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1938年8月29日。

(16)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朱、彭、刘、徐、邓转陈、陈、朱瑞、宋、聂荣臻、彭真、尚昆电，1938年4月31日。

(17)朱、彭关于需要有适当兵力伸入热察冀区活动问题致贺龙等电，1938年4月15日；朱、彭等关于第四纵队组织与任务问题致贺龙等电，1938年5月14日。

(18)朱、彭关于组织骑兵支队建立大青山根据地问题致毛泽东电，1938年6月10日；朱、彭关于派李井泉率一个团建立大青山根据地问题致贺龙等

- 电， 1938年6月12日。
- (19)朱、彭关于解决物资困难问题致各兵团首长电， 1938年5月21日。
- (20)(21)朱、彭关于巩固团结揭露挑拨离间者问题致贺龙等电，1938年5月13日。
- (22)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训令， 1938年5月31日。
- (23)冀察晋即晋察冀，当时这两个名称并用。
- (24)朱德手书，复印件， 1938年。
- (25)朱德致彭德怀、左权电， 1938年7月9日。
- (27)访问前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李世璋记录， 1980年9月11日。
- (28)访问周桓记录， 1978年11月12日、27日。
- (29)山西吉县党史办：《朱德同志两次来吉县的经过》，内部文稿。
- (30)《新中华报》1938年8月25日、30日。
- (31)朱德在北方局党校的报告，记录稿， 1938年8月28日。
- (32)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关于对张荫梧企图获取正大以北地区与冀中打通的对策的指示， 1938年9月7日。
- (33)朱、彭、王稼祥、刘少奇关于鹿钟麟向我进攻与我们的对策的指示，1938年9月18日。
- (34)朱德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稿， 1938年10月3日。
- (35)朱德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报告：《三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的历史》，记录稿， 1943年8月。
- (36)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172页。
- (37)朱德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稿， 1938年10月25日。
- (38)《中央文件汇集》1938年。
- (39)朱、彭关于打退鹿钟麟等进攻，巩固冀中、冀南政权问题致陈赓等电，1938年11月3日。
- (40)原中共太行区区委调查研究室张鱼编《国内外大事记》（1937.7—1942.6）（上）第23页。
- (41)朱德在山西吉县对军官团的讲演词，记录稿；1938年11月。
- (41)朱、彭、朱瑞为揭露鹿钟麟的反动事实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2月2日。
- (42)李达：《磨擦与反磨擦斗争》，《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 (43)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鹿钟麟斗争的方针和策略问题致朱德等电，1938年12月2日。
- (44)朱德在长治各界座谈会上的报告，记录稿， 1938年12月12日。
- (45)朱、彭关于115师主力东进苏鲁皖地区问题致陈光等电，1938年12月2日。
- (46)朱德：《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71页。
- (47)朱、彭关于部队在不妨碍战斗情况下要开荒种麦问题致伯承等电，1939年9月3日。
- (48)朱德致张丛吾信，1939年2月17日，《革命文物》1978年第1期。

二十九、反磨擦斗争

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5月版，第583、587页。

朱德在西北局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十年来的革命与反革命》，记录稿，1943年8月18日。

朱德、杨尚昆、朱瑞关于河北问题及对待办法致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9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07—108页。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冀察战区战斗序列之密电，1938年12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朱德、杨尚昆、朱瑞关于河北问题以及对待办法致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9日。

(11)朱德、杨尚昆、左权、傅钟关于国民党在河北制造磨擦以及八路军之对策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39年1月19日。

(12)朱德、彭德怀、林彪、刘怕承、贺龙、聂荣臻、徐向前、萧克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31日。

(13)朱、彭关于对敌“扫荡”河北平原之对策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939年2月6日。

(14)朱、左关于消灭和顺南犯之敌之部署致毛泽东等电，1939年1月26日；

朱、彭、左关于385旅等部突击和顺南犯之敌之部署致陈光等电，1939年1月27日；朱、彭关于打击进犯晋东南之敌等问题致陈光等电，1939年1月29日。

(15)朱、彭关于八路军晋东作战情况致卫立煌电，1939年2月2日。

(16)朱、彭、杨、朱关于与鹿钟麟谈判的共同纲领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2月3日。

(17)通讯《我没有见到鹿主席》、《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5月29日

(18)朱德关于鹿钟麟部袭击八路军制造磨擦问题致蒋介石等电，1939年3月17日。

(19)朱德、杨尚昆致中央书记处并告周、博、叶电，1939年6月18日。

(20)朱德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华北抗战的总结》，1940年6月20日。

(21)(22)《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7月版，第73、72页。

(23)朱、彭关于冀中、冀南的统战问题致贺龙等电，1939年6月30日。

(24)朱总司令在武乡士绅座谈会上的谈话，《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9月27日

(25)朱、杨致彭德怀并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2月4日。

(26)《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2月19日。

(27)康克清：《朱总风范永存我心》，《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日。

(28)朱、彭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1939年12月25日。

(29)《新华日报》华北版 1940 年 1 月 3 日。

(30)《新华日报》华北版 1940 年 1 月 1 日。

(31)朱、彭为确保太行，坚决打击侯、乔两部顽军事致吕正操等电，1940 年 1 月 5 日。

(32)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 129 师》，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版，第 152 页。

(33)太岳区，以太岳山脉为依托，包括同蒲路以东、临屯公路以北、白晋路以西的十几个县的根据地。

(34)太南，邯长路以南属太行区的一部分根据地。

(35)朱、彭关于山东、冀南反磨擦之对策问题致徐向前等电，1940 年 1 月 27 日。

(36)(38)(42)朱德在延安党校的讲演《三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的历史》，记录稿，1943 年 8 月。

(37)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河南漯河、博爱等地游击阵中日记，1940 年 3 月 9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39)朱、彭致左、黄、陈、王、刘、邓复毛、王电，1940 年 3 月 13 日。

(4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 年 9 月 9 日。

(41)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 年 9 月 9 日。

(43)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周恩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第 200 页。

三十、回延安

朱、彭等致冀南区党委并报中央电，1940 年 3 月 11 日。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 129 师》，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版，第 165 页。

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河南原河、博爱等地游击阵中日记，1940 年 3 月 15 日—23 日、12—13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第 210、216 页。

毛、王关于请朱、彭考虑和卫立煌会谈问题致朱、彭、杨电，1940 年 3 月 19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卫立煌谈判要点致朱、彭、杨电，1940 年 3 月 28 日。

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洛阳、晋城等地军事文电，1940 年 4 月 13 日，戴笠的报告日期为 5 月 5 日，因在卫部（卫为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地发出，故亦附在卫的军事文电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战地党政委员会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动员战区的人力、物力和整顿战区的党政机构，促进抗战。蒋介石是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但他只是挂名，具体工作由副主任委员李济深负责，各战区的分会以该战区最高军事长官为负责人，并聘请当地有关人士为委员。

毛泽东关于从华北抽兵南下增援华中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 年 4 月 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见卫立煌谈话的内容问题致朱德电，1940年4月12日。

(11)访问韦杰记录，1983年5月10日。

(12)朱德关于和卫立煌会晤时何应钦来电限制八路军扩大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40年5月10日。

(14)访问周文龙记录，1984年10月10日。

(15)《冀察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工作报告书》，《六、朱总司令向冀察党政分会同仁谈话》。

(16)(17)(19)茅盾：《延安行——回忆录（26）》，《新文学史料》季刊，1985年第1期。

(18)茅盾原名沈雁冰。

(20)《新中华报》1940年5月31日。

(21)朱德在延安干部欢迎大会上的演说提纲，1940年5月。

三十一、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抗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5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40年7月1日。

朱德：《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1940年7月7日。

日本大本营大陆命令第439号，1940年7月23日。

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53—54页

朱、彭关于破坏敌交通干线问题致八路军各部电，1940年4月1日。

朱、彭、左致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电，1940年7月22日。

朱、彭、左致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电，1940年8月8日。

朱德、左权：《宣传工作指示》，1940年8月22日午。

(11)朱、彭、左致吕正操、程子华、宋任穷并报聂、刘、邓并报军委电，1940年9月7日。

(12)朱、彭、左：《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1940年9月16日。

(13)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慕尼黑签订的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以换取德国向苏联进攻，1939年前后，英、美又企图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的妥协。当时人们称之为东方慕尼黑。

(14)《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37页。

(15)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

(16)《新中华报》1940年9月26日。

(17)朱、彭、左关于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部署致刘伯承等电，1940年9月16日。

(18)蒋介石致朱德、彭德怀电，1940年9月4日。

(19)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致战时新闻检查局密函，1940年10月20日。

(20)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电，1940年10月29日。

(21)新四军第三支队当时驻防于长江南岸的安徽铜陵、繁昌地区。

三十二、呕心沥血渡时艰

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版，第 203 页。

朱德致陈康白信，复印件，1940 年 10 月 21 日。

朱德，《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新中华报》1940 年 10 月 13 日。

朱德：《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中国工人》第 10 期，1940 年 11 月。

朱德，《完成边区 1941 年度财政经济计划》，《团结》第 2 卷第 1 期，1940 年 12 月 25 日。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版，第 546 页。

康克清给陈友群的电话记录，1984 年 1 月。

(11)何维忠：《伟大的号召》，《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12)访问李树槐记录，1978 年 11 月 7 日。

(13)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1 年 2 月 25 日。

(14)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就后方兵工厂扩大生产计划事致彭德怀、左权、杨立三电，1941 年 3 月 5 日。

(15)左齐：《巨大的鼓舞》，《星火燎原》选编之六，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1 年 9 月版，第 41 页。

(16)指 718 团陈宗尧团长，熊晃代政委。

(17)指 717 团陈外欧团长，晏福生政委。

(18)即 717、718 两团。

(19)朱德：《关于部队生产的一封信》，1941 年 6 月 20 日。

(20)丁本淳：《忆朱德同志对炮兵建设的关怀》，未刊稿。

(21)杨勤生：《难忘的金秋》，《星火燎原》1983 年特刊（总第 15 期）。

(22)访问余洪远记录，1983 年 5 月 10 日。

(23)雷英夫：《朱总司令在生产中》，《群众》第 9 卷第 16、17 期，1944 年 9 月 15 日。

(24)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记录稿，1941 年 11 月 1 日。

(25)朱德在欢迎 717 团晚会上的讲话，1942 年 1 月 22 日。

(26)毛泽东、朱德致彭德怀电，1942 年 2 月 3 日。

(27)《解放日报》1942 年 3 月 28 日。

(28)朱德在陕甘宁边区二科长，仓库主任联席会议闭幕典礼上的讲话，记录稿，1942 年 10 月 7 日。

(29)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2 年 10 月 19 日。

(30)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2 年 12 月 25 日。

(31)《解放日报》1942 年 12 月 28 日。

(32)朱德致任弼时信，手稿复印件，1943年6月28日。(33)访问童陆生记录，1980年11月7日、14日。

三十三、胜利前夕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1941年9月10日。

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1941年9月11日。

这是李白《与韩荆州书》中的两句话，韩荆州即韩朝宗，唐玄宗开元中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是地方高级行政长官，当时以善于识拔后进，在士流中享有盛名。

欧阳山尊：《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访问黄华记录；何其芳：

《朱总司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周立波：《一个伟大文献的诞生》；黄钢：《难忘的延安之夜》。

朱德在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会上所作的结论，记录稿，1942年7月。

朱德在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记录稿，1942年11月16日。

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2年12月4日。

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记录稿，1943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

访问童陆生记录，1980年11月7日、14日；访问陈秉忱记录，1980年10月27日。

(12)指王明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主张，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13)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1943年9月9日。

(14)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4年5月21日。

(15)朱德：《在欢迎边区部队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4年9月18日。

(17)1944年朱德应该是58岁。

(18)[英]根瑟·斯坦因《毛泽东朱德会见记》，《新华日报》转载，1945年9月4日。

(19)《爱泼斯坦与朱德谈话摘录》，1944年7月21日，译自谢伟思：《LostChance in china》。

(20)[美]约翰·罗德里克《忆朱德》，香港《文汇报》1976年7月8日。

(21)《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5日。

(22)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记录，1945年2月18日。

(23)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5—183页。

(24)《解放日报》，1945年5月12日。

(25)朱德在中共七大上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记录稿，1945年5月30日。

(26)朱德在中共七大闭幕典礼上的讲演，记录稿， 1945年6月11日。

三十四、针锋相对的斗争

蒋介石给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电报， 1945年8月11日。

《解放日报》 1945年8月14日。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1945年8月23日。

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296—297页。

朱德对出发东北工作干部的报告，记录稿， 1945年8月28日。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33、234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945年9月14日。

《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72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945年9月19日。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25页。

(15)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致贺龙电， 1945年8月30日。

(16)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电， 1945年8月31日。

(17)《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8日。

(18)《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

(19)(20)《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

(21)《解放日报》1945年11月30日。

(22)《解放日报》1946年2月4日。

(23)《解放日报》1946年3月5日。

(24)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946年3月15日。

(25)《解放日报》1946年4月3日。

(26)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6年5月10日。

(27)刘浩：《策反滇军工作》，《崇高的使命》（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6页。

(28)《朱总司令在杨家岭的时事报告》，记录稿，1946年8月27日。

(29)《朱总司令与斯蒂尔谈话》油印稿，1946年8月。

(30)朱德在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46年9月3日。

(31)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6年10月3日。

三十五、人民的光荣

《解放日报》1946年11月30日。

《解放日报》1946年11月27日。

《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日。

[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 4 月版，第 3、16 页。

朱德致艾·史沫特莱的信，1944 年 8 月 14 日。

朱德致艾·史沫特莱的信，1946 年 7 月 1 日。

朱德致艾·史沫特莱的信，1946 年 12 月 17 日。

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134 页。

(13)《解放日报》，1947 年 1 月 1 日。

(14)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7 年 2 月 1 日。

(15)《解放日报》，1947 年 3 月 9 日。

(16)蒋秦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支队》，《红旗飘飘》第 3 集。

三十六、在战略进攻中开创新局面

刘少奇、朱德致毛泽东、任弼时电，1947 年 4 月 2 日。

朱德、刘少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7 年 4 月 24 日。

朱德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欢迎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47 年 4 月 30 日。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第 70、71 页。

朱德在冀中军区的讲话，记录稿，1946 年 6 月 10 日。

毛泽东致朱德、刘少奇电，1947 年 6 月 14 日。

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记录稿，1947 年 7 月 17 日。

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闭幕词，1947 年 9 月 13 日。

青沧战役。1947 年 6 月 12 日至 15 日，晋察冀野战军在天津以南地区攻克青县、沧县及铁路沿线的兴唐、唐官屯、马厂等车站，共歼敌 9000 余人。

(11)保北战役。1947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6 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克保定以北的徐水、固城等地，共歼敌 8000 余人。

(12)朱德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少奇、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电，1947 年 6 月 29 日。

(13)朱德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的信，手稿，1947 年 7 月 20 日。

(14)朱德、刘少奇、聂荣臻致中共中央电，1947 年 8 月 9 日。

(15)三角地带，三条铁路。指北平、天津、保定三个城市之间的三角地带和平汉、津浦、北宁三条铁路线。

(16)朱德、刘少奇、聂荣臻致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电，1947 年 8 月 16 日。

(17)朱德、刘少奇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1947 年 8 月 30 日。

(18)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记录稿，1947 年 9 月 7 日。

(19)大清河北战役。1947 年 9 月 2 日至 12 日，晋察冀野战军在大清河北进攻霸县、雄县，歼灭国民党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各一部共 5000 余人。

(20)杨、杨。指杨得志、杨成武。

(21)朱德、刘少奇致中共中央军委电，1947 年 9 月 23 日。

(22)中共中央军委致朱德、刘少奇、聂荣臻、萧克、杨得志、罗瑞卿电（毛泽东拟稿），1947年9月24日。

(23)朱德、刘少奇对杨得志、杨成武10月3日电的复示，1947年10月5日。

(24)罗瑞卿：《朱总司令指挥我们打胜仗——回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297、298页。

(25)李文，袁朴。李文当时任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袁朴是李文所部第十六军军长，该军当时已进驻保定附近地区。

(26)朱德、刘少奇：《同意攻打石门给聂荣臻等的复电》，1947年10月23日。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11页。

(27)主管官被俘。指国民党第三军正、副军长罗历戎、杨光钰在清风店战役中被俘。

(28)朱德、刘少奇：《建议中央军委批准聂荣臻等攻打石门意见的电报》，1947年10月23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11页。

(29)朱德在接见晋察冀军区炮兵旅一团排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记录稿，1947年10月27日。

(30)(31)(32)高存信《忆朱总司令重视特种兵建设的片断》，油印件。

(33)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7年11月1日。

(34)(36)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49、351页。

(35)朱德：《关于攻打石门计划和注意事项给聂荣臻等的电报》，1947年11月1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12页。

(37)(40)陈靖，《往事情深》，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第242、246页。

(38)访问杨成武谈话记录，1988年7月1日。

(39)朱德《给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的嘉奖电》1947年11月13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12页。

(41)何其芳：《回忆朱总司令》，《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

(42)朱德在晋察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47年12月1日。

(43)朱德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1947年12月10日。

(44)毛泽东转发朱德1947年12月10日信的批语，1948年1月31日。

三十七、在大决战的日子里

朱德、刘少奇给晋察冀野战军关于新的作战方针的指示，1948年2月14日。

朱德、刘少奇致中共中央军委电，1948年3月5日。

朱德致孙毅的信，手稿，1948年1月11日。

朱德致孙毅的信，手稿，1948年4月24日。

朱德致孙毅的信，手稿，1948年6月2日。

刘鼎：《军事工业的奠基人》，《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5月版，第305页。

朱德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的信，手稿，1947年7月20日。

朱德致姚依林、刘鼎等的信，手稿，1947年7月23日。

朱德在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交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7年12月21日。

朱德在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8年1月2日。

朱德致贺龙、李井泉的信，手稿，1948年1月8日。

朱德致孙毅的信，手稿，1948年1月11日。

毛泽东：《敦促杜章明等投降书》，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69页。

朱德在三月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8年3月。

朱德、刘少奇致徐向前、薄一波等电，1948年4月12日。

(16)朱德致薄一波、滕代远的信，1948年5月11日。

(17)徐向前：《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光荣——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日。

(18)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直属队欢迎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48年5月13日。

(19)(20)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48年5月14日。

(21)《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43页。

(22)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8月23日。

(23)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48年9月12日、13日。

(24)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讲话，1948年10月1日。

(25)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讲话，1948年10月16日。

(26)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讲话，1948年11月26日。

(27)《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2日。

(28)朱德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8年12月26日。

三十八、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朱德在铁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9年1月28日。

朱德在冀中军区和冀中行署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47年11月2日。

朱德致孙毅的信，1948年6月2日。

朱德在石家庄市工商界代表会上的讲话，1947年12月22日。

朱德在华北工商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8年5月21日。

朱德，《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15页。

朱德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稿，1949年3月6日。

张东月：《难忘的教诲》，《新疆日报》1981年8月3日。

朱德在香山行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9年3月27日。

(11)朱德在北平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的报告（提纲），1949年4月11日。

(12)《人民日报》1949年4月22日。

(13)《人民日报》1949年4月26日。

(14)《人民日报》1949年4月12日。

(15)《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

(16)《人民日报》1949年7月15日。

(17)《人民日报》1949年7月3日。

(18)《人民日报》1949年7月28日。

(19)《人民日报》1949年7月25日、8月24日。

(20)《人民日报》1949年4月5日。

(21)《人民日报》1949年5月18日。

(22)朱德致邓子恢电，1949年5月20日。

(23)朱德在北平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1日。

(24)《钢铁工人的怀念》，《北京文艺》，1977年第7期。

(25)《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

(26)《人民日报》1949年9月25日。

(27)《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

(28)朱德：《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第44期），1949年9月1日。

三十九、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

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

月版，第296页。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5日。

朱德在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0月17日。

朱德：目前军事形势和任务，1949年2月。

朱德给毛主席的军事报告，1950年5月9日。

朱德：关于建设海军、空军、工程兵和铁道兵及解放西藏等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1950年1月15日。

杨尚昆：《在仪陇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四川日报》

1986年12月4日。

朱德给毛泽东的信，1950年9月5日。

杨得志，《怀念逐日深》，《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

第60页。

朱德：《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3—284页。

(11)朱德：《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工作》，《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34页。

(12)(30)张爱萍：《朱德总司令与国防现代化》，《虎略龙韬新孙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66、67页。

(13)朱德在各军区、军兵种首长集训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7月13日。

(14)朱德：《英雄模范的光荣任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93页。

(15)朱德：《八一杂志发刊词》，《八一杂志》创刊号，1951年4月20日，第2页。

(16)(29)朱德，《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02、305页。

(17)《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日。

(18)(20)朱德：《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74、275、278页。

(19)高厚良：《坚持军事和政治的统一》，《虎略龙韬新孙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114页。

(21)朱德在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4月20日。

(22)(24)《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27、22页。

(23)(26)朱德，《建设海军，保卫海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第298、300页。

(25)朱德：《技术在装甲兵建设中的决定作用》，《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08、309页。

(27)朱德在建筑工程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4年2月20日。

(28)(32)朱德：《在铁道兵第三次庆功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29—230、331页。

(31)朱德：《在军事学院举行国家考试时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26页。

(33)朱德在全国第二次军事院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9月19日。

(34)朱德给萧劲光、王宏坤、刘道生、罗舜初的信，1950年7月13日。

(35)朱德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0月18日。

(36)朱德在全军军工军机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8年12月25日。

(37)朱德在讨论“十大关系”时的发言提纲，1956年4月27日。

(38)朱德：《外出视察的报告》，《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52页。

(39)(42)朱德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1950年10月5日。

(40)朱德为后勤学院开学典礼题词，1953年2月1日。

(41)朱德为《后勤通讯》题词，1950年。

四十、党的第一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朱德：《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280、286、284—281、290 页。

《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浙江省肖山县破坏手工业行为的通报和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1950 年 6 月 12 日。

朱德致毛泽东函，1952 年 1 月 28 日。

《人民日报》1952 年 2 月 26 日。

朱德：《中央一级各机关进行三反运动的情况报告》，1952 年 1 月 6 日。

朱德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1952 年 1 月 26 日。

毛泽东对朱德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报告的批语，1952 年 1 月 27 日。

(1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1952 年 2 月 9 日。

(12)朱德关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总结报告，1952 年 6 月 22 日。

(13)《中央转发朱德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1952 年 6 月 23 日。

(14)朱德：《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316 页。

(15)朱德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5 年 3 月 28 日。

(16)朱德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1954 年 2 月 6 日。

(17)朱德在军事学院的讲话，1954 年 4 月 25 日。

(18)朱德：《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1956 年 9 月 17 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343 页。

(19)王从吾：《整顿党风、严肃党纪——重温朱德同志的西次讲话》，《人民日报》1980 年 7 月 24 日。

(20)齐志文：《仪陇的传颂——朱总司令和家乡人民的故事》，《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版，第 365 页。

(21)(23)顾英奇：《寓伟大于平凡》，《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版，第 398、399 页。

(22)(24)邓林：《我给朱老总做饭》，《党的教育》（内蒙），1986 年第 4 期。

(25)赵力平：《深切怀念朱德委员长对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版，第 384 页。

四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朱德在华北局、北京市委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28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49 年 7 月 3 日。

朱德：《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1949 年 7 月 23 日，《朱德选集》，人

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266 页。

- 朱德和燃料部煤矿工作干部谈话， 1949年11月2日。
- 朱德在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1月10日。
- 朱德：《在各解放区水利工作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49年11月8日，
-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73页。
- 朱德在机械工业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
- 朱德在全国纺织工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51年。
- 朱德给刘少奇的信， 1952年3月22日。
- 朱德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2月24日。
- 朱德给毛泽东的信， 1952年。
- (11)周冠五：《朱德同志对首钢建设的关怀》，《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6页。
- (12)朱德同周荣鑫、宋裕和谈话记录， 1955年5月23日。
- (13)朱德在听取包头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55年6月10日。
- (14)朱德在听取包头钢铁厂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55年6月12日。
- (15)朱德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包头市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5年6月14日。
- (16)朱德在中共内蒙分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记录， 1955年6月15日。
- (17)朱德同王鹤寿谈话记录， 1956年5月14日。
- (18)朱德同黄敬谈话记录， 1956年5月24日。
- (19)朱德同刘景范、何长工谈话记录， 1956年12月29日。
- (20)朱德关于转发成都量具刃具厂的经验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1957年3月16日。
- (21)朱德同黄敬谈话记录，1957年5月21日。
- (22)朱德在全国第二次民政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11月5日。
- (23)朱德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1954年11月6日。
- (24)朱德同欧阳钦谈话记录， 1955年10月8日。
- (25)朱德同李富春谈话记录， 1955年12月7日。
- (26)朱德视察山西省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956年5月29日。
- (27)朱德视察辽宁省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956年6月19日。
- (28)朱德视察广州时的谈话记录， 1955年1月15日。
- (29)朱德同宋裕和、李东冶、于光远等谈话记录， 1956年5月25日。
- (30)朱德同柯庆施谈话记录， 1955年2月15日。
- (31)(32)(33)(34)(36)(37)(40)(69)朱德：《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1956年8月。
- (35)朱德给中共中央的信， 1955年1月21日。
- (38)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 1955年10月8日。
- (39)朱德同欧阳钦、吴德谈话记录， 1955年10月8日。
- (41)(4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89、453页。
- (42)(45)(47)程子华：《难忘的教诲》.《经济日报》1983年8月3日。

- (43)(44)朱德：《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20—324页。
- (48)朱德：《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35页。
- (49)朱德同白如冰谈话记录，1956年5月15日。
- (50)朱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1日。
- (51)朱德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8月16日。
- (52)朱德：《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43页。
- (53)朱德同薄一波谈话记录，1957年1月5日。
- (54)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1957年1月15日。
- (55)访问萧焕辉谈话记录，1985年7月1日。
- (56)访问吴俊民谈话记录，1985年7月27日。
- (57)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1957年1月20日。
- (58)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1957年2月10日。
- (59)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1957年2月26日。
- (60)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1957年3月19日。
- (61)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外出视察的报告》，1957年4月18日。
- (62)(65)朱德：《外出视察的报告》，《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51—354、350—352页。
- (63)朱德：《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59—362页。
- (64)朱德同王震谈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 (66)朱德在全国外贸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5月7日。
- (67)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视察东北的报告，1957年5月9日。
- (68)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1月10日。
- (70)朱德视察沈阳重型机械厂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22日。
- (71)朱德视察南京无线电制造厂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23日。
- (72)朱德同一机部、二机部、经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7年12月10日。
- (73)朱德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57年12月17日。
- (74)朱德的发言提纲，1956年4月27日。
- (75)朱德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57年8月14日。
- (76)朱德同杨易辰谈话记录，1957年8月30日。
- (77)《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
- (78)朱德在煤炭工业部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2日。
- (79)(88)《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439、397页。
- (80)朱德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11月14日。
- (81)朱德和吴芝圃谈话记录，1958年12月17日。
- (82)朱德在听取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12月18日。

- (83)朱德视察广东良口人民公社时的谈话记录， 1959年1月30日。
- (84)朱德在听取中共江门地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17日。
- (85)朱德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 1957年4月15日。
- (86)朱德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 1957年4月24日。(87)《人民日报》1955年8月16日。
- (89)朱德访问苏、波、捷、德、匈、罗、蒙七国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1956年4月25日。
- (90)朱德同李强谈话记录， 1956年2月5日。
- (91)聂荣臻：《忠诚革命贯平生，留得丰功万古存》，《红旗》1986年第23期。
- 四十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 《人民日报》1959年9月18日。
- 朱德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1年12月16日。
- 朱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碰头会上的讲话记录， 1959年12月8日。
- 朱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75年1月20日。
- 朱德同李富春谈话记录， 1959年5月20日。
- 朱德同中共抚顺市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59年6月1日。
- 朱德在中共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 1959年6月10日。
- 朱德同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9年6月16日。
- 朱德、董必武、林枫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959年6月20日。
- 朱德同中共黑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59年6月23日。
- (11)朱德、董必武、林枫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959年6月29日。
- (12)《庐山会议简报》第3号， 1959年7月6日。
- (13)朱德同刘俊秀谈话记录， 1959年7月8日。
- (14)朱德同陶铸谈话记录， 1959年7月9日。
- (15)朱德同周小舟谈话记录， 1959年7月11日。
- (16)朱德同叶季壮谈话记录， 1959年7月13日。
- (17)朱德同吴芝圃谈话记录， 1959年7月16日。
- (18)《庐山会议简报》第28号，1959年7月25日。
- (19)《庐山会议简报》第36号， 1959年7月26日。
- (20)(96)访问康克清谈话记录， 1985年7月17日。
- (21)朱德视察广东省从化县城郊人民公社综合农场时谈话记录， 1960年2月2日。
- (22)朱德同中共四川省营山县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0年3月9日。
- (23)朱德同中共四川省仪陇县新寺区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0年3月9日。
- (24)羊慧明、张松休：《故乡人民的怀念》，《天津日报》1986年12月1日。
- (25)沈毓珂：《桃红李白故乡春——朱德同志回乡探亲纪实》，《党的生活丛刊》1980年第3辑第15页。

(26)齐志文：《仪陇的传颂——朱总司令和家乡人民的故事》，《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365页。

(27)中共仪陇县委员会、中共仪陇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仪陇人民永远怀念你！》，《学习朱总司令》，中共仪陇县宣传部，1977年7月。

(28)朱德同中共南充地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60年3月12日。

(29)朱德同吴芝圃谈话记录，1960年3月20日。

(30)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外出视察报告，1960年4月2日。

(31)《中央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1966年5月28日。

(32)朱德给刘少奇的信，1960年6月11日。

(33)《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年11月3日。

(34)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1月13日。

(35)朱德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1月18日。

(36)《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9月版，第54页。

(37)朱德视察上海、浙江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1961年1月30日。

(38)访问梁灵光谈话记录，1985年7月30日。

(39)访问王禹（原福建省委秘书长）谈话记录，1985年8月2日。

(40)访问夏波（原福建省委交际处处长）谈话记录，1985年8月3日。

(41)朱德视察福建、江西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1961年3月6日。

(42)朱德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13日。

(43)朱德视察四川省时的日记，1961年4月30日。

(44)朱德给毛泽东的外出视察报告，1961年5月9日。

(45)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5月31日。

(46)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6月6日。

(47)朱德为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1961年7月29日。

(48)朱德为转报《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1961年11月21日。

(49)(50)朱德：《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87—388、389—391页。

(51)朱德同刘俊秀谈话记录，1962年2月26日。

(52)朱德视察浙江、江西给中央的报告，1962年3月3日。

(53)朱德给周恩来的信，1962年4月16日。

(54)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8日。

(55)朱德视察陕西、四川给中央的报告，1962年5月20日。

(56)朱德视察四川西昌地区给中央的电报，1962年5月26日。

(57)朱德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62年7月22日。

(58)朱德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62年8月20日。

(59)朱德给李先念的信，1962年9月6日。

(60)朱德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9月25日。

(61)朱德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12月21日。

(62)朱德同上海市商业局、外贸局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12月24日。

- (63)朱德同中共海南区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月26日。
- (64)访问陈青山谈话记录， 1985年7月31日。
- (65)朱德和林李明谈话记录， 1963年1月26日。
- (66)朱德和刘建勋谈话记录， 1963年2月5日。
- (67)朱德同桂林市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月30日。
- (68)朱德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报告；1963年3月2日。
- (69)朱德同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3月19日。
- (70)朱德同廖志高、杨超谈话记录， 1963年3月30日。(71)朱德同任白戈谈话记录， 1963年4月13日。
- (72)朱德同杜心源、陈刚谈话记录，1963年4月27日。
- (73)朱德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信，1963年5月13日。
- (74)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3年5月18日。
- (75)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3年9月18日。
- (76)朱德给周恩来的信， 1963年10月15日。
- (77)朱德同中共保定地委和保定市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0月16日。
- (78)朱德同中共安阳地委、安阳市委和安阳专署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10月17日。
- (79)朱德同中共新乡地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0月17日。
- (80)朱德同中共开封地委和开封市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10月18日。
- (81)朱德同中共蚌埠市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0月19日。
- (82)朱德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10月20日。
- (83)朱德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信， 1963年10月29日。
- (84)朱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 1964年1月17日。
- (85)朱德同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4年1月27日。
- (86)朱德同杨尚奎谈话记录， 1964年2月5日。
- (87)朱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广西日报》1964年3月15日。
- (88)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外出视察报告， 1964年4月23日。
- (89)朱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4年12月27日。
- (90)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5年5月11日。
- (91)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2月30日。
- (92)陈友群：《朱老总与兰花》，《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7年2月7日。
- (93)虞佩珍：《朱老总与中山公园的兰花》，《北京晚报》1991年3月16日。(94)陈友群：《朱老总与兰花》，《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7年1月3日
- (95)访问关相生谈话记录， 1985年8月1日。

四十三、在“文化大革命”中

- (14)(17)(31)(32)访问康克清谈话记录， 1985年7月17日。
- 《中共中央通知》， 1966年5月16日。
- 指毛泽东于八届十中全会后提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32本马列著作。
- 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稿，1966年5月12日。
-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稿， 1966年5月24日、25日。
- 访问朱慎谈话记录， 1984年8月10日。
- 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 1966年12月6日。
- 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 1966年12月15日。
- 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 1967年1月11日。
- (11)(38)高振普：《最后的相见——记朱德同志看望病中的周恩来同志》，《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6期。
- (12)(13)聂元梓交待材料， 1980年8月10日。
-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光明日报》1980年11月21日。
- (16)江渭清：《不尽的思念》，《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5月版，第339—340页。
- (18)访问朱慎谈话记录， 1984年8月10日。
- (19)(42)访问赵力平谈话记录， 1984年9月16日。
- (20)(21)(26)中发(1980) 77号附件10。
- (22)朱德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稿， 1968年10月15日。
- (23)谢富治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的插话，记录稿， 1968年10月17日。
- (24)萧克：《朱德之德》，《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5月版，第55—56页。
- (2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 1984年4月版，第272、249页。
- (27)康克清：《朱德革命实践中的一些重要情节》，《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
- (28)朱德在批林整风会议军委直属组会上的发言， 1972年5月26日。
- (29)(43)张玉凤：《毛泽东晚年生活的片断回忆》，《中国老年报》1989年1月4日。
- (30)《毛主席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 (33)新华社记者：《殷切的期望》，《光明日报》1977年7月28日。
- (34)萧华：《浩气传千古——怀念朱总司令》，《光明日报》1981年6月10日。
- (35)访问刘建谈话记录， 1991年11月15日。
- (36)吴德致朱德生平研究组的信， 1986年6月7日。
- (37)访问周桓谈话记录， 1978年11月27日。

(39)朱敏：《深情怀念周伯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

(40)刘俊秀：《忠诚革命贯平生丰功伟绩垂青史》，《江西日报》1977年8月5日。

(41)访问尹庆民谈话记录，1984年8月17日。

(44)胡耀邦：《在朱德同志100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日。

后 记

编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编辑出版《朱德选集》和《朱德年谱》的工作基础上，经过5年努力完稿的。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本书依据的主要资料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朱德5000余件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他所参加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从工农红军到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会议记录，他的大量工作笔记；还有，朱德在1937年口述、由他的秘书孙泐等记录的、8万字左右的《朱德自传》稿本。此外，我们还走访了许多同朱德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广泛查阅了各种报刊和回忆录等。力求根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比较翔实的信史。

本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劳动的成果，由金冲及任主编，龚希光任副主编。各章分工执笔人是。

一——四：于俊道

五——八，四十三：姚建平

九——十三，三十九：刘学民

十四：刘学民、李洪才

十五——二十，四十一：李洪才

二十一——二十四，四十：吴殿尧

二十五——三十三：龚希光

三十四——三十八：冯若赐、吴殿尧

四十二：李洪才、王纪一

金冲及统一地对全书作了仔细的增补修改，并负责定稿。龚希光除执笔抗日战争部分外，还负责全书编写的组织工作和书中照片、插图的选定。周中菊、张平晔参加了部分编写工作。

李琦同志审阅了全部书稿。

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当的地方，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PGN0812.TXT/PGN>

